

上冊

新發現的

周恩來



司馬清揚 歐陽龍門 著

明鏡出版社 www.mirrorbooks.com



新發現的周恩來

司馬清揚 歐陽龍門

內容簡介：

周恩來是神？是鬼？還是人？無論如何，周恩來作為中共歷史上非常特殊的人物，對於中共的創建、政權的奪取以及執政，所起到的作用和地位都是無人可以取代的。

周恩來的兢兢業業的形象，非常符合世俗的道德傳統。特別是去世後的周恩來，又被中共樹立為道德楷模，被請上「神壇」。而在當今互聯網上，又有人把周恩來打入「地獄」。

「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是非功過」。本書用大量的史實來論證周恩來不為人知的另一面。周恩來是否真的是「參天大樹護精華」？周恩來的檢討到底是為誰而作？周恩來在建國後什麼時候成為真正的大管家？在打倒彭德懷、打倒「彭羅陸楊」、打倒劉少奇、逼走林彪等中國建政以後諸多重大事件里，周恩來到底起了什麼作用？至於令人「談虎色變」的中共中央專案組，周恩來在其中的角色到底如何？「批林批孔」的真實目的是什麼？周恩來與鄧穎超的真實關係如何？

本書依據衆多知情人的口述和檔案材料，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史實，並對諸多重大問題展開了討論，在大量的史實考證的基礎上，提出許多新的看法與思路。諸如建國伊始，毛澤東就想拿掉周恩來，而取代周恩來的人選一直以來則是鄧小平等等。

周恩來既不是神也不是鬼，而是作為一個無法超越歷史條件限制的人——「政治家」存在。而這個存在，是有代價的……由此展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一個嶄新的、立體的、完整的、真實的周恩來形像。

作者簡介

司馬清揚：曾用名蓑笠翁，美國加州大學畢業，在網絡和電子雜誌諸如《記憶》等上發表多篇文章，計有四十多萬字，曾經被一些頗有影響力的報刊、雜誌、書籍引用，專長於中共黨史，特別文革時期的研究，被《亞洲週刊》評價為對「林彪一案」做出突出貢獻的研究者之一，參與過明鏡出版社出版的《百年林彪》的編寫。

歐陽龍門：在美國從事信息技術工作。業餘愛好中共黨史，尤樂於為中共官方黨史拾遺補缺，糾錯澄清，使之更加完善、全面。偶有帖子發於網上，也參與過明鏡出版社出版的《百年林彪》的編寫。

《新发现的周恩来》目录

序言 千秋功罪任評說——解析“文革”中的周恩來 丁凱文 9

(一)“文革”中周恩來与毛澤東的關係。 10

(二)周恩來与江青等“文革”极左派的關係 11

(三)“文革”中周恩來与林彪的關係。 13

(四)周恩來与其他中共老干部之間的關係 14

導言 19

第一部分

第一章 七千人大會以前：在權力鬥爭中掙扎 29

一、高饒事件之後的政治格局 29

二、「反冒進」的由來 31

三、毛澤東對「反冒進」的批評 33

1. 毛的批評 31

2. 權力之爭

(1) 鄧小平的崛起 34

(2) 林彪取代彭德懷的跡象 36

四、周恩來的檢討 37

1. 周的檢討 37

2. 「躍進」的發明 41

五、反「反冒進」的後果 42

1. 劉、周之間的隔閡 42

2. 歷史的轉變 42

六、將功折罪 45

1. 廬山會議上的周恩來 45

(1) 引蛇出洞 45

(2) 廬山會議 48

(3) 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 51

2. 大饑荒中的周恩來 53

(1) 周恩來對於各地大量死人和農民缺糧是知情的 53

(2) 周恩來仍然決定賣糧食換黃金 56

第二章 文革前的四年：在「君臣關係」中揣摩 58

一、重新解讀七千人大會 58

二、周恩來在七千人大會之後的表現 64

三、整肅周的活動 67

四、為什麼毛最後還是決定先倒劉 70

五、局勢的發展 73

第三章 文革初期：積極配合毛髮動「文化大革命」 75

一、拿下楊尚昆 75

二、整肅羅瑞卿	76
三、清算陸定一	80
四、斗倒彭真	83
五、參與發動「文化大革命」	87
1. 隨著林彪一起念「政變經」	89
2. 處理廣播電台的安全問題	93
3. 肩負保衛首都的工作	94
4. 參與批判朱德	96
六、從工作組問題中脫身	97
七、積極支持中央文革小組	102
八、為毛的大字報張目	103
九、實際主持八屆十一中全會	105
十、林彪誣陷劉少奇的真相	107
第四章 天下大亂：成為真正的「總管家」	109
一、周恩來的困境	109
二、因林、鄧的矛盾而避過鋒芒	112
三、因陶鑄倒台而不可或缺	113
四、終於成了「總管家」	116
五、在軍管的過程中大顯身手	118
1. 公安系統的軍管	118
2. 鐵路、交通系統的軍管	120
第五章 二月逆流：協助毛成功地反擊	124
一、一月奪權	124
二、中央文革小組的崛起	126
三、毛對中央文革小組的批評	128
四、分析「毛澤東批評中央文革小組」	130
五、周恩來的反應	131
六、林彪的被動	132
七、徐向前的言行	134
八、陳毅的說法	138
九、反擊「二月逆流」造成的後果	139
十、尾聲	141
第六章 全面內戰：隨著毛的意志左右急轉	143
一、「5?13事件」和軍委辦事組的成立	144
二、「7?20事件」	148
三、急速的左轉導致了「全面內戰」	150
四、「全面內戰」使毛不得不緊急剎車轉向	154
第七章 艱難的收場：為毛收拾爛攤子	159
一、周恩來與造反派	159
1. 早期的造反派	160
2. 矛頭指向周恩來的造反派的命運	162

二、從全國奪權到山河一片紅	163
1. 山西	164
2. 四川	164
3. 浙江	167
4. 內蒙古	169
5. 廣西的大屠殺	175
三、「楊、余、傅事件」	179
四、清理階級隊伍	183
第八章 「九大」前後：為毛鞏固文革的勝利	187
一、八屆十二中全會	187
二、「九大」的召開	189
三、「九大」前後的一些國內外重要政策的變化	190
1. 外交	190
2. 內政	194
四、「九大」之後新的政治格局與走勢	195
五、九屆二中全會	200
1. 九屆二中全會之前	200
2. 周恩來在九屆二中全會上半段的表現	201
3. 周恩來在九屆二中的後半段	203
六、九屆二中全會餘波	206
1. 王良恩之死	206
2. 周恩來與檢討	207
七、批陳整風匯報會	208
第九章 「林彪事件」：進入新一輪的鬥爭	215
一、周恩來和林彪的關係	215
1. 周恩來的「積極」、林彪的「被動」	215
2. 周恩來與林彪的的互動、兩人的不同	222
3. 周恩來調解林彪和江青等人的衝突	225
二、在毛、林衝突之間	228
1. 周恩來勸說黃、吳、李、邱作檢討	228
2. 周恩來要和林彪劃清界限了	231
三、「九?一三事件」	233
1. 事件突然爆發	233
2. 「9?13事件」對周恩來的衝擊	236
3. 新一輪的迫害	238
4. 「九?一三事件」之後的新的政治格局	240
第十章 起伏的兩年：從最高點跌落到受批判	242
一、「九?一三事件」以後的調整和落實政策	242
1. 各個領域的調整	243
2. 解放幹部	246
二、「批林整風」匯報會	249

1. 「批林整風」匯報會的起因	249
2. 周恩來的檢討	251
3. 毛澤東致江青的信	252
三、從批「極左」到批「極右」	254
1. 批「極左」引起的爭執	254
2. 王若水的信引起的風波	259
四、在毛主導下繼續調整	261
五、外交部「1 5 3新情況」事件	266
六、「十大」的召開與王洪文等人的崛起	269
七、嚴厲的批周會議	276
1. 批周的借口	277
2. 批周的過程	280
3. 批周的結局	282
4. 批周的的餘波	284
第十一章 「批林批孔」批周公：在身受其害的同時推波助瀾	286
一、「批林批孔」的意圖在於批周及整軍隊	286
1. 「批林批孔」的興起	287
2. 周恩來的困境	289
二、1 9 7 4年1月的在京「批林批孔」大會	290
1. 軍委六人小組的成立以及駐京部隊「批林批孔」動員大會	290
2. 1月25日中央、國務院直屬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	291
3. 毛澤東的策略	292
三、周恩來的雙重角色	294
1. 由被動轉為主動	294
2. 針對周恩來的一系列攻擊	296
四、穩定社會和經濟秩序與更露骨的批周	298
1. 「批林批孔」造成的社會影響	298
2. 「評法批儒」	301
五、「批林批孔」的終結	302
1. 軍隊中的「批林批孔」	302
2. 八大軍區司令對調的妙處	305
3. 8月軍隊高幹會議	306
4. 試點——總政治部	307
六、周恩來的日子不多了	310
七、周恩來與鄧小平的崛起	312
1. 毛、周、鄧的三角關係	312
2. 鄧小平取代周恩來的歷史沿革與鄧小平復出的背景	314
3. 鄧小平復出的過程	317
(1) 毛澤東對鄧小平的刻意保護	317
(2) 邁出關鍵的一步	319
(3) 非常緩慢的陞遷	324
(4) 出席聯合國大會的風波	327

第十二章 四屆人大以及最後的日子：終於沒有被「打叉叉」	331
一、四屆人大的緣起與拖延	331
二、四屆人大準備工作中的插曲：「風慶輪事件」	334
三、四屆人大人事安排中並無兩條路線的鬥爭	339
1. 關於總參謀長人選的爭論	339
2. 文化部、教育部部長人選的爭論	340
3. 「四人幫」有利用四屆人大組閣陰謀嗎？	342
4. 關於兩個史實的說明	344
5. 關於江青、張春橋叛徒問題	345
四、1975年中國的政治舞台	347
五、生命的終結	353
六、餘波	354
第二部分	
第一章 周恩來在對毛的個人崇拜中的責任與特色	357
一、周恩來在大搞個人崇拜中的首創性	357
二、周恩來搞個人崇拜注重娛樂性與藝術性	361
三、在崇毛的同時貶損自己	364
四、結束語	365
第二章 周與中央文革小組以及江青的關係	366
一、中央文革小組、中央文革碰頭會	366
1. 周恩來與中央文革小組的成立	366
2. 中央文革碰頭會的由來	367
二、周恩來與中央文革小組的關係	368
1. 周與中央文革小組的衝突	368
2. 周同中央文革小組關係的另一面	370
三、周恩來和江青的關係	371
1. 江青的陞遷	372
2. 對江青的吹捧	372
3. 江青和周恩來的互動	375
4. 周恩來和江青的關係受到毛周關係的制約	377
四、結束語	379
第三章 「伍豪啟事」風波	381
一、「伍豪啟事」的起源	381
二、「伍豪事件」的澄清	383
三、《關於國民黨造謠污蔑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的真相》的報告	387
四、周恩來的叛徒情結	389

第四章 周恩來在中央專案組中的作用	393
一、中央專案組的發端與演變	393
二、周恩來是中央專案組的實際負責人	395
三、紅衛兵是周恩來抓叛徒的「衝鋒隊」	398
四、專案組的證據與周恩來的指導	399
第五章 「周恩來保人」的真相	402
一、保護與解放老幹部：真正起決定作用的是毛澤東	402
二、周恩來的保人特色面面觀	403
1. 黑幫、黑線	404
2. 廖承志的個例和周恩來對「親者」的拋棄	404
3. 看毛澤東的臉色行事	405
4. 點點滴滴	407
三、假象或隱情	408
第六章 劉少奇的冤案與周的參與	410
一、支持毛把劉少奇拉下馬	410
二、協助毛把劉少奇置於死地	412
第七章 周恩來「保陳毅」的真相	417
一、在「一批二保」的前提下力保陳毅	418
二、在事過境遷之後拋棄陳毅	423
第八章 彭德懷的冤案與周的责任	427
一、廬山會議前後	427
二、彭德懷被「揪回」北京	429
三、彭德懷被批鬥	430
四、彭德懷專案組組長	431
第九章 賀龍被整與周在其中的作用	433
一、毛、劉衝突是賀龍遭整肅的根本原因	433
1. 毛、劉衝突	433
2. 整肅羅瑞卿	434
3. 賀龍和劉少奇、羅瑞卿之間的關係	436
4. 毛澤東對賀龍的態度	438
5. 林彪與賀龍的歷史糾葛	441
二、毛澤東終於作出整肅賀龍的決定	443
1. 賀龍在文革初期的表現	443
(1) 文革初起	443
(2) 賀龍「插手」軍隊	444
2. 毛澤東決定整肅賀龍	448
3. 林彪參與整肅賀龍	450
4. 周恩來也對賀龍不滿	453
三、周恩來負責實施整肅賀龍的決定	455

1. 周恩來出面向賀龍攤牌	456
2. 賀龍專案組的設立	457
3. 賀龍的罪名	459
(1) 晏章炎揭發賀龍通敵	460
(2) 烈士段德昌遺孀揭發賀龍殺害段	460
(3) 李仲公揭發賀龍通敵—最致命的揭發	462
4. 周恩來的責任	464
四、艱難的平反過程	465
五、分析和結論	467
1. 毛澤東的作用	467
2. 林彪的作用	467
3. 周恩來的作用	468
4. 結論	469
第十章 周恩來與清查「五?一六」運動	471
一、「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的起源與瓦解	471
二、周恩來與中央文革在清查「五?一六」中的密切合作	473
1. 清除王力、關鋒、林傑	473
2. 清查「五?一六」的嚴重擴大化	475
3. 清查「五?一六」成為周恩來同中央文革的粘合劑	479
4. 清查「五?一六」擴大化的一個樣板	481
三、外交部的清查「五?一六」運動	482
四、結束語	485
结束语：笔者对周恩来的认识	486
一、周恩來是一位不合格的總理	486
二、周恩來是為毛一個人服務的	489
三、如果沒有周恩來，文革的災難是否會更大？	490
四、從沒有主動地去害過任何一個人的謊言	492
五、周恩來成為偉人的背後	493
後記：寫作的起因與致謝-司馬清揚	496
「後記之二：寫作的過程——歐陽龍門」	498
文獻注釋	500-648

丁凱文

友人司馬清揚與歐陽龍門新近撰寫了《新發現的周恩來》，這是海外研究中共領導人周恩來的一部新的力作。承蒙作者的信任，筆者有幸先睹為快，願就周恩來“文革”作用談一些自己粗淺的看法，行文倉促，草成此序，還望不負作者和讀者們的期望。

對於周恩來的評價，國內與海外本來就有很大的爭議。國內黨史學界自然是秉持官方一貫的說法，將周恩來美化為“聖人”，是上個世紀的“偉人”，是“文化大革命”當中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作鬥爭的“正面人物”，是“苦撐危局”的中流砥柱，是“文革”正確路線的代表。本人手頭就有幾部代表官方觀點的專著，一部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纂的《周恩來傳》，一部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劉武生撰寫的《周恩來的晚年歲月》，還有一部是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石仲泉撰寫的《我觀周恩來》，國內類似頌揚周恩來的書籍更是汗牛充棟、不知凡几。不同於國內官方觀點的海外著述，當推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其價值有目共睹。海外因《晚年周恩來》一書的出版曾掀起了一股重新評論周恩來的熱潮，一些文章亦不乏真知灼見，但也難免有些粗制濫造的坊間讀物充斥其間，為學術界所不取。總體而言，這幾年間海外有關周恩來的研究並未有更為深入的進展，究其原因，不外缺少相關的內部檔案資料，而所披露者又多為歌功頌德，不少“文革”中的當事人按官方的口徑對周恩來隱惡揚善，鮮少觸及那些敏感話題；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難於對周恩來其人具有準確和全面的把握。然而，司馬清揚與歐陽龍門廣泛地收集了大量的資料，在前人的基礎上將“文革”中周恩來的言行、作用作了極為深刻的剖析，將周恩來許多不為人知的另一面展現在世人的面前，使人們對“文革”中的周恩來有更為深入的了解和認識，筆者對此深表贊賞。

筆者曾經撰寫過有關周恩來“文革”作用的文章，深知重新評論周恩來的難處。海外著名政論家胡平先生在論述周恩來時言：“評周最難。評周之難，不僅在於我們對其行為難有全面的了解；評周之難，尤其在於我們對其處境難有準確的把握。”胡平先生進一步闡述說：“鄧小平也說，周在文革中‘經常要說一些他不愿意說的話，做些不愿意做的事’。問題是，周的言行哪些是違心，哪些是本意呢？我們總不能說，周的言行，凡是好的都是真心是本意，凡是坏的都是違心是無奈。……關鍵在於，周在中共體制中究竟處於何種境地？周順從毛，有幾分是主動，幾分是被動？主動意味著什麼，被動意味著什麼？考慮到周本人正是該體制的締造者之一，上述問題就變得更複雜了。凡此種種均可表明，評周確實相當困難。儘管說人們對毛的評價也有很大的分歧，但評毛的分歧多半源於不同的價值標準；而在評周的問題上，即便是持有相同價值標準的人也常常得出很不相同的結論。”（1）筆者對此論述深表贊同。那麼我們應該怎樣全面認識、理解“文革”中的周恩來呢？

筆者認為至少有以下幾層關係值得我們深入分析和探討：

（一）“文革”中周恩來與毛澤東的關係。

在“文革”當中，周恩來對毛澤東的態度是周恩來從事及處理一切其他要務的首則，是所有相關線索中的最為關鍵的主線，這個問題搞清楚後，其他問題也就不難搞清了。

從歷史上來看，周恩來與毛澤東在黨內的政治地位有過一段曲折的變化過程。在北伐戰爭和第一次國共內戰期間，周恩來在黨內和軍內的地位都曾高於毛澤東。周恩來當年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曾在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前後排斥過毛澤東，以致毛澤東被罷黜了紅軍中的領導職務。中共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中央蘇區和紅軍遭受重大損失，不得不開始大轉移——“長征”，周恩來對此負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周恩來在1935年的

遵義會議上支持毛澤東重返紅軍的領導崗位，後來在延安亦支持毛澤東斗垮了張國燾。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整垮了王明，成為中共黨的實際領袖，周恩來更是洗心革面，努力、深刻地檢討自己以往的錯誤，最終得到毛澤東的寬容而留在中央高層，但是其黨內地位則降到劉少奇之后。解放戰爭時期周恩來一直從旁協助毛澤東，僅僅扮演了幕僚的角色，未曾單獨主導過全党或某一個大區的工作，這一點遠不如同一時期的劉少奇和林彪等人。事實上自延安整風之后，周恩來在黨內就一直是個輔佐最高領導人的角色，終其一生沒有變化。中共建國后發生的幾次黨內鬥爭，周恩來都毫無保留的堅定地站在毛澤東一邊，維護毛澤東的權力和地位，并与其他中共領導人一起不遺余力地為毛澤東制造個人崇拜。了解這段歷史在于說明，周恩來與毛澤東的這段曲折變化的關係是周恩來日后的一塊心病，周當年在蘇區執行了所謂的王明路線，排斥過毛澤東，這就成為周恩來一生當中沉重的歷史包袱，這也是周恩來後來步步緊跟毛澤東，在政治上異常小心謹慎的最重要的原因。了解這段歷史即可了解周恩來在“文革”當中對毛澤東的態度。

周恩來在“文革”中是什麼態度呢？我們可以用“兩個堅決”作一個簡單的概括：堅決擁護、支持毛澤東的“文革”路線，堅決貫徹、執行毛澤東的“文革”戰略部署。在“文革”期間，周恩來從未就“文革”的發動、發展提出過任何重大的方針、政策，一切均唯毛澤東馬首是瞻，舉凡毛澤東提出的方針、政策，周恩來無不立即表態支持和擁護，從無異議，更不用說反對了。舉例來說，早在1965年夏季毛澤東就已開始著手軍隊內部的部署，開始作所謂“防止反革命政變”的工作。在1966年5月份的政治局會議上，林彪按照毛澤東的意圖發表了一篇“防政變”的講話，周恩來對此心領神會，隨即予以支持和響應，在5月21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發表了與林彪講話內容完全一致的講話，不僅稱贊林彪講話講得好，還提出“主要問題是防止修正主義當權。彭、羅、陸、楊是一個一個地奪取我們的陣地，有筆杆，有槍杆，有黨權。第二是防止修正主義發生政變。第三要防止修正主義的軍事政變。”（2）還如，1966年10月1日，王力等中央文革筆杆子在《紅旗》雜誌上發表《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的社論，社論中首次提出毛澤東自己審定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提法，周恩來由于沒有參與其間，故似乎並未進入狀況，遂詢問王力：黨內涉及路線問題時過去都是提左傾或右傾，沒有“資產階級”和“反動路線”的提法。周對此感到心里沒底，隨後以小學生的姿態向毛請教，得到毛的答复后，周最后心悅誠服地對毛說“我懂了”。（3）再如，毛澤東在1967年初號召各地造反派造反奪權，特別是“上海一月革命”后奪權之風日盛，周恩來在1月14日接見各大區和省委書記的講話中說：“主席大方向抓得很緊，大家跟不上，要緊跟，……這個路線的名稱叫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有的說是資產階級反對革命的路線，總之，性質是一樣的。”（4）此類事例不勝枚舉。這些情況在在說明，周恩來對毛澤東的“文革”路線持的是堅決擁護和支持的態度。至于“文革”期間周恩來貫徹、執行毛澤東的各項戰略部署更是兢兢業業、任勞任怨，唯恐不合毛澤東的旨意。王力回憶說：“對周總理，毛主席不滿意……但毛主席對周總理還能合作，因為周總理向來是主席一講他就馬上擁護。總理自己講他是管策略的，搞戰術性工作。”（5）“文革”中的所有重大事件都離不開周恩來的具體處理，從“文革”初期的中央文革碰頭會，到中共“九大”之后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從“九一三事件”到中美外交關係的和解等等，周恩來可以做事無巨細、面面俱到。在具體的工作中，大到“三支兩軍”的部署、各省、直轄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的建立、以及國防、外交，黨內鬥爭人員的處理等，小到革命樣版戲里的台詞、唱腔、身段、服裝造型等等，無一沒有留下周恩來的身影和辛勞。這已經有太多的回憶和文字予以記載。可以說，周恩來成為毛澤東的大管家，毛澤東的指示精神都由周恩來具體操辦予以實現。用一句形象的話來說，就是“謀事在毛，成事在周”。毛澤東自己甚至說過：“不管是我、少奇、林彪、小平，都離不開總理。總理不能當第一把手，可是誰當第一把手都離不開他。”（6）換句話說，這些能當第一把手的人都離不開周恩來在具體事務上的操辦，“文革”

當中的周恩來將這一特點表現得淋漓盡致。因此，我們可以確定，周恩來是堅定的毛派、左派、革命派，是屬於“毛主席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周恩來“文革”當中的所做所為實為真心實意，不能簡單地以所謂“違心”一詞予以解釋。鄧小平日后用所謂“違心”一詞為周恩來作開脫，根本就是罔顧事實的一個遁詞，與真實的歷史完全不符。搞清了周恩來對毛澤東的真實態度，厘清了所有複雜政治關係當中的這條主線，也就不難理解周恩來“文革”當中的所做所為了。

（二）周恩來與江青等“文革”極左派的關係

周恩來“文革”期間對江青等“文革”極左派的態度，實際就是周恩來對毛澤東態度的延續。雖然“文革”當中江青有過數次想整倒周恩來，但是周恩來對江青卻是一如既往地尊重、關懷、照顧、忍讓，乃至遷就、縱容。在“文革”初期，毛澤東通過非正常的手段突出江青的政治地位，使江青一鳴驚人，周恩來揣摸毛意堅持提名陳伯達出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而陳伯達順勢提名江青出任副組長（7），江青由此一躍而成為領導“文革”運動的中央領導人。

周恩來在1966年10月18日接見北京各院校師生員工時頌揚江青說：“這兩年來她搞文化大革命是很辛苦的，取得了很大成績”，同年11月28日在文藝界大會上，周恩來再次說：“我在這裡要介紹一下在座的陳伯達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是堅決擁護和執行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上面所說的文藝革命的成績，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導分不開的，都是同文藝界的革命左派的支持和合作分不開的。這是同從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貫穿在文藝界的一條修正主義黑線進行堅決鬥爭的結果。江青同志親自參加了鬥爭實踐和藝術實踐。雖然艱苦的鬥爭損害了江青同志的身體健康，但是精神上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夠補償這些損失。”（8）據列席中央文革碰頭會的邱會作回憶說：“過去的中央碰頭會，名義上是周恩來在主持，事實上是江青在主持……過去的中央碰頭會，江青不到不能開會。……過去碰頭會開會之前，周恩來總要謙恭地問江青一句：江青同志，我們開會嗎？江青不點頭不搭話，周恩來一般不會馬上宣布開會。……過去的中央碰頭會，是江青這個‘霸王’呈威風的地方。凡是要經過碰頭會處理的事情，無論大小，江青不點頭不能算數。”（9）參與中央文革碰頭會的吳法憲回憶說：“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周恩來對江青、康生都十分尊重，幾乎從來不否定他們的意見。”而江青卻蠻橫地指責周恩來說：“你周恩來，不是我們中央文革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周恩來勉強地說：‘江青同志，你比我強，我得向你學習。’吳法憲最後說：“以後江青越來越囂張，而周恩來對江青，維維諾諾不敢犯顏。”（10）這一時期的周恩來淪為中央文革的走卒。此時的周恩來還為江青辦了不少私事，包括江青一些無理要求，如江青要求派人到上海抓捕當地的公安幹部，周恩來隨即布置派人把所謂搞江青材料的人統統抓起來，并把這些材料統統收到北京。（11）中共“九大”之後，周恩來在毛澤東、林彪的支持下開始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由於有了林彪為首的軍委辦事組的大力支持，周恩來在政治局內部有了較為堅實的組織基礎，不必事事都看江青的臉色行事了，但依然不敢真的觸動江青，對於來自江青的指責和攻擊，周恩來也只能私下嘆氣，惶論與之鬥爭。1969年底到1970年5月，江青曾四次背著周恩來私下召集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員開會發泄自“九大”後對中央工作的不滿，後兩次專門誹謗和攻擊周恩來。邱會作回憶說：“這一次我把下午江青講的詳細地說了一遍，周恩來一聽就覺得有份量，一邊聽一邊作筆記。他非常難過地說：‘唉，這個人呵，幾十年我對她是仁至義盡，能做的都為她做了，可以說是無微不至，堅持照顧她幾十年呵，人不能不講良心呀。’”（12）林彪倒台後，“文革”極左派們在毛澤東的扶植下開始把持中央，而周恩來則缺少了來自軍隊老干部的支持，政治勢力大不如前。中共“十大”召開前，周甚至只能作“造反派新秀”王洪文的輔佐人。1974年

毛澤東導演，江青親自上陣的評法批儒事件，更使周恩來陷入空前的危難之中，若非檢討及時，自我作踐，以及身患不治之症，周恩來還真有可能過不去這個坎，周恩來怎麼可能會如後來鄧小平所拔高的“與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長期的堅持不懈的鬥爭”？“二月逆流”中的葉劍英、譚震林和陳毅，廬山會議上的林彪以及後來搞了整頓的鄧小平，都曾與江青等“文革”極左派作過鬥爭，但是很快就被毛澤東毫不留情地趕下了台，林彪甚至還命喪異域，唯獨周恩來卻總能全身而退，因為周恩來心里十分清楚，江青這伙人是不能隨便觸動的，一旦觸動了紅朝女老板江青這個“文革”圖騰，觸及了毛澤東的“文革”底線，那么在毛澤東眼皮底下一天都混不下去，只能招致自己的迅速毀滅，周恩來當然明晰這層利害關係，這也就是周恩來極盡“保持晚節”和順守之道的根本原因。

在政治上，周恩來決不敢與江青作對，生活上則對江青呵護備至。這樣的事例有很多，如處理江青身邊醫療事務，委派醫生、護士，解決江青的私人糾紛等。可以說，周恩來對江青的照顧、關懷無微不至。如果讓江青自己也寫一份回憶周恩來的記述，其內容絕不亞于周恩來對其他老干部的關懷和愛護，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邱會作回憶說：“周恩來對江青的認識與眾不同，認為‘江青問題’是关系到全黨的‘政治大問題’，一定要處理好，否則會影響全党全國的大局。因此周恩來對江青處處關照、愛護、幫助、忍讓，甚至有時有些放任，只要她不鬧事就好。”（13）邱會作是中央文革碰頭會的列席者和後來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成員，他的親身經歷和體會非常具有史料價值。周恩來不僅對中央里的老干部多有關照，對於那些在地方造反起家的“文革”新秀亦是如此。張春橋在上海的親信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多年後也曾深情地回憶說：“我對周恩來懷著一種對待自己父輩一樣的感情，是有著特殊原因的，我覺得他待人十分平等，而且對年輕干部特別關心和愛護。”徐景賢通過几件小事描述了周恩來對他的關愛，徐最後說：“我從心底里尊敬周恩來，也牢記他對我的厚愛。（14）周恩來在1971年還提名徐景賢出任上海市委書記。對於遠在上海的徐景賢，周恩來尚且關愛有加，相信近在北京的張春橋、姚文元等人更能得到周恩來的關懷與照顧了。至于周恩來與康生的關係，就更加密切了，他們之間的關係可以追溯到第一次國共內戰之時共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工作，那時他們就形成了密切的友誼，“文革”期間周恩來與康生的關係更加密切，“文革”期間江青確曾多次向周恩來發難，但我們從未見到康生予以響應。有資料說康生病逝之前曾強拖病體單獨與周密談，如非關係密切是絕不會有此現象的。

總的來說，周恩來對江青和“文革”極左派們的態度是以對待毛澤東的態度為前提的。毛澤東大搞“文革”運動必然要信任和重用這批人，周恩來也自覺自願地處理好與他們的關係，不僅在政治上步步緊跟，同時也在生活上處處加以關照，對這批人的態度其實也就是對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的態度的延伸。顯然，周恩來做到了面面俱到，得到大多數人的稱道和愛戴。

（三）“文革”中周恩來與林彪的關係。

“文革”期間周恩來對林彪的態度，同樣也是以毛澤東對林彪的態度為態度的。但是周恩來與林彪的關係又與江青等“文革”極左派之間的關係大有不同。筆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對此加以論述（15）。概括而言，從歷史上來看，林彪長期以來就是周恩來的學生和戰友，從黃埔軍校到北伐戰爭，從第一次國共內戰到紅軍長征，從抗日戰爭到第二次國共內戰，周恩來與林彪都經歷了那段出生入死、如火如荼的歲月。林彪自1959年接替彭德懷出任國防部長後，就一直大力支持周恩來在國務院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和林彪的關係更形密切，在中央內部的軍隊一方和江青“文革”極左派等人的矛盾中，在“文化大革命”的很多具體問題上，周恩來都是靠向軍隊一邊，也就是靠向林彪一邊。

周恩來對林彪的態度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周恩來對林彪的大力稱頌。八屆十一中全

會后，周在各种場合都堅決擁護林彪作為毛澤東的接班人，“文革”中周恩來發表的講話里就曾反復稱頌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是我們的副帥”，甚至在中共“九大”上周恩來還發表長篇講話，從歷史講到現實，大力歌頌林彪。周在黨內地位原本一直都高于林，但是為了樹立林彪接班人的形象，周恩來甘為人下，以此成為全黨的表率。第二，周恩來對林彪極為尊重。周恩來不僅在公開場合注意突出林彪的地位，在向毛澤東匯報請示時也同樣向林彪作匯報，有時甚至毛只交代周辦的事情，周也向林彪通報，表現出周恩來很強的組織觀念。王力以自己的親身觀察說：“總理對林彪還是很尊重的。”第三，周恩來對林彪的保護。廬山會議上由于林彪發起的對“文革”極左派張春橋批判，引發了毛澤東的不滿。周恩來連夜為林彪修改講話稿，甚至致信康生幫助修改，並說“此事純屬愛護副帥，忠黨，忠于領袖。”（16）與此同時，周恩來還在廬山上向毛進言，請毛在《我的一點意見》上去掉吳法憲的名字，同時周也幫助吳法憲寫檢討，保護了吳法憲暫時沒被打倒。下山后周更設法幫助軍委辦事組黃吳李邱諸人檢討過關。周恩來明白，保護了軍委辦事組也就保護了他們背后的林彪。第四，周恩來對林彪領導下的軍委辦事組的工作大力支持，其中涉及軍隊的戰備工作、國防工業建設、對外軍事援助等。“九大”后中國的經濟建設開始逐步步入正軌，取得了許多做人的成績，如氫彈爆炸成功，人造衛星上天，核潛艇研制成功等。軍隊投入“三支兩軍”的工作也順利展開，不僅穩定了全國的局勢，且迅速恢復了由于“文革”運動造成的生產停滯，使國民經濟有了較快的發展。第五，周恩來與林彪之間有著長達四十年的深厚友情，用“生死之交”來形容亦不為過，兩家關係也十分密切，高層人士之間對此也是十分了解的。

反過來我們再看林彪對周恩來的態度。林彪長期以來就支持周恩來在國務院的工作，“文革”期間亦然。林彪領導下的軍隊系統堅決支持了周恩來在中央碰頭會和後來的中央政治局會議的工作，無論是葉劍英、楊成武主軍之時，還是黃永勝、吳法憲的軍委辦事組當權之際，軍隊不僅從未參與過中央文革的倒周活動，而且大力維護周恩來的執政地位，這與林彪對周恩來的態度是分不開的。林彪明示軍委辦事組諸人要尊重、支持周恩來的工作，甚至在江青惡意攻擊周恩來時，林彪不怕得罪江青，要軍委辦事組向毛澤東反映情況，并向周恩來及時通報。正是由于周恩來與林彪相互尊重與支持，且政治理念一致，周恩來與林彪的關係在“文革”期間處於最佳時期，而這恰恰是現在官方所刻意回避和掩飾的。

（四）周恩來與其他中共老干部之間的關係

事實上，周恩來與其他中共老干部之間的關係也是以毛澤東的態度為態度。毛澤東發動的這場“文革”運動，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解決接班人的問題。然而，這場運動卻是要由毛澤東自上而下發號施令，再由下層普羅大眾自下而上完成所謂的“奪權”鬥爭。這裡首當其衝的就是黨的各級幹部，上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家主席，下到基層黨支部書記都屬或被批判、靠邊站或被打倒被奪權之列，其範圍之廣，規模之大，人員之多，影響之巨都創造了歷史之最。但是，哪些老干部當屬被打倒之列，哪些老干部當屬被沖擊卻要“燒而不焦”之列，這些無疑都在毛澤東的全盤考慮之內，有時要根據情況的變化而調整，更要根據他們在“文革”中的具體表現加以區別對待，而周恩來就恰如其分地扮演了這一重要的角色。

“文革”結束後，不少中共老干部都曾深情地回憶周恩來對他們是如何保護的。筆者不否認周恩來的確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下保護過、關照過一批老干部。但是保護和關照的前提卻是要看毛澤東、江青的臉色行事，絕非周恩來自己能擅自作主。比如鄧小平這位劉少奇司令部的二號人物，毛澤東並不想將其徹底打倒，而是區別對待，將鄧小平與劉少奇分割開來。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當然可以在某種程度上予以適當的關照。劉少奇、鄧小平雖屬同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只有打倒了劉少奇才能證明“文革”運動的及時、正確，但是鄧小平

原本就是毛澤東的自己人，是毛澤東曾經屬意的接班人之一，“文革”前鄧走到劉的一邊，引發毛的不滿，需要整一下，但是毛并不想徹底整死鄧小平。外邊大批、特批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但是鄧小平本人卻還住在中南海，安然無事，并未遭受劉少奇那般摧殘和折磨，後來因為對蘇戰備，鄧被“疏散”到江西，但卻住進了將軍樓，還有夫人、子女、秘書等生活在一起，并未遭什麼罪。這些當然是出自毛澤東的決策，周恩來負責實施而已。王力回憶說：“據我所知，所有保的人都是毛澤東決定，周恩來執行。毛澤東不決定，周恩來不敢也不能去做，重要干部他不能決定。”（17）

這裡我們還必須論及周恩來與中央專案組的關係。據王力回憶，大約在1966年的5月中央成立了專案組，這是與中央文革小組並列的機構，直接對毛澤東負責，專案組下設四個分組，分別有周恩來、康生、陳伯達和安子文負責，而周恩來就是這些專案組的總負責人。以後這些專案分組的負責人有所變化，但是周恩來卻一直擔任這個總負責人，直到去世。中央專案組在其成立之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等也搞了不少類似的專案組，其存在期間搞了大大小小無數的案子，這些案子可以說，毫無例外都是冤假錯案，這實際是中共極左政策造成的必然結果。周恩來作為這些專案組首要負責人當然要負最主要的責任。

具體而言，對於那些被打倒的高層人士，都必須有毛澤東、周恩來的簽字、批准。何人應被軟禁在家、划地為牢，何人要被軟禁在北京衛戍區或送到外地隔離看管，以及何人要被關進秦城監獄等，這些都要由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旨意視具體情況而定。比如，劉少奇是毛澤東“文革”運動當中首要被打倒之人，周恩來對此心知肚明。在對劉少奇的處理方面，周恩來是很嚴厲的。劉少奇先被在自己家中隔離起來，划地為牢，再交由“群眾”批斗，隨後受到中央專案組的審查，以至後來劉被定性為“叛徒、內奸、工賊”以及轉移到河南開封而死于當地，周恩來對此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賀龍是毛澤東“文革”開始時一直防范的人物，隨著劉鄧倒台，賀龍也被毛澤東批准隔離審查。據知情人透露，對賀龍，周恩來則是自己直接負責，別人不得插手。賀龍被軟禁在國務院西山象鼻子溝的戰時指揮所，由周恩來的衛士長楊德中直接管理。賀龍因病未能得到及時的治療而死，周恩來要負最主要的責任。另據知情人士披露，羅瑞卿是“文革”爆發前即被毛澤東打倒的軍隊領導人，羅瑞卿“文革”中的醫療管理也由周恩來直接負責，解放軍總醫院就羅的治療事宜只向周恩來一人報告，其他人均無權過問。解放軍總醫院只能提出醫療方案，但無權決定，所有治療均需經過周恩來的批准方可執行。如果說羅瑞卿因為不能得到及時的醫療而導致腿部殘疾，這不是正說明了周恩來應對此負有直接責任嗎？“文革”中軍內造反派曾經對羅瑞卿進行過殘酷的武斗，甚至用籬筐將羅抬致批斗會場。羅瑞卿當時由中央警衛團負責看管，若無毛澤東、周恩來的許可，羅瑞卿不可能被拉出去批斗遭迫害。其他中共高干則根據情況被分別關押在秦城監獄，如安子文、陸定一等，他們在獄中都受到非人的折磨和迫害。此外黃吳李邱這几位林系大將，在“913事件”後被送到北京市衛戍區隔離關押起來，這也是周恩來按照毛澤東的旨意所辦。這裡我們只舉這幾個最典型的例子，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周恩來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此，毛澤東是全盤政策的決策人物，周恩來則是按照毛澤東的旨意具體執行之。

整體而言，周恩來在毛澤東允許的範圍內保護了一批人，其中包括不少黨外人士，還有一些毛澤東并不想真正打倒的人。當然在處理過程中，周恩來也根據具體情況予以適當的關照，但是總體的政治格局是不可能改變的。然而往往這些口惠而實不至的“關照”卻頗能打動人心，不少曾經慘遭迫害的中共高干“文革”後都曾深情地回憶起周恩來是如何“保護”他們的，但是卻從不具體追究這些冤案是什麼人主持制造出來的，而那個時候的周恩來又在哪里，他們只是籠統地把一切罪責歸結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身上。一個最具代表性的事例就是，羅瑞卿至死都不忘周恩來的一句“珍言”：“一切仇恨要集中到林賊身上，一切恩情都來源于毛主席”（18）。對照羅瑞卿一案的整體過程和周恩來在其中的所做所為，這是一個多么諷刺的畫面啊！

通過上述幾個部分對周恩來“文革”中幾個最主要的關係的論述，周恩來“文革”中的整體輪廓和脈絡也就十分清晰了。毛澤東發動的這場史無前例的“文革”運動，主要依靠的就是三個人：江青在前台指揮造反派為毛澤東打倒自己的政敵而沖鋒陷陣，林彪指揮解放軍為毛澤東的“文革”保駕護航，而周恩來不僅負責貫徹、執行毛澤東“文革”的各項戰略部署，且負責保障“文革”運動順利進行的經濟基礎，一身兼任了毛澤東的“總參謀長”和“總后勤部長”，周恩來在軍隊事務上的發言權有時甚至大過林彪，如“三支兩軍”一事上，周恩來所起的作用就遠遠大于林彪。正因為周恩來是毛澤東“文革”運動最堅定的支持者、擁護者，同時又是最得力的貫徹者和執行者，再加上林彪為首的軍隊系統的大力支持，周恩來成為中共高層中一個無可輕易取代的人物。與此同時，周恩來也善于利用自己的人脈關係，營造對自己有利的形勢，及時杜絕任何可能形成的危險，把不利因素降低到最低點，有時甚至不惜犧牲他人而保存自己。雖然，周恩來在“文革”中也偶遇危難，但卻總能及時地化險為夷。最關鍵的一點是，周恩來更善于隱忍，機巧地把握好與毛澤東、江青的政治關係，永遠把自己擺在臣子、屬下的地位，對於來自毛澤東、江青的批評、指責甚至詆毀、謾罵，從不會公開說“不”，且時時處處地檢討自己以往的錯誤，唾面自干，向毛、江輸誠表忠，甘於作毛、江的奴才和工具。這正是周恩來之所以能夠在那波詭云譎、險象環生的條件下生存下來的最主要的原因。

筆者認為，國內官方的御用史學家們對周恩來的那些正面論述和評價有些并非全無道理。但是關鍵的問題在於，他們共同的特點都是以鄧小平的是非為是非來論述歷史，以中共中央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標準，按照黨的意志來解釋歷史。這樣就不可避免地陷入曲解、篡改歷史的處境當中。以周恩來與林彪的關係為例，當1980年8月鄧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的提問時，鄧小平將周恩來定性為“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而將林彪定性為“他們的目的就是陰謀奪權。所以要區別毛主席的錯誤同林彪、‘四人幫’的罪行。”1981年6月中共中央按照鄧小平定下的調子作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提及周恩來時該決議說：“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處於非常困難的地位。他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為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為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為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幹部，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費盡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這顯然不是真實的歷史。歷史證明，周恩來在“文革”中顧全的并非國家的大局和人民利益的大局，而是毛澤東一個人的大局，一個禍國殃民的大局；周恩來為了緊跟毛澤東的戰略部署，同時也是為了自保，周恩來在“文革”初期點名打倒了很多老干部，其數量之多絲毫不亞於江青、康生等人；所謂“周恩來與林彪、江青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一說，更是一個天方夜譚。對於鄧小平的“違心”之說，身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顯然是不認同的，陳伯達說：“人的認識需要有個過程。周總理有時也說了些錯話，現在說他說了違心的話，違心的話是有的，我也有過。可是人不可能經常說違心的話，主要還是認識上的原因，當時就是那樣一種認識。”（19）“違心說”不僅不能減輕周恩來在“文革”中的責任，反而使周恩來墮落成一個沒有人格的軟骨頭和偽君子。通過前文的論析，我們對周恩來“文革”中的作用就會有較為全面的認識與了解。

可喜可賀的是，司馬清揚和歐陽龍門的這部新書，將周恩來“文革”當中那些鮮為人知的一面，特別是官方史學家刻意掩蓋的周恩來的面目作了細緻、深入的剖析，諸如周恩來與中央專案組、周恩來與“清查‘五·一六’”的關係等等作了深入的探討，彌補了這些方面過去研究周恩來的不足。《新發現的周恩來》是一部嚴謹的學術著作，作者本著對歷史負責的精神，這些年來一直孜孜不倦地追尋歷史的真實，亦發表了不少有價值的文章，在文革史領域取得了相當的成就。筆者期盼此書的出版為世人深入研究、探討周恩來另辟蹊徑，同時也進一步推進文革史的研究。

注釋：

- (1) 胡平《解讀晚年周恩來》，載《北京之春》2003年第9期。
- (2)《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5月21日 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2006年版。
- (3)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1年10月版 第948頁
- (4)《周恩來接見各大區和省委書記時的講話》（1967年1月14日），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2006年版。
- (5) 同注（3）第711頁。
- (6) 同注（3）第724頁。
- (7) 陳曉農編注《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年版 第81頁。
- (8)《陳伯達江青周恩來謝鏜忠吳德在文藝界大會上的講話》1966年11月8日，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2006年版。
- (9) 邱會作回憶稿、談話稿，轉引自程光《1970年廬山會議背景的研究》，載《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下冊，田園書屋，2007年3月版 第613頁。
- (10)《吳法憲回憶錄》下卷，北星出版社 2006年9月版 第680—681頁。
- (11)《吳法憲回憶錄》下卷，北星出版社 2006年9月版 第706頁。
- (12) 同注（9）第632頁。
- (13) 同注（9）第618頁。
- (14) 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2005年1月版 第310—311頁。
- (15) 丁凱文《周恩來與林彪文革作用之比較研究》，載《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上冊，田園書屋，2007年3月版。
- (16)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 明鏡出版社 2003年4月版 第298—299頁
- (17) 同注（3）第922頁。
- (18) 羅瑞卿《黨的三大作風的楷模：回憶周總理》，見劉武生、徐曉紅編《評說晚年周恩來》 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6年9月版 第44頁。
- (19) 同注（7）第267頁。

導言

作者將從歷史的角度來描述和分析周恩來的另一面。這個另一面是為中共官方的政治宣傳有意掩蓋、有意忽視的一面；這個另一面也是為一些崇敬周恩來的人所不瞭解、或者即使瞭解了也不願意面對的一面。（本書作者之一也曾經是這樣的人）

如果說中共官方以及一些雖非官方但是有著和官方相同看法的人描述的都是周恩來的光輝的一面的話，那麼他們會認為作者描述的都是周恩來的「陰暗」的一面。但是，作者並不這麼認為，作者是站在歷史的角度、客觀地描述和分析那些「光輝的一面」所遺漏的史實。

作者不否認，有關「光輝的一面」的描述中有一些是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作者不再去重複這些事實。因為已經有大量的、連篇累牘的書籍、文章對此加以描述、渲染、甚至誇大。而對於「光輝的一面」的描述中一些不符合歷史事實、對歷史事實加以誇大和歪曲的說法，作者會根據史實予以指出。所以作者所描述的另一面也可以看作是對「光輝的一面」的一個補遺。

作者所採取的歷史的角度不同於政治的角度，尤其不同於政治宣傳的角度。歷史的角度首先考慮的是事件的真相：事件是「有」還是「沒有」，事件的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發生的環境，什麼人說了什麼、做了什麼。而政治的、宣傳的角度首先考慮的是在政治鬥爭中取勝，是奪取政權、鞏固政權、是擁護或反對現政權。有時僅僅是為了某一集團在某一時刻的利益、有時甚至在眼前的利益和長遠的利益之間做出錯誤的判斷。為了達到這些目的就要對歷史事實加以剪裁、拼湊、甚至歪曲以便說明自己在政治上的正確性。但是，為了利益集團的政治路線服務而描述歷史也有它的的尷尬：每當利益集團的政治路線變化的時候，對歷史的描述就只好重新改寫。而在周恩來的一生當中，黨的政治路線是經常而劇烈地變動。對此我們都能表示理解，我們不去和他們爭論他們的目標，我們只是要指出歷史事實和他們的某些說法不同。

作者所採取的歷史的角度不同於道德的角度。道德的角度常常要區分「好人」和「壞人」，而一旦區分了「好人」和「壞人」之後便有「好人幹好事，壞人幹壞事，好人不會幹壞事，壞人不會幹好事」之類的推論。他們尤其需要樹立一個道德上的「楷模」、「聖人」，為此就要「為尊者諱」。例如有人認為：不管你怎麼說，周恩來就是我心目中的好人。對此我們也表示理解，我們也不去和他們爭論。我們只是指明周恩來說過哪些話、做過哪些事，而有些話不是他們心目中的「好人」應該說的，有些事不是他們心目中的「好人」應該做的。而且隨著人們知道的史實越多，要「諱」的東西也就越多、越難。劉少奇有句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資本家有好就說好，工人不好就說不好。」那麼套用一下，我們說：「林彪、江青有好就說好，周恩來有不好照樣說不好」。至於說周恩來他是「違心」還是「有意」，是「迫不得已」還是「助紂為虐」，則各人可以有不同的結論。

作者還要指出的是：以政治人物作為道德楷模是十分靠不住的，也是十分不可取的。

本書由兩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編年的形式，從時間的發展看周恩來的另一面；第二部分是專題的形式，從具體的個案看周恩來的另一面。

本書第一部分首先在第一章「七千人大會以前：在權力鬥爭中掙扎」裡描述了在「高饒事件」之後周恩來和劉少奇、陳雲等人一起「反冒進」，從而引起了毛澤東的「反『反冒進』」，而且毛澤東對他們三人完全採取了不同的策略。

「高饒事件」是中共建政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黨內鬥爭。在此次鬥爭中，周恩來和劉少奇聯手「逼宮」成功。周恩來在1956年的「反冒進」過程中表現的異乎尋常的勇氣，同此密不可分。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的「反冒進」的文章實際上在周恩來的指示下起草的。甚至周恩來可以在會後對毛澤東說「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

但是自1958年初，毛澤東就對周恩來開始輪起大棒，周恩來不得不多次檢討。此等狀況不同於周恩來在延安時期的檢討。此時周恩來明白無誤的知道自己是對的。此舉開創了自己正確還要檢討的惡劣之先河。周恩來如此的地位在正確的前提下還要檢討，那其他人又有什麼選擇呢？如果說在延安是要擁護毛澤東的正確路線而做檢討，那麼此時的周恩來做檢討的目的又是什麼呢？1959年的廬山會議，周恩來再次勸說意見正確的彭德懷做檢討。至少此時的周恩來已經在政治上做出了選擇：跟從毛比什麼都重要。這是周恩來在其一生當中最重要的一個轉折點：人民和國家的利益遠遠比不上他在政治上跟從強者的選擇。此時的周恩來徹底完成了自延安以來的自我異化。毛澤東是不能懷疑的，是只能順從的，做一個永遠忠於毛個人的戰士。柯慶施曾經說過：「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當時中共黨內高層，自「反『反冒進』」之後，真正始終如一地做到這一點的人是不多的，周恩來便是其中的一位，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位。由此作者要強調的是自「反『反冒進』」以後，毛和周的關係在雙方的心目中、在實際上明確地形成了「君臣關係」。從此以後周恩來完全以毛澤東的是非為是非。許多中共高層人士如彭德懷等遭到整肅，

下場如此悲慘，就是因為他們沒有能夠像周恩來那樣完成從過去的同志關係、戰友關係、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向「君臣關係」的轉變。

彭德懷在廬山被整肅，周恩來起了極重要的作用。周明明都同意彭德懷的觀點，也明明知道彭德懷挑戰的是毛澤東的權威而不是權位，卻硬要站在毛的錯誤立場上，同其他人合力將彭德懷等人屈打成反黨集團，維護和強化了毛的神聖地位。周由此被彭德懷當面斥責為「老奸巨滑」。周恩來喪失原則，換來了自身地位「穩固」的好處，但是由此周恩來同毛澤東的君臣關係完全得到確定。周因為「反冒進」遭到批判以後，其主持的國務院各部帶頭拋出大批不切實際的高指標。而周面對背離基本常識的天文數字般虛假生產業績報告，不質疑，不追究。事實上周從未為自己在國家政治經濟建設上弄虛作假、嚴重失職及其惡果實質性承擔責任或捫心自責。這也是後來在七千人大會上周恩來再次不同意給彭德懷翻案、充當「反右傾」和繼續「高舉三面紅旗」的吹鼓手與此不無關係。

第二章「文革前的四年：在『君臣關係』中揣摩」。毛澤東為了證明其打倒彭德懷的正確性，不得不用更大的錯誤來掩蓋先前所犯的錯誤。其結果則是三年的大饑荒和幾千萬人的死亡。這種結果加劇了毛澤東對其死後被別人作「秘密報告」、被「鞭屍」的擔心。這個人到底是劉少奇還是周恩來？毛澤東的策略則是要先聯合其中之一打倒另一個。毛澤東一面在七千人大會之後重新開始對劉少奇是否是叛徒的調查，另一方面則向劉少奇透風，要求其配合打倒周恩來。但是劉少奇對此的反應是不同意。此種情況下，毛澤東採取聯合周打倒劉少奇的策略。而周恩來當時在政治、權力上受到中央書記處的排擠、壓制的局面，則提供了周恩來積極配合毛澤東的動力。毛澤東在1965年底對周恩來的態度完全可以一件事來表明：毛澤東曾經屬意要把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一文預先透露給周，但是在江青的建議下，毛澤東放棄了這種做法。

第三章「文革初期：積極配合毛髮動文化大革命」：周恩來積極參與了整肅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參與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過程。例如，在毛、林整肅羅瑞卿的突然襲擊之中，他是事前就參與的為數不多的幾個人；在鬥倒彭真的過程中，他起到了決定性的支持作用。在1966年3月28日，周恩來同康生的談話是同毛澤東在文革當中建立政治同盟的開始，由此決定了彭真甚至是劉少奇的命運。在打倒彭真的過程中，周恩來充分向毛澤東表明：周恩來是忠誠於其本人而非其他。周恩來的這種觀點，在其1966年5月21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充分表現了這一點。周恩來公開在全黨內宣稱，要忠誠於毛本人。對毛本人的忠誠大於對其政策的忠誠是周恩來得以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之一，這也是周恩來在1958年做檢討之後最大的心得。他甚至別出心裁地將彭、羅、陸、楊稱之為「四大家族」。如果說林彪有一本「政變經」（準確的說法應該說是「『反政變』經」）的話，周恩來不僅跟著念了這本經，而且還在毛的授權之下主持了「反政變」的具體工作。周恩來付出的這一切，得到了豐厚的回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時是毛澤東唯一一個與之商量改變全會會議議程、商定調整後中央領導成員名單和排列次序的黨的高級領導人。

第四章「天下大亂：成為真正的『總管家』」：從1966年10月毛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到1967年1月出現全面的「奪權」，毛終於達到了「天下大亂」的目的。而周也在這個過程中成了中共的「總管家」。一般人都說周恩來是毛時代的中共的「總管家」，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周並非「總管家」，他頭上的婆婆除了毛、劉之外，甚至連鄧小平、彭真也曾對他發號施令。「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毛和林彪成了他的「婆婆」，而陶鑄也有取代他的趨勢。直到陶鑄倒台以後，周才成為真正的「總管家」。

文革一旦發動起來，周恩來出色的組織能力和個人運作能力成為毛澤東不可或缺的人選。周恩來總是主動接受和完全服從毛的個人意志，毛澤東也需要周恩來的政治服從和政治支持。特別是在「林、鄧、陶三架馬車」代替「劉、周」政治格局失敗之後，隨之天下大亂的局勢，周恩來更是如魚得水。此時的周恩來大權在握，實際上主持黨、政、軍的工作。特別是雖然

名義上是林彪主持軍委工作，實際上是一直是周恩來代表毛澤東掌控中央軍委。周恩來的權力完全可以用一件事表明：「九大」的中央委員名單僅是由周和毛之間商定而非其他人。周恩來是實際上的二把手、第二號決策人。雖然江青作為毛澤東的代言人，周恩來不得不有時要忍耐江青的指責與狂妄。但是究其本質來言，二者都是毛澤東得以發動文革進而深化文革的得力人選，堪稱是毛的左膀右臂。周恩來對於執行毛澤東的指示不遺餘力，而且有時要走的更遠。

第五章「二月逆流：協助毛成功地反擊」：作者只討論了狹義的「二月逆流」即「二月逆流」在中央的表現。限於篇幅，作者沒有討論廣義的「二月逆流」即「二月逆流」在全國各地的表現，有些地方體現為「二月鎮反」。「二月逆流」的實質是一些在文革中受到打擊、對「文化大革命」的搞法不滿的「當權派」對文革的反彈。對此毛成功地進行了反擊，而周恩來的協助是毛成功的重要因素。

第六章「全面內戰：隨著毛的意志左右急轉」：對「二月逆流」的反擊在中央取得了勝利，在各地卻遭到軍方和保守派群眾組織的反彈，因而導致了武漢「七·二〇事件」以及全國全面大武鬥，即毛所說的「七月、八月」的「全面內戰」，亦即林彪所說的「『文化大革命』變成了『武化大革命』」。

「七·二〇事件」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轉折點，有的人認為此後毛的政策轉向和緩、文化大革命轉向「收場」。而事實上毛在「七·二〇事件」後的一個短暫的時間裡轉向了更為激烈、更為極左的方向，其中包括提出「武裝左派」、「群眾專政」，甚至懷疑整個解放軍、試圖建立第二武裝。然後才有急劇右轉，開始制止武鬥、提倡大聯合，開始給「文化大革命」收場。

中共官方的說法是江青提出的「文攻武衛」煽動起了「全面內戰」，而周恩來是反對武鬥的，周促使毛向右的方面偏轉。事實上武鬥的根源是毛提出的「武裝左派」和「群眾專政」。周恩來既有制止武鬥、促使毛向右的方面偏轉的言行，也有鼓吹「武裝造反派」、幫助毛具體落實「武裝左派」的言行。在這樣一個劇烈的左右震盪的過程中，周恩來基本上是隨著毛的思路行動的。

第七章「艱難的收場：為毛收拾爛攤子」。1967年7、8月的「全面內戰」使「文化大革命」再也無法像原來那樣繼續搞下去了。1967年秋毛澤東南巡歸來，不久就提出要開「九大」，實際上就是要收場、要結束「天下大亂」。但是，全國各地的群眾組織之間的派性鬥爭，相互的仇恨一旦被煽動起來就不那麼容易平息下去，更加上歷史上形成的中共幹部的派系、山頭的矛盾也糾纏其中，使得由亂到治的過程格外地艱難，其中甚至包含著鎮壓的血腥。再加上毛澤東又不甘心讓「文化大革命」完全偃旗息鼓，於是出現了多次的反覆。

從1967年秋到1968年9月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全部成立革命委員會、實現山河一片紅，在整整一年的時間裡，作為中共「總管家」的周恩來反反覆覆地和各地造反派、軍方打交道、一個省一個省地組建革命委員會、處理「楊、余、傅事件」，整個過程是曲折而又艱難。

第八章「九大前後：為毛鞏固文革的勝利」。經歷了艱難曲折過程，「文化大革命」的動亂終於收場了，全國的政權機構實現了重組，劉少奇被定為「叛徒、內奸、工賊」而永遠開除出黨，可以認為毛澤東個人取得了勝利，而周恩來為鞏固毛的勝利、為給劉少奇定下罪案貢獻甚巨。不過，權力鬥爭並未就此罷休，「九大」過後才一年多一點，就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爆發了。

儘管周恩來對毛澤東忠心耿耿，毛澤東對周恩來是「用而不信」。當「九大」召開過後，毛澤東開始打算重新啟用鄧小平。此時後院失火，林彪在廬山會議上攻擊了「極左派」的代表之一張春橋。毛澤東不能容忍對文革派的攻擊，認為這實際上是攻擊文革甚至是毛本人。毛澤東的當務之急是要優先解決林彪的問題。解決林彪問題，周恩來可以說是毛澤東唯一依

靠的人物。「廬山會議」其實質並非是中共官方所說的林彪想當「國家主席」、「搶班奪權」，而是朝臣派別之間的權力之爭，至於「設國家主席」、「稱天才」等等都只不過是把朝臣之間的權力鬥爭以當時的話語表述出來。

第九章「『林彪事件』：進入新一輪的鬥爭和整肅」。在毛、林之間的裂痕逐漸公開和擴大的時候，周恩來不斷揣摩毛意圖，開頭還試圖調和毛、林的關係，但是隨著毛搞掉林彪的意圖明顯起來，周也就根據毛澤東的調子而變。在處理「林彪事件」前後，周恩來再一次充當了毛的前台經理。事後，周恩來又對劃為「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人加以整肅。解決所謂「四大金剛」的模式，正是周恩來同毛澤東關係的一個典型個例。毛澤東下決心要抓黃、吳、李、邱，但是並沒有決定採取何種方式。周恩來則想出了一個方法，就是把黃、吳、李、邱用開政治局會議的辦法調到人民大會堂，然後在會上宣佈他們的罪行，當場逮捕。

第十章「起伏的兩年：從最高點跌落到受批判」。「林彪事件」之後，局勢把周恩來推上了「二把手」的位置，這時候的毛如果出現意外，周便會順理成章地成為接班人。遭受重大打擊的毛澤東，在病急當中無奈把大權委託給周恩來。所以作者認為1972年，周恩來的位置達到了他一生中的最高點。但是毛澤東事後很快就後悔交權，於是責令周恩來對全黨說明自己不是接班人。同時毛澤東開始培養王洪文，並且指定是周恩來「傳、幫、帶」。周恩來幾乎與每一個接班人，或可能的接班人，關係都十分良好。周恩來也心甘情願充當王洪文的副手。但是歷屆接班人遭到毛澤東的厭棄，難逃被打倒的命運時，周恩來即堅決予以打擊，毫不手下留情。就是鄧小平在文革中第一次被打倒，周也是幫著很很地踩了一腳的。

在1972、73這兩年裡，毛澤東認識到「文化大革命」的某些具體錯誤，同時也意識到黨內外日益增長的利用這些錯誤來懷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傾向。因此，毛澤東在某些具體問題上糾正那些已經造成嚴重後果的錯誤，包括調整若干重要的政策。而在具體執行政策的過程中，尤其是在執行調整後的外交政策方面，周恩來取了得巨大的成就。外交上的突破，一個是給周恩來帶來了個人的榮譽，另一方面並沒滿足毛澤東個人的期望。這兩點都給周恩來帶來了個人的災難，導致了1973年毛澤東對周恩來的嚴厲批判。1973年7月4日，毛澤東開始明確地警告周，在批示中說：「結論是四句話：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搞修正。將來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到1973年底毛對周恩來的不滿到達了最高點，對周進行了無情的批判打擊。毛再次批評到：「政治局不議政，軍委不議軍，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正，勢必出修正。」這兩項批評實際都是批評周恩來的，因為軍委也是周恩來實際主持的。毛澤東指責周恩來在大事上獨斷專行，向毛封鎖消息，搞「獨立王國」，也就是後來批《水滸》時說的「架空晁蓋」。

從1973年底，周恩來遭到批判、從最高點跌落下來以後便一直下滑，再也沒有能夠恢復元氣。

第十一章「批林批孔批周公：在身受其害的同時推波助瀾」。文革開始，毛是依靠軍隊整肅政府地方幹部。現在是反過來搞軍隊。進入1974年，周恩來的處境更加艱難。「批林批孔」運動的實質是「批周」、整軍隊以及樹立文革派在軍隊中的威望，而周恩來既是運動的批判對象，也是運動的推動者、領導者。因此周恩來此時的身份是雙重的，即領導批判自己的運動。在這段時間裡，鄧小平的崛起完全是毛澤東一手促成，周恩來並不是官史中所認定的主動積極，而是被動、消極的。鄧小平和周恩來的關係在1973—74這段時間裡是非常淡漠的。

然而，毛澤東整軍隊的意圖並沒有達到，王洪文和張春橋在軍隊裡的地位並沒有建立起來。周恩來的病情發展以及批林批孔造成的混亂狀態，使毛澤東只好停止「批林批孔」運動。四屆人大以及對國民經濟調整的必要性提到日程上來，為鄧小平在1975年的整頓打下了基礎。

第十二章「四屆人大以及最後的日子：終於沒有被『打叉叉』」。毛澤東本意是期望王洪

文等人和鄧小平合作準備四屆人大。不料江青等人多次對鄧小平加以指責，毛澤東不得不仍然啟用周恩來準備四屆人大。作者描述了四屆人大的前後過程，作者認為在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上周恩來、鄧小平一方與「四人幫」一方「並無兩條路線的鬥爭」。

而在批判周恩來和批林批孔中表現優異的鄧小平獲得了毛澤東的認可。1975年的1月份，隨著鄧小平的真正掌握大權，也就標誌著周恩來在政治生命上的結束。雖然隨後有批經驗主義和評水滸的運動，但是此時的毛已經無力再折騰了。在重病中的周恩來還是對於江青、張春橋以及鄧小平之間的矛盾加以調和。雖然鄧的崛起意味著周恩來的沒落，周恩來對鄧還是抱有一絲期望。毛澤東希望鄧對文革做一總結，但是被鄧拒絕。此舉的客觀效果則是周恩來避免了在離世之前被打上又叉的可能性。

劉少奇被迫害至死，林彪葬身異國。無數老革命幹部死後還打入九層地獄的現實讓周恩來確實感到恐懼。特別是周恩來對於身後是否被「打又叉」感到極度的恐懼。周恩來參與迫害的人如此之眾多，造成的刺激是無以復加。一方面這是由於黨內鬥爭的結果注定的，另一方面是因為周恩來自己知道自己所作所為的結果。還有就是周恩來知道毛澤東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作風。因此周恩來費了極大的心思保住自己的「晚節」，乃至在身患絕症、彌留人世之際還念念不忘。

周恩來之所以能夠保全，完全得益於毛澤東所重點培養的王洪文包括江青等人不能夠理解毛澤東的戰略。毛澤東的本意完全是要他們同鄧小平合作，批判周恩來。但是王洪文和周恩來走的過近，江青等又多次將鬥爭的矛頭指向鄧小平，這完全偏離了毛澤東的預定戰略方向。以至被毛澤東多次斥責，直至怒罵江青的講話為「文不對題，放屁。」但是周恩來任勞任怨的形象卻符合中國傳統的道德評判標準，再加上當時周恩來在中央專案組的諸多行為廣大百姓並不知情（至今也是如此），周恩來有幸成了廣大百姓群眾對文革發洩不滿的「大旗」在文革結束之後更是成了打「鬼」的「鍾馗」。

第二部分一共有以下幾個具體的個案。

一、周在對毛的個人崇拜中的責任與特色。人們都知道林彪在這個過程中的獨特作用，作者則指出周恩來在這個過程中不僅遠遠比林彪起步的早，而且起到的作用更是遠遠地超越其他許多人。長期以來對於周恩來在個人崇拜中的行為被忽視。周恩來在製造個人崇拜的過程中，充滿了個人特色。特別是大型歌舞劇《東方紅》的出台，是在剛剛走出大饑荒的陰影之後，幾千萬的冤魂尚未散去之時。相比於劉少奇在製造個人崇拜上的落伍，周恩來此舉更是大獲毛澤東的賞識。共產黨統治下的文藝向來是造神的工具，在周恩來手裡更是發揮到極致。

二、周與中央文革小組以及江青的關係。周恩來作為中央文革小組的當家人，積極貫徹毛澤東的文革戰略決策。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以及江青在文革前、中期基本上是同盟關係，雖然也有分歧，但是這種分歧卻被官方演繹成是路線不同的「鬥爭」關係，並進而把這種所謂的「鬥爭」誇大為長期持久、你死我活的鬥爭。這種看法顯然不是歷史的真實。

紅衛兵運動興起之後，在「懷疑一切」的口號鼓舞下，「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的人也多次受到炮轟。林彪、周恩來、陶鑄、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都被貼過大字報。中央文革內部雖有矛盾，但在鎮壓外敵方面倒是步調一致、齊心協力、毫無商量的餘地。無論是在鎮壓「五·一六反革命集團」還是鎮壓被通令禁止的造反派組織，周恩來同中央文革都是並肩戰鬥。

周恩來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主持中央專案組工作，執行毛澤東所有關於文革的戰略決策。周恩來是無可置疑的文革派。周恩來對於文革派的重要成員也是多次加以褒揚，無論是江青還是陳伯達。周恩來在1967年1月21日專門對誹謗陳伯達的大字報提出嚴厲的批評。但是這並不妨礙陳伯達被毛澤東踢開之後，周恩來對其落井下石，痛打落水狗。

江青在整個文革中同周恩來的關係更是錯綜複雜，既有開初的分歧、發展到後來江青為

毛整肅周而奔忙的一面，也有相互合作、利用的一面，在「伍豪脫黨」、「清查『五?一六』」等事件上江青甚至向周恩來示好。所以歷史事件的描述絕不能簡單地「臉譜化」。

三、「伍豪啟事」風波。被江青點了名的周榮鑫被周恩來下令燒鍋爐。其女周少華所在的紅衛兵組織發現了「伍豪啟事」之後，周少華通過其父把此材料轉交給戚本禹。但是當時的中央文革並沒有在此事上為難自己。事實證明「伍豪事件」是周恩來自己一手造成的自己的心病！毛澤東則利用此事，不時的敲打周恩來，直到周恩來在生命的最後時段。

四、周在中央專案組中的作用。中央專案組的結構和運作迄今還很少見諸公開出版物。實際上，整個中央專案組的實際領導者就是周恩來，連康生、江青等都是其手下工作人員。專案組的材料最後審批以及在報告於毛澤東之前都要經過周恩來之手，至於材料的真假不是關鍵問題，關鍵是能否迎合毛的要求。無論早期的彭德懷專案還是文革期間的劉少奇、賀龍等專案，都是依據中央專案組所提供的材料定性的。所有的重要專案的最後仲裁完全取決於毛澤東，都是毛作出決定，周恩來負責具體執行的模式。

中央專案組作為中共迫害幹部、群眾的法西斯組織，周恩來作為中央專案組的總負責，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中共官方對此百般為周恩來解釋，卻總是顯得蒼白無力。對於文革期間的重大案件，無論是劉少奇一案還是賀龍一案，其定性都是依據周恩來主持的中央專案組所提供的最後材料。顯然不是一句「周恩來不得不這樣做，這樣做是維護大局」就解釋得了的。

五、作者專門討論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保人」——保護幹部、保護民主人士、保護知識分子和其他人——的問題，即所謂的「大樹參天護英華」。作者認為周恩來為保護文革受害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實施毛的意圖。基本上來周恩來是唯毛澤東的馬首是瞻。毛澤東要打倒的，他不會保護，而且還會落井下石，助紂為虐；毛澤東要保的，或者要手下留情的，周恩來便會積極保護。

以後的幾章分別針對劉少奇、陳毅、彭德懷、及賀龍的案例作了具體的分析。

六、當毛沒有表示要徹底打倒劉少奇，並作出種種承諾時，周恩來也是跟著表態，反對將劉的問題公開化。在毛澤東最後決定要將劉少奇置於死地之後，周恩來明明清楚劉少奇的歷史、明明知道劉少奇一案是冤案、假案，仍然秉承毛的意圖參與把劉少奇定為「叛徒、內奸、工賊」。

七、周恩來在文革期間力保陳毅一事，是中共官方津津樂道的。究其原因，一是因為毛對陳毅採取了「一批二保」的政策，並沒有要馬上打倒陳毅；二是因為文革初期周恩來與陳毅有著榮辱與共的利害關係，周恩來清楚保陳毅是為了保自己。所以周有保陳毅的需要。到了八屆十二中全會，周恩來不再有這個需要了，便參與了對陳毅的嚴厲批判。到了九屆二中全會，周恩來在廬山甚至當眾指斥陳毅和陳伯達為「二陳合流」。

八、作者討論了「彭德懷的冤案與周恩來的責任」。無論是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期間還是之後，周恩來對彭德懷的批判絲毫不手軟。而在文革中彭德懷所受到慘無人道的的迫害，周恩來更是負有一定的責任。對於無產階級司令部共同的敵人，周恩來也沒有手軟的理由。

九、作者較詳細地介紹了「賀龍被整與周恩來在其中的作用」。賀龍因為未能配合毛澤東的文革戰略而遭到毛澤東拋棄。賀龍在被專案組審查和迫害的過程中，周恩來則是罪魁禍首。更鮮為人知的是在賀龍平反的過程中周恩來有意拖延和阻撓，最終導致了賀龍在1974年並沒有完全被平反，而是留下了「尾巴」。周恩來本來沒有準備去參加賀龍的追悼會。在毛澤東批示後，周在追悼會上的表演讓賀家和無數不知真相的人感動不已。但是經過多年以後，賀家終於知道真相。

十、清查「五?一六」詳盡的介紹了周恩來如何利用清查「五?一六」來整肅對立面、並通力同文革小組成員合作的事實。周恩來從來不主動迫害人的神話由此被打破。而千千萬萬

因為「五?一六」而受迫害的人僅僅因為「五?一六」的要害是反對周恩來而至今未得到來自官方的正式平反，甚至在《歷史決議》中絲毫未提。

從以上兩個部分的介紹可以看出作者描述和分析的篇幅主要集中於「文化大革命」時期，也就是周恩來生命中的最後十年。這一時期是中共歷史上一個異常複雜的時期，周恩來又是中共歷史上一個異常複雜的人物，於是文革中的周恩來就是更加地複雜。從不同的角度去看文革中的周恩來，會得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結論。而作者所取的是「歷史的」角度、「客觀的」角度。作者並不認為自己的結論是唯一正確的結論。隨著研究的深入，作者的觀點和結論也許會改變。但是，這種改變的條件只會因為作者引用的史料被證偽、新的史料被發現，而不會因為政治路線被改變、宣傳綱領被塗改、某個個人被打倒、被提升。

?

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 第一章

七千人大會以前：在權力鬥爭中掙扎

建國前後，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發生了一系列的歧見，致使毛澤東決定要「動一動」劉少奇的位置。「馬上人打天下，馬下人坐天下」導致的矛盾成為毛澤東要利用的動力，「高饒事件」遂應運而生。但是劉少奇、周恩來反彈的力量超乎毛的想像，而高崗的表現更是不如毛的期望，因此毛澤東不得不中途改變初衷。但是「高饒事件」卻在政治格局上造成了劉周靠攏的可能。為此，毛澤東一面重用鄧小平作為平衡和稀釋劉、周權力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利用反「反冒進」刻意在劉周之間打下楔子。毛澤東要改變政治格局的依靠力量還是軍隊，但是彭德懷並不是靠得住的人，毛澤東早就有意提撥林彪作為替代人選。一切安排妥當之後，隨之而來的大饑荒卻使這一權力鬥爭不得不推遲，但是這一切都為以後歷史的發展做下了鋪墊。

一、高饒事件之後的政治格局

在延安整風的時候，毛澤東有意借重「白區」力量整「紅區」的人馬，如此才可以拋開情面、避免庇護，整肅也就更加徹底。但是由此產生的「白區」和「紅區」的糾葛，隨著「白區」力量的崛起，不少人位高權重，致使不少經歷槍林彈雨的「紅區」將領難免不忿忿不平。

這種不滿情緒是建國後第一次黨內鬥爭「高饒事件」得以發生的內在根源。

在建國前後，毛澤東對於靠延安整風成為接班人的劉少奇和被整者周恩來都產生了新的不滿。針對於劉少奇在「關於農村互助組織以及對資本家和剝削問題」的看法，特別是「主張確立、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十多年內不搞社會主義」，「搞分散主義，未經毛澤東看閱，就印發中央文電」等諸多問題，毛澤東多次提出批評，甚至認為劉少奇不是合格的接班人，想讓他「挪挪位子。」

對於周恩來的不滿則表現在周恩來領導的政府工作存在著分散主義，且未能及時向中央報告工作、有形成獨立王國之嫌疑。

在地方上，由於革命進程而形成了東北、華北、華東、中南、西南、西北六個大行政區。為避免地方權力膨脹，以加強中央領導能力為名，行削藩之實，1952年8月，中共中央下令調動高崗（東北局），饒漱石（華東局），鄧小平（西南局），鄧子恢（中南局），習仲勳（西北局）到北京擔任中央機關和國務院的領導職務。俗稱「五馬進京，一馬當先」。而其中的「一馬」是高崗，負有最重要任務。

高崗進京後，被毛澤東委以重任。1953年3、4月，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先後作出《關於加強中央人民政府系統各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及加強中央對於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草案）》、《關於加強對中央人民政府財政經濟部門工作領導的決定》。據此計劃重工業部等八個工業部門由高崗負責（由此以高崗為主席的計劃委員會，有「經濟內閣」之稱），而周恩來只剩下外交、對外貿易等工作，以周恩來為書記的政府黨組幹事會同時撤銷。後者的政治意義遠遠大於實際意義。

除此之外，毛澤東還向高崗交心：劉少奇沒有搞過軍隊，軍隊不聽他的，不能掌握全局；劉少奇要架空他毛澤東，許多事情不讓他知道，擅自以中央的名義發表講話、發文件。劉少奇的思想仍停留在新民主主義階段，沒有搞社會主義的思想準備，要推著他、拉著他走，必要時要讓他「挪挪位子」；讓劉少奇當國家主席，搞榮譽職務，因為劉喜歡那一套（指迎送國賓和接遞國書等事務）。除此之外，1953年春夏之交，毛澤東給高崗一個絕密任務：命他親自去查閱東北的敵偽檔案，瞭解20年代劉少奇在奉天（瀋陽）被捕後的表現。

由此，高崗拿走了原本屬於周恩來的權力，又擔當了「挪動」劉少奇的重任。無形之中，高崗犯了未能「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的錯誤，樹敵過多。在錯估形勢，錯選時機的情況下，高崗又輕信陳雲的話，後來又被陳雲告發。而且高崗自以為深受毛澤東信任，把他們之間的私房話到處張揚，不僅洩露了毛澤東的「天機」，而且還打亂了毛的戰略部署，犯了大忌。鑒於陳雲、鄧小平等人的表態，劉少奇、周恩來的抵制，毛澤東不得不把高崗作為替罪羊拋出。趙家梁先生在《高崗在北京一半截墓碑下的往事》中，在對「批薄射劉」會議進行了大量分析和列舉事實後，認為「批薄一波容易，批劉少奇難。毛澤東感到了重重阻力。」於是毛澤東的態度轉為袖手旁觀。而劉少奇和周恩來在得手之後，進而落井下石。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召開七屆四中全會。劉少奇主持會議並作報告。會議通過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1954年2月25日，周恩來主持關於高崗問題的座談會並發言：「高崗的極端個人主義錯誤已經發展到進行分裂黨的陰謀活動，以圖實現其奪取黨和國家領導權力的個人野心。」周恩來從十個方面揭露高崗分裂黨、奪取黨和國家權力的陰謀活動。5月，周恩來在發言中無限地上崗上線，並且毫無根據的斷言高崗的罪惡已經勾銷了他對革命鬥爭所曾作過的局部的貢獻，證明他過去參加革命鬥爭的動機是不純的。這種證明無疑是一種誅心之論，由周恩來在建國後的黨內鬥爭開創先河。

在周恩來作長篇發言時，服務員事先得到通知，會議中間不許給茶杯上水，「任何人都不許進去。」因為會開得太長，與會的領導們禁不起沒茶水喝，一個服務員被指定進去添水。他看到周恩來正站在前面講話，口氣非常激烈嚴厲。他還是第一次看到周這個樣子。周知道他的角色就是凶神惡煞，怕高崗衝動起來加害自己，派他信賴的陳賡、宋任窮破例地帶槍進

入會場。

毛的本意是敲打劉少奇、架空周恩來。而結果卻使本是冤家對頭的劉少奇和周恩來大有合攏之勢。當然毛澤東留了後手，讓劉少奇做了長篇檢討，此檢討種下了劉少奇晚年悲慘的結局。十幾年之後，「文化大革命」動亂開始，過去高崗攻擊劉少奇的「炮彈」終究被後來者發現並利用起來。毛澤東在以後也多次提及高崗。

高饒事件牽涉的其他人員如彭德懷、林彪等後來無一不成為一時歷史的焦點。彭德懷對高崗說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要篡黨，後台是劉少奇。1959年的廬山會議，劉少奇、彭真等對於彭德懷絲毫不留情面。林彪由此而得出對毛「不負責，不建言，不得罪」的三不主義。

此後，毛澤東另辟溪徑，自「八大」開始將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分開，由鄧小平出任書記處的總書記（開始為秘書長）。毛澤東說：「我說我們這些人，包括我一個，總司令一個，少奇同志半個（不包括恩來同志、陳雲同志跟鄧小平同志，他們是少壯派），就是做跑龍套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有很大的權力，如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任總理的國務院要接受中央書記處的領導。大躍進中許多決策就是出於中央書記處。

毛澤東要把劉少奇、周恩來分開，培養鄧小平來牽制。這就是高饒事件之後的政治格局，也是以後廬山會議、文革的發端。楊繼繩先生說：「凡高饒聯盟，廬山會議，文化大革命這三次鬥爭，從人事上看，有著某種內在聯繫。毛澤東在這三次鬥爭中鞏固了自己的地位，而周恩來在這三次鬥爭中都扮演了神秘的角色。」而周恩來是依靠怎麼樣的表演才能在毛澤東這個導演手裡能夠一直有出頭露面的機會？這正是此書的考察之處。

二、「反冒進」的由來

在抗美援朝之後，無論是國內的經濟狀況，還是外貿的需求，特別是核武器研製的啟動，都迫使當時的中共領導人決定要大力發展經濟。

1955年12月5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座談會上傳達毛澤東的指示：「關於「八大」的準備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講反對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提早完成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保證十五年、同時爭取十五年以前超額完成。有無可能呢？有可能。」「因此必須加大速度，在我們的一切工作中都要反對保守主義，要求在較短的時間內，獲得更大的成績。」「我們完全有可能迅速建成社會主義。」「這不是急躁冒進，而是實際與可能的要求，是穩步前進。」要以此為中心，「迎接八大，使八大開好。」

毛澤東在12月6日再次專門強調「反右傾反保守」：「群眾潛力極大，可多辦事，應該反右傾反保守，提前完成改造。建議，十五年以前超額完成。改掉『大約』、『基本上』、『十五年左右』等不定語氣。」「過去反盲目冒進出毛病，反掉群眾幹部的積極性，不對的。掃盲，反冒進反掉了，正氣不升，邪氣高漲，幹部群眾均沒勁。」「反保守、右傾、消極、驕傲，發現先進經驗，改變領導方法，做到又快又好。動員群眾批評，自我批評，克服保守主義，做出來更多成績，全黨準備，全人民準備。」

對此，周恩來非常同意：「最近政府在各方面的工作，或多或少都存在著保守。」「反對盲目冒進是對的，但又帶來了副作用，必須打破這個副作用。」「我對毛主席指示的體會可以用一副對聯來反映，上聯：客觀的可能超過了主觀的認識；下聯：主觀的努力落後於客觀的需要。新大陸早就存在，而我們發現得太晚了。」12月8日，周恩來在懷仁堂講：「過去設想在第三個五年計劃完成時也許還不到2000萬噸，可是現在我們估計可以超過這樣的數目。」「毛主席最近說，如果我們要檢查過去六年來的工作的話，那麼主要的傾向還是保守傾向。」

但是實際操作中，周恩來發現毛澤東在1956年1月主持起草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

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根本不可能實現。繼而，1956年2月，在劉少奇的支持下，周恩來把計劃中的以軍工為核心的重工業投資砍掉大約四分之一。隨之因為前陣子的冒進，1956年4月國民經濟出現相當嚴峻的局勢。對此，毛澤東全不理會。於是周恩來和毛澤東產生了面對面的衝突。

1982年11月4日，胡喬木回憶說：「一九五六年各條戰線、各省市根據毛主席一九五五年冬寫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的精神，加快速度，擴大了預定計劃的規模，增加了預算指標。四月下旬，毛主席在頤年堂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追加一九五六年的基建預算，受到與會同志的反對。」「會上尤以恩來同志發言最多，認為追加預算將造成物資供應緊張，增加城市人口，更會帶來一系列困難等等。毛澤東最後仍堅持自己的意見，就宣佈散會。會後，恩來同志又親自去找毛主席，說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這句話使毛主席非常生氣。不久，毛主席就離開了北京。」也許是高饒事件中劉少奇、周恩來的勝利給了周恩來說良心的底氣。

此時站在周恩來後面的是劉少奇、陳雲等。1956年2月，劉、周、陳等人就「反冒進」達成了共識。

1956年6月2日毛澤東離開北京。6月4日，周恩來在劉少奇主持召開的中央會議上，提出繼續削減財政支出、壓縮基本建設投資和調整計劃指標的意見，並且最終通過削減國家預算和壓縮基建的1956年國家預算報告(草案)。

6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劉少奇安排中宣部起草的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社論特別指出：「在反對保守主義和急躁冒進的問題上，要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應當根據事實下判斷，有什麼傾向反對什麼傾向，有多大錯誤就糾正多大錯誤，萬不可一股風，擴大化，把什麼都反成保守主義，或者都反成急躁冒進。」劉少奇在審閱修改這篇社論後批示：「主席閱後交喬木辦。」

毛澤東後來對吳冷西和胡喬木說：「這不關你（指胡）的事。那篇社論寫好後曾送給我。我在清樣上寫了『不看了』三個字，罵我的東西我為什麼要看。」後來南寧會議，毛澤東把此文加了很多批語，挑明此社論是針對「我」的（《農業社會主義高潮》）的《序言》的，發到與會人員手中。

1956年8月，周恩來在修改《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的建議（草案）》時，刪除了部分「多、快、好、省」的口號，以避免其帶來的消極作用。因為當時不少人只重視「多、快」而忽視了「好、省」。由此周恩來後來被說成是「促退委員會」的代表。

周恩來在11月9日召集各部委黨組負責人參加國務院常務會議。周恩來在會上指出：「對於高指標應該勇於抵抗，敢於修改，這才是馬克思主義者。指標一經確定就神聖不可侵犯的提法就是迷信。」11月10日，周恩來在八屆二中全會上作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基調就是「反冒進」。毛澤東忍不住了，在11月15日終於開口，批評了李先念，「穩妥可靠」不如「充分可靠」！毛澤東忌諱這個同急躁冒進相對立的「穩」字。

三、毛澤東對「反冒進」的批評

1. 毛的批評

毛澤東不滿也無可奈何。接踵而來的波蘭、匈牙利事件以及反右運動，毛澤東只能暫時退讓。波匈事件使得毛澤東倍加警惕赫魯曉夫的大國沙文主義，同時毛也認為「反冒進」促進了右派的進攻，所有的這一切都使毛更加急迫的需要經濟上的「大躍進」。

1957年6月26日，周恩來在全國人大一屆四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有人

認為，我國的發展國民經濟計劃，在一九五六年全面冒進了，在一九五七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顯，這種意見是不正確的。」報告中有兩處肯定「一九五六年的建設是躍進的發展」。躍進的發明權是屬於周恩來。周恩來的態度變了。

1958年5月17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說：周恩來這篇《政府工作報告》，是「以無產階級戰士的姿態向資產階級宣戰」。雖然如此，毛澤東依然沒有放過周恩來。

周恩來在退縮，而毛澤東的牛皮越吹越大。1957年11月，毛澤東在莫斯科宣佈：「赫魯曉夫同志告訴我們，十五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講，十五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毛澤東勢必要以反「反冒進」來進行「躍進」的動員。

毛澤東在1957年10月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開始公開反「反冒進」。毛澤東說：「我高興的是這次會有個別同志提出了多快好省這個完全的口號。我看要實事求是，要提倡合乎實際的不是主觀主義的多快。去年把這個口號掃掉了，現在要恢復這個口號，你們贊成嗎？還掃掉《農業綱要四十條》，四十條不吃香了，現在又復辟了。」

共產黨應該永遠是促進會。我們有許多委員會，最根本的是共產黨委員會，究竟你是個促進委員會，還是個促退委員會？共產黨是促進委員會，國民黨是促退委員會。去年二中全會組織個小組促退，就是去年多花了三十億，就只能在這點促退一下，多促退就要犯錯誤，也就是說，不可過分強調反冒進。因右派是促退派，我們與右派的根子不同，我們永遠是促進派，要促退只是暫時的、局部的。」

從1958年1月份的杭州、南寧會議直到3月份的成都會議，調子越來越高。從離右派三十米到是否馬克思主義，周恩來承受的壓力愈來愈重，一路檢討不斷。周恩來的順從與認錯，更使毛澤東沿著錯誤的軌道繼續發展。

1958年1月11日，毛澤東說：「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好不好？這個是政治問題。一反就洩了氣，六億人一洩了氣不得了。」1958年2月18日，他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如果說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或者反馬克思主義，而反冒進是馬克思主義，那馬克思主義就在中國變了樣子，把搞得少的叫馬克思主義，搞得多的不叫馬克思主義。我不贊成反冒進叫馬克思主義，贊成冒進才是馬克思主義。這個冒進好嘛，使農民多搞了水利嘛！

3月9日，毛主席在成都會議上說：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的冒進，一種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究竟採取哪一種？我看應該採取冒進。

毛澤東把「反冒進」問題提到「政治」問題的高度，就佔領了思想制高點。陳小雅女士說：「這樣一來，反對他的計劃就是政治問題，他不僅代表六億人民，還代表了真理。他有資格指鹿為馬—說什麼叫馬克思主義，什麼是馬克思主義。而他說『搞的多』是馬克思主義時，『搞得少』自然就是反馬克思主義！」此武器甚是好用，毛澤東在黨內鬥爭中屢試不爽。

周恩來在南寧會議上做檢討：「反冒進這個問題，是一段時間（一九五六年夏季到冬季）帶方針性的動搖和錯誤。這個方針是與主席的促進方針相反的促退方針。實行這個方針，不管你主觀想法如何，事實上總是違背主席方針的，越是不自覺，這是方針性的違背，就越嚴重、越危險。」「這一反冒進的錯誤，我要負主要責任。」

周恩來在3月25日就反冒進問題再次作檢討：「在當時就是沒有聽取多方面的意見，沒有接觸群眾和實際，而只局限在會議室和辦公室中，更沒有看清在所有制改變後解放了的生產力要求大發展的群眾運動正在起來。我們反而只看見死的物不看見生氣勃勃的人，務實而不務虛。我負主要責任提出的『反冒進』報告就是對群眾生產高潮這個主流潑了冷水，因而不是促進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費，四十條也就被打入冷宮，這就是問題的本質。」

「當時確沒有這樣認識，等到右派教育了我，主席提醒了我，群眾實踐更啟發了我，才

逐漸認識這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方針性的錯誤。更深一層說，也就是對社會主義革命本質的東西解放生產力，社會主義建設的主流發動群眾、發展生產看不到，自然就抓不起了。」

毛澤東並不認可周的檢討：「如果從經驗上、從方法問題上作為例子，那倒是可以的。這個問題不是個什麼責任問題，也不是老要聽自我批評的問題，南寧我們都聽過了，北京也聽過了。」他還說：「關於反冒進的問題，我看以後不要談很多了。在我們這樣的範圍，就是談也沒有好多人聽了。」

毛澤東對周恩來的檢討還不滿意，還將進一步解決反冒進的問題。毛澤東決定召開「八大」二次會議，這是唯一的一次黨的大會有二次會議的情況。這就是把周恩來的問題在全黨面前揭開蓋子。

2. 權力之爭

(1) 鄧小平的崛起

高饒事件結束後，1954年9月，根據新頒布的憲法而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組織法》規定：國務院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國務院由總理、副總理若干人、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和秘書長組成。《國務院組織法》對原政務院的組織機構進行了較大的調整，撤消了政法、財經、文教、監察4個委員會，在國務院設置8個辦公室、1個秘書廳協助總理分掌各部工作，設置了主辦專門業務的20個直屬機構；35個部委職能機構。共計64個工作部門，其中經濟部門增設到35個。一剎間，周恩來大權在握，特別是經濟大權。

毛澤東一生信奉的都是權力至上。在「反冒進」的背後，同樣存在著權力之爭。對於周恩來的這種權力狀況，毛澤東在「反冒進」時多次表達不滿。

1958年1月11日，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第一次講話，就著重講反對分散主義和關於「反冒進」兩個問題。關於反對分散主義，毛澤東說：國務院向全國人大的報告，我有兩年沒看了。只給成品，不給原料，不行。要離開本子講問題，把主題思想提出來，進行交談。財經部門不向政治局通情報，沒有共同語言。「為了反對分散主義，我編了一個口訣：『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辦也有決，不離原則；工作檢查，黨委有責。』」他說：「集中，只能集中於黨委、政治局、書記處、常委，只能有一個核心。」毛澤東批評分散主義是針對國務院的。參加會議的王任重日記中寫道：「晚上和先念、富春、一波同志談了主席的講話，對於這樣尖銳地批評分散主義感到一些突然。」

陳雲在2月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作檢討時，毛澤東插話說：「政治設計院究竟在哪裡？章伯鈞說國務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滿意，他要有權設計。我們政治局委員可不可以有權參與設計呢？過去這個五年計劃實際上是無權參與設計。我是主席，也沒有參與設計。每年的年度計劃，總是請你簽字，叫做強迫簽字。我有個辦法，不看。你強迫我嘛！老是在國務院討論，總是拿不出來。千呼萬喚不出來，為什麼不出來呢？說沒有搞好，等到梳妝打扮一跑出來的時候，我們說不行，時間遲了！這事實上是一種封鎖。」

毛澤東還說：「中央大權獨攬，只攬了一個革命，一個農業，其他實際在國務院。」

為此，鄧小平領導的書記處就成了毛澤東手裡強有力的工具。鄧小平曾向毛澤東提出，書記處還是作為政治局辦事機構，負責對軍隊和國務院的文件承送。毛澤東不同意，強調書記處是黨中央的辦事機構，什麼事都要管，中央的事由你們做，發文用中央的名義。1958年6月，毛澤東起草的一個黨內指示說得更明確（見下文6月10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各小組的通知》）。

書記處在討論國務院的工作時，周恩來也要參加。從記錄看，副主席只有周恩來出席書

記處會議。而書記處要處理大量日常工作，經常每週開會三四次，常常得到毛澤東的直接領導。書記處的同志最早聽到毛澤東的聲音，知道中央核心的決策，反而比政治局的一些同志消息更靈通。

現僅舉二例，說明鄧小平的實際地位。

1959年3月成都會議期間，中共中央將提交給「八大」二次會議的《報告草稿》提交給與會者討論。《報告草稿》中，毛澤東將一段話修改為「今後我們的任務，是要貫徹執行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為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奮鬥。」並批示：「此件可用。略有修改。或者還需作某些修改，可由少奇同志及小平同志斟酌處理。」

周恩來在58年5月26日夜致信解釋「躍進」一詞的發明權後（見下文），毛澤東即指示：

小平同志：此件即付印，即刻發給到會各同志。（指周恩來送給他的「政府工作報告」和信件—筆者註）

毛澤東 1958年5月27日上午11時

到1959年的上海會議，毛澤東更是明言「權力集中常委和書記處，我為正帥，鄧為副帥。」

鄧小平當時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總書記。周恩來因「反冒進」挨批，陳雲那時也不受重用，國務院很多工作就轉到書記處。1958年中共中央書記處是當時的權力樞紐。在「三面紅旗」方面，鄧小平是毛澤東的積極支持者。大躍進時期許多決策，都出自鄧小平主持的書記處。不過，「大躍進」的問題暴露以後，鄧小平能夠比較實事求是地對待，但他還堅持對「三面紅旗」的支持。改革開放以後的出版物對鄧小平大躍進這一段時間的情況極力迴避。

一個是橫豎強迫簽字，一個是無權參與設計，周恩來是否架空了毛澤東？無論如何，在1975年，毛澤東在關於《水滸》的評論中提到：「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自然是有舊仇新恨的。無論如何，毛澤東對於周恩來是極度不滿的。毛澤東在成都會議的時候說，「（國務院）幾十個部，不知道都幹些什麼！」

（2）林彪取代彭德懷的跡象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開。在八屆一中全會選舉中央委員會主席時，毛澤東未得全票，他把自己的一票投給了林彪。林彪雖然沒有進入常委，但是在政治局委員的排名僅在常委之後。毛澤東是否從此時就有準備用林作為代替彭的打算？實事求是的講，毛彭攤牌是早晚的事。彭德懷是否受林彪在政治局委員排名在其前面的影響，筆者不敢妄加猜測。但是僅僅幾天之後，彭德懷就提出自己可以只擔任國防部長以對付外事活動，不擔任軍委日常工作的主持人，請另一個委員來主持軍委工作；或者自己只搞軍委日常工作，不當國防部長，而且同林彪商討了裁軍問題。同年年底的軍委會議上，彭德懷再次提出交班、退休問題。以後，彭德懷多次提出此問題。

1958年5月，在八屆五中全會上，經毛澤東提名，林彪被增選為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此時的林彪在黨內的排名已經遠遠高於彭德懷，已經屬於中共中央領導層的核心人員。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於上海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彭德懷再次向毛澤東提出不再擔任下一屆國防部長，毛澤東不採納彭德懷的意見。1959年4月18日至23日的第二屆人大第一次會議上，彭德懷被再次任命為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在這一段時間裡，彭多次推薦林做國防部長。彭德懷在筆記中寫道：「我覺得奇怪。林為中央副主席，對黨內

團結是有好處的；我曾經總想林任國防部長（筆者註：原文如此，不通順），較為適當，對於團結也有利。此事同聶榮臻同志談過多次，並且同毛主席當面談過此事。毛主席說，現在林有病。我以後沒同毛主席再談了。」反過來，林彪也很尊重彭德懷，在1958年的軍委擴大會議上要求軍隊「同志繼續在彭老總領導下，更好的團結起來，發揮全軍的力量，爭取（更）大的成績」。

筆者認為，軍隊一直是毛澤東的權力基礎和最重要的保障。抗美援朝之後，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在當時是不二人選。但是毛澤東什麼時候開始對彭德懷表示出不滿？毛澤東在廬山上批評彭德懷的話自然可以作為證據，但是畢竟是一時的激憤之作，要多加考量。有證據可考的則是1935年毛澤東作軍旅詩《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1947年該詩首次公開發表，同年毛澤東重新書寫該詩。但是1957年毛澤東曾說該詩「記不起了，似乎不像」、「不宜發表」。此後在1958年出版的毛澤東詩詞中，未收入該詩。1958年的軍委擴大會議，彭德懷作為毛澤東整治軍隊的重要「打手」，致使包括劉伯承、粟裕等一大批軍隊元勳被整肅（筆者認為此事彭德懷雖然不是元兇但是也要負有一定的責任）。「反冒進」之後，毛澤東要整治劉少奇、周恩來等，要把軍隊牢牢的捏在手裡。彭德懷和林彪相比，毛澤東自然更傾向於林彪，這一點已經有很多人論述，此處不再多贅。這也是廬山會議的重要背景之一。

四、周恩來的檢討

尼克松曾經說過，周恩來總是小心翼翼地把聚光燈的焦點只對毛澤東一個人。周恩來還有一句名言：「要跟著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領袖，百年以後也是領袖。晚節不忠，一筆勾消。」周恩來在什麼時候開始有此心態？或者說周恩來是不是一貫如此？高文謙在其著作《晚年周恩來》中如是說：「延安整風運動成為毛、周關係史上的重要關節，對周恩來以後的政治生涯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如果說遵義會議後，周開始接受毛澤東的領導還只是「半條心」的話，那麼通過延安整風，他從此洗心革面，開始由衷地擁戴和信服毛。」此話有一定道理。但是周恩來還沒有完全變成一個「完全沒有獨立人格的」政客，歷史表明，1958年的反「反冒進」才是周恩來徹底「臣服」的關鍵門檻。

1. 周的檢討

毛澤東說：「（檢討）要自己寫，不要秘書寫。」在毛澤東主持制定的《工作方法六十條》中，第（三十八）條規定：不可以一切依賴秘書，或者「二排議員」。要以自己動手為主，別人幫助為輔。不要讓秘書制度成為一般制度，不應當設秘書的人不許設秘書。一切依賴秘書，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一種表現。

周恩來的秘書范若愚關於這次周寫檢討一事有個極為難得的回憶：周恩來同志指示我：……因為這次是自己的檢討發言，不能由別人起草，只能他講一句，我記一句。……周恩來同志還說：關於他這次「犯錯誤」的問題，他已經和毛澤東同志當面談過了。主要原因在於他的思想跟不上毛澤東同志。這說明必須努力學習毛澤東思想。……在（記錄周口述檢討的）這個時候，陳雲同志打來電話……打來電話之後，他說的很慢了，有時候甚至五六分鐘說不出一句來。這時我意識到，在反冒進這個問題上，他內心有矛盾。……在這種情況下，我建議，我暫時離開他的辦公室，讓他安靜的構思……在第二天凌晨二時許，鄧大姐把我叫去，她說：「恩來獨自坐在辦公室發呆、怎麼你卻睡覺了？」當范說明情況後，鄧大姐說：「……還是由他口授（大意），你整理文字材料。」這樣我隨鄧大姐到了周恩來同志的辦公室，她和周恩來同志爭論了很久，最後周恩來同志勉強地同意。……在整理到學習毛澤東思想問

題時，我引了一句成語說：「我和毛主席風雨同舟，朝夕與共，但是在思想上還跟不上毛主席。」……他看到「風雨同舟，朝夕與共」這句成語時，嚴厲地批評了我。他說，在關於他和毛澤東同志的關係上，在整風以後，還可以引用這句成語，但是在整風以前，不能引用。「這也說明你對黨史知識知道的太少！」周恩來同志講這些話時幾乎流出了眼淚。最後，他逐字逐句地自己動筆修改一遍，又親自補充了幾段……我發現周恩來同志在起草這個發言稿的十多天內，兩鬢的白髮又增添了。

趙無眠先生在《真假周恩來》中的描述更為貼切：范若愚見周恩來坐在辦公桌前，小臂上戴著套袖，左手撐在額頭上，右手提筆，對著紙發呆，「凝固了一般」。他的眼皮顫動，目光專注，「時而明銳，時而暗淡，時而清澈，時而茫寐」。有幾次，他彷彿想通了，下決心落筆，卻成不了文句，紙面上留下一些點狀和線狀的痕跡。忽然又放下筆，將稿紙揉成一團，扔到廢紙簍仰身靠著椅背，淡漠的目光投在屋樑的某一點上。眼圈一紅，淚水盈眶，他輕合眼皮，不讓眼淚流下來……。

無論是「幾乎流出了眼淚」還是「不讓眼淚流下來」，這個檢討對於周周恩來說是人生中的一大轉折點：鳳凰涅槃。

周恩來又逐字逐句地親自修改，補充了幾段，才打印出來，送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傳閱。

時任總理辦公室主任的童小鵬回憶說：「後來，這個檢討稿打印出來發政治局和書記處徵求意見。鄧小平看後就說，寫這麼多幹嘛，把『離右派差50米遠』等刺激字眼劃去，有些話的份量也改得輕了。可見鄧小平對毛澤東的批評，是有不同看法的。」

在周恩來檢討前，毛澤東於1958年5月17日針對國內形勢發表講話：「假如黨分裂，就會亂一陣子。假如有人不顧大局，如有人和高崗、饒竊石一樣不顧大局，黨就要分裂，他就要走到自己的反面，就會出現不平衡，當然最後還可以平衡，不平衡走向反面就平衡，你們要注意一下。中央委員更要注意顧全大局，誰不顧全大局誰就要跌跟頭。××××不讓××××革命，他不看中國小說，未看過阿Q正傳。你們看過阿Q正傳沒有？這是本好書，沒看的要看。高崗不准中央個別同志有個別缺點，不准革命。××××他們把一個指頭的缺點說成十個指頭，鬧分裂，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凡不顧全大局鬧分裂的有什麼好結果。羅章龍、張國燾鬧分裂有什麼好處？不應鬧分裂，搞分裂是不對的，只有一種分裂是可以的。像第二國際時代德國社會民主黨投帝國主義戰爭的票，列寧才和他們決裂。在以前，列寧和他們有鬥爭，但不決裂。我們要作合法鬥爭，來爭取多數，不要搞分裂，不顧大局。山東的李峰（筆者註：山東惠民地委第一書記），廣東的古大存，馮白駒（比古好些，有進步），……古大存、李世農、沙文漢是鬧分裂的問題，廣西陳再勵也是，馮白駒稍好一點。他們是站在錯誤的立場上，地主資產階級的立場上。新疆也有一批幹部鬧分裂，不是各民族團結起來，而是要分裂出去。西南也有人在鬧。想分裂，不想合作。鬧分裂的人都是會失敗的。」

在5月20日，毛澤東再次對防止分裂講話：「如世界大戰，黨內分裂。像×××、高崗那樣的分裂，我們黨有四次分裂。一是陳獨秀，二是羅章龍，三是張國燾，四是高崗。由中央，整下去了。王明三次『左傾』路線，是以合法形式出現的，我們對他採取治病救人，經過批評達到團結的態度。容許他們繼續工作。只要有黨，新的分裂是可能有的。只要有黨，就有可能分裂，一百年後還會有。我們的辦法是團結——批評——團結，懲前毖後，治病救人。」「這樣講大家可能不舒服。我就講了才舒服。講了大家有思想準備。南斯拉夫不是搞分裂嗎？還有美國的福斯特。……世界上總是有分裂的。新陳代謝嘛，年年有分裂，月月有分裂，日日有分裂，像細胞死亡一樣，年年有團結，月月有團結，日日有團結，像細胞生長一樣。」（筆者註：有資料把毛澤東在廬山上說去年講分裂就是針對彭德懷的話當作證據，來證明毛澤東在58年的講話所講分裂是指針對彭德懷的，依現有資料來看，此種認識不確。毛澤東在58年的講話所提分裂是指針對周恩來的。）

這些話，是十分嚴厲的，周恩來如何才能過關？

5月17日，周恩來首先對「反冒進」一事檢討：「『反冒進』的錯誤，集中地反映在我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八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間。當時我對於一九五六年的建設成績和在躍進中出現的某些缺點和困難，作了錯誤的估計，把實際上不到一個指頭的缺點誇大化，肯定一九五六的年度計劃『冒』了，並且提出一九五七年適當收縮規模的意見。」他還說：對於毛澤東批評的反冒進是關於社會主義建設規模和速度問題上方針性的錯誤，「在相當時間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就在這裡」。

周恩來痛責自己犯了「反『冒進』」的錯誤，即性質為「右傾保守」的錯誤；承認自己在政府工作中「錯誤地採取了機械和靜止的平衡的方法」，存在著「脫離黨的領導的傾向」。他還痛挖自己之所以會犯上述錯誤的「思想根源」，稱之為「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經常表現為「經驗主義」，有時表現為「教條主義」，還有時表現為「兩者的混合」。周恩來自己給自己扣了許多頂十分嚇人且十分醜陋的大帽子。他這是在自己羞辱自己，並且是當著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全體代表的面自己羞辱自己。

其次周恩來表態說：這次會議，是一個思想解放的大會，也是一個充滿共產主義風格的大會。大會的發言豐富多彩，生動地反映了人民在生產大躍進、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設奇跡和革命氣概。真是一天等於20年，半年超過幾千年。處在這個偉大的時代，只要是一個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為這種共產主義的豪情壯舉所激動，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認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設路線的正確，同時，也就會更加認識「反冒進」錯誤的嚴重。

最後，周恩來對毛澤東表示徹底的臣服：「中國幾十年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驗證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離開或者違背他的領導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發生錯誤，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錯誤足以證明這一點；反過來，作對了時候或者作對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和思想是分不開的。因此，我們必須下苦功夫，認真地研究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學習他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光輝典範，學習他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學習他的思想和作風以及他所具有的偉大的共產主義的風格。」

建國後，第一次「凡是論」，也是周恩來首創。

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以及國內「反冒進」的形勢，促使毛澤東要提倡對自己的個人崇拜。毛澤東在成都會議的時候，正式為提倡所謂「正確的」個人崇拜打開綠燈。周恩來的這番話無疑是對毛澤東的回應。周恩來的這些話是含有深意的。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央領導人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抬轎子、吹喇叭，開創了60年代中國造神運動的先河。

毛澤東在成都還講：「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了。」「與其你獨裁，不如我獨裁好。」這和劉少奇、周恩來等反對毛澤東的主張針鋒相對的。

1958年6月9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提出「請考慮自己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的問題」。常委會討論他們的請求時，挽留他們繼續擔任現在的工作職務。會後，鄧小平擬定了常委會會議紀要，會議決定：「他們應該繼續擔任現任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他還將這個會議紀要報送毛澤東。毛澤東既沒有畫圈也沒有任何批示，而是退書記處。周恩來當然不是主動辭職，是感覺失寵了，再戀棧沒意思了。毛也沒有急著讓他下去，事實證明周後來成為毛整肅劉少奇的最強大和秘密的武器。周恩來也就順勢收回。

當然，毛澤東也對「反冒進」一事蓋棺定論：「反冒進（問題）解決了，現在中央是團結的，全黨是團結的。」但是毛澤東真的就高抬貴手了麼？

1957年底，毛澤東當著周恩來的面說：「要那麼多秘書幹什麼？秘書多了誤事。」當時周恩來的秘書最多，於是這些秘書被紛紛下放至各部委和地方，最少之時僅有三位。南寧會議之後，周恩來的中央財經小組組長一職被撤。

1958年夏季，周恩來要其秘書們把他個人的書和總理辦公室的書分開來管理。

就在周恩來做檢討之後不久，毛澤東決定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五個小組。

財經小組組長由陳雲擔任；政法小組組長由彭真擔任；外事小組組長由陳毅擔任；科學小組組長由聶榮臻擔任；文教小組組長由陸定一擔任。此文件在次日以中央文件形式發出。

6月10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各小組的通知》。通知指出，這些小組是黨中央的，直屬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向它們直接做報告。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只有一個「政治設計院」，沒有兩個「政治設計院」。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都是一元化，黨政不分。具體執行和細節決策屬政府機構及其黨組。對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政府機構及其黨組有建議之權，但決定權在黨中央。政府機構及其黨組和黨中央一同有檢查之權。

中央決定成立各專業小組，直隸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實際上削減了總理的權限，架空了周恩來和國務院。凡是黨政軍各方面送中央常委的報告、文件都要先送書記處。一般問題，書記處討論決定，即可下達、執行。重大問題，書記處先拿意見再報中央常委討論、決定。國務院成了書記處的辦事機構，政府機構只剩下建議、檢查和具體執行、細節決策的權力。

2. 「躍進」的發明

毛澤東對「躍進」一詞情有獨鍾。

「八大」二次會議之後，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5月25日，毛澤東看了彭真送來的1957年1月13日《人民日報》社論《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高潮》，說明最早使用「躍進」一詞自此始。

毛澤東閱後，急不可耐的於次日早7時，即致函政治局、書記處各同志，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和參加這次會議的其他同志，指出：「重看1957年1月13日人民日報社論，覺得有味，主題明確，氣度從容，分析正確，任務清楚。以「躍進」一詞代替「冒進」一詞從此篇起。兩詞是對立的。自從「躍進」這個口號提出以後，反冒進論者閉口無言了，「冒進」可反（冒進即左傾機會主義的代名詞），當然可以振振有詞。躍進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拋到一個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此文發表時，我們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國內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頒發博士頭銜的話，我建議第一號博士贈與發明這個偉大口號（即：「躍進」）的那一位（或者幾位）科學家。

周恩來收到此信後，坐不住了，唯恐別人搶去了大功。在受到嚴厲批評之後，此事可以向毛澤東表白自己原來的思想覺悟還是有一點高的。

當天夜裡，周恩來就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同時送上了「政府工作報告」的單行本。周恩來在信中寫道：

主席：

現將政府工作報告單行本送上。在第9頁和第14頁上，提到1956年建設是躍進的發展。

（意在表明躍進一詞的專利是屬於周恩來的一筆者註）

我又將這個報告讀了一次，覺得我當時的中心思想是維護社會主義，反擊右派，從建設的實績上，肯定了1956年的建設是躍進的發展，拋棄了對1956年建設是「冒進」的錯誤估計。但是，我當時還沒有意識到反「冒進」是方針性的錯誤，因而也就沒有認識多快好省的方針和農業綱要四十條可以促進社會主義建設，使其成為由量到質的躍進。我在這次黨的會上發言，說那時是「開始覺醒」，經過了三中全會、杭州、南寧、成都三次會議的整風，和接觸了一些群眾實際活動，才真正認識到這條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正確和力量。這是合乎實際情況的，因而我在這半年多的整風中，思想並無抵觸，只是深刻地感到自己思想認識的落後。

這也足以說明為什麼在我的政府工作報告發表後只能起批判右派的作用，而對1956年建設是躍進的發展的估計並不能起促進社會主義建設的作用。必須在《人民日報》去年1月

13日和12月12日（必須堅持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兩篇社論根據三中全會主席宣告的精神進行號召後，才能起動員輿論、促進運動的作用。從這裡可以看出一個真理，單單選詞相同，這是形式問題，主要地要看立的什麼旗，破的什麼邪。人民日報兩篇社論是立的多快好省和農業綱要四十條的大旗，破的反「冒進」而「促退」的歪風邪氣，所以能夠提綱挈領、勢如破竹地促進社會主義建設。因此，我認為人民日報這兩篇文章有同樣價值和功勞。

周恩來 1958年5月26日 夜

周恩來通過寫信的方式，再次表示自己要脫胎換骨，思想並無牴觸，心悅誠服的認識到自己同毛的差距。

周恩來在大躍進中說：「伯達同志講，馬克思說，人類社會的發展，到共產主義社會，生產力可以提高到『一天等於二十年』的速度。我們今天不是已經達到了嗎？」這是發自內心的還是純粹是政治表態？筆者認為二者皆有。

在周恩來等人受批評的同時，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成為當時權力樞紐。在大躍進當中，鄧小平對於毛澤東是鼎力支持。對於「三面紅旗」的態度，成了一個試金石。由此也讓鄧小平攢了一大筆的政治資金。

五、反「反冒進」的後果

1. 劉、周之間的隔閡

反冒進劉少奇領頭，周恩來等人參與，但是毛澤東卻出採取了完全不同的手法來處理。

胡喬木、胡耀邦以及李銳在提及此時曾說：「由於在一篇定性為反毛澤東的錯誤的社論原稿上（作者註：指1956年6月20日的《人民日報》反冒進的社論），有劉少奇修改的筆跡，劉也就同這一『錯誤』脫不了干係了。黨內唯一還可以同毛澤東以平等的態度討論問題的劉少奇，從此似乎也今非昔比了。南寧會議之後，逐漸使毛澤東奠定了他在中央的特殊地位，這是黨內生活的極大變化。」

李富春則說：「當時反冒進的是陳雲、薄一波出面，劉少奇、鄧小平支持的，但是劉少奇沒有自我批評，陳雲沒有自我批評，薄一波也沒有自我批評，而總理擔當了責任，總理作了自我批評。反冒進的錯誤主要是劉鄧陳薄的錯誤，不是總理的錯誤。」

周恩來也說：「1956年帶頭反冒進的是劉少奇，還有陳雲、薄一波，我也有責任。1958年南寧會議，我作了一個自我批評。薄一波就沒有很好檢討。劉少奇一點自我批評精神也沒有，陳雲沒有自我批評，最後只好由我兜起來。」

「反冒進」是劉、周聯手發起的了，但是反「反冒進」之後，劉沒事，而周則被逼檢討而致心力憔悴。這幕後原因是什麼呢？

延安整風曾經造成劉少奇與周恩來之間的過節。

陳毅在文革中說：「在延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還有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這些人，還不是擁護毛澤東思想最起勁！現在怎麼樣？當年赫魯曉夫吹捧斯大林，後來怎麼樣？劉鄧那些人沒有反過毛主席，那時他們根本沒有見過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嗎？歷史不是證明了到底誰是反對毛主席嗎！？以後還要看，還會證明。延安整風就是錯誤的！」誰整了周恩來？

在延安身兼兩大職（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中央反內奸鬥爭委員會主任）的劉少奇指責周恩來在武漢和重慶工作時，未能對王明、博古「另立中央」的行為進行鬥爭，成了「教條主義的幫兇」；其次是指責周恩來1937年派薄一波訓練閻錫山的部隊，是想「帶八路軍走」；再就是指責周恩來參與簽署「誓死保衛大武漢」的文件，而這完全是王明左傾機會

主義的主張。此外，周恩來還被指為對「皖南事變」新四軍的慘敗負責，要對1928年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的錯誤負責。

在莫斯科召開的「六大」，周恩來同意負大部份責任，但延安還有九位同志也參加了大會，也要負一定的責任。這九位同志有一位便是劉少奇。

但是，在「反冒進」一事上二人卻唱起了「二重唱」，這不能不讓毛澤東擔心害怕，尤其是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還在耳邊迴響。

眾所周知，劉少奇作為二把手，實際上並無多少實權，在槍桿子出政權的中共體系裡面，根基不大。然而周恩來則不同。周恩來在黨內的資歷不在毛澤東之下，而且做過毛澤東的上級領導。毛澤東自然不能對他們兩人「一鍋煮」，只能分而治之。於是，毛澤東選擇了周恩來，這與當時的國際背景明顯有關。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帶來了一個機遇，就是借去「斯大林化」而進行「非蘇化」。周恩來的蘇聯背景成了自己被徹底「搞臭」的重要原因。

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有意樹立劉少奇為周恩來的對立面。劉少奇代表中央作了工作報告：「有人批評我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說得正對！難道我們能夠不好六億人民之大、喜社會主義之功嗎？難道我們應當好小喜過，絕功棄利，安於落後，無為而治嗎？」

劉少奇在報告中以毛澤東的語言號召「全黨同志在建設事業中要做『促進派』，而不要做『促退派』」，並嚴厲的批判了「反冒進」，認為「反冒進造成了『馬鞍形』」。報告說：「那些反對提高建設速度、反對多快好省這個方針的批評，都是站不住腳的。」此報告把周恩來、陳雲等至於被批判的境地。

因反「反冒進」造成了周恩來被整，以至同劉少奇薄一波等人產生了隔閡。「反冒進」之後，劉少奇接踵而來的上升，同周恩來的貶斥形成鮮明的對比。毛澤東因此在劉少奇、周恩來之間打下楔子。這一後果在後來歷史的進程中，被證明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2. 歷史的轉變

胡喬木說：「1958年南寧會議、成都會議批判反冒進是（指毛澤東凌駕於黨中央之上，黨內生活不正常）這種變化的重要關鍵。從那以後毛主席的話誰也不能表示異議，中央其他領導人很難與他平等相處。」從此，毛澤東總是對的，別人都要為之讓步，即使批評錯誤，也要先說毛澤東「革命路線」的正確性，錯誤只能是中央集體承擔而不敢言毛澤東要負主要責任。

在一系列的大會上，毛聲色俱厲的批評了周恩來，上綱上線到所謂「反冒進」就是反馬克思主義。周恩來不得不放棄正確的主張，反而作出了羞辱自我人格的檢討，直至提出「請考慮自己繼續擔任國務總理是否適當？」經眾議一致挽留，周恩來渡過此次危機。大陸流行的比較婉轉的說法是「但是此後周恩來遇事發表意見，就比較少了。」

中共「十二大」政治報告指出：「從50年代後期開始，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特別是黨中央的政治生活越來越不正常，終於導致十年內亂。」

從周恩來做這個檢討開始，黨內便開始形成一種不正常的政治氛圍，一切以毛澤東的是非為是非，維護毛澤東黨的權威就是維護黨的權威，不同意毛澤東的主張就是反黨。周恩來成了對毛澤東的只能聆聽執行，毛如何說，就跟著如何做的典範。這種態勢同毛澤東欣賞的個人崇拜交織互促，吹喇叭，抬轎子的作風日甚，終於導致了個人崇拜在全國氾濫，為「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創造了條件。

周恩來的檢討的確暫時維護了全黨團結的大局，緩解了黨內緊張的氣氛，還保護了同樣「反冒進」的國務院其他領導人。但是從此以後，毛澤東就高居政治局之上，黨內的民主生活開始由比較正常轉向非正常。

對於周恩來的檢討行為，後人有多種評說，讚揚者稱其是顧全大局，為了幾億老百姓而

「忍」；但也有批評者則認為，周恩來的忍讓已經到了沒有原則的程度，助長了毛澤東的權勢。

然而影響最大則是反「反冒進」改變了周恩來，宛如完成了由量變到質變的飛躍。高層折腰自周而起，覆轍難收。毛周關係開始淪為君臣關係。

周恩來在反「反冒進」之後經常提到：「活到老，改造到老」，其實就是按照毛澤東的想法來改造自己，完全不顧是對還是錯。因此，在後來的「文革」中，周恩來僅是忠實的執行毛澤東的決定，從不諫言。作為第一號執行者，自然是第一個跟隨毛犯錯誤的人，是僅次於毛犯最大錯誤的人。金沖及說：「我讀過不少毛澤東和周恩來在各種會議上的記錄和文章……所以一般說來，毛澤東確實是更多的在把握大的方向，拿大主意，而周恩來更多的是負責執行和落實。」

周恩來對於毛澤東逆來順受。以至於到後來對於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王洪文，儘管相對於周恩來王洪文猶如一個毛頭小伙，但是周恩來仍然對之「恭敬有加」。自毛澤東發話，要「傳幫帶」，凡是周恩來主持的會議，都通知王洪文參加，並讓他發表意見。

周恩來成為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的典範。周恩來親自講：「如果壓制就犯路線錯誤，像林彪同志跟主席跟的很緊，他也能預見到，主席一點，我們就要緊跟著做。」只要毛一指責，周就迫不及待地認錯，照單全收，往自己身上潑污水，思想連拐彎都不用，還要做檢討。最後就是當毛澤東不指責的時候，周恩來把檢討當成了向毛表示忠心的工具。1975年1月8日，在周恩來主持下，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討論了四屆人大的各項準備工作，選舉鄧小平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九日，周恩來打電話到長沙，請示毛澤東還有沒有什麼話要向二中全會講，並表示「自己打算在二中全會結束時作自我批評。」毛澤東囑咐身邊工作人員，「勸總理不要講，並指示二中全會閉會時由總理傳達主席的指示：還是安定團結為好。」

周恩來在大事小事上更加突出毛澤東。軍事博物館的開放，就因為周恩來指責其沒有突出毛澤東這條紅線而被迫推遲兩年。

同此相對應的是，周恩來對於毛之惡而甚惡，無論是彭德懷還是後來的劉少奇、林彪，即使周恩來知道事情本不應該做，都是毛澤東的錯，但是周還是一如既往。此事本來就是一個「雙刃劍」，身邊戰友的一個個變成了敵人，在刺傷別人的同時，也刺傷了自己，周自己也始終擔心害怕自己也落得同樣下場。

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之後，被打入地獄。

以後在「文革」的特殊歲月裡，凡是被當權者、造反派和紅衛兵小將們誣為「修正主義分子」、「叛徒」、「特務」和「現行反革命」的人，均要在出現他們名字的時候再加上個紅筆叉叉，如果有他們的照片出現（一般是從相關人家中抄出的舊照片或舊的報刊上登載的），則馬上在他們認為是「叛徒」、「特務」、「黑幫」、「反革命分子」、「修正主義分子」等人的臉上也打上叉叉，以向世人展示。而這些人，如同彭德懷一樣，很多都有周恩來的功勞。但是說不定，自己就是下一個被打倒的對象。

後來，無論局勢多麼險惡，周恩來則從未提出辭職問題，而堅持「不倒」、「不走」、「不死」。

1975年7月1日，周恩來在會見完泰國外賓後，喬冠華要求周恩來同大家合影。周恩來同意了。但是就在攝影師杜修賢按下快門的時候，周恩來突然說到：「我這是最後一次同你們合影。希望你們以後不要在我臉上打上叉叉。」周恩來是有感而發還是另有所悟？

為了保存自己，周恩來還揣摩毛澤東的意圖，做的比毛還左。例如文革初期中提出司局級以上幹部都要燒一燒的。這種特別的「左」，正比如打別人是出於自衛的「用心」，周恩來整別人，包括整彭德懷等，是為了賺取自己的「不倒」的資本。「不倒」的背後是因為周恩來自己的恐懼，而這種恐懼，一直到死也沒有解脫，直到1976年1月2日還要聽毛

剛發表的兩首詩詞，並且還要笑出聲來。

六、將功折罪

1. 廬山會議上的周恩來

(1) 引蛇出洞

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一信奠定千古英名，萬世流芳。但是彭德懷自己也沒有想到，這裡面實在是有毛澤東的「功勞」。彭德懷在廬山上的勇氣，部分的來源於毛澤東的自我批評。

據記載：彭德懷採取的態度和做法頗顯激烈。他7天時間裡在西北組發言7次，許多話據說連負責記錄的秘書們都「手指發抖」。他說：「要找經驗教訓，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責任。人人有責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澤東同志在內。『1070』(筆者註：毛澤東提出1958年鋼產量要達到1070萬噸，2年內超過英國)是毛主席決定的，難道他沒責任？上海會議他作了批評，說他自己腦子也熱了一下。」

毛澤東在上海會議上並不是作了批評那麼簡單，而是嚴厲的批評了一幫大員，要他們學海瑞！

毛澤東在1958年12月到長沙做短暫停留。其間，周小舟請毛觀賞了湘劇《生死牌》。周小舟告訴毛，國防部長彭德懷十一月在長沙看了這出海瑞的戲，非常喜歡。毛當時表示喜歡生死牌，並欣賞海瑞這個角色。那晚在長沙，他叫林克給他找來有關海瑞事跡的部分明史。

1959年3、4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柯慶施則將湖南湘劇團調至上海再次演出。會議期間，毛澤東再次看了湘劇《生死牌》。毛澤東在會上則對海瑞讚不絕口，後還安排胡喬木找人，馬上宣傳海瑞精神。這也是吳晗《海瑞罵皇帝》的由來，由此惹禍上身是後話，暫且不表。

毛澤東說：「儘管海瑞罵了皇帝，但是他對皇帝還是忠心耿耿的。我們應當提倡海瑞這樣一片忠誠而又剛直不阿、直言敢諫的精神。」毛澤東還說：「一個人有時勝過多數，因為真理往往在他一個人手裡，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裡，如馬克思主義就是在他一個人手裡。列寧講要有反潮流的精神，各級領導要考慮多方面的意見。各級黨委要考慮多方面的意見，要聽多數人的意見，也要聽少數人的意見和別人的意見，在黨內要造成有話講、有缺點要改正的空氣，批評缺點往往就有點痛苦的，但批評之後，改了就好了。不敢講話無非是六怕：怕警告，怕降級，怕沒有面子，怕開除黨籍，怕殺頭，怕離婚，殺頭，岳飛就是殺頭才出名的。要言者無罪，按照黨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見。」

毛澤東大講海瑞，提倡海瑞精神之餘，還把《明史》「海瑞傳」送給彭德懷，讓彭向海瑞學習。就是在這次上海會議會上，毛澤東還談到彭德懷，他說：「我這個人是被許多人恨的，特別是彭德懷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此處省略見下文)我跟彭德懷同志的政策是這樣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僅跟彭德懷一個人這樣，跟其它同志也是這樣。」

不少人根據後來廬山會議的結果來反證這段話，是毛澤東早就對彭德懷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後快。但是毛澤東當時在上海會議說這話只能是暗藏殺機。筆者則認為毛澤東是在用「激將法」，引蛇出洞：彭德懷你不要因為你我之間的私人恩怨而不敢講話啊！

4月5日，毛澤東在講話中抱怨他的下屬「不大批評我的缺點」，提倡海瑞精神。毛澤東說：海瑞寫給皇帝的那封信，那麼尖銳，非常不客氣。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們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樣勇敢。我把《明史·海瑞傳》送給彭德懷看了。同時也勸你（指周恩來）看，你看了沒有？

周恩來答：看了。

毛澤東還對周說：「我們又不打擊又不報復，為什麼不敢大膽批評，不向別人提意見？明明看到了不正確的，也不批評鬥爭，這是庸俗。不打不相識嘛！」

為了讓彭德懷、周恩來「上鉤」，毛澤東對於歷史來了個大回顧，一個個點名，作為陪襯。

毛澤東說：「（特別是彭德懷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因為我跟他鬧彆扭鬧得相當多。會理會議、延安會議，中央蘇區江口會議，我們兩個人鬥。（我跟彭德懷同志的政策是這樣的）」

接著毛澤東說：「我們這些老同志沒有打過架的相當少，不打不相識。你打過來，我打過去。我跟恩來打過架沒有？跟彭德懷打過架沒有？跟朱德打過架沒有？跟你（指劉少奇）也打過架，就是合作化問題，對於洛甫的處置問題，翻你的案，也打過架。跟陳雲我們打過架。跟林彪也打過架，我們在閩西一路合作得很好，遵義會議以後我跟你們兩位（指林彪與彭德懷）斗分裂了，搞了一個會理會議整你們。因為你們要把我們搞掉，要搞掉三個人，一個是我，一個是朱德，一個是周恩來，你們要來組織司令部，你們沒有紀律，你們是錯誤的，那得整。……肖勁光我跟你打過仗沒有？那個仗恐怕是我錯的多，你正確的多。但是那個時候你也有錯誤，你一點錯誤沒有？」

劉伯承同志我們兩個不是鬥得厲害？我還寫了書，戰略問題，那就是批評你的，你也沒有答覆。後來你在軍事院校大概是想答覆一下，沒有尖銳地提出問題來批評，因為我那篇《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不能反駁的，是駁不了的。那裡頭批評了劉伯承，批評了任弼時，沒有指名字。任弼時封我一個『狹隘經驗論』；劉伯承封我一個『怕打爛罈罈罐罐』，軍事上不行。還有已經死了的凱豐同志，那時他是博古派……。至於跟粟裕同志，肖克同志，還有陳伯鈞，還有郭化若同志，我們幾個人是歷來鬥的，他們是我的反對派。但是（筆者註：原文如此。）你們是反對派，你們的官還可以做，我不報復。去年報復一次，不是我的報復。去年報復是開軍委擴大會議，四五百人，是你們犯了錯誤，把你們這一批評，我就開心了。」

毛澤東還以李銳寫信為例，鼓動下屬向他提意見，說不僅要有「骨頭」還要有「肉」。但是胡喬木卻說：引用海瑞的說法不止這一次，實際上還是要求不要出海瑞。如果真是如此，那不就是釣魚麼？周恩來就讀懂了毛的真實含義，檢討沒有白做。後來彭德懷廬山上書，是不是同毛澤東鼓勵李銳寫信有關？

彭德懷上廬山前，對是否上山開會，有過猶豫。黃克誠說：「早有一次，主席對彭開玩笑地說：「老總，咱們訂個協議，我死以後，你別造反行不行？」黃克誠說，可惜彭德懷並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說就說。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先引誘彭德懷「犯我」，然後再將「犯人」的重武器打向彭德懷。或許是最終還是沒有抵擋住「真理往往在他一個人手裡，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裡」的誘惑，或許是要「為民鼓與呼」，也許是毛說的看準了事要大膽干，當逆風襲來時要敢於「擋風」給以的鼓勵，彭德懷上了山。但是同在廬山上，也受到毛澤東特意點撥的周恩來，和彭德懷的表現卻是大相逕庭。

（2）廬山會議

1957年7月2日，廬山會議開幕。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萬言書」（筆者註：實際上彭德懷致毛的信大約在3400字左右），力陳大躍進的荒唐，矛頭直指毛澤東。周恩來開始呈觀望態度，李銳問他對「萬言書」怎麼看，只是輕描淡寫地說：「那沒有什麼吧。」其實毛澤東已經就彭德懷寫的信和劉少奇、周恩來通過氣了。不在廬山的陳雲都覺得廬山上氣氛詭異，勸接到上山通知的鄧子恢不要上山。鄧子恢說：幸虧陳雲同志，不然，後果不堪設想。

7月22日，毛澤東找幾個人談話。柯慶施、李井泉對糾「左」不滿。柯慶施說，現在很需要毛主席出來講話，頂住這股風，不然隊伍就散了。他認為，彭德懷的信是對著總路線，對著毛主席的。當天晚上，毛澤東與劉少奇、周恩來商量準備第二天開大會。1959年7月23日，毛澤東大發雷霆，對彭德懷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但是毛澤東話中有話，警告周恩來要站穩腳，要思量，別站錯了隊：

「我勸一部分同志，講話的方向問題要注意，講話的內容要基本正確。要別人堅定，首先自己要堅定；要別人不動搖，首先自己不動搖。這又是一次教訓，他們還不是右派，是中間派。我所謂方向，是因為一些人碰了釘子，頭破血流，憂心如焚，站不住腳；動搖了，站到中間去了，究竟是中間偏左偏右，還要分析。

他們重複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錯誤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只差30公里了。現在他們這種論調，右派歡迎。這種同志採取邊緣政策，相當危險。」

這段話是在敲山震虎。周恩來要以切實的行動來證明自己已經悔過。無獨有偶，在1958年1月毛澤東在徵求《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意見時就聯繫1953年的事情敲打周恩來。毛澤東說：「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辦也有決，不離原則。工作檢查，黨委有責。」這八句歌訣，產生於1953年，就是為了反對那時的分散主義而想出來的。」意即針對當時政務院在1952年未經請示中央討論即批准財政部發佈「新稅制」。（筆者註：「新稅制」是薄一波報周得到周的同意後發佈的，但是周並未上報給毛。）

會後，周恩來就指責彭德懷把「失」字放在前面是有意識的。現在的周恩來，在毛澤東決定反擊後，開始積極充當打手，不過不再是打自己的屁股，而是幫著毛打彭德懷的屁股了。

周恩來不是不知道彭德懷是對的，就像一年多以前不是不知道自己是對的一樣。

周恩來對彭德懷說（筆者註：此對話節選自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本）：「鋼、鐵、煤的計劃不能完成。還有運輸是個大問題。木材、化肥、糧食繼續緊張。更重要的是基建。還有機械、財政、金融、外貿……上海的煤只有七天的儲備。六個月的存量只有三百一十億斤。去年增加了二千八十萬人。按『一五』經驗，一元貨幣九點六元物資，市場就正常一點。一九五六年，一比八點八就緊張了。」

彭德懷問：「這些情況為什麼不到大會上去講一講呢？」

周恩來支吾其詞地：「開始就講這些困難，像訴苦會了，誤會成洩氣不好。」

彭德懷感歎：「你們這些人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

豈止是人情世故那麼簡單。周恩來明知道問題的嚴重性，卻助紂為虐，落井下石，置彭德懷於死地，立下一份功勞，表上一份忠心。

周恩來後來在8月1日的常委會上為自己辯解：「你的骨頭是犯上。」言外之意毛澤東不是皇帝麼？周恩來同志人在社會主義社會裡，思想卻停留在封建王朝皇權時代。現在應該「所有領導同志都要馴服」，但是「馴服就沒骨頭？」於是周恩來後半輩子非常馴服，但是有沒有骨頭則是見仁見智。這一馴服是對毛一個人馴服，後來還對毛的夫人也馴服。

7月26日，毛澤東提出「事是人做的，不僅對事，也要對人。要劃清界限，問題要講清楚，不能含糊。」由此，對彭德懷的批判開始升溫。當天下午，周恩來向北京來的各部委的來參加會議的幹部作了長篇講話。他在講話中提醒到會人員劃清政治方向和工作態度的界線：一是不能動搖和否定黨的總路線，這是第一位的問題；二是工作態度是第二位的問題。周恩來警告下屬在這場政治鬥爭中不要站錯隊，要保衛總路線，不要動搖；同時要抓好經濟工作，渡過經濟難關。此外，周恩來還勸彭德懷不要站在局外指手畫腳，要盡快認識「錯誤」亦即檢討。

8月1日常委會上，主要是毛澤東講話，其它常委不時插話，追問。周恩來除了為自己的馴服辯解以外，指責彭德懷的信「方向是向總路線進攻，站在右傾立場，信的鋒芒是指向

總路線」。當劉少奇揭發彭德懷反對唱《東方紅》時，周恩來插話說：「這是感情問題。」當毛澤東說彭德懷過去和他七分合作時，周恩來急忙補充說：「華北又鬧獨立自主。回延安三年格格不入。解放戰爭合作，抗美援朝，回到軍委，不大靠攏了。」

8月1日，批判彭德懷的大批「援軍」上山，他們是來參加八屆八中全會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8月4日晚，由劉少奇主持，向這批「援軍」傳達前兩天常委批評彭德懷的情況。周恩來作了長篇發言，他說：「會議中有一種苗頭，就是多講缺點，誇大缺點，以彭德懷同志為代表。他在火車上就談到若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就會出匈牙利事件，7月7日在主席那裡匯報時，他也談了這個看法，我們聽到就不以為然。第二次在主席那裡匯報，他又說，工業的大躍進，是農業的浮誇搞起來的。歸罪於農業，也是不對的。大躍進是工業躍進在先。農業是主席直接領導的。他攻擊譚振林，也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常委會找彭談，認為這封信是有計劃、有準備、有組織、有目標的活動，是一個反黨中央、反總路線、反毛主席的活動。是一個綱領性的東西。彭在政治局會議上總是冷言冷語，……」，接著，周恩來把常委會上強加給彭德懷的各種罪名，傳達給「援軍」。如：「常委會找彭談，認為這封信是有計劃、有準備、有組織、有目的的活動，是一個反黨中央、反總路線、反毛主席的活動，是一個綱領性的東西。」「省上的周小舟同志，他也是打著無產階級旗幟向『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進攻的。」「彭信一出來，問題性質變了……是糾左之後，右傾機會主義露頭了。山上山下，黨內黨外，國外都有。彭德懷同志是這一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的主要代表。所以，這次全會毛主席提出來，全會的任務，就是要保衛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反對黨內分裂鬥爭。問題本質是這麼一回事。」

周恩來還把黃克誠和張聞天捆綁在一起：「毛主席說的軍事俱樂部，首先是一個國防部長、一個總參謀長，總是密切合作了。」「張聞天講了三個鐘頭，文武合璧，相得益彰，一文一武，國防、外交。」而黃克誠則是上山之後，周恩來就勸黃不要亂發言。但是黃發言之後，周恩來批評到：「你吃了狗肉來的吧！勁頭這麼大！」此時的周恩來已經沒有是與非了。

彭德懷折身於廬山。原來主管經濟工作的周恩來不知道彭德懷是對的？當然知道。但是周恩來依然落井下石，還勸說別人攻擊彭。

張愛萍回憶：他上山的時候，廬山上對彭老總的批判已經搞了半個月。也許是怕他們上山後亂放炮、犯錯誤吧，當晚，周恩來通知他們參加預備會，介紹了前一階段的情況，特別指出「彭德懷和張聞天的《意見書》，是右傾機會主義向黨、向黨中央、向毛主席、向總路線的進攻。這有著深刻的思想、歷史根源；是有綱領體系的活動。」雖然張愛萍想方設法為周恩來開脫，但是就如後來文革中一樣，周恩來不僅自己要做幫兇，還要說服別人也要當幫兇。

1959年8月24日，周恩來應軍委擴大會議主席團的要求，在會上作題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堅決粉碎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陰謀集團的活動》的報告。雖然周恩來表示：「我也不能說對彭德懷同志的歷史問題知道的完全的清楚。」但是這並不妨礙周恩來對彭德懷的歷史來個總的清算和鞭撻。

報告將彭德懷的歷史分成15個時期：（1）平江暴動及其以後一段時間；（2）立三路線時期；（3）一、二、三次反「圍剿」時期；（4）第一次王明路線時期；（5）長征、遵義會議；（6）張國燾分裂時期；（7）北上長征時期；（8）洛川會議極其以後、東征以後西征；（9）第二次王明路線時期；（10）華北抗戰時期；（11）延安整風和華北座談會；（12）七大前後；（13）西北野戰軍時期；（14）抗美援朝時期；（15）主持軍委工作時期。周恩來歷數彭德懷的歷史問題。除此之外，引人注目的是，除了彭德懷以外，周恩來把張聞天和黃克誠也列入「高崗反黨集團的漏網分子，重要成員」，這一次是「高饒事件反黨聯盟的繼續和發展。」

彭德懷倒了，周恩來立功了。

隨後在10月6日的《人民日報》上，周恩來發表長文《偉大的十年》，論證了總路線的正確，不點名的批評了彭德懷，指出「我們黨內有些人之所以陷入右傾機會主義的泥坑，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於他們反對黨的總路線。」，為大躍進大唱讚歌。

其實早在周恩來剛做完檢討，於1958年的7、8月間在河南農村視察時，就已經表態了。周恩來在8月初視察河南遂平縣人民公社時得知畝產才3853斤時說，「你們放的衛星不小啊，聽說西平縣比你們膽子更大一些，放了畝產7320的衛星。」周恩來於1958年7月19日和8月6日兩次參觀豐產展覽，當他看到西平縣和平社二畝小麥平均畝產7320斤和猛進社一畝七分地的小麥平均畝產7201斤時，非常重視。他說：「西平在你們那裡，西平是第一的，是狀元。」人們用常識作出判斷：7320斤，在一畝面積的打麥場上平鋪將近半米厚，這是不可能的。由此就可以理解周恩來是如何對待其主管下的國務院各部委所依據的那麼多虛假的數據而做出的生產計劃！

《人民日報》的老記者聶眉初回憶：「在那一段時間，我每次都列席中南海大煉鋼鐵的電話會議，成為聆聽這個最高指揮部聲音的新聞工作者。這樣的會議多由周總理主持，有時是薄一波同志，個別時候是李富春同志主持的……各省是工業書記參加。總理挨個点名詢問：昨天產量多少？書記們挨個回答：昨天生產焦（炭）多少，鐵多少，鋼多少。《人民日報》與此配合，在顯著位置以最快的速度刊登各地放的『衛星』和創造的先進經驗：8月21日三版報導了『河南一千多座轉爐土爐煉出千噸鋼』……(一個個的衛星就是這樣放出來的一筆者註)」。]

而周恩來後來為了維護「三面紅旗」，對於造成幾千萬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的「大躍進」的評價是「這是真正的大躍進，不是吹牛。」

(3) 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

楊繼繩認為：毛澤東7月23日講話以後，風雲突變，再也沒有人說反左的話了。大會集中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人進行批判，逼他們作違心的檢查。毛澤東身邊的高官們迅速改變態度，緊跟毛澤東，加入反右傾的大合唱。他們中的有些人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沒有畏懼，在敵人嚴刑拷打中也沒有屈服，而在極權制度中做了高官以後，有的變成了馴服的綿羊，有的變成了兇惡的鷹犬，更多人則是見風使舵，八面討好。當然，他們這樣做有種種堂而皇之的理由：為了維護大局，為了黨的團結。但是，有一點是不能迴避的：個人利害關係。在戰爭年代，他們多是孤身一個，沒有家庭包袱，他們認定鬥爭的對象是邪惡的，成功了就是英雄，犧牲了就是烈士。當了高官以後，有妻子兒女，有榮華富貴。更為重要的是，懲治他們的是被戴上種種理想光環的政權，是被所有的宣傳工具天天歌頌的「英明領袖」。這使他們感到，殺了頭不僅殃及子女，還要遺臭萬年。極權制度就是這樣把昔日的英雄變成了奴才。中國的高官歷來有一個追求：文死諫，武死戰。實際在中國的歷史上，武死戰的層出不窮，文死諫的寥若晨星。這也是制度使然。……1956年，周恩來和陳雲根據在第一線抓經濟所遇到的困難，提出了「反冒進」，後來在南寧會議以及其它會議上，遭到毛澤東的痛斥。周恩來一度失去了經濟工作的發言權。「大躍進」就是針對「反冒進」而提出來的。周恩來從此「痛改前非」，再也不敢非議「大躍進」了，緊跟毛澤東搞「大躍進」。「既要維護「三面紅旗」，又要解決「三面紅旗」造成的惡果，周恩來的內心是矛盾的。這種矛盾的心態，造成了他在廬山會議期間的雙重人格。他一方面努力解決現實問題，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計地迎合毛澤東。

另一種觀點則是：

廬山會議後，黨內外在一片「反右」氣氛籠罩下，急躁冒進再一次抬頭，各地的指標不

僅沒有降下來，反而出現了新一輪的「躍進」風潮。舊的困難沒有消除，又增加了新的困難。階級鬥爭的理論與實踐也從此升級。廬山這場鬥爭「在政治上使黨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直接導致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上的長期混亂。周恩來在廬山處於被動尷尬的地位。在這種處境下，他憂心如焚，顧慮重重，內心常常充滿矛盾。他難以忍受一些過頭的做法和違反經濟規律的事，但又不便在公開場合提出不同意見。他惟一能做到的，就是根據實際情況，把毛澤東和中央做出的這些決定加以變通，盡量減少損失，而「變通」起來往往是力不從心，困難多多。特別是「投鼠忌器」，他在盡最大可能消除「大躍進」消極影響的時候，還必須顧及到毛澤東的形象不受影響；他在反右傾保守的時候，還要考慮務實，擠去虛高的水份。他就是在這些矛盾的夾縫中周旋著，在兩難處境中遊走著。實踐證明，廬山會議以後的歷史雖然沒有因為周恩來當時的努力而改寫，但在經濟上卻把因批右造成的損害減小到了最低程度。周恩來功不可沒！

無論哪種觀點都承認了：在上海會議上，毛澤東讓周恩來和彭德懷學海瑞，周恩來沒有學，彭德懷學了。沒有學的周恩來成了批判彭德懷的主力之一。對於周恩來的「老奸巨滑」在廬山會議一開始，就表現無遺：

7月10日，毛澤東召集各小組組長開了一次會，講了一番話。這番講話主要是為大躍進中的缺點、錯誤辯護。第二天傳達時，當傳達到「一年來有好的壞的經驗，有成功的與錯誤的經驗；不能光說有壞的錯誤的經驗」時，周恩來插話說，1958年邀請來中國的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扎夏季科回國後談在中國的觀感，說中國高速度發展，「大躍進」超過蘇聯，對社會主義陣營有好處；錯誤缺點發現快，糾正也快。蘇聯一教授說中國「大躍進」這個詞好。其實，扎夏季科對中國有批評性意見。周恩來只轉達人家的好話，把人家批評的話隱瞞了。周恩來為了用蘇聯人的話為毛澤東幫腔，竟片面地轉述人家的意見。深深知道毛澤東內心想要的東西，周恩來總是給予支持，無論是否對人民有利是無所謂的。在此點上，周恩來在後來責任田一事上的表態得到了充分體現。（見第二章）

筆者認為：反「反冒進」是中國建國後第一大轉折。全局性的「左」傾錯誤就是從這個時候迅速發展起來的。周恩來可以說是以原則為代價，換取自保的利益。明明「反冒進」是對的，卻要順著毛的意思，偏要說自己不對；明明說不出口，下不了筆，硬是強迫自己公開說出自己的罪過，袒臂接受廷仗。整個國家卻繼續為毛澤東錯誤冒進的政策付出代價，直至經濟大幅滑坡，天災人禍，一連三年大饑荒，餓死人無數。因此，周的相忍為黨純粹是美化，是黨重要，還是老百姓重要？可以說，如果沒有反「反冒進」，就沒有後來的文革。而大躍進造成的後果，各地大量餓死人的時候，周恩來作為一國總理，並沒有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進而採取積極措施，而是完全的體現了一個當時體制下的一個官僚的本色，在大饑荒中，寫下了重重的一筆。

2. 大饑荒中的周恩來

（1）周恩來對於各地大量死人和農民缺糧是知情的

1958年冬就出現了餓死人的情況，1959年春天餓死人更多。也就是說1959年春天，大饑荒已經全面出現。面對成千上萬的農民在死亡線上掙扎，執政者在糧食上沒有採取應急救助措施，反而繼續從農民口裡剝奪糧食，繼續出口糧食。

國務院秘書廳1959年4月6日，送上了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糧情況的報告，4月9日，又送上了15省春荒情況統計表，說有2517萬人無飯吃。

早在1959年1月至2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連續收到了大量的群眾來信，反映河南省東部的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縣發生大量的浮腫病人和死人情況。1960年2月，江蘇省省委向周恩來報告，全省城市浮腫病患者就有12萬多。農村的情況比城市更為嚴重。

1960年初，周恩來收到有關部門轉來的安徽省一個政協委員的來信，信中反映安徽省和縣、無為縣餓死人情況。周恩來於3月29日致函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要求查明情況後回復。

信件全文如下：

希聖同志：

轉上一信，請閱後派人前往兩縣一查，也許確有此事，也許誇大其辭，但這類個別現象各省都有，尤其去年遭災省份，更值得注意。主席在批轉山東省六級幹部會議文件上，也曾著重指出這一點。請查明後復我一信。

敬禮！

周恩來

一九六零三月二十九日

周恩來並沒有認真對待此事，僅是表示「也許確有此事，也許誇大其辭」。同時此信表明了周恩來知道「這類個別現象各省都有」。

隨即在4、5月份，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和中央監察委員副書記王從吾分別寫關於信陽事件的書面報告，上報周恩來。周恩來決定成立中央工作組，馬上深入信陽地區，進一步調查情況，向中央作詳細的匯報。事後周恩來也只是表示「信陽發生這麼大的事，我有責任。」有人說，周恩來得知信陽事件中有許多群眾被餓死，而國家的糧庫就在附近，受飢餓的群眾卻沒有一人去搶倉庫時，被深深地震動了，他整整一夜沒合眼。

但是整整一夜沒有合眼的周恩來又採取了那些有效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呢？有開倉放糧麼？沒有。相反，周恩來還採取了相反的動作，在造成幾千萬的死亡上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楊繼繩先生在其《墓碑》一書中講述了這麼一個情節：由於非正常死亡大量發生，1960年12月28日，中共河北省委向地、市黨委發出密電：《關於必須及時發現和制止死人問題的緊急通知》。省委一方面要求它的下級注意解決死人問題，一方面大力催促它的下級完成糧食徵購任務。前者只是口頭上的號召，而後者卻是加速死亡的切實行動。1961年9月15日，省委召開了電話會議，要求「在政策範圍內多購一些，少銷一些」，「全省全年的徵購任務堅決完成32.1億斤」，並把這個指標分配到了各專區。滄州專區接到2.4億斤的徵購任務後，再向縣分配下去，有的縣農民的平均吃糧水平每天只有2兩多一點。河北省這樣做也是中央逼出來的。1961年10月5日晚，周恩來總理召開了全國糧食問題會議，他強調指出：各省務必抓緊進行徵購。李先念副總理在會上還批評河北省徵購任務完成得極為緩慢。10月16日，參加這個會議的省長劉子厚給在省裡的領導人閻達開、李硯農、萬曉塘打回緊急電話，提出「首先把徵購任務切切實實地肯定下來（不是力爭，而是堅決）完成33億斤。」「我們必須向各級幹部進行深入的思想工作，幫助他們提高認識，端正思想，明大義，顧大局。要瞭解在目前情況下，還要少吃一點，多拿一點。動員起來，做好群眾工作，堅決完成今年的徵購任務。」為了完成徵購任務，各地區派大批幹部深入農村。僅邯鄲地區就派出了3638名幹部下鄉，分片包干抓糧食入庫運動，入庫糧食在增加，但農民和基層抵觸情緒也在增加，他們質問：今徵購任務增加了兩次，為會麼還要增加？在這場「糧

食入庫運動」中有多少暴行？多少血淚？這是可想而知的。

宋任窮回憶：1960年10月周恩來要求繼續從黑龍江、吉林調撥糧食，並詢問黑龍江省，糧食是不是要緊張？並說，過去說保證不餓死一個人，現在看一看，真使人心中不安。但是心中不安並沒有影響周恩來繼續徵糧的決心。宋任窮還回憶到，當時他派了大批地方幹部和軍隊幹部調查黑龍江省的情況，寫了不少報告。周恩來就看了19篇。但是這並不影響周恩來在1962年繼續從黑龍江徵收大量糧食。

時任黑龍江省委書記的楊易辰回憶：1962年，中央給黑龍江省下達了調撥2.8億斤糧食的任務。黑龍江雖說是全國重要的產糧基地，比有些省稍微好過一點，但當時的經濟狀況也已經十分困難，糧食非常緊張。人吃馬料，馬代人死，不少人全身浮腫，患肝炎的相當普遍。我主管財貿工作，負責安排全省人民的生活，既感到責任重大，也感到壓力很大。1962年3月，總理到遼寧召集東北三省領導同志開會，調糧問題是一個主要議題。黑龍江省是歐陽欽同志和我參加的。會上，當總理向我提出要黑龍江省再增撥2億斤糧食支援外地時，我就有些想不通了。覺得黑龍江已經調出了不少糧食，為國家作出很大貢獻，再要多調出2億斤糧食，實在困難太大，如果因為糧食出了問題，也無法向全省人民交代。我是個直性子，想不通的事就不容易轉彎。因此，就同總理爭了起來，表示對再調撥2億斤糧食有意見，要求中央考慮黑龍江的實際困難。總理表現出高度民主的作風，他並不打斷我的話，也沒有強迫我執行命令，而是耐心地聽我講完，然後循循善誘地與我談，要樹立全局觀念，服從大局。黑龍江有困難，但其他省份更困難，很多省死了不少人，國家要拿出糧食來幫助他們。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全國上下團結一致，同心同德，才能渡過難關。每一個黨員幹部，尤其是領導幹部，一定要顧全大局，以黨和人民的利益為重，堅決支持和執行中央的統一部署。總理的一席話，使我深受教育。我感到自己確實是考慮本地區的利益多了，想整體的利益少了。思想通了，在行動上我堅決執行了中央的調糧計劃，想辦法做好各方面的工作，與全省人民一道完成了調糧30億斤的任務。

結果卻是黑龍江餓死了19萬多人！

真的拿出糧食來幫助其它省了？還是出口了？此問題楊繼繩先生在《墓碑》一書對於糧食的去向分析的非常透徹，在此，筆者僅引用當時的庫存糧來說明問題。

對於當時（1960—1962）年間的糧食情況，周恩來是瞭如指掌的。僅僅從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根據不完全統計，周恩來就糧食問題談話就多達115次，在總理辦公室退給糧食部辦公廳的現在仍然保存的32張報表中，周恩來的筆跡有994處。但是這些談話和筆跡中可以看出，周恩來關注的主要是城市糧食供應，然而死亡幾近都在農村！顯然周恩來考慮的是政治影響而非人的生命，城市人特別是幾個類似北京的大城市如果餓死人，一旦傳播出去，政治影響不可估量。但是農村即使餓死人，但是由於地處偏僻，在中共當時的封鎖體制下，很難象大城市那樣容易傳播出去。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工作會議。周恩來在會上作關於糧食問題的報告，涉及估產、徵購、銷售、調撥、進口和集中運輸的等多項議題，唯獨沒有提到甚至也無建議：開倉放糧！

當時的庫存到底有多少糧呢？

大饑荒年代糧食庫存（貿易糧，億斤）

	57—58年	58—59年	59—60年	60—61年	61—62年
七月	354.85	388.94	338.79	265.88	157.46
八月	401.9	398.71	395.84	289.11	191.3
九月	486.31	417.23	503.15	341.02	234.81
十月	560.21	418.12	655.21	386.93	304.95

十一月	6 9 0.6 6	6 5 8.0 2	8 8 7.0 3	5 4 0.0 8	4 6 0.5 7
十二月	7 5 6.9 1	7 4 8.4 3	8 4 8.9 8	5 7 2.1 1	4 9 0.0 2
一月	7 2 5.0 8	7 1 4.4 2	7 6 4.1 5	5 1 0.3 5	4 3 8.7 9
二月	6 7 6.7 5	6 5 4.5 6	6 7 3.1 9	4 4 4.5	3 9 4.8 8
三月	6 0 1.6 6	5 5 6.0 1	5 4 4.5 4	3 5 9.8 3	3 2 8.8 6
四月	5 0 7.6 2	4 3 3.5	4 0 3.5 1	2 6 7.8 9	2 5 7.9 8
五月	4 0 4.5 3	3 1 9	2 8 6.2 2	1 9 0.8 6	2 0 0.9 2
六月	3 8 4.4 1	3 4 3.2 8	2 9 7.0 6	1 7 1.7 1	1 8 9.2 8

資料來源：1962年8月25日《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

幾千萬人是守著幾百億斤糧食庫存餓死的！

周恩來無需說什麼大話，只要下令開倉放糧就可以了！而在個別地方，確實有地方官員開倉放糧而導致本縣死亡人數大大低於鄰縣！就連信陽那麼死亡嚴重的地方，都沒有運糧進來！後來還是信陽自己庫裡的糧食解決的！而作為罪魁禍首之一的吳之圃在67年因病去世時，周恩來竟然還提議要為他舉行追悼會！可見當官和老百姓在周恩來的心目中是不一樣的。可見為了調糧到中央，為了出口，為了其它，但不是為了救人命，周恩來謊言說盡！

（2）周恩來仍然決定賣糧食換黃金

應當說，當時很多的決策是毛澤東或者當時的體制決定，周恩來並無太多主動權。例如在造成如此重大死亡的大饑荒原因之一就在與不准老百姓逃荒！根據楊繼繩先生在《墓碑》一書的記載，地方官員根據1959年3月頒布的《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制止百姓逃荒，公然將農民困在家中餓死！而此文件正是周恩來根據鄭州會議精神親手改寫制定的！顯然這是針對當時饑荒日益嚴重，百姓逃荒事件劇增而出台的。此事如果完全算到周恩來頭上是不公平的。

但是並非說明周恩來手裡毫無一張牌可打！

正當各地大量餓死人的情況下，周恩來決定要以糧食換黃金，而且就在死人最嚴重的1960年開始。當事人回憶說：

「1960年，我國財政赤字已經高達80億元，但為保證最低限度的國計民生的需要，還必須從國外進口大量小麥。在嚴重危機面前，如果我國在國際市場拋售黃金，以解決外匯緊缺問題，也不是不可以的，但周總理不贊成這樣做。他說，黃金不能賣！我們要以黃金作後盾。他強調，在外匯的使用上，我們花一個美元都要認真考慮考慮！周總理這種一心一意為國家、為人民的利益著想的崇高思想品質，使我們感動不已。事隔這麼多年後，每當我想起他這兩句言簡意賅鏗鏘有力的話，仍然感慨萬千。在周總理直接過問下，我們不僅沒有賣黃金，而且還利用金價比較便宜的機會，每年買進幾十萬兩黃金。年年買進，一直買到1970年。這些黃金都是用專機運回國內的。」

一兩是1.613盎司，當時黃金價格是一盎司約為40美元，當時匯率為一美元對2.4618元人民幣，糧食價格大米約為0.2元人民幣每公斤，10萬兩黃金就需要近1億公斤大米！且不論具體的糧食用量，但是這個決定本身就是極其荒誕無比！而且1961年也還是如此買進！1961年發生了什麼？

1961年，糧食部陳國棟、周伯萍和國家統計局賈啟允三人受命，讓各省填寫了一個有關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經匯總以後，全國人口減少了幾千萬！這份材料只報周恩來

和毛澤東兩人。周恩來看到後通知周伯萍：立即銷毀，不得外傳。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監督銷毀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後周恩來還打電話追問周伯萍：銷毀了沒有？周伯萍回答銷毀了，周恩來才放心。

對於事無鉅細，事必親躬的周恩來，可以理解不能違背中央政策不開倉放糧，不能違背中央政策制定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中央文件，但是賣糧食換黃金卻是周恩來一手決定的！是錢重要？外匯重要？還是人的生命重要？！作為一個泱泱大國的總理，對於本國人民的死亡是如此的麻木，而對於那些死亡的證據又是如此的敏感保密，這個是何等的諷刺！

從中央到地方，從毛澤東到周恩來，在到地方大員，廬山會議後，從官方文件、領導人講話和新聞媒體，眾口一詞地宣傳「自然災害」，不再像1959年那樣，把大批人因飢餓而死說成是瘟疫流行。1960年10月29日，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這樣大的災荒那是我們開國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們這個年齡的人來說，二十世紀記事起，也沒有聽說過。」

從好處著眼，是維護大局，是防止黨的分裂，但是如果從官場進退，政治沉浮、個人得失等角度來看，周恩來等順從毛澤東的意志，明明知道問題的嚴重性，絲毫不敢進言，而是推波助瀾，落井下石，共同把災難推向極端。

第一部分 第二章

文革前的四年：在「君臣關係」中揣摩

周恩來歷來是緊跟當朝的一把手。在毛澤東的眼裡，如果毛下台或者周在毛死之後還在台上，那麼周是極有可能做「秘密報告」的人。因此毛借「反冒進」整治了周恩來，隨後掀起了「大躍進」。廬山會議反右傾之後的進一步「躍進」加劇了大饑荒，而大饑荒造成的嚴重後果迫使毛澤東不得不暫時退讓。這時雖然有不少重要決策，仍由身居二線的毛澤東主持作出，但在決策程序上，特別是60年代初期，在一線實權大大擴大的局面下，毛進行全局性佈置，已很難繞過劉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會議和政治局會議。

60年代初期的格局，具體說來是，劉少奇在總書記鄧小平協助下主持黨中央工作，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工作。周也要向劉請示。劉只有重大問題才向毛澤東報告，請毛髮表意見或作決斷。若毛不在京，除極其重大的問題外，劉可與在京常委商議後，對任何問題可以當場拍板。

隨著經濟的好轉，毛整肅黨內高層的念頭重起。劉少奇在1962的七千人大會上當面指責大躍進，觸動了毛。但是毛澤東在先整周還是整劉的問題上尚未作最後決定。直到劉少奇讓王光美做了關於《桃園經驗》的報告，江青告了狀。鑒於赫魯曉夫下台的教訓，毛澤東感到有生前被清算或架空的危險，同時江青的告狀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於是拿掉劉少奇成了毛澤東的優先選擇。同時由於周恩來的積極迎合，特別是同劉少奇相比，對待江青的態度，在毛澤東決定先打倒哪一個上起了重要作用。在毛澤東清洗了「彭羅陸楊」之後，劉少奇的態度，終於使得毛澤東下定了決心。但是周恩來始終是要被打倒的一個人，但是人算不如天算，還沒有等到被畫叉叉，周恩來就離開了人世，隨後毛澤東也撒手人寰。

一、重新解讀七千人大會

「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的「成果」就是打倒了劉少奇。文革的中後期，毛澤東又把矛頭對準了周恩來。但是人算不如天算，還沒有等到毛澤東的那「九篇文章」重新「出爐」，周恩來就去見馬克思了。眾所周知，在「反冒進」的時候，毛澤東批過周恩來，說周離右派只有50米了。但是此時「批周」和後來文革中的「倒周」完全不同。毛澤東何時開始想「倒周」？或者更明確的說：在毛澤東準備發動文革的時候，是否在準備一開始就把矛頭對準劉少奇，還是另有他人？筆者在閱讀大量的文獻之後，發現毛澤東在考慮發動文革的過程中，對於是先「倒周」還是先「倒劉」是考慮過的。是因為劉少奇自己的「所作所為」，周恩來給予毛的「充分配合」，才使毛在1965年初下定決心先「倒劉」。

1956年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毛澤東對此有過如下表示：一則是喜，一則是懼。「喜」，是指揭開了教條主義的蓋子；「懼」，是指除擔心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出現思想混亂外，也包含擔心身後有人否定自己。可以這麼說，毛澤東在當年僅是擔心有人反對他的話，那麼從蘇共二十大之後，就開始考慮如何吸取斯大林在世時沒有能識別和除掉赫魯曉夫式人物的教訓。

許多專家學者說，七千人大會是個分水嶺。主要的證據為三：

第一個是：劉少奇的「指頭論」引起了毛澤東的嚴重不滿

張素華女士持有這種看法：

「但事情還不止於此。毛澤東本來對劉少奇主持起草的報告初稿就有意見，豈料劉少奇在1月27日做大會口頭報告時，更講了一些讓毛澤東心中不快的話。劉少奇在向大會解說出現經濟困難的原因時，提出了天災、人禍哪一個是主要原因的問題，並做出了兩個『三七開』的判斷。他說：有些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是天災，有些地方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只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

這裡有人要問，早在1960年底和1961年初，毛澤東就把工作中的錯誤稱作為『人禍』，劉少奇這樣講毛澤東怎麼會不高興呢？問題是，毛澤東自1961年4月以後，幾乎沒有再用『人禍』的提法，也從未做出過幾分人禍幾分天災的判斷；此外，用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比喻缺點、錯誤與成績之間的關係，是毛澤東第一個提出來的，而且他經常講，尤其是在工作出現失誤遇到困難的時候。再者，毛澤東雖然在估量地方工作時，曾突破『一個和九個』的框框，但是並沒有對全國的工作做出三分缺點錯誤、七分成績的估量。因此劉少奇的這番話就顯得十分大膽，作為第二把手，他做出了毛澤東從未做出過的判斷，而這些敏感問題恰恰是毛澤東本人不願意多說的。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毛澤東幾次談到『人禍』，是在小範圍的內部談話時講的，而劉少奇卻是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向七千黨的領導幹部，也就等於向全黨提出這樣尖銳的問題，對工作做出了這樣的估量，毛澤東聽起來自然不那麼愉快了。在毛澤東看來，劉少奇是缺點錯誤講得過於嚴重了。1964年8月20日，毛澤東在北戴河同中共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等談話時說：『七千人大會綱，也有目，把一些缺點錯誤講得嚴重了一些，以後在4、5月更講得嚴重。』可見劉少奇的這一估量，給毛澤東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張素華女士指出「劉少奇卻是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向七千黨的領導幹部，也就等於向全黨提出這樣尖銳的問題」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劉少奇提出這個問題並不是在七千人大會上首次提出的。

劉少奇在1961年的5月31日的中央工作會議全體會議上講：「這裡提出一個問題：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於天災呢，還是由於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

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我也問了幾個省委幹部。我問過陶魯箴同志：在你們山西，到底天災是主要的，還是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的？他說，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造成目前困難的主要原因。河北、山東、河南的同志也是這樣說的。其他一些省我沒有問。總起來，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從全國範圍來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這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講，這還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問題。現在看來恐怕不只是一個指頭的問題。總是九個指頭、一個指頭，這個比例關係不變，也不完全符合實際情況。我們要實事求是，是怎麼樣就是怎麼樣，有成績就是有成績，有一分成績就是一分成績，有十分成績就是十分成績。成績只有七分就說七分，不要多說。我們這幾年確實做了一些事，也做了一些不見效的事情。我們在執行總路線、組織人民公社、組織躍進的工作中間，有很多的缺點錯誤，甚至有嚴重的缺點錯誤。』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雖然沒有七千人大會規模大，但是也包括中央和各地負責人，含（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及其助手）。因此涉及面也不能說小。

第二個是：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

毛澤東在1967年2月3日會見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團長巴盧庫時說：「1962年1月，我們召開了七千人的縣委書記以上幹部大會，那個時候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不進行鬥爭，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中國會要變成法西斯專政的。這篇講演沒有公開發表，在內部發表了。以後還要看一看，裡面也許有些話還要修改。不過在那個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然而張素華經過查證毛澤東講話原稿，發現毛澤東並沒有在七千人大會上這麼講過。

第三個是：三面紅旗的問題

張素華認為，儘管劉少奇為三面紅旗做了辯護，但實際上「從這裡可以看出，劉少奇對每一面『紅旗』都做了論述，他的方法是總體上肯定，具體上指出問題，事實也等於檢討了指導思想存在的問題。應該說，在這一點上，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意見並不是很大，有的問題他自己也做過檢討。關鍵是劉少奇的結論，即『現在都不取消』，難道將來就要取消？毛澤東似乎覺得劉少奇對『三面紅旗』肯定得不夠，尤其同林彪相比，更顯得劉少奇堅持『三面紅旗』不那麼理直氣壯，即使同周恩來相比，劉少奇的態度也顯得有所保留。這也是毛澤東對劉少奇產生不滿的另一個因素。」

或許劉少奇是有所保留。實際上，當在討論劉少奇的書面報告時，有人對於三面紅旗的維護不夠。劉少奇這才口頭講話上做了大量的對於三面紅旗以及總路線的肯定，而這些在其選集中僅被「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再經過五年、十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所代替。劉少奇在講話中對於總路線是完全肯定的，對於每一面紅旗都是用大量的詞語來維護的。筆者認為劉少奇的對於「但是再經過五年、十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的表示恰恰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維護三面紅旗：不要因為現在出了這些問題而否定它。這正是劉少奇要傳達給聽眾的信息。而至於劉少奇真心是否也這麼想，或許毛澤東認為劉少奇不是真心維護，則是另當別論的。

綜上所述，毛劉的矛盾並沒有後來渲染的那麼嚴重，特別是在毛髮動文革後，一些原本的說法被改動。例如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對於蘇聯的說法是強調向蘇聯學習而非後來1966年整理公開的反修內容諸如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等。後來黨史界為了刻意把七千人大會的分水嶺作用誇大以及把其作為兩條路線鬥爭的源頭，使得七千人大會陡然突出。

那麼是否就可以說七千人大會是否真的沒有影響或者沒有重大影響？當然不是。

流傳頗廣的江青說的一句話，很多人認為其是解開這個謎團的一把鑰匙。江青說，毛主席在七千人大會時憋了一口氣，直到文革才出了這口氣。然而筆者在查閱所有關於江青此次講話的多種版本，未曾發現。《光明日報》副總編輯馬沛文在中直機關討論《歷史決議

（草案）時說：劉被打倒後江青說：現在才出了七千人大會上這口惡氣！但是馬沛文也沒有提及江青在何時何地講的。但是這是否就表明許多文革史專家判斷毛澤東在1962年中共七千人大會以後就開始計劃打倒劉少奇是錯誤的呢？

在毛澤東那張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可是在五十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1962年的「右傾」赫然在目！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始於1962年策劃無疑是站得住腳的。而且就在七千人大會以後不久，毛澤東已下令審查劉少奇的歷史問題，開始策劃排除劉少奇為代表的黨內高層的反對派。我們的問題是：毛澤東在鎖定劉少奇之前，是否還另有打算？

很多人在解讀這張大字報時忽視了另一個方面，就是毛澤東除了指責劉少奇之外，還同樣的指責了周恩來！因為毛澤東發動文革打倒劉少奇，這點毫無爭議。然而毛澤東在文革中對周恩來採取任而不信，時而警告，以至後期則採取了打倒策略，這點上確實重視不足。毛澤東在這張大字報中卻透露了另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在1962年的「右傾」，周恩來無疑也是牽涉在內的中共大員之一。毛澤東指責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同時，把工作組問題同1962年和1964年中央工作指導方針上的分歧聯繫起來，明確指出黨中央有個「資產階級司令部」。這些，周恩來都難脫其身。毛澤東是否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後，在先打倒劉少奇還是周恩來的問題上有過猶豫，繼而仔細斟酌，隨之時局的變遷，最終做出了先打倒劉少奇的決定？

在七千人大會之後毛澤東為什麼對周恩來不滿？經過三年大饑荒以後，毛澤東實際上內心知道是失敗了，並且在七千人大會上做了自我批評的。但是這並不是毛澤東的本意。這種自我批評不是真心的，是在客觀情勢的逼迫下、當時大饑荒的壓力下的產物。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名言「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大家滿意」則被毛私下裡改為「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完全放屁。」並諷刺為「這就是他們所謂的馬列主義。」

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做自我批評，除此之外，還另外講了幾點，其一就是民主集中制：「如果沒有民主，不瞭解下情，情況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見，不使上下通氣，只由上級領導機關憑著片面的或者不真實的材料決定問題，那就難免不是主觀主義的，也就不可能達到統一認識，統一行動，不可能實現真正的集中。」

對於毛澤東的這話，明顯是在為自己推卸責任。更為隱晦的是，在毛澤東的自我批評不是發自內心的情況下，毛澤東要有「替罪羊」。是什麼導致了毛澤東今天要當眾批評自己？毛澤東不會真正的去從自己的原因去找答案。如果毛澤東真的認識到，根子出在自己身上，那麼就不會有以後的文革。毛澤東此話還可以從反面來理解：因為有人提供了虛假材料或者對我施行了封鎖，我並沒有得到真實的材料和數據，所以你們要承擔責任。對此，毛澤東除對劉少奇的當面指責不滿外，對於周恩來心生不滿也是不難想像。

1959年4月，毛澤東在上海講：「講海瑞，我很後悔。可能真正出了海瑞，我又受不了。少奇等是在我身邊多年的戰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講話。」周恩來就更不敢在毛澤東面前講真話，為此被彭德懷怒罵為「老奸巨滑」。中共高層圈子的人都知道能夠引起毛澤東大發脾氣的幾件事都與他認為有人向他隱瞞情況報告有關。1965年春，羅瑞卿在和林彪談話時說：「我知道主席和你都是最痛恨不通氣的，我今後一定照規定做。」林彪的反應是完全同意。有一次毛澤東當著葉子龍的面，像是自言自語地說：「他們為什麼不說真話？到底為什麼？」葉子龍說：「早在1958年1月份的南寧會議上，毛澤東就說過要做老實人，

說老實話，辦老實事。但是，在實際工作中，毛澤東聽到的不完全是實話。」毛澤東找人瞭解情況，但聽到的是一片好好好，沒人講問題。

周恩來對此心領神會。周恩來在2月3日為毛解脫和分擔責任：「這幾年來，黨風不純，產生了浮誇和說假話的現象。我們要提倡說真話。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要大家講真話，首先要領導上喜歡聽真話，反對說假話。如果你亂壓任務，結果像同志們所說的，他就會準備兩本帳，揣摩一下才講，看你喜歡聽什麼再講什麼。這的確是一個黨風問題。大家都說假話，看領導的顏色說話，那不就同舊社會的官場習氣一樣了嗎？你們反映的情況我聽起來覺得很痛心。你們說假話當然不對，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壓你們。」

在這裡，周恩來首先講了下面提供假材料的責任，又為毛分擔了責任。

在2月7日，周恩來繼續為毛澤東辯護。周恩來首先是努力維護毛澤東的形象和表示忠心：「這幾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工作，在『三面紅旗』的指引下，成績是偉大的，是第一位的，主要的；缺點和錯誤是第二位的，次要的。

『三面紅旗』，經過實踐的考驗，證明是正確的。從建設社會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來看，今後將會更加證明『三面紅旗』的正確和光輝。我們的缺點和錯誤雖然嚴重，但是，它是屬於執行中的具體政策和具體工作的問題，不是『三面紅旗』本身的問題。缺點和錯誤，恰恰是由於違反了總路線所確定的正確方針，違反了毛主席的許多寶貴的、合乎實際而又有遠見的意見才發生的。」

其次，周恩來再次為毛推卸責任：「對於缺點和錯誤，在中央來說，國務院及其所屬的各綜合性委員會，各綜合口子和各部，要負很大責任。國家計劃和具體政策，具體措施，有許多是由政府部門提請中央審核批准的。還有一些政策性的文件，沒有經過中央審核批准，就由各部門擅自發出，這更是無組織、無紀律的分散主義行為。」

周恩來的這些動作，並沒有獲得毛澤東真正的歡心。對於自己威信受損，毛澤東遷怒於劉，也遷怒於周。毛澤東遷怒於周的另一個原因，則來自於周恩來的順從。毛澤東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非常容易把責任推給那些只是順從領導而不提意見的人。恰恰周是這方面的典範。

最重要的是，鄧小平在2月6日的講話絲毫沒有提及自己的責任，實際上就把責任推給了具體辦事的周恩來。於是周恩來在2月7日的講話指責了鄧小平。周恩來在檢討了國務院的責任後說，「國務院的具體工作都是在書記處的領導下的。」事實上也是如此。周恩來自反「反冒進」之後，在一定程度上在決策方面被邊緣化。國務院制定的文件要拿到書記處討論，周恩來也要參加書記處的會議。但是，這樣一來也難免有影射毛澤東之嫌。因此對於周來說，難有「萬全之策」。周恩來的這個講話沒有收入《周恩來選集》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周恩來一方面要千方百計為毛澤東辯護，另一方面避免成為眾矢之的，不免要顧此失彼。但是周恩來維護毛澤東的一面是佔了上風。

彭真在1月18日提出毛澤東也要負責任，有錯誤也要檢討後，1月19日許多人對於彭真的這個講話做了不同的表態。周恩來顯然對彭真的話不滿：在講責任方面，要從我們自己身上找原因。他說，在目前困難時期，要頂住，承擔責任，全世界都指望我們。主觀上的錯誤，要著重講違反毛澤東思想，個別問題是我們供給材料、情況有問題，應由我們負責，不能叫毛主席負責。如果不違反「三面紅旗」的思想、毛澤東思想，的確成績會大些。調查工作進行後，情況正在好轉，但不能過分樂觀。經驗現在還不能完全總結，還是初步總結。主席講過，不經過反覆，不能取得教訓。現在不是弱了，而是強了。過去幾年是浮腫，幸虧主席糾正得早，否則栽得跟頭更大，要中風。現在的問題是要爭取時機，不怨天，不尤人，發憤圖強，埋頭苦幹。不吹，不務虛名，要謙虛謹慎，驕傲總是危險。主席早發現問題，早有準備，是我們犯錯誤，他一人無法挽住狂瀾。現在要全黨一心一德，加強集中統一，聽「梢公」的話，聽中央的話。中央聽毛主席的話。這是當前工作中的主要問題，不解決，寸步難

行。如糧食上交130到150億斤，就很難。1959年認識鋼材，1960年認識煤炭，1961年認識木材，我們這些人真笨。不一心一德，集中統一，就不能解決問題。如果這一點思想不通，辯論三天三夜也可以。

周恩來的這個表態是十分耐人尋味的。周的意思非常明顯：第一：要維護毛澤東的威信，特別是集權到毛手裡，要聽「梢公」的話，同毛澤東在1月30日講話的弦外之音不謀而合；第二：維護「三面紅旗」，即使周恩來知道「三面紅旗」帶來的危害是十分巨大的。因為不久前周恩來在河北調查時對於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提出過比較尖銳的意見（筆者註：當時毛澤東提議要求的）。周恩來的這番表態無疑是表現了一個政治家的成熟一面，但這對於國人是否是福，則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不過周恩來在此處的表達的另一個觀點則是應該肯定的，必須頂住當前的困難局面，不能低頭。

正是在周恩來的這番表態下，陳伯達才奮起指責彭真，國內黨史對陳伯達的不公則是顯而易見的，例如張素華女士在其《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一書中就用「發難」二字來形容陳伯達的發言。

二、周恩來在七千人大會之後的表現

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一線人員的根本差距在於對於形勢的判斷。毛澤東認為開七千人大會的時候已經越過了最低點。早在1961年的8—9月份，中共中央在廬山舉行工作會議，討論工業、糧食、財貿及教育等問題。毛澤東這次開會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再次提高徵購糧食數目。毛澤東在會上分析了當時的經濟形勢，認為問題暴露出來了，將走向反面，現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勢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對於這一點周恩來是同意的。但是在劉少奇等人的反對下，此舉沒有通過。周恩來如此講：「今年為了緩農民的氣，在廬山把糧棉油的徵購數目搞低了。」「但是，不能說明年還是這樣。農村明年就得回升。」毛澤東在《信陽事件》之後有過內部指示，指出：「餓死人的問題是高指標、高徵購造成的。」周恩來顯然也是明白這個道理的。但是一旦毛澤東提出要再次高徵購，周恩來再一次跟上了。

但是在七千人大會之後，劉少奇等召開了西樓會議。發現了財政問題十分嚴重，原因則是屈服於政治壓力，怕戴右傾的帽子，財政部門沒有報告，對此李先念等人是負有很大責任的。劉少奇因此說：「中央工作會議（指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一個本來面目，怕什麼？！」

1962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會上，劉少奇和周恩來分別做了發言。劉少奇直言不諱的改變了七千人大會關於「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的基本估計。劉少奇的講話非常尖銳，甚至把對困難的估計的夠不夠上升到是否是馬克思主義者的高度。而周恩來的講話則明顯「弱」，是在強調調整所需要的時間上做文章，而非強調形勢的好壞。顯然這樣講話，政治風險會小的多。實際上，周恩來早在聽取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匯報工作時就說「形勢大好，問題不少，前途光明。」周恩來的看法更接近於毛澤東的看法。

毛澤東的看法恰恰同此相反。而且事實上經濟的快速好轉，讓毛認為自己的看法是對的。5月11日，周恩來說「農業生產下降的趨勢，除部分地區還在繼續外，大多數地方已經停止並開始回升。」麥克法奎爾認為正是經濟上的好轉才使得毛澤東在1962的夏季能夠發動反擊。毛澤東是否進一步認為，大躍進的發動大家都有責任，對於形勢的看法為什麼又要改變？實際上卻是一步步好轉。劉少奇等人的做法是否借此向自己施壓或者逼其讓權？

此時的周恩來雖然也跟在劉少奇的後面，積極的參與經濟調整工作，卻比劉少奇謹小慎微得多。王光美在回憶這一段歷史的時候說：「陳雲同志曾就包產到戶和用重新分田的辦法刺激農業生產的問題，同一些領導同志交換過意見，少奇、小平同志同意，林彪也同意，恩

來同志表示還是先聽取毛主席的意見。毛主席回北京的當天（1962年的7月9日毛澤東回到北京一筆者註），陳雲同志當面向毛主席陳述意見，主席不表態，實際上是反對的。毛主席和陳雲同志談完話後，即找周恩來同志談話，接著又找少奇同志談話。」

早在1962年的4、5月份，田家英同逢先知在上海向毛澤東匯報調查農村包產到戶的情況時，楊尚昆從北京打電話給田家英：「總理要我問你一下，可不可以把農村的私有部分放寬一下？」田家英當即表示同意。

作為一個國家總理向一個秘書詢問國家政策本身就是封建主義王朝遺風。如同皇權時代丞相要通過皇帝的近臣來瞭解皇帝的思想和轉達自己的意見，雖然田家英的地位遠遠低於周恩來，而此近臣也一點不含糊，立即自己就做了決定。當陳雲尋求意見時，周恩來看重的並不是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而是毛的意見要比多數常委的意見更重要。

周恩來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還有一個不為人所注意的部分是「堅決還賬，努力承擔國際義務」，周恩來提及對於其他國家的援助並不能因為自己困難而削減對外國的援助。這同王稼祥在七千人大會後提出的「三和一少」是完全相反的。周恩來為此被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表揚。

毛澤東在農村大搞社會主義教育，城市進行「三反」、「五反」的時候，沒有忘卻對上層建築的改造。毛澤東要把上層建築改造成能夠為自己的革命路線而服務。因此毛澤東對於知識界、文化界大動刀戈。習仲勳因《劉志丹》小說而被牽連，作為周恩來依賴的重要副手，周恩來並無一句為習仲勳辯誣，僅是在毛澤東的允許下，告訴習仲勳「即使出了《劉志丹》小說這個問題，錯了就改嘛。」，勸其「千萬不要有一念之差。」對於文化界藝術界，周恩來也是積極配合毛澤東的決策。（筆者註：周恩來是很早就感覺毛要在文化界大動干戈的中共重要領導人之一。）

例如對於江青要搞樣板戲，周恩來非常配合。《人民戲劇》在1977年撰文稱：「周總理遵循毛主席的指示，極為關心革命現代京劇的創作，澆灌了許多心血。周總理日理萬機，非常繁忙。但是，他總是不辭辛苦，抽出許多時間來看戲，提出修改意見。毛主席作過指示，肯定過的幾個樣板戲，總理不知參加過多少次排練，看了多少遍演出，作過多少次指示。」其實無論是在樣板戲，還是在京劇改革上，只要作為毛的「探測器」（江青）有任何要求，周恩來都是積極配合的。（筆者認為：周恩來是對此是非常明情的。江青自己也對王光美說過說：做對了是毛主席，做錯了是自己的。）

中國文藝舞台開始刮起編演現代戲的時候，周恩來對於舶來品芭蕾舞指示到：「當然，芭蕾舞是外來藝術，不可能一開始就民族化，可不可以先編個巴黎公社，或者十月革命題材的？」周恩來並委託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處理此事。後來林默涵真的抓了，搞了一部《紡織女工》的現代劇，並得到了周恩來的大力支持。

除此之外，1964年，在大躍進餓死的那些冤魂尚未遠去的時候，由周恩來任「總導演」為毛澤東個人崇拜推波助瀾的歌舞劇《東方紅》面世。此劇在樹立毛澤東個人崇拜方面立下的功勞不亞於後來形成的「紅寶書」—《毛主席語錄》。

「大海航行靠舵手」是「文化大革命」時期最流行的歌曲之一，當年它在各種政治場合的地位僅次於「東方紅」，在為毛澤東個人崇拜製造氣氛方面，也只有「東方紅」可以相比。這首歌的誕生同周恩來也是密切相關，而且在文革前期的許多群眾集會上，最後都是由周恩來親自揮臂指揮群眾齊唱此歌。

藝術作品，在周恩來手裡成了為毛澤東樹立個人崇拜的工具，而且獨出心裁。通過更通俗更容易傳播的音樂和舞台藝術，使毛澤東在普通老百姓心中紮下了跟。當年大搞毛澤東個人崇拜的不僅是林彪，還有獨具匠心的周恩來。用走群眾路線的方式搞個人崇拜，利用這種手段來保護自己，是周恩來奉行的基本策略之一。

建國以後，毛澤東始終對知識分子懷有深深的「敵意」，階級屬性上是資產階級的。因

此自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到60年代初的系列思想文化界的批判運動，再到文革，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發動一輪又一輪的清洗。在這當中，江青被始終賦予了重任。從參與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到60年代初期的文化界的政治鬥爭，江青是毛澤東精心培育的「尖兵」，也是為「文化大革命」準備的「旗手」與「文攻」闖將。

對待江青的態度，是周和劉的一個很大不同。同一個時期，周恩來的小心翼翼同劉少奇的「猖狂」形成了明顯對比。如果考察60年代以來的上層政治鬥爭，無論是早期的劉少奇、中期的林彪，還是後期的鄧小平，他們對於江青以及後來江青勢力（即「左派」）的態度是如此的重要，甚至都可以影響到他們的存亡與是否可能復出。

江青說過：「進城的初期，總理給我安排過幾次工作，接觸了一些事情。後來，就辭職了。」「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長談話，他們都不聽。」周恩來則不同。文化部於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在北京召開。會議期間，在6月23日由周恩來出面召集演出人員並舉行的座談會上，江青首次以江青的名字公開出席了大會。江青在會上批評到：「在戲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還有牛鬼蛇神。」

羅瑞卿曾是政治局常委會的列席者，政治局常委會是決定幾億人命運的最高決策機構。時值四清，（毛岸青的太太）邵華為了鍛煉而到農村搞四清，羅知道毛岸青要人照顧，就勸她不要去，後來邵華堅持要去，羅考慮再三將她安排在離北京很近的地方，一旦有事可以馬上回來。毛知道了這事卻很不高興，於是下令取消羅列席常委會的資格。後來毛的護士吳旭君告訴，這是邵華自己要去的，羅參加常委會的資格便得以恢復。

邵華僅是一個兒媳而已，江青則是毛的夫人，對江青態度的好壞，由此會產生多大的影響，是不難想像的。同此對應的是，江青對於毛澤東的影響也很大。例如江青的告狀，在劉少奇倒台一事上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筆者註：詳見下文）。

在文革中直到1972年的年底，周恩來和江青的關係也維持的相當不錯，雖有衝突，但是合作是主要的。

劉少奇可以說是發動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始作俑者。但是建國以後，特別是「八大」以後，見於國內外的局勢變化，劉少奇對於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造勢已經遠遠落後於周恩來。雖然在廬山會議後，劉少奇再次表示要搞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但是劉少奇同時又說也要搞林彪、鄧小平的個人崇拜。毛澤東在劉少奇眼裡已經沒有那麼突出了。

赫魯曉夫下台讓毛感到活著就被推翻或者架空的可能性。毛覺得忠於其本人比忠於其路線更為重要。這也是毛喜歡個人崇拜的終極原因。周恩來搞的針對毛個人的《東方紅》無疑是備受毛澤東欣賞的。而此時的劉少奇不僅不繼續在搞毛澤東個人崇拜上努力，而是要扯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的「後腿了」。

張戎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寫到：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劉少奇再度當選國家主席。全國上下組織了歡慶活動，和他一九五九年首次當選時大不相同。街頭敲鑼打鼓的遊行隊伍拿著彩旗，舞著獅子，放著鞭炮，並排舉著毛和劉的像。報紙上連篇累牘地報導：「毛主席劉主席都是我們最愛戴的領導人」。很明顯，在中共高層，有相當多的人在暗暗為劉使勁。劉在制止饑荒上的功勞使他有了眾多支持者，就連毛的親信也覺得劉「行」，「有辦法」，跟他「感到對路」，而同毛疏遠。甚至還有人建議，劉當選時在天安門城樓掛劉的像，而不掛毛的！（當時毛的像只在節慶時才掛在天安門城樓上。）劉趕快否決了這個提議。正在選舉劉的當兒，劉夫人王光美被召到人民大會堂的「一一八」。劉當選後走進來，看見妻子在場，一愣。毛劈頭蓋臉辱罵了劉一頓，仇恨之意溢於言表。劉跟妻子僵坐在那裏，默然對視。

三、整肅周的活動

蘇共 20 大之後，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對毛澤東的影響巨大。一喜一懼，喜的是毛終於「小媳婦熬成了婆婆」，懼的是自己身後是否也有人會做秘密報告。朱德的秘書陳友群說：五六年我曾聽田家英同志講：主席有一次說，「現在喊萬歲，誰知道百年後如何？」因此對於毛來說，牢牢的掌握權力是其核心綱領。然而權力鬥爭是掩藏在路線鬥爭之下，不是赤裸裸的喊出來的。權力鬥爭的目的之一又是為了培養自己中意的接班人，而此舉又是為了防止赫魯曉夫報告的出現。大饑荒卻迫使毛澤東不得不把開展黨內鬥爭、換掉現有的接班人、樹立新接班人的計劃推遲。赫魯曉夫下台之前，毛澤東主要是防止有人會在其身後做秘密報告。歷史上的周恩來和康生非常相似，這點在西方學界基本上達成共識。那就是周恩來歷來是搖身一變，跟隨新的一把手，並且痛打前任一把手。但是在文革中，康生主管的中聯部，江青很難插手進去。這和周恩來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1958 年周恩來被指責為「反冒進」，進而後來有了柯慶施要取代周恩來的說法。但是無論此事真相如何，周恩來下台一事並不是空穴來風。

王若水回憶說毛澤東曾經在 1957 年大罵鄧拓為漢元帝，他當時並不知道為什麼這麼罵。後來王若水才知道周恩來因為「反冒進」被毛澤東批評，並且在 1973 年毛澤東再次提及漢元帝時，方才明白：我一直以為，1973 年那次毛提及漢元帝是指周恩來，而 1957 年那次是指鄧拓；這說明我沒有真正聽懂。現在我才明白，其實兩次都是對著周恩來——57 年罵鄧拓不過是借題發揮，指桑罵槐而已。李志綏認為，其實毛開始時是想借用民主黨派人士來替共產黨整風，目標是「反冒進」的那些領導。毛萬萬沒有想到，民主人士的意見越來越尖銳，攻擊的矛頭逐漸指向毛本人的統治。毛被迫暫時回頭和黨內反對他的同志聯合起來。王若水還說：毛澤東曾經將想把周恩來從總理的位置上撤下來的意圖告訴劉少奇，徵求劉的意見，劉沒有同意，大概劉覺得不能理解。黨外民主人士就更想像不到毛竟會有這個意圖了。所以，在「大鳴大放」中，竟沒有什麼人批評周恩來。但是王若水並沒有說是從何處得知「毛澤東曾經將想把周恩來從總理的位置上撤下來的意圖告訴劉少奇」的。

七千人大會之後，江青和劉少奇、王光美的關係一度非常密切。1962 年的北戴河會議期間，江青告訴王光美這次是田家英、陳雲犯錯誤。

在 1963 年底或者 1964 年初，江青找王光美抱怨其在中宣部、文化部受到冷遇。江青對王光美說：文藝界的問題如何如何嚴重，說北京借口沒有房子住，不讓在北京搞文藝會演。她向主席告狀，主席發脾氣，說北京針插不進水潑不進，沒有房子把人民大會堂騰出來，進部隊招待所。然而更令王光美感到驚訝的是：江青毫不隱晦地講周總理和鄧穎超同志的壞話。她兩次聲色俱厲地說：「夏衍是個叛徒，怎麼調到北京的？要追查！」她還說：「主席不好說的話，由我來說。說對了是主席的，說錯了是我江青的。事後王光美把江青談話的情況和內容詳細向劉少奇報告了。劉少奇後來找江青談話，對江青進行了批評，並說中央準備開一次文藝問題座談會，你對文藝工作有些意見，你可以今天在我這裡談，也可以到會上談。

遲延昆先生後來回憶說：王光美於 1980 年春天寫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封信。我只是在 1980 年五月中旬聽陸德（陸定一之長子）講述過這封信的主要內容（當時陸定一已經解放，恢復了政治局委員的待遇，所以讀到過這封信）。信的主旨是，毛澤東本來要聯合劉少奇整周恩來，但是由於劉少奇不肯配合，毛澤東反過手來聯合周恩來打倒了劉少奇。她在信中說，1965 年春節（筆者註：根據《劉少奇年譜》推斷其實是 1963 年底），江青去她家講了許多對周不滿的話，其中我今天還記得的一件是說夏衍不是好人，為什麼會調到北京。當王光美向劉少奇轉述江青的意見時，劉少奇批評了王光美，要她不要過問這類事情。並說：「夏衍調北京是我（劉）批准的」。其實早在建國一開始，毛澤東就約劉少

奇談話，反對周恩來。但是劉少奇就沒有同意。劉少奇說反總理對黨的事業不利，周恩來有很大功績，絕不能反。

1964年11月26日，毛澤東在聽取三線建設工作匯報時插話說：「整個文化部系統不在我們手裡。究竟有多少在我們手裡？20%？30%？或者是一半，還是大部不在我們手裡？我看至少一半不在我們手裡。齊燕銘也不好，聽說他是你（指周恩來）的秘書長。這個人不能當秘書長。你還不如到解放軍找一個頭腦清醒的人。整個文化部都跨了。」

齊燕銘和周恩來關係非常密切。毛澤東慣用手法就是「剝筍」政策，由表及裡。周恩來的外圍就是齊燕銘、陳毅等人。到了文革，周恩來死保陳毅，就是這個道理。後來打倒劉少奇，不就是先拿掉彭真嘛？

也就是在這個時期，毛澤東指責周恩來：你搞那麼多秘書幹什麼，讓秘書牽著鼻子走！為此，周恩來被迫取消了「總理辦公室」的建制。對於這種批評，周的秘書們是有不同看法甚至是憤憤不平的，但是這無濟於事。周恩來表示：我現在有12個人，6、7個人下鄉，還剩一半，還不行，要作個徹底革命派，把那個辦公室不要了。周恩來對於毛的指責，改正的比誰都快。對於毛澤東的提議，周恩來跟風跟的特緊，例如在文革中，當毛澤東提議要精簡機構時，周恩來再次對其總理值班室「動手術」。

對於如何建設三線建設，毛澤東對國家計委非常不滿，終於導致國家計委的改組。周恩來因此而向毛澤東檢討：「這星期內，建議主席指定時間，約富春、秋裡、一波、伯達、先念（瑞卿不在）參加常委會，聽取秋裡口頭匯報，並給指示。」草案說：這些年來，在計劃工作中沒有體現出毛澤東思想。我們的病根就是思想方法陷在形而上學的泥坑中不能自拔，計劃工作不講辯證法，工作做得不活，沒有生氣，老在那裡搞煩瑣哲學，氣魄不大，甩不開，沒有戰略觀點，不能高瞻遠矚。現商定由余秋裡負責組織二十人左右的計劃參謀部，擺脫計委機關的日常工作，集中到國務院，搞長期計劃。」

「小計委的成立」實質上削弱了周的經濟管理權。建國以來，李富春一直領導計劃工作，是周恩來的得力助手。而李富春領導的計委則是毛澤東眼中的「獨立王國」之一。即使毛澤東特別交代「小計委」由周恩來直接領導，但是實際上周事情繁多，難以專顧。事實證明「小計委」是貫徹毛的經濟思想，削弱了周的權力和地位。

實際上早在1963年4月17日，毛澤東就決定成立國務院內務辦公室，由謝富治任主任，統一管理公安部、內務部等。謝富治直接向毛澤東負責。

對照歷史，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各小組的通知》。通知指出，這些小組是黨中央的，直屬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向它們直接做報告。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63-64年周恩來的權力也一直不斷削弱，後來在文革八屆十一中全會，陶鑄分管了大部分部。所有這些史實表明，周恩來一直都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就會粉身碎骨。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關鍵的職位，周恩來在文革前丟失。中央調查部的一系列任務都被當局視為至關重要，諸如反間諜、收集政治情報、保證高級官員出行的安全、監控訪華的外國要人和代表團，其前身更是赫赫有名的中共中央社會部。建國後常委裡面是由周恩來主管。但是文革前夕，由鄧小平接任。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再由康生接管。

毛澤東的心態從《關於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一文的批語可以探知一二。此文實際上包括毛澤東在一九四一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以後寫的長達五萬多字的批判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九篇文章。

看過「九篇文章」的胡喬木評論到：「用詞辛辣、尖刻，甚至還帶有某些挖苦」，是毛澤東的「激憤之作」也是過去長期被壓抑的鬱悶情緒的大宣洩，刺人的過頭話不少」。毛澤東只送給當時與他關係最密切的劉少奇、任弼時看過，沒有在其它領導人中間傳閱。

1964年春，「九篇文章」從北京中央檔案館發現。毛澤東將這組極具攻擊性的文稿

批給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康生、陳伯達以及陳毅傳閱，毛在批語上寫「請提意見，準備修改」。顯而易見的是，劉少奇已經知道此文，而且此文多處援引劉少奇的觀點，目標顯然是周恩來，而且周恩來恰恰是文中所攻擊對象之一。毛澤東是提前給一干大員「打預防針」，是在拉攏劉少奇。

然而，在1965年1月2日，毛又將此件批送謝富治、李井泉、陶鑄傳閱，讓他們對文章提出意見，以便毛「修改」。眾所周知，謝、陶都是屬於毛嫡系人馬，李因為在七千人大會上由鄧小平出面毛澤東同意才保住位置，不過後來李的表現確實令人驚訝，大致是鄧小平最後也被打倒的緣故。

引人注目的是毛在1965年1月2日的批語中寫道「刪去文中提到的周恩來的名字，因為總理一生正確比（錯）誤多得很多」毛還說，「此文過去沒有發表，現在也不宜發表，將來（幾十年後）是否發表，由將來的同志們去作決定」。同時，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出現了巨大的分歧，最終以劉少奇道歉了事。這絕對不是巧合，恰恰反映了毛澤東的思想變化，在這段時期前後，已經改變打倒周的打算，開始拉周反劉，但是又不明確反劉。

此文又經多次反覆，1974年6月，毛澤東又找出「九篇文章」，將有關稱讚劉少奇的內容盡行刪去，「打算印發中央委員，但後來只發給部分政治局委員看過」。此舉完全是針對周恩來有意將此文作為反周的大石頭。此為後話。

四、為什麼毛最後還是決定先倒劉

七千人大會之後，堅持激進的毛澤東和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和陳雲等為代表的相對務實的人在路線和政策之間出現了較大的分歧，並且這種分歧越來越嚴重。這些分歧的本身是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但是在毛澤東眼裡是出現了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重大分歧，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掩藏在背後的是毛澤東是否被架空奪權的問題。麥克法奎爾認為毛澤東在這段時期內的權威明顯受到削弱。

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講：「中央有事情總是同各省、市和各部商量，可是有些部就是不同中央商量，中央有些部作得好，像軍事、外交，有些部門像計委、經委，還有財貿辦、農業辦等口子，問題總是不能解決。中央大權獨攬，情況不清楚，怎樣獨攬？人吃了飯要革命，不一定要在一個部門鬧革命，為什麼不可以到別的部門或下面去革命呢？我是湖南人，在上海、廣州、江西七、八年，陝北十三年。不一定在一個地區干，永遠如此。中央、地方部門之間，幹部交流，再給試一年，看能否解決，陳伯達同志說不能再給了。財經各部委，從不做報告，事前不請示，事後不報告，獨立王國，四時八節，強迫簽字，上不聯繫中央，下不聯繫群眾。謝天謝地，最近組織部來了一個報告。外國的事我們都曉得，甚至肯尼迪要幹什麼也曉得，但是北京各個部，誰曉得他們在幹些什麼？幾個主要經濟部門的情況，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麼出主意？據說各省也有這個問題。」

猶如「反冒進」之時，毛澤東再次說「強迫簽字。」誰是這裡的中央？難道是劉周等一線領導麼？顯然不是，是指毛澤東自己。毛澤東覺得意猶未盡，在當天發出《關於領導機關應加強請示報告工作的批語》。批語說：中央對國內很多情況不清楚。許多領導機關封鎖消息，不作論證性的報告，事前不請示，事後不報告，實行獨立王國。而國外使館消息，卻如此認真而迅速。請同志們想一想，是否可以把這個十幾年的老毛病改一改呢？如果再不改，那就只有執行紀律的一條路了。」從中也可以看出，毛澤東表揚了外事部門，實際上是對周恩來的表揚，但是同時又對劉少奇、周恩來的工作提出嚴厲批評。

統戰部副部長、曾經是中央書記處書記的劉寧一後來說：為什麼從劉少奇同志身上開刀呢？毛主席認為黨權是在少奇同志、政權是在周總理那邊，而劉周用的人都是壞人，反對他的。

毛澤東發動反擊，是從兩個方向上開始的。一個在國際上反對現代修正主義，一方面在國內開展四清五反運動。

然而，毛澤東出於勝算的考慮，不可能劉少奇和周恩來「一鍋端」，只能聯合一個打倒另一個。那麼是什麼促使毛做出何種決斷呢？

決定先「倒周」還是先「倒劉」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赫魯曉夫下台。

周自己認為自己對毛澤東是忠心的，但是毛澤東並不是這樣認為。毛澤東說：周恩來從來都是跟從一把手。換句話說，周恩來不是忠於毛澤東個人，而是因為跟毛澤東這個強者，自己才不會打倒，才有勝算，由此才選擇了毛澤東。但是一旦毛澤東死後，如果周恩來活過毛澤東，周照樣象批李立三、博古一樣批毛澤東，做赫魯曉夫式的報告，而且周恩來的發跡歷史就是一典型的批判前任領導史。但是在毛澤東生前，周恩來會跟著毛，要保持晚節。

赫魯曉夫的下台，讓毛澤東覺得必須要防止生前就有被逼下台或者被架空的可能。

劉少奇對蹲點、調查會以及四清等問題上，是犯了「天條」的。劉少奇在1964年夏，一時間呼風喚雨，四處遊說，並於8月1日在京黨政軍機關和群眾團體負責幹部的大會上，就農村社教運動發表長篇講話。劉少奇在講話中宣稱，若不蹲點，則無資格做中央委員、省委書記、地委書記。同時劉少奇聲稱用那個開調查會的方法（毛澤東在《農村調查》中間講了開調查會，開調查會為毛澤東發明所創），找人談話，已經不行了。

在如何搞「四清」的問題上，毛澤東亦曾經對劉少奇的看法表示過不同：第一，不要把基層幹部看得漆黑一團；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隊員集中在一個點上（針對劉少奇的「扎根串聯論」）。事後由田家英把這些意見轉告了劉少奇。劉少奇緊皺眉頭，沒有說話。如果是周恩來的話，二話不說，就立馬寫檢討，然後在第一時間遞上去。

《毛澤東傳》的作者們表示：從劉少奇八月一日的講話和毛澤東對修改「後十條」的意見中，可以隱約地感覺到毛澤東與劉少奇在「四清」問題上，乃至兩人關係問題上出現一些不協調、不和諧的情況。

然而事實上遠非僅止於此。

劉少奇在1964年對江蘇「四清」運動的開展不滿，同江渭清發生衝突。實則是劉少奇覺得江渭清不買「賬」。9月8日，江渭清以個人名義給劉少奇寫了一封信，匯報全省運動進展。劉少奇接到江渭清信後，於9月23日覆信給江。劉少奇在這封信中首先針對江渭清信中所寫的「在任何時候任何問題上，我們都必須學習中央、毛主席及中央其它領導同志的指示，否則，將犯更大的錯誤」的一段話，表示這些話「不完全正確」，其次劉少奇提出「應向一切有真理的人學習。」劉少奇解釋他之所以反對學習江渭清那篇講話，是因為江渭清的講話「空話連篇，基本上是一篇教條主義的講話」。劉少奇還指出：「同不能把馬克思、列寧的學說當成教條一樣，也不能把毛澤東的著作和講話當成教條。」雖然當時此信經過毛澤東修改，並且毛評價甚高，但是劉少奇此舉未免影射江渭清將毛澤東著作當作教條之嫌。矛頭直指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然而，在造神運動中不落後於任何人的劉少奇此等行為，自然在毛澤東眼裡是屬於叛變之舉。自然，同周恩來、林彪等人相比，劉少奇就更顯得「不合時宜」。

劉少奇的以上種種做法，即使本人無影射、貶低毛澤東之意，但是說者無意，聽者有心。同時，毛澤東要求高級幹部下鄉蹲點，但是遲遲不見動靜。劉少奇一發火，做報告，全國一百五六十萬幹部就趨之若鶩般參加城鄉四清。這不能不讓毛澤東覺得大權旁落。而且報告中明確說：「對毛澤東著作也不要教條主義！」，這更是讓毛覺得是釜底抽薪。同時期的周恩來對於毛的個人崇拜卻是大造其勢。

江青知道劉少奇的報告後，哭著向毛澤東告狀：「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才作秘密報告，現在你還沒死，人家就作公開報告了。」

赫魯曉夫在1964年10月14日被他一手提拔的親信、黨中央主席團和書記處的成

員經過密謀策劃而趕下台。毛澤東後來說：「我的責任是分一、二線。為什麼分一、二線呢？一是身體不好，二是蘇聯的教訓。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沒有當權，每次會議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沒死之前，樹立他們的威信，沒有想到反面。」

江青的告狀，這和毛澤東的擔心是一致的。

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嚴家其說：「赫魯曉夫的下台給毛澤東敲響了警鐘。毛澤東就認為，劉少奇、鄧小平這些人到哪一天也會把毛澤東弄掉。」

1964年年底，毛劉公開發生衝突。1964年12月份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的做法讓毛澤東無法繼續忍受下去，其一是12月19日劉少奇安排的王光美介紹「桃園經驗」的中央工作會議沒有等到毛澤東出面就自行宣佈散會，毛澤東對陶鑄夫婦講「有人就是往我的頭上拉屎拉尿」；其二是1964年的12月27日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打斷毛澤東的話並且不再給毛澤東講話的機會直到會議結束。所有這些都讓毛澤東難以接受。後來劉少奇道歉，毛澤東也表示：「我批評了少奇同志了，但你們今後還是要聽他的話喲！」實際上隔閡已經產生，難以消去。

劉少奇在毛澤東生前就有大不敬的態勢，讓有利天平漸漸傾向於周。

毛澤東在批評了周恩來領導下的國家計委、統戰部、文化部等之後，現在又轉向劉少奇。在毛澤東的眼裡，已經是洪洞縣裡無好人了。但是毛澤東又不能盲目行動，犯「四面出擊」的錯誤。更重要的是雖然劉周等所有一線領導無可能一致對毛的行動，但是毛澤東卻要防備這一招。

從周恩來的角度看，劉、周之間的矛盾遠遠大於周、毛之間的矛盾。劉在「高饒事件」中曾與周聯手，但是在「反冒進」時卻被毛澤東利用。劉少奇準備用對待整風的態度對待大躍進並暗示經濟政策上的分歧達到了「路線」性質的程度。毛澤東在周恩來對其大表忠心後，又採取保護周恩來的做法。對於周恩來來說，自然是對毛既感激又畏懼。但是對於劉少奇來說，周恩來卻是潛在的競爭對手。在60年代初的經濟恢復期，劉少奇和周恩來的關係是若即若離，並非親密。首先是在劉少奇的力主提議下，在新成立的中央財經小組（握有經濟大權，相當於經濟內閣）裡面，周恩來僅為組員。在1962年的北戴河會議期間，周恩來受到了下面的很多人的指責。有的在二月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上贊同中央決策的人，現在開始反悔埋怨（因為毛澤東開始批黑暗風），甚至對周恩來說了十分難聽的話。劉少奇並沒有出來為周恩來說話，反而是和毛一唱一和的又領導起新的潮流。無論從歷史的淵源還是歷史的現實，周恩來都和劉少奇存在著相當大的芥蒂。而這種關係在毛澤東看來，恰恰是可以利用的資源。

五、局勢的發展

雖然後人從意識形態、毛對社會理想的追求、以及對國內特權階層不滿等等諸多「正面因素」來尋找毛髮動文革的原因。但是縱觀整個文革，特別毛本人就是最大的「資產階級法權」擁有者，所有的這些，毛在文革中從來沒有從制度上或者法律上拿出有效的措施來維護或者保證所謂這些「正面因素」。事實證明，毛髮動文革，其一：立足點就是權力，拿回權力是為了保證自己生前或者死後不會被推翻或者鞭屍；其二：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就要樹立自己認為可靠的接班人；其三：讓中國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自己成為斯大林之後的世界共運的領袖（筆者按：此舉早早破產，而且這也是毛自建國後犯錯誤的思想根源之一）。

毛澤東為了達到這些目標，從掃清外圍開始。這些外圍就是後來所稱的「彭羅陸楊」反革命集團。周恩來後來在1966年5月份講「這次在中央揭發的彭、羅、陸、楊，是中央領導機關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看起來出修正主義不可避免，中央地方都會出現。說哪個國家的工作做得很好，不會出修正主義，是不對的，這就忽視了左、中、右的客觀存在，這就

是『一潭死水』。主要問題是防止修正主義當權。彭、羅、陸、楊是一個一個地奪取我們的陣地，有筆桿，有槍桿、有黨權。第二是防止修正主義發生政變。第三要防止修正主義的軍事政變。」 「彭羅陸楊」是連在一起的，毛澤東是作通盤考慮的。

但是整「彭羅陸楊」前後，局勢並不是很明朗。康生在1965年8月底9月初，在釣魚台同幾個秀才討論建國以來的外交工作時表示：「我早就認為，建國以來的外交路線是徹頭徹尾的投降主義，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與會人員雷英夫提出疑問：外交可是周恩來一手領導的。康生表示：「你到底還年輕，還不懂得什麼叫路線，什麼是路線鬥爭。政治上的問題，複雜的很呢。現在你還不明白，過一年、兩年之後，你會慢慢明白的。」雷英夫後來說，進了監獄之後，才明白康生已經預感到文革風暴，並且懷疑要打倒的第一個是周恩來而不是劉少奇，或者劉周「一鍋煮」。

就在1966年的3月份，江青在搞文藝座談會的時候還批了周恩來：「前年根據主席的指示，我提出了……樂隊要中西合璧，有人說這是非驢非馬，是個驢子也好嘛！這次會是毛主席贊成的。中央文化部都把它封鎖起來，不向下傳達。周恩來另外又搞個民族音樂座談會，又講了要先分後合，要洋的就是洋的，中的就是中的，搞純粹的民族樂隊，不許混雜。這是錯誤的，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他是應改作檢討的。」

在這個時候，發生了要不要參加蘇共二十三大的事情。1966年2月初，彭真向毛澤東提出這個問題，毛澤東說還有一個多月時間，可以從容考慮。3月5日，劉少奇在京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不派，並將討論結果告知毛。但是毛並無回音。3月10日，彭真提出，鑒於毛沒有答覆，是否可以考慮另外一種意見，劉少奇以與會人員常委僅為其一人為由拒絕了彭的提議。但是3月12日，彭真突然通知吳冷西，已徵得劉少奇同意，另起草一份電報。但是吳冷西拒絕起草。彭真於是自己起草，然後用電話傳給毛。此事後來成為彭真一大罪狀。

此事非常蹊蹺。毛澤東首先不表態，繼續釣魚。而後無論彭真是否得到劉少奇的同意，都會造成是劉少奇同意的結果。然而妙處在於，毛澤東在此時非常害怕內外勾結，這才是致命之處。此舉對於彭真的倒台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對於劉少奇也是大大不利的。

文革起來之後，在工作組一事上，周恩來完全表現的圓滑。

而劉少奇卻越陷越深，在7月29日的講話成了壓斷駱駝腰的最後一根稻草：「清華有人寫了一條反動標語，『擁護黨中央，反對毛澤東』，大家認為不得了了，我看沒有什麼可怕的，他起不了作用，搞不亂無產階級專政。對這樣的人，保護一下也沒什麼關係。」劉少奇同志講到這裡，毛主席突然出現在主席台上，劉少奇的講話被打斷，全場掌聲雷動。實際上毛完全是衝著這句話才突然出來的。毛疾步行走帶出來的風把劉少奇的講稿都扇到地上去，劉少奇不得不彎腰下去拾。毛澤東此時走到舞台前沿，全程震耳歡呼。穆欣回憶道：「這種情景，給人們留下永遠難忘的印象。」

劉少奇被一張大字報「打倒」。周恩來被派到清華去繼續表現自己：「我當時從外地回來，又碰到外語學院的問題，我選了二外，到二外又碰到張彥在這個方面所造成的惡劣情況，這使我更進一步認識張彥的問題。本來想接著轉到外語學院去，但是由於清華的問題，中央和主席讓我去，我不得不改變方向到清華去。」

第一部分第三章

文革初期：積極配合毛髮動「文化大革命」

打倒「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一個重大步驟。在這個過程中，周恩來是積極配合毛澤東，出了大力氣的。在這個過程中，周恩來的出

色表現，使毛看到了周的意願和能力，對於文革的發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也使毛決定在打倒劉少奇之前不僅不去動周，而且還要大加利用。

一、拿下楊尚昆

毛在文革中多次說過：「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的重要標誌是打倒了「彭、羅、陸、楊」。在這四個人當中，楊尚昆第一個被拿下。1965年11月10日，也就是上海文匯報突然刊出《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同一天，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免去楊尚昆的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由汪東興接替。這件事當時知道的人不多，但在黨的上層增加了政治上的緊張氣氛。」

毛對楊尚昆的不滿是由來已久的。1965年7月，毛澤東在頤年堂召集會議，當著周恩來的面大罵楊尚昆，說楊尚昆為什麼還不走？王力回憶說：毛主席早就要楊尚昆離開北京，說楊尚昆搞竊聽，還說反右派時楊尚昆把左派打成右派，罵楊尚昆從來不檢討，他打右派打錯了，翻過來了，他也不檢討。會上大家說馬上叫楊尚昆走。會開完後，楊尚昆打電話給吳冷西，問會上談了些什麼問題？吳說「我沒參加會，你問王力。」楊尚昆就問我，我不好說毛主席罵他，只說毛主席在會上大講黨史，講龐然大物。從這次會以及後來的發展看起來（因為毛澤東同時罵了劉少奇的秘書鄧力群），龐然大物是指劉少奇。

毛澤東說楊尚昆竊聽事件、不檢討僅是放出來的煙幕，非實質性問題。楊尚昆被免職，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職位的敏感性，並非完全因其本人的所謂錯誤。所以一開始並沒有被打倒，而只是免職、調動工作。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作出打到楊尚昆的決議時，把背著中央私自安裝竊聽器等罪名都加在了楊尚昆頭上。對此，周恩來明確說過：「彭、羅、陸、楊的問題，早有察覺，楊不能與那三個人相比。他自己成不了氣候，只是抱了腿。」

楊尚昆被免職的實質意義是，毛要把中央的機要與保衛的權力交給自己的親信汪東興掌管，保證毛澤東的旨意暢通無阻。雖然汪東興是毛澤東的警衛人員出身，與楊的工作閱歷和能力，無法相比，但是由汪東興掌管中辦，毛澤東才更放心。

除此之外，不為人注目的是，楊尚昆還代表中央分管「克格勃」（即前身為中央社會部，建國後改名為中央調查部）系統的工作。文革發動之際，在毛澤東眼裡有竊聽前科的楊尚昆自然不能被繼續信任。

那麼在拿下楊尚昆的過程中，周恩來起了什麼作用呢？

1966年10月29日，周恩來、鄧小平和彭真三人代表中央約楊尚昆談話，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正式通知他將被解職，調任廣東省委書記。楊尚昆當然知道此事的嚴重性，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這是一次不尋常的談話，十分值得記著，永遠不要忘記！」

11月9日，楊尚昆「寫了一封信給主席」，要求「能見見主席，得到主席的批評、指示」。11月10日，「中午主席找去談話」。毛澤東這時還和楊尚昆打馬虎眼，說什麼「廣東那麼熱，你跑到那裡去幹什麼？」以及什麼調查、匯報之類的話。

1965年11月19日，楊尚昆到周恩來辦公室告別。此時形勢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不知道又要搞什麼運動。楊尚昆是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來找周恩來。楊尚昆激動的對周恩來講：「由於我工作崗位特殊，涉及面很廣，做了些工作，也犯過些錯誤。許多事情你都瞭解，有些問題只有你知道，我沒有向中央其他同志說過；但也有你不瞭解的，我不願意多說。如果發生意外的情況，要處分我，甚至要開除我出黨，只要你知道我是坦白的、無辜的，我就心安了。我決不計較個人利害，也不願意說不應當說出的事。周總理兩眼一直盯著我，聽完我說的話，……然後對我說：『不至於如此，你放心！』」

中央對楊尚昆的問題「早有察覺」，當然應該是毛也有察覺，周也有察覺；然而在同楊尚昆談話的時候毛也不動聲色，周也不動聲色。想當初周恩來對於李銳詢問彭德懷的信會有什麼結果時不也是不動聲色么？

文革興起之後，根據廖漢生（楊尚昆的妹夫）的回憶，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後，原在國務院教育部機關黨委辦公室工作的白林（廖漢生的妻子），「就因為尚昆的『問題』，不適合做黨辦工作，調整到其他處工作」，「20天以後，賀龍元帥家裡傳話給我，轉達了周恩來總理的意見」，「事隔一天，王尚榮來到我家，轉達了賀龍副主席的意見」。「我向白林轉達了領導同志的意見，要她接受組織的考察」，廖又分別向賀龍、葉劍英、李雪峰、楊勇、鄭維山匯報了情況。

雖然周恩來是什麼意見？賀龍又是什麼意見？廖漢生都沒有說清楚。但是結果卻表明了：「株連」是有的。

二、整肅羅瑞卿

接下來的是整肅羅瑞卿。不少人引用羅瑞卿的秘書王仲方的回憶說周恩來事先不知道，此事是值得商榷的。羅點點在其回憶錄中說周恩來是知情的。余汝信先生認為：「因為羅所處的敏感位置，毛澤東當然認為會前知情的人越少越好，以免走漏風聲。惟多種材料及回憶表明，常委中除毛、林之外，起碼周恩來、鄧小平是知情的。據周恩來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毛澤東到達上海的當天，12月5日，即召周恩來從北京飛上海。當天，周在毛召見後，即成為毛有關批羅指示的實際執行者。其他與會者中，起碼陶鑄、謝富治、葉劍英、肖華、楊成武、李作鵬、張秀川、王尚榮、雷英夫等是知情的。政治局成員中，劉少奇、彭真、賀龍等不知情並不奇怪。在毛的心目中，羅與他們走得那麼近，提防還提防不及，豈能讓他們事先知情！彭真毛就乾脆以在京「看家」為名不讓他到會。」周恩來事先是否知道，或者是提前多少天知道，是可以商榷的。而筆者更興趣的是周恩來在批判羅瑞卿中的所作所為。

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說：「會議開始之前，政治局常委中除毛澤東、周恩來、林彪之外，大都不知會議的內容。與會人員被分批召到上海，開會時才知道是為了整總參謀長羅瑞卿的事。」但是羅點點並沒有舉出實證來證明自己的說法：周恩來到底知道多少？

羅瑞卿的倒台，涉及諸多因素。筆者曾經專門撰文論述。

1965年11月，姚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轉載問題成了政治上的「試金石」。11月25日，周恩來飛抵上海，隨即知道姚文的內情，當即打電話通知了彭真。此時的周恩來尚不知毛的底，還「與」彭為善，這也是周恩來的一貫作派。一旦知道毛的底，周也翻臉不認人，痛打落水狗。羅瑞卿此時也在上海陪同毛見外賓，並在和毛的交談中得知毛是看過姚文的。《羅瑞卿傳》以及一些刊物對此的表述是：羅得知後給彭真打電話，並告訴彭真，毛已經看過此文，他已經要《解放軍報》轉載，請彭真也考慮轉載。筆者認為，事情的微妙在於，就在羅打電話之前江青剛試探完羅瑞卿。羅拒絕了江青關於要召開軍隊文藝座談會的提議。而江青則告訴羅，北京就是因為有彭真才不轉載姚文的。現在羅真的打了電話給彭真，在毛看來，彭真確確實實「按照」羅的建議轉載了姚文（關於周恩來的作用見下文論述）。這充分證明了羅彭的關係不一般。或許羅瑞卿想留一手或者其他原因，《解放軍報》和《北京日報》在轉載時的表態是不一樣的。

周恩來是在12月5日到上海，當天毛就召見了周恩來，隨即成為毛有關批羅指示的實際執行者。周恩來最為重要的一項任務就是遊說葉群出面揭發羅瑞卿。

葉群到達上海後，帶林豆豆到上海錦江飯店去看周恩來，談了七八個小時，林豆豆一直在場。林豆豆說，她們連午飯也沒吃，葉群說她本來不願在會議上發言，總理通知她講一講，

她就講了一講。周恩來說是主席親自點的名，叫他一定通知葉群講一講。林豆豆還聽周恩來對葉群說，主席召集這個緊急會議後，怕羅長子在雲南搞「政變」，特別對雲南加強了控制。葉群還問羅長子會不會逃到國外，周恩來說不會。葉群為什麼不願意講？因為周恩來要葉群講的只是重複葉劍英在11月4日的話。

羅瑞卿的一位部下這樣回憶，1965年11月4日，葉劍英從杭州打電話叫我第二天坐飛機去見他，說事情很重要，但沒有說什麼事，說來了就知道了。第二天晚上下了飛機，葉帥已派車等在機場，然後把他接到空軍療養院，副總參謀長楊成武和總政主任肖華都在。葉帥開門見山地說，家門不幸，羅瑞卿出問題了，一是要當國防部長；二是對林彪封鎖消息，不匯報；三是折磨林彪，要不就不匯報，要不一說幾個鐘頭，林彪在大連養病，羅瑞卿拿地圖講了很長時間，林彪直出虛汗；四是對林彪搞突然襲擊，等林彪報告毛主席，毛主席定了就解決問題。說完，葉帥沒有評論。我說，我回去對羅瑞卿採取什麼態度呢？葉帥說，該怎麼辦就怎麼辦。第二天，我就坐飛機回來了。幾天後，我隨羅瑞卿去參加外國使館舉行的建軍節招待會，路上，羅瑞卿氣得鼓鼓的。原來是李作鵬幾個找他談工作，吵起來了。羅瑞卿還很奇怪，李作鵬過去不是這樣嘛。我心裡有數，李作鵬肯定也被打過招呼。果然，上海會議之前，李作鵬幾個人拿出了一封誣告羅瑞卿的信。上海會議主要說羅瑞卿反對林彪的問題，給他羅列了許多罪名，羅瑞卿一直不承認那些不實之詞，再三說明自己是支持擁護林彪的。為此，羅瑞卿同志受了不少冤屈。

葉劍英實際就是安排此人回去盯羅瑞卿的梢！而後來葉群在上海會議提出的「葉四點」完全是葉劍英提出的這四點的翻版！因為葉群所說羅瑞卿通過劉亞樓講的四點如下：第一、一個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第二、要好好保重林彪同志的身體，這一點就靠你了；第三、今後林總再不要多管軍訓的事情了；第四、交給羅去管，勸他多尊重羅，要相信羅，軍隊的事情放手讓羅去管。「葉四點」其中心內容是羅瑞卿要主管軍隊，做國防部長，而葉劍英對這位羅瑞卿的部下所講遠比「葉四點」厲害，基本上就是後來給羅瑞卿定罪的基礎——一由折磨封鎖林彪發展到反對林彪。

但是為什麼後來毛澤東又要借葉群的嘴講出這四點？很明顯，毛澤東決定要打倒羅瑞卿之時，不再像1959年廬山會議那樣赤膊上陣，那樣連個轉圈的餘地都沒有。毛澤東要借用林羅的矛盾，這樣通過葉群的口說出無疑要比通過葉劍英的口砝碼重的多！另外比這更重要的一點就是毛澤東通過此舉把林彪捆綁在「倒羅」的戰車上，而對於葉群在上海會議上所講的，事後並沒有得到很大重視，因為後來根本就沒有形成以葉群講話為主要內容的下發中央文件！

周恩來做通了葉群的工作，而葉群在某種程度上被與會人員看作是林彪的代言人。周恩來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按毛澤東的意圖封鎖彭真。

12月2日，毛澤東在林彪報送楊成武遞交的中共蘭州軍區委員會關於五十五師緊急備戰中突出政治的情況報告上，寫了那段著名的批判「折中主義」的話。此件在轉發時還有彭真的份。但是隨後，林彪於12月3日寫信告毛：十二月二日主席有關五十五師突出政治一文的批示已經收到。毛澤東在此信上於12月7日批示到：

林彪同志：

此信一同印發。

十二月七日

彭真同志暫不來此，可以不送閱了。

毛澤東已經決定不讓彭真參與上海會議，屬於被封鎖對象。

上海會議召開後，在雲南的羅瑞卿知道鄧小平、李井泉被叫到上海會議開會之後，自己

卻沒有得到通知，急的象熱鍋上的螞蟻。羅瑞卿打電話回北京，問彭真。彭真說：「只知道開會，不知道開什麼會。」彭真打電話到上海，找吳法憲詢問會議情況。時值吳法憲在周恩來房間，秘書過來通知吳法憲。吳剛要去接電話，周恩來阻止吳：不要接，就說找不到你。他可能是來瞭解會議情況的。吳法憲覺得當時非常奇怪：彭真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列席常委會，位高權重，難道彭真也出了問題？羅點點則說：後來彭真打電話問總理。總理大概知道會議內容的，而且可能向彭真吹了一點風。彭真又打電話給羅瑞卿說，你去吧，去了就知道了。

是信不過吳法憲，怕吳法憲說漏嘴？自己要親自交代彭真才行。無論是哪種情況，周恩來都巧妙的利用了彭真，彭真是把羅瑞卿「搞到」上海的一個重要棋子。難怪周恩來對葉群說，羅瑞卿不會跑。

但是周恩來除此之外還是做了嚴密佈置。首先，羅瑞卿一到昆明，周恩來就打電話告訴閻紅彥要看住羅瑞卿。再次，周恩來委託吳法憲派一架飛機，配備最好的機組，到昆明把羅瑞卿接到上海來。周特意強調，要吳親自掌握好這架飛機，做好應變措施，飛機只能往東飛，不能往西飛。吳法憲說：明白這是要防止羅瑞卿跑到緬甸或者印度去。

吳法憲親自交代前往接送羅瑞卿的時念堂機組，並且告訴他們：「現在發給你們機組每人一把手槍，在空中如果有特別行動時，你們要聽中央的。空中要注意監視他們（羅瑞卿等）的行動。」就在吳法憲交代機組人員的時候，周恩來特意打電話來詢問情況，吳法憲匯報說：請您放心，機組人員的飛行技術不錯，政治上也很可靠，一定能把這次任務完成的很好。」

這不是把羅瑞卿當敵人看待了嗎？

很明顯，周恩來要保證羅瑞卿來上海與會，故意讓彭真去安撫羅，讓機組還帶槍「押送」，以便成黨交給的任務。

上海會議分為三個組，分別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主持。由周恩來主持的組異常活躍。

羅到上海後，也是周恩來、鄧小平受毛澤東指示出面與羅談話。當羅瑞卿要求見毛澤東或者林彪把事情說清楚的時候，周恩來不同意，「不要去見主席，也不要去見林彪」，並被周批評為「幼稚、天真」。據說當時是周恩來一把搶過秘書手中的電話，疾聲厲色的怒斥！

上海會議只是決定把羅瑞卿清理出軍隊系統。但是為了保證文革的順利發動，毛澤東決定有必要在軍隊進一步肅清羅瑞卿的影響。於是毛澤東決定於上海會議之後的來年三月份召開批羅會議。特別是《二月提綱》以後，毛澤東要把彭真饒進來，特意安排留守北京的彭真主持這次會議，讓彭真充分表演。果不其然，彭真在這次會議的過程中，「在一系列重大政治問題上，對羅瑞卿的錯誤，採取了縮小、掩護、包庇、支持的態度，並且企圖給羅瑞卿等同儕翻案做好種種準備。彭真實際上是同羅瑞卿站在反對毛主席和反對黨中央、反對林彪同志的立場上。有關事實有葉劍英、肖華、楊成武、劉志堅四同志，另寫一信報毛主席和黨中央。」

三月批羅會議中，葉劍英把羅辦秘書等人寫的揭發材料報給毛，羅自己也寫了個申訴檢討材料。毛作了批示，大意是羅是漏網的高饒分子，羅執行的是資本主義軍事路線，在政治上反黨反人民的，作風上一貫飛揚跋扈，要批倒批臭，徹底打倒。但是葉劍英並沒有把此批示告之羅，而是把羅朝死裡整。羅此時把唯一的希望寄托於毛身上。羅在3月18日打電話給周恩來，要求去見毛澤東和林彪，他覺得他無論見到他們其中的哪一位，都可以把事情解釋清楚。周恩來卻告訴羅：你的事情是主席親自定的，不要再抱有任何希望（幻想）！羅瑞卿聽到此話，五雷轟頂，寫了個便條給其家人，隨即跳樓自殺。周恩來得知之後，第一句話就是羅是自絕於黨。

從這些情況來看，周恩來不僅事前參與了倒羅的各項準備活動，且事後作了大量工作，周在1966年5月21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給羅瑞卿等人定性時說「這次在中央揭發的

彭、羅、陸、楊，是中央領導機關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主要問題是防止修正主義當權。彭、羅、陸、楊是一個一個地奪取我們的陣地，有筆桿，有槍桿、有黨權。」

1965年12月15日上海會議結束當晚，在錦江飯店舉行了文藝晚會，演出的中間還安排了舞會。因為剛揪出了羅瑞卿，幹部當時還是非常緊張，但是周恩來忽然提議葉劍英給大家唱評彈助興。作為廣州人的葉劍英結果卻唱出了道地的蘇州評彈，周恩來同葉劍英的配合真是相得益彰。周恩來一吐心中怨氣。

原來，羅瑞卿飛揚跋扈，曾經在建國之初就對周恩來出言不遜。在處理被稱之為《建國後公安系統的第一冤案》（陳泊、陳坤被羅瑞卿迫害一事）過程中，周恩來受陳泊之妻呂璜之托，專門從公安部調閱案宗，然後同羅瑞卿交涉。但是羅瑞卿根本就不買賬，在電話中就指責周恩來。知情人告訴筆者，羅瑞卿指責周恩來，你插什麼手，你是政務院總理，但是不是我的領導，這個事你管不著！羅瑞卿同周恩來講話電話後，大為震怒，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受到嚴厲指責，對陳泊的迫害變本加厲。後來周恩來評價羅瑞卿：「你們藝術學院出來的，部藝的教育方法有問題，是羅！羅瑞卿、陳其通、魏傳統是氣味相投，都喜歡舊的。當然藝術院的學員是好的。他們一談起四川戲，一點不好也不讓講，不但對你們這樣，對我們也是這樣，羅瑞卿就是不准講四川戲不好，飛揚跋扈！你聽他說過吧？（鄭維山：聽過。）他們氣味相投，應把他們批倒、批臭。」

三、清算陸定一

陸定一遭清算的根本原因是毛澤東認為「宣傳大權」要掌握在可靠的人的手中。除此之外，陸定一和林彪、周恩來、陳毅等人的矛盾也是不可忽視的一面。毛澤東要靠這些人去發動文革，清算陸定一自然有為這些人「買單」之意。

1961年夏季，《文藝十條》出台，但是陸定一不准發出。周恩來、陳毅多次催促，仍不准發出。1962年年4月，趁陸定一不在北京，才得以發出，而且是用齊燕銘主持的文化部的名義。

周恩來在1962年的時候，對待知識分子一度表現的很右。周恩來在1962年的廣州作題為《論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肯定我國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而不是屬於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但是此事在中央高層有人反對，此人就是陸定一。中宣部不讓傳達這個講話，更不能公開。當時陸定一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主管意識形態。當時的周恩來寄希望毛澤東對此表態，但是毛澤東卻沒有為周恩來說話。毛澤東怎麼可能為周恩來說話呢？時任中紀委常委的曹瑛在討論《歷史決議》時說：1965年，我陪柬埔寨外賓到武昌，毛澤東同志接見。毛說我要使整個文化界還有黨政軍等，使他們半年到一年睡不着覺，我就高興了。他是咬牙切齒地說這個話的。

1963年，中宣部主持召開省市自治區宣傳部長會議，會議簡報稱：「不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赫魯曉夫的觀點。」矛頭直指周恩來。會議簡報還稱：「中宣部有三條線：一條是周總理、陳雲，抓文藝；一條是康生，抓理論工作；一條是陸定一，沒有什麼可抓。」就是說，周、康等人在文化部奪了陸定一的權，銷了陸定一的職。周恩來自然非常惱火。在隨後召開的一次書記處會議中，周恩來突然到會，本來周恩來很少參加書記處的會議（筆者註：此說並不準確，《周恩來年譜》對周恩來參加書記處會議多有記載），非常激動的講：「在社會主義國家不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並不是我首先講的，列寧早就講了，少奇同志也講過，我講了為什麼就不對呢？」陸定一為什麼敢對周恩來開炮，不對劉少奇開炮呢？1963年的劉少奇風頭正勁，陸定一捏柿子專挑軟的捏。

陸定一直比較左，左到什麼程度？（筆者註：文革之後，陸定一是屬於反思比較徹底的

一位中共元老。)順應毛澤東的旨意，1963年3月16日，文化部黨組向中宣部及中共中央寫了《關於停演「鬼戲」的請示報告》，報告在批評有鬼魂形像的戲演出漸增的問題時，突出的批評說「更為嚴重的是新編的劇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批評界又大加讚美，並且提出『有鬼無害論』，來為演出鬼戲辯護。」在1964年12月27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陸定一說：「文化部全部爛掉了，整個單位是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聯合專政。」陸定一還點了部長和幾位副部長的名字。知情人說，毛澤東一直認為陸定一在政治上比周揚強。

比較詭異的是，但是若干年後，文革爆發，陸定一作為《閻王殿》的閻王被整肅，周恩來卻仍然高就其位，這為周恩來的高政治地位作了極好的註腳。特別是陸定一的「左」得到了毛澤東的賞識，八屆十中全會升任中央書記處書記。毛澤東的這種欣賞左傾幹部的思維從「反冒進」就已經形成，這為中共體制內的幹部多為「假大空」提供了極好的解釋。

周恩來的及時轉向以及同江青良好的關係可以說明一點問題。

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澤東關於文學藝術的兩個重要批示先後發表。周恩來用激情澎湃的語言表達了自己的忠心擁護：「實在應當登高一呼，把主席的話廣泛地傳播開，而且在行動上來證明，真正是擁護黨和毛主席的話。」周恩來親自抓《紅燈記》《智取威虎山》等革命現代劇，並主導了歌頌毛的歷史大劇《東方紅》，把毛澤東的宣傳與崇拜推到了一個歷史的新高潮。在1963年12月2日毛澤東關於文藝的第一個批示出台之後，周恩來就提出文藝界要徹底改造，改造的根本途徑是和工農兵相結合。周恩來反過來指責中宣部，我和你們鬥爭到什麼時候，你們什麼時候才能按照毛主席的講話辦？

同周恩來相比，陸定一在江青面前明顯不如周「識相」。江青說過：「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長談話，他們都不聽。」周恩來則不同。

1963年，江青認為只能搞現代戲，不准搞古代戲。周恩來就責問周揚：「你們不是說現代戲不好寫嗎？(指《霓虹燈下的哨兵》)現在不是寫出來了嗎？你們看怎麼樣啊？你們不要老寫死人了，寫寫現代戲吧。」

文化部於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在北京召開。會議期間，周恩來出面召集演出人員並舉行座談會，江青首次以公開身份出席了大會，在會上批評到：「在戲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還有牛鬼蛇神。」

江青在中宣部指手畫腳，陸定一也很少頂他。但是，陸定一對於當時文藝界的態度和江青是不同的，是搞「折中主義」的。陸定一方面認為滿足於「帝王將相」等戲，中國遲早也會出現赫魯曉夫；另一方面，陸定一也認為《趙氏孤兒》等戲要允許其存在。江青認為抓中央和北京是有阻力的，於是轉往上海。

江青在提出要批判《海瑞罷官》後，要求陸定一合作遭到拒絕。但是那個時候，毛澤東對於陸定一還是保護的。毛澤東說認為：文藝界的問題，中央有責任，他也有責任，不應該責備陸定一。但是在1965年的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出爐後，陸定一配合彭真，對此文進行抵制，大大激怒了毛澤東。周恩來出面，要求彭真陸定一等對此文進行轉載。在隨後的《二月提綱》出爐的過程中，陸定一也和彭真站在一邊，此時陸定一下台的命運已經注定。陸定一自己也不是沒有感覺，在1966年2月去武漢匯報《二月提綱》的時候，就非常緊張。陸定一把自己和彭真綁在了一起，都認為「評海瑞罷官」一文中罷官和彭德懷的聯繫是亂聯繫，不好。

於是陸定一和彭真一起遭到了清算，周恩來並沒有忘記以往的過節。

在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對陸定一清算歷史舊帳：「什麼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陸(定一)說：新中國學校培養出來的學生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怎麼能這麼說？不能這樣講，……不能像陸定一所講的那樣一律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陸(定一)根本不講理，副總理要兼一個口，要他搞文教口，常常就不幹，說我要抓大權。叫他兼

管文字改革委員會，他也不幹，因為胡喬木同志建議要搞文字改革委員會。只有個人主義思想，沒有黨性，沒有階級鬥爭，陸定一家是大地主，解放後他回家賣地賣了很多錢，他說把錢交給黨了，自己用了一部分。他家是大地主從來未向我講過，他沒有改造的決心。厚道是有階級性的，有黨性的，對國民黨蔣介石不能講厚道。沒有個性，只有階級性、黨性。」

以後，周恩來多次點陸定一的名，指責其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周恩來管不了中宣部，管不了陸定一。1966年9月27日，被審查中的陸定一寫信給周恩來要求看一些文件以便寫檢查，周恩來沒有理會。

1967年1月，周恩來追溯當時對中共五大部中兩個最老的、最有名的部（組織部和中宣部）進行的衝擊，認為是「完全正確的、必要的」：「我們自己組織部落在了安子文手裡，思想工作落在陸定一手裡，這就是為什麼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許多高級幹部不如年青人活躍這是個根源，是階級根源。」

從陸定一遭到清算，我們可以看出，所謂的「政治路線」並沒有「組織路線」重要，是否遭到整肅和清算，並不完全取決於你的政治觀點，更重要的是你是不是用得著的人。陸定一所鼓吹的「文化部全部爛掉了」、「新中國學校培養出來的學生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若干年後在代表毛思想的「兩個估計」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述。

四、斗倒彭真

彭真在七千人大會的時候說：「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們對毛主席不是花崗岩，也是水成巖。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麼高。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面沒有好處，得不到教訓。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各有各的帳。書記處最大錯誤是沒有調查研究。」

《變局—七千人大會》的作者張素華認為：彭真的這段慷慨陳詞，成了七千人大會最引人注目亮點之一，他是惟一一位在大會上指名提出毛澤東犯了超越階段，辦公共食堂的錯誤（當然，毛澤東不僅僅是這些錯誤，但即使是這一些錯誤，當時也無人敢具體指出），並且應該進行檢討的人。彭真的這個講話，成了日後中共歷史上的一段經典發言，不斷被人們所稱讚。」

反過來是否也可以這樣認為：彭真是說毛有錯誤，然而重點還是在後面，為毛分擔責任，找了「替死鬼」。

錢癢理先生則認為：彭真指責毛確實不合中共黨內的高層政治生活規則的。但是彭真對毛的這些批評，都是毛在「大躍進」遇到挫折後多次承認過的。彭真的說法類似「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因此錢癢理認為，彭真的發言與其說是針對毛澤東，不如說是通過坦率的指陳來維護毛澤東。筆者贊同錢癢理先生的解釋。彭真的講話，在毛看來是否是真的批評，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考察。一個是彭真自己，一個是彭真在七千人大會之後有無受到影響。

1961年，彭真回山西視察時說：這些年大家受苦了，因為我們犯了錯誤。他接著說：沒有不犯錯誤的人，馬克思犯過錯，毛主席犯過錯。他說：「誰不犯錯誤？毛主席自己講，我的錯誤一火車也拉不完。我彭真犯過的錯誤就更多了。」這說明彭真在七千人大會時的講話是有前例的，並不是突兀的，這可以看出彭真還是維護毛的權威的。

更重要的是在7000人大會之前後彭真，是得到毛的充分信任的。廬山會議批彭德懷，彭真被毛半路調到廬山上，充當生力軍。對蘇論戰當中，彭真也是毛依賴的主力之一。七千人大會之後，毛對彭真的信任更為突出。

1963年冬，毛澤東派江青到北京搞京劇改革。江青說：「主席說了，北京做得好，叫我來學習。」而且其時毛對北京市的工作是滿意的，表揚的。彭真和市委也是歡迎江青的。1964年，毛澤東還誇獎彭真：思想文化領域的階級鬥爭你怎麼搞？北京是首都嘛，全國各省、市都看著你呵！毛澤東選擇文化界作為突破口時，在1964年7月成立了以彭真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筆者註：毛澤東一開始是提名陸定一，但是陸定一推辭不幹。）

正如彭真的秘書說的：「表面上看，是看不出毛澤東要搞彭真的。『文革』前他似乎很信任彭真。比如，1961年各國共產黨布加勒斯特會議，中共派代表團出席，任命彭真為團長；60年代中期，有個時候要批判朱德有野心，毛主席是讓彭真去和朱德談話的。又比如，直至1966年3月，周總理出國訪問期間，中央就把周總理的一些工作交給了彭真代管。」其間，也夾雜著一些不和諧的聲音。事情出在江青和北京市委日行漸遠上。彭真一開始對江青也不錯，到後來就應付了，最終導致江青的不滿。

無論如何，直到1964年年底，毛澤東對於彭真還是高度信任的。這可以從《前十條》一直到《二十三條》的制定看出。毛澤東在指責計委和中央書記處為獨立王國的時候，並沒有表示對北京市委有什麼不滿。在1965年初期，鄧小平和彭真甚至取代劉少奇負責社教運動的領導工作。這充分說明了毛澤東對彭真的信任。

事情的轉折點在吳晗問題和姚文元的文章上。而正是這個問題，彭真和陸定一一起栽了個「大跟頭」，被劃到一個「集團」裡面。

1962年夏，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後，江青就要求陸定一等人批判《海瑞罷官》，被陸定一當場拒絕。1964年，毛澤東親自把《海瑞罷官》，列為可供批判的39個《文學藝術資料》，批轉至縣團級，卻因中央一線沒有佈置批判而作罷。1964年，毛澤東提出批判吳晗的問題。吳晗則於應周恩來要求，寫了正式報告，說明《海瑞罷官》絕無影射意圖。當《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於1965年11月10日發表後，陸定一認為，此文牽強附會聯繫「七千人大會」後的「單干風」、「翻案風」，有挑起事端之嫌，支持彭真進行抵制。

後來周恩來說，1964年主席提出過批判吳晗的問題。1965年4月2日周恩來到邯鄲碰到劉子厚、李雪峰。李雪峰對周說，主席批評了彭真，說彭真認為批判吳晗是個人問題。周恩來回京後對彭真說，雪峰對你有意見，說你對主席指示聽不進去。彭真表示：「批評得對。我的認識同主席的話有本質的區別。」

筆者認為，如果彭真配合毛，批吳晗，作為批周或者批劉的幹將來使用也未嘗不可能。毛澤東是遞給彭真一把雙刀劍來處理吳晗和《海瑞罷官》的。當然從歷史的變化發展來看，彭真在「文化大革命」中終究還是難逃一劫的。

當彭真在1965年硬頂著不轉載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的時候，周恩來介入。周恩來得知姚文（即：《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是經過毛澤東親自修改之後，在11月27日出面向彭真挑明，此文是毛澤東親自批閱過的，彭真不得不表示可以轉載。對於此點，國內黨史是猶抱琵琶半遮面。在孫琦所著的《毛澤東與周恩來的合作生涯》中說：周恩來心裡明白，這篇文章一定是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如果北京的報紙再不轉載，那便是公然和毛澤東對抗。無奈，他只好親自過問，到了1965年11月29日，《北京日報》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對此，康生和張春橋曾經講：上海市委告訴了周，周給彭真打電話之後，北京才同意轉載。張春橋還特意講到：羅瑞卿到上海，下飛機後從警衛員中聽了點消息，知道了對北京的意見。陳丕顯先和羅談了，羅打電話告訴彭真。陳又告訴了總理，文章在總理的督促下，拖到11月29日，北京各報才開始轉載。

彭真的秘書說：彭真和軍隊一些幹部的關係可能也是毛主席曾經注意到的問題。彭真和羅瑞卿的關係是比較密切的。羅瑞卿在擔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公安部部長和總參謀長期間，和彭真都有密切的工作關係。不止如此，每年國慶節，在28、29日晚，幾個特種遊行隊

伍舉行預演排練，彭真親臨審查時，羅瑞卿幾乎每次都去陪同（楊成武也陪過）。在十大元帥中，彭真和賀龍的來往較多。他和賀老總是在延安時結下的友誼，都住北京後又互相看望。賀老總喜歡釣魚，釣到了有時送來給彭真。彭真有空閒也喜歡去賀家串門。薛明（賀的夫人）工作安排到市委宣傳部，是得到了彭真的關照的。這種關係，可能也都犯忌。

這也驗證了周恩來的楊尚昆是單干戶的說法。

周恩來的介入也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周恩來的這種介入，完全可以在後來說成是周恩來「包庇」彭真，成為打倒周恩來的一大證據，另一方面，對於當時的毛澤東來說，這是一個重大信號，就是周恩來站在哪一邊的問題得以解決。

當時是兩種對立的觀點形成了僵局。周恩來在此時出面表明了自己的態度，而彭真被迫做出讓步。這僅是表面的東西。其實更深層的意義在於，這場具有深遠意義的「革命運動」是否能夠順利經過分娩的陣痛，在經過艱苦的努力之後，在周恩來的出面之下，終於跨出了關鍵性的一步，來到世上。以批判《海瑞罷官》為突破口的形成作為標誌，文革序幕的一角就這樣在周恩來手裡掀起。筆者認為文革應當從1965年的11月算起。

彭真同意《北京日報》在11月29日發表。第二天《人民日報》跟進。《人民日報》則將姚文元的文章作為學術性的而非政治性的文章轉載，在周恩來的干預下加上了按語說「歡迎批評，也歡迎反批評。」即是按語中的「即使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也是可以討論的。」

12月22日，毛澤東同彭真談話，重申《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真表示「沒發現吳晗和彭德懷有什麼組織關係，吳晗不是政治問題。」實際上，這是毛澤東最後一次「挽救」彭真。毛在修改姚的文章的時候並沒有指出這一點，完全是出於「時機不到他不會透露半個字，以免打草驚蛇。」當時毛彭談話的時候，在場的還有楊成武和康生。楊成武剛剛因為在倒羅中立下了大功。從一定程度上來講，這三個人都被視為將來「文革的重要干將。」後來，張春橋對彭真的頑固表示驚奇說：「不知道會觸動這麼深，震動這麼大，更不知道彭真會這樣堅決地反對。」

彭真在1966年2月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時候，仍然堅定吳晗和彭德懷沒有關係。事情的轉折出在3月11日晚。當許立群向彭真請示如何回答上海市委宣傳部長楊永直提出關於「二月提綱」涉及的「學閥」等問題時，彭真指責上海市委在發姚文元的文章時失去了黨性。彭真這種對待上海的態度完全是和毛澤東的設想背道而馳的。

但是毛澤東的權術是如此的「莫測高深」。1966年3月18日至20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毛澤東嚴厲批評了《人民日報》。吳冷西對周恩來講：主席這次批評很重，我要好好檢討。周回答說：不光是批評你，也是對我們說的。吳冷西接著向彭真也談了，彭真的回答同周一樣。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澤東同康生連續三次談話。而在談話之前，康生說：3月28日我去上海前，與總理談了一夜。康生與周恩來到底談了些什麼，迄今未見披露。但是從事後的發展來看，毛澤東覺得一舉拿下彭真是很有把握了。筆者認為，其一就是劉少奇當時不在家，其二就是周恩來的表態。於是毛澤東嚴厲批評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壞人，壓制左派，不准革命。並表示：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五人小組匯報提綱」是錯誤的，毛澤東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隊伍，進行「文化大革命」，批評彭真同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壞人，如果繼續這樣下去，要中宣部解散，北京市委解散。康生後來在5月5號和6號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表示毛澤東的這三次講話貫穿一個中心問題：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義？現在已經出了，彭羅陸楊，田家英、鄧拓、廖末沙都是，向中央進攻，要進行「文化大革命」。

3月31號，康生奉毛澤東之命回到北京並且當日將三次談話紀要給周恩來、彭真看並

匯報四個小時，周恩來表示完全同意毛澤東的指示。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周恩來不僅正式寫報告給毛澤東，用來表明自己的態度，以及為貫徹落實毛的指示而準備採取的措施。報告中說：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大旗，徹底批判文史哲方面的反動學術思想，徹底揭露這些學術權威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立場，嚴格看待這是奪取文化戰線上領導權的問題，以利興無滅資，組織自己隊伍，打倒反動學術權威的鬥爭。並擬按此方針，起草一個中央通知，送主席審閱。同時，指出前送主席審閱的五人小組報告(即《二月提綱》——作者註)是錯誤的，擬由書記處召開五人小組擴大會議，邀集上海、北京有關同志加以討論，或者進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寫。同時，除了向毛寫了正式報告之外，周恩來還特意用打電報的方式告訴毛澤東以示鄭重，表示對毛澤東給以堅決的支持。

隨後，4月2日，《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同時發表了戚本禹那篇沒有讓發表的攻擊要害的文章。4月5日，《紅旗》雜誌發表了關鋒、林傑被壓的文章。而當時的《人民日報》是周恩來主管的。

周恩來私下背地裡拋開其他常委做如此表示，影響可謂非常惡劣。

在中央常委中，周恩來示第一個作如此表示，以示忠心。毛澤東在中央常委中打開了第一個缺口。陳雲曾經對「文化大革命」之所以為什麼發生如此表示過：黨內民主集中制沒有了，集體領導沒有了，這是「文化大革命」發生的一個根本原因。而周恩來則是向毛澤東臣服的第一干將，離開中央集體率先表示同意錯誤意見，因此對於文革的發動，周恩來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遠遠不是僅僅用被動的捲入，說了幾句違心的話那麼簡單。周恩來做的不僅單純表示向毛澤東效忠，而且變本加厲，拿出實際行動來擁護對毛澤東的支持。

4月10日中共中央以中發(66)211號文件批轉《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批語說這個紀要很好，很重要…不僅適合軍隊，還適合地方。4月16日，周恩來認為此批語一般化，對紀要的評價不夠。陳亞丁根據周恩來的口述重新起草了個批語。江青找劉志堅、張春橋、陳亞丁做了推敲修改，22日劉志堅送周恩來審定。5月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通知廢止211號通知，10日用新批語代替，但是時間仍落款為4月10日。新批語相對與舊的，著重增加了「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意義和重要性，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視文化戰線上的階級鬥爭，毛澤東文藝思想是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方向」等重要內容。眾所周知，《紀要》在江青從作為協助毛澤東指揮文革的助手搖身一變成為旗手的過程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周恩來此舉也是向毛江等作政治上的表態。

除此之外，周恩來還在思想上對於即將到來的文革做了動員。4月底的周恩來在一次講話中說：一個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目前正在我國興起。這是意識形態領域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誰戰勝誰的激烈而長期的鬥爭。我們必須在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以及其他各種文化界中，大興無產階級思想，大滅資產階級思想。這是現階段我國社會主義革命深入發展的關鍵問題，是關係全局的問題，是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命運和前途的頭等大事。

4月9日至12日，中央書記處開會，周恩來指出彭真的「路線」是錯誤的，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對立的，是反對毛主席的。1966年4月16日周恩來參加了毛澤東在杭州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集中批判了彭真。周恩來並且代表中央同彭真談話三次，指出其所犯錯誤。彭真對於這一切應該早有準備。早在轉載姚文元的文章之時，就是因為周恩來的干預，彭真才做了讓步。後來撤銷《二月提綱》的時候，毛澤東打電話給周恩來，對《二月提綱》作了嚴厲批評，質問周恩來這個材料怎麼會以中央文件的名義下達，到底是哪個皇帝決定的。對於毛的指示，周恩來告訴彭真：想不通可以保留看法，你現在需要沉默。毛主席看過那些人的文章，而且是他親自批准。你、我，還有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們，都應尊重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黨不能再出現任何裂痕了。

毛澤東敢於趁劉少奇出國訪問之際拿彭真開刀，這同周恩來的支持是分不開的。至此，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障礙基本上都排除，只剩下如何讓劉少奇等犯一個可以說得過去的錯誤了。

五、參與發動「文化大革命」

周恩來對於文革的發動知不知情，中共官方的說法是說周恩來不知情，對毛主席發動這場「革命」的深層想法不太清楚，周對「文化大革命」缺乏思想準備，周恩來是被動地捲入這場運動之中的。事情果真如此嘛？事實上周恩來從處理楊尚昆、羅瑞卿的時候就開始涉入，並非對「文化大革命」的發動不知情，反而是積極地向毛澤東表態，全力支持毛髮動「文化大革命」。

1965年夏，劉少奇接班人地位將由別人取代的消息，已在極小的範圍內傳出。據王稼祥夫人朱仲麗回憶，1965年秋，周恩來奉毛澤東命去看望已賦閒幾年的王稼祥，周恩來對王稼祥說，接班人可能是林元帥和鄧總書記。在「文革」前召開的一次小型會議上，周恩來同其他幾位中央領導人談起毛的接班人時，認為鄧小平可以接替毛來掌舵。據原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和組員王力回憶，中央的不少人在毛髮動文革前就已經知道矛頭所指為劉少奇。陳伯達在他的獄中回憶裡說：「到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才從毛主席的談話中知道，（整個）戰略部署的鬥爭是對劉少奇的。當時除了林彪、江青、總理、康生、謝富治、汪東興和我之外，幾乎沒有人知道。」

當然也有人看出了徵兆。鄧力群就說過：「拿我來講，過去不知道林彪跟毛澤東的爭論，覺得林彪不但政治上行，而且會打仗。管好中國這個國家，中共這個黨，光懂政治不懂軍事不行。據我的接觸，當時有這種看法的人不少。毛澤東同志的這個選擇，不能說不包含當時相當一部分人對林彪的看法。」筆者曾經和國內一位黨史專家對此進行過討論，從1965年的形勢來看，南北連個方面均有戰爭威脅，北面來自蘇聯，南面來自入侵越南的美國。戰爭的威脅是毛澤東要換接班人的原因之一，而且這種形勢下，林彪則是第一人選，特別容易獲得黨內支持。

按毛澤東的說法，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從一搞社會主義就開始。從這個意義上講，毛髮動文革，是想清算建國後十七年的總賬，清算所有在十七年中反對過他的人，包括劉、鄧、周、陳、彭等等。當然，毛澤東在具體操作過程中，採取分化、拉攏等手段，層層剝筍，各個擊破。在1965年底至1966年4月份這段時間裡，毛澤東在周恩來的大力協助下，順利完成外圍的清理工作，即「彭、羅、陸、楊」被打倒。而在這一階段劉少奇的「被動」同周恩來的「順從與積極表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現有資料表明，劉少奇只是在大局一定的情况下，才表態支持。但是周恩來絲毫不敢掉以輕心，正如他同吳冷西講的：「不光是批評你，也是對我們說的。」因此周恩來一方面要積極配合毛澤東的部署，另一方面要不失時機地、不斷地向毛澤東表示「忠誠」。

除了在清除「彭、羅、陸、楊」「四大家族」的工作中竭力配合之外，在毛澤東的其他部署上，周恩來也是貫徹毛澤東意圖的主要執行者。

4月16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彭真的錯誤，撤銷所謂《二月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等問題。4月24日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基本上通過了中共中央的《通知》草稿，提交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根據李雪峰的回憶，這個擴大會議實際上是周恩來主持。這個擴大會議其實也就是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的預演，文革的到來已成定局。

劉志堅回憶說，4月14日周恩來就把他叫到釣魚台8號樓說，中央確定劉志堅和陳亞丁到上海參加一份中央文件的討論和修改，這就是《五一六通知》。

5月1日，周恩來在歡迎阿爾巴尼亞領導人謝胡的大會上的講話指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現階段我國社會主義深入發展的關鍵問題，是關係全局的問題，是關係到我們黨和

國家命運和前途的頭等大事。」 毛澤東為了這個頭等大事，做了長期的準備。

1. 隨著林彪一起念「政變經」

林彪在著名的1966年「5?18講話」也就是所謂的「政變經」中說：「毛主席近幾年來，特別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義的問題，黨內黨外、各個戰線、各個地區、上層下層都可能出。我所瞭解，主要是指領導機關。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採取了很多措施。羅瑞卿問題發生後，談過這個問題。這次彭真問題發生後，毛主席又找人談這個問題。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佔領我們的要害部位、電台、廣播電台。軍隊和公安系統都做了佈置。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做這個文章。這是沒有完全寫出來的文章，沒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們就要學這個沒有印出來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為了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這是很深刻很嚴重的問題」。

當時的華北局負責人李雪峰回憶，他和與會代表在5月18日聽林彪的「政變經」講話時便知道矛頭所指是劉少奇：「他沒有點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劉少奇。劉沒有講什麼」

5月18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在北京玉泉山會見胡志明時，都說「彭真……反毛主席，他是中國黨內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已經挖出來了。

但後來周恩來卻說「5?16通知」「關係到整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對理論、路線、方針都談到了，歸結到結束語，主席已經意識到睡在旁邊的赫魯曉夫，不僅是彭真，有的已經揭露出來，有的還沒有揭露出來，有的還正在培養作為我們的接班人，各級黨委都應該提高警惕。這個話在中央來講是劉少奇。那個時候不能說，是黨內文件，你們沒有傳達。就是我們經常跟主席接近的人，有那麼一點點感覺，但也不敢想，因為主席沒有透露。我們稍微有一點點感覺，曾經跟主席議論過，拿林彪同志和劉少奇比，林彪同志的思想性高得多了。」

在5月18日的時候，當著劉少奇的面，周恩來當然不會明確說劉少奇就是赫魯曉夫。但是背後不還是和「主席議論過，拿林彪同志和劉少奇比」過麼。「不敢想」的說法是僅僅是為了襯托毛主席的「權威」而已。因此，周恩來在五月份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時候是明確知道毛澤東的矛頭所指。這在周恩來5月21日的講話中也可以看出倪端來，通篇講話充滿了對林彪的吹捧，但是對劉少奇則絲毫沒有讚揚。

要說林彪一個人在念「政變經」，則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因為無論是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還是劉少奇都有念過「政變經」。在5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鑒於毛澤東多次談到要防止反革命政變，周恩來建議林彪做一個關於政變的講話，這就是林彪說：「常委的其他同志要我先講」的由來。戚本禹在論及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的過程時說，這次會議，名義上是劉少奇主持，實際上，起核心作用的是周恩來，筆者認為周恩來比劉少奇更能領會毛澤東的意圖。其實，周恩來不僅大講特講防止反革命政變，還大力吹捧林彪，號召全黨群眾要緊跟毛澤東走，為黨和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從一定意義上講，周恩來的通篇講話就是為文革的發動做了全黨的動員。

余汝信先生論及林彪「5?18講話」的要旨是「防政變」而決不是「政變」。「防止反革命政變」及隨之成為實證例子的對彭、羅、陸、楊「四大家族」（周恩來語）的揭發批判，是當時毛澤東灌輸予中央的思維定勢，並使之成為整個中央政治局常委班子的共識，不是林彪個人的發明創造。以解決彭、羅、陸、楊為主要任務之一的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主持者是劉少奇（受正在南方的毛澤東所委託），常委之中，周恩來、林彪、鄧小平都講了話。林彪「5?18講話」開頭第一句就說：「本來是常委其他同志先講好。常委同志們讓我先講」，讓林先講，並不等於其他人不講。按照戚本禹的解釋，而這「常委」則是指周恩來。林講話之後，周恩來於5月21日、鄧小平於5月25日均分別在會議上講了話。

主持會議的劉少奇有無正式發言，至今我們不得而知，目前所知的劉少奇關於彭、羅、陸、楊問題最詳盡的說明，是其於當年6月27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的講話。

據目前所知，周恩來、鄧小平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劉少奇在民主人士座談會上的講話，均未見中共官方的正式轉發件。故此，長期以來，歪曲史實者似乎有了可乘之機，造成的假像是似乎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有周、鄧、劉與林彪觀點相同、論調一致的言論這麼一回事，即使是比較嚴謹的文革史著述，在對林彪「5·18講話」大加鞭撻的同時，對周等人的講話也是避而不談，未著隻字。

中共正式出版物首次公開承認有周恩來的講話，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纂的《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一條簡短記載：「5月2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三個問題：（一）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二）領導和群眾問題。（三）保持晚節問題。」惟要參閱周講話全文，目前還只能求助於文革中群眾組織的出版物。

周恩來開宗明義的講，「同意許多同志的講話。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講話，講的很好」。……「什麼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壞處是使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各方面竊取了領導地位，奪取了領導權。可以看出產生修正主義國內原因是主要的。」「林彪同志講的亞非拉地區六十一政變，也可以看出國內因素是主要的。在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時期，存在著階級鬥爭。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就講了『糖衣炮彈』，一九六二年十中全會就講得更明確了。一九六三年四清至現在發現基層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可以看到一個地方，一個部門，一個時期，修正主義可以成為當權派。」……「（筆者註：周恩來在此狠批彭、羅、陸、楊）彭、羅、陸、楊是一個一個地奪取我們的陣地，有筆桿，有槍桿、有黨權。第二是防止修正主義發生政變。第三要防止修正主義的軍事政變。我們的三防與陸定一的三防不一樣。對政變的危險，同意林彪同志的講話，中央與地方與中央為主、國內與國外以國內為主，黨內與黨外以黨內為主……」「一種是搞政變。搞資本主義復辟，然後再推翻…彭、羅的問題可以發到縣、團討論，以後逐步深入到群眾中去的。」（筆者註：原文如此，不太通順。）

引人注目的是，周恩來傳達了毛澤東在5月5日會見阿爾巴尼亞領導人謝胡時談到發動和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所採取之策——「剝筍」政策。毛澤東說：……那些舊人有一部分鑽到黨內來，暫時潛伏不動，待機而起。等於赫魯曉夫潛伏不動，待機而起一樣。第二個可能就是剝筍政策，一層一層地剝掉，剩下的是好的，把壞的剝掉。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四十五年了，我們就初步地剝了一遍，剝掉了不少反動的：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張國燾、張聞天、高崗、饒漱石、彭德懷、羅瑞卿、彭真等等前後幾十個中央委員，還有睡在我們身邊沒有發現的。

周恩來講：「另一種是不斷地清除修正主義，「剝筍」不斷出現，不斷清除。出是肯定的，出來後可採取剝筍的政策，這樣可以避免修正主義復辟，這就是我黨當年對國民黨的政策。一九二七年以後，國民黨分成左、中、右派，中間的轉化為右派的剝筍，但並未實現這個政策。現在用到無產階級專政直到共產主義實現，這是發展規律。如新中國成立以來，一次是高饒事件。二次是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事件，『四大家族』是第三次了（筆者註——這是黨內第一次把彭羅陸楊作為一個反革命集體對待），對他們都是採取剝筍政策，修正主義不可能得逞，使我們國家不出修正主義。主席說：『他們得支氣管炎，吃五十片藥就消滅了細菌』。事情是兩種可能，或者我們被他們打倒，或者我們剝掉他們。一種是得逞，一種是剝掉。想一想，不採取剝筍政策，不剝掉，不消除，我們的國家、黨不知怎麼樣了。前後三次事件都是結合起來的，彭和高都是個人利害衝突，不消除他們，他們的陣地會越來越大，這是很危險的。揭開『四大家族』，奪回他們所佔領的陣地是剝筍政策的勝利（筆者註：原文如此，筆者認為是剝筍政策），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應該慶祝。現在世界上有些國家好像風平浪靜，不採取剝筍政策，『死水一潭』是不成的，修正主義搞政變，基礎是一文一武，掌握筆桿子、槍桿子，兩個都佔領了就動手，但最重要的是黨權，彭是大黨閥。防止修正主

義竊取我們的黨權，防止修正主義的重點要放在上邊、中央、黨內、國內。」「林彪同志講的那一段歷史，一方面要記住政變之多，另一方面要相信北京出了政變總會有黨、國、領導軍隊造（反）革命反的人，要有信心，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團結在毛澤東同志周圍，堅持不懈地採取剝筍政策，世世代代傳下去。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毛澤東思想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走向滅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走向勝利的這個偉大時代的頂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與列寧一樣是天才的領袖，是世界人民的領袖……彭（真）是高山倒馬桶……，從最近二十三條下達後，彭打出反左的旗號，完全取消四清的一條黑線，不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對於「四大家族」，周恩來後來還聳人聽聞的評論到：「1963年主席就曾經說過要防止黨內一兩個有威信的人帶錯了路，舒舒服服地變成了修正主義。1965年主席又提出要是中央出現修正主義地方敢不敢造反這個問題。到1966年就果然出現了，真是不信而不言中，這是主席英明偉大的預見，試想如果彭、羅、陸、楊的陰謀成功，那不知道有多少人頭要落地。」

除了對積極鼓出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之外，周恩來在這裡還大力褒揚林彪。周恩來說：「『三家村』、『前線』反黨反社會主義出現在這個時期，他們採取相同的立場、思想、主張、目標是向黨向社會主義地起進攻，進攻的目標是林彪同志，針對毛主席，首先砍掉毛主席的左右手，這不是偶然的，不是巧合，羅是大比武出現的，陸是夫妻老虎店發現的，他們的共同點是反對突出政治，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工農兵學習毛主席著作，在這個時期他們出來反對林彪同志，因為林彪同志對毛澤東思想提得最早，舉得最高，發揮最多，用的最活，做得最力。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林彪的講話是最有份量的的講話。高舉毛澤東思想，提出了活學活用，四個第一，……『四大家族』原形畢露，事情不簡單，鬥爭剛開始。我們的陣地一個一個地被奪走了，現在要一個個地奪回來。他們打著紅旗，散佈了大量毒素，他們是見不了天日的，我們要把毛澤東思想交給群眾。……彭、羅、陸擺出一付一貫正確的姿態（彭說他既非教條主義，又非經驗主義），驕傲自滿，自高自大，從無自我批評，同主席和林彪同志從不談東北的問題，個人主義勝過黨性，對他提過意見的人，他恨之入骨，永遠不忘。」

最後，周恩來告誡全黨：「蓋棺不能定論，火化了也不能定論，像瞿秋白就是一個叛徒，他臨死時寫了一篇《多餘的話》，這篇講話在香港的一個雜誌上發表了，意思是說我不應該參加政治活動。李秀成也是一個叛徒，李秀成的自供就看出了，戚本禹同志寫文章批判過，不因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議把瞿秋白從八寶山搬出來，把李秀成的蘇州忠王府也毀掉。這些人都是無恥的。毛主席的一家，毛澤民、毛澤覃，毛主席的愛人楊開慧烈士，這些人是真正的烈士，這才是領袖的家庭。『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要跟著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領袖，百年以後也是領袖。晚節不忠，一筆勾消。學毛著，作筆記要和自己的革命歷史聯繫起來，作總結，有的人擺樣子，不讀毛著，拿起來讀一段就痛心了。要返回來讀三十本書。」

文革史專家宋永毅對這段話的評價是：由於周第一個在黨的政治局會議上主張對死者墓地的打砸搶，數月以後，他的講話廣為流傳，瞿，李兩人的墓地即被紅衛兵全部毀掉，文革群眾性政治暴力中對死者屍體，墓地的殘害即由此濫觴。

此外，周恩來在講到領導與群眾的問題時，講：「中央更加團結了，全黨全國人民更加團結在毛主席的周圍。通過文化大革命的活動，我們要更好地宣傳毛主席的領袖作用，不僅在中國，而且要在全世界宣傳毛主席的領袖作用，要謙虛謹慎，還要當仁不讓。主席在1962年提出形勢、矛盾、階級，十中全會公報，1963年第一個十條，文化大革命，三線。1965年備戰備荒為人民，這次又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央要加強反修，這次上海市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大作用，提倡大家學上海，要把毛澤東思想交給群眾，為了剝筍，必須用毛澤東思想武裝群眾。」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充當世界革命運動的領袖，讓中國

成為世界革命運動的中心。自斯大林在1953年去世之後，毛澤東就為這個目標奮鬥，這也是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初衷之一。因為毛澤東要爭當世界共產主義領袖，最大的不利條件就是中國的經濟實力遠不如蘇聯，但是毛澤東卻一直想走「捷徑」。這段話充分體現了周恩來對於毛澤東「心聲」的把握。

周恩來在講到「要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時，有人插話：「彭真說總理總講他的社會出身，黨內講，黨外也講，真有點麻煩，講得太頻繁了。總理這樣講是榜樣，警惕自己，改造自己。劉介梅不是由好變壞，又由壞變好了嗎？」

周恩來的努力得到了回報。1966年5月中辦副主任田家英自縊身亡。主管中央檔案事務的副主任曾三停職審查。6月，周恩來的親信、國務院副秘書長（前兼總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調任中辦第一副主任，7月，童兼新組建的中辦秘書局局長。

2. 處理廣播電台的安全問題

林彪帶頭念起了「政變經」，周恩來積極跟進，陳伯達、康生也一擁而上。但是，要說實際行動起來防止「政變」，還是周恩來出力最多。

196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免去楊尚昆中辦主任職務，任命中辦警衛局局長汪東興為中辦主任，同時，中辦機要局局長李質忠被提為中辦副主任。

12月14日，毛澤東約李質忠談話，稱：「機要保密、警衛工作很重要，要保住黨的機密，不要被修正主義利用，並防止內部出修正主義，打起仗來要警惕牛鬼蛇神會出來破壞，要把這個意思告訴中央機要局、機要室，還要告訴軍隊的機要局、廣播事業局的負責同志都要注意」。

1966年1月14日，周恩來約丁萊夫、楊成武、徐子榮（公安部副部長）談廣播電台的安全保衛問題。周稱，廣播事業局要成立電台安全保衛小組，要從部隊調一個現職參謀長專管電台的安全保衛工作。4月8日，擬調廣播事業局負責安全保衛工作的陸軍第63軍參謀長王壽仁抵京履任（據王壽仁後來回憶，他是乘坐周恩來的專機趕至北京的），5月30日，中央正式任命王壽仁為廣播事業局副局長。

3月27日，周恩來在楊成武、王尚榮（總參作戰部長）、呂展（北京市公安總隊總隊長）及丁萊夫等陪同下，檢查廣播事業局大樓（當時局機關與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北京電視台均在同一大樓內）的安全警衛情況，指示要制定警衛應急方案、指定應急支援部隊、播音室前要有戰士守衛、大樓院內不能開門太多、廣播劇場不能對外，等等。3月28日及4月12日，周恩來分別檢查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位於北京市郊的兩個發射台——雙橋491台、沙河573台的安全警衛工作。

5月14日，即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在展開對彭真的批判期間，周恩來於0時40分指示廣播事業局代管北京市台。廣播局上午研究確定了代管辦法後，向周作了匯報，周當天批示同意。5月27日，公安部隊司令部作出《關於加強廣播電台武裝警衛情況的報告》。報告稱，年初以來，根據周恩來、總參和公安部的指示，公安部隊對加強重要廣播電台的警衛工作採取了很多措施。各地98個重要廣播電台普遍加強了兵力。各總隊對電台警衛工作均指定專人負責。各重要電台的警衛部隊還調整加強了幹部，並有營以上幹部重點掌握。各省、市、自治區對調動電台警衛部隊的權限都作了規定，以防止發生問題。加強了通訊聯絡，給警衛部隊配備了無線電台。

3. 肩負保衛首都的工作

1966年5月15日，周恩來、葉劍英依照毛澤東「保衛首都」的指示精神，就加強首都警衛工作聯名報告毛澤東和中央常委，提出，組成以葉劍英為組長、楊成武、謝富治為副組長，劉志堅、李雪峰、汪東興、周榮鑫、鄭維山、傅崇碧、萬里、蘇謙益參加的首都工作組，負責保衛首都安全的工作，直接對政治局常委負責。

關於首都工作組的工作任務，周恩來解釋說，是在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發現後，主席感到首都的保衛很重要，責成我來管這件事，組織了首都的工作組，由軍委、公安部、國務院、中央辦公廳和其他一些部門組成，任務：

- 1、保衛中南海安全。
- 2、保衛首都，增強衛戍力量。
- 3、保衛要害部門，如：中南海，釣魚台，國防部……等等。
- 4、為保衛首都安全，把黑戶口，五類分子搞走。
- 5、處理外國僑民中一些不受歡迎的人。

以上五條，六月初向主席匯報，主席對第四條原則上不太贊成，主席提出：把矛盾上交中央，中央怎麼辦；矛盾下放到公社沒有土地，也不好辦，交到其他省，是以鄰為壑，還是自己消化。這個指示，我已通知首都工作組，但用工作人員的問題和當時紅衛兵運動的迅速發展，有的單位沒有傳達下去，現在各單位在查封黑材料中，如發現有那時的黑戶口，五類分子名單，要鑒別開來，封存起來。需要指出來的是，「以上五條，六月初向主席匯報」的人正是周恩來本人。

首都工作組有一個長期計劃，即通過公安局大規模遣返驅逐所謂的「成份不好」的居民。按周恩來的講話則是毛澤東在5、6月份否決了此計劃，但是實際上在66年的夏季，此計劃得到非常好的實施。根據資料，以「遣返」為名，把近10萬居民強行趕出北京押往農村。僅據官方非常不完整的統計材料，當時至少有33,695戶北京市民被抄家搶掠，有85,196人被驅趕出城。此風很快在全國各大都市蔓延，多達40萬的城市居民被「遣返」到農村或邊遠地區。顯而易見的是，此計劃是得到毛澤東的同意，並得到周恩來的支持和其它政府官員的協助。謝富治就說：「民警要站在紅衛兵一邊，跟他們取得聯繫，和他們建立感情，供給他們情況，把五類分子的情況加少給他們。」

在那個夏季，「打殺，公社知道，縣裡知道，市裡知道，連周總理都支持」的傳言在北京流傳。這種傳言絕對不是空穴來風。在當地的片警和居委會的指引下，北京第15女子中學的「紅衛兵」於66年8月25日來到橄欖市附近廣渠門大街121號的房主李文波（小業主成份）處抄家。這些瘋狂的紅衛兵翻箱倒櫃、掀開屋頂，毆打李文波、劉文秀夫婦，逼他們交出根本不存在的「槍枝、黃金」，甚至還不准劉文秀上廁所。李文波在忍無可忍中拿起菜刀抵抗，於是被當場活活打死。然而在9月10日，周恩來則聲稱「反動資本家砍傷十五中的學生」，進而勸說不「要組織十萬人的示威活動」。因為「這樣一搞，反而倒使這個反動的資本家揚了名，擴大了敵人的影響，在國際上也會造成不好的影響」。周恩來考慮的是開大會影響不好，絲毫沒有批評「打人不好」，違法不好，打死了人在周恩來的眼裡也是不需要償命的。僅僅在8月中旬至9月底的46天，在北京市被打砸搶分子打死的達1700多人。8月中旬至10月3日，從北京城里趕走所謂「牛鬼蛇神39萬7千4百人。」

事實也是如此，正如宋永毅先生指出的那樣，周對於一般群眾所受的迫害，尤其是在北京紅色恐怖的「紅八月」中所受的老紅衛兵，西城糾察隊（西糾）的殘害又鮮有同情之心。

一個當年僅16歲的中學生對「紅八月」源起的回憶：「1966年8月，北京工人體育場批鬥小流氓的10萬人大會，我們學校的「紅紅紅」是召集人之一，因為他們組織的一個人挨了小流氓的扎。在會上他們把小流氓打得極慘，可當時在坐的中央首長包括周總理等沒一個人制止，由此開了全北京市的打人風。」

5月18日，即林彪「5·18講話」的同一天，周恩來就加強首都警衛工作進行部隊

調動之事，與楊成武和北京軍區協商，並書面報告毛澤東，提出擬調陸軍第63軍189師和陸軍第65軍193師來京擔任衛戍任務，衛戍區司令員由傅崇碧擔任。部隊到後，將對在京要害部門和廣播宣傳機關的保衛任務重新調整。毛澤東閱後批示：照辦。

5月26日，葉劍英主持首都工作組第一次全體會議，周恩來參加。會議研究和決定首都工作組的任務、組織、當前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調兩個陸軍師加強首都警衛力量等問題。周恩來在會上講話稱：首都衛戍工作，既要抓緊，又要走穩，要有領導、有步驟地進行，頭腦要清醒，不能急，一急就容易被壞分子鑽空子。首都衛戍工作牽連全局，必須把形勢觀察好。反革命畢竟是少數，我們掌握著大權，有槍桿子，軍隊是可靠的。會議決定：如遇有緊急情況需調動衛戍部隊，周恩來不在時可報鄧小平。

不可否認的是，「防止反革命政變」的總決策者，是毛澤東本人。1967年2月3日，毛對來訪的阿爾巴尼亞卡博、巴盧庫時所說：「北京市委是水也潑不進，針也插不進。現在不是改組了嗎？還不行，還得改組。當發表改組市委時，我們增加了兩個衛戍師，現在是四個衛戍師。以前兩個師是好的，但太散了」。

對於這段時間周恩來的行為和活動，麥克法奎爾和沈邁克在其書中對此有過精彩的描寫。下面是其中的節選部分：

周恩來在1967年1月接見一群不守規矩的學生時說加強北京衛戍區的部隊是最好的部隊高度「精幹」。他們不會因為有人「罵他們」、「動手打他們」就被煽動起來，他們絕對不會「開槍。」「如果你們罵他們、打他們，你們要知道他們是毛主席的戰士。」據傅崇碧說，在文革的高潮時期，衛戍區的幹部、戰士、家屬超過十萬人。30年後他回憶道：「當時發到衛戍區的中央文件數量比整個北京軍區都多。」（筆者註：這些文件絕對多數均為周恩來起草或者批示過。）

除了採取步驟保證整個北京地區的「安全」，首都工作組採取了更為慎密的措施來增進中南海高牆內的保安。周恩來在1967年6月說，因為中南海多年以來是楊尚昆「管」，裡面混進了「背景複雜」的人。主席甚至考慮到「反革命集團對中央搞暗殺」。為了保證主席的安全，楊尚昆的繼任汪東興對中央辦公廳進行了重組。周恩來說：「如果我們沒有把這些人趕走，主席就不能搬回中南海。」

不只是毛和他的同事在中南海的居住區清除了可能和楊尚昆有「不正常關係」的工作人員；一些因為資格老而多年住在中南海的黨的重要人物也被「趕出去」了。7月初，李富春副總理和汪東興通知那些人：中央「最近決定」以後只有與政治局常委的工作直接有關的高級官員才能住在中南海裡面。其他的人要搬到北京的其他地方。

大約一年以後，周恩來回憶說：「到了六月，北京穩定了。」穩定是有可能的，但絕不是平靜。事實上，就在這個月，文化大革命走向公開、吵雜、和喧囂。

由此可見，無論是林彪，還是周恩來、鄧小平，尤其是周恩來，是積極響應、堅決貫徹的。但是林彪是講得多，做得少，周恩來卻是做得多，講得少，如此而已。毛澤東的意圖，周領會的最快、最深，執行起來最堅決。

4. 參與批判朱德

5月23日，在劉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張鼎丞、林彪、陳毅、周恩來、薄一波、烏蘭夫等紛紛發言嚴厲批判了朱德。

周恩來說：「反對毛主席我都領導過。寧都會議也是我領導的。雖然弼時同志從後方來了，因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員代替了嘛。這是我一生最大的錯誤和罪惡。王明路線我也犯了，四中全會我也參加了。所以我最大的過錯是1931年到1935年遵義會議這四年之長。這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事。然後洛川會議，然後王明回來。1937年底到1938年武

漢時代，這都是路線性質的嚴重錯誤。當然還有其他錯誤。解放後還犯過反冒進錯誤等等。這幾件事都是朱德同志一起嘛。

至於朱德同志的賬那就更多了。從井岡山一直打到梅縣，都是盲動主義，軍閥主義，流寇主義。然後是立三路線，你也犯了。然後是王明路線四年，然後又是洛川會議。那時王明沒有回來，那還不是反對毛主席，你沒有領導？然後王明回來。第二次王明路線一直到六中全會，以後還有一些『殘餘』。幾十年歷史，朱德同志跟張國燾鬥爭，前一半應歸功於劉伯承同志的推動。如果沒有劉伯承同志在那裡，黃袍加身，你頂得住嗎？後一半是賀龍同志，弼時同志，關向應同志的共同推動，才北上了。如果沒有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

解放以後，那多了。毛主席常說，高饒彭黃的事，你都沾過邊嘛。你到處發表意見，是一個危險的事。……我們不放心，常委中有這樣一個定時炸彈，毛主席也擔心。毛主席說過，你就是跑龍套，可是你到處亂說話。你要談話，得寫個稿子，跟我們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南昌起義，就是有錯誤嘛。我當著資產階級國家的元首尼雷爾的面說：南昌起義，我有錯誤。他聽了很為驚奇：你還有錯誤？那時錯誤嘛，城市觀點嘛。所以，今天我把對你（朱德）的不滿告訴大家，希望你們監督。」

周恩來對朱德的批判「從反對毛主席的錯誤」是周、朱都參與的，似乎是在替朱德分擔些責任。但是周恩來隨即話鋒一轉，「至於朱德同志的賬那就更多了」，把朱德同張國燾聯繫在一起。接著周恩來在列數朱德解放後的嚴重問題後，把朱上綱上線為「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在政治局常委中的「一個定時炸彈」。最為重要的是，毛在廬山上指責彭的時候，就說他百年之後，有人怕彭。現在周恩來把朱同高饒彭黃聯繫起來，並且說「毛主席也擔心」，言外之意朱德如果活到毛死之後，就有可能做赫魯曉夫報告的人。

周恩來是否真的認為朱德有這麼大的能耐，不重要。重要的是通過批判朱德，向毛澤東表示對毛髮動的「文化大革命」的支持。

六、從工作組問題中脫身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等七人貼出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攻擊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搞修正主義。當夜，李雪峰按照周恩來、康生以及陳伯達等人的意見即內外有別來到北大處理此事。隨著毛澤東下令將大字報公開向社會發表，累積多年的社會矛盾在突然之間有了爆發的裂口，社會開始動亂，首先是在校園。毛澤東後來自我評價是「我闖了一個禍，就是批發了一張大字報。」「時間很短，來勢很猛，我也沒有料到，一張大字報一廣播，就全國轟動了。」

於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在北京的中央領導決定派出工作組，形成了後來稱之為「黑暗的50天」。派工作組的事情，周恩來負有一定的責任，但是周恩來後來在工作組一事上全身而退，由此顯出周恩來在政治上的老辣。

對此，《晚年周恩來》的作者高文謙認為：周發覺政治氣氛詭異，於是周恩來藉機出國，毛澤東對周恩來此舉的動機心照不宣，有意放他一馬，當即表示：「贊成總理的意見」。箇中原因有二：（1）毛是因為政治上的需要，爭取多數，孤立少數，利用矛盾，各個擊破；（2）周在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關於「保持晚節」的講話，業已在政治上表白心跡。在這種情況下，毛樂得順水推舟，批准周出訪東歐，以免和劉、鄧一起陷進去。

然而事實並非完全如此。

文革開始後的第一個工作組，就是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決定派出的。

鑒於天下大亂，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在6月9日飛往杭州懇請毛回京。但是毛委託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和領導運動。對於工作組一事，毛對這三人講：「派工作組太快了並不

太好，沒有準備。不如讓他亂一下，混戰一場，情況清楚了再派。」但是毛澤東同時又對下面的人說：「關於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亂。放手發動群眾，要大搞，這樣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來。不一定派工作組，右派搗亂也不可怕。北大一張大字報，把文化革命的火點燃起來了！這是任何人壓制不住的一場革命風暴。這次運動的特點是來勢兇猛，左派特別活躍，右派也在頑抗、破壞，但一般不佔優勢。打擊面寬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後分類排除。」

對於要出國一事，周恩來此時反而是犯了猶豫。（筆者甚至認為周恩來此時並不想離開。）周恩來要陳毅代替他出國。究其原因無非有二：（1）國內局勢變幻莫測，自己出去，會不會就是下一個彭真？（2）保護陳毅（筆者註：此時陳毅正被外國語學院的學生衝擊。）彭真被打倒，就是因為趁劉少奇不在家，現在陳毅會不是就是下一個彭真？陳毅倒了，自己就快了，毛澤東多次說過此話。對於此二種干係，周恩來不是不清楚。但是毛澤東卻是有意讓周恩來「擺脫干係」。

周恩來在6月16日離京，先去羅馬尼亞，然後24日訪問阿爾巴尼亞。6月27日，周恩來在地拉那群眾大會上發表長篇講話說：「目前，我國的億萬工農兵群眾，廣大革命的知識分子，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正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粉碎資產階級的代理人篡奪黨和國家領導的陰謀。這是一場挖修正主義根子的鬥爭，將進一步鞏固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包括在文化領域內的專政。我國廣大人民，正在徹底破除幾千年來剝削階級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雖然陳伯達修改和審定的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在6月1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但是陳伯達再也沒有公開表示過如此意見。而周恩來除了在地拉那表示支持，而且在隨後的幾個月內多次表示要橫掃牛鬼蛇神！兩次公開表示贊同陳伯達的意見。周恩來確確實實在履行自己的諾言：「通過文化大革命的活動，我們要更好地宣傳毛主席的領袖作用，不僅在中國，而且要在全世界宣傳毛主席的領袖作用，要謙虛謹慎，還要當仁不讓。」

作為證實筆者推測的另一證據則是：有人透露，周恩來在此次為時半個月出訪中，其心情一直處於一種異乎尋常的緊張狀態中。甚至在回國時巴基斯坦的總統發覺周恩來表現有異於往常。

周恩來一回國，康生就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刻意拉攏周。根據王力的回憶，康生主要告訴周恩來劉、鄧可能站不住了，周自己不要陷進去，主要是兩條，第一不要參加工作組，第二要管管「文化大革命」。

麥克法奎爾評論到：「周恩來的精明過人之處在於他並沒有接受康生要他管管文化大革命的建議，他設法躲開政治局常委會議，從7月11日開始，他飛到武漢見毛，又到上海主持接待來訪的尼泊爾王太子。7月11日和12日，周與毛長談。毛給周看了他在7月8日給江青寫的信的抄件，信中毛說了他對文化大革命的設想，說了他要搞個「天下大亂」，也表達了他對林彪5月18日在擴大的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的關注。7月14日，周在飛回北京的路上繞道到大連，在那裡向林彪轉達了毛的意見，林彪表示將在回到北京以後根據毛的評論修改講話的正式文本。7月19日，陳伯達也許是因為和毛討論過而壯了膽，再度提出撤銷工作組，遭到以劉、鄧為首的大多數人的反對。」關於周恩來的態度，無論是《周恩來傳》還是《周恩來年譜》都沒有提及。

7月23日，在討論工作組問題的會議上，劉少奇、鄧小平與康生、陳伯達等人意見相反。同日，陳伯達還在北大宣佈了「對於『6?18』這個事情，說是個反革命事件，是不對的，是錯誤的。」這個事情明顯是衝著工作組去的，因為針對發生在北大的「6?18」事件，劉少奇在6月20日以中央名義將北大工作組的簡報批轉全國：「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

高文謙先生在其《晚年周恩來》一書中，對於周恩來與工作組的關係做過深刻的解析，

並引用周恩來在7月24日凌晨給劉少奇、鄧小平的信作為證明。

高文謙先生說：在工作組問題上，周恩來本來就因出訪東歐而相對超脫，回國後更是由於康生的打招呼 and 毛澤東的交底，而有意同劉少奇、鄧小平保持距離，並注意同中央文革小組保持接觸，竭力在兩軍對壘中保守中立，為自己預留退路。在毛回京後尚未明確表態之際，周就已經開始轉向，不再完全附和劉、鄧不撤工作組的主張，而是著重針對出現的問題提出「改進」的辦法。

七月二十三日，在討論工作組問題的會議上，劉少奇、鄧小平堅持認為大部分工作組還是好的，黨對運動的領導總得通過某種形式，對工作組不能採取消極撤換的辦法。康生、陳伯達等人則列舉所收集到的材料，指責工作組「鎮壓群眾」，「阻礙運動」。雙方相持不下，會議不歡而散。會後，周恩來連夜寫信給劉、鄧，出面充當和事佬，試圖化解雙方的歧見。

周恩來在24日凌晨4時寫信致劉鄧。

少奇、小平同志：

昨晚所談之事，經再三考慮，並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見主要由於對形勢的估計和問題的認識而來，其他原因非主因此以不談為妥，因看法不盡一致。在北京工作組的派出，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個工作組在本單位所發生的情況又有其特殊性，這需要進行現場調查，作具體分析。工作關係，必須談清，並做具體規定，否則不好工作。我今晨在外語學院看大字報，增加一點感性知識。

匆匆補告，並致敬禮！

周恩來

七月二十四日四時半

高文謙先生斷言：這封信充分表現出了周恩來善於在政治上左右逢源和息事寧人的為人。信中既肯定了派工作組的「必要性」，為眾多參加工作組的幹部進行了開脫，又強調各單位發生的情況「有其特殊性」，暗示中央文革所說的情況亦有可能，並表示要到現場作調查研究。這在表面上是響應毛澤東回京後，對爭論的雙方所提出的號召，實際上則為他後來的轉向預留了伏筆。果然，當毛隨後正式表態，對工作組大張撻伐時，周馬上緊跟，率先表態擁護，主動對派工作組的問題作自我批評。

根據最新的史料，筆者認為此說法可以商榷。

卜偉華先生說，在7月19日劉少奇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當陳伯達以工作組不一定比學生高明、有的還整學生為理由，提出撤銷工作組時，周恩來、康生、陳毅、陶鑄表示支持。

郭影秋則回憶說：是7月18日毛澤東從武漢暢遊長江回到北京後，形勢更加急轉直下。據知，毛澤東回到北京後，首先聽取了江青等人的匯報（筆者註：江青是7月20日才回到北京，此說法不確切），在此期間內劉少奇也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於7月19日至23日主持召開了「文化大革命情況匯報會」。我曾參加過一次，會上對於是否派工作組有明顯分歧。陳伯達、康生、關鋒等人不主張派，而少奇、小平、薄一波、李富春等主張派。小平同志說：「黨的領導被打倒了，下面的組織癱瘓了，沒有黨的領導，運動怎麼進行。因而，應該派工作組協助黨委、黨組織進行運動。」周總理這時插話說：「我們年輕時搞運動，也沒有什麼組織領導，學生自己可以搞運動。」意思不是很明確，似乎是不主張派。少奇馬上針對周總理的話說：「學校運動起來了，發生那麼多問題，誰能辦得好呀，讓你去也解決不了。」會上自始至終對於是否應該派工作組，一直爭論不下。

通過郭影秋的回憶，顯然周恩來是站在陳伯達一邊的。周恩來是針對鄧小平的話做的反駁，而劉少奇則反駁周恩來的話，其間的氣氛顯然比較緊張。

《周恩來年譜》對於周恩來的立場採用的是曲筆：1966年7月19日、22日，周恩來參加劉少奇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主持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有關問題。陳伯達在會上提出要撤銷工作組，遭到劉少奇、鄧小平等多數人的反對。此說法同《劉少奇年譜》的說法相同，即沒有正面提及周恩來的態度。

繼而根據周恩來在7月20日到毛澤東處開會，23日同鄧小平等人到劉少奇處開會，討論工作組問題。

由以上材料，筆者推斷，周恩來在此時對工作組的態度已經明瞭，並非「著重針對出現的問題提出『改進』的辦法」，而是就此同劉少奇等人發生了爭論。周恩來致信劉、鄧的意旨並不在於「出面充當和事佬，試圖化解雙方的歧見」，而是因為和劉鄧發生爭吵之後，主動提出彌補其間關係，並為自己作出一些解釋。

而且根據卜偉華先生的資料，此時支持撤銷工作組的並不是少數，而是多數。

筆者認為，此手法同康生在《二月提綱》的做法是一模一樣。康生在制定《二月提綱》的過程中並無反對意見，因為沒有完全摸清楚毛澤東的底數。周恩來同樣如此，在得到康生的密告之後，同樣把自己擺在一個可進可退的穩坐釣魚台的位置，也如一個押寶的賭徒，一手押紅，一手押黑，不管是紅是黑，他都保險取勝！一面支持陳伯達的意見，另一方面又對劉少奇採取模稜兩可的說法，不表態。毛澤東在回到北京對工作組提出批評後，周又馬上緊跟，率先表態擁護，接著主動對派工作組的問題作自我批評。相對於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態度，周恩來的「跟進」是顯而易見的。

周恩來在24日凌晨就來到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看大字報。周對周圍的師生講：「今天早晨我看了一個半小時的大字報，你們的大字報貼在外面，我只能趁你們睡著的時候，天亮了，你們起來了，就不讓我看了。我不能坐在辦公室裡亂髮議論，我要來看，然後向毛主席匯報。」

隨後的第二天，周恩來繼續來看並講話：

「同志們！同學們！今天我很滿意，很感謝你們，你們很守秩序。你們寫了很多大字報，讓我看了一個小時。我從大字報中學習到不少東西。昨天看了兩個小時，今天看了兩個小時，你們懂得用毛澤東思想來分析、比較、研究事情了。……我既來了，就要抓下去。毛主席號召我們要將文化革命進行到底！

我是來支持你們革命的！（熱烈鼓掌）不管你對革命認識有多少，多一些，少一些，或犯了一些錯誤，不要緊，只要你們革命。我也犯過一些路線錯誤，但是仍是做黨的國家工作。

工作每前進一步，都要檢查，看有沒有錯誤，有了就要改。認真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精神力量就會變為物質力量。符合毛澤東思想的，符合人民利益的，工作就會搞好。

總之，一句話，只要革命，總會有前途的！（熱烈鼓掌）

你們回家的都回來了，我就和你們在這裡見面。你們還沒早餐，我找個捷徑，還是來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周恩來的這個講話非常有特色。第一個，周是第一個向學生表態支持學生革命的政治局常委；第二個，文革中一大特色，周恩來群眾集會上揮臂指揮合聲大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從此發端。在為毛澤東個人崇拜推波助瀾時，周恩來可以說是獨出心裁，表現得與眾不同。周恩來沒有象林彪那樣編纂毛語錄，而是通過更通俗更容易傳播的音樂和舞台藝術，和廣大老百姓打成一片。

1966年7月29日，周恩來在北京市革命師生「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上對於過去一個半月的形勢做了講話。

首先，周恩來把主要責任推到被撤職的領導上面：

「同志們、同學們：

在北京，過去舊的北京市委，舊高教部的領導，舊的中共中央宣傳部的領導，都犯了嚴重的，也就是大家所說的黑線性的錯誤。這就是一種罪行了，不單是普通的錯誤嘍！」

其次，周恩來對於工作組做了解釋：「我們倉促地決定了，迫不及待地到處派工作組。」「剛才小平同志講了，也有的工作組是好的，但工作組大多數同志主觀上是好的，主觀上不是想這樣做，但他們的工作方法是老一套，這就是大家所說的『老革命遇到新問題』，不適應新形勢的要求，也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要求，儘管工作組的絕大多數同志是好的，但是效果就是這樣冷冷清清，或造成了群眾斗群眾的現象，把學校和學校的聯繫也隔開了，那勢必就冷冷清清了。這套方法完全不適合這種轟轟烈烈的革命師生的革命運動的要求。」

周恩來還對如何搞「文化大革命」作了傳達，例如成立的各級文化革命委員會或文化革命小組。

周恩來對於新生的中央文革小組特意提出表揚：「我們中央的同志，首先是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的同志：陳伯達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陶鑄同志和其他同志到群眾中去，他們去體驗，我們現在跟著去學習。」

最後，周恩來表態：「總之，這一個新的事情，新的運動，我們過去都不熟悉，我們離青年時代遠，要到你們中間去學習，取得新的經驗，老革命做新工作就年輕了，革命工作就能做得更好！（鼓掌）只有這樣才能算得上毛主席的戰友和學生。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

七、積極支持中央文革小組

中央文革小組前身是「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其成員名單是在周恩來參加、由鄧小平主持，在1966年4月9日至12日召開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草擬，並報毛澤東批准的。周恩來在中共政治局會議上提議陳伯達擔任組長，而陳伯達順勢提議毛澤東的妻子江青擔任第一副組長。但是初期的中央文革小組是默默無聞的。

文革小組的首次亮相，是周恩來精心策劃的。7月9日，在北京召開的「亞非作家緊急會議」閉幕。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設宴祝賀會議成功，並與劉少奇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宴會前會見參加會議的各國代表。事先，周恩來親自打電話通知穆欣，要陳伯達參加會見，並叫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出席宴會，新華社將趁此機會公開報導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的事。

為了樹立中央文革小組的權威，毛澤東在7月24日發話說：「中央好多部，沒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組卻做了不少好事，名聲很大。」繼而在緊接著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進而稱讚：前一時期正確的是中央文革，而不是中央。

7月27日晚，康生在北京師範大學講話時稱：「今天我們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所有成員都到北師大來，跟著你們學習文化革命的經驗。……好多同志寫條子來，要我們介紹文革小組的同志，我執行這一指示：組長陳伯達同志，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康生在介紹江青時，首次將江青稱為「第一副組長」。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由周恩來親自審定的關於此次接見的新華社電訊稿刊登於次日的《人民日報》。通訊中說：「有1,500名學生代表登上天安門城樓，同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參加大會。毛主席和林彪、周恩來、江青等同志分批地接見了他們，同他們談了話，並且在一起照了相。」「慶祝大會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同志主持。他在致開會詞時說：『我們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在這裡同大家見面。……。』」在此新華社電訊中，江青被放在

十分突出的地位，就如歷史已經證明的那般，江青高於其他政治局常委的地位呼之欲出。

8月31日，毛澤東以乘敞篷汽車繞行天安門廣場後再開大會的方式，第二次大規模接見紅衛兵。據新華社消息，毛和林彪「以及賀龍同志」，由謝富治、楊成武陪同乘第一輛汽車，緊跟著周恩來、陶鑄、聶榮臻、江青乘坐的第二輛汽車，鄧小平、康生、劉少奇、陳毅乘坐的第三輛汽車，朱德、李富春、陳雲、董必武乘坐的第四輛汽車，葉劍英、肖華、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乘坐的第五輛汽車，緩緩繞行天安門廣場一周，然後登上天安門城樓。「六時四十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宣佈接見外地來京革命師生大會開始。江青同志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向大家問好。她說，我們熱烈地歡迎你們，向你們致革命的敬禮」。

新華社電訊首次公開稱江青為中央文革第一副組長。

對於這個非驢非馬的中央文革小組，從開始亮相到結束，周恩來都給以了大量的支持和合作，詳述見專題部分《周恩來同中央文革小組以及江青的關係》一文。

八、為毛的大字報張目

工作組是撤了，通知也發了，但是一系列的問題還需要解決，第一是要使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的一些決定需要通過黨的中央全會正式追認，其次要為文革的進一步發展掃清障礙。

7月27日至30日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預備會議期間，周恩來分別約鄧小平、陶鑄兩次談話，與康生談一次。8月1日，按照毛澤東意見，周恩來負責處理清華大學工作組和「文化大革命」問題。為什麼是周恩來處理清華大學？眾所周知，清華在一定程度上是劉少奇的代名詞，這種安排是一種政治上的考察。周恩來處理清華的「用心」就是對毛澤東的忠誠，二者是可以劃等號的。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周恩來對劉少奇的態度是同自己的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而導致毛澤東決定寫大字報的主要誘因是8月4日毛同劉少奇的激烈爭論。毛澤東指責劉少奇的罪狀之一就是：「新市委鎮壓學生群眾，為什麼不能反對！我是沒有下去蹲點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鎮壓學生的主要材料之一就是蒯大富遭到打擊。

8月1日凌晨和晚上，周恩來分別找蒯大富談話。蒯大富向周恩來詳細論述了清華的情況，主要就是告了工作組的狀。蒯大富回憶說周恩來在聽取匯報時不讓一起來的賀鵬飛進來，而賀鵬飛之所以要進來就是「怕我(指蒯大富)告工作組的狀」。蒯大富在接受田炳信採訪時表示：「你們注意啊，這天是1966年的7月31日。8月5日，毛主席《我的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就出來了，給劉少奇以致命的打擊。所以我想起來啊，有點對不起劉少奇。」蒯大富的告狀，為毛澤東的大字報提供了炮彈，也成了毛整劉的利器，而穿針引線的則是周恩來。

同時，周恩來找王光美談話，叫王光美準備去清華大學工作組參加總結和檢查。周恩來告訴王光美：「你檢查時不要牽連別人。」王光美後來說：意思是不要牽連少奇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然而王光美在清華就是代表劉少奇，王光美做檢討，怎麼可能不牽涉到劉少奇？據知情人講，在劉少奇的追悼會上，王光美連鄧穎超的手都沒有握，很是尷尬。

8月5日毛寫了大字報之後，並沒有立即公佈。但是周恩來是第一個看到大字報的黨的高級領導人，也是毛與之商討的唯一的一位。同日，周恩來按照毛的旨意打電話給劉，要劉不要再見外國人，也不要再公開露面。毛澤東把底透給了周恩來。據當年參加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廖漢生回憶：「一天晚上十二點，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旁邊的一個廳裡召集軍隊各總部負責人，海、空軍負責人開會，北京軍區楊勇和我也出席了，我當時是八屆候補中央委員，這次會是打招呼會。周總理說：『毛主席下了決心，寫了《我的一張字報》，晚上

把我叫去，交給我，讓我向大會傳達，後又收回去了。第二天晚上又把我找去，再把《我的一張大字報》交給我。現在毛主席已下了決心，要改組政治局常委。』打招呼會散了，周總理又向各省、市第一把手打招呼。」可見此時的周恩來遠比林彪重要的多。事實上，根據張愛萍在討論《歷史決議》時的談話，毛澤東早就寫好此大字報，當時並沒有拿出來。根據歷史的發展則表明，毛是同周恩來商討之後才決定拿出來，並且由周恩來出面做先行工作。

關於毛澤東何時寫大字報是可以進一步討論的，但是無論那種情況，周恩來都起到了其他中共高級領導人包括林彪在內所不能比擬的作用。這從中也折射出周恩來地位的升遷，自然是大力支持毛澤東發動文革之後獲得的豐厚回報之一。

就在5日晚上，周恩來約各元帥（包括賀龍）談話，談了三個多小時。周恩來此舉，明顯是在向各元帥交底，實際上就是先行為毛的大字報做工作，打預防針。吳法憲回憶到：1966年8月8日（據筆者考證實為6日）周恩來親自向軍隊主要領導人打招呼，傳達毛澤東的「大字報」精神。與會者除吳法憲外，還有楊成武、張愛萍、肖華、許光達、肖勁光、蘇振華等人。周恩來將毛的「大字報」向眾人連續念了兩遍，並說「現在看來，多年的事實證明，劉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來想培養劉少奇當接班人，現在看來不行了，他辜負了毛主席的希望。現在中央決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劉少奇，擔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現在先通知你們一下，暫時不要再往下傳，就你們知道就行了。」周恩來向各位元帥交底只會比同吳法憲等人交的更深。

根據上述資料表明，實際上毛寫完大字報後，告訴了周。但是在向大會傳達之前，需要預先做好工作。此工作是由周恩來完成的，主要是兩個方面。周恩來先在5日晚做元帥的工作，繼而在6日做了更多軍隊高級將領的工作，然後是各省市一把手的工作。從中也看出毛澤東的倚重力量是軍隊。

如前述，文革的打擊對象不僅是劉少奇，而且有周恩來。原「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和組員王力回憶，中央不少人在毛髮動「文革」前就已經知道矛頭所指是劉少奇，這包括周恩來。中共的黨內鬥爭就是如此，你自己檢討還不行，你要揭發別人，你要對別人落井下石，你才能過關。此時，周恩來就處在這麼一個關頭。

周恩來在8月5日和22日兩次在清華大學講話。周在講話中明確承認派工作組是犯了方向性的錯誤。錯在不搞斗批改，而是挑動群眾斗群眾。周恩來講：「對蒯大富、劉泉同志的案件，我是主張解放的，平反的。」

對於工作組問題，周恩來說：「毛主席看了你們的《兩論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很稱讚你們的革命勇氣和革命首創精神。同學們，他們有大無畏的精神！把鬥爭的主要矛頭對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指向阻礙革命運動的工作組，有什麼不可以？如果工作組阻礙運動的發展，壓制群眾運動，甚至鎮壓群眾，那就有權利把他們趕走。學校革命的主人，很清楚，是革命的學生，教職員工。而工作組來了，如果起個戰士的作用，那還許可，可是我們在工作組派來後，又加了一些限制，生怕群眾運動搞亂了！」

周恩來同時強調：「我這次來清華是老老實實做學生的，來學習的，也是來煽風點火，煽社會主義的風，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火。」22日，周恩來再次講：「我上次說，我是來煽風點火的，是煽社會主義之風，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火。現在已經把火點起來了，就應該由你們自己來解決自己的問題。我相信這個火會很快地在全國點起來。那麼今天來到北京的西安的、蘭州的、南京的、長春的、哈爾濱的、天津的、上海的、貴州的等等各地的許多同學，都把這個火接回去了，所以相信他們也能和你們一樣，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

九、實際主持八屆十一中全會

八屆十一中全會實際上是周恩來主持的。王力回憶說：「到八屆十一中全會前夕，毛主

席下決心換接班人。那時林彪不在北京，日常工作就由總理主持。從這個時候起，中央批文件就是總理批了，沒有少奇同志了。把少奇同志換下來，是全會前夕就定了的，選舉只是個形式。全會公報是早就寫好的。公報初稿是總理批的。」從中可以看出，周恩來是實際上會議的組織者。實際上，沒有周恩來的鼎力相助，這次全會是開不起來了。

全會公報說：「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然而，根據《周恩來年譜》記載：周恩來在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對林彪提出的「頂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等類言辭，我曾同毛主席談過，也同林彪交換過意見，用詞應當力求科學、準確、恰當。此公報除了大力吹捧毛澤東之外，還大力吹捧了林彪：「全會認為，林彪同志號召人民解放軍在全軍展開學習毛澤東同志著作的群眾運動，為全黨全國樹立了光輝的榜樣。用毛澤東思想武裝工農兵群眾、革命知識分子和廣大幹部，進一步促進人的思想革命化，是防止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使我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取得勝利的最可靠、最根本的保證。對毛澤東同志著作，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普遍適用的，應當進一步在全黨全國推廣。」

王力在回憶時講：「公報初稿是總理批的，我當時的印象很深：第一個為何送審傳閱的名單上沒有劉少奇；第二主席後邊即是林彪；第三初稿上寫上了劉少奇的一段話，給勾了。」林彪作為接班人的地位呼之欲出。

1966年8月1日，宣告文革全面發動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開幕，但是林彪還像往常一樣請了病假呆在大連。毛澤東決定讓林彪取代劉少奇，讓汪東興幾次打電話催林彪馬上回北京，並讓周恩來安排專機。但是林彪知道，「虎背」是不能「騎」上去，騎上去就下不來了，推辭再三，而且正式寫了請假的書面報告。8月4日下午，毛澤東同劉少奇發生激烈爭吵。當天，毛澤東再次讓秘書打電話給林彪，林彪還是推卻身體不好，不能出席。據說從全會一開始，接林彪進京的專機就一直停在大連，但是林彪就是不上機。毛澤東大怒，你林彪不來，不配合，停會，林彪什麼時候來，什麼時候復會。

這個時候周恩來再一次出面勸說。周恩來打電話給林彪，我現在處境很困難，你不來，我就更不好辦。文革之初，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陳伯達認為自己並無這個能力，於是推脫。周恩來找陳伯達談話，陳伯達推薦康生，康生既有原來在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工作經驗，也有這個能力，更有在延安整風的領導經驗，但是康生卻不能做「劉盆子」。陳伯達推辭多次，但是周恩來最後說：「你還是共產黨員，難道中央不能安排你的工作嘛？」同樣，林彪出於「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不得不來。

林彪的威望在當時確實很高。樹立林彪為接班人，不僅是毛澤東發動文革時的權宜之計，同時也迎合了當時大多數人的意見。陳雲在建國之初就同高崗談起並提出林彪是毛澤東最合適的接班人，鄧力群更是回憶說自建國後就認為劉少奇不如林彪，到文革前林彪當接班人更是大多數人的共識。

然而林彪接替劉少奇在黨內的職務的提名，卻是由周恩來揣摩毛澤東的旨意而提出。周恩來在1967年秋天告訴吳法憲，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矛頭對準劉少奇。毛澤東問周恩來「看來劉少奇不行了，我對他觀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對鄧小平也觀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要把劉少奇拿下來，現在怎麼辦？」，周恩來回答說「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劉少奇最合適。」毛說「好，那就把林彪接來北京吧。」1966年8月5日晚吳法憲接到周恩來電話指示，第二天上午派專機去大連接林彪回京。周還特別交代說「要絕對保密。這件事，只准你一個人知道，不能告訴任何人。」當接林彪的專機抵達機場飛機滑行到機場在跑道一頭停下時，周恩來立即登機面見林彪，汪東興代表毛澤東也趕到機場。三人在機艙內部談了三十多分鐘。但是林彪出來的時

候，臉色陰沉，吳法憲本來想上前說幾句，但是卻嚇跑了。而根據當時參加討論《歷史決議》的劉瀾濤的發言，毛澤東當時確實沒有提及鄧小平。劉瀾濤說：

記得有一次在杭州開會時，接北京電話，說羅瑞卿同志跳樓重傷，我們聽了心情非常沉重，毛澤東同志不問長短，毫不動容，就宣佈繼續開會，當時我深感寒心。到八月，八屆十一中全會首先炮打劉少奇同志，毛主席親自說，我對少奇同志觀察了21年，現在完全失望了。請周恩來告林彪（當時在旅大）盡快來京。

原來，當毛澤東在8月4日下午和劉少奇當面翻臉之後，決定換馬。周恩來對毛澤東提攜林彪的想法心領神會，積極推薦林彪成為黨內排名第二的領導人。根據吳法憲的回憶錄，當時的副主席名單是林周二人，但是周恩來把自己的名字勾掉，以突出林彪的副統帥和接班人地位。亦有資料說是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周恩來代替鄧小平接見兄弟黨時表示，接見時用政治局常委的名義而不用中央副主席的名義。在以後的文革歲月裡，周恩來多次公開自豪地提及這件事，說林彪「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緊的，我推薦他為副統帥」。

但是林彪知道接班人是「燙手山藥」，極其免強為難。但是當毛澤東對林彪說：「你現在身份不一樣了，應該有個登台演說才好啊！」實際上林彪知道這是毛澤東要他表態，攻擊劉少奇等，林彪以不明就裡為由推辭不幹。周恩來表示可以找別人代寫。於是周恩來找雷英夫談話，要其為林彪準備講稿。

八屆十一中全會的一大突出特點就是除了吹捧毛之外，還吹捧了林。據知情人告之，是周恩來出面向全會提議林彪為接班人，並當場表示：（林彪）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舉得最高，最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一貫忠於毛主席，跟毛主席最緊、跟得最好。」周恩來還表示：「我們黨，毛主席是最高統帥，林彪同志是副帥。今後的一切大政方針，都要由主席和林彪同志來決定，其他人都是做具體工作的。」此類的話，周恩來在文革中多次重複。

八屆十一中全會正式確認了文革的左傾指導方針，使其合法化，而且從組織上得到了保證。毛澤東在閉幕會上說：「（這次）可能比過去好一些，因為過去沒有這樣公開的決定，並且這次有組織的保證。這回組織有些改變，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書記處書記、常委的調整，就保證了中央這個決議以及公報的實行。」會後，大多數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相繼遭到誣陷和迫害，中央文革小組掌握了中央很大一部分權力，中共中央對於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完全失去了抵制和糾正的能力。

十、林彪誣陷劉少奇的真相

在1980年的「兩案」審判中，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指控「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誣陷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時稱：「一九六六年八月劉少奇仍但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並重新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的時候，林彪就指使葉群於八月十一日、十二日兩次找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作戰部副部長雷英夫，指使雷英夫寫誣陷材料。八月十三日，林彪看了雷英夫寫的誣陷材料。八月十四日，林彪在他的住處告訴雷英夫，用給林彪和毛澤東主席寫信的形式，附上誣陷材料，由他批轉毛澤東主席，並說『這樣更政治化些』。當天，林彪就把雷英夫寫的信和誣陷劉少奇的材料批送給江青『酌轉』毛澤東主席」。特別法庭判決書亦確認：「一九六六年八月，林彪讓葉群把他們捏造的誣陷劉少奇的材料口授給總參謀部作戰部副部長雷英夫，指使雷英夫寫了誣陷劉少奇的材料」。

此材料主要指責劉少奇（1）大家應該學習王光美的經驗，不應該學習毛主席的指示；（2）自以為可以和主席「平起平坐」，可以當最高領袖；（3）在歷史上也犯過很多方向性的嚴重錯誤；（4）在組織路線方面也有很多錯誤；（5）思想作風惡劣；（6）攻擊養病的老同志。

眾所周知，自1962年以後，林彪基本上閉門不出，怎麼會有揭發劉少奇的材料？葉群又是如何才能口授？事實上證明，林彪除了按照毛澤東的意思收集或者轉送其手下將領對羅瑞卿等人的揭發材料之外，自己從未寫過或者讓葉群口述過對於被打倒的中共高級領導人的揭發材料。而且雷送劉少奇的材料是在8月14日，為什麼相距不到半個月，又因「8?25事件」被林彪下令撤職查辦呢？余汝信先生認為：讓劉少奇靠邊站，是毛澤東本人的「戰略部署」。在雷英夫材料的上報過程中，林彪只不過扮演了一位中間人的角色。林彪將雷的材料送到毛處之時，八屆十一中全會已經結束，劉的靠邊站已屬必然，雷的材料對此過程並不會起到什麼大的作用，更多的只是成為林的一種政治表態。而「8?25事件」突然發生，林彪一旦要在楊成武與王尚榮、雷英夫之間作出抉擇，他無理由不支持前者而支持後者，不管他雷英夫是否在十多天前還有「功勞」。

「四人幫」倒台之後，雷英夫到處向人訴苦，當年的那份報告是被別人逼出來的。

1981年春，雷英夫經總政批准解除隔離。夏天，雷在青島療養後回京路過濟南時，有人請他吃飯，雷說：「我是受冤枉的，軍委要派人給我平反，我揭發劉少奇是周總理叫我揭發的」。還說：「現在院裡將取消教育長，訓練部設部長，回去要我當訓練部長。」雷英夫還說：（當初的那個報告）毛主席批准了，總理和葉（劍英）副主席也知道。」

真相大白。以雷英夫的身份，既不是中央委員，當時八屆十一中全會的結果尚未透露，雷何來如此大膽，何來如此知情？背後有周恩來這顆大樹，自然知曉一切。

從以上討論可以看出，周恩來對於文革的發動並非完全不知情。當然，毛也不會讓他完全知情；他對毛主席發動這場「革命」的深層想法有可能不完全清楚，所以他要時時處處揣摩毛的意思；對「文化大革命」有可能缺乏某些思想準備，但周肯定不是被動地捲入這場運動之中的，他是利用各種機會不斷地積極地向毛澤東表態，全力支持毛發動文化大革命。這種支持這種努力充分體現在號召「保持晚節」、做老幹部的思想工作以及對新生事物的支持（紅衛兵、中央文革小組以及後來的造反派等）上。但是周恩來的地位並不是穩固的，而是處於隨時可倒的狀態，直到陶鑄倒台才站穩了腳。周恩來在這段時期是毛澤東發動文革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也是不可或缺的文革依賴支柱之一。

第一部分 第四章

天下大亂：成為真正的「總管家」

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劉少奇儘管還是政治局常委，實際上已經被排出權力核心之外。周恩來的黨內排名沒變，但實際權力有所增加。不過這並不表明周恩來的地位完全鞏固。根據毛澤東的「層層剝筍」政策，在剝掉了劉少奇之後，下一層會是誰？周恩來會在下一層被剝去的可能性並不是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浪潮，隨時有可能將周卷下台。這一點可以從周和中央文革小組的關係、從陶鑄的起伏過程中看出端倪。

一：周恩來的困境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所謂「綱領性文件」——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通知》，是由周恩來向毛澤東提議：「並擬按此方針，起草一個中央通知，送主席審閱。」然後由鄧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成立以陳伯達為首的起草小組，按毛澤東提出的「文化大革命」方針起草，再由毛澤東親自修改的，其中的重要內容全是毛澤東親筆寫成。

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一書可知，毛澤東在反覆修改這一文件中，曾先後將文件稿批給江青、周恩來、鄧小平、彭真、康生等，卻從未批給林彪。在劉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這個文件時，是全體到會者都毫無異議地表示同意的。

但是周恩來畢竟不是毛澤東線上或者稱之為「毛派」的人，文革，就是要清算一線的錯誤，清算建國以來17年的問題，周恩來也是被清算之列。

在毛澤東文革初期的人事佈局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種苗頭：分化劉少奇、周恩來，打倒劉少奇之後，周恩來則是下一個被打倒目標。正如陳毅在文革初期一針見血：「說什麼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和舊政權的矛盾，說到底，『文革』第一要打倒劉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來。」陸定一在討論《歷史決議》時也指出毛澤東是要把劉少奇和周恩來都打算解決的。而周恩來對此也並不是沒有思想準備。文革伊始，周恩來就在門廳前面準備了一個小包，裡面裝著簡單的洗漱用具，準備隨時被抓走，到時候只需提上這隻小包。

王保春和王文耀（二人均為陳伯達的秘書）回憶：八屆十一中全會後，鄧穎超親自寫信給劉叔宴（陳伯達的夫人）並登門拜訪，原因則是周恩來受到毛澤東的批評，而且批的很重。於是鄧就求救於自己的老部下，希望劉能促使陳伯達從中調和。在毛澤東批周之後，許多應該由國務院處理的行政文件，國務院各部的生產、業務報告，都經中央辦公廳轉到陳伯達辦公室。陳伯達不同意這樣做：「怎麼能這樣？這些文件不能接，要由總理處理。」陳伯達的政治預見能力可見一般。

作為替代，毛澤東準備安排鄧小平接替劉少奇負責黨務系統，並且兼管中央專案組；啟用陶鑄接手周恩來的政務系統；林彪則作為黨的二把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時主持軍隊事務。

按照毛澤東的意見，經中央同意，陶鑄除分管中宣部外，還分管中組部、教育部、文化部、衛生部、體委、新華社、人民日報、出版局、廣播事業局等，還參加中央軍委的領導工作（筆者註：關於陶鑄參加軍委工作，並不確實）。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進一步把陶鑄提拔為中共第四號人物，可見毛澤東對其是寄予厚望托付重任的。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原按毛澤東意圖中央工作由林彪主持，但是林僅主持過幾次會後就不再管（二個星期左右），中央日常工作才由周恩來再次負責。

1966年9月5日，由周恩來修改由中央碰頭會討論過的《關於黨政幹部任免審批手續的暫行規定》，並報送毛澤東審閱。《規定》提出：中央局書記，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第二書記，省長，中央各部部长、第一副部長或常務副部長，國務院辦公室主任或第一副主任、委員會主任，部長或第一副部長、黨組（委）書記或副書記的任免，由中央常委會直接審定，或由常委碰頭會議提出報毛澤東、林彪審批；黨和政府系統的司局級幹部，由常委碰頭會提出，指定常委陶鑄審批；大軍區、軍兵種和三總部軍政一二把手的任免。都要呈報毛澤東和中央。周恩來的名字全然不見其中，可見毛澤東要重用的人當中，周恩來已經不在其列或者實際權力大為縮減。

從鄧小平的分工，以及陶鑄所分管的部，以及此《幹部任免通知》所規定，周恩來基本上已經被架空。如果不是林彪抽身而退，周恩來就只有一個外交部可以主管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文革小組成立以後，就成為毛澤東手中強大的利器，周恩來對於中央文革小組是非常重視和合作的，但是二者之間並不是沒有衝突。

在1966年9月18日至20日之間，張春橋主持，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參加的「北京大專院校部分師生座談會」在京召開。蒯大富、譚厚蘭、韓愛晶等二十多人參加。蒯大富、王大賓說：文革中存在一條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指責周恩來「搞調和」，「把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保了下來」；還提出「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並沒有領導解決這問題」，「懷疑現在是否還有一個暗中與黨中央、毛主席對抗的司令部」。

張春橋把這類發言上報毛澤東，並向江青和陳伯達匯報，反映了有人說周恩來搞折中主義，是八級泥瓦匠。江青在匯報會上說：「小將們講的對，周總理就是搞折中主義，一貫如此。」

隨後在10月份，中央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此次會議主要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解決8、9月間主持中央工作的領導人周恩來和陶鑄以及各省市領導人的問題。

10月31日，7千多人在北京體育館集會紀念魯迅逝世30週年，姚文元在會上作了題為《紀念魯迅革命到底》的講話。姚文元說：「他多次批判過『唯無是非觀』，主張革命的戰士應當旗幟鮮明，有分明的是非和熱烈的好惡。他最憎惡那些貌似『公正』而實際上站在舊勢力一邊的『正人君子』們。他曾經這樣淋漓盡致地刻劃過這類『正人君子』的醜態：『雖然是狗，又很像貓，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狀可掬，悠悠然擺出別個無不偏激，惟獨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臉來』。他在《中國文壇上的鬼魅》一文中，無情地勾出了那種自稱『決非左翼，但又不是右翼，超然於左右之外的人物』的醜惡鬼臉，指出『蒙蔽是不能長久的』。這真是對於今天某些自命『超然』『公允』的現代修正主義者絕妙的畫像。」

《紅旗》雜誌在同日的社論中亦指責：「在兩軍對壘中那種貌似『公允』、『公正』的『和事佬』，那種所謂『不偏不倚』的『騎牆派』，『調和』、『折中』就是混淆黑白，為虎作倀。在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中，搞折中主義，實際上就是站到敵人一邊。」「那些標榜走中間道路的人，必然劃到修正主義的泥坑。」「在這兩條路線的鬥爭中，進行調和、折中，這實際上就是維護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反對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然而實際上的周恩來並不是如此右，中央文革小組也不是一直左。自從周恩來提出陳毅代替他出國未成之後，周對於發動文革是積極響應的，而且為了揣摩毛澤東的想法，表現的比中央文革小組的一些人還要左。更為深層的則是，由於歷史的原因，例如「伍豪事件」、周恩來在蘇區時同毛澤東的關係以及在抗日戰爭時期在武漢的表現，這些就如緊箍咒一般牢牢的套在周恩來的頭上。由此而造成的心理負荷和內心的恐懼恰是周恩來在文革中多次表白要保住晚節、緊跟毛走的重要內在原因。由此周恩來必需表現的比別人更「革命」，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表示自己是永遠跟著毛主席走的人。這也是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只有這樣，周恩來才能夠給自己寬心。這也是解釋周恩來對待孫維世等關係密切的人包括自己的親屬的「大義滅親」。而這種「大義滅親」能體現自己是革命的最有力的行動之一。除此之外，周恩來對於曾經跟隨他長期工作的下屬或者同僚也是絲毫不仁慈，例如潘梓年等人。同時也就解釋了周恩來為什麼會對中央所定性的壞人加以毫不留情的迫害或者對他們所受到的慘無人道的待遇熟視無睹。

1966年6月份，周恩來指示幹部要引火上身。隨後不久，毛澤東提議所有幹部都要在運動中表演一下。於是在李富春主持的、陶鑄抓的、副總理和各口負責人都參加的會上，搞出一個「司局級以上幹部都要燒一燒」的會議紀要。周恩來閱後，批示到：「我看這個文件很好，請文革小組同志閱後送主席。」關鋒在此文件上批：「我看這個文件不好」。王力說：「我是不同意提出幹部都火燒的。」張春橋、姚文元、關鋒、戚本禹和王力五人聯名對此文件表示了異議。毛澤東批示此件不發，退文革小組。周恩來在指導外交部的造反派運動時，一再指示矛頭要向上，但是這矛頭確是不能對準陳毅、周恩來的。

中央文革倒周的行動，完全是來自毛澤東的授意，如果毛澤東不點頭，無人敢對周恩來做出實際行動甚至動這個念頭。後來把周恩來贊同文革的發動說成是說了違心的話，同中央文革小組作了堅決的鬥爭，抵制了文革的發動等都是站不住腳的。周恩來同中央文革小組的關係完全是即鬥爭又聯合，作為毛澤東的左右手，共同把文革發動起來並推向高潮。

周恩來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是幸運的，因為鄧小平出局、陶鑄倒台而站穩了腳，隨之而來的天下大亂更是讓毛離不開周。但是「九大」以後，林彪又自己跳了出來，所以周恩來才得以繼續留在政治舞台上。以後毛針對周恩來的一系列行動還沒有開花結果，周恩來就離

開人世，自己在生前終於沒有被打倒。這可以說是幸運的。但是如果離開周恩來，毛澤東的文革能發動起來嗎？

周恩來對於文革的發動，並不是不知情，而是對於毛澤東的部署率先帶頭表示支持，堅決支持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由於周恩來自身的地位，「晚節不忠，一筆勾銷」的觀點，對於為數不少的幹部無疑敲響了警鐘，只有順從毛澤東的旨意，不可違背，從而為「文化大革命」的發動消除了重大阻力。即使如此，針對周恩來的打倒行動，時起時伏，周恩來後來說：文革讓他少活十年！這是大實話。

從以上史實也可以看出，毛澤東出于實用的目的，對周恩來在文革發動的戰略中的配合給以了充分的信任，包括與之商討《我的一張大字報》和實際主持八屆十一中全會和商討決定政治局常委名單等事情，但是隨之毛澤東對周恩來的想法有過短暫的起伏。可是這種起伏隨著時局的變化很快就消失，等到毛澤東重新想整肅周恩來則是「九大」之後的事情了。

二、因林、鄧的矛盾而避過鋒芒

從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人事佈局中可以看出用林彪、鄧小平、陶鑄「三駕馬車」代替劉少奇和周恩來的苗頭。文革開始以後，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態度是鮮明的。儘管鄧小平在大躍進失敗以後和毛澤東有些疏遠，而劉少奇越走越近，以至於在派工作組的問題上和劉少奇來站到了一起，但是毛澤東始終是將劉、鄧是分開的。在改組中央領導機構的醞釀過程中，經毛澤東親自審定的政治局常委排列次序，鄧小平的位置比文革發動前提升了。按照王力和陳伯達的回憶以及《周恩來年譜》中的記載，陶鑄是從下面被毛澤東「勾」上來的，也就是說本來鄧小平的排名比後來的高。而鄧小平在這次改選中，是全票當選。

作為中發〔66〕267號附件二的大事記和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看出，前者隱晦了鄧小平在《二月提綱》中的責任，後者還表揚了鄧。鄧小平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還分管中聯部、中調部等，其中更重要的是鄧繼續擔任「彭、羅、陸、楊專案審查委員會」主任，而原來這個一開始是周恩來負責的。所有這一切表明，毛澤東是要留下鄧小平並且是委以重任的。

然而，由於林彪所持的與鄧小平「勢不兩立」的態度，由於鄧小平在林彪、江青的咄咄逼人的攻勢之下採取的「避其鋒芒」的態度，又由於鄧小平對劉少奇未能「反戈一擊」的態度，使毛澤東的這個初衷未能實現。這也就是毛澤東常說的「形勢比人強」、「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的政治局擴大會上，本來是要批劉少奇的，而林彪和江青卻認為主要的危險不是劉，劉已經被「一張大字報」打倒，現在主要危險是鄧。林彪批判鄧小平同自己爭戰功，把鄧小平同彭真、吳晗和北京市委問題等捆綁相連，指責鄧小平和吳晗打的是「政治撲克」，是敵我矛盾。除了林彪之外，謝富治等也指責了鄧小平。不為人所知的是，周恩來也指責了鄧。根據孫萬國先生的採訪，一位國內黨史專家說，在文革之初，周恩來不僅攻擊了鄧小平，而且在鄧小平倒台一事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在文革結束，鄧小平在非常小的圈子裡對於周恩來是非常刻薄、批評有加的。

毛澤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專門找鄧小平談了一次話，要他和林彪搞好關係，配合他在人事上的安排和佈局。據說鄧與十帥中的九帥關係都很好，唯獨從不與林來往。鄧小平回憶說：「文革開始的時候，主席找我談話，讓我和林彪搞好關係，我答應了，但與林彪談了一次就談崩了。」可以這麼說，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毛澤東要鄧小平「跟林彪搞好關係」，林彪、鄧小平共處為其最重要的佈局。王力說，但是林彪把鄧批成那個樣子，兩人就無法共事了。鄧對康生說，因為把我提成敵我矛盾，我沒法工作了，常委分配我的工作，由康老管吧！

8月份，鄧小平還在人民大學等地方公開講話，指導文革。10月份的中共中央會議開始，鄧小平還做了關於文革開展以來形勢的報告。但是經毛澤東審定的陳伯達講話稿公開將劉、鄧並提作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加以批判。陳伯達的講話在中央工作會議一結束就在全國各地廣泛流傳開來。鑒於這種形勢，毛澤東不得不讓鄧小平檢討。

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劉少奇負責的黨務工作由周恩來暫時擔當。其後林彪曾短暫地主持過中央工作，以後因為身體原因或者其他原因，不再主持，最終由周恩來負責黨、政兩方面的事務。中央工作會議之後，在眾多人包括周恩來指責鄧的局面下，鄧小平顯然無法繼續工作。陶鑄也無法很快接手周恩來這兩個攤子的，於是周恩來也就不可能很快地被排除。毛澤東對於鄧小平則採取了「冷藏」的辦法，以備後用。

三、因陶鑄倒台而不可或缺

文革以前陶鑄就深得毛澤東的信任。毛澤東不喜歡北京的空氣，就四處巡遊。毛澤東最愛去的地方就有柯慶施主管的華東、陶鑄主管的廣東、湖北、李井泉主管的四川等地。代替陸定一的陶鑄為吹捧毛澤東也是不遺餘力的。

陶鑄在調到中央以後的工作，對於文革初期毛澤東的戰略部署是積極響應並支持的，毛澤東也是滿意的，這就有了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升到排名第四的結果。然而，也就是從這時開始，毛澤東開始對陶鑄不滿。

首先，陶鑄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沒有象毛澤東預期的那樣向劉少奇猛烈開火。從陶鑄的角度來看，也許是由於在「高饒事件」中因為反對過劉少奇而犯錯誤的教訓，所以有些躊躇不前。對此，毛澤東當時雖有不滿但尚未計較，仍然重用陶鑄。

8月、9月，中央和國務院的工作主要是周恩來和陶鑄兩人在管，毛澤東後來表示過對兩人這段時間工作的不滿。王力說中央工作會議主要就是批評周恩來和陶鑄的。

9月21日，經陶鑄批准，新華社播發天津市市委第一書記萬曉塘去世，50萬人參加了追悼會的消息。毛澤東批評到：這實際上是向黨示威，這是用死人壓活人。

10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陶鑄的秘書馬恩成回憶：「這次會上我沒有見到陶鑄，在簡報上也沒有看到他發言。會議快結束時，陶的秘書張漢青來看我和薛光軍，並問了我們會議的情況和中南局機關的情況。我問他，為什麼未見陶鑄同志發言？張說：陶鑄最後有一個書面發言，可能交得晚了，來不及印出。對此，我不便再多問，但已感覺到陶鑄可能左右為難，處境不妙。」陶鑄仍然堅持在黨的領導下搞文革，反對在農村工礦企業深化文革，連續搞了幾個社論和指示，所有這些，雖然毛澤東畫了圈，但是正如王力認為：毛澤東內心是不滿意的，這些同毛澤東的文革思維是背道而馳的。

在會議期間，甘肅的胡繼宗（原湖南省委常務書記，陶鑄的下級幹部）提醒陶鑄：伴君如伴虎呀。

這時毛澤東認為陶鑄留在中央已經不合適了，讓他和譚震林到中南和華東地區視察。但是譚震林說工作忙，又受到衝擊，不能成行。毛澤東就讓陶鑄自己一個人下去。但是陶鑄也留在中央不走！這時毛澤東還沒有下定決心要打倒陶鑄。但是隨後來而來的幾件事卻使毛澤東的態度發生了很大改變。

11月10日「安亭事件」發生，張春橋的處理得到了毛澤東的讚許，做出了「先有事實，後有概念」的肯定結論。而陶鑄的態度則是大相逕庭。陶鑄就在王洪文率眾臥軌的前夕，主持討論了「再論抓革命促生產」的人民日報社論。其目的正如陶鑄所說：就是要把他們（上海的潘國平、王洪文等）壓下去，寫這社論把他們壓下去。

11月27日，江青指使關鋒、戚本禹列舉了陶鑄七大罪狀，指責陶鑄實際上仍在執行「劉鄧路線」，更為嚴重的是，此報告斷言陶鑄同毛澤東提倡的「炮打司令部」唱對台戲。

1 1月28日，江青在「檢閱」文藝大軍的大會上說：「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周恩來同志，陳伯達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許多同志，都肯定了我們的成績，給過我們巨大的支持和鼓舞！」而這個講話是經過毛澤東精心修改的。很明顯，陶鑄不再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也不再屬於「無產階級司令部」！

接著，毛澤東決定要陶鑄在1 2月6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檢討，這是毛澤東第一次直接表態要陶鑄檢討，實際上就是批鬥。

1 2月26日，毛澤東在以借過生日為名，實際是向其親信路線交底。毛澤東明確說道：「少數不肯回頭，堅持錯誤，陽奉陰違，耍兩面派的人，一定要被群眾打倒，這極少數人是咎由自取」。毛澤東所引「咎由自取」是陶鑄的原話。對於「不識相」的只能打倒。正如王力所回憶到：這時主席定了開批評陶鑄的生活會。這個會於1 2月底在懷仁堂召開，總理主持，叫「生活會」。這個會就是批評陶鑄、叫陶鑄作檢討的會。這個會上的發言是一邊倒，無產階級革命家也一直批評陶鑄，主要發言是陳伯達。主席定了要開這個會，大家議論是要陳伯達發言。王力的回憶、和曾志的回憶都說在這次生活會是一邊倒地批評陶鑄，只有李富春說要不讓陶鑄回中南算了。王力還回憶了一個細節：毛澤東曾說，希望你們能開個會把陶鑄揪出來才好呢！

1 2月29日，毛澤東最後一次和陶鑄談話，毛澤東再次批評陶鑄：「你怎麼還不下去？」陶鑄不明就裡，以為毛澤東還在保自己。會見以後，立即將談話內容通報了周恩來和林彪。

周恩來當即作出了佈置，說：「過了新年，陶鑄同志就出發。」

林彪則說了「你呀，現在就被動」和「要被動被動再被動」的忠告。

然而這些都為時已晚，因為毛澤東已經決定要打倒陶鑄，只是還在考慮打倒的時間和方式。

1 2月30日，「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隊」不知得到什麼暗示，「突然狂放起來，強迫陶鑄立即接見。」接見中，陶鑄與之發生了正面衝突。

1 967年1月4日，中央文革小組接見了這支造反隊，接見中陳伯達、江青、康生表了態，隨後「打倒陶鑄」的消息傳遍全國。至此，陶鑄在毛澤東的文革人事佈局中被剔除。

周恩來在陶鑄被打倒的事件之中的作用相當微妙，至今很少有人提及。有記錄說，陳伯達、江青宣佈打倒陶鑄的時候，周恩來、王力也在場。王力則表述得較為含糊，說在場的有「陳伯達、康生、江青、我，還有別人。」

周恩來本人的解釋則是：「我們分手後，我去給陳郁（廣東省省長）打電話，回來見他們正接見紅衛兵，我坐下來聽了一會兒，陳伯達、江青、康生他們話已講過了，我沒有聽到。」

早在1 0月18日，周恩來就和陶鑄在一些具體事情上操作不同。當時，預定的是毛澤東第五次接見外地來京師生紅衛兵。但是陶鑄主管的宣傳部在1 7日廢除了1 6日為這次接見擬定的「標語口號」，另發了一個「呼喊口號」。後者刪去了一些過長的文字，如「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首都三司」立即起來造反，提出「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同意了「首都三司」的意見。

在1 2月6日批評陶鑄的會議上，周恩來批評陶鑄講過「懷疑一切」。事實上，周恩來不僅在這次會議上，而且在陶鑄倒台之前、之後都有在公開場合及私下裡對「懷疑一切」的說法表示過不滿。周恩來說：「懷疑一切是不科學的，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懷疑，你們不要什麼都懷疑，照你們這樣說，那就『洪洞縣裡沒有好人』了。懷疑是允許的，但總要有點根據。」周恩來曾經對陳伯達說：「陶鑄這樣講，我就不好開展工作了。」周恩來的意思很明顯，陶鑄的懷疑一切，有火燒到自己頭上的危險。

同樣是在這次會上，周恩來讓陶鑄作了自己的「擋箭牌」。會前，在毛澤東否定了由谷牧等人搞的「十五條」的情況下，谷牧不知情，仍然搞了個匯報提綱。陶鑄知道毛澤東態度，

但是沒有制止。周恩來也知道有這麼一個提綱，也沒有制止，而且周恩來是知道底細的。毛澤東對此十分惱火，決定借此批鬥有關人員，除了谷牧之外，還有周恩來和陶鑄是涉案人員。在這次會議上，陶鑄一個人頂下了所有責任。正如高文謙所述，周恩來在此事上並沒有站出來為此承擔責任，也沒有給陶鑄等人開脫，聽由他頂下全部的責任，相反還注意撇清和其中的干係。

在《工礦十條》下發之後，毛委託林彪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批評陶鑄，林彪說有病推辭不幹，於是周恩來主持。

在1月4日凌晨，周恩來同陶鑄談話。雖然周恩來自己對陶鑄說他自己並沒有聽到陳伯達江青康生的講話，但是根據上文王力的回憶則表明還有「無產階級革命家在場」，而當時的傳單則表明周恩來是在現場。且不論周恩來聽到與否，周恩來是和江等人取得一致意見之後代表中央同陶鑄談話的。作為中央代表同要倒霉的「當事人」談話，周恩來是多次扮演此種角色。曾志的回憶非常清楚的表明，周恩來就是通知陶鑄：你已經被軟禁，不要離開家門一步！。賀龍後來則是「陶鑄翻版」而已。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周恩來在5日的談話，說明周恩來同陶鑄談話之前並沒有同毛澤東商量，也沒有經過黨中央討論，僅是自己根據自己掌握的底牌同陶談話！

陶鑄倒台之後，周恩來曾經如此表白過：「（陳伯達）就注意觀察主席身邊的同志，那些是執行主席路線的。他不僅觀察到劉鄧，而且觀察到陶鑄。所以我們推薦了林彪同志，也推薦了陳伯達同志，是我黨傑出的理論家。富春同志犯了個錯誤，在傳達我的意見時加了一句話說陶鑄也是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的，我怎麼能這樣說陶鑄呢？」

「打倒陶鑄」原本不在毛澤東的文革戰略部署之中，不僅如此，毛澤東原本還打算重用陶鑄。但是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深入，陶鑄同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衝突不斷。陶鑄在某些事情上的做法，不能不使毛澤東認為陶鑄已經成了繼續深入發動文革的「絆腳石」，必須加以整肅。相比之下，周恩來對於「文化大革命」和對於中央文革小組的態度，更能夠讓毛澤東和江青所接受。同時，在林彪、周恩來與陳伯達、江青等人的壓力下，鄧小平不得不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之後出局。這個時候，以陶鑄代替周恩來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毛澤東以林彪、鄧小平、陶鑄的三架馬車代替劉、周系統的打算未能實現。

陶鑄對於「文化大革命」言行、對於中央文革小組的「對抗」態度都令毛澤東日益不滿。相比之下，周恩來對於「文化大革命」則是更順從毛的旨意，對於中央文革小組採取更加「忍讓」的態度。局勢的發展、兩人各自的表現，終於導致了陶鑄的「倒台」和周恩來的「保全」。

陶鑄倒台使周恩來的作用暫時更為重要，地位暫時更為鞏固。周恩來的作用也就更加無人可替。周恩來暫時站住了腳跟。陶鑄實際上給周恩來作了「擋箭牌」，讓周恩來得以繼續留在文革的戰車上。

四、終於成了「總管家」

陶鑄倒台後，周恩來成為名副其實的「總管家」。

周恩來在建國以後，雖然處在中共權力核心之內，但是並不是最主要的核心。除了毛之外，劉少奇也處在周的頭上。1956年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成立，周恩來為首的國務院更是淪為其執行機構。根據《周恩來年譜1949—1976》記載，周恩來在「反『反冒進』」之後更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以1959年—1961年其間為例，周恩來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多達60餘次，而主持國務院全體會議才10次左右。周恩來更是多次致信中共中央書記處，匯報工作情況，而大政方針需要由中央書記處作出。

1959年5月16日，周恩來為瞭解各地鋼鐵、主要是地方生鐵的生產情況和問題，以便給6月中央召開的省市書記會議提供這方面的材料，約各副總理談話，建議在20日

前後，分別出發到九個產鐵的重點地區去視察，6月15日左右回京。次日，周恩來就此事寫信給鄧小平並中共中央書記處，說明「視察的內容，主要是生鐵的質量和數量問題，為此，擬到產鐵、產煤基地，對礦石、煤炭、洗煤、煉焦、耐火材料、煉鐵、煉鋼，設備、運輸、勞動力分配和成本核算等一系列問題做具體瞭解，以求實現中央經濟小組的要求：先保質量，後爭數量。除此以外，對市場供應，農業生產等問題也就近進行一些瞭解」。

1959年11月18日，周恩來批評《人民日報》11月16日在第一版頭條位置發表的1月到10月全國工業生產情況的材料中，報道這十個月工業生產總值比1958年同期增長百分之四十八點九，是嚴重違反中央的規定，政治上和組織上都是錯誤的。周恩來指出：中央早有規定，凡全國性的數字，一定要經過中央批准才能發表。要求接受教訓，避免重犯類似的錯誤，把工作做好。並要吳冷西回去宣佈凡是全國性的數字現在一律不發表，到今年底或明年年初再說。什麼時候公佈、如何公佈都要經過李富春同志和中央書記處。

這種局面一直到1965年下半年之前都沒有什麼大的改觀，反而是彭真的地位的崛起，使得周恩來頭上的「婆婆」更多了。也正如前述，連陸定一都敢不理會周恩來的意見。這一切到了毛澤東開始發動文革之後開始改變。

首先是在清除「彭羅陸楊」之中，周恩來成了毛澤東最得力的助手。緊接著，在文革的正是發動到1966年年底的天下大亂時期，由於林彪的大撒手和陶鑄的出局，周恩來成了毛澤東不可或缺的主要助手。其內含主要有二，其一就是周恩來出色的組織、工作能力，這也是大陸黨史界一直所津津樂道的地方。例如周恩來自紅衛兵運動以來，僅據周恩來的工作臺曆統計，周恩來共接見北京和全國各地來京的紅衛兵及群眾組織代表達一百六十餘次。毛澤東接見八次紅衛兵的壯舉也是周恩來一手組織操作的；其次，文革中最黑暗的一面之一，就是中央專案組為主的迫害各級幹部及普通百姓的行為，而主管中央專案組的正是周恩來。而周恩來在這方面的能力恰恰是官方一直所不予承認甚至羞於提及的。毛澤東發動文革所要清除的「階級敵人」，也是周恩來要執行的任務。縱觀周恩來的這兩方面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周恩來的生存。（此部分請讀者參閱專題部分《周恩來在中央專案組中的作用》一文）

隨著1967年全國全面奪權的展開，周恩來才真正成為具有實際意義上的全國的「總管家」。在這點上，毛澤東是從組織上作出了保證的，那就是由周恩來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代替中央書記處處理各方事務。

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書中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基本事實，他說：「事實上，毛澤東在文革中的不少重要決策，林彪都被蒙在鼓裡，只是在事後才打了招呼，以致林彪對毛的意圖不甚了了，不知文革運動怎麼搞法。見各級領導人像走馬燈似的垮台，而作為『副統帥』的林彪卻對運動的前景茫然無底，處境著實難堪。」楊成武後來也這樣回憶：「林雖是副統帥，但常委碰頭會、軍委、國務院、國防、外交、經貿等等，都是周恩來管，具體事沒給林彪權。」

五、在軍管的過程中大顯身手

自文革興起，一些重要單位如監獄、物資倉庫等自1966年下半年開始實行軍事管制。到了1967年，奪權導致的派系鬥爭以及武鬥，甚至是在1966年的大串聯，諸般等等，導致天下大亂。相比之下，軍隊情況則好的多。此種情況下，軍管則成了能夠維持秩序、保證國家基礎保障供應的唯一辦法。到1969年開「九大」以前，軍管遍及全國，上至國務院各部委下至縣政部門，甚至出現一部分軍隊管制另一部分軍隊的奇特現象。

而各單位的軍管，大部分是周恩來在其主持的文革碰頭會上提出並報毛澤東批准、或者由毛澤東作出具體軍管單位批示後由周恩來而非林彪執行具體操作執行。

以下是公安、鐵路、交通、郵電等系統實行軍管的實例。

1. 公安系統的軍管

周恩來在工人體育場會見外地在京革命造反團體時表示：「我們要像上海工人警告的那樣防止接管風。革命靠自己，每個工廠、單位，都應提高革命造反派，把力量組織起來，監督他們認真抓業務工作，不要讓他們躲在後面，叫我們上當。」

1967年1月17日下午5時，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和北京市公安局革命造反派在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後到公安部報喜。謝富治給以熱烈支持。

當晚，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大專院校及各機關造反派座談會表示：「現在政法公社宣佈市公安局奪權，中央領導和中央文革小組要幫助他們搞好這一工作，這個工作很複雜、繁重。條件成熟的要奪權，不成熟的就監督嘛。」同時周恩來表示：「北京市公安局奪權了。奪權以後有許多問題需要研究，中央文革是會幫助你們研究的。」

1月26日，周恩來同樣對《政法公社》的奪權大為讚賞：「奪權要由聯合到大聯合，以本單位革命造反派為主，外單位援助為輔。自己解放自己。當然也有特殊的，內部力量差，外部力量強，去煽風點火，機會成熟了，不奪又不成，不奪可能被右派奪了，那就奪。比如公安局的奪權，《政法公社》的同志長期蹲在那裡，逐步培養局內的造反派，奪了權。」

而對於這一歷史情況，諸多文章則明顯是混淆事實。例如萬迪宏在《謝富治沉浮錄》一文中如此描述：1966年12月26日，江青在接見合同工、臨時工「造反」組織時，公然鼓勵他們去佔領勞動部、總工會，謝富治立即傲兀。12月31日，他與周恩來在接見北京政法學院的「造反」組織——「政法公社」時，主動「建議」說：「你們是不是可以搞一個試點，把西城公安分局完全包下來，由你們去管。」

當時，周恩來聽後驚得目瞪口呆。他沒想到謝富治竟然會煽動群眾去接管公安機關，自毀長城。於是，他憤怒地對謝富治說：「這是你說的，我不同意！這事你決定不了，我也決定不了。這樣大的事，要經過政治局常委討論，還要請示主席批准才行。」

且不說周恩來根本不會在大庭廣眾之前對謝富治如此否定，顯然作者對此點是毫無背景知識所致，從以上事實來看，周恩來、謝富治等對於公安局軍管一事毫無異議。

余汝信先生則根據檔案材料研究認為：1967年「一月風暴」後，對於公安系統是否能奪權，中央領導層曾持肯定態度，但很快就發現問題接踵而來，難以收拾。如在北京，先是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接管」了北京市公安局，後北京礦業學院「東方紅」提出不能由單一組織接管，引發爭議，雙方大打出手，各不相讓。為不讓對方佔便宜，又各自向中央文革提出，乾脆讓軍隊接管算了。經謝富治請示周恩來，決定軍管，於2月11日由公安部和北京衛戍區司令部聯合發出佈告，稱「奉國務院、中央軍委命令，由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衛戍區司令部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建立軍事管制委員會，任命牟立善同志為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劉傳新、王更印兩同志為副主任，並對市公安局所屬機構一律派出軍事代表，實行軍事管制」。以後，各地公安機關相繼實行軍管。

根據《周恩來年譜》記載：1967年2月8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林彪：對京、津兩市實行軍管，擬先從公安局入手。次日，召集中央碰頭會，討論通過公安部、北京衛戍區聯合發佈的由北京衛戍區司令部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建立軍事管制委員會並對市公安局所屬機構一律實行軍事管制的佈告，佈告經毛澤東批准後於2月11日發出。1967年9月6日周恩來同意公安部黨組提出的由北京衛戍區接管公安部預審局的請示。同月27日，周恩來在第四次接見廣州地區赴京各群眾組織代表時說：公安部門在業務上不能分派別。現在公安機關癱瘓，派別很多，我們必須實行軍管。機場、鐵路、倉庫、碼頭，港口等都要實行軍管，不容許侵犯。

在1967年12月9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討論《關於公安機關實行軍管的決定》等文件。10日，將《關於公安機關實行軍管的決定》報送林彪轉毛澤東審批。此前，在修改該決定時加寫：「各地公、檢、法機關是專政工具之一。現在不少地方公、檢、法機關造反派一方面作為革命群眾組織與地方上革命群眾組織進行串連和聯合行動，另一方面又作為專政機關執行專政職能，這種混淆兩種職能的情況是不利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順利進行的。」「各地公安機關不論由機關內部或外部造反派已經奪權的，仍應實行軍事管制。在軍管實行後，外部造反派應立即退出公安機關，不再到公安機關進行串連，內部造反派應按行政系統接受軍管委員會或軍代表的領導，不許進行內外串連，也不要再參加地方無產階級革命派接系統的大聯合和代表會，而只在內部協助軍管會或軍代表進行革命和業務工作。」

1968年4月1日，公安部領導小組向中央領導、中央文革小組報送關於公安部改組情況的報告。主要內容：一是對公安部進行徹底改組，新的機構已組成，總數126人（以軍隊41名幹部為骨幹），其餘全部人員由解放軍幹部帶領，已於2月7日離開機關到西郊政法干校集中學習，揭發批判；二是深入開展大批判，截至目前止，共挖出叛徒、特務、走資派和有嚴重政治問題的重點分子101人，逮捕22人，群眾看管79人，其中包括7個副部長級幹部。7個副部長級幹部中，徐子榮、汪金祥、凌雲於1967年被逮捕，楊奇清、嚴佑民於1968年3月被逮捕，劉復之、尹肇之被監督勞動；三是指稱羅瑞卿、徐子榮、汪金祥等是「罪大惡極的反革命」，「資敵通敵，裡通外國」，「把黑手伸向無產階級司令部」，要繼續批深批透，批倒斗臭；四是建議由軍隊調來的曾威（軍級）等四人組成審查清理檔案小組，以曾威為組長，再從軍隊中選拔150人，擔負審查清理檔案的任務。翌年1月19日，公安部領導小組向國務院報送《公安部運動情況簡報》，稱公安部機構組織進行了初步改革，將原來的11個廳、局合併為5個辦公室（即政治、行政、偵破、治安、接待辦公室），編製由1200多人減為百人左右。精簡下來的1000多名幹部，春節之後赴東北佳木斯農場，走「五·七指示」的道路。對這兩個報告，周恩來未表示異議，並轉報毛澤東及中央批准。

1968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內務部的軍代表和公安部業務領導小組即聯合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上報《關於撤銷高檢院、內務部、內務辦三個單位，公安部、高法院留下少數人的請示報告》。報告稱，撤銷高檢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其工作終止。高法準備留二三十人（一半為軍隊幹部，一半從原來的幹部中評選）負責審核重大案件。公安部除留下原來的四十幾個科以下幹部外，再加上軍隊幹部共留百人左右。其餘精簡下來的二千四百多名幹部於明年2月春耕前，分別下放到佳木斯（公安部、內務部）、湖北沙市（內務部）、湖北沙洋（高檢、高法、公安部一部分）三個農場。農場的所有制和領導關係都隸屬於當地革命委員會。12月26日，周恩來批示「擬予同意」，毛澤東批示「照辦」。

2. 鐵路、交通系統的軍管

1967年3月，由周恩來提議，旨在著重討論軍隊支援地方春耕生產以及軍隊「三支兩軍」問題的軍以上幹部會議在京召開。

周恩來在3月13日講：「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進入全面階級鬥爭和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進行奪權鬥爭的新階段，奪權鬥爭是由上海推動起來的。奪權鬥爭的發展雖然不算很快，但也不算慢。但是在這個階段中，不少地區（有一半），不少機關和企業事業單位，由於無產階級革命派沒有旗幟鮮明地聯合起來，有的革命組織轉化了，有的兩方都是革命派，但不聯合，甚至爭論不休，發展到武鬥，當權派幹部沒有挺身而出，沒

有檢討自己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錯誤，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劃清界線，這樣就使當地的軍事領導機關無從支持和參加革命的『三結合』奪權，這些單位陷於癱瘓狀態，或者被壞人篡奪了領導權，或邊防、沿海，或交通要道（碼頭、鐵路局、海港），或專政機構，或機密要害部門，或國防企業事業單位，國防工廠，倉庫等單位都應實行軍事管制。」

3月5日，齊齊哈爾鐵路局所屬昂昂溪車站，因引導員、扳道員在工作時間辯論爭執，忘扳道岔，盲目接車，造成383次旅客列車與020次貨物列車側面衝突的重大事故。機車大破一台，貨車損壞八輛，正線中斷行車6小時10分。

鐵路部門上報《齊齊哈爾鐵路局運輸狀況嚴重混亂》的材料說，齊齊哈爾鐵路局管轄線路阻塞現象嚴重，每天都接到全國各地發來大批請求運送物資的告急書。要滿足這些需要，每天必須運出五千一百多個車皮，而目前他們每天只能裝運一千七百至一千八百個。外地運來的物資，每天也有二百多個車皮卸不下來。鐵路局的事故大大增加，到3月15日，已發生行車事故三百二十六起，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五十。這樣短的時間內，事故之多，損失之重，是該局歷史上罕見的。造成這些問題的主要原因是：紀律渙散，不聽指揮；派別多（全局二百多個組織），不但增加了脫產人員，而且經常爭論，影響工作；有些人強調破框框，而把一些必需執行的規章制度隨便破除了；領導幹部「怕」字當頭，放棄領導。3月18日，該局軍代表介入文化大革命，成立了「三結合」的抓生產第一線指揮部，並計劃在各分局也成立指揮部，代替長期癱瘓的領導機構。但全局軍代表只有四十多人，困難仍很大，迫切希望駐軍派更多的幹部去加強領導。

針對如此嚴峻形勢，毛澤東在3月19日對《齊齊哈爾鐵路局運輸狀況嚴重混亂》材料作出批示：「林彪、恩來同志：此件請閱。一切秩序混亂的鐵路局，都應實行軍事管制，迅速恢復正常秩序。一切好的鐵路局，也應派出軍代表，吸取那裡的好經驗，以利推廣。此外，汽車、輪船、港口裝卸，也都要管起來。只管工業，不管交通運輸，是不對的。此事請研究酌處為盼！」

雖然毛澤東的批示是給林、周兩人的，然而具體措施，則是周恩來落實，林彪參與的材料至今未見。

3月21日，周恩來根據毛澤東「一切秩序混亂的鐵路局都應實行軍事管制」的批示，要余秋裡、谷牧立即研究擬出對鐵路、交通、郵電三部及其所屬重點企業實行軍管的決定稿。當晚，周恩來接見鐵道部、交通部、郵電部造反派代表和各部黨組成員，說：請大家來，是要迅速解決鐵道、交通、郵電三個部的工作問題。對三部要實行全面軍管，不能再耽擱了。

次日，周恩來與李富春、李先念等在中南海會議室接見交通、鐵道、郵電三部群眾組織代表共六十多人。周恩來在接見時稱：「機關大聯合都沒有搞好，『三結合』還沒有條件，三個部都不成熟，鐵、交、郵剛由部外轉入部內，鐵道部三十三個組織觀點不一致，兩大派還要談判協商。……」「經我們研究，鐵路、交通、郵電要實行全面軍管。主要物資設備、援外、國防、航空先軍管。一月底，我的意見民航局歸軍隊管。那樣集中，但到真正實行軍管時，有部分人拒絕不幹，鬧了幾天，軍事院校和工廠還是說服了，最初鬧的人多，一天天鬧的人就少了，鬧了四五天沒鬧頭了，最後不鬧了。現在是三月份，不能再耽擱了。原來二月份又等了一個月，剛才大家鼓掌，可能是不會有意見。總之不能再推遲，無論如何第二季度的生產要搞好。鐵路、輪船、碼頭、汽車、港口、運輸公司先搞大的，郵政先搞省會、直轄市，大的港口，至於地方還可根據需要，實行軍事管制。派軍管小組或委員會，由谷牧同志負責。軍管的目的是過渡的辦法，還是要實現大聯合，『三結合』。」

3月28日，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集碰頭會，討論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關於鐵道、交通、郵電部門實行軍管的決定。至1967年5月，鐵路系統大部實行軍管。全國十八個鐵路局，軍管了十個，即齊齊哈爾、吉林、錦州、北京、呼和浩特、柳州、成都、西安、烏魯木齊、昆明鐵路局。五十一個鐵路分局，軍管了二十七個。

但是對鐵道部機關軍管的實施，延至5月中旬方得以落實。5月19日晚，周恩來接見鐵道部臨時業務監督小組（1月29日成立）全體成員和部機關兩派群眾組織——機關革命造反總部和聯絡總站的代表。針對有人提出要砸爛鐵道部業務監督小組，周指出，聯絡總站造業務監督小組的反是錯誤的。周說：你們上網太快了。現在我宣佈鐵道部實行軍管。如果你們再來衝擊，就按軍管處理。

5月31日，周恩來接到國務院聯絡員辦公室報告：鄭州、徐州、蚌埠、金華、宣化等鐵路樞紐站段因兩派武鬥，炸毀機車，停止作業，致使京廣、津浦、隴海、浙贛等四條主要鐵路幹線均處於癱瘓狀態，僅徐州一處就停開貨車六十九列。周恩來當即批示同意濟南軍區68軍黨委常委關於要求對徐州鐵路分局和火車站實行軍管的急電（時陸軍第68軍軍部駐江蘇徐州市，負責徐州地區「三支兩軍」事宜）。中午，周到毛澤東處，說明鐵路輪船關係到全國交通命脈，一旦中斷，國民經濟局勢不可收拾，對鐵路、交通實行軍管的問題不可再拖。毛澤東表示同意。

下午，周恩來召集李富春、李先念、葉劍英、肖華、楊成武、谷牧、余秋裡開會，商定如下對策：（一）盡快公開發佈關於不許中斷鐵路、輪船交通的命令；（二）將全國十八個鐵路管理局分給附近駐軍實行軍管包干，將沿海沿江輪船交給海軍實行軍管包干；（三）參加軍管的軍隊人員均與當地軍分區、武裝部分開，不再介入地方支左工作。以便統一鐵路、輪船運輸的管理，免受干擾；（四）責成總參負責擬定調動部隊的實施計劃，次日拿出方案。會後，周恩來將向毛澤東匯報的情況和會議商定的措施，連同鐵路中斷情況的八份電訊，一併送陳伯達、康生、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並告「擬為此事再發一告鐵路輪船職工書。定稿後再送閱」。

經毛澤東批示「照辦」的《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關於對鐵道部實行軍事管制的決定（試行草案）》於5月31日正式發佈。《決定》共八條，其中第一、四條稱：「一、為了堅決貫徹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徹底搞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認真執行『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保證革命生產雙勝利，根據毛主席關於『軍隊不但要協同地方管農業，對工業也要管』以及『只管工業，不管交通運輸，是不對的』等重要指示，特決定自即日起對鐵道部實行軍事管制，成立軍事管制委員會（以下簡稱軍管會），任命蘇靜為軍管會主任，楊傑、朱互寧為副主任。」「四、軍管會在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的領導下，對部的各項工作實行統一領導。部屬單位無論是否實行軍管的，均受部軍管會的領導；分散在各地的單位，同時受所在地革命委員會或軍區的領導，但有關生產運輸調度業務，必須服從部軍管會的集中指揮。」

6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發出《關於堅決維護鐵路、交通運輸革命秩序的命令》。6月5日，周恩來召集擴大的中央常委碰頭會，討論文件之一，為《對鐵道部實行全面軍事管制的部署（草稿）》。6月12日，國務院、中央軍委決定，對全國鐵路實行全面軍管。

第一部分 第五章

二月逆流：協助毛成功地反擊

陶鑄特殊的倒台方式，使無產階級革命家們感覺到「人人自危」，自然對江青產生怨言。為了緩和這種局面，毛澤東批評了以江青為首的文革派。林彪對江青不滿，林彪為穩定軍隊作出了一些行動。這些都使無產階級革命家們感到了一些鼓舞。加上他們對於「革命已經革

到自己頭上」的不滿和反彈，終於彙集成一股「二月逆流」。對於這種局面，毛澤東採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成功地離間了林彪和其他副總理、老師。因陶鑄倒台而暫時穩住的周恩來，見風使舵，幫助毛遏制了這股「逆流」。於是，中央文革小組在反擊「二月逆流」中一舉取代了書記處，使毛的「文化大革命」繼續向縱深發展。

一、一月奪權

文革在1966年底繼續向縱深處發展。周恩來在12月6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對於文革的發展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周恩來首先表示運動是「方興未艾，主席說不能夠剎車，一個多月後運動必有發展。現在勢不可擋，要因勢利導，要導要疏，不要堵，不要擋。」。繼而周恩來痛打落水狗：「劉鄧路線不僅（筆者認為此處缺了個「是」字）五十天的問題，少奇作為主席的接班人已經二十年了，的確不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影響是很深的。……小平主持書記處十年，沒有盡到應有的責任，也不宣傳主席思想（筆者註：在這裡周恩來已經不再稱劉、鄧為同志。）」

在批判完劉鄧之後，周恩來繼續對原有的部分中央機關點名批評：「中央宣傳部也不宣傳主席思想，宣傳修正主義思想。組織部的安子文在搞黑線，是彭真的黑線，過去的聯絡部搞三和一少，後來經糾正，調查部搞神秘的東西，統戰部不執行主席的路線。中央辦公廳楊尚昆也是搞黑線。工、青、婦也有不少問題（劉寧一、蔡大姐除外）工會問題很多，青年團垮了。黨校、黨報、新華社、廣播電台，都有嚴重的問題，還有農村工作部早就垮了。」

周恩來隨後奩了一堆人的名字：「薄一波和彭真結合在一起，是兩面派。薄一波影響到工交戰線。陳雲的錯誤在財貿系統有影響的，鄧子恢的錯誤，過去有過批判。羅瑞卿在公安部中搞特務作風，影響也很深。謝富治同志是單槍匹馬到公安部去的。羅經常給他出題目，也受到他的干擾。文教戰線有陸定一、周揚、夏衍等統治多年。科學部門也受了他們的影響。外交方面，主席親自抓的，也還有問題。從上面這些情況可以看到劉鄧影響之深之大。」

最後周恩來勸說大家要放棄牴觸情緒，積極投入到文革當中：「我對劉瀾濤說，你當年是怎樣鬧革命的？各地同志說的意見不多，中央部門的同志說了很多意見，說到什麼問題時，幾個部長一轟而起，站起來圍著我，說明大家的牴觸情緒不小。如果我們不搞文化革命，怎麼樣呢？就不能不出修正主義。大家的情緒那末不好，最多是脫褲子，罷了官，有什麼了不起。我當時說，當年打仗，入了虎穴，坐牢，入地獄，死都不怕，現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搞文化革命有什麼可怕？最多是掉點磅，生點病，罷官嘛！大家沒有從整體來考慮搞革命。一定要搞這場革命，不搞怎麼行呢？」「文化大革命的認識不外思想不通，有埋怨情緒，是可以理解的，有話當面說了，把思想搞通就好嘛！但違反組織原則，欺騙中央，那是不允許的，這樣就會變成黑線人物，就會變成反黨。這次會大家老老實實把思想擺出來了，脫褲子，就好嘛！但不能當面這樣，背後一套。那是不行的。」

1966年12月26日，毛澤東說：「我這次搞了個文件——『五一六通知』，廣播了一張大字報，搞了個紅衛兵大串連，大串連使全國革命聯成一片。整個文化大革命的過程都是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較量，現在還在繼續。資產階級在黨內還有一定的市場，還有大批幹部世界觀沒有改造或沒有改造好，這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市場。這些代表人物頑強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利用這個社會基礎，他們本人是黨的各級領導者，在黨內有影響。」同時，毛澤東表示「祝全國全面的內戰乾杯！」

這一切意味著在1967年，社會會更加動盪、衝突更加激烈、涉及範圍更加擴大的新階段。果然，新年一過，黨的第四位領導人陶鑄便被打倒。

1967年1月4—6日，上海發生主要性質為奪權的「一月風暴」，繼而北京的新市委造反派於1月18日也在混亂中發生了奪權。

但是對於奪那些權，毛澤東在1月16日表示：「過去是軍隊打江山，現在是工農自己打江山，軍隊幫助。」「群眾選舉新的幹部，就讓他們選嘛！廠長、書記讓他們去選。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選。」但他對「接管」的內容作了一個重要限制：「接管很好，只管政務，不管業務，事情還是原來的人去搞，我們只管監督。」此話表明，造反派可以奪的只是「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而不是業務工作的領導權。

對此，周恩來也多次明確表示只奪領導權不奪業務權。

但是，毛澤東隨後改變了主意。毛澤東說：「不要分走資派與頑固派反動路線了，奪過來再說。」周恩來隨後傳達了毛澤東的意見：

（一）軍隊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在運動開始時，是不介入的，但實際上已介入了。（如材料送到軍隊去保管，有的幹部去軍隊。）在現在的形勢下，兩條路線的鬥爭非常尖銳的情況下，不能不介入，介入就必須支持左派。

（二）老幹部到現在多數對文化大革命還不理解，多數靠吃老本。過去有功勞，要很好的在這次運動中鍛煉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勞。（這是毛主席引用了《戰國策》上的「觸碧說趙太君」），要堅定站在左派方面，不能合稀泥，堅決支持左派，然後在左派的接管和監督之下搞好工作。

（三）關於奪權。報紙上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頑固分子的權，不是這樣的能不能奪？現在看來不能仔細分，應奪來再說，不能形而上學。否則受限制，奪來後是什麼性質的當權派，在運動後期再判斷。奪權後報國務院同意。

（四）奪權後的老幹部和新奪權的幹部，共同搞好業務，保守國家機密。

周恩來這個傳達核心就是一條：不論什麼權，包括業務權，先奪過來再說。另外關鍵的一條則是：奪權後報國務院同意。

一月奪權之後必然導致權力的重新分配，然而負責審批新成立的權力機構（即後來稱之為革命委員會）則是國務院。這符合毛澤東的本意麼？

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和10月份中央工作會議之後，各省的文革由中央文革主導，但是省市的日常工作還是由周恩來為首的國務院主導、各政治局委員和副總理分片分工負責。

一月奪權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大革命」。隨後而來的則是成立的「新政權」由誰來主導，這是產生「二月逆流」的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之一。

對照同一個時期的中央文革小組的變化，則不難發現毛澤東早已經另有打算。

二、中央文革小組的崛起

在中央文革成立之初，中央曾經有明確規定，這個小組隸屬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用江青的話說：「我們整個中央文革小組就是中央常委的一個秘書班子。也還是哨兵工作、參謀工作，就是提出意見，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中央常委參考。所作的工作就是這麼一點。」

但是，這個秘書班子，卻得到毛澤東額外的賞識。1966年7月18日，毛澤東從武漢回到北京。當天毛澤東只接待了幾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卻讓劉少奇吃了個閉門羹。毛澤東在24日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聯席會上對文革小組大加讚揚：「中央好多部，沒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組卻做了不少好事，名聲很大。」同時，對工作組責罵一通。

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提出了「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目的、重點、依靠力量、方法，還規定各級文革小組是「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權力機構」，「不應當是臨時性的組織，而應當是長期的常設的群眾組織」，「它不但適用於學校、機關，也基本上適用於工礦企業、街道、農村」。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一躍而為政治

局常委。全會不久，江青成為中央文革代理組長，列入中央領導人的行列。

中央文革小組開始有自己的碰頭會，由陳伯達召集。但是中央文革小組內部矛盾重重，毛澤東決定由周恩來主持。

隨著文革的繼續深入，特別是在10月中央工作會議和中央發出《工業十條》和《農村十條》之後，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委幾乎全被衝垮，運動也擴展到工廠和農村。「文化大革命」的領導和進行，主要通過中央幾個領導人以及文革小組成員的接見、講話和中央文件、報刊社論的精神來體現。文革小組的權力也隨之延伸到基層。

中央文革小組已經成為毛澤東發動和繼續深入開展文革的「利器」。

但是周恩來同時還主持中央碰頭會。周恩來在1967年2月2日致信陳伯達、江青並中央文革小組，提議：「（一）今後每星期一、三、五晚十時起在釣魚台召開碰頭會，以文革為主。我參加，討論形勢和政策及有關文件草案。明（三）日，我提議討論初中和小學開學文件、工業生產問題（文件在印發），下一次討論農業。（二）今後每星期二、四、六下午三時半在懷仁堂或國務院會議室召開碰頭會，以常委四同志（周、陳、康、李）為主，副總理（陳、李、譚、謝）和劍英參加。務請中央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參加，分別討論黨政一些業務問題。」4日，毛澤東在信上批：「此件不用，退周。」由於兩者因具體的分工不同，衝突自然難免。合而為一自然是最妙不過。因而毛澤東否決周恩來的提議是意料之中。

上海「一月風暴」奪權開始之後，新華社在1月10日對此發了兩篇熱情洋溢的電訊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發起總攻擊》，另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組織，在〈文匯報〉〈解放日報〉發出〈緊急通告〉》。毛澤東當天就把這兩個電訊稿批給陳伯達及中央文革小組：「（一）此兩件很好；（二）請你們在二三日內，替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起草一個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指出他們的方針、行動是正確的，號召全國黨、政、軍、民學習上海的經驗，一致行動起來。起草好了之後，開一次較大的會通過發表。」

電報起草之後，由周恩來主持通過了此賀電內容。筆者在此特意強調指出的是官方歷史的「裁剪手法」。中央文獻研究室出版的《毛澤東傳：1949—1976》在引用此手稿內容是特意刪掉了「起草好了之後，開一次較大的會通過發表」一句，以造成讀者既然是毛澤東批示給中央文革小組的，那麼賀電內容也是由中央文革小組討論通過的，從而為周恩來撇清。但是根據王力的回憶，此電是由周恩來主持討論通過的。

此賀電內容倒是無甚出奇之處。原本僅是「秘書班子」的中央文革小組卻讓國人驚詫，罕見的排在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署名之後！王力回憶說，在賀電內容通過後，毛澤東到會，說署名要加中央文革小組。對於這個非同小可的舉動，中央文獻研究室出版的《毛澤東傳》承認：把中央文革小組同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並列在一起發電，這是第一次，自然也大大提高了它的地位。

其實這是對中央文革小組工作職能的根本轉換，由一個參謀秘書機構變成一級行政機構，自此，中央文革小組可以向各級黨委或者行政單位下指示了！中央文革小組一躍成為黨政軍最高領導機構之一，經常以中央的名義發號施令，後患無窮。「緊跟毛主席，緊跟黨中央，緊跟中央軍委，緊跟中央文革小組」也成為當時的政治口號，「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成為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代名詞。

周恩來對於毛澤東的心思摸的最透，指示領會的最深，執行的最堅決。

毛澤東指示起草賀電一事是在10日早上5時，在當天周恩來接見學生工人及軍事院校代表時表示：「中央文革小組是毛主席最好的參謀部，軍委是司令部，我們國務院是執行機構（陳伯達同志插話：中央文革不是參謀部，只是個工作機構），我們要以上海為起點作個

榜樣：鐵道學院已經決定到鐵路沿線去宣傳了，別的院校也可以考慮大搞宣傳（筆者註：指的是「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抓住了目前的關鍵問題，保守派以新的形式進行破壞文化大革命—反對經濟主義傾向。）。」

周恩來執行毛澤東關於奪權的指示非常堅決。以至毛澤東說：「這樣不行」。周恩來在1967年2月1日（僅僅幾天的時間！）說：「工交二十三個部門都奪了權，紡織部內部造反派未形成，外部要幫一下。國防口、農林口、文教口參差不齊，發展不平衡，但也奪了。各省市也都在奪。」

1968年2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於各地來電格式的通知，其中要求專電向中央請示，屬於「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可告中央文革小組；屬於行政業務問題，可電告國務院。這是對中央文革小組取代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的一種非正式的確證。《周恩來年譜》如此記載：「（1968年2月16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草擬給各地的電報稿，通知今後來電應按問題性質分別發給有關部門，不要給個人來電。二十五日，囑秘書向各自負責聯繫的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打招呼：今後給中央寫信或發電報，均應按中央二月十六日通知規定執行。」此種記載，非常令人驚訝。既然表明周恩來親自所擬電報稿，但是電報稿內容卻忽略不提，純屬有意而為之！周恩來還親自為此電再次打招呼給各級領導負責人，可見周為此電是十分的重視！然而僅僅因為電稿是抬高突出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地位，《周恩來年譜》的作者們就絲毫不提及其內容。這正如宋永毅先生所評論：剪裁者，有意去存取捨也。它不是完全的憑空偽造，所依的也可說是歷史事實的一部分。只是這些部分事實來自編撰者對歷史整體的一番或許是言不由衷，用心良苦地加工與拼湊。與偽造者的讀者期待一樣，剪裁者也是為了掩蓋歷史的真實，誤導讀者得出與史實完全相反的結論。由此完全可以洞察編纂官史的作者們的用心良苦之處。

在1967年2月5日（筆者註：王力回憶說是3日或者4日，穆欣則回憶說是2月初，筆者考證為5日），毛澤東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周恩來反映：由於一些人被打倒，書記處的一些日常工作沒有人抓。毛澤東回復到：「現在是文革小組代替了書記處。」

三、毛對中央文革小組的批評

中央文革小組成立之後，形如一盤散沙，內部也是矛盾重重。曾經是中央文革小組一員的穆欣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內部充滿錯綜複雜的爭鬥，作為一個共產黨的組織，它是我所見到過的最無政府、最無章法的地方。對此毛澤東十分不滿意。

隨後毛澤東借中央文革小組在2月4日關於「湘江風雷」和「紅旗軍」的批示發火：「為什麼匆忙發出這個指示？也不送給我看」雖然毛澤東認同這個批示的內容。毛澤東繼續批評到：「文革小組沒有民主集中制，怎麼行？」「文革小組沒有經過正式會議做出過決定，各人說各人的。康生說一套，陳伯說一套，江青說一套，對上沒有報告。」

陶鑄是在毛澤東默許下被打倒的，是由江青等在公共場合下公開的。陶鑄的倒台是必然的，但是出局的形式卻是出乎意料。堂堂的一個政治局常委轉眼之間就這樣不可思議地突然被打倒，那麼下一個將會是誰？相對於陶鑄，毛澤東、林彪是暫時無需擔心的。比陶鑄地位更低的人則感到自危，甚至包括周恩來。

陳毅、譚震林、李先念等就曾經來到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家尋求答案。李富春回答說：我也不知道，常委沒有討論。譚震林發牢騷：「這樣一件大事，起碼應該經過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陳伯達有什麼資格公開點陶鑄的名，宣佈陶鑄的『問題』？」「中央文革小組又怎能決定打倒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這不是胡來嗎？」

於是有人提意見，像陶鑄這樣一個政治局常委的倒台，沒有經過中央開會研究，是不合

程式的。此例一開，中央文革就可以隨意宣佈打倒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員，再要打倒其他人就更不在話下。老同志們能不憤怒？但是沒有一個人敢於向毛澤東提出。

對於這些「老傢伙的憤怒」，毛澤東瞭如指掌。

對於中央文革小組，毛澤東是有點恨鐵不成鋼。現在機會來臨，毛澤東借陶鑄事件，趁機敲打下中央文革小組又把它送進「預期的位置」。

在2月6日的常委擴大會上，毛澤東說：你們文化革命小組，毫無政治經驗，毫無軍事經驗。老幹部統統打倒，你們掌權掌得起來？毫無經驗，沒有領導過罷工，沒有指揮過打仗和群眾運動，只是做了些調查研究工作。陳伯達對我不接觸、不談心，就是送一點文件來。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沒有幾個她看得起的人。對幹部要寬大一點。犯了錯誤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頭上來了。你們就不犯錯誤？陶鑄是犯了錯誤，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也沒有同林彪同志、總理打招呼，上脫離，下沒有同幹部群眾商量。對幹部，不要不許革命。徐向前，我保，住到我這裡來。江華、江渭清、楊尚奎、劉俊秀、譚啟龍這些人還是要保吧！

為了表明毛澤東的態度，讓無產階級革命家們能夠「上鉤」，毛澤東特意在2月6日說：「今後，每週到我這裡談一次。在座的，再加上李先念、譚震林、聶榮臻、關鋒、戚本禹，不要另外搞三、四個常委的小組。平常我要多看些材料，一週一次會。日常工作總理多做一些。」此話一是回應周恩來關於碰頭會的提議，最主要的還是給「老傢伙」們壯膽。結果呢，這只證明是毛澤東「虛晃一槍」，給這些人一個「定心丸」：我對你們還是信任的，你們還是有關的資本。

2月10日，毛澤東繼續召集有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葉劍英、江青、王力等參加的常委擴大會，當面批評陳伯達、江青：「你這個陳伯達，你是一個常委打倒另一個常委（指打倒陶鑄）！過去你專門在我和少奇之間投機。我和你相處這麼多年，不牽涉到你個人，你從來不找我。你這個江青，志大才疏，眼高手低！你眼裡只有一個人。打倒陶鑄，別人都沒有事，就是你們兩個人的事！別人要不就是沒有到，要不就是沒有說話，只有陳伯達講了話，江青插了話。」

毛澤東繼續說：「我看現在還同過去一樣，不向我報告，對我實行封鎖，總理除外，總理凡是重大問題都是向我報告的。」

12日，毛澤東繼續批評：「小組成立以來，沒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開會。去年六月以來，代替了書記處，也是獨立王國。罵別人獨立王國，自己獨斷獨行，否認政治局常委存在。」「文化大革命，鬧一二年，總要停頓。現在有打倒一切的風氣。幹部統統打倒，怎麼行？」「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是無政府主義。」「把工人、學生提上來，掌握了權，沒有經驗，幾個月就變了，很不穩定。」「上海公社如果一發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黨、政、軍還要不要？一切都管？」

四、分析「毛澤東批評中央文革小組」

毛在批評中央文革小組的時候，打倒陶鑄的事件是中心話題，附帶延伸了對老幹部的問題。毛澤東以後並沒有為陶鑄平反，這種批評，正如王年一評論：令人啼笑皆非。毛澤東不也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麼？既然打倒錯了，為什麼不推翻這個打倒而讓陶鑄照舊工作呢？」但是卻給還在位的革命家們一個回答：打倒陶鑄本質上沒有錯，但是江青在程序上是搞錯了的，以後就是要搞你們，也會通過組織程序，不會不明不白如陶鑄一般。

再次，就是關於奪權中還要不要黨的問題。

毛澤東在1月講過：反對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批駁了徹底改善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提出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黨的領導還是要的。但是毛澤東傳達奪權要先奪過來再說，這樣就把這話否定了。現在毛澤東又重提還要黨政軍。這也是周恩來在2月

17日聲稱財政部黨組的工作要恢復的重要背景。其實在文革中「黨」的領導的變化非常複雜，《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1982）》中對此有詳細論述。

其次，在10日批評完之後，毛澤東要文革小組開會，批評陳伯達、江青。但是毛澤東卻「欲蓋彌彰」：「陳伯達、江青的問題，只准在這個地方說，在文革小組批評，在別的地方一概不准談。」此話並非僅僅是為保護中央文革小組，以免批評之事流傳於社會，造成對中央文革小組的被動，於文革大局不利。而是要告訴「蠢蠢欲動」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們，批評文革小組是要封鎖的，不想讓你們知道，不給你們造成機會。實際上，這完全是一種把戲。結果，葉劍英同老師們通了氣，李富春同幾位副總理講了。毛澤東要的就是這種效果。火已經點起來了。而譚震林早就對江青不滿，因而在知道毛澤東批評江青的消息後，備受鼓舞。但是「二月逆流」之後而作為通風報信的葉劍英、李富春卻絲毫未損，反而作為正確一方批評幫助犯錯誤的一方。

2月11日在懷仁堂主持中央碰頭會上，葉劍英、徐向前等開始因為文革革到自己頭上表示不滿。葉劍英責問陳伯達：「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幹什麼？」「革命，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徐向前拍著桌子說：「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你們這樣把軍隊亂下去，還要不要這個支柱？難道我們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這類人來指揮軍隊嗎？」看到此種情況，周恩來發現攻擊中央文革要成為會議的主題，於是匆匆地結束了會議，而使老師們未能遂願。「大鬧懷仁堂」於是2月16日才能再次上演。

毛澤東在12日繼續批評了中央文革小組，這不能不說是繼續「引蛇出洞」的高招。12日的批評至關重要，因為2月份的第一次大鬧已經上演。

14日，中央文革小組開會批評陳伯達，江青沒有參加。《毛澤東傳》的作者們承認：這件事，陳毅、譚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很快也知道了。他們對毛澤東嚴厲批評中央文革小組感到極大興奮。

毛澤東為了繼續自己的「引蛇出洞」，公開造輿論。王力在2月14日對《紅旗》雜誌通訊員傳達毛澤東的講話精神：「有的權奪來奪去，倒沒有真正的奪權，有的奪了，並不能很好的鞏固，帶『長』字的都叫靠邊站。有一個單位（是中央的）都是年輕人，一個帶『長字』的都沒有，不能奪權。現在流傳著對司局長稍微靠近一點就叫『保』字派的說法，不從階級分析的觀點出發，而從那一級出發，這樣搞下去，我們要失敗。」「對於軍隊一定要採取正確的態度。相信我們的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手締造的軍隊。這支軍隊在毛主席和林彪主席的領導下，是一支堅強的人民的軍隊。軍隊支持地方可能支持錯了，但鬥爭的鋒芒千萬不能指向軍隊，軍隊中個別人是有錯誤的，但如果因軍隊個人的錯誤而把矛頭指向軍隊，我們就要犯錯誤，就要上當。」「把陶鑄轟了之後，所有的副總理都要轟，甚至連文革小組也要轟，但是就沒有發覺有敵人。」

五、周恩來的反應

周恩來在1月4日凌晨同陶鑄談話。曾志的回憶非常清楚的表明，周恩來就是通知陶鑄：你已經被軟禁，不要離開家門一步！。根據事後毛澤東批評陳伯達、江青來看，周恩來這次談話僅僅是同江青等人商討過而非執行毛澤東的決定。

周恩來對於自己的處境非常瞭解。一月份的混亂局勢，特別是在他傳達了毛澤東的關於「先奪權」之後，局勢只能進一步惡化。對於因為陶鑄非正常倒台方式而引起的老師和副總理們的憤怒，周是瞭如指掌的。特別是一月份「大鬧京西賓館」之後，中央文革和老師「副總理」之間的衝突愈演愈烈。「鬧翻臉」的結果會置自己更加艱難的地步，因為文革實行的是「剝筍」政策。自己曾經親自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傳達過。

因此，周恩來在1967年2月初，親自給幾位老師和副總理寫了一封信，信的內容大意是：運動方興未艾，欲罷不能，大勢所趨，勢不可擋，只能因勢利導，發氣無濟於事。要十分注意你們的言行，謹慎從事，不要說過頭話，不要做過頭事，不要節外生枝，增加「文化大革命」的困難，不要被人抓住把柄，造成被動，要他們「戒慎恐懼」，遇事三思……周恩來囑咐周家鼎親自送給幾位老同志看，一定交給本人，不要轉手，閱後由本人簽字帶回。

周家鼎拿著信先後到過陳毅、賀龍、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余秋裏等同志那裡。這封信簽名回來周恩來看過後，就被銷毀了。

周恩來為什麼要寫這封信？難道是怕引火上身？無論如何，從事後發展來看，周恩來這封信沒有起到「未雨綢繆」的作用，也足以說明這些老師當時也並不是對周恩來「言聽計從」。周恩來對他們起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高文謙在其《晚年周恩來中》說：在二月十六日「大鬧懷仁堂」時，周恩來知道事情鬧得有些「出格」，特別是陳毅的發言和譚震林的拂袖而去，肯定會讓中央文革一千人抓住把柄。他本人作為會議的主持者脫不了干係。所以他採取主動，在會議中間打電話向毛澤東報告了此事。為此毛派汪東興前來聽會，不過等汪趕來時，高潮已經過去。

實際上，散會後，周恩來向汪東興介紹了會議情況。汪東興向毛澤東作了匯報。

然而，中共官方在編撰的有關周恩來的書時，多是故意把此事隱瞞。例如陳揚勇在其《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一書中引用谷牧的回憶：「這一次總理沒有去，三天都沒有去。」來為周恩來開脫，以證明周恩來保護這些老同志。

六、林彪的被動

在1月份發生的「大鬧京西賓館」一事，林彪是站在軍隊高級將領這邊的。事後，林彪痛斥江青。吳法憲在其在回憶錄中有專門一節談及此事。原林辦秘書張雲生在他的回憶《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一書裡也印證了這場林彪與江青的衝突。

1966年底，林彪同意以軍委、總政的名義發電報給各大軍區，提出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受到衝擊時，第一書記可到軍隊來暫住，絕密檔案亦可送到軍隊來保存。加上《軍委八條命令》的出台，所有這些均使幾位老師和副總理受到了鼓舞，並且認為林彪是站在他們這一邊的。

毛澤東此時「火上澆油」，特意同林彪拉開距離。

毛澤東在10日斥責中央文革小組的同時還批評了林彪：「我看現在還同過去一樣，不同我報告，對我實行封鎖。總理除外，總理凡是重大問題都是向我報告的。」王力回憶到，毛澤東是面對林彪講這話的，是在批評林彪。

毛澤東批評林彪，無意中會造成一種林彪也是受壓制的如同老師一般。

其實，林彪對於軍隊有著自己獨立的想法。林彪認為，軍隊應該獨立，不應該摻合地方事務。早在1960底，林彪針對羅榮桓要求軍隊與地方政務掛鉤的觀點給以否定。從歷史的觀點來看，這無疑是正確的。對於「文化大革命」中的支左，這並不符合林彪的本意。毛澤東特意批示到：以後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軍隊支持、援助，都應當這樣做。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應重新發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廢。請酌。

但是在穩定軍隊維護軍隊利益上，林彪和老師們的看法是一致的。這個就決定了林彪不可能置身度外。特別是毛澤東對林彪的批評，使得這些無產階級革命家認為林彪是他們陣營中的一員。林彪審時度勢，並沒有像上次因為「肖華事件」（即1月份的「大鬧京西賓館」）那樣再次大罵江青。

2月16日大鬧懷仁堂是整個「二月逆流」的高潮。譚震林是「二月逆流」的主角之一。餘怒未消的譚震林在17日懷著滿腔忿恨給林彪寫了一封信，痛斥江青「手段毒辣」、「醜化

黨]、「真比武則天還凶」。而譚震林就此而被打倒，而且在以後召開的「九大」會上未能進入中央委員會。這也充分說明了把矛頭對準江青的後果是嚴重的，也證明了筆者所持有的某人同江青的關係會在很大的程度上決定了其政治命運的觀點是正確的，無論是譚震林，林彪還是周恩來。

譚震林的這封信清楚地表明了他對林彪的信任。

其實就在一次大鬧之後，這些無產階級革命家們就在李富春家裡相聚，譚震林就提議應該找林彪，而且認為林彪是和他們是站在同一條戰線上的。譚震林提議：「應該找林彪同志反映情況，爭取他的支持。」

2月17日，林彪收到此信，沉默半晌，表情灰暗，但他還是什麼都不說，而且要求保密。這無疑是在保護譚震林。18日，江青攜帶王力到林彪處談話。19日凌晨毛澤東發了「無產階級震怒」，林彪再也掩蓋不下去。林彪這時候才把信轉給毛澤東。

知情人告之，譚震林寫給林彪的信並不是只給林彪一個人的，而是譚震林一式兩份，抬頭為毛主席、林副主席。並且譚震林給林彪的信是在毛澤東開會決定整肅無產階級革命家之後才交出來，上寫「譚震林最近之思想竟糊塗墮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預料之外」。這個和張雲生的回憶是相吻合的。這個和周恩來在1970年廬山會議上把許世友等人罵張春橋等人的信及時轉給毛澤東形成鮮明的對比（筆者註：詳見后文第八章論述）。

林彪的批語顯然搪塞之詞。毛澤東收到此信後，批示原件退回，顯然是對林彪表示不滿。特別是毛曾經要求江青攜帶王力到林彪處通氣。林彪此種「不作為」顯然不是毛澤東想要的結果。

林彪收到後將原件撕得粉碎，扔在紙簍裡。後來葉群又背著林彪將這些碎紙片撿回，並把它貼在一張白紙上，藏在自己的文件櫃裡。張雲生說這是林彪發洩對毛澤東不滿的真實一幕。林彪的不滿還在繼續。當毛澤東在2月19日凌晨召集嚴厲指責譚震林、陳毅等人的緊急會議時，本來通知了林彪參加，但林彪以「身體不好」為由請假，派了葉群作為他的代表……根據王力的回憶，原本是毛澤東主持的常委擴大會只要通知林彪，林彪都會到席。

江青、王力向林彪匯報毛澤東在16日夜的談話時表示：（談及徐向前元帥時，林彪說了一句）「他不能代表解放軍。」知情人告知，林彪還講了一句，還批評了陳伯達。王力回憶說林彪說陳伯達不過是個書生，實際上林彪是針對原來陳伯達關於軍隊的說法再次批評到：「解放軍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我怎麼不知道。」

在「大鬧京西賓館」中，時任廣州軍區司令員的黃永勝，公開發言：「希望中央文革多聽毛主席的話，特別是江青同志要多聽毛主席的話！」葉劍英把會議情況報告給林彪。後來在「反擊二月逆流」時，江青因「大鬧京西賓館」事非要壓黃永勝作檢討，黃永勝在請示林彪後，始終頂住沒有理睬。江青對此一直耿耿於懷。筆者認為，黃永勝的表現與後來黃代替楊成武出任總參謀長一直關係甚大。林彪在文革后「913事件」之間極力避免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插手軍隊事務，因此毛澤東也只能把以「批林批孔」之名行讓江青、王洪文等人插手軍隊事務之實的行動在「913事件」進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此點也注定了林彪的結局。同時也說明林彪和周恩來處事的不同，林彪在軍隊中的這種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毛澤東的「為所欲為」，例如抵制張春橋出任總政治部主任一職，支持後來的軍委辦事組成員對抗江青等人，而周恩來則明顯的不同。如果周恩來像林彪一樣抵制江青等插手政務系統，顯然局勢會在一定程度上好些。但是正是這種不同，也預示了兩人的結局的不同。

然而「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為了推卸責任，把事情攪渾，居然說出「二月逆流是反林彪的」這樣明顯歪曲事實的話來。對此，周恩來同志也應聲。周恩來對楊成武說：「要向你檢討，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林彪頭上，一切幸福來自毛主席……」周恩來對羅瑞卿說：「一切仇恨要集中到林賊身上」「一切恩情都來源於毛主席」。

毛澤東對林彪的做法洞若觀火。在19日凌晨會議之前，毛澤東特意把葉群找來單獨談話，做了工作，說：現在老師們不聽我的，我準備帶著林彪到南方去鬧革命，打游擊，重建一支解放軍。為了籠絡林彪，毛澤東並特許葉群今後可以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會上，慣於逢場作戲的毛澤東又故意對葉群說：你告訴林彪，他的地位不穩啊，有人要奪他的權哩。然後又危言聳聽地說：這次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我就和林彪離開北京南下，再上井岡山打游擊，讓劉少奇、鄧小平上台，陳伯達、江青槍斃，康生充軍，文革小組改組，讓陳毅當組長、譚震林當副組長，余秋裡、薄一波當組員。再不夠，把王明、張國燾請回來。力量還不夠，請美國、蘇聯一塊來。

毛澤東把林彪置於「火烤」的位置。你林彪不是想置身度外嘛？毛澤東把這些人矛頭說成是指向你林彪，我倆是拴在一跟繩上的螞蚱。挑撥離間是毛澤東的拿手好戲。

七、徐向前的言行

在19日毛澤東召開的會議上做出決定，對陳毅、譚震林、徐向前三個人進行批評的生活會，他們三人停職檢查。因此後人把徐向前也列為「二月逆流」的主角。真實的歷史並非如此。

江青之所以提名徐向前出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完全是因為徐向前因為歷史上問題（很容易被劃到張國燾那邊去），適合做「劉盆子」。

徐向前自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以來，可以說是「鞠躬盡瘁」。

徐向前在會見北京軍區幾個革命組織時大發雄威：你們（指文體單位）是專門鬧革命，機關是抓革命，促生產，要一面革命一面工作，主要是鬧革命。你們要堅持文鬥，反對武鬥，要擺事實講道理。鬥爭總是不平衡的。你們現在主張怎麼革命？（《新燎原》一同志回答：我們主張揪出幕後人，不僅保衛部，上面還有線，扶植一方，壓制我們一方。批判反動路線，才能斗批當權派。）你們認為斗楊勇、廖漢生到時候沒有？（答：沒有。）沒到，什麼時候到？（徐副主席很氣憤站起來）你們認為阻力是什麼？（答：爪牙沒抓出來。）你們的觀點是根本錯誤的，你們這樣搞會把打擊面擴大，楊勇、廖漢生這樣的活老虎毛沒拔一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多得很，劉、鄧路線，劉志堅……。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是少數。凡是斗群眾，凡是犯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錯誤的，都是鬥爭目標？那個軍區那個部隊沒執行過。為什麼對楊勇、廖漢生你們鬥過幾次？我勸你們把廖漢生鬥鬥，楊勇是個什麼東西，鬥鬥去。我非常不同意你們的做法，你們不鬥楊勇、廖漢生，要去抓鄭維山，造鄭維山的反！方向錯了。你們造反，對！造什麼反？要狠造楊勇、廖漢生的反，這個反不造，你們要擴大，就會擴大到你自已頭上，如都搞成楊勇、廖漢生的爪牙、走狗，這就不得了！要集中火力。一個是對楊勇、廖漢生要鬥垮、斗臭、燒焦；一個是團結到批評到團結，不要打擊自己的朋友，我和你們商量研究，革命不容易，不能分散火力，我看你們要好好的學習十六條。革命怎麼革，革誰，革命的目標都不知道你們革誰的命？放著老虎不打，硬拉自己的朋友！如果讓我參加你們的新《燎原》、《星火》，我不參加。（《火炬》一同志：如這樣大方向一致，就團結一起幹。）放著活老虎一毛不拔，還到處去找，究竟有多少老虎？要打多少老虎？

關於1月19日的大關京西賓館，中共官方的說法是在與中央文革的對抗中「徐帥一掌拍在茶几上，把茶杯蓋震落在地。葉劍英怒不可遏，用拳頭連連捶擊著桌子」。

然而實際情況是徐、葉兩人在是否要揪斗肖華的問題上拍茶几、捶桌子，相互對抗。

《葉劍英傳》如此敘述：「過了一會兒，肖華來了，徐向前問他，昨晚到哪裡去了。肖華躲躲閃閃。徐向前生氣地對肖華說：『你是膽小鬼！你怕什麼？他們能把你吃掉嗎？』他盛怒之下，拍了桌子，把茶杯蓋子和碟子都摔了。」

葉劍英「也大聲地說：『他昨天半夜裡跑到我那裡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來的，如果有

窩藏之罪，我來擔當！』說話間捺不住滿腔怒火，猛拍桌子，傷及右掌。散會回家以後，端茶杯覺得右手無力，秘書陪他到軍事科學院門診部拍了片子，才發現右手掌骨遠端骨折。」

《徐向前傳》的描述是：「肖華到會後，講了頭天晚上被抄家的經過。徐向前氣得拍了桌子，茶杯蓋子摔到地上。葉劍英氣憤他說：肖華是我保護起來的，如果有罪，我來承擔！說著，也拍了桌子，傷著了手骨。接著『大鬧京西賓館』一說就傳揚開了。」

作為當事人當時在場的吳法憲後來證實：「作為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徐向前出於責任，和陳伯達一起批評總政治部主任肖華，於是引起兩位元帥之間的對抗。」吳法憲還回憶說：「徐向前（幫助陳伯達批評肖華一筆者註）批評了肖華。」徐向前說「你肖華是有錯誤的。你把軍隊的政治工作搞成這個樣子，影響了我們全軍。」吳法憲還說，兩位老帥在肖華問題上得公開矛盾，給了我們這些與會者很大得震動。一時間，整個會場上鴉雀無聲。這天晚上得會議就這樣不歡而散了。參加會議得同志回到房間裏休息，但是背後都議論紛紛。

1966年10月開始，邱會作就被總後造反派批鬥「車輪戰」，被搞得暈厥。林彪下令邱會作到西山去，還特意批示到：沒有我和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的命令，邱會作不許下西山。但是在1月份，徐向前無視林彪的批示，打電話給邱會作：我不是以軍委文革小組組長的名義，而是以軍委副主席的名義命令你下西山，去見群眾。」邱會作無奈，從西山回到總後機關，遭到嚴刑拷打，致終身殘疾。後來又被林彪救出。

根據周恩來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的講話，邱會作的這段回憶得到證實。周恩來：「對邱會作同志，邱會作同志被鬥了幾個月。（邱會作同志就是去年林付主席『八?九』講話說的壞人斗好人，好人挨了整。）邱會作同志被整後，當權派中一小撮壞人搞了一個多月，幾乎被整死。林付主席要他到香山找個地方休息，徐向前下令讓他回去主持工作。徐向前說：『我現在給你打電話，不是以軍委文革名義，而是以軍委付主席的身份命令你回去主持工作。』在這種情況下，邱會作同志只好服從。六點鐘接到電話，八點鐘就回去了。第二天一早，就被捉去了，被打個半死，打得骨折了。後來，林付主席知道了，親自去把邱會作同志接回來，他們保護什麼老幹部？他們保護的是劉鄧司令部！」

趙爾陸的問題也是如此。現在很多人仍然把趙致死的責任歸於林彪。

林彪曾經對趙爾陸問題的講話，「對趙爾陸的錯誤要狠狠地批，對他的工作要重重的用」。典型的林彪特色，雙關語，一方面是保，另一方面是批，重點是保。林彪對張愛萍、韓先楚問題的批示同此批示大致雷同。在趙被造反派衝擊後，林彪第一個提出讓趙到北京的西山休息。於是周連同聶葉等人具體安排了此時。當趙的噩耗傳來，林立即派葉群去看望趙爾陸的夫人郭子瑞同志，並把郭子瑞同志接到毛家灣休息。郭子瑞對林副主席說：「怎麼革命了一輩子到成了反革命，走資派！」林斬釘截鐵地說：「不要怕戴帽子，走資派是黨內問題，應該在黨內解決。」後來又派黃永勝的夫人項輝方和邱會作的夫人胡敏，多次到趙家看望郭子瑞同志。這個時候，國防科委的造反派還硬說趙是自殺，是叛徒，要打倒，林彪寫了個條子批示到，趙不是反革命，其家屬也不是反革命。

周恩來的態度也是模稜兩可。周恩來在1967年1月11日接見七院代表時候說：「我看了你們兩條標語，說趙爾陸是彭、羅線上的人。（插話：是彭、黃分子）（這時總理大笑）你怎麼這樣亂連？我還以為是彭真呢！你們把彭、黃、羅、趙連在一起是沒有根據的，是在全黨全軍都通不過的。凡是瞭解黨的歷史（插話：聶、賀六一年國防工業三級幹部會上有嚴重問題的）六一年對趙爾陸的批判過頭了，過火了。那時會上羅對趙的攻擊最厲害，按他的辦法干，趙就根本不能做工作。羅的方案都提上來了，在我的前廳吵得不行嘛，是林副主席考慮了幾天之後，從外地打電報給主席留下來。你們提六一年這條對趙最有利，我勸你們把這兩條收起來，不然你們要失敗的。」

最重要的是毛澤東本人的講話沒有被及時傳達。毛澤東的女兒李敏在一次回家見到毛澤東時，談到趙爾陸被整的事，毛澤東說：「趙爾陸是井岡山的人，為什麼要整他？」這句話

在趙爾陸去世後才傳出，如果早點傳達下來，在當時毛澤東的話真可以說是一句頂一萬句，絕對權威，趙爾陸肯定會得到保護，對趙爾陸的攻擊將會減弱，他的生命將會延續。

下了西山的趙爾陸，終因遭受迫害導致的過大心理壓力和壓抑，最後引發心臟病、哮喘病致死（1967年2月2日），不可謂不是個悲劇。

但是在整個事件中，是誰下令趙爾陸下的西山？就是時任擔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徐向前。徐向前在其回憶錄中只為自己評功擺好，對所有的這一切都不絲毫不提，難道是對歷史真實的回顧嘛？

徐向前針對賀龍說：「蘇振華是賀龍政變的主要人物，班子都配好了。賀龍給蘇振華許的願，當軍委秘書長，許光達當總參謀長。羅斌（海軍航空兵政治部副主任）的根子是蘇振華。羅斌的大字報是蘇振華指使的，貼到什麼地方，哪時貼都有指示。」

這是筆者目前看到在公開場合明確說賀龍政變的最早的材料。

徐向前還多次提及「揪軍內的一小撮」。

徐向前在接見部隊科研單位革命造反派時講：「我們總政新的文革小組成立以前，情況是不太熟的，所以我不多講，只少講幾句。為什麼我們全軍文革小組要改組？因為過去全軍文革小組是以劉志堅這個壞蛋把持的，他對中央文革小組封鎖。既不請示也不報告。中央文革小組有很多指示不執行，對他的批評還不改，這是我們軍隊裡所謂劉、鄧反動路線裡頭一小撮裡面的一個人物。這樣打著紅旗搞了好多鬼事，你們的材料比我們還多些。最近是準備進行批判劉志堅這樣一個壞蛋的大會嗎？籌備嘛！因為有這樣的人物搞鬼，我們全軍的文革小組能搞好嗎！搞不好。」

從上面種種情況來看徐向前並沒有對所謂的文革牴觸，反而是積極參與，整這個，燒那個，不亦樂乎。

雖然徐向前如此賣命，卻依然討不了好。

吳法憲回憶說：「林彪與江青大吵之後的第二天，林彪通知葉劍英和徐向前主持召集軍委會會議，傳達毛澤東對肖華問題的處理意見，並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參加，但是中央文革小組只有關鋒一人與會。會上不少軍隊幹部爭著發言，以發洩心中的憤懣。黃永勝就直言文革小組不聽毛澤東的話，不執行毛澤東的指示，胡亂批評解放軍，亂鬥解放軍幹部，要奪解放軍的權，希望中央文革作出認真、深刻的檢討。關鋒回去後向江青匯報了會上的情況，江青大怒說這個會議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江青的會議，並將矛頭對準主持會議的徐向前，徐向前只好推到會上發言的黃永勝身上，讓黃永勝作檢討。為此，黃永勝去問林彪要不要寫這個檢討。林彪則說『絕對不能寫這個檢討，要堅決頂住。我去直接報告毛主席。』」

但是江青對林彪一點辦法都沒有，只好把這筆賬算到徐向前的身上，並建議林彪撤換徐向前的軍委文革小組組長之職。吳法憲回憶說：「林彪事後對我說：『誰當全軍文革的小組長，過不了多久，就會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換徐帥，全軍文革那就讓他名存實亡吧。』」吳法憲最後說，「後來果然如此，徐向前下來以後，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由楊成武代理了一個短時間，不久，楊成武隨毛主席東巡以後，全軍文革也就銷聲匿跡了。」

徐向前在2月份的態度有所轉變，幾次批評陳伯達（讀者亦可以參閱《徐向前傳》），但是相對於葉劍英在1、2月份的表現，實屬「小巫見大巫」。而且葉帥後來還在2月份對趙永夫開槍事件表態說「打得好，是一個很漂亮的仗」「軍委支持你」「並要他『徹底肅清殘餘的反革命』」。

對於徐向前離職的原因，徐自己也有過說明：江青板著臉說，徐老總老了，不能工作了。

因此客觀的說，徐向前雖然和陳毅、譚震林一起被勒令檢討，但是若說其實二月逆流的「干將」也未免與歷史不符，誇大其詞了。

周恩來則在徐向前和中央文革小組之間的衝突進行調和。徐向前自己說：「我於是向總理表示想辭去全軍文革的工作。總理慰勉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嘛。』」這兩句話由總理

說出來，感染力是很強的。」徐向前雖然沒有辭職，但是後來因為「二月逆流」被批，軍隊文革小組就漸漸銷聲匿跡了。

八、陳毅的說法

陳毅在2月16日懷仁堂的會議上說：「這些傢伙上台，就是他們搞修正主義。在延安，劉少奇、彭真，還有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這些人，還不是擁護毛澤東思想最起勁！他們沒有反對過毛主席，他們根本沒有見過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嘛？歷史不是證明了到底誰是反對毛主席的嘛？以後還要看，還會證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給了赫魯曉夫搞修正主義嗎？」陳毅的這些話是張春橋、王力、姚文元事後整理的，並經過周恩來、康生核對過的。

當陳毅講到周當年曾在延安整風中挨整一事時，周立即表示：「應該檢討，整得對嘛！我有錯誤，對當時的批評，從來沒有意見。」陳毅敢當著周的面，挑撥離間，膽子夠大的。周豈是如此能輕易被挑撥的？當陳毅講了對毛澤東有影射的話後，周恩來又是馬上接過來說：「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決定由周恩來主持開會批評陳毅、譚震林、徐向前三個人。周恩來叫王力整理出一個2月16日懷仁堂會議記錄。王力在會上讀了，並核對情況。陳毅表示異議，說有一句他沒有講，要去刪掉。周恩來當場駁斥：「講是講了，不要刪了。」周還在此處特別註明：「陳先挑撥康老，後挑周」。

有人表示，包括王力，均認為陳毅在講話中影射了林彪，這話值得商討。因為就在同一時期內，陳毅這尊「大炮」不斷在吹捧林彪。更重要的是，陳毅的這番講話是以否定劉少奇、彭真等為前提的。

「913事件」之後，11月4日，毛澤東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的同志。當葉劍英走進會場的時候，毛澤東對與會人員說：你們不要再講『二月逆流』。」毛澤東同時編造謊言：「『二月逆流』是什麼性質？是老帥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的。那個王關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帥，老帥就氣嘛，發點牢騷。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鬧懷仁堂嘛！」同時毛澤東叫葉劍英把此話轉告給陳毅。但是葉劍英並沒有傳達。周恩來在1972年1月2日看望陳毅時也沒有向陳毅傳達。

直到次年1月6日，毛澤東再次對周恩來、葉劍英說：「『二月逆流』經過時間的考驗，根本沒有這個事，不要再講『二月逆流』了。請你們去向陳毅同志傳達一下。」周葉當場核對了記錄後才去告訴陳毅。

從這個事情可以看出來沒有毛的發話，不敢越雷池一步，即使毛髮話，也必須再三驗證，可見，在當時毛的權威所在。

九、反擊「二月逆流」造成的後果

正如前述周恩來在2月2日致信陳伯達、江青並中央文革小組，提議文把革的釣魚台會議和國務院會議室召開的碰頭會分開。很明顯，周恩來的意圖仍然是把兩套人馬分開，免得互相爭吵，以利於工作。

對此江青曾經指責：「你（指周）一貫地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禮，長期搞一個政治局碰頭會，還有國務院碰頭會，把中央文革裡的常委拉到你那邊去，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要知道，我們中央文革不出面保你，你周總理也會被打倒。」

4日，毛澤東在信上批：「此件不用，退周。」因為周恩來的提議明顯不符合毛澤東意圖。

2月19日，毛澤東召集政治局會議，嚴厲批評了「大鬧懷仁堂」的老同志。毛澤東當

時決定召開對陳毅、譚震林、徐向前三個人進行批評的生活會，他們三人停職檢查。根據毛的決定，中央政治局從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懷仁堂連續召開了七次政治局生活會，批鬥譚震林、陳毅、徐向前等人。

中共官方史說，周恩來不得不親自出面負責召集和主持針對這幾位老同志的「政治生活批評會」。在這樣的會上，他不得不講一些違心的話，其中包括那些犯錯誤的老同志，也包括自己。在期間，由中央文革成員戚本禹開列的供批判用的材料中，有一份經李富春起草、周恩來審批的國務院系統開展運動的報告。

其中陳毅的話頗有意味。據王力說：在周恩來和康生對會議記錄作最後整理時，陳毅認為記錄歪曲了他的一些話，要求刪去，被周恩來拒絕。陳毅要求刪去的内容是其沒有把毛澤東同赫魯曉夫相對比聯繫。

周恩來為了能夠繼續留在政治舞台上，除了在記錄上盡量撇清自己除外，還做了對「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行動很不得力的檢討。而這些檢討成了江青時不時敲打下周恩來的武器。

19日會議之後，由周恩來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不復存在。《毛澤東傳》的作者們如此寫道：「這以後，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動，實際上由中央文革碰頭會取代。」同時，江青、張春橋輪番找周恩來談話，打著貫徹毛澤東關於「文革小組代替了書記處」指示的旗號，提醒周要把中央文革當作中央書記處來看待，今後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要首先提到文革小組討論，逼他把各省、市、自治區籌備建立革委會的權交給文革小組。

王力說：這個事件以後，江青就以文革小組的名義公開向總理奪權。一次是江青在文革小組會上公然對總理說：「主席已講過了，文革小組代替了書記處。以後總理要象對待書記處一樣對待文革小組。」周恩來只好說：「我以後只主持國務院辦公會議。」後來江青、張春橋又提出這個問題，周恩來說：「以後你們做決定，我給你們辦事。」江青還說：「地方成立『三結合』的領導班子，總理不要管了。到北京來匯報，總理太忙，不要組織了，由文革小組組織。」

反擊「二月逆流」的直接後果就是，政治局癱瘓了，中央文革不僅取代了書記處，而且取代了政治局，創造了在中共歷史上開創了踢開政治局的先例，而周恩來極力的配合是造成此後果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整個過程中，毛澤東成功地離間了林彪和其他老師們；而周恩來也得到一定的回報。周恩來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和執掌中央專案組兩大權力系統，此地位一直到「九大」之前沒有動搖過。

毛澤東首先是在發火之前，給周恩來一個「甜棗」。針對周恩來對事先沒有看十三期紅旗社論一事，毛澤東說了一句：黨章上沒有這一條，黨報黨刊上的社論要送常委審查。但是隨後卻指示王力將即將要刊出的《紅旗》雜誌社論《必須正確地對待幹部》一文交給周恩來審閱。

社論提出：幹部隊伍中的大多數是好的，在奪權鬥爭中必須從這樣一個正確的估計出發去對待幹部。對當權派，不作階級分析，一切懷疑，一概否定、排斥、打倒，這是一種無政府主義思潮。對犯錯誤的幹部要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教人的政策，一腳踢開，一棍子打死，這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

周恩來閱後送毛澤東審批時註明：「這篇社論很重要，很及時」，「提議在黨、政、軍、文革碰頭會上討論一次再發表」。毛澤東則回應到：同意你的意見，討論後再發表，並把「三結合」的思想寫進去。以後重要的社論都應這樣做。

江青雖然時不時的向周恩來問罪（中共官方黨史對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也時不時的向周恩來示好（中共官方黨史對此則避而不談）。江青在這種重大問題上和毛澤東還是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的。

閻長貴回憶：不錯，江青在周恩來面前，比較隨便和放肆，有時發脾氣，或頂撞周恩來；對這些事和這種情況，在20世紀90年代，我曾問過戚本禹，他告訴我：江青和總理的關係很好，她之所以敢在總理面前發脾氣，那正是他們關係比較好的表現，她怎麼不敢在劉少奇、林彪面前發脾氣？閻長貴先生還說：1967年2月下旬的一天，我送一份反映貼總理大字報的材料。江青看了看，說：「凡是涉及到總理的事情我心都不安！」我知道，中央當時不允許給總理貼大字報，江青、陳伯達曾派我到北大找聶元梓，要她組織人到天安門前覆蓋關於總理的大字報。江青這句話給我印象很深，影響也很大。

周恩來對此也是禮尚往來。周恩來同中央文革小組的關係更緊密，也更加順從江青。

李富春在「徹底批判陳毅大會」上的講話時講：「昨晚和今晨總理叫我來參加你們的大會，這說明總理是支持你們的大會的。總理親自確定為『徹底批判陳毅大會』，你們批得對，批得好。希望你們今後徹底批深批透。你們提出陳毅必須向毛主席低頭認罪，提出陳毅不投降，就堅決打倒他，我都贊成。但是你們有的同志提出『打倒陳毅』，我看還不行，你們勒令陳十天交出檢查，我支持你們的革命行動。剛才周總理特地打電話告訴我，要我說一句：總理和中央文革是一致的，現在有的人想挑撥是辦不到的。」類似的話，據筆者所知，周恩來多次在群眾大會上講過。

十、尾聲

在文革轟轟烈烈進行了半年之後，當初積極參與文革的老帥們發現「文革是革我們原來幹過革命的命」。革別人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就不樂意了。在1967年初，接連發生了幾件讓老帥們感到振奮的事情。先是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就陶鑄被打倒一事批評了江青和陳伯達，會後李富春將消息傳播出去；其次林彪因肖華的事情大罵江青，而且「軍委八條命令」的頒布也壯了幾位老帥和副總理的膽。這些老傢伙們終於在2月11日和16日的「大鬧懷仁堂」出了口惡氣。

在毛澤東聽了張春橋、王力、姚文元匯報後，決定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員開會「嚴懲」這些犯上作亂的「臣子」。

19日凌晨，毛澤東發了「無產階級的震怒」：「中央文革小組執行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錯誤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十一中全會決議你們都舉手通過了。為什麼執行起來有牴觸呢？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大鬧懷仁堂，就是要搞資本主義復辟。要對文化大革命發難。」「這次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我就和林彪離開北京南下，再上井岡山打游擊，讓劉少奇、鄧小平上台，陳伯達、江青槍斃，康生充軍，文革小組改組，讓陳毅當組長、譚震林當副組長，余秋裡、薄一波當組員。再不夠，把王明、張國燾請回來。力量還不夠，請美國、蘇聯一塊來。」

然而時隔不久，除了譚震林之外，其他人都復出，足以證明毛澤東是陽謀，而不是蓄意打倒。譚震林完全是因為罵江青的信而被真正打倒了。正如毛澤東後來所說的：「大鬧懷仁堂，是借我批評文革小組的東風。」

毛澤東決定中央政治局從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懷仁堂連續召開了七次政治局生活會，批鬥譚震林、陳毅、徐向前等人。不僅如此，毛澤東還勒令陳毅、譚震林、徐向前到正在京西賓館舉行的軍委擴大會上作檢討。中央文革小組把此事捅到社會上，由此而造成了聲勢巨大反擊所謂的「二月逆流」。雖然這次老帥們作了檢討，但是毛澤東並不知道他們是不是陰一套陽一套，對於文革是不是「轉彎了」。時有湊巧，王秉璋事件給毛澤東一個機會。

1967年1月，王秉璋被造反派游鬥之後關押，患上了肝炎。王的妻子找吳法憲要求寫報告給林彪。林彪得知後，報告給毛澤東，說七機部是機要部門，王秉璋完蛋了，那誰來

主持工作？毛澤東同意林彪的意見，把王秉璋解放了。同時毛澤東通過劉素媛告訴葉群，要葉群把王送到西山和老師們住在一起，看看他們在幹什麼，說什麼，都有那些活動，有無串連。毛澤東要求王秉璋詳細瞭解情況並直接向他報告。後來王秉璋向毛澤東報告的非常詳細：徐聶葉什麼時候什麼地點作了什麼，談了什麼，寫的一清二楚。王秉璋說，老師們在受到批鬥後，接受了教訓，態度轉變了，一致認為這個運動稿的很好，對於防修是功不可沒，起了巨大作用。毛澤東看了這些報告，批給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毛澤東對這些老師開始加以保護。

首先，4月29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118室召集周恩來和被指責參與「二月逆流」的老同志李富春、陳毅、譚震林、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李先念等開了一個團結會。毛澤東還笑著問譚震林：譚老闆，你的氣消了沒有？我的氣已經消了，咱們訂個君子協定，不許罵娘。當晚，周恩來就見機而作開出一個出席「五一」勞動節慶祝大會的名單。在當時那種特殊的歲月氛圍裡，這樣重大的節日能否有資格上天安門，成了判定某個人有無「問題」的顯著標誌，關係重大。一般來說，這個人能參加這類活動，名字一見報，就意味著此人政治上沒什麼問題，不在打倒之列。5月1日晚上，這些老同志都登上了天安門，與毛澤東等一起同首都群眾歡度五一節。次日的《人民日報》作了報道。儘管這樣，這些與「二月逆流」有關的老同志還是被認為犯了嚴重的錯誤。在毛澤東的心中，那些「大鬧懷仁堂」的老同志還沒有回到他們「大鬧」前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對於因為受「二月逆流」衝擊的這些老師，國內黨史界一概把這些人的復出和照顧歸功於周恩來，這是不公平的。當時在4月份，康生和江青提議中直機關黨委組織起來，老師周圍的工作人員、黨支部成員對其批鬥。老師們被搞得灰頭灰臉的，家也被造反派圍困了。4月底，葉帥在西山的宿舍被幾千人圍困，日夜口號震天響，要葉帥出來「回答群眾問題」。林彪把這情況向毛澤東報告。但是毛澤東直到5月3日才委託黃永勝去西山作造反派的工作。經過長達兩個小時的耐心規勸，造反派才離開西山。林彪趁熱打鐵，建議毛澤東停止老師們家裡黨支部對他們的批判，說再這樣下去，老師們的身體就垮了。毛澤東同意了林彪的意見。林彪派黃永勝和吳法憲兩個去老師家裡慰問。

相比之下，5月5日，周恩來親筆致信陳毅、譚震林、李先念、余秋裡和谷牧(並告李富春)提出：五一團結，不要又造成你們五位同志錯覺，重犯過去「錯誤」；否則，就又要來一個新的反覆，甚至走入「絕路」。周恩來語氣強硬，措詞嚴厲，來告訴這些人不要再對文革加以抵制。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周恩來又對這些老師們重加鞭撻。

事情的結束最終是因為「913事件」之後。毛澤東出於籠絡人心之舉，把罪責歸於林彪一人，「二月逆流」方才告一段落。

第一部分 第六章

全面內戰：隨著毛的意志左右急轉

「二月逆流」很大程度上在各地表現為「二月鎮反」。特別是有了借林彪口述、毛澤東批准的「軍委八條命令」，各地軍方採取了不同的方式鎮壓造反派，還發生了流血事件。

毛澤東成功地發動「陽謀」，反擊「二月逆流」，中央文革小組成為事實上的政治局。但是這種中央層次上的逆轉並不和各地的文革開展同步，各地的造反派仍然處於受壓制、甚至被打成反革命的狀態。

1967年2月27日，陳伯達把載有天津小站材料的《快報》(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辦事組1967年2月15五日編印)上報，並寫道：「這是一個鬧資本主義復辟的例子。」

革命群眾要記者給主席反映情況。現在把材料送上，請順便一閱。」毛澤東對此批示到：「從上至下各級都有這種反革命復辟的現象，值得注意。」

在此批示下，反擊浪潮由中央逐漸傳到全國各地，各地造反派紛紛喊出口號，要揪出當地的「譚震林式的代表人物」，例如：武漢要救出「武老譚」陳再道，廣州要「抓廣譚實際上就是抓黃永勝、劉興元」。

3月27日，中央發出《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周恩來在30日送審的中共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稿共五條，其中第二條講到：「不得把群眾打成『反革命』，不准亂捕人。僅僅因為沖軍區和對軍區提意見，或對本地區、本單位的奪權有不同意見，而被打成『反革命』的，應一律平反，被捕的，應一律釋放，通緝令，應一律取消。」

對此，毛澤東批示到：許多外地學生衝入中南海，一些軍事院校衝進國防部，中央和軍委並沒有斥責他們，更沒有叫他們認罪、悔過或者寫檢討，講清問題，勸他們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沖軍事機關一事，卻看得太嚴重了。

4月1日，中央又轉發《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的附件，其中規定規定：「不得隨意宣佈群眾組織是反革命組織」、「不得把群眾打成『反革命』，不准亂捕人。僅僅因為沖軍區和對軍區提意見，或對本地區、本單位的奪權有不同意見，而被打成『反革命』的，應一律平反，被捕的，應一律釋放，通緝令，應一律取消。」

4月2日「人民日報」《正確地對待革命小將》社論，此社論是北航紅旗駐漢聯絡站站長徐鵬飛提供的原稿基礎上修改形成的，審批社論者，除總編唐平鑄外，還有後來隨謝、王到武漢的北航紅旗的吳介之（研究生）。

4月6日，中央軍委發出林彪口述後加以整理《十條命令》中規定「對群眾組織，無論革命的、或者被反動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況不清楚的，都不准開槍，只能進行政治工作。」「不准隨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任意把群眾組織宣佈為反動組織，加以取締。更不准把革命組織宣佈為反革命組織。」「對於過去衝擊過軍事機關的群眾，無論左、中、右，概不追究。」

一時之間，各地造反派聲勢大振，文化大革命又一次出現重大的反覆，直到發展成7、8月的「全面內戰」和「武化大革命」。

而在這過程中，周恩來積極配合毛澤東的部署，不遺餘力的執行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先是在「5.13武鬥」事件中見風使舵，接著在「7.20事件」中立下大功。周恩來真正掌握了「黨、政、軍」的大權。「7.20事件」讓毛澤東急速轉向極左，隨後又緊急剎車，借剎車之勢，周恩來對動了自己「奶酪」的王力痛下殺手，這一切都體現了周恩來的政客本色。

一、「5.13事件」和軍委辦事組的成立

根據王年一先生的介紹：

1966年冬至1967年春，在空軍機關、海軍機關、總後勤部機關和它們所屬的文體單位、院校，群眾組織都分成兩派。空軍中保吳法憲（時任空軍司令——編注）的、海軍中保李作鵬（時任海軍政委——編注）的、總後中保邱會作（時任總後勤部長——編注）的是一派，即所謂「保守派」（亦稱「老三軍」），人數較少。反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的是一大派，即所謂「造反派」（亦稱「新三軍」），人數較多。當時的「造反」是所謂「無產階級司令部」支持的。肖華（時任總政治部主任——編注）、楊成武（時任代總參謀長——編注）隨之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這一大派。

根據吳法憲的回憶，造反派是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的，然而最微妙的地方則是所謂的保守派中的一些人可以直接通天。

吳、李、邱的日子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並不好過，為避免揪鬥，曾經藏起來，而邱會作被打致重傷。

時值《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 25 週年之際，「老三軍」準備於 5 月 13 日在北京展覽館搞一次文藝會演，而對立面則準備衝擊這次會演，並且認為這是同「老三軍」決戰的機會。

為了準備這次演出，「老三軍」的成員之一劉素媛（曾經陪毛澤東跳舞）找到毛澤東尋求幫助。毛澤東則讓徐業夫親去毛家灣向葉群交底，並要葉群找劉素媛談。劉素媛則把毛澤東要保吳法憲告訴了葉群。葉群表示支持演出。然而這和周恩來原來的設想並不一致。周恩來在 4 月 20（或者 22）日指示：五一節各文藝單位到公園演出，要由各種不同觀點的群眾組織聯合起來演出。

無論是演出之前還是臨到演出之際，肖華作為總政治部主任對於此演出都堅持：要演出就要聯合演出，否則不可以演出的觀點。5 月 13 日，肖華打電話指示軍委文革辦：通知空軍、海軍、北京軍區主要負責人，請他們勸說一派演出的文藝團體不演出或者推遲演出，以免引起兩派群眾之間的武鬥；同時通知解放軍藝術學院等單位反對演出的群眾組織，命令他們不准衝擊演出會場。軍委文革辦當即執行了肖華的指示。演出前，肖華和陳伯達來到演出現場，肖華勸大家不演，陳則模稜兩可，含含糊糊。演出發生武鬥之後，肖華和陳伯達又趕到現場，指責演出的一派不聽命令，這直接導致了「5·13 事件」之後對肖華的批鬥。

武鬥發生後，周恩來一面幫肖華解脫，一面急速轉向，表態支持演出的一派。周恩來在 14 日凌晨 3 點多接見反對演出的「沖派」時表示：「演出是肖華和我們批准的。你們不應該造這次演出的反，演革命的戲，演『長征組歌』，難道不是宣傳毛澤東思想？你們為什麼要衝？」

周恩來為什麼急速轉向？周恩來說：「林副主席說，要有革命性、科學性嘛，可是你們呢？（下面吵吵嚷嚷）你們是那兒的？你們派別多，我搞不清，反正今天的演出，沖就不對。既然已經演出了，七點鐘聽說要武鬥，我們正在議論這個事情，你們就打開了，本來想叫他們不要演了，後來他們要堅持演出。林副主席知道了，非常著急，馬上表示支持，肖華主任忙著這件事，可是你們（指沖派）從派別的利益出發，就這樣幹。」

14 日凌晨 6 點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海軍直屬機關革命造反派（是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的派別）並講話。周總理表示本來你們沒有要求我接見你們，我來接見你們，我是支持你們的！

但是 14 日晚，周恩來在解決兩派武鬥的問題時，因為兩派都在，故周恩來批評了武鬥，支持了肖華。然而這引起了「老三軍」的不滿。張秀川對周恩來說：「總理，這件事你最好不管了。」張秀川把內情告知了周恩來。

「老三軍」對肖華不滿，開始揪斗肖華。周恩來在 5 月 21 日還公開表示對肖華的保護，林彪叫肖華暫避西山。

余汝信先生認為：以流行的說法，肖華個人的政治危機，緣自兩個月後，肖華被指為這一主要是軍內兩大派的武鬥衝突事件的幕後支持者和操縱者。關於「5·13 事件」，目前似乎還未有一篇文章能真正說清楚其前因後果，究其原因，還是如李德生那樣將事件的責任公式化地歸罪於「林彪及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事實上，「5·13 事件」前衝派在軍內占相對優勢，傾向於沖派的，不僅有肖華、還有楊成武，而支持所謂「三軍黨委」的一派、卻處於相對劣勢。目前，並沒有材料支持「5·13」武鬥衝突是一有組織有計劃的「預謀」的說法。它與文革中眾多的突發事件一樣，是兩派矛盾激化的產物，卻決非有什麼周密的幕後的「預謀」。

「5·13 事件」後表態支持「三軍聯合演出」的，不僅有林彪，還有周恩來，於是造成了肖華政治上的被動，但決非毀滅性的打擊，並沒有任何人（包括林彪）給肖華定性，肖

只要認真檢討，也許還可以過關。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卻是肖華自己的「不檢點」。而將肖「不檢點」的事往上報的，不是別人，正是楊成武（這次，是楊成武「要把水搞渾，他自己逃脫」了）。毛澤東得知肖華在東躲西藏中竟還有如此行徑，可以一邊寫檢查，一邊拈花惹草，龍顏為之大怒，直斥其為「扶不起的天子」！毛的這句內部「最高指示」被迅速傳了出去（這就是有人故意要把水搞渾了），也就最終決定了肖華垮台的命運。惟江青事後對此過程有一段講話：「解決肖華問題是一場嚴肅的政治鬥爭，結果把肖華不應該拿出去的材料拿出去了，搞得滿城風雨，對解放軍不好，是抹黑。壞人利用這些來搗亂，破壞人民解放軍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當時制止，始終沒有制止住，地方也利用上了，這樣就打偏了」。

根據知情人講述，肖華調戲的女服務員，是楊成武認真交代總參管理局政委嚴峻從女服務員手中拿到鐵證的。嚴當時還不願意，被楊痛罵一頓。

6月9日晚，周恩來陪同林彪以及其陳伯達、康生、李富春等在人大會堂觀看了「老三軍」派的演出。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都作了報導。從此「新三軍」一蹶不振。肖華的倒台，卻意外的導致了軍委辦事組的成立。

有人斷言是林彪提議設立軍委辦事組的，這不符合歷史的真實。

1968年10月30日，江青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說：「軍委辦事組是怎麼產生的呢？1967年夏天，鬥爭肖華的時候，出現了不嚴肅的現象，把一場嚴肅的階級鬥爭，變成低級下流，轉移了鬥爭大方向，侮辱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因此，我建議成立一個看管小組（引者註：軍委辦事組亦稱軍委看守小組）。開始是4個人。後來……在軍隊產生了新的辦事班子——軍委辦事組。楊、余、傅問題出現後，進行了改組。」

看守小組的成立，實則是因為總政和軍委文革小組相繼癱瘓，欲以其取代上述兩機構負責指導總政及其他軍隊駐京機關、部隊文化大革命運動方面工作的職能。

根據王年一先生文中引用的1967年10月15日，軍委辦事組給總理、陳伯達、康生、江青並中央文革小組報告得知：

在江青提議後，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在8月17日發出指示：由吳（法憲）、葉（群）、邱（會作）、張（秀川）四同志組成一個小組，由吳負責，任務主要負責駐京各機關、部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看著總政機關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不要出偏差。9月24日，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又決定增加楊成武同志為辦事組成員，並指定楊為組長，吳為副組長。

報告還對軍委辦事組的功能做了解釋：10月4日，我們研究了軍委辦事組如何進行工作的問題。認為，由於總政目前處於癱瘓狀態，軍委文革小組目前實際上也處於癱瘓狀態，軍委辦事組是在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直接領導下，負責處理軍隊系統駐京機關、部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具體工作。各大軍區、省軍區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工作，是在中央文革小組直接領導，軍委辦事組負責辦理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組交辦的一些有關具體工作。至於部隊各項建設、戰備工作、行政工作、幹部工作等等，統由軍委常委直接領導進行。提到辦事組來的這類問題，均呈送軍委常委處理。

同時報告說：「軍委辦事組是個臨時性的（筆者註：語句不通，原文如此），待政治工作組組成後，即將辦事組的工作移交政工組負責，軍委辦事組即行撤銷。」

對此報告，周恩來於10月16日作出批：「提議在小組會議上討論一次，再正式報告主席、林副主席。」10月20日，康生批：「此事必須先請示林彪同志，在林彪同志同意後再正式上報主席。」

1967年10月27日，楊成武、吳法憲向林彪報告稱：「關於軍委辦事組問題，向總理、伯達、康生、江青同志並中央文革小組寫了一個報告，遵康生同志的指導先報您批示後，報主席批示。現將報告呈上，請閱批。」林彪批示：呈主席批示。

毛於1967年10月28日批示：剛成立又取消，恐怕不妥。

軍委辦事所行使功能在1968年「楊、余、傅事件」後突然發生了巨大的轉折。

根據王年一先生的文章：1968年3月28日，毛、林、周接見黃永勝、吳法憲、溫玉成。毛問辦事組現有哪幾個人，黃永勝等回答後，毛說，還可以增加劉賢權。政工小組可以考慮取消。今後軍委辦事組由林副主席直接捏到手裡。

毛又說：「軍委辦事組要訂個制度，至少一周到林彪同志那裡匯報一次工作，一次談一兩個鐘頭。有事無事都要去，除非林彪同志身體不好。過去我們兩個處在第二線，讓他們去搞，他們也不匯報，搞封鎖，實行隔離，隔離不反省。」

林彪說：「不瞭解情況。」周恩來說：「軍委常委不要開會了吧？」

毛說：「軍委就是辦事組。軍委常委可以不開會了。」

林彪說：「把它懸空起來。」

毛說，葉劍英說過，楊成武是接班人。現在換了黃永勝，你這個黃永勝為什麼不可以接班？

從以上論述得知：軍委看守小組的提議與林彪無關，軍委常委不再開會與林彪無關，其中起作用最大的卻是無任何軍職的周恩來！

實際上，在肖華被毛斥為「扶不起的天子」之後，不僅總政治部，全軍文革小組亦實際停止了運作。8月16日，周恩來、陳伯達、江青接見三軍黨委負責人時宣佈：鑒於徐向前、肖華主持的全軍文革小組已經癱瘓，不能領導全軍文化大革命，中央決定，由吳法憲、邱會作、張秀川、葉群四人組成領導小組領導全軍文化大革命。同時，總政要關起門來亂一陣子，肖華不參加一切公開活動。1967年1月全軍文革小組改組及8月該小組停止活動，都是周恩來出面宣佈的。由此可見周恩來在文革中的實際地位。

一個明顯的對比則是：儘管林彪在名義上是中國級別最高的副總理，但他從來沒有參與過國務院的工作。而另一方面，周卻對軍隊事務則涉入極深，隨著文化大革命展開，周密切地介入了解放軍的所有主要決策。據林彪手下一位將軍的兒子說：「我父親對『文化大革命』中的發生的事情記得很清楚，他告訴我軍委辦事組（他是其中的一位領導成員）一共處理了1300多份文件，沒有一件毛主席不知道，沒有一件周總理沒有親自處理。」也正如上述軍委辦事組成立伊始，也是優先報告周恩來的。

周恩來還直接參與了文革期間部隊的調到。根據時任軍長胡燁的回憶，無論是通知其執行任務，還是部隊的調到，都是周恩來所為。在1967年9月4日，周恩來更是告訴他在執行任務時：「必要時，可以開槍！」根據知情人講述，武漢「7·20事件」之後調派海軍亦為周恩來親自所為。

周恩來授權開槍的事情還在寧夏導致了「青銅峽事件」。據當時主持蘭州軍區轄內陝、甘、寧、青四省區「三支兩軍」工作的洗恆漢回憶說：1967年8月12日，陸軍第62師奉命赴寧，其所屬186團進駐途中受阻。師部於是上報軍區。洗恆漢說：「收到六十二師報告的當天晚上，我召開軍區常委會議，常委們一致感到事關重大，立即將寧夏的原電報轉報中央。第二天深夜，總理親自給我打來電話，聽得出來總理非常著急，他說，報告收到了，你們提個處理意見報中央。要駐寧夏部隊派人守護大壩，決不能發生爆炸事件。」蘭州軍區隨即報送的處理意見中提及，如有人繼續進行爆破活動，並有人開槍向部隊射擊時，「部隊可以還擊」洗恆漢又說：「到了八月二十八日凌晨，康生給我打來電話說：『總理委託我叫我給你打個電話，你們關於青銅峽的處理意見報告，中央收到了，毛主席也看了，政治局也研究了。中央同意你們的意見。』我接到電話後，又立即召開黨委常委會進行了傳達，並且立即把中央的決定和軍區的意見告訴了寧夏支左領導小組康健民、徐洪學同志。」

此時的周恩來真正成了中共的「管家」。每天的各種請示、報告、文件象小山似的堆在周恩來面前，有各省市自治區的，中央的，國務院的，中央軍委的，中央文革的，都需要周恩來處理。難得一次的是，周恩來於1967年10月11日在解放軍總政治部報送的關於部隊幹部職務任免報告上批告葉劍英、楊成武並報林彪：軍委有關日常行政、部隊調遣、幹

部任免、部隊編組、武器裝備等非屬三支兩軍和國防外交範圍的請示報告和批件，應由軍委和總參直報林副主席請批，不需經我手轉報。此事請軍委常委一議，報林副主席轉報主席批准。否則，壓在我處文件太多，無時處理，而且超越權限。貽誤大事。事實上，並沒有人照辦，周恩來仍舊是忙的「腳不著地」。

二、「7·20事件」

在1967年的春夏之交前後，各省造反派經歷了很大的分化改組，而這些分化改組對於後來「7·20事件」起來很大的催化作用，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對於理解「百萬雄師」的敢於造反是關鍵性的。

其一是四川產業軍的垮台，其二是河南省造反派二七公社的得勢。在「7·20事件」發生之中，作為中央文革小組的工作人員張根成被抓後，有軍人指責批判說：「中央文革都幹了些什麼事？把80萬人的『產業軍』打成『反革命』，在內蒙、河南幹了些什麼？把解放軍打成『保皇派』！」

19日上午，軍代表張某在漢口對「百萬雄師」頭頭講話：「中央最近有個別人給中央寫了一個報告，其中有：河南省軍區支左方向錯了；二七公社是左派組織。毛主席看後，將這兩條劃掉了」；「河南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以前由中央文革直接管，現在，中央把全權交給了武漢軍區，因為武漢軍區政策水平高，中央信得過，運動至今還沒有開槍打死過人」。「江西軍區指戰員被迫轉入農村」；「中央某同志說產業軍是保守組織，與貧下中農相處很好。現在成都物資緊張，生活困難……關於成都問題，中央做出決定後，部隊不通，其中8個戰士徒步上北京，要將材料親手交給毛主席，對中央文革表示不信任」。這些動向，反映出部隊對於全國形勢認識，對中央文革十分疏離；擔心形勢將不利於武漢，擔心「犯方向路線錯誤」。

周恩來對此洞若觀火，在7月18日的軍區和會議說：「好的壞的，武漢形勢的發展有幾個問題處理不好，虧理，所以他們就要抓頭頭，打倒陳再道，抓譚氏人物，二、三月的批判不服氣，加上河南問題的影響，二七公社解決的方案有影響，這是坦白說的。」

徐海亮先生在其《武漢「七二〇事件」實錄》中認為：這些動向，反映出部隊對於全國形勢認識，對中央文革十分疏離；擔心形勢將不利於武漢，擔心「犯方向路線錯誤」。實際上，通過各種渠道，他們收集研討了內蒙、成都和河南軍區的問題，研究了中央的態度，對解決各地所謂「保守派」的方針政策，表示極不理解 and 極其不滿。當時最擔心的是走四川、內蒙、河南的道路，這些憂慮立即以大量對抗性言論、標語——甚至謠言表示出來。

出於自己利益的考慮，某些百萬雄師的頭頭和軍區包括軍區司令陳再道等對於周恩來甚至毛澤東都非常藐視。

根據徐海亮先生《「武漢事件」及其在文革進程中的位置》一文敘述，在16日的軍區匯報會上，陳再道和周還對拍了桌子。

周勸說陳：「文化革命是史無前例的，沒有經驗犯了錯誤；錯了改正就好；要你們承認錯誤，寫檢討，是為了保護你們，不是要打倒你們。主席對此都已經表態了嘛！」但陳再道將整理的工人總部（百萬雄師的對立面——筆者註）的材料送給周，甚至揚言讓總理去調查嘛。

陳再道說：「毛主席自己說要相信幹部的大多數、軍隊戰士的大多數、群眾的大多數，這三個大多數都是支持『百萬雄師』的，要給軍隊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

陳再道甚至「拍桌子說你有什麼了不起，你（過去的那些事——筆者註）……我還不知道」？以至指著周的講稿揚言：「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講稿上簽字，我們就執行」。周也（氣的）拍桌子對陳說「你不要以為我們拿你沒有辦法！」事情激化之後，周恩來將重返武漢，陳再道說「周總理來了又怎麼樣，還不是和王力一樣！」

批鬥王力時，軍區副政委要29師張政委讓群眾頭頭放了王，傳達總理指示——派代表

商談解決武漢問題。一個頭頭居然把桌子一拍，說「武漢問題，就在武漢解決，毛主席就在武漢」！

因此筆者認為，從現有的這些材料來看，一旦侵犯了自己的利益，敢於對抗中央對抗毛澤東的人不是沒有，也由此而得出現在對於文革中的個人崇拜所起的作用實際上大大誇大了的。張根成回憶：張回到東湖賓館，謝富治、楊成武、余立金在場議事，張問為什麼獨立師幹部這個樣，還說什麼「游泳的人、那老頭子」那地方……謝說「你不知道呀，那（蔡）就是王明的警衛員！這個事就是他們搞的」！顯然，謝富治和三軍領導認為出現了兵變，而其中還有歷史淵源。

在整個「7?20事件」中，真正起核心作用的是周恩來。7月18日，周恩來代表中央對於武漢的局勢作出帶有結論性質的四點：「一，武漢軍區支左大方向錯了；二，要為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組織「工總」平反；三，「工總」等造反派是革命左派；四，「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

此四點被獨立師政委蔡炳臣連夜傳達到團以上的幹部，接著被傳達到排以上幹部，並把獨立師派駐武漢各單位的軍代表叫回來聽了傳達，並要求軍代表傳達給群眾組織。這是造成「7?20事件」最直接的導火索。

據8201的幹部後來揭發，蔡在傳達時說：「中央首長來了四天，聽了三天匯報，作了一天報告。我和師長本來是代表大家意見去向中央首長回報的，但一看氣氛不對，總理和王力根本不願聽取大家的匯報。鍾政委在匯報時說一句，總理問一句，問得鍾政委答不上來，只好把匯報提綱放在一邊作檢討。軍區後勤和其他單位觀點都是一致的，在匯報時也被頂回去了。我們匯報對新華工看法時，王力很反感，還說我們思想不通。總理和王力很注意我們兩個」。「王力講，三新、二司打解放軍是對解放軍的最大愛護。王力把『百萬雄師』的優點都變成了缺點」。牛說「我和大家的心情是一樣的，思想也是不通的，組織服從，個人意見保留」。頓時會場吵吵嚷嚷，二人說「你們對外不要提總理說的」，意思要他們注意策略，把矛頭指向王力。

從中可以看出，周恩來的態度是非常不友善的，只不過後來是王力做了替罪羊。

事件爆發以後，周恩來除了返回武漢，秘密安排毛澤東出走上海外，還調動了部隊包圍了武漢。7月25日，在天安門城樓，周恩來見到《湖北日報》的一個在京記者劉某問他武漢局勢，周說：你們放心。我們已經從外面調了某某、某某部隊，把武漢包圍住了，陳再道他們想翻也翻不了浪。武漢是安全的，是萬無一失的。

當事人後來回憶，在劉豐找到王力以後，周恩來對北航的井崗山、吳介之兩位同學說「武漢發生的事，是我們的家醜，回去要保密，不要亂說，一切聽中央的口徑。」又說，「出了這麼大的事，我是有責任的。王力同志和謝副總理代表中央嘛，他們的講話是主席和我同意的嘛！『百萬雄師』是對著中央來的。主席很生氣，他老人家沒有料到會這樣，我們建國以來從未發生這種情況……」

7月25日，周恩來對河南省的軍隊幹部也講：「我在武漢講了四點，又講了八點，四點、八點都是我講的，我走了，事情就發生了，他們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這完全是預謀的，矛頭完全指向中央」。26日下午，周恩來主持召開擴大的中央常委碰頭會，討論「7?20事件」，參加會議的同志至今還記得，周恩來指出該事件是一個「叛逆行為」，陳再道和鍾漢華聽到總理嚴詞，幾乎當場癱倒在地。

7月30日清晨，周電瀋陽軍區副司令員曾思玉，「我已經派飛機去接你，你立即來北京，3日你去武漢軍區工作」；當日旋接見曾思玉、劉豐，代表中央宣佈了武漢軍區新領導的任命。引入注目的是，此次任命不是由林彪親自通知和主持的。

三、急速的左轉導致了「全面內戰」

「7?20事件」在文革史中寫下了重重的一筆。首先是其強烈的刺激了毛澤東和中央領導層，認為造反派受壓制，而有軍區支持的保守派則因為有「槍桿子」做支撐，是造成造反派不得勢的重要原因。「槍桿子出政權」的思維再次左右了當時的文革趨勢，中央的政策急劇左轉，然而隨之而來的是外交部的失控，軍區所受到的衝突，都使以林彪為代表的軍隊系統和視外交部為周恩來根基的利益受到極大的傷害。二者的抵觸和反彈，加上整個局勢的失控，毛澤東不得不來個急剎車。王力、關鋒以及林傑則成為這次急剎車、急劇轉向的犧牲品。不幸的是，因為文革最後的終結，王力等人在沒有東山再起的可能了。

7月28日，周恩來接見江西省四方代表講指出現在問題的關鍵在軍區，軍區必須通知軍分區、武裝部，把民兵的槍收起來，武鬥才能停止，並直言過去軍區錯誤，就是對軍分區武裝部發槍給農民，動員農民進城搞武鬥，就是策劃，放縱！軍區要負這個責任。7月30日，在第八次接見河南代表時，周恩來就提到武漢講：「軍區、軍分區、野戰軍給保守組織、支持軍區的保守組織發了槍，名字叫『發給基幹民兵』，他們拿了槍進行武鬥，或者挑動農民進城市進行武鬥。我們反對這樣做……過去放縱群眾斗群眾，是有人策劃的」。

但是憑借「7?20事件」的東風，各地造反派大受鼓舞，持械武鬥和搶槍惡風不止，特別是全國掀起亂揪「軍內一小撮」和抓當地的「武老譚」、「陳再道」，嚴重衝擊了各地軍區。在武漢剛剛翻身的三鋼造反派，居然前後出動數萬人次，到湖北專縣乃至全國「武裝支左」，遭到周恩來的嚴厲批評和一些中央領導的臭罵。

林彪就各地群眾亂揪「軍內一小撮」和搶槍產生強烈憂慮，致信毛澤東，說當前最嚴重的問題是奪槍的問題，但毛並不認同。

實際上，「7?20事件」對於毛澤東所產生的刺激同林和周是不同的。毛澤東第一反應則是造反派手中無槍，受壓制，這是造成當前造反派受壓制的最主要的原因。早在7月18日，毛澤東就講「為什麼不能把工人學生武裝起來？我看要把他們武裝起來」

據王力回憶說：「林彪在此之前寫了一封信給毛主席，前面說形勢很好，後面主題是奪槍問題很嚴重，必須發布命令禁止奪槍。毛主席的信是針對這點說的，前面說同意形勢很好，這是套話，但他不同意後面林彪關於奪槍的話。毛主席說奪槍問題並不嚴重，他分析說現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軍分區幹部支持右派。他著重分析多麼嚴重！他原來說三依靠，最重要的是依靠部隊，現在說部隊主要領導骨幹支持右派。他說當前文化大革命中心問題是武裝左派……從這封信裡還可以看到，他老人家的思想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他要建立第二武裝。……毛主席8月4日的信，5日林彪主持會，就要貫徹執行，周總理也參加了。老實說當時大家都蒙了。但都得表示擁護，都得這樣作」。

張雲生則回憶到：從對回信的批示來看，主席對於目前形勢比較樂觀，對於一些地方發生的搶槍事件，似乎也不很焦慮。

林彪又主張起草了一個針對廣東嚴禁奪槍的通告，周批給文革碰頭會準備發出，後接受王力的意見（怕與毛的判斷「奪槍問題並不嚴重」相左），叫廣東先試驗一下，而且強調對勞改犯奪槍，部隊可以開槍。由於情況認識不一，周恩來要求全軍文革小組將南京、廣州、瀋陽三個軍區受到衝擊的詳細情況立即上報，並約三軍負責人和南京、瀋陽軍區領導談話。

就在毛澤東到達上海的的當天晚上，中央首長第七次接見河南赴京代表團。會議中間，江青突然來到會議現場，發表了著名的「文攻武衛」的講話：我們不能太天真爛漫。當挑起武鬥的一小撮人，他們拿起武器打你們的時候，革命群眾可以拿起武器自衛，在雙方達成停止武鬥的協議以後，他們仍然不把武器收起來的話，你們自衛的武器不能放下！（鼓掌，並高呼：毛主席萬歲！）我記得好像就是河南一個革命組織提出這樣的口號，叫做「文攻武衛」，這個口號是對的。」雖然江青在講話中也提出要文鬥不要武鬥，然而整個講話的中心卻是要反擊！據陳曉農先生說，此舉是得到毛澤東的同意的。

毛澤東在8月4日致信江青時就認為：認為75%的軍區和駐軍支持右派，文革運動要解決的問題之一是「武裝左派」和實行「群眾專政」，並說「如此左派聲勢大振，右派氣焰就壓下去了」。此信在中央文革傳達。這足以表明「7·20事件」對毛澤東的刺激，在這種刺激下對整體形勢作出了極為嚴重的估計。因此筆者也有理由相信江青的「文攻武衛」講話正是毛澤東授意的。

1967年8月3日，毛澤東在上海聽取楊成武的匯報時，表示同意湖南長沙準備武裝1萬工人「左派」的請示，並饒有興致地介紹了上海準備武裝10萬工人的做法。他問道：槍在右派手裡好呢，還是左派手裡好呢？他還說，正規軍的槍奪了不要緊，以後再發嘛！聽說47軍有個團長的槍被奪走後大哭起來，這是個好團長。右派搶了去哭是對的，左派搶了就不要哭。8月4日，余立金向毛澤東匯報說，由於兩派之間鬥爭加劇，都在搶奪武器，應該加以制止。毛澤東不以為然，他說了凡是打了大仗的就好，爛透了就可以迅速好轉。不痛不癢的就會拖下去。全國搶的槍，只有二三萬支嘛！此後一個月，全國被搶奪的槍支達到48萬至50萬支，毛澤東仍說：「那有什麼了不起，三四十萬支槍有多少喲，不多！50萬支有多少喲，不多！光全國民兵武器就有350萬支嘛。」

周恩來接到江西告急電，在京西賓館主持軍委擴大會，由文革辦事組電告江西制止搶槍；但與會人員剛剛回到釣魚台，毛澤東的批復已經發來，為什麼軍分區可以向保守派發槍，我們不能武裝左派？辦事組負責人王廣宇回憶：因皮定鈞電告中央，江西搶了百餘條槍；上午，周緊急召集康生、張春橋、楊成武、韓先楚和王廣宇等開會，商議起草電報，批評軍區和造反派。該電也按慣例以要事匯報形式呈上海毛澤東，毛中午即批復。戚本禹問他們為何匆匆發電批評江西軍區和造反派，說毛有批復。

周恩來在接見湖南三方代表時說「造反派當然要求武裝，這是最高統帥的指示！」在周恩來主持制定的《中央首長在武漢革命派組織的座談會上的談話紀要》中明確規定：「槍桿子一定要牢牢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裡，我們要把革命群眾武裝起來。武漢也要建立一支人民武裝力量，由左派來掌握，把槍支發給左派。首先是武裝工人，學校裡應該搞軍訓。」

因此在1967年8月10日，「中發（1967）243號」文件《中共中央關於處理江西問題的若干決定》第6條明確規定：在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的領導下，在條件成熟的地區，要把革命群眾武裝起來。目前首先在南昌、贛州兩地，準備研究實行。革命的群眾武裝，是協助人民解放軍保衛國家財產、維護革命秩序、制止壞人殺害左派群眾的強大力量。今後，軍分區、人武部，決不准以任何借口把槍支彈藥發給或變相發給保守派；各派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奪取解放軍槍支、搶劫軍火倉庫和各種軍用物質。此通知實則為以中央文件的形式通令全國進行武裝左派的宣言。

時任四川革籌第一把的張國華曾經傳達過武裝作派的中央指示：「武裝革命派，是毛主席的偉大的戰略部署。主席最近有個精神，中央文革有這樣一個指示，就是對革命派，在具備下面的條件下要武裝……我們這個四川呢，已經武裝了幾個地方……」

曾經轟動全國的「三次武裝支瀘」也同周恩來密切相關。作為「三次武裝支瀘」的重要參與人物王茂聚說：「武裝支瀘是周總理批准的。」但是後來在1968年9月16日，周恩來否定了這個說法。

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8月中下旬。

8月24日周恩來接見廣州造反派和解放軍報記者，仍然提出：廣州工人造反派要以「紅旗工人」、「工聯」、「八一戰鬥兵團」，「廣州工人」為核心首先聯合起來。……工人造反派聯合起來後，馬上武裝工人，可以武裝2—3萬人，雙方簽訂的四項協議是靠不住的」。周恩來指出孤立分化瓦解「地總」、「春雷」、「（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工交紅旗」、「紅旗工人赤衛隊」可以爭取。同日，周恩來、戚本禹接見廣西雙方代表，一開始就談到：很久不見你們了，兩個月了，最近很忙。你們「聯指」怎麼越搞越不像話，又去進攻人家，越走越

遠了。你們再這樣下去，我們就要全部武裝他們（「4?2 2」派），看你們怎麼辦？！「4?2 2」的同志，文革給你們的電話知道了嗎？（要上交援越抗美軍事物資）你們比較聽話，辦得比較快。還有一部分沒有收回是不是？！

正如徐明的評論：周確確實實、時時牢記毛澤東當年文革的根本意圖，還要讓革命造反派在這場鬥爭裡得到支持和壯大，不能讓造反派吃虧，對黃永勝就警告，再不能制止武鬥，就給造反派發槍。正如上述，周恩來對於造反派是大力支持，而且要發槍進行武裝支持。

急速左轉的表現還有其他方面，例如「砸爛公檢法」也是在這個時候傳達的。

當事人施義之回憶說：「1966年底我到公安部時，『砸爛公檢法』的口號在內部大字報和批鬥會場上時有出現，但聽到正式提出『砸爛公檢法』口號是在『七?二〇』事件後謝富治在公安部歡迎大會上的講話中。『七?二〇』事件後，7月22日周總理、謝富治、王力等回京，各部委都有人去西郊機場迎接。公安部有李震、於桑和我去了。謝富治回公安部受到聯絡站組織的群眾夾道歡迎，還開了歡迎大會，大會由我主持，李震致辭，謝富治講了話。」

「會後部領導一起從禮堂後門走出，在路上謝富治對李震講：『我講話別的不要傳下去，我講的毛主席說：聽到『砸爛公檢法』這句話我就高興。這句話要插下去，用什麼方法，你們研究』。謝還說『我聽毛主席說『砸爛公檢法』這句話沒有十次，也有七、八次』。當晚，李震找我商量，能否通過聯絡站辦的小報《紅旗》把這個內容插下去。我說：『看來除了這個辦法外，沒有其他辦法了』。第二天聯絡站的馬文華拿來稿子要我審定，我要他送李震。印出後，由聯絡站的政治部造反派組織『東方紅』分發到各省、市、自治區。『七?二〇』事件以前，各級公檢法部門已被衝擊、被破壞，這個口號插下去無疑是火上澆油，在全國進一步掀起了『砸爛公檢法』的高潮。」

1967年8月21日，周恩來對《七機部軍管會的指示》中說：「政治部和公、檢、法不是一個系統，政治部由毛主席親手締造的，如果要砸，要勸阻；勸阻無效由他們負責。要勸說『新九一五』的同志不要管，千萬不要武鬥。政治部的領導幹部有缺點錯誤，可以批判，不要砸。」周恩來的言外之意是，公、檢、法是可以砸的。就在三天之後，周恩來表示：公、檢、法過去受彭真、羅瑞卿控制，有很多思想和作風是反毛澤東思想的。搞跟蹤、搞盯梢、偷聽電話、搞特務活動，甚至挑動是非。公、檢、法一定要搞大的鬥批改，才能徹底肅清羅瑞卿的流毒……。

實際上，毛澤東在1967年會見剛果（布）總理努馬扎萊時說：「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們的國家機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508頁）「砸爛公檢法」正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初衷之一，作為執行毛澤東文革政策最得力的助手，周恩來自然對此是堅決執行的。1968年3月18日，周恩來在接見浙江省赴京代表團時的就講：「把黨內一小撮走資派伸向浙江的黑手一個個揭發出來，砸爛公檢法，文教戰線上許多壞事要改造。」後來，當毛澤東改變調子說他在杭州住過多次沒有出什麼事，說明浙江公安機關也沒爛麼。周恩來隨著就改變調子，說不能講壞分子在公安戰線上對我們實行了專政。

但是大陸黨史界歸其罪於謝富治一人，顯然是有失公允。

四、「全面內戰」使毛不得不緊急剎車轉向

「7?20事件」深深地刺激了毛，使毛覺得「槍桿子」不聽使喚，百分之75的軍區、軍分區支持了右派，於是發出了要「武裝左派」的指示。這樣一來，槍支彈藥便通過各種方式落入了勢不兩立的各派群眾組織手，武鬥終於發展成了「全面內戰」。

同時，各地對各大軍區、省軍區、軍分區的衝擊也達到新的高潮，也就是「揪軍內的一小撮」。

《紅旗》雜誌發表「八一」社論當天，天安門廣場和西單附件就有大字報，點了五個軍區司令的名字：陳再道、楊勇、楊得志、許世友和韓先楚。這五個司令不聽中央招呼。韓先楚被稱為「韓再道」。

8月16日，造反派抄了許世友的家，刮起了倒許的「八月黑風」。致使林彪在1967年8月份親自出面保許世友：「許世友在文化大革命中思想不通，落後了。但他幾十年來是一員戰將。現在還是想法不讓他犯錯誤，不要因為他對文化大革命犯錯誤而搞垮他。」毛澤東於8月18日也在上海秘密召見許世友，明確向他交底：許世友打不倒，南京軍區黨委打不倒，南京軍區打不倒。

中央的「8?4指示」使廣州軍區局勢迅速惡化。根據葉曙明先生的敘述，在7月23日武鬥之前，廣州兩派的衝突，並未動用熱兵器，甚至連用棍棒的都不多。8月4日中央指示和「文攻武衛」使武鬥變得合法化，各群眾組織開始紛紛製造武器。而炮轟軍區，則為搶奪軍隊槍支彈藥、軍用設備，提供了一個「革命」的理由。8月初，群眾搶武器達到了高潮。澤澤厚先生告訴後來告訴葉曙明先生，武鬥期間，廣州兩派一共搶了一萬多支槍。

《紅旗》雜誌發表「揪軍內一小撮」的社論以後，廣州造反派受到了極大的鼓舞，炮轟廣州軍區黨委的口號響徹羊城。8月1日，廣州紅司再發出《炮轟廣州軍區黨委緊急戰鬥動員令》；工聯發出《給廣州軍區廣大指戰員的一封信》；8月8日，廣州三司炮轟廣州軍區黨委聯絡站發表《嚴正聲明》；8月12日，紅司發表了題為《堅決打倒廣州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社論等等。矛頭直指軍區，聲稱廣州譚震林式（指黃永勝等軍區領導）的人物是逃脫不了人民的鎮壓的。

葉曙明先生的《文攻武衛，武鬥升級》一文中也詳細介紹了「7?20事件」之後廣州武鬥情況的急劇升溫。8月23日造反派衝擊軍區是最嚴重的一次，連軍區作戰大樓都佔領了，就是作戰室沒敢進。黃永勝到北京匯報，戚本禹當著周恩來的面問黃永勝：黃司令，現在抓廣譚啦，誰是廣譚啊？是不是講你啊？抓廣譚實際上就是抓黃永勝、劉興元。

但是軍隊畢竟是毛澤東的最後支柱，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是毛的能夠發動文革的依靠。無論是毛還是周，都知道軍隊是解決造反派和保守派衝突的關鍵所在。正如王力所說：「主席表示他要坐鎮武漢，就地解決武漢問題。總理要十五日回北京，我很著急，向主席請示：總理不能走，中央討論的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我們都不知道，幫助主席解決武漢問題沒有把握。主席先問總理的意見，總理同意留下，主席說好。主席提出中央確定的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要先從部隊解決」。

8月11日，周恩來接見首都紅代會學生代表時講：「現在到處抓陳再道。就像前些時期到處抓譚震林一樣這是不對的。什麼廣州要抓廣州黃再道。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同志，瀋陽軍區司令員都是好同志，任重道遠，又沒有經驗，這幾年來接觸群眾又比較少，當然有些領導長期脫離群眾，加上傳統觀念，受《黑修養》的影響，容易犯錯誤，但也容易糾正，尤其是野戰軍還不同於軍區，他們不同於軍區，和群眾接觸就更少了。我們的軍隊只要給任務，去了以後，立刻就改變形勢。但壞人也在搞鬼，例如就有壞人奪了軍隊的槍，搶衣服，甚至抓軍區司令員等，是不行的」。

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就是一、四方面軍關係的潛規則。

在「7?20事件」之後，名為揭開「徐向前老帥畫皮」的大字報劈天蓋地，主要罪名為（1）積極推行張國燾路線，瘋狂反對毛主席；（2）可恥的逃兵；（3）劊子手陳再道的黑後台等。清華井岡山兵團的紅衛兵甚至抄了徐向前的家。但問題是徐向前不能倒。

建國以後，以徐向前、韓先楚、許世友等為代表的原四方面軍幹部一直受到毛澤東的重用。從根本上來說，這是一種權術，是一、四方面軍的平衡，而這種平衡是輕易不能打破的。徐海亮先生就認為在「7?20事件」事件發生後不久就認識到這個問題：

可是毛澤東經過冷靜慎重考慮，很快決定將武漢事件作為「嚴重政治錯誤」處理，稱陳

為「你們要打倒」的同志。這時，對事件真相和背景的調查、審查都剛剛開始，事情並未弄清。但是，他對事件有個基本判斷，當然不願把自己統帥的軍隊置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邊，輕易地依靠激憤的民眾去搞臭搞倒一個又一個剛烈的老軍人；也不願意有人利用陳再道的錯誤打破政治平衡。周恩來出面，首先阻止了對原四方面軍同志的可能傷害，保護了業已靠邊的開國將帥。被造反群眾抄家的徐向前與徐海東，立刻得到周的關照。毛、周迅速地制止了對原四方面軍領導的懷疑與衝擊、制止了文革滑向宗派鬥爭的可能，進而保護了彭紹輝、許世友和韓先楚等。

僅僅是對陳再道似的人物與順籐摸瓜的衝擊，就可能立即蔓延全國，首當其衝的是原來四方面軍的高層幹部和各軍區領導。文革中一再顯露出的所謂「一方面軍整四方面軍」的暗流，完全可能立即變成頂翻文革航船的巨大暗礁。把文革的路線鬥爭和對軍隊高級領導的教育，引到山頭與宗派與歷史恩怨的歧路去，當然是毛澤東、周恩來並不主張的。

因此，一方面毛澤東要建立第二武裝，要武裝左派，另一方面對犯錯誤的四方面軍的幹部並不深究。事實上，鑒於歷史的原因，在長征過草地時期，一、四方面軍就有「密電情結」。因此在「7?20事件」事件的時候，四方面軍幹部就會認為這是一方面軍整四方面軍。《微行》一書裡面講述毛澤東和林彪在對待有關原四方面軍高級將領上，是非常極慎重的。而在文革之中，中共中央一再保護備受衝擊的韓先楚、許世友、陳再道，毛又特別倚重四方面軍的將軍，如謝富治、陳錫聯、許世友，還有鄭維山、李德生、韓先楚等，這都是為了那個潛規則。如果陳再道被徹底打倒了，「反軍」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會導致許世友等一干軍區司令的倒台，最後甚至連一方面軍的黃永勝等也跑不了倒台的命運。那麼文革也就真的將會是一場內戰，毛澤東也許真的會再上井岡山。

江青在1970年回憶這段時期時講「六七年七、八、九月是我黨、我軍、全國革命人民的緊要關頭，主席到上海時，我接到一個電話，他們要搞多少萬人的示威，整許世友同志，要許世友同志陷害主席，我當晚派文元同志到上海，飛機差點觸電。文元到上海後，主席派春橋同志用直升飛機去接許世友同志。他有個怪脾氣，但是個好同志，許世友同志當時圍困退到了三線，已無路可退。許世友見到主席時感動得流淚。另外他們還整黃永勝、陳錫聯、楊得志……一句話，要搞亂我們的軍隊，搞亂我們的黨，搞亂我們的革委會。」

於是毛澤東說「7?20事件」不是「兵諫」，不是什麼「謀害主席」，不是「反革命事變」，他（指陳再道）也不是「住到賊窩裡去了」。毛澤東說，「7?20事件」「不過是要以王力作為人質，迫使中央改變處理武漢問題的方針」

這個時候，無論是毛還是林、周都意識到這個問題，對毛來講則是考慮如何剎車。

8月14日，毛澤東嚴厲批評了在1967年8月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發表的《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40週年》社論一文，指出要『還我長城』。

同時，外交部在8月份的出現的情況為這種退縮的提供了台階。

周恩來送走毛澤東之後，嚴令軍區一定找到王力。王力找到後，當事人回憶，當時周恩來高興地拍著手笑著說：「謝天謝地，謝天謝地！」王力被送回之後，周恩來上樓就喊：「王力呢？王力在哪裡？」趕到屋裡，周緊緊握住王力的手，一把抱住他，親了又親，激動地說「支持王力同志，支持王力同志！」（王力回憶，周還流下眼淚）

在送王力回京的飛機起飛之後，周恩來的飛機才起飛，但是到達北京之後特意安排王力的飛機後降落，造成周恩來迎接王力的局面。王力回京以後，鄧穎超攜主席塑像去釣魚台看王力，江青還對此發牢騷不快，說「統一戰線統到中央文革來了！」

7月25日，周對河南軍隊幹部，談到：「河南二七公社平反了，很快就影響到武漢工總，我在武漢講了四點，又講了八點，四點、八點都是我講的，我走了，事情就發生了，他們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這完全是預謀的，矛頭完全指向中央，這不是簡單的事

件……」。

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全國準備分省和軍區辦武裝幹部的學習班。周恩來首先落實辦湖北省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調武漢軍區和湖北、河南省軍區的領導幹部進京學習。當時，毛對王力看法甚佳，還要王力承擔辦班組織工作。8月12日，周恩來到京西賓館接見武漢地區軍隊領導，說「你們都是好同志，請你們到北京來，一是為了你們的安全，二是要你們好好學習，提高覺悟，跟上形勢」。謝富治、吳憲法、王力參加接見並有講話。

1967年8月7日，王力在釣魚台16樓接見了外交部的姚登山（原中國駐印尼大使，後來成為外交部的造反派頭目）和群眾組織代表，說了一通批判外交部長陳毅的話，對陳毅造成很大壓力。王力講話記錄被印成傳單，廣為流傳，成為炮轟陳毅的重磅炮彈。雖然王力在其回憶錄中百般解釋，但是後果已造成。對此，周恩來在8月23日評價到不要從王力同志講話裡撈稻草，一根稻草也撈不到。8月19日，外交部造反派公開宣佈「奪取」部黨委領導權。整個外交部上下頓時陷入一片混亂，各司的外交業務癱瘓停頓。在造反派奪權後，外交部發往駐各國領使館的電報中竟出現「打倒劉（少奇）、鄧（小平）、陳（毅）」的口號。整個外交業務陷於混亂，大權一時落入造反派手中。

毛澤東說：「整陳老總的也就是整總理的。把陳毅打倒了，你周恩來也就差不多了。」造反派也心知肚明：「不打倒陳毅，就不能打倒周恩來。」周恩來的命運同陳毅的命運休戚相關。周恩來對於這種矛頭所指早有準備，中央文革小組也對這種苗頭大力鞭笞。

8月20日，經周恩來同意，外交部就「香港抗暴鬥爭」向英國駐華代辦處發出照會：「最強烈抗議港英瘋狂迫害香港愛國新聞事業。港英當局必須在48小時內撤銷對香港《夜報》、《田豐報》、《新午報》的停刊令，無罪釋放19名香港愛國新聞工作者和三家報紙的34名工作人員。」8月22日2時40分，北京數千紅衛兵、造反派演出了新中國外交史上最荒唐的一幕——火燒英國代辦處。

後來毛澤東在同美國友好人士斯諾的談話中說：「外交部就鬧得一塌糊塗。有一個半月失去了掌握，這個權掌握在反革命手裡。」這是一次非常嚴重涉外事件，造成中國與各國關係緊張，使中國的國際形象受到極大損害，影響極其惡劣。

周恩來立即出面制止，和江青、陳伯達、康生一起，緊急起草了一份由他和上述三人共同簽名的廣播講話稿，在現場反覆播出，勸阻疏導狂熱的人群離去。周恩來又和陳伯達起連夜接見外事口各造反派組織代表極其嚴厲地批評了火燒英國代辦處的作法，宣佈外交部奪權「完全是非法的」，表示：已經控制不住局勢了，我們再不出來講話就要犯罪了。

眼看局勢大亂，火燒到自己的眉毛了，在1967年的8月24日午夜，周單獨約見了當時擔任毛聯絡員的楊成武，談了他對時局的看法和憂慮，說目前局勢十分嚴重，已經失去控制。王力有一個「八?七講話」，一講就亂了，奪了外交部的權，火燒英國代辦處，表示：「王力給外交部的談話及一封信有些揪軍內一小撮的味道，造詞有些問題。占外交部的事，火燒英代辦處，連鎖反映（應）到外貿部、其他部……這樣下去怎?得了，我擔心的是連鎖反應。現在，一個是中央的領導不能動搖，一個是解放軍的威信不能動搖！」要楊成武帶上王力的「八?七講話」等材料立即返回上海向毛報告。

毛澤東則讓楊成武回北京向周恩來轉達的口頭指示：「王、關、戚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此外，毛澤東「並對王力八月七日講話批：『大、大、大毒草』。」

8月26日夜，周恩來先去林彪處，又與陳伯達、康生、江青宣佈了隔離王、關事宜。8月30日晚上，周恩來主持中央文革小組開會，宣佈毛澤東的決定。

毛澤東的另外一條批示卻透露出一些玄機。

9月7日，毛澤東在戚本禹寫於9月4日的檢討信上批示：「已閱，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錯誤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錯誤。便時，請你告之關、王二同志。」此批示明確王

力等還是同志，陳再道不也被稱之為同志麼？不就是人民內部矛盾麼？

但是事情的結果卻是王關戚最後都被收押入監，這又是為什麼呢？

9月24日，毛澤東一回到北京，外交部反對王力一派的王海容就去向毛澤東匯報王力「八·七講話」在外交部如何不得人心，想探聽毛澤東的態度，而毛澤東卻只吟出了兩句古詩：「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然後就以要休息為由對這位表侄孫女下了逐客令。

這兩句詩是出自唐人羅隱憑弔諸葛亮的一首詩中，慨歎諸葛亮雖有雄才大略，然而時運不濟，壯志難酬的命數，這充分表明了對王力、關鋒的倒台充滿不得已的痛惜之情。漁歌子認為「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所表達出來的對王、關、戚的感情，與毛澤東「九·七批示」是一致的。他並未將王、關、戚歸入應被打倒的敵人之列，而只是迫於當時的某種形勢，不得不拋出他們來作犧牲，以求得政治上的平衡。但是無論如何，客觀上，周恩來成為最大的利益獲得者。

第一部分 第七章

艱難的收場：為毛收拾爛攤子

1967年7、8月的「全面內戰」使「文化大革命」再也無法像原來那樣繼續搞下去了，1967年秋毛澤東南巡歸來不久就提出要開「九大」，實際上就是要收場、要結束「天下大亂」。但是，全國各地的群眾組織之間的派性鬥爭，相互的仇恨一旦被毛澤東、周恩來、中央文革煽動起來就不那麼容易平息下去，更加上歷史上形成的中共幹部的派系、山頭的矛盾也糾纏其中，使得由亂到治的過程格外地艱難。再加上毛澤東又不甘心讓「文化大革命」完全偃旗息鼓，於是出現了多次的反覆。從另一意義上講則是毛澤東自文革伊始，就不得不在文革的不同階段啟用不同的群眾組織派別，排斥阻礙當時文革部署的派別。（筆者註：毛澤東搞文革實際上也是「摸石頭過河」。）而這些所謂的中央的部署，就成為當地的掌權者屠殺、迫害對立面的工具或者對立的造反派攻擊對立面的藉口。而這些部署的完成也是由周恩來主導完成。

從1967年秋到1968年9月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全部成立革命委員會、實現山河一片紅，在整整一年的時間裡，作為中共「總管家」的周恩來反反覆覆地造反派打交道、一個省一個省地組建革命委員會、處理「楊、余、傅事件」，整個過程是曲折而又艱難。在這一過程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周是完全按照毛澤東的指示行事。

一、周恩來與造反派

自造反派、保守派的出現到退出歷史舞台，代表中央出面同這些派別打交道最多的無疑是周恩來。無論是對於造反派的支持還是壓制，周恩來都是同當時以毛為首的中央文革派是一致的。並不是像中共官方黨史中說的只是「林彪、四人幫」在支持、煽動造反派。

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召前後，各地造反派風起雲湧，成為以毛澤東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進攻的有效武器，因此得到中央的大力支持。實際上早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不久，各級黨委負責人就紛紛提出「炮打司令部」、「引火燒身」等口號，以積極的姿態領導運動，除緊跟黨中央的部署之外，部分黨委領導人或是想「引蛇出洞」，搞右派模式的翻版。周恩來就曾經親自為造反的群眾支招，為造反大會定名為「炮打司令部群眾大會」。

但是對於這些造反派，中共當權派在經過了一段時間的摸索，首先是總結出了復員軍人不能成立自己的組織、不准成立跨行業、全國性的組織。繼而是「支一派」「壓一派」，即支持所謂的「造反派」，瓦解所謂的「保守派」，結果激起了被壓制一派的劇烈反彈，釀成震驚中外的「7?20事件」。之後毛澤東急劇左轉，發出「武裝左派」指示、並由江青出面鼓吹「文攻武衛」，導致「全面內戰」。然後毛澤東再度急剎車，中央對各地的處理辦法，改為「兩派大聯合」揪斗「走資派」。有的地方進行得比較順利，有的地方卻問題卻始終無法解決，中央最終發現只能支持一派對另一派進行剿滅，如果兩派都不「聽話」時，就把兩派都「消滅」。經過血腥的鎮壓之後，全國山河一片紅才姍姍來遲。在新生的革委會建立起來之後血腥的鎮壓並沒有停止，反而是變本加厲，此為後話。

1. 早期的造反派

無論是北京市紅衛兵造反派的出現，還是中央各部委造反派的出現，周恩來是熱情支持的。以國家機關係統中第一個成立的造反組織的財貿系統革命造反聯絡委員會為例，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周恩來的態度。

1966年12月31日，全國財貿系統革命造反聯絡委員會召開成立大會。周恩來出席並發表也熱情洋溢的講話。首先周恩來表示了熱烈祝賀：

「同志們，我首先要祝賀你們財貿系統革命造反聯絡委員會的成立！向你們致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敬禮！我現在代表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黨中央和國務院向你們問好！」

其次周恩來對於造反派的任務進行了動員：

「我們逐步地看到，在我們中央的各部委，國家的各科室、各系統羅、各部委、人民團體的各方面，地方上各級領導中，幾乎普遍的在不同程度上，在那個一段時期，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犯了這個嚴重的錯誤。我們認為必須提倡炮打的精神，而首先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肅清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的後果和它的影響。所以，這個鬥爭是及其艱苦的。」「我們從中央到地方，從黨政機關到各個系統、各個方面，從城市到鄉村，更大地、更廣泛地、更深入地動員起來了。你們這個戰線，動員得好！所以，我們首先來組織這個戰線，支持你們革命的造反派！支持你們徹底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周恩來最後還寄希望這火能從中央燒到地方：

「最後一點，你們現在是造反派，你們在各部成立了組織，也把這個各部的組織形成一個整個財貿系統的造反聯絡委員會，不僅要在北京活動，你們還準備有計劃地派出代表向全國的財貿系統進行革命造反。」

然而時過不久，在1967年的二月份，就出現了第一次大規模的全國性的「二月鎮反」。筆者認為出現在中央層次上的和地方上的層次有很大的不同。正如前文所述，中央層次上的是毛澤東的「陽謀」，然而借「陽謀之風」，有些部門特別是軍隊系統因為受衝擊嚴重，對造反派（也包括一些保守派）出現了嚴厲、殘酷的鎮壓。除此之外，還有其它幾個原因也可以說明此鎮反絕不是沒有先兆。

第一個是由於各地造反派和保守派的不聽指揮，導致衝擊各保密機關、軍事機關等，迫使中央採取行動。1967年2月份，一些軍區受到衝擊。《人民日報》在1967年2月17日報道福建軍區對衝擊軍區的造反派展開鎮壓時，表示反軍活動是「無產階級的敵人的瘋狂反撲。」1967年1月16日，《紅旗》的評論員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一文把湖南保守組織「紅色政權保衛軍」被定位「黨內走資派的御用工具」。1月22日，周恩來當眾宣佈「中國工農紅旗軍捍衛軍」、「全國工農兵奪權司令部」、「北京革命造反聯合行動委員會」、「西安紅色恐怖隊」、「湖南紅色政權保衛軍」都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都是

反革命組織。

第二個就是針對於當時出現的成立全國性組織的採取了嚴厲的鎮壓取締。因為成立全國性的組織完全可以演繹成為游離於中共的另一大政治組織，足以讓中共感到威脅。因此整個中共領導層就會集中對外。當時在1967年初的「全紅總」的鎮壓，就是這類模式。

第三個就是對於訓練有素的復員轉業軍人為主體的組織，中央是不允許存在的。例如在1966年底各地成立的全國紅旗軍，頗有戰鬥力，以復員、轉業軍人為主體，吸收工人、農民參加，在內蒙古就成立了全國紅旗軍的第四縱隊。在湖南則成立了以解放軍的榮譽、復員、轉業、退伍軍人為主的「湖南紅旗軍」。1967年1月20日中央軍委來明確將其宣佈為反動組織，責令省軍區抓捕了其頭頭賀孟宣等，解散了其組織。

因此，諸多的原因造成了中央上層領導一致對外，聯手造成了這次地方上的鎮壓。在3月份，當毛澤東在中央層面上成功的完成「陽謀」之後，發現各地又冷冷清清，於是又殺了個「回馬槍」。但是因為時間差和各地的具體情況不同，造成了「反擊二月鎮反」在各地的表現不盡相同。

但是在此過程中，周恩來等人因為要緊跟毛澤東的偉大戰略部署，但是毛澤東的出爾反爾，迫使周恩來等人也就表現的前後不一，多次翻臉不認賬。

以湖南省的造反派組織「湘江風雷」為例。「湘江風雷」全稱為「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湘江風雷挺進縱隊」，1966年10月14日成立於北京。10月3日，其負責人向陶鑄志簡略談了在北京成立這個組織的情況，並請陶鑄同志當縱隊顧問，陶鑄同志收下了紅衛兵袖章和縱隊革命造反宣言及其它材料並且表示：我不當顧問，我是文革小組的顧問，當了幾個顧問，我就當你們一個普通隊員吧。

在毛澤東默認下，陶鑄很快倒台，並且這成為中央文革整治「湘江風雷」的一個重要理由。周恩來在1967年1月20日點名批評了「湘江風雷」，並且說那是陶鑄搞的。同日，湖南省軍區根據中央「1.20來電」，鎮壓了衝擊軍區的「湘江風雷」的盟友組織「紅導彈」、「紅旗軍」等。2月4日，全軍文革辦傳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湖南「湘江風雷」、「紅旗軍」的批示：湖南軍區對「湘江風雷」和「紅旗軍」的頭目，應當立即採取專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受蒙蔽的群眾。後來在解決湖南問題時，周恩來卻當眾表示：中央從來沒有發出過「1.20電報」。

2月5日解放軍開始出動逮捕湘江風雷組織人員。2月16日，周恩來說：現在沖軍事機關成了風，這怎麼能行呢？長沙沖了，貴州貴陽要繳解放軍的械。我們說有壞人指揮，長沙不僅沖了，而且佔了軍區大樓，最後我們下令抓頭子。是「紅旗軍」和「湘江風雷」合起來搞的。直到6月9日，周恩來還說：湖南「『湘江風雷』幾乎遍全省，跨行業，其頭頭確是很壞，有的是幫會」。

但是，過了不久，毛澤東又認為「二月鎮反」會葬送「文化大革命」。依據在4月初通過的《中共中央轉發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及附件》以及《中央軍委十條命令》，各地受到鎮壓的造反派開始得以翻身。中央開始自1967年的7月12日開始接見湖南各組織代表解決湖南問題。此時的背景則是：在武漢「7.20事件」前後，毛澤東依據下面所報情況，認為現在全國形勢不容樂觀，全國大多數軍分區、武裝部都是支持了保守派，而鎮壓了造反派。在這大背景之下，例如青海的「八一八」、河南的「二七公社」、湖北的「鋼工總」、江西的「大聯籌」這些被一九六七年所謂「二月逆流」時期被打成反動組織的造反派開始翻身。「湘江風雷」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自7月12日至8月6日，短短的不到一個月時間，中央連續六次接見湖南各方代表，解決湖南問題。周恩來是其中的主角。周恩來對「湘江風雷」徹底的平反：「湘江風雷」是左派組織，革命組織。周恩來還承認「那個『二?四』批示是因為我們受了蒙蔽！」會見代表

其間，周恩來還叫醫生檢查被湖南紅聯高司扣留的「湘江風雷」代表的身體狀況。

8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湖南問題的若干決定》。決定聲稱：軍區打擊「湘江風雷」革命群眾組織，壓制「工聯」等革命造反派的錯誤，軍區黨委常委劉子雲、政治部副主任崔琳等同志應負重要責任。除了軍區負責之外，中央文革小組對湖南省軍區2月3日關於「湘江風雷」報告所發的「二·四批示」是錯誤的，「湘江風雷」是一個群眾人數較多的革命組織，在大發展中混入了極少數的壞人，造成內部成份不純，出現了一些缺點錯誤，但是不應該因此否定這個組織，在這個問題上，中央是有責任的。從這裡得到教訓，未經調查清楚，何必那樣匆匆忙忙地根據一面之詞發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負責主要的責任。

2. 矛頭指向周恩來的造反派的命運

1967年10月5日，20個「湘派」組織代表在湖南長沙「東方紅總部」舉行會議，討論並確定了「省無聯」的《成立公告》，並議定了10月11日召開「省無聯」成立大會。但是周恩來總理於10月9日，在武漢召見包括「工派」與「湘派」在內的湖南部分大造反組織的頭頭時，說：「『省無聯』是跨行業的組織」，「就不要成立了」；「你們一些組織發表的《九·三〇》聲明是錯誤的，你們不應再打內戰了，分裂不利於長沙的文化大革命運動。」

無論周恩來這話是否說的由衷，湖南造反派組織在1967年炮轟周恩來的行動卻是沒有斷過。陳益南先生認為：當時湖南在文革中，之所以出現了「炮轟周恩來」的活動，除了造反派中不少人，存在有對周恩來總理是否應對「二·四批示」負有責任的疑問這一思想基礎外，北京「五·一六」紅衛兵團反周恩來的思潮及組織，無疑更是湖南反周活動的直接動因（長沙「紅中會」及其屬下《齊衛東》、《奪軍權》的一些學生，都與北京「五·一六」有聯繫）。當然，更重要的背景，應該是文革中出現的造反派不斷炮轟、打倒中央領導人而「成功」的特有慣性思維，在起強大的作用。既然劉少奇、鄧小平、陶鑄都是在造反派的一頓「炮轟」後，頃刻能垮台，那麼，再出現一次「炮轟」周恩來而又「成功」的可能，又如何不會在激進冒失的紅衛兵頭腦中產生呢？！像「紅中會」這樣全部是尚不知天高地厚的中學生紅衛兵造反組織中，有些人踏上這條「反周」之路，幾乎是「順理成章」了。陳益南先同時表示「當時幾乎整個「紅中會」的紅衛兵，都或多或少有「反周」或懷疑周恩來的觀念，特別是其領導人，「反周」意識更是強烈。

林彪在1967年10月24日接見湖南駐軍負責人時就說過「湖南突出的問題，是極左派在活動」。這番話的背景，就是因「紅中會」成員發動了幾次炮轟周恩來、反對省革籌小組的大行動。其實早在1967年8月12日，「紅中會」組織屬下的長沙市一中紅衛兵《齊衛東》與《奪軍權》這兩個戰鬥隊就貼出了公開炮打周恩來的大字報，指責周恩來是「二月鎮反」的「黑主帥」。

楊小凱的《中國向何處去》在1968年1月12號出台。文中聲稱：「但是由於無產階級革命力量的大大加強，這次退卻沒有遭到二月份那次退卻所造成的「潰退」，資產階級這次不能像三月那樣幾乎一口吞下革命等等。湖南炮轟周恩來的革命力量不但沒有被消滅，反而還成立了省無聯，在某些方面，向前有了發展。這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力量成長壯大的證明。」固然，不僅有此文，另外還有《我們的綱領》、《關於組織和建立毛澤東主義小組的想法》兩文。

1968年1月24日，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長在接見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湖南班全體同志時，一致宣判了省無聯的「死刑」。康生說：「『省無聯』的綱領，楊曦光的文章，周國輝的講演，他們自己被迫把湖南的階級鬥爭蓋子揭開了，劉、鄧、陶的爪牙，公開的。隱蔽的都跳出來了。國民黨反革命分子、特務分子、自首分子跳出來了。彭德懷、

賀龍的爪牙也都跳出來了。而反革命「非常委員會」的黨羽，「五?一六分子」的黨羽，就在你們湖南被迫的跳出來了。」

於是「省無聯」的頭頭們被判處重刑。張家政（湘江風雷第二號頭頭）被判20年，宋紹文（省文藝界紅造團）判15年，畢健（湖南紅旗軍）判10年，楊曦光（紅中會）判10年，周國輝（高校風雷）判7年，張玉綱（中南礦冶學院「井岡山公社」）判3年。還有如李仲昆（湘江風雷）等人，則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長期監管。同此相對應的是所謂「五?一六分子」的頭頭也遭到殘酷迫害。

二、從全國奪權到山河一片紅

對於中央的有名的造反派干將，周恩來曾經說：「第一個高潮在毛主席親自領導下，聶元梓的大字報公佈以後，全國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也推動了機關和大中城市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革命的洪流所向無敵。」現在蒯大富要比聶元梓鞏固得多，當然我不是說聶元梓不好，聶元梓一聲炮響震動了世界，我是說聶元梓比蒯大富經受的鍛煉少，我從七月份回國後經手了兩個人的問題，一個是蒯大富，一個是王錫鵬，我不隨便捧他們，靠你們左派奮鬥。」

而各省的情況，又因情況而異。這裡我們以山西、四川、內蒙古、浙江、廣西為例，分別闡述在此過程中周是怎樣按照毛澤東的指示行事。

1. 山西

文革開始的時候，山西省委第一書記衛恆因為地域的關係被毛澤東看作是劉少奇、安子文線上的人。1966年初，薄一波等人的對立面、山西省副省長劉格平就被叫到北京，以便中央瞭解情況。1966年1月23日，劉格平給毛澤東、林彪、康生寫信反映薄一波、安子文等人發表聲明出獄，而他本人則如何堅持鬥爭和北平軍人反省院的情況。12月，周恩來、康生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和劉格平談話。周恩來對劉格平說，毛主席要你站出來，山西省委癱瘓了，你回去找省委的一些同志組織一個小組，把工作管起來，注意要抓緊經濟工作，特別是山西的煤炭很重要。當劉格平表示不好辦時，周恩來說，不要緊，中央支持你。

劉格平於1967年1月6日由北京回到太原，住進山西省軍區招待所。隨後開展了緊張的串聯活動。經劉貫一介紹，劉格平首先與張日清談話，策劃在山西的奪權事宜。1967年1月上旬，劉格平在山西省軍區招待所召集開會，參加這次集會的有劉格平、張日清、劉貫一、袁振、續純實、陳守中。會上劉格平說他在北京見到了總理和康老，說中央領導同志授意他負責組織起來，革山西省委的命。隨後劉格平等人策劃了組織「1?12奪權」。此次奪權在22日被周恩來表揚為「山西省也向我們提供了寶貴經驗，發揮了首創精神，各地也創造了很多新經驗。」直到1969年周恩來還表揚說「你們奪權早，占頭幾名」。

但是此事卻引起了強烈反彈。衛恆稱：劉格平、劉貫一、袁振等人所寫的大字報，是政治迫害。他們五個人的底子我們清楚，他們掌權不如我們掌權。現在我還是省委第一書記，要對中央和山西人民負責。對於劉格平的境遇，周恩來在1967年4月14日講：「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甘心失敗，挑撥是非，把鬥爭矛頭引向群眾，指向解放軍，指向站出來的領導幹部，許多地方有這樣的徵候。本來這些領導幹部是很好的，但也有矛頭對準他們，如山西的劉格平同志，山東、黑龍江、貴州，更不用說上海和北京了。」

2. 四川

四川劉結挺、張西挺二人更可以說是被周恩來一手解放出來的。對於此二人，用句通俗

的話說「就是王八蛋也要支持。」

早在1966年11月份，周恩來和西南赴京聯合告狀團四十名代表座談時，就向代表們瞭解劉結挺的情況並把劉等人揭發李井泉的材料要去。只過了4天，周恩來就接見了劉結挺，但是並沒有表態。

1967年3月26日出版的第435期《文化革命簡報》登錄了反映宜賓問題以及為劉、張翻案的文章（題目為《宜賓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對文化大革命猖狂反撲殘酷鎮壓革命派》）。毛澤東在第二天對此批示：「此事應加以處理，」可找雙方……來京商談。」

在周恩來的安排下，四川各路人馬來到北京。周恩來於1967年4月1日至4日其間，集中精力同四川黨、政、軍負責人及群眾代表談四川和宜賓問題。4月3日，周恩來當眾宣告：「四川宜賓地區的問題馬上就要解決。」4月4日就發出《中共中央關於四川省宜賓地區劉結挺等同志平反的通知》。通知聲稱：關於四川省宜賓地委劉結挺等同志案件，我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十分關心，並指示周恩來同志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找雙方有關人員來京，加以處理。此通知認為：（1）這個案件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李井泉一手製造的，經鄧小平、彭真、楊尚昆批准的冤案，完全顛倒了黑白；（2）劉結挺案應予平反。（3）這個通知，可在當地群眾中宣讀，對這一冤案，要發動群眾進行揭發。效率之高，令人感歎。

於是在周恩來、康生、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下，最後經毛澤東同意批准，劉結挺、張西挺被派回四川四川擔任了「省革籌」的主要負責人。5月7日，有名的解決四川問題的「紅十條」以中發通知的形式公佈於眾。通知把「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和「川大『八·二六』戰鬥團」定為革命組織，決定由新任成都軍區第一政治委員張國華同志、司令員梁興初同志和前宜賓地委書記劉結挺同志、前宜賓市委書記張西挺同志，負責組織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以張國華同志為組長，梁興初、劉結挺同志為副組長。

曾經作為張國華手下的劉、張，現在同張國華平起平坐起來。張國華向周恩來反映：「我們18軍的同志對他（指劉結挺）有反映，覺得一下提的太高，這樣重用他……」周恩來則態度嚴肅的說：「這是中央決定了的，你要做18軍同志的工作。」

1967年5月14日，張國華、梁興初、劉結挺、張西挺四人向周恩來等聯名提交《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對處理重慶問題的意見》，陳述以任白戈為首的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錯誤，聲稱長期以來，受到李井泉的支持，庇護，他們互相勾結，在重慶進行復辟資本主義的罪惡活動。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任白戈追隨李井泉堅持推行劉少奇，鄧小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事實證明，任白戈早已墮落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我們意見，應當公開宣佈撤銷任白戈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處書記和中共重慶市委第一書記的職務，撤銷任白戈兼任的重慶軍分區第一政委的職務；要幫助受壓抑的革命群眾組織的恢復和發展。被錯誤宣佈成非法的組織或反動組織的革命群眾組織要平反，對錯捕的革命群眾和革命群眾組織的負責人要釋放，並恢復名譽等。

5月16日，周恩來表示：中央同意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張國華、梁興初、劉結挺、張西挺四同志回成都後寫來的關於重慶問題的報告，中央同意他們的看法和意見。同日，周恩來表示：劉結挺、張西挺是被李井泉長期打擊的，經過考驗，我們把他們提到省的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周恩來為了支持劉結挺、張西挺，點名批評了反對他們的四川的群眾組織（「產業軍」和重慶「815」派，周恩來在1967年8月21日見國務院各部及所屬院校代表時稱之為「產匪」。）。周恩來更是於5月19日下令：1、派軍隊保護造反派。2、把反動組織包圍起來，進行政治瓦解。3、對少數壞頭頭，必須鎮壓，把幕後策劃者宜賓軍分區付司令員徐德有抓起來。

被周恩來稱之為革命組織的「川大『八·二六』戰鬥團」和「紅成」（紅衛兵成都部隊）

卻因為圍繞對劉、張問題和對支左部隊的某些看法不一而產生分歧。自劉、張返回成都，「紅成」就開始掀起打倒他們的行動。為此受到壓制的「紅成」到北京告狀。9月26日，周恩來、陳伯達等人接見進京告狀的「紅成」代表。周恩來說：「『紅成』打倒劉張的錯誤是立場問題，「滑到危險邊緣了。」周恩來這壓一派、支一派的講話大大激起了「紅成」的憤怒。「紅成」同「川大『八·二六』戰鬥團」的鬥爭更激烈，四川的局勢進一步惡化，雙方惡鬥不止。反對劉張和支持劉張是導致四川武鬥的重要和主要原因之一。四川武鬥是驚天動地，天下聞名。

1967年12月19日晚，要打倒劉、張的「紅成」紅衛兵組織等要求在20日上午九點以前打倒劉結挺、張西挺。如果打不倒就立即解散。張國華為此打電話給周恩來。周恩來當夜就做了指示（這個指示比保護彭德懷的指示迅速多了!）：

（1）劉、張的問題是四川十條的問題。對待劉、張的態度就是對待十條的態度。打倒劉、張就是反對四川十條，就是反對了中央。

（2）劉、張的住處不要轉移，原來住在哪兒，還住在哪兒。軍區要保衛他們的安全。這是對軍區、部隊的一個考驗。

（3）揪斗劉、張是嚴重的政治錯誤。揪斗劉、張的會，無論劉、張在不在場，那大方向就錯定了！

1968年1月，張西挺因為「杜靈」事件遭到群眾組織毒打。此事驚動了中央。周恩來發來專門指示：「這種行為是目無中央的表現，要嚴肅對待。」

在重慶也是如此。「重慶8.15」與「反到底」兩派也因為在打倒和支持劉張上產生分歧，繼而相互大打出手，竟然驚動了毛澤東。1968年3月15日，周恩來在接見四川省革籌小組領導成員時說：「重慶『八·一五』去年把李井泉搞去，根本不鬥他，不給『反到底』鬥，『反到底』紮了三個草人，鬥了後把他燒了，『紙船明燭照天燒。』為什麼不給他們鬥，這是大方向問題，我是聽主席說的。主席看的比我們多，是主席看小報，看了給我們講的。主席許多小報都看了。重慶『八·一五』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勝》，主席說叫『反到底』派批得一塌糊塗，還有什麼《嘉陵江上煙雲滾滾》，主席都看了。」周恩來又批評張國華和梁興初：「你們在成都要像梁興初同志在重慶對反到底的講話那樣，尖銳的批評紅成對劉、張的問題，問題就解決了。」「他是瞭解情況的，有點吞吞吐吐（指張國華）。我問的那句話，就是要你直說，你要敢講。你那發言是滑稽的，你對重慶兩派的說法是矛盾的。『八·一五』是響應「紅成」在成都打劉、張的，你說他比『反到底』錯誤少，你的發言是有偏向的，沒有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講話。你在中印邊界，主席交給你的任務，你的決心那麼大，為什麼這次你沒有那麼大的決心。十條對五十四軍稱讚了，五十四軍有點翹尾巴。對『八·一五』偏聽，所以『八·一五』響應紅成打倒劉、張的口號，沒有站在全局，五十四軍去年十二月的電報是好的。五十四軍在重慶的態度有問題，助長了『紅成』打倒劉、張的氣焰。張、梁、劉、張是不可分的，是十條上肯定的。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上。（指梁）你在重慶對『反到底』的講話，敢那麼批評，沒有講『八·一五』。給『八·一五』那樣講就好了。」

1968年3月15日，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央領導在接見四川省革籌小組領導成員時明確表態：反劉、張就是給李、廖翻案，就是劉、鄧復辟。

正是有了中央和周恩來的這種支持、壯膽、撐腰，劉、張二人在四川犯下了滔天罪惡。後來兩人因「殺人」和「傷害罪」等罪名分別被判20年和17年有期徒刑。

1968年5月28日，以張國華同志擔任四川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李大章、梁興初、劉結挺、天寶、張西挺（女）等同志擔任副主任的四川革委會正式成立。

3. 浙江

毛澤東私下對周恩來講，要保江華。於是周恩來照令行事。在1967年2月12日批鬥江華大會的前一日，周恩來派飛機接江華進京。而事先得到此消息的「紅暴」（浙江省紅色暴動派臨時指揮部）因此開始轉向保江華。但是毛澤東並沒有把此事批示給中央文革。

浙江當時主要的兩大派是「省聯總」（浙江省革命造反聯合總指揮部）、「紅暴」（浙江省紅色暴動派臨時指揮部），「二月鎮反」之後重組的「省聯總」由於受到外來執行「三支兩軍」任務的20軍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在當地佔據了優勢。

由於中央並沒有明確表示要打倒江華（這個同四川的情況截然相反，李井泉被中央早早宣佈要打倒），所以江華問題成為兩派鬥爭的一個原因。無論是周恩來還是中央文革小組都沒有明確說那一派是保守組織，所以兩派都是造反派組織。

1967年6月24日，中共中央明令發出《中共中央關於各地群眾組織代表團來京談判需達成六條協議的通知》。（中發（1967）199號）通知要求：一，不上街遊行。二，互不打架，互不衝擊。三，不抓人，不扣人。四，不阻礙鐵路，公路，輪船運輸。五，不動員農民進城，攔路，攔車。六，不奪槍，不開槍。由此按基本平等的精神，中央對浙江問題發出《中共中央對浙江「省聯總」、「紅暴派」關於堅決執行「六?二四」通知的協議的批示》（中發（1967）223號）周恩來在接見河南赴京代表團時說：「我向你們介紹過浙江紅暴會翁森鶴同志。省聯總把紅暴會打了，翁森鶴同志也挨了打，但他堅持大方向，堅持團結，批評紅暴會的缺點。他是紅暴會的赴京代表，因為這樣一個觀點，紅暴會認為他右傾，把他從代表團開除了。開除後他還是堅持大方向。我同紅暴會的同志講，不應該開除他。」此中也可以看出周恩來的態度。

浙江自1967年3月開始軍管。軍管會由駐浙江部隊負責人組成。龍潛任主任，阮賢榜、曹思明、南萍、陳勵耘任副主任。1967年6月30日，浙江「省聯總」「紅暴」派雙方代表對《六?二四》通知達成協議。實際上卻是衝突不斷。在中央發出上述中發223號文件通知之後，周恩來於1967年8月16日對浙江省軍區的電話指示中要求紅暴會要靠攏省聯總，要教育造反派照顧大局，要把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省一級不行的話，看看廳一級有沒有人站出來。這樣過一段，就可以成立革命委員會的籌備小組。由於一直沒有省級幹部站出來亮相，浙江省在1967年8月6日成立了浙江省臨時領導機構或稱為浙江省最高權力機構（這在全國是獨一無二的）。同時在8月份，中共中央決定改組浙江省軍管會和省軍區（即「兩個改組」）。任命南萍為浙江省軍管會主任，陳勵耘為副主任，熊應堂代浙江省軍區司令員，南萍代政委。此改組表明了中央的意見：即在大聯合中以「省聯總」為核心，「紅暴」為被聯合一方。為此兩大群眾組織也開始相互妥協，例如「省聯總」不再稱「紅暴」是走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是犯了錯誤。

儘管周恩來在1967年9月20日說「最近八個省、市、自治區解決了問題，即甘肅、四川、河南、內蒙、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但是實際上並非如此。但是周恩來的講話表達恩來中央迫切希望浙江能夠解決問題的想法。問題的關鍵在於兩點，其一就是省級幹部直到1967年年底才有人站出來亮相；其二，兩大群眾組織仍然紛爭不停，軍管會領導人對兩大派的看法不一。針對如此分歧，罕見的是，毛澤東在1967年11月22日批示到：浙江的「紅暴」，與湖北的「百萬雄師」不同，是個犯過錯誤的老造反派，有許多群眾，似宜同意姚文元同志意見，以幫助，批評，聯合為原則。究應如何，請討論酌處。此論調固然符合毛澤東在1967年7、8、9月在南方一系列談話的精神，但是未免不含有其對江華的個人因素。11月4日，周恩來對黑龍江省炮轟派代表時的談話時指出：浙江兩派打得不可開交，能不支持一派，反對一派？主席說：不能，它不是象武漢百萬雄師那種情形。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於1967年12月1日主持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討論《關於正確對待犯過錯誤的老造反派的通知》等文件。此通知於12月2日以中發通知形式發出。通知指出：「毛主席最近對浙江如何正確對待紅暴派問題，作了重要的批示。毛主席說：「浙

江的紅暴，與湖北的百萬雄師不同，是個犯過錯誤的老造反派，有許多群眾，似宜以幫助，批評，聯合為原則。」毛主席的這個極其重要的指示，對於各地的工作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關於正確對待犯過錯誤的老造反派的通知；中發（1967）367號）通知還指出：「目前不少地方都存在不同於百萬雄師的犯過錯誤的老造反派，應當對他們採取正確的政策，即毛主席提出的幫助，批評，聯合的政策，而不應對那些組織的群眾採取施加壓力、絕對排斥的政策，才能有利於促進革命的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但是實際上在執行過程中，各地的群眾組織並不是享有這種待遇。中共中央在12月4日對四十七軍就中發（1967）367號通知的請示的回電時說：湖南的高司不同於浙江的紅暴，高司的總部不能恢復，要幫助基層組織認識錯誤，要他們跟造反派搞大聯合。

中發（1967）367號文件還指出：「應當組織有各派參加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以『斗私，批修』為綱，大力幫助他們學習毛澤東思想；批評他們的錯誤，並促進他們自覺地改正自己的錯誤；同時大力推動他們同其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共同進行革命的大批判，實行革命的大聯合，在革命『三結合』領導機構中保留他們一定的名額。」浙江「省聯總」、「紅暴」派雙方又因此名額的多少展開新的爭奪。

為貫徹通知精神，周恩來在1968年1月份分別於18日和20日同「紅暴」派、浙江「省聯總」代表談話。周恩來批評了「紅暴」想繼續把隊伍拉大，矛頭指向軍區的做法，並不能因為「省聯總」壓過他們就要再反一下，但是同時也告「紅暴」以後省聯總來了以後也是要批評他們的，他們也有很多錯誤。周恩來在同浙江「省聯總」談話時要求浙江「省聯總」高姿態，在省、市革命委員會要有他們的代表，在工代會、紅代會代表中給紅暴留點席位。紅代會只留一名常委就不夠了，組織上採取高姿態。同時周恩來也要求浙江「省聯總」切實同「紅暴」聯合。接著在2月5日，周恩來基本上按照同樣的要求再次同雙方代表商談，稍微不同的是對於「紅暴」的批評少了些，同時表達了迫切希望浙江省革命委員會成立的願望。經過馬拉松式的商談，周恩來在2月15日，同時會見了雙方代表，雙方終於達成一致協議。

1968年2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聯合發出通知：浙江省「省聯總」和「紅暴派」來京代表，在學習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基礎上，經過了「斗私，批修」，實行自我批評，達成了《關於革命大聯合的協議》。浙江省革命委員會終於在1968年3月18日宣告成立。當日，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接見了浙江省赴京代表團成員。周恩來表示浙江委員會的成立要歸功於毛主席路線的勝利。

4. 內蒙古

內蒙古和很多其它省市一樣，奪權從1月11日《內蒙古日報》社開始。造反派先期佔領，接著保守派反攻，接著在保守派的要求下，軍隊介入。軍隊介入前，請示軍委，中央軍委文革小組組長徐向前回電指示：「一定要調查清楚情況，情況不明，不宜輕易表態。要站在革命左派一邊。軍隊不得動武，可以出面調解。」造反派對於軍方的行動大為不滿，不僅要求軍區領導到作出檢查，還圍攻軍區。1月27日，由造反組織「長纓戰鬥隊」寫的《內蒙古軍區竟敢違背中央指示，出動武裝部隊鎮壓革命群眾》一文載入《中央文革快報》，並由林彪批轉，通報各大軍區。但是隨第二天的《軍委八條》則讓軍區大受鼓舞。

2月5日，造反派學生韓桐被內蒙古軍區軍訓部副部長柳青開槍打死，為此國務院、中央軍委於2月6日發出特急明碼電報。全文如下：

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內蒙古軍區、呼市三司和呼市紅衛軍（均請軍區轉）：

在內蒙古軍區發生的事件，應該立即停止，事態不要擴大。請內蒙古自治

區黨委、內蒙古軍區、呼市三司和呼市紅衛軍四方面各派 3—5 名代表來北京商談解決。我們於 2 月 6 日派飛機來呼市接你們的代表。

據悉，軍區周圍有一師範學院同學中彈致死，如確，應嚴追兇手和指揮者，查出後應予法辦，並向死者家屬致唁和予以撫恤。

電報發出的第二天，「呼三司」報全文轉載，外蒙古電台立即播出消息：內蒙古軍民衝突，一學生中彈致死。根據吳迪先生的說法，這一國際影響讓周恩來後悔不迭——因為電報的最後一段是他加上去的。

2 月 10 日下午，周恩來、肖華等在人民大會堂小會議室第一次接見內蒙古四方代表。由於各方各持一端，無法做出結論，周恩來決定立即派內務部長曾山帶上秘書、法醫赴呼調查。周恩來再問詢了各派的情況，批評了「呼三司」醜化解放軍。周恩來說：「對待人民解放軍要注意影響，不要醜化。你們（指三司代表）將來奪權還要靠解放軍協助嘛！」

2 月 12 日，周恩來辦公室電話指示：內蒙的問題很大，總理正在全面進行研究，一定要很好解決。現在武鬥很嚴重，要求四方面代表分別給家裡做工作，停止武鬥，不要使事態擴大。2 月 14 日，周恩來再次指示：目前雙方對立情緒很大，這樣下去，對解決內蒙問題不利。幾方面都應立即打電話回去做工作，停止對立宣傳，停止對立和衝突。

1967 年的 2 月份，因為《軍委八條》的頒布，大環境要求造反派不能把矛頭指向軍隊。但是內蒙開槍事件過於嚴重，因此周恩來在第一次會見並沒有特別指出內蒙造反派的問題，並且接連發出兩個指示，要求息事寧人。

但是在 2 月 16 日的接見中，周恩來嚴厲批評了造反派，指責他們矛頭指向解放軍，不維護國家利益。而此時正是毛澤東在 2 月初之後連續多次批評中央文革之後，並且表示了「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人一定要走向反面，一定被人家打倒，幹不了幾天，無政府主義要不得的。

在這次接見中，周恩來首先講：「你們（指造反派）公開在報紙上點解放軍。你們完全沒有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接著周恩來抬出了毛和林，周說：「這樣也不行，主席和林副主席看了以後很不安，你們的腦子有點熱了，你們想到沒有，沒有毛主席的領導，沒有人民解放軍的保護，你們能實行大民主嗎？我知道你們沒有考慮這個問題，你們在給人民解放軍臉上抹黑呀！（周很激動）」

隨後，周恩來批評造反派拿死人壓活人：「我今天是抑制著感情說這些話的，你們當中不少是左派，現在我還承認你們是左派，但是這件事你們錯了，就是死了人也不能這樣做呀！我們不知有多少人民解放軍英勇地犧牲了，我們這樣做了嗎？」

周恩來接著舉了各地的例子，衝擊軍區是不對的，是不允許這麼搞的，因為「這次是有領導地自下而上的奪權，奪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這次奪權靠什麼？靠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親自領導，靠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靠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靠社會主義道路，靠『十六條』。」「如果解放軍有錯誤，你們可以提出來，中央可以解決。我們是相信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所領導的人民解放軍的，一旦敵人來了，首先衝鋒陷陣的還是我們英勇的人民解放軍。我和解放軍談話幾分鐘就能解決的問題，和紅衛兵則要好幾個小時。」

最後周恩來指出：「今天任何人都不准動搖我們解放軍在全國人民中的聲譽。」

借《軍委八條》的背景，加上周恩來的講話，無疑會使內蒙古軍區壯膽，認為自己大方向是對的。於是軍區變本加厲，同保守派結合在一起，製造白色恐怖。從圍攻內蒙古師範學院「東縱」大樓，到大肆拘捕，僅呼市公安局和內蒙古公安廳自 2 月 8 日至 3 月 17 日，就拘留、逮捕 500 多人。從 2 月初到 3 月中旬，全區旗縣以上的 190 多個單位被保守派奪了權。同時，軍區著手籌建黨委的「三結合」領導班子。與高錦明等「反烏蘭夫派」對立的王逸倫、王鐸被軍區列入應予結合的「革命領導幹部」名單之中。在以二王為首的「革命幹

部」的支持下，軍區決定於3月18日召開全市大會，成立呼和浩特革命委員會。

3月9日，周恩來又分別接見了「呼三司」和「紅衛軍」的代表。然而這次會見，周恩來同「呼三司」代表會見時完全是對軍區「和稀泥，對「呼三司」進行了批評。」周恩來上來就批評「呼三司」：「你們和軍區關係沒有搞好，那怎麼能行呢？他們打電話說，你們還散發傳單，繼續鬧對立，你們組織內部有沒有人挑動啊？」當代表郝廣德說：他們（指軍區和保守派）包圍師院時，有劇烈爆炸聲，外面有探照燈，人員匍匐前進，喊衝啊，沖……。」周恩來解釋到：「這是精神戰嘛！」

「呼三司」代表反應很多人被抓，周恩來無任何表示。只是在郝廣德說軍區是奉軍委和總理指示抓的時候，周恩來非常生氣表示：我怎麼能指示抓人呢！

周恩來又指責「呼三司」靜坐，指責「呼三司」在外面宣傳：「你們對軍區亂叫，哎，那怎麼能行呢？看你們把這事件鬧的，越來越複雜，二醫大到處捅，捅完就走了，把負擔加在別人身上。」

郝廣德辯解到：「二醫大被圍攻，我們去援助。」周恩來對此進行了批評：「你們紅衛兵就管得寬，什麼都管。軍區的事麼，問題越搞越複雜，跟軍區對立，使你們處於不利地位。」

周恩來的這種態度無疑對於軍區的行動是「火上加油」。然而這種態度和當時中央對於軍隊的態度是一致的，或許中央有平息事態，息事寧人，對雙方都進行勸解的意思。但是中央的屁股在當時是做在軍方這一側，因此造成事實上的支持軍隊，各地因此而形成的「二月鎮反」皆因此而起。

3月10日，康生在軍級幹部會議上講話，重點講了兩條路線鬥爭，這是長期存在的。3月16日，中共中央關於印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出獄問題材料的批示出爐（中發〔1967〕96號）。這種動態預示著中央政策的變化。事實上，「二月鎮反」並不符合毛澤東關於奪權的設想，因為如果是保守派奪權成功則意味著劉鄧路線的反覆。這豈不是前功盡棄了麼？因此，中央首先在3月17日發出通知：省、市、自治區一級的奪權，在採取行動之前，應事先取得中央同意派代表來京同中央商量。沒有經過中央同意，不要成立臨時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不要在對方報紙上報道和廣播電台上廣播奪權。此舉使得內蒙軍區決定於3月18日召開全市大會，成立呼和浩特革命委員會的設想破滅。

3月18日，周恩來等第三次接見內蒙四方面代表。在接見過程中，周恩來一反前態，嚴厲指責了內蒙軍區，在座的康生、肖華等也對內蒙軍區加以痛斥。（筆者註：大概因為毛澤東在3月11日下令調查青海2月23日流血事件。）

周針對內蒙古軍區宣佈「河西8.18」組織為反革命組織一事講：「你們表面上似乎聽中央的話，實際上你們不聽。我們辦事都得請示毛主席、林副主席，但你們不是這樣。你們這種情況，我們不得不耽心內蒙古軍區究竟站在什麼立場上。你們把那麼多群眾組織宣佈為反革命，同群眾搞得那樣對立。」

接著，周恩來針對內蒙軍區扣留《紅旗》和《解放軍報》記者一事，指責軍區對抗中央，是不遵守軍委的命令。在座的王力說：「《紅旗》雜誌是黨中央的刊物你們竟敢扣押《紅旗》的記者。你知道《解放軍報》是誰領導的？是林副主席，我們毛主席是最高統帥，你們把解放軍報記者也扣了起來，把筆記本沒收，至今不還！」於是周恩來說：「你們竟然在軍區門口把《紅旗》和《解放軍報》記者扣起來。四大自由嘛，記者沒有這個自由？肖主任打了電話，你們還要押送回來。扣留了筆記本，在黃厚手上一個月不報告。記者報導如不符合實際，你們可向上反映嘛，怎麼能扣留？這件事就是對抗中央，沒遵守軍委的命令。」

隨後，周恩來更加嚴厲的指責：……第四、宣佈人家好多組織為反革命，怎麼能這樣壓制？即使是保守的組織，也要教育提高，怎麼能壓制？完全不是對待群眾組織應抱的態度。這是劉、鄧路線（康生插話：這是反毛主席思想的，是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第五、你們派部隊來北京，就是你們要指揮中央，你們目無中央。北京衛戍區是保護中

央，保護毛主席的。你們派兵來大街上抓人，是要為所欲為。

第六、還有這樣的傳單（指軍區印的陳鼎寫的材料），還加上了按語。清華附中的一個十六歲的小孩子，即使是他寫的，也要勸說他不要寫。你們還加上了按語，印發傳單？如果是你們寫的。這樣做不是破壞解放軍信譽嗎？這怎麼能這樣對待紅衛兵？何況對紅衛兵，你們對中央文革的記者都那樣對待，這是對抗中央！

第七、你們包圍了師範學院，據這位同學（指郝廣德）講已經三天了。一個群眾組織，怎麼能那樣對待？這是你們有指揮的，要把一個群眾組織搞垮嘛。對這個問題，打電話你們沒有回答，還要中央去調查！這一個月來你們進攻，不照中央的意圖辦事。清華附中同學的信，如調查屬實是你們強迫寫的話，你們就要犯更大的錯誤，你們欺騙中央。

第八、開大會奪權，說是搞呼市的慶祝，實際上是奪區黨委的權。權星桓、康修民實際上是讓你們掌握的群眾組織抓起來了。對區黨委書記，你們軍區政治部就定了性？你們比中央在先把名字點了，不奪權也等於奪權了，你們有這麼大的權嗎？七、八號奪權（指呼市）根本沒有報來，十五號登報，明天要開大會，還要批准登報，都不是商議，是給我們下命令，統統是先斬後奏，你們犯了多大的錯誤！

這一系列的事情，我們不能再忍了。這些你們都沒請示過中央。你們想過了沒有？這麼做對不對？（郝廣德：他們把十八號開會的事在廣播電台廣播了）噢！報紙、廣播怎能有同中央不同的聲音？你們掌握了報紙、廣播，就登、就廣播？廣播問題的四點指示不生效了？

（郝廣德、高樹華：他們把二十二問中央文革，在京參予反中央文革活動的「抗大」，在報紙上、廣播上稱為「左派」，要大家學習）這是反動的！你們（問《紅旗》、《解放軍》報記者）認為「抗大」是什麼組織？（記者答：「抗大」炮轟中央文革，是反動組織！）

最後，周恩來說：「說明你們（指軍區）的立場問題，是執行劉、鄧反動路線。你們說群眾大會不開了，還是要開向中央示威？是真不開了，還是搞什麼？這都要看一看。對區黨委的六位同志要立即恢復自由！」「今天會上談的不能向外傳，四方面各負其責。」

周恩來給內蒙古軍區扣上來了一系列的罪名「向中央示威」，「欺騙中央」，「反抗中央」直至執行劉、鄧反動路線」。

值得提出來的是，周恩來在同一個時期指責其它軍區的言論同此相仿。作為執行當時毛澤東的革命路線，這無疑是沒有什麼可以多加指責的。然而，在官史如《周恩來傳》或者其年譜中，周恩來此種作為是絲毫未有提及的，為的是避免破壞了周恩來愛護軍隊的光輝形象。

以3月18日談話為基點，從3月18日至4月12日，中央多次接見四方代表，嚴厲批評內蒙古軍區、自治區黨委的王鐸、王逸倫和保守派。

3月30日，中央召見區黨委代表，周恩來讓二王檢查錯誤。周恩來指責王逸倫「頑固地堅持劉、鄧路線，又是烏蘭夫的人。」周恩來指責王鐸「搞投機」，「同保守派搞結合」。最後二人被周恩來定性為：「是沒有烏蘭夫的烏蘭夫反撲，是沒有烏蘭夫的烏蘭夫復辟」。

經過多次接見，被成為「紅八條」的《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內蒙問題的決定》在4月13日晚出爐。其主要內容是「呼三司」等造反組織是革命組織，軍區別領導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改組內蒙古軍區領導，成立以滕、吳為首的內蒙古革委會籌備小組。

但是此事遭到了內蒙古軍區和保守派的嚴重抵抗。呼和浩特竟然出現了「周恩來是兩面派」、「打倒康生」、「與中央血戰到底」、「砸爛高錦明的狗頭」、「與『呼三司』決一死戰」、「強烈要求中央撤銷八條」、「重審內蒙問題」等標語，以至後來還出現了「周總理為什麼反不得？」的大字報。4月21日下午，中南海西門外出現了五百多人的「內蒙古赴京代表團」，他們宣佈：「我們要在這門口靜坐，周恩來不接見，我們不離開。」靜坐持續了六天六夜，周恩來不得不承認：「在北京發生這樣的事，可以說還是頭一次。」4月27日，周恩來、康生、陳伯達等答應接見。但是在在周恩來不足兩個小時的講話中，口哨聲、口號聲、跺腳聲、起哄聲達五十餘次。這種藐視中央權威的會議或許是文革開始以來第一次，從某種意義上

說，其實就是宣告了文革路線的破產。

兩派的對抗逐漸升級，隨之武鬥在五月份也被推向高潮。5月10日，保守派在曹文生、張三林的指揮下，幾千人圍攻黨委大樓。圍攻人員手持凶器，砸爛門窗，焚燒文件，打傷工作人員100多人，重傷20餘人。5月11日，內蒙軍區在中央指令下派出部隊，支援造反派。保守派終至敗北。

根據吳迪先生的文章介紹：根據當時內蒙古的各類小報公佈的數字，自4月13日至5月13日的一個月內，呼市地區保守派（包括軍人）上街遊行示威者達十萬人次，出動汽車七百餘輛，參加武鬥三萬餘人。有三千多軍人不歸營房，脫離建制。在這一個月中，因武鬥致傷者一千三百餘人，重傷三百人，致死者十餘人。

針對如此混亂形勢，5月16日晚上，周恩來、康生、江青、徐向前、聶榮臻、葉群等16位中央首長在人大會堂接見了兩千七百多名赴京戰士。事前這些戰士被內蒙古軍區參謀長王良太等事先打過預防針。根據吳迪先生的論述，無論這些中央大員無論如何解釋，這些勸慰之言迅即淹沒在混亂和憤怒的海洋之中。終此會，台上是聲嘶力竭，好話說盡，台下是哄聲四起，群情洶湧。向台上遞條子，送材料的軍人接踵挨肩。坐在主席台一側的第二夫人葉群成了接收材料的三等秘書。會後，周恩來、江青、康生等人到總參招待所看望這些赴京軍人，這些中央大員們竟在「周總理兩面三刀」、「周總理是兩面派」的鼓噪聲中被送回了汽車。

接連在5月19日和20日，周恩來等又分別同軍區警衛營和部分軍區和自治區領導座談。軍區警衛營要整訓，周恩來講：「警衛營要做模範，過去你們領導上犯了錯誤，你們是受騙的，所以認為三司是個反動組織。過去你們支持『無產者』，所以現在感情一時扭不過來。你們要集中在一起，整頓一下，要做模範嘛！」第2日，周恩來同自治區領導座談，表示中央堅決支持滕、吳和造反派，並警告如果不服從命令，以自由脫離解放軍（論處），「北京軍區、北京衛戍區要採取行動」，「中央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5月24日，總政治部在政協禮堂召開歡送內蒙赴京人員大會。軍人在會場上再次高呼「背叛中央」的口號，衝上主席台毆打了內蒙軍區第一副政委吳濤和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陸楊。

主持會議的王良太向大鬧會場的將士們發問：「今天的會開的好不好？」眾齊聲歡呼：「好！」王良太回到住處後洋洋自得，並喝了茅台酒。」

毛澤東終於震怒了。5月26日，中央軍委頒布了《關於處理內蒙古軍區問題的決定》：「對軍區副司令員黃厚、參謀長王良太實行隔離審查。對軍區副政委劉昌、政治部副主任張德貴實行停職反省；軍區其它在京人員集中到外地整訓。」同時，「調一個師的兵力移駐呼和浩特；將軍區警衛營、通信營部分人員和高炮營，測繪大隊調離呼和浩特，分駐北京軍區指定地區。將內蒙古軍區改為省級軍區，劃歸北京軍區建制。」同日晚，周恩來、康生等中央負責人接見「呼三司」等造反派代表，傳達了軍委的上述決定，表揚他們聽話，勉勵他們戒驕戒躁，再立新功。十五天後（6月15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於內蒙古軍區問題的通報》，將中央對黃厚、王良太、劉昌、張德貴及其部屬的處理公之於眾。

在中央的極力高壓下，內蒙古的保守派終於被造反派擊垮。1967年11月1日，內蒙革命委員會成立。滕海清任主任，吳濤、高錦明、霍道余任副主任。滕海清是被從被窩裡叫起來直奔人民大會堂，由周恩來宣佈任命的。滕海清的上任卻給內蒙帶來了更深重的災難。

5. 廣西的大屠殺

廣西的情況也是比較特殊，在中央沒有決定明確支持韋國清之前，中央對於廣西的兩派

基本上調和。但是明確表態支持韋國清之後，中央則全力支持支持韋國清的一派，繼而這一派成了屠殺另一派的主要民間依靠力量，但是這種屠殺得到了韋國清的支持，甚至中央的支持。

文革中廣西主要是兩大派「聯指」和「4?2 2」。二者實則由群眾組織大聯合後，1967年4月19日廣西區黨委書記處書記伍晉南發表「四?一九」聲明，因為對此意見不一，從而分裂出來的。「聯指」（南寧聯指，柳州聯指，柳州鐵路局鋼聯指，桂林聯指，被稱之為保皇派）主要是支韋（韋國清，廣西區黨委書記，廣州軍區第一政委）打伍（晉南）賀（希明）霍（泛）傅（雨田）謝（王崗）袁（家柯），「4?2 2」（南寧4?2 2，柳州造反大軍，柳州鐵路局工機聯，桂林老多，被稱之為造反派）支伍反韋。

文革中周恩來多次接見廣西兩派代表。1967年6月1日，周恩來第一次接見廣西兩派代表談話時說：我們今天主要是聽兩派代表的意見。6月14日，周恩來第二次接見廣西兩派代表談話時表示：韋國清有功勞，但是也有錯誤要檢查。你們衝擊軍管就是不對。軍區支持韋國清同志過急了，個別同志工作方法有缺點毛病，你們可以提意見，進行批評。在這兩次會見時，周恩來和稀泥說兩派都是革命群眾組織。第三次，周恩來就嚴厲批評了「4?2 2」派，並指責了伍晉南：軍區，野戰軍可能有些缺點錯誤，但是你們（指「4?2 2」）這一派從來未講過解放軍一句好話。……伍晉南，我最後警告你，再插手鐵路、插手軍區問題，我就要隔離你們。6月30日，周恩來在第四次接見廣西兩派組織時又和稀泥，說桂林「老多」過去是出名的嘛，「4?2 2」是造反派嘛。你們造反的早，覺悟的晚。又指「聯指」說：你們造反的晚，覺悟的早。

1967年8月24日，周恩來和戚本禹第五次接見廣西雙方代表。周恩來嚴厲指責「聯指」進攻「4?2 2」，講「你們再這樣下去，我們就要全部武裝他們（4?2 2），看你們怎麼辦？！」同時周說：「現在軍區決定支持你們（4?2 2）。你們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方面，要歡迎他們（「聯指」）回來，慢慢地走向大聯合。」（筆者註：此時的背景恰恰是「7?2 0事件」之後的左轉。）

1967年9月13日，周恩來第六次接見廣西雙方代表時提出：兩派要聯合，不要叫「4?2 2」人家反革命集團了，反過來也不稱「聯指」為韋國清集團，兩方面組織要保證六?六通令、九?五命令的全面執行。（筆者註：「7?2 0事件」之後的左轉，然後又右轉。）9月22日，周恩來第七次接見廣西雙方代表，筆者尚未查到具體談話內容。

中共中央在1967年11月份，決定以韋國清為首建立文革文本革籌小組。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在1967年11月12日批轉韋國清同志《在廣西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線錯誤的檢討》（中發〔1967〕342號）。同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廣西問題的決定（中發〔1967〕353號）出台。《決定》指出「韋國清同志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雖然犯了一些錯誤，但是，他不堅持錯誤，能夠誠懇地檢查錯誤，態度是好的。這個檢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已經批准，並且已經偉大領袖毛主席看過，批示『照辦』。安平生、伍晉南兩同志在運動中也有錯誤，他們都做了初步檢查，韋國清、伍晉南、安平生三同志的聯名檢討，表示願意改正他們的錯誤。中央同意他們這個檢討。」

1967年11月12日，毛澤東批示同意廣西兩派促進革命大聯合十條協議。

1967年11月16日，周恩來單獨接見了廣西「聯指」赴京代表團。周恩來在接見中批判了中共早期領導人陳獨秀、瞿秋白等人的錯誤。

1967年11月19日，周恩來第八次接見廣西兩派赴京代表團時態度一改從前。周指出「聯指」和廣西「4?2 2」兩派都是革命群眾組織本來都是造反出來的。但是都犯了一些錯誤。同時周嚴厲批評了「4?2 2」敵情觀念不強，犯了很多違反紀律的事。究其主要原因則是「4?2 2」是不支持韋國清的。

正是由於中央的這個態度變化，廣西省在1967年冬「聯指」開始在廣西各地成批鎮壓屠殺「4?2?2」。這種屠殺同中央力挺韋國清有直接的聯繫。1968年4月9日，《廣西聯指報》在一版發表社論：向「階級敵人」刮起12級颱風，聲稱：韋老爺（韋國清）出錢，軍區出槍，「聯指」出人，向「階級敵人」主動地不停頓地發起猛烈的攻擊，向「階級敵人」刮起12級颱風。

掌握權力的「聯指」以及重新上台的幹部，「名正言順」地鎮壓廣西「4?2?2」，必須在政治上搞臭「4?2?2」。1968年5月2日，廣西軍區副政委、南寧市革委會主任韓世福在常委會說：廣西「4?2?2」是「走資派」、「叛徒」、「特務」、「地、富、反、壞、右」，以及「反共救國團」和「國民黨殘渣餘孽」操縱、混入的反動組織。據官方的內部機密文件記載，1968年5月11日，廣西各地、市、縣成立革命委員會後，「聯指」掌握了政權，不少地方刮起了亂殺人的歪風，到5月11日止，全廣西慘遭殺害的「4?2?2」的幹部、群眾和所謂「叛徒」、「特務」、「走資派」、「反共救國團」以及「地、富、反、壞、右」和他們的子女共18000多人。

1968年5月17日，韋國清為向中央提交一份重要報告，說在廣西「破獲了一起蔣匪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反革命組織，已經捕獲團長1人，副團長3人，政治部主任3人，經濟部長1人，支隊長4人，聯絡站負責人共63人。繳獲反革命組織綱領、反革命刊物、入團登記表、印鑒、與國外敵特機關聯繫的秘密通訊地址及部份槍支彈藥等罪證。」「該反革命組織涉及南寧市及南寧、玉林、欽州、柳州等四個地區」、「發展組織的活動特點是：利用群眾組織的派性，易地活動，鑽進群眾組織，互相串連，靠打砸搶補給經費，通過武鬥掌握武器，總部設在南寧市解放路新風街（廣西「4?2?2」派的控制區），利用「4?2?2」據點造反樓做聯絡站，與越僑有聯繫。」此舉得到了中央的大力支持，周恩來代表中央給以明確的結論。

以廣西為例子，著名的「七?三佈告」在1968年7月3日出台。正如吳若愚先生所論述：到了1968年的夏天，毛澤東接見紅衛兵頭頭蒯大富、聶元梓的時候，覺得造反派已經過了頭了，已經失控了，毛澤東利用他們已經達到目標，可以把造反派犧牲掉了。在此之前，中央頒布的「七?三佈告」就是在此背景下出籠的。其時，全國已經實現全面軍管，在廣西，掌握實權並從未被打倒的以韋國清、歐致富為首的軍方，從一開始就站在「聯指」一方。對「4?2?2」的集體大屠殺，就是在軍方的縱容甚至策劃，指揮下進行的。如果說「七?三佈告」前，軍方還是半遮半掩地縱容和參與「聯指」對「4?2?2」的屠殺，那麼「七?三」佈告之後，軍方就赤裸裸親自上陣，調遣軍隊對「4?2?2」實行大規模的武裝圍殲。實際上並不是僅僅廣西一家按如此模式照辦。

1968年7月，中央、中央文革派飛機到廣西，接兩派（「聯指」、「4?2?2」）頭頭赴京參加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7月25日，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在接見廣西來京學習的兩派群眾組織部分同志和軍隊部分幹部時對於「4?2?2」嚴厲指責。此次接見實際上一邊倒的審判，廣西造反派「4?2?2」被定為反革命組織。中央的「七二五講話」宣告廣西造反派組織的終結後，與會的「4?2?2」眾多代表被解放軍武裝軟禁在解放軍政治學院的學習班。廣西「4?2?2」赴京控告團427人，也成了「聯指」的俘虜，被押回廣西關監。1968年8月19日，廣西「4?2?2」的九個頭頭：白鑒平、廖偉然（柳州）、章英、農烈（南寧）、王反修、李振林、錢文俊（柳鐵）、劉振林、劉天償（桂林）被在京一起學習的廣西「聯指」頭頭當作「反革命」拘捕，扭送北京衛戍區司令部關押，隨後送回廣西各地關押。

這次「七二五講話」講話，在文革造反派歷史上應該佔有其重要的地位。下面是部分對話內容：

康生：聽說廣西黨校有個教員叫朱仁的，朱仁在座嗎？（這時區黨校「紅

浪」的朱仁站起來。)我希望你忠實地講，你來北京到底幹什麼？是革命的，還是不革命的？

康生：你這樣的黨校教員，毫無黨員氣味，你這樣的黨員，是代表什麼黨？你是代表國民黨，是謝王崗的黨！

周恩來：你是「4?2 2」的嗎？（朱答：是）你代表哪個「4?2 2」？

（朱答：現在的「4?2 2」。）是代表現在在南寧放火的「4?2 2」嗎？

熊一軍是不是你們一起的？（筆者註：朱仁為廣西黨校教員。）

康生：你要老實交待在北京造了些什麼謠言？參加了些什麼黑會？搞了些什麼黑活動？哪個黑司令部指示你的？

陳伯達：把你的黑司令部端出來！

周恩來對廣西「4?2 2」派評價上的「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在這個談話中表現的淋漓盡致。周恩來談到桂林造反大軍「包圍第三監獄、勞改工廠」一事時，有這樣一番話：「去年、前年你們造反動路線的反，做了些好的事，現在還造誰的反？！我在去年說過：你們還有造反精神，我支持了你們，現在你們變成了這個樣子，你們裡邊一定混進了壞人！」周恩來還斥責「4?2 2」另一代表蘇振國說：「你們把殺人的、放火的、搶援越物資的、中斷交通的，都說是受壓的，還說別人是右傾翻案，這是反革命罪行，對這些人就是要實行專政嘛！」當「4?2 2」代表曹東峰匯報「西大『革聯』被圍幾個月了，沒糧食吃」時，周恩來反駁道：「什麼沒糧食吃，你們搶啦！」這樣一些講話傳達下去，當然就會被認定是周恩來宣佈「4?2 2是反革命組織」了。

在長達五小時零十分會議上，所有在座的中央首長無一不對廣西「4?2 2」派進行了猛烈抨擊和嚴厲譴責，其語氣之尖銳，措辭之激烈，是文革時中央領導人對群眾組織一中少有的。完全形成了「群起而攻之」，只准認罪不准抗辯的局面。中央領導指責廣西「4?2 2」要造產階級司令部的反，梧州和南寧放火問題由「4?2 2」負責，犯了反對「七?三佈告」，不支持韋國清等錯誤。

同時周恩來等人還對「反共救國團」表了態。

周恩來說：「你們（指廣西『4?2 2』）組織裡就沒有『反共救國團』？廣西為什麼發生這麼多反革命罪行，就是後面有黑手。『反共救國團』總團在廣州，你們廣西有分團。他們有空子就鑽進來，雙方都要查」。

康生說：「恰巧你們那裡有『反共救國團』總團在廣州，分團在廣西。你們不是與廣東『旗派』有接觸嗎？『旗派』的頭頭有的當了『反共救國團』的頭頭，恐怕在你們那裡也有這個問題。」

周恩來說：「你們（指『4?2 2』派柳州造反大軍代表白鑒平）不是揪出了兩個嗎？『4?2 2』裡邊更多！」

康生說：「今天在廣西存在革命與反革命的問題，『七三』佈告已經指出了，人民內部矛盾很多，但敵我矛盾是主要的，『反共救國團』就是在你們那裡，還有托派分子和國民黨殘渣餘孽。」

周恩來與康生等人沒有絲毫的區別。

在這個講話中，周恩來還特別點了廣東「紅旗」派負責人武傳斌：廣東的武傳斌，雖然他是革委會的常委，但他破壞林副主席所說的三性——革命性、科學性、組織紀律性，偽造介紹信，帶一百多人來，做你們黑會的主席。大革命時，我在兩廣呆過，我為你們難過，兩個當黑會主席的，一個是廣東的武傳斌，一個是廣西的朱仁。我再講兒句，反正朱仁是會傳出去的，我也不怕你傳出去。去年，偉大領袖毛主席要我到廣州，與造反派談談，那時「三面紅旗」是造反派，但不能總吃那三個字，不能吃一輩子。他說什麼周某人是支持他們造反派的。但是，他現在跑到北京來，是造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反了！」

「七二五講話」不僅是對廣西造反派毀滅性的打擊，同時也沉重打擊了廣東的「紅旗」派。此後，廣東「紅旗」派成了「過街老鼠」，由「響噹噹的造反派」變成了「反革命」、「右派」，廣東各地遊街隊伍中經常可以看到被押著示眾的「牛鬼蛇神」是地、富、反、壞、右、「紅旗」……

當時親歷會場「4?2 2」派的「柳州鐵路局工機聯」頭頭錢文俊所描述的場景：整個主席台都在信口雌黃，連周恩來也變了個人。明明南寧的大火是軍隊和「聯指」炮轟造成的，我們卻成了放火的「4?2 2」……我終於明白了「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含義。整個接見的局面就成了討伐我們的算帳會。這是一個宣判我們政治死刑的宣判會，如此而已……直到天亮，這次令人終身難忘的接見終於劃上了句號。我們的「革命」也劃上了句號，正所謂「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不過，我總算開了眼界，知道了所謂「神聖的卑鄙」。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合力剿殺下，廣西發生了慘無人道的屠殺。對此，因很多文章都對此有過詳細的描述，在此，筆者無意再加以重複。

三、「楊、余、傅事件」

可以說如果離開了周恩來，毛澤東在準備發動文革時和在開展文革中的一些措施很難說能夠貫徹下去。而周恩來能夠在文革中一直「屹立不倒」，此乃一大原因。相比之下，江青的沖衝殺殺更多是在輿論方面，周恩來則是把毛的思想落實在行動上。1968年3月份發生的「楊、余、傅事件」就是個明證。但是周恩來在「楊、余、傅事件」中的角色和作用，一直為人所忽視。周恩來在整個事件中的表現可謂是舉足輕重。

楊成武、余立金以及傅崇碧的倒台至今是撲朔迷離，眾說紛紜。毛澤東在「7?2 0事件」急速左轉之後隨即來了個大調頭，隨之在10月份發表了《毛澤東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重要指示》。指示指出「造反派和紅衛兵小將到了可能犯錯誤的時候」。然而正如毛澤東所多次強調的，一個傾向總是掩蓋著另一個傾向，伴隨著該指示隨風而起的「右傾翻案」又達到了一個新的高潮。按照王年一的解釋，楊、余、傅的倒台則是因為在此大背景之下其忠誠度受到了「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懷疑，從而導致了清洗。吳法憲則認為是毛林在吳法憲和余力金髮生衝突時選擇了吳法憲。然而事實比這個複雜的多。

1968年3月24日，林彪對於楊成武等人的錯誤做了一個說明，隨後周恩來接著發言。周恩來首先是表態「完全擁護林副主席剛才宣佈的我們偉大領袖、偉大統帥的英明的決定和命令！」。其次是周恩來表態：我們要永遠忠於中央文革！周恩來為什麼表這個態？

楊成武的倒台，究其原因之一，中央文革認為楊成武對中央文革不忠！江青認為楊成武整她的黑材料。（筆者根據其他知情人的敘述，楊成武倒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楊成武腳踩多條船，特別是和江青走的過近，江青以圖通過楊進而染指軍隊，此事引起林彪的警覺，而在此事上林彪也得到周恩來的支持，另外楊成武私下里認為其應該在即將召開的「九大」上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對其現有权力表示出不滿，而此事引起毛澤東的反感。諸多原因造成楊成武的最終倒台。）特別是楊成武按照江青的指示，在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都表態同意下，組織編寫了「兩條路線鬥爭史」的提綱。此提綱是對真實歷史的完全篡改，毛澤東對此非常不滿。因為提綱只提到毛、林、江三人。二者相連，江青遷怒於楊成武。江青在3月24日講話中聲稱：又例如，有的人勾結起來，像楊成武之流，口頭上說，中央文革怎麼樣、怎麼樣。而實際上做了很多事情欺騙中央文革，這說明什麼呢？這就是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對以毛主席為首的、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反對人民解放軍，反對革命委員會。

因此，周恩來在此次講話中，非常突出的向江青當眾表示忠心。除了多次帶頭高喊堅決相信中央文革的領導！堅決擁護中央文革的領導！向中央文革學習！向中央文革致敬！向江

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此外，周恩來首先針對江青的心理特點，對於其備受懷疑的歷史情況做一說明，給以充分的肯定：

周恩來表示：「這裡，我提幾句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所起的作用。江青同志是一個堅強的共產黨員，無產階級戰士。她不是從今天，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三十年代她就是一個堅定的共產黨員，就是一個同叛徒，同假共產黨員、特務和社會的反動派作鬥爭的一位堅強勇敢的女戰士。」

隨後，周恩來針對於楊成武整黑材料一事表示看法：

「如果說現在或者是兩面派或者是特務、壞分子，他們所謂收集江青同志那個時候的材料，有兩種，一種是江青同志自己為戰鬥所寫的東西，那不是什麼黑材料，那是紅材料，革命的材料！至於國民黨社會上，那時候是反動派統治著，那時他們寫的東西，污蔑、造謠、迫害，那都是反革命的東西，把那些東西如果拿出來，作為黑材料，那你要在哪個地方登？江青同志自己說的很清楚，那就是台灣的話，香港的話，就是應該被打倒的那些人的話，那有什麼黑材料？」

周恩來接著對於江青的鬥爭歷史做了說明，「三十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學生。得到毛澤東思想長時期的修養、學習和鍛煉。經過了戰爭的年月。解放以後正是江青同志身體很差的時候，受到黨內一小撮走資派的代表人劉、鄧、陶，彭德懷，賀龍，彭、羅、陸、楊，譚震林等等，以至受到肖華的迫害。」以此證明「儘管如此，江青同志堅強不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進而說明江青的具體工作，「在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準備階段，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教育的時候，進行了文藝的改革，大家都知道，1964年演出樣板戲八出，都是經過江青同志親自指導、修改出來的。到了1966年要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了，反革命、叛徒、內奸彭真寫了個《二月提綱》，可是江青同志得到了林副主席的委託，寫出了革命的《二月座談紀要》，這是我們人民解放軍大家都人手一冊，讀過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提一提她的成績的一兩點，就足以證明江青同志的偉大成績。」

最後周恩來指出：「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剛才提到，她還有很多的著作，還有很多的演說，現在印成了小冊子，大家都讀了的。這就看出江青同志是我們黨內傑出的女戰士，傑出的共產黨戰士！值得我們向她學習！向她致敬！」

如果不瞭解楊成武為何倒台的真實原因之一，是很難理解周恩來為何如此屈膝卑恭向江青獻媚。

周恩來在這次講話中另外還突出了一下兩個特點：

1) 對於當前出現的「右傾翻案」給以嚴厲批評。周恩來講：「在這兩條路線鬥爭中，接著就出現了去年的反動的『二月逆流』，就是說，在中央以『二月逆流』的幹將譚震林為代表的，和一些同志、一些人，仍然繼續地、堅決地、頑強地、站在他們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上，矛頭對著中央文革，矛頭對著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早在3月20日，國務院辦公室就傳達了「譚震林應該打倒」的指示。

2) 周恩來把矛頭指向聶榮臻等人。周恩來講：「那麼，今年這一次又把楊成武等人事務（可以說是一個新的『二月逆流』，而這個新的『二月逆流』還是繼續去年『二月逆流』）公開出來，揭發出來。我們林副主席指出了，我們中央文革堅決的揭發這件事情。這一次事情還在繼續揭發，我們甚至於要研究，要在座的我們人民解放軍指戰員同志們，你們繼續揭發，有可能在楊成武後頭還有黑後台。」

聶榮臻在4月6日打電話詢問葉群：楊成武的黑後台指的是誰？葉群替周恩來掩飾：並沒有點名嘛，社會上正在炮轟，將來轟到誰就是誰。4月7日，聶親筆致信毛澤東，希望就楊成武「黑後台」一事同毛澤東面談。4月10日，周恩來電話轉告毛澤東在這封信上的指示：榮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養病，勿信謠言。周恩來在4月20日接見國防科委

代表時講：「聶榮臻同志我也很熟，我們是老戰友，我知道他不是一貫正確的，是有錯誤的，我不在這裡說。我收到他一封信，我想跟他提幾點意見，幫助他。在二（應為三月筆者註）月底楊成武問題出來後，他給毛主席、林副主席有一封信，也抄了一封給我，毛主席加了批語，然後準備繼續寫一份檢討，他確實對這次大會不是什麼事情都知道的，感到不安，寫了一封信，我打算給他提幾點意見。他是四月十六日寫的，我還沒有提意見，毛主席要我幫助他，等寫了以後，經過國防科委黨委討論後公佈，有意見還可以提。」後來召開八屆十二中全會，周恩來再次提到：「聶檢查說他這個『多中心論』是楊成武灌輸的，是受楊成武的影響。其實，是聶搞的『多中心論』，鬧獨立王國。在晉察冀就鬧起來了，楊成武不過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可見，這個黑後台，周恩來指的就是聶榮臻。

楊成武的厄運到此並沒有結束。

3月27日，周恩來在北京市工人體育場召開的10萬人大會上，再次對楊成武鞭撻，對江青的革命歷史、豐功偉績作了系統的宣揚，並當眾舉臂高呼向中央文革學習！向中央文革致敬！向江青同志學習！致敬！和打倒譚震林等。周恩來為什麼如此賣力？1968年2月13日外交部91名幹部聯名貼出《揭露敵人，戰而勝之，徹底批判「打倒陳毅」的反動口號》，被認為是「為二月逆流翻案的代表作」。周恩來對於越是關係親近的人下手來特別重，例如原南方局的幹部潘梓年等人的處理，以撇清自己。周恩來在此時率先表態打倒譚震林和如此賣力猛批楊成武都與此點不無關係。

周恩來後來在多個場合對楊成武等人繼續鞭撻。周恩來在1968年4月20日接見國防工辦、七機部、中國科學院代表時表示：總參黨委提「以楊成武為核心的黨委領導」那種情況是楊成武自己提的，是自己喜歡，不但自己喜歡，而且對別人也強加，給國防科委學習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寫了一封賀信，寫了有以某人（筆者註：指聶榮臻）為核心的國防科委黨委的領導。在「九大」時，當毛澤東提到肖華、楊成武時，周恩來表示肖華，楊成武都是壞人，楊余問題大一些，傅也不是老實人，不講實話，三個人都不講實話。

到了1970年，周恩來又暗示楊成武是所謂「五·一六」這個反革命分子戚本禹等人的後台。周恩來說：「戚本禹是個野心家，是跑腿的，活動能力很強。他無孔不鑽，文化方面他鑽的地方最多。江青同志不讓他去，他硬要去。他還到煤炭部、化工部，工廠也到了，工廠到二七車輛廠、首鋼。所以工業單位也要搞，文化方面他和體委的劉長信，衛生系統的孫正有來往。他兩個兒子證明也不是好人，他能伸就伸，對樣板戲也插手，亂改，特別是對交響音樂《沙家濱》和《白毛女》。楊成武那篇文章主席很不滿意，大樹特樹不符合毛澤東思想，不能登出，但戚本禹一定要登。後來登在第二版上，楊成武還不滿意。戚本禹道歉，王力還給送像章慰問。互相勾結，暗地活動，以後才揭發出來。」

「楊、余、傅事件」後的一個直接後果是由軍委辦事組取代軍委常委。然而自軍委辦事組改組起到提議軍委常委不再開會者均是周恩來！

1968年3月25日，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向林彪報告稱：「中央文革碰頭會議討論過新的軍委辦事組名單，擬了5個同志，現先送上，請考慮是否妥當，並請在您考慮後，向主席報告請示。名單：黃永勝組長，吳法憲副組長，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當天，林彪：「呈主席批示。」毛指示照辦。

1968年3月28日，毛、林、周接見黃永勝、吳法憲、溫玉成。毛問辦事組現有哪幾個人，黃永勝等回答後，毛說，還可以增加劉賢權。政工小組可以考慮取消。今後軍委辦事組由林副主席直接捏到手裡。討論過程中，周恩來提議說：「軍委常委不要開會了吧？」（筆者註：《周恩來年譜》在此處掐頭去尾，直接引用了毛澤東的講話而把周恩來的提議刪略不提。）毛說：「軍委就是辦事組。軍委常委可以不開會了。」林彪說：「把它懸空起來。」毛說，葉劍英說過，楊成武是接班人。現在換了黃永勝，你這個黃永勝為什麼不可以接班？

除了上述周恩來的講話之外，還可以看出周恩來在其他方面落實毛澤東部署時的重要作用。1968年3月23日，毛澤東開會解決「楊、余、傅」問題。定板之後，剩下的事情都是由周恩來主持完成的。周恩來在毛澤東和林彪離開之後，繼續主持會議，決定立即採取措施，第一，命吳法憲派飛機立即接黃永勝進京。為防止走漏風聲，要求吳法憲一個人去接黃後，由周親自談話。第二，周同時命令李作鵬和邱會作帶領中央警衛團部隊去楊成武家，將楊帶到人民大會堂，由林周等人談話。抓楊成武的時候，作為楊成武鄰居的徐向前，其哨兵被換，電話線被切斷。可見作為中國特工鼻祖的周恩來的老辣與幹練。第三，通知鄭維山和傅崇碧到人民大會堂，由周恩來談話，並準備飛機將傅崇碧送去瀋陽，並通知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準備好接待工作（根據傅崇碧的回憶實為軟禁）。第四，派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楊德中帶警衛部隊到空軍大院逮捕余立金。第五，決定在召開駐京部隊團以上幹部大會上，傳達中央對「楊、余、傅」問題的決定。

整個過程，滴水不漏。無論是在文革發動時的羅瑞卿事件，還是文革中的「楊、余、傅事件」，還是後來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周恩來都堅決地貫徹了毛澤東的決策，可謂忠心耿耿，日月可鑒。

四、清理階級隊伍

始於1967底的「清理階級隊伍」，一方面是對中共傳統的敵人加以消滅，另一方面則是在建立革命委員前後，作為解散群眾組織（特別是對立面的組織被冠以各種例如叛徒、特務等稱謂加以整肅）、消除派性的一種輔助手段。

毛澤東利用文革初期劉少奇等第一線官員犯下的錯誤，激起的眾怒，號召民造反，向著他認為的官僚階層發動進攻，這自然不包括所謂「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1967年1月風暴之後，毛澤東本來以為各群眾組織會很快達成協議，「三結合」會很快實現。在此基礎上，毛澤東就會繼續引導把矛頭指向軍隊。即毛澤東的本意是依靠軍隊整治地方、各層官僚政權，然後反過來依靠重新建立的政權整治軍隊。1967年4月初接連發的《中共中央轉發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及附件》以及軍委十條，都強調了因為「沖軍區和對軍區提意見，或對本地區、本單位的奪權有不同意見，而被打成『反革命』的，應一律平反，被捕的，應一律釋放，通緝令，應一律取消。」在此大的背景之下，在1967年夏季發生了各地嚴重衝擊軍區的事情。但是「三結合」併沒有很快實現，毛澤東不得不才用軍管的方式，而這注定了毛澤東想依托重新建立的「三結合」組織來整治軍隊的想法落空。實際上整治軍隊的實施到了1974年批林批孔的時候才得以實現。毛澤東不得不優先考慮成立符合自己旨意的政權組織。但是在種種政治勢力出於自身的利益，紛紛對造反派組織實施滲透與控制，導致各地的群眾派性武鬥不斷升級。此衝突是造成各地遲遲不能成立「三結合」模式的革命委員會的主要原因。因此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工作重點自1967年8月底之後就從整「走資派」轉為重點打擊群眾組織中的「壞人」。

因此當大批的造反派衝垮了各階層的官僚政府後，周恩來代表中央宣佈：群眾組織要解散。但是「請神容易送神難」，這種行為難免被造反派認為是「兔死狗烹」。於是很多造反派顯示出其獨立性，1968年7月有所謂的由北京、廣東、廣西、四川、遼寧、黑龍江、青海、貴州等地造反派頭頭雲集的所謂清華、「北航黑會」就是其典型案例。其在會上要醞釀成立的全國造反派聯絡組織更是犯了當時「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大忌，反過來遭到更殘酷的打擊。

但是造反派畢竟僅是群眾組織，在經歷了較長時間的融合後，其成分非常複雜。這就給當權者有機可乘。毛澤東在1967年視察三大區的時候就講：「群眾組織裡頭，混進了壞人。」毛澤東在九屆一中全會上回顧時也說：「工廠裡確有壞人。」而這些壞人按照毛澤東的

說法，恰恰是「此次運動中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來，是大好事。」毛澤東在一開始，設想通過「斗私」、「批修」等「說服教育」的方式來消除群眾組織之間的派性，但是並未成功。於是借用參與行政控制權力的軍隊為主導，在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掌控下，「清理階級隊伍」成為毛澤東對付造反派的一個殺手鐮。

而「清理階級隊伍」這個詞正式的出爐，則是在1967年11月27日，周恩來、康生和江青接見北京紅代會成員時江青提出的。江青講：「在整黨建黨過程中，要突出兩條路線鬥爭歷史，不突出不搞清楚兩條路線鬥爭歷史是不行的，這一點回去好好搞一下。新華印刷廠講得很好，就是建黨過程中，在文化大革命過程中，要逐漸清理階級隊伍，黨內要清除特務、叛徒、變節分子，黨外也要清理，對於有現行反革命活動的，要嚴肅處理，剛才提的三K黨（指國民黨、一貫道、三青團）有現行活動的嚴肅處理，地富反壞右不老實的也要嚴肅處理，當然由群眾處理，不是由政府。」

1968年5月13日，姚文元把《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送毛澤東參閱。5月19日，毛澤東批示：「建議此件批發全國。我看過的同類材料中，此件是寫得最好的。」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聯名轉發這一材料，要求「有步驟地有領導地把清理階級隊伍這項工作做好」。全國範圍內正式開始清理階級隊伍。

然而事實上在這之前，各條戰線的清理階級隊伍就已經動員多時。

1968年2月21日，中央首長在接見天津市市委會及駐京部隊文藝系統代表時的講話充分體現了這一思想。周恩來講：「文藝界大多數人是要革命的，但周揚以及叛徒、特務掌握的文藝界蓋子沒有徹底揭開，我們現在抓住天津典型，不僅要在天津，像方紀、孫振、白樺、李超、楊潤身等，其他地方也有周揚的死黨，必須號召廣大文藝界革命派，擦亮眼睛，分清敵我，樹立起無產階級革命隊伍。把這一小撮壞人揪出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批判黨內最大的劉鄧陶，聯繫到文藝界的黑線周揚、夏衍，進行批判。不僅是天津，上海、北京也有，他們勾結在一起，我們必須要把他們批臭批倒，好不好？天津萬張反革命集團，不僅是兩個人，是個集團，當然是個小集團，有叛徒，有特務，特別是在文藝戰線，公檢法專政的機關更要做好工作，要改造，要改造公檢法，改造文藝界的領導，把壞人揪出來，有錯誤的檢討錯誤。公檢法是實施專政的，以後必須依靠解放軍改造。」

1968年5月28日，周恩來在接見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四川班全體學員時指出：「四川省革命委員會成立，任務繁重，要深入開展革命的大批判，因為過去對劉、鄧及其在西南的代理人李井泉聯合批判不夠，流毒很深，還未肅清，你們不是要解放大西南嗎？這個口號現在才實現，貴州開了個頭，還不夠，四川處於首位，一定要四川起來，四川在西南影響很大。要把他們批深批透，斗倒斗臭。這是你們的責任，兩派要聯合批判。同時，還要聯合起來清理階級隊伍，把最壞的人揪出來，當然要區別對待，最近我們印了江青同志的二（兩）個講話。江青同志去年十一月五日給文藝界座談的講話，……主席批示的某個印刷廠清理階級隊伍的材料，還有公檢法清理階級隊伍的材料，這點在四川很重要，中央是寫在第一條的，希望你們兩派要聯合，深入地把階級敵人清理出來，只有這樣你們才能心明眼亮，四川這個大後方才能鞏固。」

隨後，在周恩來的主持下，下發了一系列的在各條戰線上清理階級隊伍的指示，例如《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關於轉發全國煤炭工業會議決議的批示》（1868.07.24；中發（68）112號）中指出：認真清理階級隊伍。解放前的煤礦長期被帝國主義、官僚買辦霸佔。解放後，在中國赫魯曉夫招降納叛的叛徒哲學庇護下，一小撮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混進了煤礦職工隊伍，他們伺機破壞和搗亂，妄圖復辟資本主義。我們必須把它們挖出來，批倒批臭。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做好調查研究工作，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穩、準、狠地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在當時關於各省的革命委員會的批示以及各省派系聯合的批

示中，清理階級隊伍成為必提之要件。

同一個時期，中央首長在接見各省代表團時，也均提出清理階級隊伍都的要求。但是文革開始後，毛澤東很少對事情作出具體指導，具體的執行是靠周恩來完成。當毛澤東提出要清理階級隊伍的時候，周也有自己的認識：「要自己把壞人揪出來，有材料交給對方組織，自己把自己那派壞人揪出來，這樣子比較好，不損害革命組織本身。毛主席教導我們，在通常情況下容易識別好人壞人，但在特殊情況下，背後有壞人容易被蒙蔽，要自己把他揪出來，這樣不損害這個組織本身，這個組織就更好。」在如何執行上，1968年2月5日，周恩來接見浙江省聯總代表談話時指出：「辦事組，政治工作組，搞個專政的。內蒙古搞得好，他們叫群眾專政。」

高樹華先生以其親身經歷說：如果列舉文革中最为百姓痛恨的事情，除了「抄家破四舊」，恐怕就是屬所謂「群眾專政」了。恐怕後者更勝一籌，呼市地區有民謠說：「不怕判刑坐監，就怕送到群專。」因為在「群專」名義下，可以任意逮捕、關押、刑訊，甚至秘密殺害，無需法律依據。1968年1月15日，「呼和浩特市群眾專政指揮部」（簡稱「呼市群專」）成立，和全國的形勢合拍，內蒙古猛挖烏蘭夫黑線上的漏網之魚。17日，「呼市群專」就開始了第一次大搜捕，「範圍之廣，規模之大，深入程度、組織紀律性都出乎意料之外……從而狠狠打擊了階級敵人。」抓的人之多，迫害手段之殘酷，包括高樹華先生的著作在內的很多書籍都對此有過詳細的描述。1月6日，在內蒙革委會第二次全委會上，滕海清、高錦明等人發動了「挖肅」運動，並組織了一批「挖肅」的骨幹隊伍，並提出「挖烏蘭夫黑線、肅烏蘭夫流毒」。在1968年的1、2月份，根據時任內蒙古革命委員會常委高樹華的回憶，內蒙古的挖肅和群專均得到了中央的肯定。1968年的2月4日，中央首長在接見赴京匯報的滕海清等人，對內蒙的工作很是讚賞。得到中央支持的滕海清變本加厲，最終在內蒙古的「挖肅」以及「內人黨冤案」上遺臭萬年。1969年2月4日，周恩來等中央首長在接見內蒙古革委會主任滕海清時仍然說：內蒙很複雜，內部有敵人，外部有修正主義，烏蘭夫在內蒙搞了二十年，他要搞獨立王國。內蒙問題，要全部解決，有個時間問題，你們時間不長，搞得不錯麼，你們不要太急了，中央從來沒有催你們。

根據周恩來的講話，群眾組織要自己去判斷，識別，自己去揪。這無疑是提供了一個清理對立面的絕好機會。主持中央日程工作的周恩來從來沒有出台一個文件系統而明確的說明，僅是籠統的要求和發一些所謂「經驗材料」。至於要清理什麼樣的人，政策標準是什麼，卻從來沒有發過明示。這是清隊中各地個單位自行其是根本原因，也是造成如此大規模的迫害慘劇的罪惡之源。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矛頭對準那些造反派則是心照不宣的。

滕海清辦公室主任李德臣說：「值得注意的是，有些造反派已經發展到老虎屁股摸不得的地步。……現在已經到了觸動老造反派靈魂的時候了。」滕海清更是親自上陣，矛頭指向「呼三司」。對此點，全國各地都在唱同一個經。

「清理階級隊伍」之所以受到歡迎，還與各地掌控權力一方清除各種異己勢力提供了便利。董國強先生以江蘇南京為例，詳細論述了許世友利用此機會大整原來對立面的過程。

即使在中共自己和毛澤東本人看來，「清理階級隊伍」也被嚴重擴大化了，周恩來對於這種擴大化是知道的。1968年底，曾思玉向周恩來匯報：湖北省清理出幾萬多階級敵人。最終這場由毛澤東親自領導、周恩來等人協助進行的文革中的一個重要步驟最終導致了三千萬人被鬥，五十萬人死亡的慘劇。其具體細節已有眾多文章論述，此處不在贅述。

由此可以看出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文革碰頭會成為中共中央的權力樞紐，也成為毛澤東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鐵拳頭」。執行毛澤東的決策，同各地方派系打交道，是周恩來工作中的重點。但是在此過程中，毛澤東對於當地派系的態度，或者是毛澤東對於當地派系所擁護或者反對的當地領導人的態度，成為周恩來行為的準則。毛澤東自1967年南巡歸來，隨即提出要開「九大」。周恩來在準備「九大」的過程中盡心盡力，並且在八屆十二

中全會上做了重要的講話，為打倒劉少奇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第一部 第八章

「九大」前後：為毛鞏固文革的勝利

1968年9月，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雖然毛澤東「天下大治」的目標還遠遠沒有達到，但是大體上壓住了「天下大亂」的局面。10月，中共召開了八屆十二中全會，對「文化大革命」的失敗者劉少奇進行了總清算，同時還批判了「二月逆流」的參與者。1969年4月，中共召開了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文化大革命」的勝利者之間進行了權力的再分配，毛澤東、林彪、周恩來、江青都各有所獲。然而，勝利者皆大歡喜的局面沒有維持多久，新一輪的權力鬥爭又「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開始了，才一年多就在1970年8月的九屆二中全會上公開爆發出來。

一、八屆十二中全會

1967年9月23日，毛澤東視察華東、華北、中南區之後回到北京，就提出明年要結束文革，召開「九大」，專案要盡快結束。除了有問題的，很多的同志要參加「九大」，要當中央委員。劉少奇與鄧小平要有區別。並且指示周恩來負責「九大」籌備工作。

次日，毛澤東召見周恩來，表示接班人當然是林彪，同時表示劉少奇與鄧小平分開。周恩來在10月9日表示把應當用法律的形式把林彪作為接班人定下來。1967年11月，由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上，整理了一份通報並由中央下發全國，即《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關於徵詢召開「九大」的意見的通知》。通知說：許多同志建議，「九大」要大力宣傳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並寫入「九大」的報告和決議中，進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

中央在1968年9月全國各省市建立革委會後，又宣佈進入了「斗批改」階段。《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的9月7日社論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員，工廠裡的斗、批、改，大體經歷這麼幾個階段。」1968年年底至1969年年初中共中央陸續批轉了北京「六廠二校」的經驗作為「斗批改」的樣板。

為了籌備「九大」，中央在1968年10月份召開了八屆十二中全會。1968年10月8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事先討論出席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名單（草案），共商定一百三十三人。9日，周恩來起草了一個出席擴大的十二中全會的名單草案解釋，並將名單送毛澤東、林彪審定。

1968年10月13日，八屆十二中全會在京召開。會議前，中央文革小組向周恩來提出要再一次批判「二月逆流」，清算他們的錯誤，而且連朱德也要批判。周恩來提出要請示毛澤東。江青回復毛澤東已經同意。周恩來於是安排幾位老師和副總理分別到全會的各個組裡去。例如陳毅到華東組，華東組對於陳毅可以說知根知底，這種安排極其有利於批判。根據吳法憲的回憶，中央文革小組提供了一些「炮彈」（批判材料），不僅有幾位老同志在「二月逆流」中的所謂錯誤，還有他們幾十年以來的老賬。吳法憲認為這些這些材料中央文革的人是提供不出來的。因為這些老同志參加革命以來的錯誤統統得到了清算，包含紅軍初創時期、第一次國內革命時期、井岡山時期、瑞金根據地時期等。

毛澤東在10月13日講話時，曾經和周恩來有以下對話。

毛澤東：「肖×還是打過仗的，國慶節上了天安門，這次沒有去，他是什麼問題？我也不清楚。」周恩來：「他有段歷史不清楚。他在潮安縣一個村莊打了一仗，向敵人交了槍，還回家成了一個黨。這次被造反派查出來了。」

毛澤東：「×××呢？」周恩來：「大革命失敗以後，他在梧州開書店被抓後，向敵人乞降，原判死刑，改為徒刑，他又乞降，放出來時他跪下說：『再不當共產黨。』。經過調查，確有此事，需要審查，現在不能參加這個莊嚴的會了。」

周恩來就是「活字典」。因此，筆者有理由相信正是周恩來提供了這些「炮彈」。

引人注目的是，周恩來在這次會議上，系統地批判了軍中元老。

對於聶榮臻，周恩來批判到：（1）聶榮臻對科學院、國防科委發生鎮壓群眾，給他指出，他不愉快，硬要把一派壓垮，結果使七機部長期武鬥；（2）聶榮臻同志在晉察冀鬧獨立王國；百團大戰，他很積極；執行劉少奇「和平民主新階段」，也很積極；（3）聶借口保護幹部子女，說我們是：「不教而誅」。實際上是關心「聯動」；（4）聶榮臻同志不但對「9?15」、「9?16」的問題處理得錯誤，他硬把趙爾陸同志逼死，還說趙爾陸是自殺的，經化驗，服過安眠藥，但不至死的程度；（5）「多中心論」是聶榮臻搞的。但是聶檢查說他這個「多中心論」是楊成武灌輸的，是受楊成武的影響。其實，是聶搞的「多中心論」，鬧獨立王國。在晉察冀就鬧起來了，楊成武不過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6）造成國防工辦、工政和國防科委的對立。原來三家是一個食堂，所有權是科委的，由於聶榮臻的指導思想是獨立王國，不給工辦，工政的同志吃飯，逼得工辦、工政的同志臨時在工棚裡開了一個食堂。

葉劍英的錯誤在於：（1）葉劍英派工作隊，好多都派到肖望東那裡去了，所以肖望東對主席那麼凶；（2）戚本禹也是二月逆流的一部分，是跟葉參座的。因為他們壓抑群眾運動，所以軍事院校沖中南海；（3）二月大鬧懷仁堂後，17日甘渭漢起草鎮壓群眾的傳單，葉劍英修改後，還加重了，加上「如不立即撤退，一切後果由你們負責。」用飛機大量散發。接著就抓人，抓了十萬人，還說少。軍隊剛開始發動群眾，黃新廷和李井泉勾結在一起，來了一個鎮反運動。於是萬縣就開了槍，一次打死170多人，其中還有小孩子，這事葉劍英也是有責任的；（4）葉劍英的女兒（葉向真）沖軍事科學院（王樹聲同志為保護檔案）大字報也上街了，葉是知道的，他沒有制止。葉向真用綁架的方法，只用了七分鐘的時間，就把彭真、羅瑞卿搶走了，引起了以後的全國綁架，此事戚本禹和他們有聯繫；高幹子女作壞事，就是高幹縱容的，陳雲的女兒陳偉立，徐向前的女兒徐魯濱，反動得很，現在還直接攻擊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付主席；（5）趙永夫是付司令員，把司令員劉賢權同志關起來，23日鎮壓群眾，《青海日報》的「八?一八」給圍起來，打死三百多人，葉劍英還打電報祝賀，說他們打了勝仗。趙永夫倒說是林付主席祝賀的。二月開軍委以上幹部會，就是要糾正他們的錯誤，但葉劍英還把趙永夫找來介紹經驗，中央看到不對頭，林付主席講了話，才制止了。

徐向前的問題更嚴重：（1）徐向前對邱會作同志的批鬥要負責。邱會作同志被鬥了幾個月，被當權派中一小撮壞人搞了一個多月，幾乎被整死。林付主席要他到香山找個地方休息，徐向前下令讓他回去主持工作。徐向前說：「我現在給你打電話，不是以軍委文革名義，而是以軍委付主席的身份命令你回去主持工作。」在這種情況下，邱會作同志只好服從。六點鐘接到電話，八點鐘就回去了。第二天一早，就被捉去了，被打個半死，打得骨折了；（2）他們鎮壓群眾後，有些學生在三座門靜坐幾晝夜，要找徐向前辯論，中央讓他去接見群眾，他不去。有的同志說：「外面冷得很，不要把他們凍壞了。」徐向前說：「凍死了活該，多凍死幾個。」對群眾就是這樣的恨。以後還是陳伯達同志去作工作，徐向前還說：「這是軍隊的事，誰要你管？」並說：「我用不著你們管，我沒有什麼錯誤。」江青同志是全軍文革的顧問，但是他們開會不通知她，所以江青同志說：「他們把我開除了。」

周恩來還對保護老幹部發表了自己的看法：（1）聶、葉、徐三人點頭抓楊勇，聶還說：

「要燒，要燒焦。」群眾聽說是這樣，於是就抓起來了。後來他們推脫責任，說是上面點頭的。後經再三追問，鄭維山同志還當面對證說：「是在京西賓館第二會議室，你們三人點頭的，怕有問題，又找了他們二人，他們說了，要燒，要燒焦」。這樣他們才啞口無言。到底誰在保護老幹部？（2）中央文革曾保過聶，但他對中央文革反而不滿。也保了陳毅、徐向前，都不滿，竟說：「不要你們保」。好像保了他們，他們就不光榮了，他們自以為一貫正確。實際上幾個元帥兩次接見的兩次講話後，群眾要他們檢查，中央文革的同志出來保他們全部過關的。事後，他們對這些不但不感激，反而說中央文革不保護老幹部。

周恩來最後質疑說：他們保護什麼老幹部？他們保護的是劉鄧司令部！

會議的最大成果則是，依據周恩來主持的中央專案組提供的證據，全會通過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及《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證》。

二、「九大」的召開

1968年10月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閉幕。同年12月，周恩來起草「中央參加「九大」作代表的名單和預擬名單」。

1969年3月8日，毛澤東召集有關人員開會。毛澤東第一句話就問：陳伯達政治報告寫得怎麼樣了？周恩來回答：看來恐怕不行吧。同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討論由陳伯達起草的部分「九大」政治報告稿和「九大」準備工作會議的時間、議程。會後，將會議情況書面報告毛澤東、林彪：「九大書面報告稿，伯達同志昨夜已交出四分之三草稿，還有兩個半問題（國際、毛澤東思想和團結起來），請伯達同志三天內將它寫完，然後大家來議。」而陳伯達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稿被指責為「鼓吹唯生產力論」，最終遭否定，周恩來並沒有表示任何支持或者贊同的意見。

1969年4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開幕。

周恩來在4月14日做了發言，主題有二，第一個表態擁護文革，第二個是吹捧林彪。周恩來表示：「（在回顧了歷史再經歷文革之後）才能懂得黨的歷史，就是毛澤東思想勝利的歷史，才能懂得毛主席是怎樣創造性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才能懂得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才能懂得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如果不是毛主席親自倡導，並發動群眾進行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就不能摧毀，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就會像毛主席很早就指出的那樣，那就不要很多時間了，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面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的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

周恩來發言的第二部分則造成了嚴重的歷史後果。那就是最遭人詬病的「林彪與毛澤東在井岡山會師」一說，使林彪長期遭到不明真相的人們的恥笑和責罵。對這一篡改歷史的說法風行一時，周恩來是有責任的。作為南昌起義的主要領導者之一的周恩來，應該比一般人更瞭解那段歷史，但是，為了政治需要，為了「緊跟毛主席」，他卻以「無產階級司令部」第三號領導人的重要身份向莊嚴的黨代表大會講了這樣的話：「林彪同志成為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經開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義失敗後率領一部分起義部隊走上井岡山，接受毛主席領導的一位光榮代表。從此，林彪同志一直緊跟毛主席，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為中國人民革命戰爭和革命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隨後，周恩來又於5月14日在國務院所屬單位傳達「九大」大會上傳達毛澤東在「九大」期間的講話時，談到南昌起義的時候，再次說：「林彪同志南昌起義失敗後，帶領部隊上井岡山，一直在毛主席身邊戰鬥。所以我說南昌起義的光榮代表應該是林彪同志。」

而引人深思的這個講話中的一段內容。

當毛澤東提出不要抓壞人不要擴大化時，周恩來則表示：「應該抓敵人，抓壞人嘛……。」周恩來還說彭德懷、賀龍、彭羅陸楊，薄一波、安子文他們是叛徒、內奸、異己分子，但跟他們跑的並不一定是叛徒、特務，也要區別對待。劉少奇的錯誤是網羅一幫子，勾結起來，別人不知道，搞分裂，是地下黑司令部。

三、「九大」前後的一些國內外重要政策的變化

1. 外交

文革的發動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毛澤東要在把中國樹立成為世界革命的「樣板」，讓中國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毛澤東試圖以中共革命成功的模式來實現世界革命的成功，即以所謂的亞非拉為世界的農村包圍世界城市西歐和北美發達國家。1966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把宣傳毛澤東思想和「文化大革命」作為駐外使館的首要任務。

而作為主管外交的周恩來對此是認真執行的，也是不遺餘力的。1966年10月3日，周恩來在對參加國慶觀禮的全國紅衛兵代表的講：「中國革命越強大，越能影響世界的各個國家。世界革命中心逐步轉到了中國，我們要備荒。備荒不僅是克服每年不可免的災荒，備荒，包含了為人民而儲備，為戰爭而儲備，還要為世界革命做出支援。

為了貫徹這一精神，中宣部隨即「批准」向海外出口毛主席語錄。根據新華社統計，從1966年10月下發兩個「批准」到1967年7月，共有25種外文版毛著計460萬冊發行到世界148個國家和地區，新華社說這一宣傳攻勢「將使毛澤東思想越來越深入人心，從而喚起世界廣大勞動群眾，組成一支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向舊世界發動聲勢凌厲的總攻擊，爭取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徹底勝利」

但是強加於人的宣傳導致了無數的外交糾紛。從1966年10月開始，中國的外事工作貫徹宣傳毛主義和「文革」這一「主要任務」，一直延續到1969年。其形式五花八門，可以說無所不用其極，除了在外事活動中向外賓和駐在國官員作口頭宣傳外，還由駐外使領館的工作人員、記者、留學生、專家、國際列車員、海員等，在所在國散發毛澤東著作、語錄、像章、「文革」文件、圖片，並在使領館、宿舍區和援建工地等地樹立「文革」標語牌和毛澤東畫像、展出「文革」資料、放映宣傳電影，連外銷商品和援外物資的包裝上都印製了毛澤東語錄和毛畫像。中共在很多鄰國有華僑組織、友協和僑校，這些組織也從使領館接受指示，傳播毛主義和「文革」資料，甚至建立海外「紅衛兵」組織。中共使領館還負責篩選親毛派人士和青年學生，送他們到中國「朝聖」或培訓，這些人回國後或是肩負為「文革」作宣傳的任務，或是被發展成「革命者」。

1967年，65名留法學生和4名留學芬蘭學生根據中央指示回國參加文革時途徑莫斯科。1月25日，學生們決定要到紅場向列寧和斯大林敬獻花圈，而斯大林當時是被蘇聯政府否定的。行動前，留學生通過中國駐蘇聯使館向外交部國內報告，外交部很快復電同意。由於學生效仿國內的紅衛兵，朗誦《毛主席語錄》，高唱斯大林的讚歌，導致蘇聯警察的制止，而且很快演變成流血事件。69人全部遭到毒打。周恩來給學生致電慰問，外交部並在26日照會蘇聯大使館，對蘇聯修正主義的「法西斯罪行」提出「最強烈的抗議」。2月11日，周恩來親自主持「歡迎留學生憤怒聲討蘇修法西斯暴行大會」。

比宣傳更嚴重的是，一些外國的激進分子也真正的學起「造反」來，要造本國政府的反。對此剖有研究的程映紅就對坦桑尼亞做過精彩的描述。坦桑尼亞是中共60年代在非洲的主要友好國家。派往坦桑尼亞工作的某工作人員（某英文翻譯）在1967年底來到坦桑尼亞後，也拉起「造反」人馬，並鼓動當地仿照紅衛兵組成的「綠衛兵」也起來造反。實際上此雖然是受到中共的啟發而成立的，但這個組織的宗旨卻不是造反，而是貫徹政府的政策，是

動員群眾的手段。然而中方的「造反派」卻表示要用「中國紅衛兵」的名義和坦桑尼亞的「綠衛兵」串連，向他們介紹「紅衛兵」的「造反」經驗。1968年初這些人又開始在坦桑尼亞工人中大肆活動，要求他們起來造本國政府的反。1968年7月，坦桑尼亞雜技團學成歸國，最初團內還相安無事，但很快就鬧起了派性，動不動就「造反」，以「革命」的名義為自己爭名奪利。中方「造反派」的上述活動引起了坦桑尼亞政府安全部門的注意，把情況上報給總統尼雷爾。當時尼雷爾正在推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激進政策，對銀行和大工業實行國有化。國際社會懷疑他受到中共的影響，國內很多人紛紛反對，尼雷爾本人受到很大壓力。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造反派」在坦桑尼亞肆意妄為，必然會給尼雷爾的反對派提供機會。而剛果的盧蒙巴政權和印度尼西亞的蘇加諾政權被右派軍人推翻，就是前車之鑒。在這兩次政變中，右派軍人的借口都是現政權親華親共，要把自己的國家變成中共的附庸。這兩次政變使中共在這些國家多年的苦心經營和援助一夜間化為烏有。尼雷爾接到政府部門關於中國「造反派」活動的報告後，對「文革」在坦桑尼亞的發展非常憂慮。

1968年6月尼雷爾訪華時當面向毛澤東和周恩來提出中方「造反派」的問題。根據中共外交官的回憶，尼雷爾與毛澤東會見時，雙方一開始由於對「文革」的分歧很不愉快。儘管毛澤東後來也表示，不允許「造反派」在坦桑尼亞活動，但他的理由卻與「文革」沒有關係，而是說這些人「搞大國沙文主義，欺負駐在國。」有了毛的聖旨，周恩來與尼雷爾會談時表示，中共絕不允許援外人員把無政府主義帶到國外，更不允許他們在國外「造反」。那個企圖在坦桑尼亞開闢「造反第二戰場」的英文翻譯，被使館送回國後即下放勞動。

這種強加於人的做法造成了與毛澤東的願望相反的結果。毛澤東思想文革開始僅一年多的時間，中國就同30多個建交國家發生外交糾紛。甚至有若干國家例如加納、印尼等國同中國斷交。從1965年7月到1970年10月，只有也門一個國家同中國建交。已經建交的和半建交的53個國家，發生外交糾紛的有40個。而且許多國家例如印尼、緬甸等都發生了針對當地華人的流血事件。中國的外交走進了死胡同。經過兩年多的時間證明，這種強加與人的做法是無法取得成功的。中共當局開始改變做法，首先收斂的是對毛澤東思想的宣傳。

1968年3月份，毛澤東連續在一些涉外報告上批示：不要強加與人，並刪去一些類似「應大力宣傳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之類的話語。1968年3月29日，毛在發表緬共武裝鬥爭二十週年的聲明的請示報告（涉及在我報刊上發表兄弟黨對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上批示：「一般地說，一切外國黨（馬列主義）的內政，我們不應干涉。他們怎樣宣傳，是他們的事。我們應注意自己的宣傳，不應吹得太多，不應說得不適當，使人看起來好像有強加於人的印象。」1968年4月6日，毛在中央聯絡部、總參謀部起草的關於幫助外國人員進行訓練的文件中，將「主要是宣傳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偉大導師毛主席和戰無不勝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句中的「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偉大導師毛主席和戰無不勝的」21字刪掉，並批示：「這些空話，以後不要再用。」1968年6月12日，一個接待外賓的計劃中，曾經規定過群眾在同外賓接觸時可「自發地分別地贈送毛主席像章」。毛批示：「不要」。

於是，周恩來在1968年7月在修改改《關於改革對外宣傳工作的指示》時加寫：「反對形式主義和強加於人的宣傳」，「反對庸俗化」，要「通過生動的事實、準確的敘述、鮮明的主張，實事求是」地宣傳毛澤東思想，「而不是學院式的背誦，教條式的宣傳」。要克服和糾正對外宣傳中的「自我吹噓」。1968年11月19日，周恩來得悉摩洛哥當局因中國「無錫」輪懸掛毛澤東語錄而阻攔該輪進港，中國駐摩大使館代辦向摩外交部表示抗議事，作內部指示：「無錫」輪去摩洛哥掛毛澤東語錄的做法不對。1969年6月初，周恩來針對「文化大革命」以來對外濫送毛主席像和語錄等情況提出批評，強調要善於做對外宣傳，慎之又慎。

雖然在對外宣傳上有一定的收斂，但是在沒有發生重大的戰略性的轉變之前，中共在外交上的策略不會有根本性的調整。

例如緬甸是中共在「文革」期間被視為「輸出革命」的重要目標國。中國政府曾與緬甸政府達成政府間協定，承諾中國不公開支持緬共，緬共在華機構和領導人不在公開場合露面。但這些約束在「文革」中都被打破，緬共領導人不但在中國公開露面，而且還在中共黨報黨刊上發表文章鼓動緬甸革命。毛澤東親自批准留在中國已有17年之久的大批緬甸共產黨人和少數民族分子回國開展武裝鬥爭，建立根據地。為了保護那些在中國受訓的緬共人員能安全進入緬甸開展武裝鬥爭，中國人民解放軍還專門組織了護送部隊，深入護送到緬甸境內，直到被護送人員抵達安全地點。有時這些中共護送部隊還直接與緬甸政府軍發生戰鬥。中共當時一個重要的戰略考慮是，利用中國南方少數民族和東南亞民族的親緣關係，將東南亞國家的少數民族作為東南亞共產黨擴大武裝時的兵源。毛澤東曾很明確地告訴老撾共產黨和緬甸共產黨的領導人：你們可以到中國邊境那些與老撾、緬甸民族接近的少數民族中去徵兵麼！這是他們的國際主義義務，中國邊境地區可以作為你們的後方麼！1970年在和越共總書記黎筍的談話中，毛澤東提出讓老撾共產黨到雲南的老撾族中去徵兵。在座的周恩來和黃永勝說，在西雙版納有老撾族，周恩來還說「我們的壯族跟他們非常相像」，毛澤東說將來老撾決勝的時候，「可以到廣西一帶招一些壯族人，到雲南招一些傣族人」。他還以歷史上廣西軍閥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隊伍為例，說這些少數民族都很能打仗。

但是「珍寶島事件」發生後，蘇聯的威脅促使中共不得不重新審視其外交政策。於是聯美反蘇的戰略也就應運而生。特別是在1972年2月，毛澤東在會見基辛格時，提出的「一條線」的戰略構想，標誌著中共的外交政策的重大調整。

1972年，斯里蘭卡再度發生名為「格瓦拉叛亂」的左派軍事暴動。雖然並無證據表明中共支持這個組織，但中共的「世界革命」立場還是引起了斯里蘭卡政府的懷疑。親華的班達拉奈剋夫人的政府受到很大壓力，被迫對中共大使館採取了一系列監視和檢查措施，拆封全部郵件，搜查新華社和中國工人的宿舍，連中共援助斯里蘭卡重點建設項目的物資也在搜查之列，很多中共外交官甚至擔心使館會被關閉。為了保住和斯里蘭卡的關係，周恩來被迫接見斯里蘭卡大使，不但沒敢就斯政府的監控措施提出抗議，反而說班夫人很聰明，反覆檢查，查不出中共有任何牽連，「不就把右派的嘴封住了嗎？」周恩來甚至還說，中國正在清查「五·一六分子」，如果斯里蘭卡政府在搜查中國駐斯機構時發現有這類人物，「請坦率地告訴我們，幫我們清理階級隊伍」。

中國大陸最近披露的材料說明，在墨西哥直到1972年還有受中共支持的反政府游擊隊在活動。1972年墨西哥左翼力量上台，總統埃切維裡亞決定和北京建立外交關係，但就在中國大使熊向暉赴任前一周，墨西哥宣佈逮捕了一批「在中國受過訓練的游擊隊」，此消息經報刊披露後給親華的埃切維裡亞政府造成極大的困擾。埃切維裡亞在接受國書的儀式上不得不異乎尋常地向中國大使熊向暉提出中共支持游擊隊的問題。中共資深拉美外交官黃志良在回憶此事時，不但不否認這些游擊隊受中共支持，反而坦陳「這是中國『文革』混亂時期極左路線留下的惡果」。和墨西哥建交是中共70年代初調整外交路線時在拉美取得的一大勝利。為了鞏固和墨西哥的關係，周恩來迅速邀請埃切維裡亞訪華，給予極其隆重的接待，借此向墨西哥輿論表明中共無意支持反政府游擊隊。

2. 內政

文革發動之後，有過幾次殺戮的高潮。第一次是1966年紅八月前後（筆者註：包括「黑色的五十天」）的暴行，第二次是1967—68年間的武鬥，但是這些並沒有以國家政權的名義進行。在1968年至1969年的「清理階級隊伍」的，是毛澤東和周恩來聯

手「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文革史專家丁抒先生認為，50萬人死於清隊。依筆者在查閱如雲南省等地的文革資料時也發現「清理階級隊伍」時期是在整個文革中迫害致死人數最多的一個時期。「清理階級隊伍」在一定程度上是為革命委員會的成立服務。但是全國山河一片紅之後，對於人民群众的屠殺並沒有結束，反而在1970年再次掀起了高潮。

1969年8月22日，周恩來在送給毛澤東審閱的關於邊疆各省市的情況報告中提出：堅決鎮壓反革命分子。對那些裡通外國、策劃外逃、破壞社會治安、搶劫國家財產、破壞生產、殺人放火放毒、利用宗教迷信製造叛亂的反革命分子，必須堅決鎮壓。對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必須由革命群眾嚴加管制，勞動改造。同年9月27日，中共中央下達《關於武漢北、決、揚的指示》聲稱：「在武漢市出現的所謂『北斗星學會』、『決派』（即：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革命派）這類地下組織，幕後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假借名義，暗中操縱的大雜燴。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復辟。他們不擇手段，製造謠言，散佈各種反革命流言蜚語，混入群眾組織進行挑撥離間，大刮經濟主義、無政府主義的妖風。對這類反革命的地下組織，必須堅決取締。」「所謂《揚子江評論》是一些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幕後操縱的反動刊物，肆無忌憚地大量放毒，必須查封。《揚評》的主要編寫人員，應由湖北省革命委員會責成有關機關審查，按其情節輕重，分別嚴肅處理。」

1970年1月30日，周恩來將中共中央《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的送審稿送毛澤東審批。指示說「蘇修正在加緊勾結美帝，陰謀對我國發動侵略戰爭，國內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機蠢動，遙相呼應……」「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是一場激烈的階級鬥爭，是打擊帝、修、反『別動隊』的鬥爭……實際上也是一場重要的戰備工作。」「要突出重點，打擊的重點是現行的反革命分子。」周恩來遞交送審稿時附了一封信，說明「我們幾經討論，認為現在需要發這樣一個指示，給在備戰動員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以打擊。」次日毛澤東批示「照辦」後，該指示下達全國，即所謂「1?3 1指示」。

同一時期，《關於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和《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經周恩來審閱修改、毛澤東批准也於2月5日同時發出。三份文件的貫徹執行構成了「一打三反」運動。

《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中最重要的是兩點：（1）打擊的重點是現行的反革命分子。（2）要統一掌握批准權限。殺人由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批准，報中央備案。

同「清理階級隊伍」不同的是，這次運動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領導下，動用國家暴力機器，全國幾乎同時進行的一次「依法」處置政治犯的運動。而所謂的「現行的反革命分子」大多都是以言論、思想獲罪，其中典型的有對文革不滿、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為劉少奇鳴冤叫屈等。毛澤東的「一個不殺」政策徹底成為謊言，就殺戮思想犯、言論犯的規模而言，這是毛澤東自延安掌權之後最大的一次，也是中共當局鎮壓大規模地以言論、思想治罪的高峰。

這份文件還將殺人權下放給各省市自治區。這無疑是造成各地大開殺戒的最重要的原因，在實際執行當中，判處死刑的權力甚至一度下放到了縣、市一級。

據歷史學家王年一披露：「一九七〇年二月至十一月共十個月挖出了『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一百八十四萬多名，捕了二十八點四八萬多名，殺了數以千計的人。」其中，逮捕了「反革命分子」二十八萬四千八百多名。這一年成為「文化大革命」中大恐怖的一年，許多地方都有像遇羅克這樣的思想先驅者被槍斃，像張志新這樣的優秀共產黨人被判處重刑。如今已經證實，大多數都是冤假錯案。文革結束後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報告說：「一九七〇年『一打三反』運動中錯判死刑最為突出。寧夏錯殺七十人中，一九七〇年判處的有六十八人；天津市錯殺的二十八人中，一九七〇年判處的有二十二。」

正如上面所述，這一運動的開展依然是由周恩來首先提議的。在維護中共統治方面，周

恩來是不可能心懷慈悲的。正如周恩來對遇羅克的評價：「此人不殺，殺誰？」對楊曦光則認為「此人反動到了幾點！」

四、「九大」之後新的政治格局與走勢

林彪在中共「九大」被確立為「接班人」。4月14日，周恩來在「九大」全體會議發言時稱：「這次在新的黨章中明確寫上：『林彪同志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這是從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奮鬥中自然引伸出來的最正確的結論，是完全符合事實的。它得到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革命人民的熱烈擁護，也得到全世界廣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們不僅為有著我們的偉大領袖、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而感到無限幸福，我們還為有了眾所公認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林彪在現場聽了周恩來發言後即稱：「我沒有準備講話，我插幾句話。總理的講話，我事先不知道內容。……我個人很慚愧！年輕時上井岡山，和毛主席在一起，那時不知道什麼事，只知道跟毛主席干就是了。講老實話，從我接觸的領導人中間看，毛主席比其他人高明。那時我僅僅是這點樸素的感情，不是自覺的、高瞻遠矚全面的認識，工作上取得的一些成績，是毛主席教導的結果。我們的一切勝利，都是毛主席英明領導的結果。若是跟賀龍、若是跟張國燾搞下去，我的腦袋沒有了，不是可能沒有，是一定的沒有。我能存在完全靠毛主席，每個時期都是毛主席指引方向，跟著干就是了。一切都是靠毛主席英明領導這個偉大的政治因素。我個人起的作用，是很微小，很微小的。」

「九大」之後不久，5月初，周恩來代表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宣佈，「決定不設書記處，由在京的部分政治局委員處理中央日常事務。」對於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林彪的態度非常明確，多次要求軍委辦事組參加政治局工作班子的同志全力支援周恩來，說「你們要把總理（周恩來）當作軍隊的領導。總理的事就是軍隊的事，他對你們說的話就是對軍隊的指示，一定要照辦。」

周恩來此時是如何領導的呢？邱會作說：「周恩來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班子的過程中，終於形成了一個『模式』，其核心就是中央政治局和毛主席個人的關係問題。文化大革命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們是平等的（至少在口頭上是這樣），實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毛主席是中央常委會一班人的『班長』。雖然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以毛主席為主，常常是他一個人說了算，但形式上毛主席只是一票，在名義上並沒改變成員之間的『平等』地位。但是周恩來執政後，他正式地把毛主席放在高高凌駕於中央政治局之上的位置上了，政治局及其常委會成了毛主席的『從屬』，黨的政治局領導集體要向毛主席個人請示工作，聽從他的指示……那個時候，周恩來對重大問題是向毛主席寫書面報告（同時也報林彪）。他在參加毛主席接見外賓等活動時，有些事還當面請示，有時還約毛主席面談。在周恩來主持政治局處理問題時，凡他認為有必要的，討論後會請汪東興、葉群分別向毛主席、林彪口頭匯報。毛主席的批示和汪東興帶回來的口信，很快就在政治局內傳達學習。政治局起草的中央文件，只有在毛主席批准或劃圈後才能發出。」

相對於文革中1967—68年的政治格局來說，周恩來的權力並無太多增加。但是相對來說，以林彪為首的軍隊勢力的比重卻明顯增加。即使林彪本人沒有此心，但是客觀的形勢造就了這種結果。第一個，為了穩定全國動亂的形勢，毛澤東不得不動用軍隊。軍隊則以「三支兩軍」的形式介入文革。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到全國山河一片紅的時候，「一元化」領導的各省革委會主任、省委書記中現役軍人佔了七成多，而各省的縣級革委會由軍人擔任主任的多在80%以上，最多的雲南和湖北省居然佔到了97%。第二個，而在中央領導中，軍委辦事組是「九大」後政治局工作會議的主體，其成員佔了政治局工作班子13名

成員中的7名（黃、吳、葉、李、邱、李德生、謝富治）。

周恩來的權力基礎正如上面幾章所論述的，陶鑄倒台之後，鄧小平也出局了，全國大亂的局勢等諸多方面造就了周恩來始成為真正的管家。「九大」召開，周恩來沒有代表中央作任何報告。當「九大」開過之後，按照文革發動的初衷，周恩來則是下一個目標。但是此舉則有兩個前提：第一個，有人能代替周恩來，此人就是毛澤東一直對其保護有加的鄧小平。歷史的發展也證明了這一點。第二個，林彪的配合。此配合不僅是指對毛，也要對毛身後的江青等人。但是林彪與江青等人的矛盾一直很深，竟然到了要拿槍斃了這個「娘們」的地步。

相比之下，周恩來則明白的多。

江青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將，是「文化大革命」的旗幟，是衝鋒在前不回頭、拚死效力的「過河卒」。不僅江青如此，張春橋、姚文元等人亦然。許多事看似張、姚表演，實為江青所為，說到底還是毛澤東。有文革史的研究學者說，毛澤東和江青的關係是「夫妻店」裡他和「文革女老闆」的關係。

邱會作認為：「周恩來對江青的認識與眾不同，認為『江青問題』是關係到全黨的『政治大問題』，一定要處理好，否則會影響全黨全國的大局。因此，周恩來對江青處處關照，愛護，幫助，忍讓，甚至有時有些放任，只要她不鬧事就好。」周恩來不僅認識到，如何對待「江青」的就是「如何對待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就是「如何對待毛澤東的態度問題」，而且還能夠在實踐中落實。自反「反冒進」以後，周恩來的心思大部分就用於如何討好毛澤東的問題上，實屬歷史的悲劇，也是周恩來的悲劇。知情人講述，周恩來在1968年間曾經授意主管軍政大學的張秀川搞了個「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史」，裡面提到了毛林會師，還提及了江青的偉大奮鬥歷史。但是當毛澤東否決了江青委託楊成武搞的「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史提綱」之後，周恩來下令把寫成的東西全部收回銷毀。

作為毛澤東的代言人，「九大」後江青接連對周恩來的發動了幾次攻擊。最重要的一次是《周恩來年譜》記載的「江青私自召集姚文元、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謝富治等開會，誣稱周恩來『在亂中看不清方向，作不出決策』，吹噓自己是很成熟的領導幹部，可以掌握國家的全盤領導。」唯有提及要糾正的則是《周恩來年譜》所記載的時間是不對的，時間非1970年的5月17日，而是「九大」之後不久，1969年的5月17日。

根據程光先生的採訪，「九大」之後，江青背著周恩來曾經四次和在京部分政治局委員「談話」發洩對「九大」後中央工作的不滿，後兩次是專門誹謗周恩來的。

就在九大期間，康生和張春橋悄悄的告訴吳法憲：「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是周恩來批准的，《人民日報》上的社論也是周恩來審閱過的，所以這個口號的提出，周恩來要負責任。吳法憲把此事向林彪做了匯報，林彪則告訴吳法憲：「胖子，你不要上當！他們的目的，是要慫恿你出來反對周總理。你千萬要注意，這個話對誰都不能再說。『揪軍內一小撮』是中央文革他們提出來的，總理即使看過了，也可能是一時的疏忽，不能怪總理。我們黨內不能沒有總理。我身體不好，毛主席要掌握大政方針，毛主席正確方針的貫徹和組織實施，全靠周總理。周總理的角色我是幹不了的。看來康生還是想當總理的，是有這個心思的，你們要注意。周總理出國的時候，兩次由康生任代總理，但是據我看他是幹不了這個總理的。」吳法憲還建議葉群把此事告訴周恩來。葉群說「我已經告訴周總理了。」吳法憲還回憶到：「儘管這樣，我還是在合適的時候，再一次把這件事情告訴了周恩來，想提醒他注意江青、康生等人的活動。聽了我的話，周恩來只是笑了笑，什麼話都沒說。」

1969年5月17日，江青召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李德生、姚文元在其住處開會。江青在這次會議中對周恩來評論到：「周恩來有行政工作才能和組織才能，這一點我很佩服。但是大的原則問題上他看不清，容易跟著別人走，今天東風來了是東風，明天西風來了是西風。『文化大革命』中他辦錯了幾件事情，寫了檢討，現在還在我的手裡。『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他同中央文革唱對台戲，只主持中央常委碰頭會，不參加中央

文革小組碰頭會。後來中央常委碰頭會垮了，這才要求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周恩來這個人不能掌舵，不能當一把手。」

邱會作回憶，江青5月17日攻擊周恩來時，黃永勝當場予以反駁，帶頭中途退場抗議，並立即到林彪那兒作了匯報。以後的情況是這樣的：「林彪說：『最近以來，江青攻擊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大多數，是嚴重的違紀行為，應當向毛主席匯報……』汪東興立即安排了黃永勝、吳法憲當日晚七點到毛澤東處，而我（邱）則到了周恩來那裡。江青前幾次談話都涉及到周恩來。每次講過之後，我都利用和周恩來一起工作的機會，及時地向周恩來『透風』。他聽了以後總是表情凝重，壓抑不語。這一次我把下午江青講的詳細地說了一遍，周恩來一聽就覺得有份量，一邊聽一邊做筆記。他非常難過地說：『唉！這個人呵，幾十年我對她是仁至義盡，能做的都為她做了，可以說是無微不至，堅持照顧她幾十年呵，人不能不講良心呀！……我很感謝軍委辦事組的同志們。你及時的通報，對我有很大的幫助。你們都是老同志，歷史上的事，你們雖然不在中央領導崗位上，但是事情的內容，中央的結論，你們是知道的。老同志就是老同志呀！老同志好哇！』」

「晚上黃永勝說，他們大膽地向毛主席匯報了江青的胡說八道，但毛主席似乎對江青沒有太大的憤怒，僅僅有些『小責備』，主要還是為江青『開脫』。毛主席說：『對總理的問題，她（江青）是隨便說說的。政治局委員之間談些問題是可以的，但不能專搞攻擊別人的活動。你們（黃、吳）到我這裡來，我不會向她講的，你們也不要說出去。要是她知道了你們來我這裡，講過她的問題，那今後你們的日子就不好混了！』」

毛澤東當然心知肚明，黃永勝到他那兒去告江青的狀，就是林彪在告江青的狀。毛澤東「批評」了江青幾句後，又告誡黃永勝（也是對林彪），不要把與江青的矛盾擴大，也不要把事情公開，否則「黃永勝」們就會「混」不下去。

周恩來是聞名世界的政治活動家、中國政府總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人，江青為何敢向周恩來叫板？對此，邱會作記得江青5月17日那天說了幾句他印象很深的話。『我（江青）同主席的關係，你們能見到的當然就是夫妻關係了，你們看不到的又是什麼呢？同樣，主席同總理的關係，你們能看到的好像是挺好的，但實質上並非如此，你們看不到的又是什麼呢？』多年以後我（邱）想過，江青如此膽大妄為，攻擊周恩來，整周恩來，一點沒有『背景』是不可能的。」

但是就在此時，林彪自己跳了出來。

林彪不僅不配合江青攻擊周恩來的行動，更為要命的是，在1969年7月，林彪把張春橋是叛徒的材料轉送給毛，而在此之前毛澤東剛剛向林提起張春橋是不是可以作為接班人培養，林彪則王顧左右而言他，說還是邱會作等這些經過考驗的人靠得住。張春橋是毛澤東的心腹愛將，可以說在唯一一個在文革發動之後敢頂毛的嘴的人。歷史也證明，張春橋等人才是毛澤東真正得同路人。這對於毛澤東來說，不得不重新調整自己的政治算盤，將石頭砸向了林彪。

而同時期的周恩來則很有自知之明。例如在1970年6月17日在上報給毛澤東的《關於國務院各部門建立黨的核心小組和革命委員會的請示報告》中提出：國務院各部、委、直屬機構與中央工交政治部、中央基本建設政治部、中央農林政治部、中央外事政治部、中央文教政治部、中央國防工業政治部、最高人民檢察院等，由文革前夕的90個單位，精簡為27個單位。擬設立的27個單位是：國家計委、國家建委、冶金工業部、一機部、燃料化學工業部、水利電力部、交通部、輕工業部、財政部、商業部、對外貿易部、農林部、外交部、對外經濟聯絡部、公安部、衛生部、文化組、科教組、中國科學院、國務院辦公室、國防部、二機部、三機部、四機部、五機部、六機部、七機部。上述單位除國防部、文化組、科教組不建立革委會和黨的核心小組、國務院辦公室不建立革委會外，其餘全部建立核心小

組和革委會。

國務院擬設立的 27 個單位中，劃歸軍委辦事組管轄的單位 7 個，分別是：國防部、二機部（劃歸國防科委管轄）、三機部（劃歸空軍管轄）、四機部（劃歸總參通信兵部管轄）、五機部（劃歸總後勤部管轄）、六機部（劃歸海軍管轄）、七機部（劃歸國防科委管轄）。此外，8 個單位（包括 1 個委員會和 7 個國務院直屬局級機構）由國務院系統調出，即：電信總局調歸通信兵部領導；海洋局調歸海軍領導；民航總局調歸空軍領導；中央氣象局與總參氣象局合併，歸總參領導；國家測繪總局與總參測繪局合併，歸總參領導；體育運動委員會調歸總參領導；新華社、廣播事業局原定歸中央文革領導，後成立中央組織宣傳組，改歸其管轄。

經過此番裁撤，國務院的權力被減縮、分割是空前絕後的。如規定「各部、委建立黨的核心小組，直屬黨中央領導」，「各部、委是在黨中央直接領導下的工作部門，其大權集中在中央」，又在國務院系統內劃出數個部門歸軍隊管轄，或乾脆調歸軍隊領導，國務院實際只領導 20 個部門。而這一自行放棄權力的方案，卻是國務院自己主動提出的。由此可以看出周恩來的精明之處，「權高震主」的現象是不允許發生的。

五、九屆二中全會

1. 九屆二中全會之前

1970 年 3 月，毛澤東考慮召開四屆人大，修改憲法。其時，毛澤東在武漢，林彪在蘇州，籌備工作的具體操作，則由在京的周恩來主持進行。

1970 年 3 月，在長沙休養的毛澤東收到周恩來送來的憲法修改草案提要和一封信。3 月 7 日，毛澤東和汪東興談話，作出「改變國家體制，不設國家主席」的指示。毛澤東說明：「憲法中不要寫國家主席這一章，我也不當國家主席。」

據此，王年一先生分析到：周恩來送來的憲法修改草案和信中對此是怎麼說的？無論過去的有關著述還是近年出版的《周恩來傳》、《周恩來年譜》都諱莫如深（有香港出版物稱周恩來在信中最先提出了設國家主席和由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的建議，但資料來源不詳）。不過，毛澤東既是針對所閱文件而作的指示，由此可以推斷，是草案或信中提到了設國家主席和由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的建議。毛澤東不與「副統帥」林彪，也不與周恩來或政治局其他領導人商量，便作出了只能照辦的指示而不是提供商量的建議，並要汪東興第二天回北京，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傳達他的指示。

當時，誰也不會想到毛澤東後來把「設國家主席」與批判林彪集團聯繫起來。關於設置國家主席問題，已經有很多文章對此進行過討論，再次不再多贅。

事情的結果則是直到 8 月份九屆二中全會開幕，此事仍無定論。

8 月 22 日，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對憲法修改草案中「不設國家主席」作了解釋，談及了林、周、陳、康在此問題上與毛的不同意見：

「下午見主席，我們特別提了國家主席的問題。報告上已經說了嘛，但我們又說了：大家熱切希望，既然是一元化嘛，黨的主席、國家主席也要一元化。儘管是個形式，但群眾熱望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是當然副主席。這樣就滿足群眾願望。領導嘛，當然是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的領導了。但在國家形式上，是國家元首、副元首。我們並且還提了個方案，說接待外國使節可以由元首授權，國家主席授權人大常委會主任、副主任接待使節。大概幾位同志，伯達、康老、我、林副主席，四個人都說了，主席說，那是個形式。（康生插話，主席還有句話，說『我提議修改憲法就是考慮到不要主席』。）當然，起草的稿子還是照顧那個一開始由東興同志傳達的主席的意思。但我們還是反映一下子，還提出

了一個方案。主席說，現在當然也見了不少外賓，也可以不見，有些不是也沒有見嘛。主席說，當國家主席、元首嘛，就是有點好客，不大好不見，雖然接待使節可以由別人。實際上，這個問題主要的還是黨的領導和行政上國務院，黨的本身也還有一些事。設立人大常委會為的培養幹部。外國人不是說，黨的決議人民代表大會保證通過，人大常委會更是保證通過。資產階級也是這樣的，你看嘛，英國的國會制，還不是多數是工黨的決定？然後國會通過就是了。甚至還沒有通過就已經宣佈了。現在是保守黨是多數了，是保守黨的國會。美國也是一樣。資產階級也是一個黨和一個行政機構。主席說，那兩層都有必要，人民代表大會和常委會。後來康老也說，有人主張把人大常委會同國務院合在一起。主席說，那也不行了，總還要有那麼一個機構才行。」

最值得主意的是，周恩來講話裡面提及「但我們還是反映一下子，還提出了一個方案。」言外之意，此次周恩來是「揣兩份乾糧上山」的。據一位林辦秘書的回憶，中辦印發的《憲法》修改草案討論稿確實是兩種方案，一重是《憲法》條文有「國家主席」的一章，另一種則是沒有。

事實上，周恩來特意打電話告訴陳伯達：有些人主張還是要設國家主席，請陳準備些條文，等一等看看毛主席的意見，備而不用。陳伯達則說：「因毛主席還是不贊成設國家主席，我回來就把那個條文抄樣扯掉了。周總理給我打電話的事，我也從沒有跟別人說過。會上批我批的那樣厲害，一說，事情就會牽連到周總理。有許多事，我都自己一個人吞下了。」

2. 周恩來在九屆二中全會上半段的表現

會前，毛澤東就想請林彪講講形勢問題。對此，周恩來也是知道的。8月22日晚，陳伯達到林彪住處，他非常希望林能在會上講話。陳認為「九大」以後，「無休止的運動」，不但沒有減弱，反而在繼續發展，我們這樣一個大國長期處在這樣的狀況是極不利的，共和國承受不起，人民受不起長期的無政府狀態。陳認為，造成這種局面，在主席那裡起作用的主要是江青和張春橋。江青不能碰，碰碰張春橋是可以的。陳認為，如果林提出張春橋的問題，毛澤東肯定會支持林的。張春橋的問題不解決，對黨的事業的危害實在太大。林彪沒有對陳伯達表態。林只說，如果要講，明天向主席報告一下。」（筆者註：惟未見陳伯達本人關於這件事的回憶）

九屆二中全會本來預定在8月23日下午3時開始。但是會前，毛澤東再次問林彪要不要講話。林彪說想講幾句。林彪向毛澤東談了張春橋等同吳法憲等之間關於刪掉三個副詞的爭論。並且周恩來也表示有這麼回事。

原來在1970年8月13日（筆者註《毛澤東傳》為13日，吳法憲在其寫的回憶錄中則是14日），憲法修改小組成員吳法憲同張春橋發生了激烈衝突。事情緣於草案稿序言部分有一段話：「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張春橋認為「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是諷刺。」而吳法憲認為這是「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貶低毛澤東思想。」而且吳法憲說：「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發展馬列主義，是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和《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肯定了。這樣說不是要否定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和《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嗎？」而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正是周恩來一手定稿的。事後，吳法憲向周恩來匯報，周恩來表態：「我支持你，你批評的好。國務院的指導思想應該加上毛澤東思想，這是應該寫上的。」周恩來同時表示贊成關於設國家主席的問題。

然而時過境遷，九屆二中全會之後，中央繼續調查吳法憲等人。康生追問吳法憲廬山前後的活動時，周恩來就說：「你（吳法憲）在8月13日晚上的活動我就不清楚。」當場吳法憲就回答：那天晚上我是第一個給你打電話的，我把情況都向你匯報了的。你也表示贊成

設國家主席，贊成國務院的指導思想是以毛澤東思想為指針。周恩來很不高興。

8月23日下午，九屆二中全會開幕，林彪發表了針對於張春橋的講話。按大會議程，林彪講完之後是周恩來講話。毛澤東問周恩來，你講吧。然而周恩來則說不講了。周恩來此舉顯然是不想沖淡林彪所講的主題。

當晚，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上，汪東興提出來要重新聽一下林彪的錄音。周恩來表態：「這個意見好，就按你們的意見辦，我負責向毛主席報告。」周恩來進一步提出：「是否放兩遍錄音，大家反映放一遍聽不懂，為了便於討論，明天上午在禮堂再放兩遍錄音，後天再討論，這樣一共是兩天。」這樣，九屆二中全會的日程被打亂。

汪東興回憶：播發錄音的時候，有人提議要將林彪的講話稿印發給每位代表，與會者鼓掌表示同意。周恩來讓我請示毛主席，毛主席說，他們都同意印發，我沒有意見，你就印發吧，還囑咐要由林彪審定後再發。我將毛主席的意見用電話報告了周總理。周總理說，你抓緊辦理，先印出清樣，送常委審閱。」

在聽完林彪的講話錄音之後，葉群對汪東興、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說：昨晚總理交代張春橋準備《憲法》草案中設國家主席的章節，這對我們有很大啟發，我們要向總理學習。據知情人的敘述，此時周恩來還特意「照顧」了張春橋。周恩來對張春橋說：「憲法草案，有關國家主席的章節，要準備一下，備用」。張春橋回答說：「現成的。已經準備好了，請總理放心。」

邱會作在西北組講：「有人連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他都反對，這不符合歷史。……有人說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種諷刺，就是把矛頭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來飯後碰到邱會作，讚揚邱會作，下午放了一炮，很有力量。吳法憲也發現，在8月24日晚上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周恩來同吳等人有說有笑，但是對張春橋等人表情冷淡。

周恩來自己在東北組也發言擁護林彪的講話，同意「天才」的觀點。周恩來說：「儘管毛主席叫我們不要總強調『三個里程碑』，但客觀上就是這樣。」

8月24日下午，九屆二中全會開始小組討論。華北組開始「起哄」，汪東興提出要揪人。在討論的過程中，8月25日下午，華北組的四名勞動模範先後發言，質疑《憲法》為什麼不設國家主席，認為憲法起草委員會有問題，還點了康生的名字。吳德說：這個態度你們怎麼表？如果問題涉及中央的負責人，按照黨的原則，應該先報告毛主席，毛主席就在廬山。吳德向周恩來稟報，周恩來責備吳德為什麼不在會上反駁。吳德說不瞭解情況，不好發言。周恩來說：不是很好講嘛，你們反對《憲法》起草委員會，主任是毛主席，副主任是林彪，這不是反對毛主席嗎？周恩來為什麼態度突然改變了呢？

原來25日中午，江青帶著驚恐不安的張春橋、姚文元到毛澤東處反映情況。毛澤東決定先拿陳伯達開刀，於8月31日在陳伯達整理的那份論述「天才」的語錄上，寫下一大段批示——《我的一點意見》。毛澤東用來寫「我的一點意見」的語錄是周恩來提供的。8月28日，周恩來叫吳法憲寫檢討，並向吳索要了一本陳伯達搞的「語錄」。廬山會議之後，回到北京的陳伯達打電話向周打聽情況。周欺騙陳伯達說：本來事情或許還可緩和，汪東興把那語錄一交出去，就沒有辦法了。陳伯達回憶說：周的語氣是親切的，這是陳終身難忘的。陳伯達被人賣了還幫人家數錢！

至此，廬山風向陡變。吳法憲回憶說：廬山閉幕的時候，周恩來明顯開始和吳疏遠，並且當周恩來同康生同機返回北京的時候，兩個人很親熱。吳法憲慨歎：「周總理很值得我們學習，善於『看風使舵』」。8月29日晚上（吳法憲回憶錄上是31日根據《周恩來年譜》應為29日），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陳伯達的錯誤。會議中間，周恩來曾經三次遞條子給林彪，希望林彪在講話中表揚張春橋、姚文元幾句，有利團結。但是林彪根本不理，令周碰了一鼻子灰。

3. 周恩來在九屆二中的後半段

1970年8月25日，刊登有汪東興、陳伯達、陳毅等人發言的華北組第二號簡報（全會第六號簡報）印發全會後，各小組會上要求設國家主席、提出要「揪人」的呼聲更加激烈。許多中央委員都作了附和陳伯達、葉群等的發言。拿到華北組第二號簡報張春橋頓時驚慌失措，連忙帶著姚文元找江青。江青第一個反應是找周恩來，但是不知道出於什麼原因，江青直接找了毛澤東告狀。隨後，江青帶著張春橋和姚文元又到周恩來處談話。

當日下午三時，毛澤東主持召開有各組組長參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召開會議之前，毛澤東特意把周恩來叫來交底。周恩來也向毛表示堅決的支持。得到周恩來的支持之後，毛澤東決定立刻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這也是正是周恩來存在的價值。

會上，毛澤東嚴厲批評陳伯達等人在小組會的發言違背了「九大」方針，提出要按「九大」精神團結起來，不要搞分裂，不要「揪人」。並警告說，關於國家主席的問題不要再提了。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會議決定全會分組會休會，停止討論林彪講話，收回華北組第二號簡報。

吳法憲所在西南組的組長張國華回來傳到了毛澤東的指示：「毛主席在下午兩點召集了中央常委和各大組組長會議，決定停止討論和學習林副主席的講話，同時也要停止批判。現在會議已經發展到要揪人的地步了，有人寫信要把反對『天才論』的人揪出來下放，說這樣的人不能在中央工作。這個空氣太熱了，要冷下來。因此毛主席決定，休會兩天，換換空氣。關於設國家主席的事情也不要提了，毛主席說他不當國家主席，林彪同志也不當國家副主席。天才的問題也不准再提了。這兩天把會議的情況搞清楚，然後再開會。」

毛澤東是如何知道「有人寫信要把反對『天才論』的人揪出來下放，說這樣的人不能在中央工作。」的？這本是許世友寫給毛、林的信中所言。然而毛澤東並沒有收到此信。許世友、韓先楚、楊得志和南萍、熊應堂等人的信到了大會會務組，又到了周恩來手裡。周恩來把信轉給葉群，並附條子說此事到此為止。周恩來的兩面派作風由此可見一斑。

隨後周恩來按照毛澤東的部署，緊張的同各方談話。26日周恩來約吳法憲等人開會後，到林彪處談話。晚，到康生處談話。以後又約全會六個小組組長開會。27日，周恩來參加毛澤東召集的會議。下午，先後同林彪、陳伯達談話，批評了陳伯達。晚，參加政治局部分成員會議。會後，去康生處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談話。28日，周恩來先後去林彪和康生處談話。之後，約政治局部分成員開會。

江青後來對這一段的歷史有過回憶：「那天我和康老正在開會，總理派人送來了陳伯達的發言稿，不是記錄稿，我們與陳伯達幹了一仗，說他真狠毒啊，你想把毛主席周圍的人一網打盡。從此再沒見過這王八蛋。我當時講，你拿了槍殺我的頭好了，你們就是跟這樣狠毒的人走啊！你們怎麼解釋呢？真狠毒！就是要顛覆我們國家，幫助蘇修，顛覆世界革命根據地，這能容忍啊！」

關於這一段時間周恩來的表現，徐景賢有過一段非常真實的回憶：與中委們的無事等待成對比的，是周恩來的格外忙碌，為了配合毛澤東查明事情的來龍去脈，周恩來調集了各大組的發言記錄，發現幾個「宣講員」的發言內容驚人地相似，說明事先有過串連，統一過口徑。於是，周恩來和康生一起，找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談話，追查他們到各組「宣講」的由來；結果查明了陳伯達編選的、通過汪東興印發的那份《恩格斯、列寧、毛澤東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的出籠經過。為駁斥陳伯達、吳法憲等人散佈的謠言和詭辯，周恩來特意把北京存檔的關於毛澤東圈掉「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三個副詞的文件原件，調來供毛澤東和政治局委員們參閱，周恩來白天黑夜地操勞，據他自己說：「足足有三十六小時沒有合過眼！」周恩來還根據毛的明令調黃永勝上山，安排李德生、李先念回北京「值班」。

1970年8月29日周恩來參加由林彪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周恩來與康生傳達毛澤東幾天來的一系列講話，著重講了團結問題。周恩來提出：在全會一開始的分組討論中，陳伯達、吳法憲等人作了有代表性的錯誤發言，把修改憲法的討論引導到一個錯誤的方向去，以華北組最為突出。8月25日主席召集常委擴大會議之後，才扭轉了這一錯誤偏向。直到今天開會前，一直停止了小組會，我們這幾天的工作就是要說服一些犯錯誤的同志作初步的檢討。在聯繫歷史上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進行自我解剖、批判後，強調：主席對犯錯誤同志的態度一貫是，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要給犯錯誤的同志認識、改正錯誤的時間，對他們還要看，不能著急。全會還有兩項議程，不能耽擱久了。大家要下決心按照主席的指示不折不扣地去做，一定要把這次會議開好。

1970年8月31日，毛澤東在陳伯達所編《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上寫下《我的一點意見》，嚴厲地點名批判陳伯達。周恩來在此之後如同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一樣，是毛澤東所依靠的、貫徹毛澤東意見的主要執行人。

同日，周恩來先後同黃永勝、林彪、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談話。深夜，周恩來同康生到毛澤東處，將《我的一點意見》稿取來，給張春橋看過並同張談話，並與次日交給林看，林表示同意。隨即，周恩來到毛澤東處對《我的一點意見》稿作個別文字修改，然後決定付印，並將印件送陳伯達閱。隨即，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陳伯達。周恩來在發言中嚴厲批判了陳伯達：《我的一點意見》時說，這是毛主席考慮了三天後，才寫出來的；陳伯達在中央核心內部長期不合作，他的問題遲早要暴露的。

9月4日，毛澤東同周恩來談話，指出陳伯達如無政治歷史問題，我的意見還保留中央委員；但要陳再進一步檢查，我看有困難。然而實際上的情況則是：毛澤東在廬山住地同周恩來、葉劍英連日研究「批陳」問題，確定逐步開展「批陳整風」運動，並把調查陳伯達反革命歷史和政治面目當面教給周、葉。葉劍英在毛澤東處領命後，以周恩來特別顧問的身份，率領工作組到福建、廣東等地調查陳伯達的歷史問題，最終為批陳整風做出了特殊的貢獻。

而陳伯達則說：「後來聽說，在一個會上，有人批我在大的問題上沒有同毛主席配合。周恩來同志解釋說：『是在一些大的問題上沒有配合，不是在一切重大問題上都沒有配合』，還舉例說，在反對蔣介石的時候就配合了。在這樣條件下，周恩來同志還能維護我，使我感到他對事對人的公正。」筆者極其懷疑這是在粉碎文革後美化周恩來的行為而造出的謊言。退而其次，即使周恩來這樣講了，也不能抹殺掉周恩來是執行毛批陳最得力的助手這一事實。只能說陳伯達對此的認識還是一書生之見。

值得注意的是，會議中間，9月2日，周恩來飛回北京，在深夜，約外交部、外貿部和外經部領導成員開會。在講話中指出：《參考資料》是否有必要每天登一條毛主席語錄？第一，看的人不多；第二，針對性很難辦。經過研究，並請示了毛主席，從9月5日起，不要登語錄了，《共運資料》也不登了。《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這本語錄，未經中央批准，要清查一下。中央已三令五申，不經中央批准不得出版毛主席語錄，為什麼還亂編東西，怎麼這樣不謹慎？引用毛主席語錄，一定是中央批准發表的。不能濫用毛主席的威望。有些話不是毛主席講的，有的沒有發表，不能以訛傳訛。《參考消息》主要是正面的，也要選登反面材料，使大家有所比較，否則不能起廣泛的教育作用。同月8日，周恩來就由《西行漫記》一書改名出版的《毛主席生平》和郵票發行等問題批示：（一）新華書店及各地分店收回這本書。《毛主席生平》不再出售，但《西行漫記》譯本不要禁止。（二）告交通部，郵票上不許再印毛主席像、語錄、指示和詩詞。

9月14日，周恩來在參加中央和國家機關黨的核心小組成員會議上，向與會人員傳達毛澤東所寫《我的一點意見》一文，並介紹陳伯達的歷史情況及1959廬山會議上陳的問題。據說，在這次廬山會議之後，周特意留下九十九名黨政軍高級幹部，聽他講活學活

用毛澤東思想的報告。周恩來回顧了歷史，披露了當年派陳毅去奪毛澤東軍權的事實。周恩來交待了自己曾犯過的嚴重錯誤，最後總結自己犯錯誤的根源，是由於年紀輕輕就當了大官，官癮重，怕違背莫斯科指示丟官，就盲目執行莫斯科路線。周恩來稱這是他一生中最嚴重的教訓。]

六、九屆二中全會餘波

1. 王良恩之死

在九屆二中全會上還發生了一件不同尋常的事，就是許世友、韓先楚和楊得志三位上將上書毛澤東、林彪，信中提出「幾個犯錯誤的人不能留在中央工作，而應該下基層鍛煉。」這矛頭是對著張春橋等人。這信不僅在若干年之後又起波瀾（三位上將檢討多次方能過關），而且還是時任中辦副主任王良恩少將自殺的主要原因之一。

8月25日，許世友等三人的寫好之後，委託當時擔任華東組記錄簡報工作的華東組會議秘書洪雪竹交給負責大會會務的王良恩，請王良恩轉呈毛。王良恩接到這些信後，按程序上交給周恩來。然而老於世故的周恩來卻把此信轉給葉群，並附條子，到此為止，存你處。周恩來此舉也有避免事態擴大化之意。事後葉群對吳法憲、邱會作講：我檢到三個「險球」，你們一定要守口如瓶，我一定要保住三個司令。

「林彪事件」之後，由汪東興和王良恩負責領導查抄林彪住處以及辦公室。搜查人員在林彪辦公室的檔案中發現了許世友、韓先楚、楊得志寫給毛澤東、林彪的信。根據一位當事人的回憶：這幾封信都在林彪辦公室的檔案中。我們在清查中發現後，感到不好把握，就一起交給辦公室主要的負責人、中辦副主任王良恩，他負責呈給上面。王良恩再次把信交給周恩來。深知內情的周恩來重新做了批示：「此件是在傳閱中被葉群扣壓的。退。周恩來。」周恩來此舉是將信退回王良恩，表示此事應當瞭解不予追究。

1972年初，江青在參與處理山東揭發林彪問題時得知，在廬山會議期間，參加會議的省領導向中央寫信，建議處理當時在廬山犯錯誤的人。依據此線索，江青找到了這些信。江青於是找毛告狀，要求清查此事。江青給中辦負責人（即汪東興）寫了一封信：「一定要徹查這幾封信是如何到林彪那裡去的！」此事涉及到王良恩。江青於1973年1月9日在中辦《批林整風簡報》上作出批示：「王良恩危害黨中央毛主席！」同日，中央辦公廳臨時召開黨委擴大會議，揭發批鬥王良恩，最後，江青「王良恩是野心家、陰謀家、大反革命、定時炸彈！」康生提出要追究王良恩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搞的什麼陰謀」。

周恩來得知此種情況下，指示王良恩：邊檢查邊工作，但是卻絲毫不出來替王良恩解釋此信是如何到林彪那裡去的！

多次檢討卻過不了關的王良恩最終選擇了自殺！

雖然王良恩的問題固然不止這些，但是此事的份量頗重。但就此事而言，中辦副主任王良恩不過就是中間的經辦人，最後卻被逼自殺，箇中原因耐人尋味。「林彪事件」之後，江青想利用此線索，以王良恩為突破口，然後擴大戰果，把自己不中意的幾個人予以打倒。江青的威逼，眾人的揭發，落井下石固然是王良恩自殺的主要原因，但是作為對此事瞭如指掌的周恩來卻未施以援手，沒有做任何實質性的解釋，這也是王良恩絕望的主要原因之一！

2. 周恩來與檢討

吳法憲回憶：8月28日，周恩來就要求吳法憲作檢討。周恩來對吳法憲說：「你是辦事組副組長，組長沒有來，你們組裡出了事情，你應該主動承擔一點責任。還是寫個檢討，

把問題說清楚就算了。」「這樣做的目的，最主要的是替『副統帥』擔責任。你明白，問題是『副帥』的講話引起來的。要保護『副帥』，不然的話又要攻到『副帥』的頭上去了。」

9月22日，周恩來在看到毛澤東21日對汪東興書面檢討的批件後，同康生到林彪處，將毛批件送給林看，提議先約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四人在一起閱讀該件，在他們想通了後，應給主席、林副主席寫一書面檢討，揭露事實真相，與陳（伯達）完全決裂。

除了自己善於做檢討之外，周恩來還善於勸別人做檢討。

早在1959年的廬山上，周恩來就勸彭德懷不要站在局外指手畫腳，要盡快認識「錯誤」亦即檢討。

劉寧一說：阿爾巴尼亞邀請一個婦女代表團，我和總理商量去不去？因為阿方邀請多次，決定還是去，總理推薦夏之栩同志帶頭，我也請示報告了康生。代表團出發後第二天，江青在人大會堂開什麼會，突然把我叫去提出：據說有一個重要的代表團去阿爾巴尼亞，誰決定的？我回答是我們提出的，請示了總理、康生、富春。江青說，毛主席講的文革小組代替書記處職權，這樣重大的事為什麼事先我一點也不知道！總理要我趕快檢討，我檢討了說我落後於形勢，有老框框。誰知總理也批了一段「思想上有老框框」，富春同志也寫了同樣一段，康生也只好寫了自己有老框框之類的檢討。

1966年底，一些軍隊院校學生對陳毅、葉劍英等老師的講話不滿。1967年1月3日，軍隊院校的「批資籌備處」要批判陳、葉。周恩來勸劉志堅做檢討：為了緩和學生們把冒頭指向老師的激烈情緒，是否由「全軍文革」承擔些責任。1月4日，劉志堅於不得不做了檢討。劉志堅說：「昨天晚上，總理提醒我，今天上午全軍文革小組開了許多鐘點會議，小組同志對我進行了批評幫助，這樣我才有所觸動，下面我分別講一講我的錯誤。下午總理、伯達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對我進行了批評幫助。」

但是這些人是如何對待劉志堅的呢？劉志堅說：「沒有向中央文革、軍委全面的反映軍隊院校文化革命情況，沒有主動發現主流，（康生同志插話：不是沒有全面，而是沒有。）我們最近反映了一次。（江青同志插話：那是我們要你去匯報的。）（總理插話：你就沒有匯報過，是我們要你去匯報的。）都沒有反映主流，只是聽了一些當權派的匯報，匯報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康生同志插話：話要說大問題。）（總理：不要講這些小問題。）（楊成武同志插話：黑暗，一塌糊塗，只講陰暗面，一片黑暗。）（王力同志也指出這一點）首先是領導機關受到衝擊了，片面反映了一些壞的情況，起了很壞的作用，對葉副主席在他的思想上起了很壞的作用，講了些這樣的事情……的問題，火車票的問題……的問題呀！」

從這些插話可以看出，周恩來的本意並非是要劉志堅做檢討過關，而是完全配合中央文革等人把劉志堅當作替罪羊拋出去！事實也是，劉志堅在1月5日會見學生的時候，就被抓起來。1月8日，劉志堅就被轉送到北京衛戍區。直到1974年被毛澤東指定解放後才復出。

肖勁光的例子則是另外一種情形。1972年7月，為貫徹中央「批林整風」會議精神，海軍黨委召開了「四?五」會議。此次會議實質是要讓蘇振華復出做準備，肖勁光要為此讓路。為達到此目的，肖勁光被扣上「上了林彪賊船」的帽子。但是肖勁光就是沒有鬆口，於是會議開成了馬拉松。

此時此刻，周恩來出面。周恩來打電話告訴肖勁光。肖勁光回憶說：周恩來幾次打電話安慰他，並暗示他為避免整垮，有些問題可以先承認下來。在此重壓下，肖勁光不得不打掉牙齒朝肚子裡吞，不得不違心地承認自己上了「賊船」。於是事情得到了解決。「四?五」會議後，肖勁光同志以「上了賊船」的莫須有罪名，又由海軍黨委第一書記降為第二書記，蘇振華同志升任為海軍黨委第一書記，肖勁光同志被剝奪了主持海軍工作的權力。

當然也有極其個別的不畏周恩來強勢的錚錚鐵骨。1957年馬寅初在全國人民代表會議上發表了《新人口論》的書面發言，尖銳提出中國人口問題的嚴重，呼籲盡快地控制人口

的盲目增長。但是這和毛澤東當時要搞大躍進是背道而馳的。大躍進是要有廣大的人口做勞動力的。於是遭到嚴厲批判，不是學術上的批判。完全是政治高壓、政治迫害。但馬寅初說：「有的文章，說過去批判我的人已經把我駁得『體無完膚』了，既然是『體無完膚』，目的已經達到，現在何必再駁呢？但在我看來，不但沒有駁得『體無完膚』，反而駁得『心廣體胖』了。」周恩來再次出面了。周恩來特地約馬寅初談話，勸他不要固執己見，應從大局著眼，還是寫個檢討好。別人勸馬寅初，馬寅初還可以不放在心上，但是周恩來勸，馬寅初就不得不認真對待了。這次談話後，馬寅初梳理了自己的理論，發現並沒有錯。他又寫出5萬字的《我的哲學思想和經濟理論》，發表在《新建設》1959年第11期。馬寅初在文中拒絕了周恩來的勸降：「這次遇到了學術問題，我沒有接受他的真心誠意的勸告……因為我對我的理論有相當的把握，不能不堅持，學術尊嚴不能不維護，只能拒絕檢討。希望我這位朋友仍然虛懷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絕檢討視同抗命則幸甚。」

七、批陳整風匯報會

九屆二中全會以後，周恩來在1970年11月7日與康生、李德生聯名致信毛澤東、林彪，提議將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所寫《我的一點意見》下發傳達，因為「在辦理陳伯達專案工作中，我們發現如不使更多負責同志和辦專案的同志知道主席的《我的一點意見》一文，就不容易得到多的真實的揭發和檢舉材料，而現在黨內外和國外輿論都已漸漸覺察到陳伯達從九屆二中全會後即不再出面，可能出了問題。因此，我們提議將主席的《我的一點意見》擴大印發範圍至各省、市、自治區黨的核心小組，各大軍區、省軍區、各軍、各總部、各軍兵種黨委常委，中央黨和政府各部、委領導小組或黨的核心小組成員，「以便得到對這一可疑之人的更多揭發」。並告此建議已經中央政治局會議同意。毛澤東閱後批：「略寬為好，如地級、師級；中央應有一指示下達。」14日，周恩來批改中共中央《關於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的指示》，經當晚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16日，中央正式下發此《指示》和《我的一點意見》，要求各單位由主要負責人親自傳達。由此，全黨開展「批陳整風」（對外稱「批修整風」）運動。

但是從哪些部門「以便得到對這一可疑之人的更多揭發」呢？陳伯達是在華北組「煽風點火」的，而華北組除召集人李雪峰外，還有北京的吳德、天津的解學恭、山西的陳永貴、內蒙古的吳濤作為所在省、市的領隊出任副組長，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代表軍隊方面也是副組長。而文革中，陳伯達同華北的關係又特密切。

陳伯達參與天津、河北問題的解決，是緣於當時為了解決各省市的問題。1967年8月9日，中央在周恩來主持下召開會議並做了分工，張春橋、姚文元參與華東，陳伯達參與天津、河北問題的解決。周恩來在這次會上說：作這樣的分工，是落實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推動形勢發展，實現毛主席爭取明年春天或稍晚些時候結束「文化大革命」的戰略部署。

這也是陳伯達與華北結緣的開始。作為擔負華北地區「三支兩軍」主要任務的北京軍區，自然要服從代表中央參與處理華北地區的「三支兩軍」工作的領導—陳伯達。1967年12月至次年1月間，陳伯達在北京軍區代司令員鄭維山、政委李雪峰等陪同下到河北各地視察，為省革委會的成立清除障礙。時駐河北各軍、省軍區都傾向於各地較保守一派，唯獨38軍支持激進派，陳伯達等急於穩定局勢，在保定等地的講話中，未免站在北京軍區立場，對38軍支持的一派作了嚴厲批評。這個案例比先前描述的廣西案例一點也不過分。但是，華北的問題仍然被選做突破口。

華北方面在傳達廬山會議精神的時候，李雪峰、鄭維山等只傳達了毛澤東的《我的一點意見》，對於批陳講的很少，向中央匯報得也很簡單，說我們按照中央的精神已經傳達，就兩句。康生在華北給中央的報告上批：奇怪？毫無揭發！遂將華北的這個報告送給毛澤東。

這就成了問題。江青鼓動北京軍區內部揭發，於是38軍的揭發報告便應運而生。這個報告是毛澤東讓江青把38軍的人找到北京，搜集情況，寫的揭發陳伯達的材料。揭發的是陳伯達在廬山會議前兩次在華北的亂說亂動。報告第二部分說：「陳伯達不擇手段地插手軍隊，搞宗派活動，妄圖亂軍、奪權。我軍於1967年初奉命調華北以來，越來越感到，陳伯達的手伸得很長，活動反常、手段惡劣。據我們所知，北京軍區的許多重要會議，他都到場講話……」這份報告，在揭發陳伯達在華北地區的反黨行為的同時，還給人一種強烈的印象，那就是北京軍區負責人在縱容陳伯達在這裡亂跑亂說，使他成了華北地區的「太上皇」。

從歷史的發展來看，此舉並不僅僅是批陳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通過批陳，達到改組北京軍區的意圖。文革開始，楊勇和廖漢生被打倒，北京軍區就被改組過一次。在楊余傅事件發生的時候，毛澤東就想改組北京軍區。九屆二中全會之後，北京軍區又一次被改組勢在必行，因為毛澤東雖然當時是把矛頭對準陳伯達，實則是對準林彪的。而北京軍區肩負著首都的保衛工作，對於毛澤東來說，這是關係到自己身家性命的，因此一定要通過改組，從而換上自己信任的人，這樣方能感到安心。隨後，毛澤東借批示周恩來的關於開好華北會議的報告而把黃永勝等人都放「進來」。毛澤東此舉表明毛對廬山圍繞設不設國家主席、三個副詞的鬥爭，並不只局限在對陳伯達的批判上，而是想採取各種辦法削弱林彪在軍隊的勢力。

這個報告自然是攻陳的炮彈。1970年12月16日，毛澤東批了該報告：林、周、康及中央、軍委各同志，此件請你們討論一次；建議北京軍區黨委開會討論一次，各師要有人到會，時間要多一些；討論為何聽任陳伯達亂跑亂說，他在北京軍區沒有職務，中央也沒委託他解決北京軍區所屬的軍政問題，是何原因讓陳伯達成了北京軍區及華北地區的「太上皇」？當日，周恩來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毛澤東對38軍黨委報告的批示。政治局成員一致擁護毛澤東的意見。會議商定，先約北京軍區黨委鄭維山、李雪峰等8名常委於18日前來中央開會，向他們傳達毛澤東的批示，並商量召開北京軍區黨委會議的問題。

1970年12月18日，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向列席會議的北京軍區黨委常委、北京衛戍區負責人傳達毛澤東對38軍報告的批示。為了「打通思想」、「更好團結」，政治局決定先以三天時間召開北京軍區黨委常委會，初步統一認識。並決定華北會議自22日開始，北京軍區所屬各單位及北京、天津、河北黨、政、軍領導幹部四百三十餘人到會。

周恩來於19日，書面向毛澤東、林彪報告政治局會議情況：昨晚政治局會議傳達和討論主席對38軍報告的批示，參加會議的還有華北地區和北京衛戍區的一些負責同志。會上，大家一致擁護主席要北京軍區黨委召開擴大會議的建議，認為這次會議應集中討論北京軍區和華北地區對陳伯達問題的認識和揭發，人要多一些，時間要長一些。為開好這個會，打通思想，更好團結，政治局同意在人到齊、開大會之前，先以三天時間開北京軍區黨委常委會議，初步統一認識，利於接受大家批判；同時，由黃永勝、李作鵬找38軍到會同志談話，指出他們的報告是好的，起了推動作用。在會上，要通過揭發批判來達到團結。毛澤東當日批示到：「照辦。要有認真的批評，從批評達到團結的目的。建議李德生、紀登奎二同志參加會議。永勝、作鵬應同德生、登奎一道參加華北會議。」並指出：「這次會議在全軍應起重大作用，使我軍作風某些不正之處轉為正規化。同時對兩個包袱和驕傲自滿的歪風邪氣有所改正。」毛澤東在批示中還點名要黃永勝、李作鵬參加會議。

這個批示預示了以下兩個問題：1）改組華北軍區；2）批陳整風是檯面上的，檯面下的是考察黃永勝等人的表現，以及他們和華北的李雪峰、鄭維山是怎樣的關係。若當時能揭發出實質性的材料無疑會更好。實際上當時，中央已定「陳、李、鄭反黨集團」，所以無論李雪峰、鄭維山等人如何檢討都過不了關的根本原因。

22日，華北會議正式開始。然而當時會議仍然由李雪峰、鄭維山主持，因此，要批他們，怎麼個批法？根本無法深入。對此，24日，周恩來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參

加會議的黃永勝、李作鵬、李德生、紀登奎等人的匯報。因揭發批判陳伯達而涉及北京軍區主要負責人鄭維山和李雪峰，政治局會議認為，華北會議還未形成認真的批評和徹底揭露的精神，要求參加會議的政治局成員在幾個主要小組會上繼續做工作，打通思想，突破缺口，以影響大會。25日，周恩來就華北會議情況致信毛澤東，林彪，提出目前會議還處在學習和表態階段，估計形勢打開，將在今年底、明年初。同時匯報中央政治局討論意見。毛澤東閱批：「同意。」26日，參加會議的政治局成員分別在各小組會上繼續發動揭批問題，會議的氣氛越來越緊張。同日，周恩來火上澆油勸大家發言，並說：「如果會議開的無力，中央要點名了。」27日，中央政治局指定四個人幫鄭維山寫檢查，指定吳德、吳先恩等四個人來「幫助、督促」李雪峰、鄭維山端正態度，交代問題。鄭維山後來說，當時的「幫李、鄭小組」實際上就是搞逼供。

問題的癥結是之一「為什麼聽任陳伯達在北京軍區亂跑亂說」，正如前面所述，正是周恩來主持會議，宣佈的中央領導人的分工——陳伯達參與華北的三支兩軍。而李雪峰、鄭維山的檢討恰恰是不理解這一點，沒有能夠解釋清楚「為什麼跟著陳伯達跑？」以至陳伯達成了「太上皇」。但是周恩來卻對此保持緘默。陳先瑞在回憶錄中就說：「為何聽任陳伯達亂跑亂說」，這除了中央能阻止他，北京軍區是擋不住的。陳伯達到華北是「解決」地方上「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我們沒有請他「解決北京軍區所屬的軍政問題」。「太上皇」一說也不是事實。

1970年12月30日和1971年1月4日，江青再請示了周恩來之後，來到會上猛批了鄭維山。江青講：「現在我還稱你們同志，就是因為你們還有機會交代，主席的批示是給你們出路的。你們是群眾攻一點交代一點，你們要徹底交代。」江青在此次講話中，把北京軍區領導人奉命陪陳伯達到內蒙視察說成是「背著中央」，陳伯達之所以在廬山上有恃無恐就是因為有北京軍區給他做後盾。江青還指出華北山頭是有歷史性，點了聶榮臻的名字。

針對江青的講話，周恩來在1月9日致信江青，提出：「我勾掉的幾處，有的案尚未結，有的牽連太多。與主題無關，可以去掉。」對講話中隨意點名批評的情況，指出，「這樣點名，未經討論，恐不恰當」。並告：「主席在（一月）六日批示：講話不要印發。七日批示：錄音是否放聽，請先將文字送我看過再定。我建議，你將這兩次講話錄音的文字本先呈主席審閱。」11日，將根據江青兩次講話錄音整理的文稿送毛澤東，毛閱後批：「不要放聽，也不要印發，可作內部材料保存。」唯一可以理解的是，毛澤東現在需要的軍隊諸如聶榮臻等人的支持來倒林，因此江青點聶的名是不合時宜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周恩來的政治上的老辣遠非江青所可比擬的。

1月8日，毛澤東在濟南軍區政治部《關於學習貫徹毛主席「軍隊要謹慎」指示的情況報告》上批示，提出：「我軍和地方多年沒有從這一方面的錯誤思想整風，現在是進行一場自我教育的極好時機了。」當日，周恩來批示將此件印發政治局成員，明日討論、下發。次日，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毛澤東對濟南軍區報告的批示，一致認為當前應以批修整風的自我教育運動作為推動各項工作的中心。會後，周恩來致信毛澤東，提出近期將專門召開一兩次政治局範圍的批陳整風會議。同日中央軍委召開批陳整風座談會，各大軍區、軍委各總部和各軍兵種負責人一百四十三人參加會議。自本日起，出席軍委座談會的全體成員均參加華北會議。

1971年1月12日，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黃永勝、紀登奎、李德生關於華北會議情況匯報，商定召開大會及結束會的安排。《華北會議對鄭維山同志錯誤的初步揭發材料（未經核對）》和《華北會議對李雪峰同志錯誤的初步揭發材料（未經核對）》兩份材料被上報給毛澤東。材料列舉了李雪峰、鄭維山的六大罪狀以及同陳伯達的關係，但是卻沒有任何同林彪甚至是軍委辦事組（指黃、吳等人）的聯繫。

1月20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林彪，匯報政治局會議情況，提出：即使中央指出原北京軍區負責人的錯誤，也不應與陳伯達放在一起成為所謂「反黨集團」。華北會議之後，「仍需進行一段艱苦教育工作，如北京軍區、華北局舊機構、河北省革委和河北省軍區、天津市革委。而軍隊的團結，軍民的團結，各地各單位的群眾關係，連山西、內蒙在內，都需要很慎重地加以處理。因此，中央的發言和會議的傳達，要很好地掌握分寸，有步驟地進行」。毛澤東閱批：「照辦。」

1月23日，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據董保存先生，周恩來講：「第一，你們認為華北問題還沒有揭蓋子，我認為是到了高潮。我不同意華北會議還沒開完即刻改組北京軍區。第二，你們硬把鄭維山向陳伯達一邊拉，這個不好。這樣把鄭維山向陳伯達那個方向拉，鄭維山就可以不作檢查只等審查。第三，處理結果向主席報告要寫兩個意見，一是鄭維山作檢查繼續工作；二是北京軍區改組，鄭維山免職。把這兩種意見報告主席，主席批哪一種意見就按哪一種意見執行。不要只報一種。」

筆者對此表示懷疑。因為根據《毛澤東文稿》中〈對周恩來在華北會議上的講話提綱的批語〉的註釋得知，毛澤東在周恩來1月20日送審的講話提綱初稿上批示到「已看一遍，大體可用。明天可能談一次」。1月23日，毛澤東約周恩來等談話，商議周恩來的講話提綱。根據毛澤東意見對提綱作修改後，周恩來於當夜再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閱後在送審報告上寫了一個批語「同意」；並且又在信封上寫了一個批語「完全同意」。1月24日，周恩來即根據此提綱，代表中共中央在華北會議全體大會上作總結講話。這個講話提綱後作為中共中央1971年第6號文件印發。

據此，可以得出，關於北京軍區改組等意見在20日即已經成為定局，而且在周恩來遞交的《華北會議對鄭維山同志錯誤的初步揭發材料（未經核對）》和《華北會議對李雪峰同志錯誤的初步揭發材料（未經核對）》兩份材料中已經完全認定鄭維山是站在陳伯達一邊的。

1月24日，周恩來代表中央對於華北會議作出總結（中共中央1971年第6號文件印發）。周恩來在講話中嚴厲的批判了李雪峰、鄭維山：李雪峰把個人凌駕於黨委之上，做官當老爺，唯我獨尊，一個人說了算，動輒罵人訓人。鄭維山飛揚跋扈，稱王稱霸，竟然下令開槍鎮壓群眾，伸手向中央要開槍權、掃蕩權。他對同級以家長自居，對下級蠻橫霸道。鄭維山過去緊跟楊成武搞山頭主義、獨立王國，這次又緊跟反黨分子陳伯達，站在錯誤路線一邊。李雪峰過去緊跟劉、鄧，同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壞人混在一起，反對毛澤東的革命路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初期，他緊跟陳伯達跑了。他和陳伯達的思想上有共同性、有個人野心。李雪峰還在廬山會議上搞了準備翻案、算賬的材料，這次會議上又派人回去銷滅滅證，在背後搗鬼。他對有的同志的揭發批判很反感，甚至反咬一口。這種態度如不轉變過來，那是很危險的。

同時周恩來宣佈了改組改組北京軍區的決定：任命李德生為北京軍區司令員，謝富治為第一政委，紀登奎為第二政委。免去了鄭維山的司令、李雪峰第一政務的職務。

這裡面還有一個插曲。李雪峰在檢討中除了「反黨集團」、「陰謀」外，李雪峰什麼都認了。所有的與會者，包括周恩來、江青都相信了，認為李雪峰說清楚了。只有毛澤東一人不相信。到了中共「十大」時，周恩來，甚至包括張春橋、姚文元都認為李雪峰沒大事，不應該劃為林彪的「大將」，但還是開除了李雪峰的黨籍。當時，專案組副組長紀登奎曾問周恩來：是不是和毛主席說一說？周恩來說：你代表我們去說。毛澤東說，不能原諒，他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意思是李雪峰沒說實話。紀登奎則回憶說：他向毛提議「李雪峰、鄭維山兩位，同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四位大將的問題不一樣，處理上也應當有區別，建議不要開除黨籍了。」誰知毛主席聽了以後，高深莫測地說：「紀登奎呀，你這個人啊，少兩根白頭髮。不像我們這些人。」

關於周恩來指責「鄭維山飛揚跋扈，稱王稱霸，竟然下令開槍鎮壓群眾，伸手向中央要

開槍權、掃蕩權。」更是信口雌黃。1968年各派內鬥不止，導致鐵路運輸不暢。河北磁縣兩派把在磁縣把鐵路電話線破壞，已經影響到京廣線、隴海線以及西南、西北的鐵路線段調度周轉。對此中央採用一律鎮壓的策略，無論你是造反派還是保守派。1968年2月8日，周恩來電話指示鄭維山：「維山同志，據鐵道部軍管會報告，邯鄲地區兩派發生武鬥，在磁縣把鐵路電話線破壞，已經影響到京廣線、隴海線以及西南、西北的鐵路線段調度周轉。你們馬上派一個團到那裡，制止武鬥，恢復鐵路暢通！可以按『二六命令』處置，『二六命令』你們可大量印發，廣泛宣傳……」「當地駐軍在執行上述命令時，首先要耐心地進行政治思想工作，講清道理，進行勸阻。如勸阻無效，可對空鳴槍警告，令其撤回。在勸阻和警告仍然無效時，可宣佈這種搶奪是反革命行動，並採取措施對其少數的壞頭頭和肇事兇手予以逮捕法辦。遇到這些人拒捕和抵抗時，人民解放軍有權實行自衛反擊。……」於是對於不聽指示的當地造反派，解放軍最後採用了武力鎮壓的方式。華北會議上，只有黃永勝為鄭維山講了話。黃永勝對全體與會者說：「磁縣事件，是上面的責任。」

？

第一部分 第九章

「林彪事件」：進入新一輪的鬥爭

1966年，周恩來在揣摩毛澤東的旨意後推舉林彪為接班人，並在文革中多次對此加以解釋。文革初期，周恩來與林彪都是堅定的文革派。周、林二人都是毛澤東發動和推行政革的重要力量，因此在這場史無前例的浩劫之中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二者的不同點在於，林彪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作為一種軍隊力量的「橡皮圖章」，而周恩來是毛澤東文革路線的具體組織者和實施者。其角色絕非官方定位的「說了一些違心的話，做了一些違心的事」。

分析周恩來和林彪的關係、對比兩者在文革中的表現和作用，周恩來的真實形象無疑會更加清晰。周恩來與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之前基本上保持了良好的關係，互相尊重與支持，現在大陸官方將周恩來與林彪關係解釋為周恩來與林彪進行了「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

這一說法根本是站不住腳的，是無視事實和有意誤導，無非就是想人為地區分周恩來與林彪的關係，一方面拔高周恩來的偉人形象，另一方面則繼續抹黑林彪，讓林彪充當毛澤東文革罪孽的替罪羊。

九屆二中全會之後，毛、林之間的裂痕逐漸公開和擴大，周恩來不斷揣摩毛意圖，開頭還試圖調和毛林的關係，但是隨著毛搞掉林彪的意圖明顯起來，周也就根據毛澤東的調子對逐漸和林彪等人劃清界限。在處理「林彪事件」前後，周恩來再一次充當了毛的「第三隻手」。事後，周恩來又對劃為「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人加以整肅。

一、周恩來和林彪的關係

1. 周恩來的「積極」、林彪的「被動」

林彪曾經說過：我這個國防部長有一大半是總理替我當的。實際上確實如此。

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周恩來揣測毛澤東的「聖意」後，推薦林彪為接班人，此後二者的關係由此變得非常之近。特別毛澤東當時開列的中央副主席、常委的名單上，副主席是兩個，一個是林彪，另一個是周恩來。但是當名單傳到周手上時，周恩來把自己的名字圈掉了，林彪就成了唯一的副主席。

對此，周恩來在文革初期多次給以解釋：「從七大開始，每次鬥爭，都感到劉少奇沒有多少馬列主義水平，看他二十年了，到十一中全會，就決定了，劉少奇不能挽回了，他沒有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水平。難道你能說主席包庇劉少奇嗎？問題是要逐步認識的。林彪同志主持軍委工作後，強調學習毛主席著作，政治掛帥，就看出林彪同志思想水平高，認識水平高，就認識到林彪同志是正確的，能緊跟主席思想的。一九六五年大家逐步認識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最好接班人。一九六六年就解決了，水到渠成，心服口服。」

後來鄧穎超在廬山會議上曾經表態：擁護林彪的講話，同意設國家主席，並義憤填膺地說，誰反對毛主席，誰反對林副主席，我們就打倒誰！鄧穎超還爭功似地說：「我們現在都說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你們知道嗎？『親密戰友』這樣的稱呼是我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第一個提出來的。」當然，當毛林反目之後，無論是周恩來還是鄧穎超都對此再也不提。

表面上林彪是副統帥，毛澤東的親密戰友，黨章上明確記載的接班人，可實際上並無太大的實權。文革中任何大小事項的決策權都在毛澤東，而執行權則在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文革碰頭會。特別在文革初期，林彪看起來更像一個「橡皮圖章」。無論是初期的紅衛兵運動，還是一月奪權之後在建立各地委員會的過程中，周恩來在其中的作用遠遠大於林彪。

文革初期，林彪接連在8月18日，8月31日和9月15日對紅衛兵講話。這些講話被國內黨史論者「林彪在接見大會上作了煽動性的講話，從而導致紅衛兵運動在全國城鄉各地迅猛發展，勢如燎原。」周恩來在9月25日的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造反總司令部負責人座談會也承認「林彪同志和我的三次講話，篇篇都是經過主席審查的」。吳法憲說：據我所知，林彪歷次接見紅衛兵的講話，都是由中央文革代為起草的，林彪從不表示自己的任何意見，每次都是照稿宣讀而已。

何蜀先生在查閱大量有關「文化大革命」史料後認為：「現經常被用來當作批判靶子的一些『林彪講話』，其實並不全是他自己的，大多是別人（按照毛澤東的意圖）寫好並經毛澤東審定後安排他去照著念的；講話表達的也並非他的個人思想，而是表達了『文化大革命』發動者毛澤東的意圖和當時『無產階級司令部』高層領導集體的思想。」

何蜀先生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的史實來證明之：1966年8月31日，正值「紅五類」紅衛兵（或曰「血統論」紅衛兵）製造的「紅八月」的「紅色恐怖」高潮中，毛澤東第二次接見了紅衛兵，對紅衛兵的打、砸、搶、抄、斗大加讚賞和鼓勵。在接見之前，林彪審定別人為他起草的講話稿時，在「革命的小將們，毛主席和黨中央熱烈讚揚你們敢想，敢說，敢幹，敢闖，敢革命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你們干了大量的好事，你們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議。我們十分高興，我們熱烈支持你們」這段話後邊，加寫了「堅決反對壓制你們！你們的革命行動好得很！」毛澤東審定時批示給林彪：「這樣修改很好。」顯然，這篇講話基本上是別人按照毛澤東的意圖代林彪起草的，林彪所加寫的只有那麼兩句，其內容與前邊的話的意思並無多大不同（等於是同義反覆）。毛澤東認為「這樣修改很好」，可以看作是對林彪的鼓勵。

1966年9月15日，毛澤東第三次接見紅衛兵，林彪又作了講話，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專門講到了兩種不同的「炮打司令部」，說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一些「牛鬼蛇神」企圖炮打無產階級革命的司令部。這篇講話稿是接見前由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中央文革小組顧問、中宣部部長陶鑄送毛澤東審定的，毛澤東對這段話作了加寫和改寫，強調了不能容許「牛鬼蛇神」炮打無產階級革命的司令部，「要粉碎這些牛鬼蛇神的陰謀詭計，識破他們，不要讓他們的陰謀得逞。」這段話，對當時剛剛興起的「炮打司令部」造反浪潮起到了一定的遏製作用。毛澤東為什麼要在這次講話中作這樣的強調？這是值得研究的另一個問題。但可以肯定的是，這篇講話並非林彪自己寫的，代表的也並非林彪的個人意願。因為反對「牛鬼蛇神」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顯然不好用來當作林彪的「罪行」，一般文革史著作很少提及這段話。

何蜀先生則指出，關於9月15日接見時的講話，還有一個細節不大為人注意。從《建

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中（第137頁）的有關注釋可知，在這次接見之前，陶鑄曾將替周恩來起草好的講話稿送周審定，周於14日將講話稿送陶鑄時提出：「我仍主只由林彪同志一人講即可，已函請主席批示。」陶鑄在將講話稿送毛澤東審定時寫道：「我意明天還是林總與總理兩個都講較好。請主席批示。」毛澤東即批示：「可以由兩個人講。」可見，當時的講話，不僅稿子是由陶鑄組織寫作班子（當然是按照毛澤東的意圖）起草的，而且，由林彪一人講還是由林彪與周恩來兩人分別講也是由毛澤東最後決定的。關於1966年國慶節慶祝大會（即第四次接見紅衛兵）時的林彪講話，有的文革史著作提到林彪和周恩來在接見紅衛兵時的講話，習慣於從兩人的講話中各取所需，引出不同的句子，強調林主要講造反，周主要講紀律，或者說林的講話是高調，周的講話是低調，等等。其實，在瞭解了當時這些講話出籠的內幕之後，這樣說顯然就不準確了。

然而與此相對應的是，周恩來不僅在同紅衛兵時候講話火氣十足而且是身體力行的參與具體的工作，林彪則是只講講話應付了事。

周恩來在8月5日清華萬人大會上講：「我這次來清華是老老實實做學生的，來學習的，也是來煽風點火，煽社會主義的風，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火。」

周恩來在8月18日號講：「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們要大破資產階級思想，大立無產階級思想，也就是大立毛澤東思想。大海航行靠舵手。我們偉大的舵手，就是毛主席。」

8月27日周恩來在首都紅代會上說「我們來就是幫助你們建立聯絡站……我們有責任幫助你們，不光成立總站，還在成立分站，給你們干革命的方便。給你們架專用的電話線，準備交通工具、吃住。」

在8月31日接見外地來京革命師生大會上，周恩來說「現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新的高潮。全國各地的青少年組織了紅衛兵和別的革命組織，這是一項偉大的革命創舉。我們的紅衛兵小將們，破『四舊』，立『四新』，充當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衝鋒陷陣的急先鋒。你們那種敢想、敢說、敢做、敢闖、敢於革命、敢於造反的精神，得到了全國廣大工農兵和革命幹部的熱烈支持。我們向英雄的工農兵歡呼！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

類似的講話舉不勝舉。

鑒於當時歷史情況，周恩來與林彪都要表態，但林彪只是口頭上擁護，而周恩來則不僅是口頭上的擁護者，而且還是各項具體行動的策劃者和指揮者。在以後的文革歲月裡，周恩來堪稱之為毛澤東推動文革的最重要的助手，積極參與和配合了文革各項的方針的落實，沒有周的大力支持和堅決推動，毛澤東的任何瘋狂舉措都幾乎難以推行。即使周如國內黨史界認為的「不太理解」，行動上「很不得力」，但實際上周是毫無保留地堅決站在毛澤東一邊，認真貫徹執行了毛澤東的文革方針和政策，使文革狂潮一次次推向高潮。事實上，後人只能考證其說了什麼，做了什麼，對於周恩來的內心真正想法外人很難得知，所謂的「不太理解」，行動上「很不得力」也就只能是臆測了。相反，如果從周恩來對其親屬們的勸誡，則完全可以得出周恩來是非常自覺的投入到這場運動。文革發動之初，周恩來的侄子周爾輝曾經向周恩來訴苦，周恩來的回答則是：「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共產黨員要能經風雨。見世面。」無獨有偶的是，周恩來亦曾經如此訓示過其侄女周秉德。周恩來指責周秉德是為當時被批判的省委說話。

周恩來在1967年1月26日接見工交口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講：「批判薄一波、陶魯筋的鬥爭至今沒有展開，學校將薄一波抓回來後沒有示眾，都鬥爭薄一波，但不揭發，薄一波領導財經十七年，一九五三年那麼多人批判，為什麼現在批判不起來？抓彭、陸、羅、楊不怎麼困難，為什麼抓薄一波那麼困難？今天工交口都在場，這個問題值得深思。薄一波管工交各部幾年，工交口成立黨委，管各部黨組，黨委，部長。管得很深，為什麼各部揭發得很少？」

1967年3月3日周恩來在批判新疆軍區副政委張仲瀚的會上說：「張仲瀚今天上午低頭認罪，不管你過去十七年的影響，只要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就什麼都沒有了。……今天張仲瀚既然低頭認罪，向毛主席請罪，覺得心情沉痛，這點比別的同志好像還好點，既然如此，我們確實還給你一個帶罪立功的機會，讓你改造。」張仲瀚隨後即被關押入獄。3月28日周恩來接見安徽各界代表時說：「為什麼要專門提出打擊以李葆華為首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因為安徽流傳中央要保李葆華的說法，這樣就影響了一部分群眾，影響了奪權鬥爭中把矛頭指向以李葆華為首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丁凱文先生就寫過：被周恩來點名打倒的省級領導人還有廣西的賀希明、霍泛，新疆的武光，東北局的顧卓新、喻屏等人。事實上，文革期間周恩來點名打倒的人數量之多，一點不比康生、江青和陳伯達少，從周恩來文革期間的大量談話中看，周提及的西北和西南地區的原領導人幾乎全被打倒了。因此周恩來是對毛澤東文革路線最堅定的支持者和執行者，所有文革的重大戰略部署，周從頭至尾幾乎都參與。這自然也包括毛澤東打倒眾多原一線幹部的策略。周恩來在文革中的角色決不是所謂的「說了一些違心的話，做了一些違心的事」而已。

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政委閻紅彥被逼自殺後，周在1967年1月14日對雲南赴京代表談話時卻將閻定性為「叛徒」，周說「是他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是一個可恥的叛徒」，「我代表黨中央向你們正式聲明，這件事與兩派中的任何人也沒有關係，我向毛主席匯報時說過，任何人要想拿這樣的事來嫁禍給誰都是空想，任何人想要造謠誣蔑都不行」。周恩來同日在接見各大區和省委書記講話時，周再次說「這麼大的事情，用這麼個態度，不單是壓制群眾，而且反抗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抗拒中央的領導，自絕於黨和人民。」「閻之死，有人要把責任嫁禍於紅衛兵，紅衛兵一定要調查真相。……閻紅彥是自己可恥地解決了。」

被稱之為「大樹參天護英華」和「殫精竭慮護英華」的周恩來，講這種煽風點火的話絕非少，而是舉不勝數。然而這些語言，在官方的周恩來傳記，自然是一點都不會提的。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原按毛澤東意圖中央工作由林彪主持，但林彪僅主持過幾次會後就不再管，中央日常工作由周恩來負責。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一般均由周恩來召集。按照《晚年周恩來》的作者高文謙的說法，在文革中，毛澤東的很多決策，事先林彪都毫不知情，只是在事後才打了招呼。楊成武也說：「林彪雖是副統帥，但常委碰頭會、軍委、國務院；國防、外交、經貿等等，都是周恩來管，具體事沒給林彪權。」高文謙先生甚至認為：「事實上，毛澤東在文革中的不少重要決策，林彪都被蒙在鼓裡，只是在事後才打了招呼，以致林彪對毛的意圖不甚了了，不知文革運動怎麼搞法。見各級領導人像走馬燈似的垮台，而作為『副統帥』的林彪卻對運動的前景茫然無底，處境著實難堪。」

從現有的材料來看，周恩來絕非官方的有關周恩來的傳記所言：周恩來的確積極參與了這個運動，但周「很不理解」，是「違心」和「被動」的，且設法糾正過火的、極端的做法，努力減少「左」傾錯誤所造成的損失，等待時機糾正錯誤。

對於大串聯，王力回憶說「大串聯則是毛主席的一貫思想……說各地學生到北京要免費，到北京大鬧一場他才高興。」由於這是毛堅持要做的事，周恩來也是堅決服從的。

但是由於外地學生來京是毛澤東一手制定的決策，雖然這給周恩來的國務院出了很大的難題，周恩來還是堅決執行服從的。至於具體的行動，毛澤東的八次接見紅衛兵都是由周恩來精心策劃安排，無論是組織、安排，還是接待、交通、食宿、安全保衛等諸多環節，周恩來都嚴格把關，精心策劃。第一次，周恩來安排在天安門由毛接見紅衛兵，接見完後當場進行總結，各個組都向周恩來匯報。總結後周恩來又研究下次接見的方案。以後的七次每次接見之前都要根據經驗教訓，四處勘測路線，再選擇最佳的方案。根據1月27日《人民日報》上新華社的報道，1月25日和1月26日連續兩天接見的情況看，毛主席先

後檢閱了1100萬「文化革命大軍」，在第八次則接見了250萬。

而且正如上述，從「一月奪權」到「軍管」再到各地委員會的成立，都是由周恩來具體操作。在整個過程中，即使周恩來與林彪都作過類似的講話，林彪只是口頭上擁護，而周恩來則是各項具體行動的策劃者和指揮者。周恩來作為毛澤東推動文革的最重要的助手之一，積極參與和配合了文革各項的方針的落實，是保證毛澤東的文革大略得以發動和深化的最重要保障。

儘管林彪在名義上是中國級別最高的副總理，但他從來沒有參與過國務院的工作。林彪的影響力僅局限於軍隊，但就是如此，周恩來在有關軍隊的實際運作中，其作用遠甚於林彪。周對軍隊事務極感興趣，隨著「文化大革命」展開，周密切地介了解放軍的所有主要決策。據林彪手下一位將軍的兒子說：「我父親對『文化大革命』中的發生的事情記得很清楚，他告訴我說軍委辦事組（他是其中的一位領導成員）一共處理了1300多份文件，沒有一件毛主席不知道，沒有一件周總理沒有親自處理。」

自1967年的「上海一月革命」後，全國陷入了造反奪權的動亂之中，毛澤東不得不派出解放軍對全國實行大規模的軍管，由此開始了「三支兩軍」。但是作為軍隊主管人物的林彪卻基本上毫無作為，而是在軍隊裡沒有任何職務的周恩來，不僅過問軍隊的部署調動、人員安排，且常常親自發號施令，可以說是事無鉅細。在軍隊參與「三支兩軍」的過程中，充分體現了周對軍隊的掌控能力。

首先由周恩來在1月27日傳達毛澤東21日的指示時：「軍隊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在運動開始時，是不介入的，但實際上已介入了。（如材料送到軍隊去保管，有的幹部去軍隊。）在現在的形勢下，兩條路線的鬥爭非常尖銳的情況下，不能不介入，介入就必須支持左派。」

1967年1月25日周恩來就民航系統軍管一事給吳法憲的指示說「應以國務院、中央軍委的名義起草命令，宣佈由軍隊接管民航系統（包括整個民航系統所有機場、港站）。接管後，業務工作仍由原領導班子來抓。」2月17日周恩來對河南省軍區指示「（一）中央命令：迅速派部隊讓武鬥的雙方立即隔離；（二）宣佈：對河南日報進行軍事接管；（三）接管後停刊幾天……以上命令，望立即執行」 同月27日，周恩來致函毛澤東：建議立即對廣東實行軍管，準備籌建「三結合」的革委會，並建議對雲南亦先行軍管。毛澤東批示同意。28日周與廣東省委、廣州軍區負責人談話，宣佈由廣州軍區和廣東省軍區組織對廣東省實行軍管。此外周還與雲南省有關負責人及造反派代表談雲南實行軍管事宜。

3月13日周恩來在解放軍軍級幹部會議上專門談及軍管問題。周說「軍事管制問題，到二月中旬，全國實行軍事管制的單位六千九百多個，大都是公安、郵電、電台、報社、銀行、倉庫、監獄等單位。其中倉庫、銀行占很大數目，倉庫三千一百多，約佔一半；銀行一千四百多，約佔五分之一。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各級銀行都要軍事管制。將近七千個軍管單位，已經用了團的兵力。現在軍事管制從地區上看，只達三分之一。全國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包括天津），已經實行軍管或等於實行軍管的加上已經批准，準備實行軍事管制的有十個：陝西、新疆、青海、西藏、雲南、廣東、廣西、福建、浙江、江蘇。已經實行『三結合』奪權，成立革命委員會的有五個：黑龍江、山西、貴州、上海、山東。」

此後，各省部級單位甚至縣市的軍管問題都是由周恩來直接處理。3月18日，周恩來與李富春、聶榮臻、葉劍英商討軍管問題，並致函毛澤東：已向國防工辦和國防工業部門（二機、三機、四機、五機、六機、七機）宣佈，準備實行軍管。其辦法擬每一部門只派出三人的軍管代表小組，運用原有的機構領導業務，同時推動各革命群眾組織進行開門整風，實現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幫助需要批判的各級領導幹部檢討亮相，分別處理，以便最後實現各部門的革命「三結合」。……國務院工交、財貿、農林、衛生各部門正遵照毛主席指示，分別進行排隊，擬在工作癱瘓部門，亦實行軍管，其辦法如國防工業各部。定後將分別報批。

這些需要派出的軍管代表，擬經由軍委、總政從軍事科學院、高等軍事學院、政治學院德才兼備的老幹部中選派。毛澤東批示：退總理照辦。3月23日周恩來要求派一個師的兵力對大慶實行軍管，毛澤東批示：照辦。4月2日周批示同意青海成立軍事管制委員會，由劉賢權任軍管會主任。5月19日周恩來對四川宜賓地區的電話指示說，派軍隊保護造反派；把反動組織包圍起來，進行政治瓦解；對少數壞頭頭必須鎮壓，把幕後策劃者宜賓軍分區副司令員徐德有抓起來。7月28日周恩來給新疆軍區的指示說，立即制止烏魯木齊武鬥，有軍隊戒嚴，如果紅二司再死一人，要拿你們是問。與此同時，周恩來還在5月27日主持中央碰頭會，討論通過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關於對國務院XX部（委）實行軍事管制的決定（試行草案）》，28日報毛澤東林彪審閱，毛澤東批准：此決定由中共中央發出。周恩來如此深入介入「三支兩軍」這樣的事例還有很多，不勝枚舉。

林彪作為軍委的主要領導人，但對「三支兩軍」卻極少介入，除了表態支持毛澤東指示外，亦未曾發佈過什麼特殊命令。1967年3月20日的軍級幹部會上，林彪亦到會講話，在談到軍隊支左問題時說：「毛主席、黨中央很信任人民解放軍，搞軍管、搞軍訓、支援工業、支援農業、支援左派，好多重大的任務。這種種任務，光榮是光榮，偉大是偉大，但是，是新的任務。一方面證明毛主席、黨中央相信軍隊，另一方面我們軍隊責任是很大的，任務是很新的，過去還沒有這樣子搞過。」林彪還說：「支援地方，總的方面還是抓革命，促生產。不要只抓革命，不促生產了，把生產停頓下來。也不要只搞生產，把革命停頓下來。我們應該同時進行，而且應該以革命來帶頭，來掛帥，來促進生產。」

周恩來還直接下令調動軍隊。1967年9月4日，周恩來直接把電話打到當時陸軍XX軍在西安市的軍部，要軍長胡煒派部隊對某武器彈藥庫嚴加保護，並說必要時，可以開槍！1968年5月下旬周恩來再次命令胡煒去保衛秦嶺山脈深處、寶成鐵路附近的一座國家戰略儲備油庫。

這些都充分說明周恩來對軍隊的掌控能力非一般人所能比擬，其作用在實際上甚至超過林彪。當時作為「大秀才」的王力則說：「林彪的態度是：毛主席不到會他不到，毛主席不叫他主持會他不主持。……林彪雖然是接班人，他的地位跟劉少奇不一樣，劉少奇做第二把手時是主持常委日常工作的，那時毛主席退居二線。林彪不是這樣，因為毛主席回到了第一線。……毛主席自己是一線，所以林彪什麼事都往後退。」林彪自己則說：「向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小組請示報告，不要以為自己瞭解了就不報告中央，不要以為是小事就自己處理，不要以為自己聰明就不請示報告，也不要怕麻煩中央。無論大事小事都要請示報告。總理、中央文革小組同志都是日日夜夜工作的。可以發電報、打電話。」這些無疑是對林的「無作為行為」做了最佳的註解。

對於地方事務，雖然毛澤東在批示時也指明林彪參與，但是實際上林彪基本不管。2月7日，毛澤東對西藏軍區黨委關於請示中央盡快對西藏軍區領導人張國華等表明看法的報告批示：「林彪、恩來、葉、聶、徐各同志：請你們研究一下，張國華、周仁山、王其梅等究竟是好人、壞人，一二日內擬電告我，發出表態，是為至盼！」根據毛澤東指示，周恩來於次日與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肖華同張國華、陳明義談西藏問題。1967年5月8日凌晨，周恩來再次與有關人談西藏問題。在周恩來的主持研究下，毛澤東要的答案出來了。張國華是好人，周仁山（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書記處書記、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王其梅（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書記處書記、西藏軍區副政委）是壞人，被中央宣佈定為「中國赫魯曉夫在西藏的代理人」打倒，王其梅也成為「軍內一小撮」之一，以後被迫害致死。

2. 周恩來與林彪的的互動、兩人的不同

在不涉及到實質性問題的前提下，周恩來有時候會讓人覺得很厚道。

但是一旦涉及到實質性問題，周同林等人很大的不同之處就在於此，周恩來不會無視毛的存在。無論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毛的態度。王光美曾經回憶道：「陳雲同志曾就包產到戶和用重新分田的辦法刺激農業生產的問題，同一些領導同志交換過意見，少奇、小平同志同意，林彪也同意，恩來同志表示還是先聽取毛主席的意見。」周恩來唯「毛」首是瞻的形象被王光美的短短一句話活脫脫的勾畫出來。

除此之外，更進一步的說，周對於毛是無條件的忠誠，當任何個人與毛髮生衝突時，他均會不問是非地站在毛的一邊，非常熟練的對毛要整的人冷酷的加以處置。這也是周恩來的存在價值所在。

即使官方的《周傳》等書籍時，周對毛幾乎沒有一句勸諫，在「反反冒進」之後，他對毛的錯誤路線從來都是大力倡導、不遺餘力的推行的，都時用服從大局來解釋的，從來沒有自己的主張，對毛的錯誤做法從來沒有過反對意見，只要是毛的指示明知是錯他都要想盡辦法堅決執行。一旦毛的心思有變，周恩來更是積極揣摩毛的動向，以便更好的為毛服務。

林彪與周恩來之間的關係決非官方所稱的「周恩來跟林彪、四人幫作了不同形式的鬥爭」、「對林彪反革命集團作了艱苦卓絕的鬥爭」，在九屆二中全會以前林與周之間實際上是一種「互相關懷、互相幫助」的關係。這種關係紀體現在執行毛澤東的文革路線，也體現在林對周的工作上的支持。

在1967年的春夏之交，北京以及其它地方有一股「打倒周恩來」的浪潮。5月底，以張建旗為首，正式成立了北京鋼鐵學院「五?一六兵團」。6月2日，張建旗將他3月31日寫的攻擊周恩來的大字報《給周恩來的一封信》拋了出來，又以「鋼院五?一六兵團」的名義，貼出《23個為什麼?》的大字報，責問周恩來。6月14日，「首都紅衛兵五?一六兵團」成立。他們在夜深人靜之時，張貼出各種攻擊周恩來的大字報、大標語和傳單，諸如《揪出二月黑風的總後台——周恩來!》、《周恩來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徹底搗毀資產階級司令部!——質問周恩來》、《周恩來是毛澤東主義的可恥叛徒!》、《周恩來還我戰友!》、《周恩來，你在農林口究竟要幹什麼?》等。在每張大字報、大標語和傳單的最後，都署名「五?一六」三個醒目的阿拉伯數字，其中的「1」字寫成一個熊熊燃燒的火炬形狀。

高文謙先生說：此時是周恩來在政治上最難過的時候，社會上倒周的勢頭甚囂塵上，周本人也在中央文革碰頭會內部不斷遭到江青組織的圍攻批鬥，日子很不好過。這時毛澤東正在南方巡視，林彪利用坐鎮北京主事的機會，有意拉周一把，出面表態支持周恩來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對他表示：你要大膽主持這個會，放手處理問題，我現在情況不熟，身體不好，全靠你了；還特地向軍隊方面的人打了招呼，要他們全力支持周的工作。

周恩來對林彪的這種關照自然心存感激。1967年夏，毛澤東命楊成武回京單獨向周匯報情況，毛強調只對周恩來一人講，但周仍然堅持要楊還需向林彪匯報，並請楊轉告毛是周讓其向林匯報的。

毛澤東的保健醫生李志綏回憶錄：李單獨向周匯報毛的病情，並說不可告訴其他人，因為這是毛嚴令禁止的。但事實上周還是向林作了匯報，當李志綏質問周恩來的時候，周則回答：「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組織和領導，林副主席是我的領導，我怎麼能不報告他呢？」李志綏在書中還透露說，「九?一三事件」後，汪東興派人查抄林彪在毛家灣的住宅，抄出很多林周的合影，汪將這些照片收了一大包給了周，周對此感激不盡。

在毛澤東於1968年7月28日會見北京京五大學生領袖時的談話上。這是個帶有私人性質的談話，那麼在這次談話中，不經意的二次周的談話，就可以折射出周林的關係。第一次，當老毛批評蒯司令的井岡山亂打亂鬧時，林彪表示：值得，損失最小。隨後周說：林副主席說得好，損失最小最小，成績最大最大。當談到林彪是接班人時，周表示：林彪同志

主席著作學得好，包括蘇聯在內對馬列著作都沒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了。

實際上，周恩來對林彪做了大量不合實際的吹捧。在此僅舉一例。後來，周恩來把對林彪的吹捧至極致：「我們的副統帥林彪同志已經是眾望所歸的了。經過幾十年的培養，經過幾十年的鍛煉，經過幾十年的領導經驗的證明，林彪同志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第一人，……像林副主席中央經過考驗的領袖，事實上已經存在了，為什麼我們不在法律上定下來呢？」接班人要用法律的形式定下來，也是古今中外的新鮮事。翻看國際共運史來看，無論是哪個政黨，也無此壯舉，周恩來這提議，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於是在1967年11月，由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上，整理了一份通報並由中央下發全國，即《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關於徵詢召開「九大」的意見的通報》（1967.11.27；中發〔67〕358號）。通知說：許多同志建議，「九大」要大力宣傳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並寫入「九大」的報告和決議中，進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

丁凱文先生認為：林彪領導下的軍隊系統堅決支持周恩來在中央碰頭會和「九大」後中央政治局的工作。無論是葉劍英、楊成武主軍之時，還是後來的黃永勝、吳法憲等人的軍委辦事組當權之際，軍隊系統不僅從未參與過中央文革倒周的活動，而且大力支持周恩來在中央的工作，這與林彪對周恩來的態度有必然地聯繫。有一次葉群專門告訴楊成武和吳法憲，一定要積極支持周恩來的工作。葉群告訴吳法憲，林彪當面對周恩來表態說：「我的身體不好，一切工作還希望你鼎力相助。」

「九大」召開期間，康生和張春橋曾對吳法憲說，「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是周恩來批准的，《人民日報》的社論也是周恩來審閱過的，所以周恩來要對此事負責。吳法憲會後直接電話報告了林彪。林彪特意召吳到毛家灣，對吳說「你不要上當！他們的目的，是要慫恿你出來反對周總理。你千萬要注意，這個話對誰都不能再說。『揪軍內一小撮』是中央文革他們提出來的，總理即使看過了，也可能是一時疏忽，不能怪總理。我們黨內不能沒有總理。我身體不好，毛主席要掌握大政方針，毛主席正確方針的貫徹和組織實施，全靠周總理。周總理的角色我是幹不了的。看來康生還是想當總理的，是有這個心思的，你們要注意。周總理出國的時候，兩次由康生任代總理，但是據我看他是幹不了這個總理的。」事後吳法憲和葉群都向周恩來通報了此事。另一件事是：「九大」後江青擅自召開政治局委員會議，除江青外，還有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李德生、姚文元。江青在會上一是大肆吹噓自己的「革命經歷」，二是惡毒攻擊周恩來。江青指責周恩來「在大的原則問題上看不清，容易跟別人走，今天東風來了是東風，明天西風來了是西風。」江青炫耀說「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辦錯了幾件事，還有檢討在我的手裡」，並說「周恩來這個人不能掌舵，不能當一把手。」江青還說黃永勝等人在搞軍黨論。面對江青對周恩來的攻擊，黃永勝等人當場與江青頂了起來，隨即宣佈退場。黃永勝等人會後及時向林彪作了匯報，林彪決定讓黃、吳二人直接向毛澤東匯報，並要葉群立刻聯繫。邱會作則去中南海西花廳向周恩來通報有關情況。周含著淚握著邱的手說：「老同志就是老同志！老同志就是老同志！」但是毛並未在意此事，只是對黃吳說「你們不要講到過我這裡來告江青的狀，如果讓她知道了會整你們的。她已經整過你們一次，我也不告訴她，你們到我這裡來過。」

除了這種相互支持的互動外，周、林對一些問題的看法也是較為一致。例如解放老幹部。1971年萬里和趙紫陽就是在周恩來與軍委辦事組大力支持下得到解放，萬里被任命為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趙紫陽被任命為內蒙古自治區革委會副主任，與此同時，經過黃永勝等人的艱苦努力，還有一批軍隊幹部如楊勇、張宗遜、梁必業、張震等人也都榜上有名要被相繼解放。

林彪與周恩來有不同的地方。林彪根本不怕江青，甚至當面怒斥江青（詳見下文）。江青要整周恩來，林彪都對周恩來伸出援手，不怕得罪江青。但是周恩來不會直接同江青抗爭。

更多的不同是兩個人對事情的思考不同。林彪在私下從不讚揚文革，卻以「文化大要命」

稱呼文革；以「武化大革命」形容武鬥，充分體現了林彪對文革的真正看法。1959年，林彪就在私下裡指責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是「憑幻想胡來」，認為彭德懷的意見書是正確的，就是「急了點」；而反修鬥爭則是「罵絕了，做絕了，絕則錯。」劉少奇倒台之時，林彪在私下裡對林豆豆說過「劉少奇、鄧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劉沒有道理。」對於文革中的動亂、發槍、支左等多個方面，林彪都和毛有過不同意見。更為深刻的是林彪對於社會的看法和毛澤東根本不同。林彪認為「人一切爲了改善生活，故只有有關改善生活的行動才能動員大眾，人的需要什麼就什麼。」林彪還認為：人民爲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爲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的及其他東西。不可忽視人民的生活，而無目的去幹別的。林彪在建國之初在中南關於土改等政策都是相當右的。如果說林彪是「勉從虎穴暫栖身」還有一定證據的話，那麼對於周恩來有又什麼證據呢？

1970年12月，林彪拒絕了毛要其見斯諾的要求，並私下對家人發洩對毛的不滿，揭他的老底，說：「今後再也不隨便講話了！講話都要有根據，不然你好心好意擁護毛主席，還會犯擁護過頭的錯誤。」並憤憤地表示：「什麼路線，就是毛線。」「什麼講老實話，他（指毛——筆者註）就最反對講老實話，最喜歡吹捧，誰講老實話，誰就完了。」

到了1971年5月1日，林彪根本不想參加，後經周恩來親自打電話，再三勸說後，才勉強到場，卻始終不同毛澤東講話。毛澤東對林彪也視若不見，冷淡之極。林彪僅僅坐了幾分鐘後，便不辭而別。最後導致連一張合適的合影都沒有留下來。周恩來為此大為惱火。

周恩來絕無可能這般私下對毛不滿，更別說當面「摔臉子」了。

1967年5月21日，周秉德從西安回到北京，吃完飯時同周恩來談起了西安的文革局勢。周秉德批評那些學生造反派斗老幹部的行為。周恩來則說學生大方向對，只要符合「十六條」，擁護黨和毛主席，就是革命學生。周秉德實在不理解：些造反派，殘酷批鬥革命老幹部，盡做讓親者痛仇者快的事，這也算大方向對嗎？周恩來怒道：「你好像是省委派來做我的工作來的。你總是袒護省委，為省委講話，你再這樣我就把你趕走了！」最後，周恩來說「我有錯誤，但我跟主席。晚年不是消極的保持晚節，而要積極地保持晚節！」

周毛都去世之後，社會上起來一股風，竭力抬高周恩來，貶低毛澤東。由此鄧穎超曾經對那些不識大局、感情用事，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受過些委屈的幹部說：你們不要這麼搞，不能這樣搞麼。恩來什麼時候反對過毛主席？他這個人你們不是不瞭解，路線對了，他就對了；路線錯了，他就錯了。你們那樣說，那樣搞，無法向歷史向後人交代麼……。

3. 周恩來調解林彪和江青等人的衝突

林彪和江青的真實關係，是不是真的如官方所言「相互勾結，篡黨奪權，妄圖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直至1980年後被合二為一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

吳法憲回憶說：「對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這場『文化大革命』，不管林彪是否衷心擁護，但同周恩來一樣，他都全力去執行毛澤東的部署和計劃，這是毫無疑問的。至於對江青，最初因愛屋及烏，林彪對江青也是很尊敬，對江青提出的問題，也很重視。」但是隨著運動的開展，林彪與周恩來和江青等文革派的態度則變得大相逕庭。而這也是林彪最後得以很快出局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1966年的10月份，造反派開始衝擊部隊。1967年1月14日，肖力(毛澤東的女兒)控制下的《解放軍報》刊出標題是「一定要把我軍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徹底」的社論。這是最早公開提出「揪軍內一小撮」的社論。這篇社論號召：「要把軍隊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徹底，還必須繼續放手發動群眾，還要經過激烈的鬥爭，衝破重重阻力。」……「這種阻力，主要是來自混進軍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來自極少數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在我們軍隊裡，確實有那麼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

權派，和極少數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他們當面是人，背後是鬼，兩面三刀，欺上瞞下，玩弄資產階級政客的卑劣手法，抗拒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從此引發了全國性的「揪軍內一小撮」的浪潮。

各地的造反派有了這個上方寶劍，軍隊的各級領導人就遭到了和地方黨政領導幹部一樣的厄運，被揪斗、遊街、罰跪、撕掉領章和帽徽，甚至性命不保像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就悲慘的死于非命。一時間，各軍區紛紛來電告急求救，叫苦不迭。此舉大大的刺激了軍中的老帥們，中央文革同代表軍隊勢力的老帥們的矛盾一下子就浮出了水面。1月19日，葉劍英同徐向前因為肖華一事，對拍桌子，「大鬧京西賓館」。

20日，葉劍英以軍委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向頂頭上司林彪告了江青、陳伯達的狀，把中央文革一干人對軍隊的指責攻擊全部端給了林彪。揪斗肖華一事，引起了林彪的極大憤怒。林彪叫秘書打電話通知江青專門來一趟。林彪一見江青怒火沖天，不等江青開口，就大發脾氣，連珠炮一樣的責問江青：「你們說解放軍已經走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已經被我們帶到了資產階級軌道上去，有什麼根據？說三座門是閻王殿，你們一見三座門就有氣，你們太放肆！這完全是對軍隊和軍委領導的污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是毛主席指揮的，軍隊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何解釋，你們這樣仇視軍隊，仇視軍委領導，我幹不了，不幹了！我辭職總可以吧。我要報告毛主席，你們不同我商量，大罵肖華，鼓動抄家，搶檔案，這是為什麼？你們不通過軍委，就直接插手軍隊的工作，想搞掉總政，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嗎？我要找毛主席，請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職務。」林彪連說帶罵，根本不讓江青解釋。張雲生說「林彪臉色氣得紫青，身上一陣陣發抖。張雲生還是第一次看到林彪氣成這樣。」林彪對張雲生說：「叫葉群，快把江青給我趕走！」張雲生驚得目瞪口呆。江青接著向林彪道歉說：「你是中央副主席，軍委副主席，我有錯誤，你可以批評我，你批評我，斥責我，甚至罵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裡去呢？那句話的確不是我說的，罵肖華，抓肖華，抄家都是不對的，絕對不是我支持的，你可以檢查，這件事情我已經報告了毛主席，是我錯了，我檢討。」

關於林彪和江青之間，據說還有一次，林彪揚言要找槍，「斃了她！」

吳法憲回憶說「這次林彪與江青大鬧，撕開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說是種下了分裂的種子。林彪對江青是不滿的，但是又怕得罪了毛主席，不敢過分譴責。就這樣，雙方的矛盾和鬥爭一直延續到『九大』，延續到廬山會議，延續到『九·一三』林彪的終結。」吳法憲還說：「據我所知，在當時的中央常委以至整個的中央領導層裡，敢於這樣當面斥責江青的，除了毛澤東之外，就只有林彪了。」

這也是林彪主持制定「軍委八條」的重要背景。

但是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的靠山是毛澤東。周恩來在1968年10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說：「中央文革是我們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產生的一個新生的力量。中央文革，在兩年前十一中全會上已經肯定了。那個時候，在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領導下，中央文革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成了直接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一個前線發動群眾的機構。」從本質上來講，中央文革小組和林彪沒有隸屬關係，實際上，中央文革小組是直接聽命於毛主席的。

但是林彪遠沒有周恩來看得這麼清楚。江、張、姚的政治數量級無法企及林彪於萬一，林彪曾鄙夷地說，張春橋、姚文元這種名字他過去連聽都沒有聽說過。

林彪不只一次罵過江青而且還時時刻刻提防江青染指軍隊。林彪囑咐葉群：「不能讓這個女人插手軍隊，軍隊不能亂。」但是毛澤東通過改組「全軍文革小組」，由江青出任顧問，並接受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雙重領導，以利於江青在軍隊勢力的滲透。林彪與江青大吵之後的第二天，林彪通知葉劍英和徐向前主持召集軍委會議，傳達毛澤東對肖華問題的處理意見，並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參加，但是只有關鋒一人與會，其他人都躲避開。會上不少軍隊幹部

爭著發言，以發洩心中的不平。黃永勝就嚴厲批評文革小組不聽毛澤東的話，不執行毛澤東的指示，胡亂批評解放軍，亂鬥解放軍幹部，要奪解放軍的權，希望中央文革作出認真、深刻的檢討。關鋒回去後向江青等匯報了會上的情況，江青大怒說「今天這個會議是個反對毛主席、反對中央文革、反對我的會議，」並將矛頭對準主持會議的徐向前，徐向前只好推到會上發言的黃永勝身上，讓黃永勝作檢討。為此，黃永勝去問林彪要不要寫這個檢討。林彪則說「絕對不能寫這個檢討，要堅決頂住。我去直接報告毛主席。」江青對林彪一點辦法都沒有，只好把這筆賬算到徐向前的身上，並建議林彪撤換徐向前的軍委文革小組組長之職。吳法憲回憶說：「林彪事後對我說：『誰當全軍文革的小組長，過不了多久，就會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換徐帥，全軍文革那就讓他名存實亡吧。』」吳法憲最後說，「後來果然如此，徐向前下來以後，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由楊成武代理了一個短時間，不久，楊成武隨毛主席東巡以後，全軍文革也就銷聲匿跡了。」（筆者註：周恩來曾經說謝富治在徐向前和楊成武之間任過一段全軍文革小組組長。）

黃永勝出任總參謀長後，其行事風格大異於其前任楊成武，黃永勝不買江青的賬，認為軍委辦事組只能向毛、林、周三人負責。原來軍隊調動命令報告上名單冗長，致使兵力調動遲緩且易洩密。於是毛澤東批示，軍委辦事組有關軍隊調動的文件不送中央文革小組。黃永勝依令而行。江青則極為不滿，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大罵黃永勝等：「黃永勝，吳法憲，你們目無中央，無組織、無紀律，搞獨立王國，封鎖消息。」江青揚言不許二人參與會議，還要寫檢討。林彪支持黃吳，堅決不寫檢討，黃吳也認為沒有錯。周恩來、康生和姚文元則和黃永勝和吳法憲談話，要求兩個人檢討錯誤，並暫時停止工作。

原定黃永勝率團出訪阿爾巴尼亞之事也受到江青的阻撓，周恩來則出面請示毛澤東。毛澤東發話，江青不對，黃永勝仍然應當出訪阿。黃永勝回來之後，毛澤東在江青不在場的時候，告訴黃永勝：不要怕江青，你們要抵抗，要鬥爭，要批評。黃永勝等人就真的信以為真了。

由於周恩來主持文革碰頭會，這樣夾在中間，事情難辦。吳法憲說：「我們與江青等人的矛盾激化後，周恩來為調解江青和軍委辦事組之間的矛盾，真是費盡了苦心。」周恩來提出，黃吳李邱要和江青等人在一起開一個團結的會。周特別叮囑這些丘八們不論江青說什麼，都不要說話。不曾想，黃吳李邱遭到江青破口大罵：「你們軍委辦事組的人，身穿的綠軍裝，頭戴的紅五星，領子上的紅領章，這些都是老娘給你們爭來的。你們目無中央，目無組織紀律，不覺得可恥麼？」因為有周恩來的囑咐，只是為了團結，黃永勝等就一直站在那裡，聽江青訓斥，一聲沒吭，忍氣吞聲，啼笑皆非。周恩來也覺得江青太過分，就把事情報告了毛。毛指示江青要檢討。周再次叮囑黃永勝等人不要「放炮」。江青的檢討很不像樣，吳法憲說：「江青同志的檢討，我們表示歡迎。但是江青同志先入為主，偏聽偏信，出口傷人，主觀、片面地處理問題，值得引起警惕。」知情的汪東興接著說：「江青同志好訓人，隨便罵人，侮辱同志，這是最不好的。江青同志的錯誤，常委要負責，總理對江青同志太遷就了。」江青聽了我和汪東興的發言，氣得臉色發青，表情很難看。周恩來就立即宣佈散會。

為了彌補林彪和江青的間隙，周恩來主動提議，把江青的行政級從九級提到五級，林彪同意了，並和周恩來一起簽名。

但是林彪對於江青等人的敵視是很明顯的。1969年9月，林彪到江西視察時講：在中國，小產階級可能把權搶走，要防止小資產階級搶權，現在就要注意。他還明確說：據我看，上海就是小資產階級掌權。林彪向毛澤東推薦十二軍軍長李德生出任總政治部主任，張春橋事後向江青講，林彪就是不想讓我們插手軍隊。張春橋曾嘲笑黃永勝：「是個大老粗，什麼也不懂。」林彪在同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會面時說：「張、姚是無名小卒，不知是從哪裡冒出來的，也沒有做過什麼大的工作，不過是個小記者。」

二、在毛、林衝突之間

1. 周恩來勸說黃、吳、李、邱作檢討

九屆二中全會以後佈置的批陳整風，矛頭就對準林彪。1970年9月19日，毛澤東在廬山會議結束後返回北京時，在豐台火車站同北京市黨、政、軍負責人紀登奎、陳先瑞、吳忠的談話中說：陳伯達是船上的老鼠，看見這條船沉了，就跑到那條船上去。當時參加談話的吳德回憶說：「毛主席這麼說，使我意識到了陳伯達後邊還有人，不僅是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這些軍委辦小組的人，而是地位更高的人。我想到了林彪。」

毛澤東為了敲山震虎，第一步是以汪東興的檢討為誘餌，利誘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等也檢討，借此順籐摸瓜，可以直搗「黃龍」。

9月22日，周恩來看到毛澤東21日對汪東興書面檢討的批件後，同康生到林彪處，將毛批件送給林看，提議先約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四人在一起閱讀該件，在他們想通了後，應給主席、林副主席寫一書面檢討，揭露事實真相，與陳（伯達）完全決裂。指出。這樣做，對黨對己都極有利。

其實早在廬山上，周恩來就找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談話，並要吳法憲作檢討。吳法憲很緊張，於8月28日晚上偷偷報告了林彪。林彪說：「你沒有錯，不要作檢討。」葉群對吳法憲說：「你為了捍衛主席思想，主觀動機是好的，不要檢討。」但是周恩來對吳法憲說：「現在要保副帥，這是由副帥講話引起的。法憲，你出來做個檢討，承擔責任，不然就要搞到副帥頭上了。」周恩來給吳法憲出點子，在檢討中要重點寫自己，對林彪講話「理解錯了」。現在周恩來找上門來了，吳法憲不檢討過不了關，葉群對吳法憲說：你犯錯誤不要緊，只要不牽涉首長和黃總長，大鍋裡有飯，小鍋裡好辦。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也勸吳法憲，檢討中不要涉及葉群和他們。

9月29日，吳法憲檢討。10月13日，葉群檢討。毛抓住了就不放，14日批示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在廬山發生的問題，是「一個傾向掩蓋著另一個傾向」，「反九大的陳伯達路線在一些同志中佔了上風」。因此「陳伯達一吹就上勁了，軍委辦事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但是黃永勝等還沒有檢討，大魚還沒有釣出來，毛澤東再次強調，「黨的政策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除了陳（伯達）待審查外，凡上當者都適用」。

但是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等三人遲遲不寫檢討。

黃永勝覺得自己是半截子上的廬山，自己有什麼錯？根本不需要作檢討。周恩來讓邱會作做黃永勝的工作：不是發言不發言的問題，主要是檢討宗派主義，讓主席高興點！這就是周恩來喜歡檢討的原因和目的？！

1971年2月20日，毛澤東批評軍委辦事組在「批陳問題上為什麼老是被動，不推一下，就動不起來，」要求「採取步驟，變被動為主動」。次日，江青傳達了毛澤東對黃永勝等人的批評。周恩來以自己為例，聯繫歷史上所犯錯誤的教訓，極力勸說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做檢討。在周恩來這種引導下，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等以及其他政治局成員也做了檢討。

28日，周恩來就中央軍委辦事組26日給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的檢討報告致信黃永勝，提出：「如果軍委辦事組這個報告，不提在政治局會議上的檢查，事情的發展就好像接不上；而你不在這報告上單獨寫幾句，也對主席的幾次提示和批評，難以交代，時間也耽擱了。報告上還應寫幾句，在軍委辦事組開會後，各總部、各軍兵種都在繼續進行批陳整風，情況如何，也應寫上。」同日，黃永勝按周恩來信中要求，補充了有關內容。

3月份，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交出書面檢討。但是所有的檢討都沒有涉及到林彪。毛澤東一時無奈，只能擴大黃永勝等檢討的範圍。3月23日，毛澤東把黃永勝、李作鵬、

邱會作三人書面檢討批示給周恩來，並通過江青轉告說，由周恩來，康生、江青先商量一下，給黃永勝等人創造一次機會，讓他們在一定範圍內作檢討，不要再失去機會了。下午，周恩來與康、江商定再召開一次中央批陳整風會議，進一步批陳，並聯繫自我教育。周向匯報毛澤東後，毛提出，此事應向林彪匯報。

3月29日晚，周恩來同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李德生、紀登奎前往北戴河林彪處匯報批陳整風幾次會議情況，毛澤東對批陳問題的多次批示和談話，以及擬召開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的安排。林彪聽匯報後表示：「完全擁護」毛澤東自廬山會議以來一系列指示和工作部署，對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三人的檢討「很高興」，並要求吳法憲、葉群「重寫一次書面檢討」，但是絲毫沒有批評黃、吳、李、邱。

事後，毛澤東詢問林彪有無批評，吳法憲說挨批了。周恩來幫忙圓謊：「批了，批了。」吳法憲說，這下子毛澤東高興了。

1971年4月15日批陳整風匯報會在京舉行。但是在周恩來前去北戴河向林彪匯報並表示希望林彪出席時，用李德生的話說是「毛主席要林彪出來參加一下即將召開的批陳整風匯報會，講幾句話，給他個台階下」，林彪以身體不好為由拒絕出席。但是在18日，王輝球和王秉璋揭發了吳法憲在廬山上同他們串聯的事情，當晚黃永勝就告訴了葉群。林彪決定19日返京親自坐鎮，準備在必要時候直接出面同江青等抗衡。鑒於林彪回京，毛澤東決定會議延長，由周恩來出面，送去批陳整風會議的有關材料，並通過葉群轉話，希望林彪能夠出席會議，但是林彪一口回絕。周恩來私下裡對吳法憲說：「林副主席要是以講話的形式檢討幾句就好了。」周恩來以為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樣，可以為毛的歡心為毛做檢討。

既然林彪就是不肯與會講話，「批林整風」匯報會議也就只能草草收場。毛澤東以退為進，一方面穩住黃吳李邱，另一方面要做足功課，出手必勝。

周恩來在4月29日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全體大會作總結講話指出：廬山會議及其前後，軍委辦事組五位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在組織上犯了宗派主義的錯誤；但錯誤的性質還是人民內部問題，同反共分子陳伯達問題的性質根本不同。……經過會上同志們的善意批評和幫助，並有個別揭發。五位同志對所犯錯誤已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表示願意通過實踐和學習，改造自己。講話強調：對犯錯誤的同志，只要真正願意改正，我們就要採取歡迎幫助的態度。

周恩來複雜的一面在這前後也表現的非常明顯。在廬山會議之時，由於毛澤東還沒有示意出是要打倒林彪。9月7日，在林彪下山之前，周恩來看望了林彪，但是沒有說話。林彪特意叮囑黃、吳、李、邱有事多向周恩來請示報告。

當毛澤東批示吳法憲等人的檢討「可以了」之後，在中央召開「批林整風」匯報會時，在東北小組的王輝球和王秉璋揭發了吳法憲在廬山上同他們串聯的事情。陳錫聯將此事匯報給周恩來之後，周恩來打電話安慰吳法憲：「揭發出這樣的事情，你不要緊張，還是和原來一樣，沒有什麼變化。我要王輝球、王秉璋他們去向你說明情況。」

對於周恩來希望林彪檢討的態度，林彪並沒有直接表態。但是林彪私下裡對黃吳李邱則說：「根據我的看法，你們沒錯。你們檢討我不怪你們，也不會生氣。但我不會檢討。」

2. 周恩來要和林彪劃清界限了

毛澤東是對林彪不滿意，還是因為傳統的看法因為林彪代表的軍人勢力的崛起讓毛澤東擔憂？

據說是毛澤東對《紅旗》雜誌第12期社論《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篇社論作了嚴厲申斥的批示，因為「發現」了「揪軍內一小撮」的提法。但是就在這同一期《紅旗》雜誌上，除了這篇社論之外，還有另一篇社論《向人民的主要敵人猛烈開火》，其中同樣有

「黨內、軍內一小撮」的提法，為什麼毛澤東沒有對它作這樣的批示？在「720」事件之後發表的若干社論（《人民日報》、《解放軍報》）有時還一天同時發兩篇社論中，幾乎每篇都有這個提法，為什麼毛澤東一直沒有「發現」並作出這樣的批示？

兩篇都有「軍內一小撮」的提法，但《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中，有一個提法是《向人民的主要敵人猛烈開火》中沒有的一一那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手締造的，是林彪同志直接指揮的偉大軍隊」。此文突出的用了相當多的篇幅頌揚林彪，大段大段地頌揚林彪對建立人民軍隊作出的貢獻，稱頌他「系統地闡明了和創造性地發揮了毛主席的軍事思想」，「林彪同志提出的保持我軍無產階級性質的一系列重大措施，使我軍的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解放軍的思想政治工作和軍事工作，經林彪同志提出四個第一、三八作風之後，比較過去有了一個很大的發展，更具體化又更理論化了。」由此何蜀先生尖銳的提出對林彪的這些頌揚，能不引起毛澤東的不安和反感嗎？實際上，楊成武的回憶證實了這一點：「在上海虹橋賓館，有一天，毛澤東非常煩躁地說：『什麼永遠健康，難道還有不死的人嗎？』」毛澤東還要楊成武回去報告周恩來，不要宣傳個人，否則將來要吃大虧，要犯錯誤。這裡的個人指的就是林彪，這是對輿論宣傳林彪的直接否定。對於周恩來，也知道了毛林之間關係的玄機。幾年後，毛澤東南巡時明確說：「有人說軍隊是我締造的，但不能指揮。」

也有不少的文章提出，是因為軍隊勢力的極度膨脹導致毛澤東對林彪的不滿。事實上軍隊勢力的極度膨脹同林彪權勢的增加並不存在必然關係。「九一三事件」之後，到「十大」的時候，各省省委書記中，軍人占47%，第一書記中仍然占66%。所以毛澤東真正忌諱的是林彪本人的「權高震主。」

九屆二中全會，林彪一個講話，引得二百多個中央委員的共鳴，竟然「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表面上矛頭對著張春橋，骨子裡否定文革。毛澤東坐不住了。毛澤東看出廬山會議這場風波同林彪有密切關係。

8月24日，周恩來就同康生找吳法憲、李作鵬和邱會作談話，追查他們的所作所為。緊接著8月28日就要求吳法憲做檢討。

當毛澤東將鬥爭的矛頭指向林彪時，出利害關係的選擇，無論原來周恩來和林彪的關係如何，周都不會冒主席之大不韙，為林彪說一句好話。相反，周一如既往的如同對待彭、羅、陸、楊，對待劉少奇一樣對待林彪。落井下石是必然的。

雖然周恩來勸說吳法憲爭取主動盡快寫出檢討是為林彪講話承擔責任，甚至隨後建議毛澤東刪除為批陳伯達而寫的《我的一點意見》中涉及到吳法憲的內容。周恩來甚至在毛澤東發怒之後，仍然在26日一大早，周恩來就全會印發林彪開幕式講話一事致信康生：為使林副主席講話不發生任何副作用，請你起來之後認真讀兩遍，有需要改動處，請用鉛筆改，於午前退我親收。此事純屬愛護副帥，忠於黨，忠於領袖，以此共勉，暫勿告人為壑。午前，康生將林彪講話稿退回，並告，我看了兩遍，只在第三頁上改了一個標點。如果林副主席同意發表，我看可以印發給到會同志們學習。

但是周恩來開始同林彪一派拉開距離，並有意洗刷他本人與這場風波之間的干係。為此，周在追查中示意吳法憲應該在政治局決定全會討論林彪講話的問題上替他講幾句話。吳法憲果真照做了，把責任擔了起來。不僅如此，周還一再要吳法憲出來證明他當初曾經批評過黃永勝不願留守北京，非要上山這件事，以便讓毛知道他並沒有上林彪的這條船，事先並不知情，而且是有過鬥爭的。

此外，周恩來還設法補救他過去對張春橋一直比較冷淡的態度，刻意在一些場合當眾表揚張、姚兩人，說他們這回姿態高，照顧大局，不計較別人的誤解，事後還主動在發言中講了維護林副統帥的好話。8月29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周恩來曾經連續三次給主持會議的林彪寫條子，希望他在講話中表揚張春橋、姚文元幾句，以利團結。但林彪根本不予理睬。

對於毛澤東想通過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的檢討，進而把林彪揪出來的戰術，周恩來也是極力配合，不斷催促他們做檢討，其中不乏以自己也做過檢討來勸說。後來毛澤東果然在葉群的檢討上做出嚴厲的批評。當初搞劉少奇，不也是先從王光美入手嗎？

更為明顯的是周恩來對待林彪本人的態度的轉變。林彪被明確樹立為接班人之後，如果毛、林、周等國家領導人依次而出會見內賓和外賓時，周恩來總是將隨行的人有意壓後幾步，以突出毛、林二人。這在文革歷史紀錄片中是可以看到這個細節的。周恩來為了突出林彪，當其和林彪一起對公眾講話時，也刻注意突出林彪。例如在1966年的「818」講話中，林彪先講，周恩來隨後。周恩來特意在呼喊「毛主席萬歲」時比林彪少喊一個。林彪喊了三個而周恩來只喊兩個。

1970年12月份，毛澤東以下發中央文件的形式，將毛同斯諾的談話發到「黨的基層支部，口頭傳達至全體黨員」。毛澤東說：過去這幾年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現在沒有必要，要降溫了。

為了配合毛澤東的攻勢，在1971年1月26日，周恩來找出中共中央1966年8月和1967年12月所發兩份文件，其中周恩來在1966年8月4日中央批准同意陶鑄的報告上寫到：「此件不因人廢言，因為是主席的指示，中央批准的，必須嚴格執行。」周恩來又在原報告所寫「主席指示：今後不用這類語言（即『最高最活』、『頂峰』、『最高指示』等）。大家認為這是偉大領袖的謙遜態度。我們應當照主席的指示辦」處批註：「照毛主席思想，主要不是謙遜，而是不科學，因為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要發展的，無止境的，永遠不能說『頂峰』，說『最高最活』。」周恩來還在在逐段批注時特意註明：「林副主席在宣傳和捍衛毛澤東思想的當時，為反對劉少奇的不提而對抗毛澤東思想，用此提法，有鼓舞全黨全軍全國人心，打擊劉少奇反動氣焰的必要性。」

洞察出此間奧妙的周恩來，在1971年2月18日，將外交部編印的《外事活動簡報》「古巴駐華臨時代辦加西亞訪問外地的幾點反映」送毛澤東閱。簡報第四條反映加西亞在井岡山參觀時對講解員不提南昌起義和朱德率部上井岡山這兩段史實提出意見，認為這樣講外國人不容易理解。毛澤東批示：「第（四）條說得對，應對南昌起義和兩軍會合作正確解說。」然而此事的始作俑者就是周恩來，一年多以前的「九大」上，周恩來在大會重點發言中公開發言稱「林彪同志是南昌起義失敗後率領一部分起義部隊走上井岡山，接受毛主席領導的一位光榮代表」。當時周恩來這個不「對南昌起義和兩軍會合作正確解說」的發言，嚇得林彪趕緊打斷周恩來的話，說：我林彪沒什麼，一切都是毛主席，我如果跟著賀龍、朱德早就完了，沒有今天。還當場哭了起來。

其中引人矚目的是，周恩來在1971年5月10日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周恩來講述了黨內兩條路綫鬥爭歷史。周恩來在講述「井岡山會師」時說：「當時林彪是個連長，陳毅同志是個團的黨支部書記。」在這裏，周恩來絲毫不再提毛林會師一事，而且把當時仍然為右派代表的陳毅作為林彪的上級講出，這與當初周恩來極力對林彪的吹捧形成鮮明的對比。更為驚訝的是，周恩來再談話中表揚了鄧小平。（筆者註：將在第11章詳述。）

在1971年8月，周恩來對一幅準備對外發表的畫有毛澤東、林彪在一起的題為《遵義會議》的油畫批示道：「這是違反歷史事實，應予否定。」這實際上是在否定誰呢？

到1974年楊成武復出的時候，周恩來說：「我要向你檢討，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林彪頭上，一切幸福來自毛主席……」。羅瑞卿解除「監護」後，周恩來也曾讓鄧穎超捎話給羅瑞卿，希望他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林彪身上，把一切功勞歸於毛主席。

三、「九·一三事件」

1. 事件突然爆發

筆者認為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竟然對毛的禁嚮張春橋下手，而響應者盡然群勢洶洶，形成潮流，「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使毛澤東深感憂慮，於是拿掉林彪成為必然之舉。廬山會議後，毛澤東步步緊逼下，儘管周恩來一再勸說，林彪還是沒有行動起來，公開認錯，主動讓位。

7月10日，毛澤東向陪同周恩來前來匯報的熊向暉瞭解黃永勝等人在總參謀部傳達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的情況後，說：「他們的檢討是假的。廬山的事情還沒有完，還根本沒有解決。這個當中有『鬼』。他們還有後台。」周恩來對熊向暉說：今晚主席講的話，絕對不能外傳。

陳長江回憶主席對接班人林彪越來越不滿。到1971年8月，對林彪的不信任達到頂點。謝靜宜的丈夫蘇某在空軍機要局，通過謝靜宜傳來消息，林立果在空軍成立了秘密組織，在做武裝奪權的準備。主席決定南巡，行前主席說，我就不相信，這些司令員們跟著林彪走。難道解放軍都會造反？還是那句老話，如果解放軍不聽指揮，我再上井岡山打游擊去。

8月5日，葉群身體不適回到北京檢查。8月6日晚，邱會作帶夫人胡敏來到毛家灣，談到深夜。周恩來特意打電話問候，聽說葉群正在接待客人，馬上追問是那些客人。

8月9日周恩來陪緬甸政府總理奈溫前往廣州參觀訪問，臨行前他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安排中央日常工作，並致信毛澤東，主席如有急事，可經吳旭君（毛澤東的護士長）同志以保密電話告訴我，或告（王）海容（毛澤東的侄女）轉告。

1972年5月，周恩來在一次會上說，毛澤東為什麼要南巡？去年批陳整風匯報會，中央文件發給軍事系統60多份，可是軍委辦事組黃永勝他們扣住了，只發了7份，傳達範圍非常狹窄。去年7月被毛主席發現了，說要繼續跟各地打招呼，他們的檢討是假的，廬山的事情還沒有完，還根本沒有解決，這個當中有「鬼」，他們還有後台。毛澤東南巡時說，批陳整風匯報會，發了五個大將的檢討，都認為問題解決了。其實廬山這件事，還沒有解決。他們要摀住，連總參二部部長一級的幹部都不讓知道，這怎麼行呢？

這說明周恩來清楚毛澤東的意圖：毛澤東在南巡中的一系列行動，其矛頭都是對準林彪的，顯示出毛已下決心將林彪的問題端出來，徹底解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實際上，毛在南巡前已向周恩來打了招呼，其行蹤也只有周一人知曉，周對此心知肚明，密切予以配合。

1971年8月14日，毛澤東離開北京去南方各地巡視，同沿途黨、政、軍負責人談話，講述黨內路線鬥爭歷史，批評並揭露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以及背後支持的林彪在廬山會議上搞突然襲擊、分裂黨、急於奪權的陰謀活動。另一方面，周恩來年8月16日和張春橋、黃永勝、紀登奎乘火車到北戴河林彪處匯報工作，並告訴林彪黨中央決定在國慶節前後召開九屆三中全會，然後召開四屆人大，現各項準備工作正逐步就緒。

一方面周恩來於9月10日請示國慶節前召開九屆三中全會，補選幾名中央委員等事宜。毛澤東批，都同意，還要補選常委。另一方面，「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黃、吳、李、邱均有重任，黃為第一副總理，張春橋、李先念、紀登奎等也是副總理，李、邱也是副總理；吳是副委員長，只是大家不理解，主席為什麼要康生當委員長，而不讓朱老總當委員長，總理還叮囑這幾個將軍在會上不要再議，不要放炮，主意不是他們幾個的。

筆者認為，此舉措完全是想穩住黃永勝等人，不要把黃永勝等人真的逼向林彪，讓林彪成為「孤家寡人」。雖然誠如後來黃永勝說我雖然忠于林彪，但是更忠于毛主席。但是毛自己確要小心行事，猶如文革初要把北京城變為「水晶球」一樣才敢回到北京。但是一旦將林彪拿下，一向號稱「死了張屠戶，不吃混毛豬」的毛，是不會留用黃永勝等人的。當初楊成武倒臺之後，葉劍英等人遭到毛的拋棄，也是此種原因，無非葉劍英是和楊成武都是踩著羅瑞卿的肩膀上來的罷了，更何況在「文革」中同林彪一起對抗過江青的黃永勝等人呢？況且黨內的鬥爭模式早已固定，等著你騰出位置的人和你曾經整過的人，正眼巴巴看著你倒黴，早

已經準備好大石頭了！

周恩來對於南巡中的毛澤東保持著「熱線」聯絡。毛澤東向周交代林可能會被他逼得狗急跳牆。 9月3日，在南方陪同毛澤東巡視的汪東興，將經毛澤東閱改過的他與華國鋒追記毛澤東沿途談話內容稿專送周恩來處。 9月11日周恩來奉毛澤東之命前往長沙聽毛澤東返京的華國鋒談話。 9月12日，毛澤東火速回京。毛澤東的專列路過濟南的時候，濟南軍區政委袁昇平給周恩來打了個電話，匯報了專列離開濟南的時間。

當夜「九·一三事件」爆發。林彪的飛機還沒有起飛，周恩來對李德生和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說林彪「要逃」！ 葉群打電話給周恩來，周恩來表示夜行不安全，而且說要去看望林彪！葉群急忙推辭。 當周恩來得知有飛機在北戴河機場，連續採取了以下關鍵措施：

(1) 周恩來叮囑吳法憲如果葉群來電話要去調飛機，則不能答應，說要先請示我才可。吳法憲照做了。葉群打電話給吳法憲，吳法憲說調動飛機的事情，我不能做決定，要請示總理。這可是原先沒有的事！葉群接著打電話找黃永勝，但是黃永勝被周恩來「留在」人民大會堂了！葉群找不到黃永勝，這才慌了！葉群急忙衝向林彪的臥室：首長，黃吳李邱被（周）抓了，現在就要派人來抓你了！

(2) 周恩來同葉群講完電話後，在凌晨零時左右來到中南海游泳池，告訴了毛澤東，並且隨後毛澤東就搬到人民大會堂。

(3) 當林彪的座車大紅旗從其駐地衝向北戴河機場時，8314部隊中隊隊長肖奇明開槍射擊，擊中大紅旗後座玻璃上。事後周恩來還表揚了肖奇明，槍開的好！

無論葉群一方還是毛、周一方，都相互把對方當成了敵人！

當天晚上，周恩來還告訴了李作鵬一條奇怪的命令——一道命令把黃、吳、李都繞進去了！當葉群和周恩來通電話時，葉群對周說林彪要「動一動」，是「天上動」。周恩來先以夜航不安全為由加以勸阻後，隨即令李作鵬：山海關機場的專機不要動，要動須有周恩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四人一起下令才能放飛，但是後來則稱李作鵬將此命令篡改為「四個首長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才放飛」。雖然後來李作鵬回憶說：9月12日晚上在海軍大院，周恩來給他打電話，讓他通知山海關海軍機場。這個關於三叉戟的電話是李作鵬、李作鵬夫人董其采和朱秘書三人記錄的，核對後，還特意給周恩來復誦了一遍。復誦時用的是李作鵬夫人董其采的記錄稿，周恩來肯定地回答對，傳達也是按這個記錄稿。以後審理「兩案」時說李作鵬說一人讓起飛就起飛，而李作鵬堅持說他說的是四人讓起飛才起飛，他沒有篡改。其實無論是哪一個版本，都不重要。

如果要攔堵飛機，周恩來可以直接通知機場。周恩來為什麼要「捨近求遠」？而且這個命令，周恩來並沒有告訴黃永勝和吳法憲，也就是說從另一個方面來講，周恩來的命令就是讓飛機無任何起飛的可能性！ 若是周恩來本意如此，那麼可以直接通知機場把跑道封死就可以了。如果是因為黃吳李都是軍委辦事組成員，但是李德生等人也是軍委辦事組成員。周恩來的真實目的就是想把黃永勝、吳法憲和李作鵬都拴在一根繩上。更為更為重要的是，黃永勝等人作為林彪的下級，此命令有何用？！

那麼邱會作呢？

知情人透露，邱會作曾講，「與其說林保過我，不如說周保了我」。早在1935年內周恩來從鄧發手裡救下了邱會作，後來長征時，周患重病，肝膿腫，高燒昏迷不醒，是邱和另外三人一直用擔架把周抬出草地的。1967年3月30日周恩來對著一群革命小將，作了一大段關於邱會作的講話。首先周回顧歷史表達了邱是我周恩來看著長大的，而且是行影不離的。並且說是在1959年，毛親自點名叫邱擔任總後勤部部長的。邱作的很出色，有多麼出色呢，周恩來在點名道姓地點評了我軍歷任總後部長之後說：「邱部長是我軍歷來最優秀的後勤部長，是最好的後勤部長。這不僅是我的看法，也是黨中央、毛主席的看法！」邱在周、林之間起到什麼作用呢。在第二次廬山會議前，林與周曾過默契，相互支持彼此很多。

邱會作自己這樣解釋過，是某種意義上的林、周之間的聯絡員。周對於邱是充滿了期望。70年代初，有次邱隨同周接見外賓時，周恩來被問起高齡、接班人選時，周以手指邱說：已經找好了，就是這個人。隨即表揚了邱所負責的生產、整頓、軍工、後勤等部門，對未受到大的破壞、內部尚有序表示滿意。當時葉帥、熊向暉等都在在場。邱極感受寵若驚，乃至半晌無語後來在回憶錄裡對這段好好寫了一筆。據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回憶：老毛在9月23日晚上向周恩來佈置對黃、吳、李、邱採取措施後，因已通知邱會作第二天上午到機場送負責同志出國到越南訪問，沒有來得及同邱會作談談。工作人員解釋說「總理確實想單獨找邱會作談談，做做工作，因時間來不及，沒談成。」其實這就是一種春秋說法。在「九·一三」之後的去越南代表團的名單上還有邱，周一一直想把邱支開，讓邱去越南避下風頭，這才是周的想法。

2. 「九·一三事件」對周恩來的衝擊

「九·一三事件」之後，周恩來曾經痛哭。對此，有很多不同的解析。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有如下解釋，即林彪作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黨章規定的接班人，卻叛國投敵自我爆炸，周恩來深感無法向世人交代其中之原因。高文謙先生的解釋為毛周因治國理念的不同，周長期在毛的陰影下生活，有志難伸。丁凱文先生則認為「毛澤東的下一個鬥爭矛頭必是他周恩來無疑。所以當紀登奎一提及林彪自我爆炸應該高興時，周不僅不能高興，反而悲從心來。周只能告訴他們『你們不明白，事情不那麼簡單，還沒有完……』。顯然，周恩來心裡明白他不僅又要作一個新的專案組的負責人，製造新一輪的迫害，很可能他自己也逃不過這一被整的厄運，毛澤東怎麼會容忍他周恩來坐穩接班人的位子呢？」

邱會作曾經說：林彪死了，最困難的就是總理了，過去林彪在，總理可以因此擋住來自上海幫的明槍暗劍，現在，總理被推到一線了。果然不久，就開始批周公了。邱會作明白此道理，周也會明白。

周恩來在得知林彪摔死在溫都爾汗後，一個人面對牆壁大哭，說過最有份量的兩句話：「還沒有完」和「林彪是個好人！」周恩來當然知道林彪是好人。知情人說，周恩來曾經坦言：在林彪手底下，比在彭手底下好過的多。現在應該更明確的說，周恩來自己當然更清楚，如果林當家，那麼周的日子會比毛當家的時候強過萬倍！

林彪事件對毛澤東的刺激是巨大的，對周恩來的刺激同樣是巨大的。向來謹慎小心的周恩來，在那段時間變得多疑；不僅是謹慎小心，甚至可以說是謹小慎微了。周恩來的專機機長張瑞靄對此有過生動的回憶「林彪事件」發生不到一個月，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一世訪問我國。

10月10日，總理陪他去南方參觀訪問。以往專機起飛，由機長向總理報告航線、時間、天氣、機況後，總理同機組同志們握握手，問候一聲就放心地上飛機了。這次不同。聽完報告，他不放心地問：「飛機檢查了嗎？」答：「都檢查過了！」周又問：「正常嗎？」答：「正常。」周再問：「沒發現問題？」答：「沒問題，都正常。」周繼續問：「試飛過嗎？」答：「試飛過。」周反覆問「也檢查也試飛過了？」答：「我親自檢查試飛過了。」機長張瑞靄從1954年起就為總理飛專機，從未見過總理這樣不放心。我自己跟隨總理乘飛機，何止百次，空中遇險就有過七八次，更不曾見過他這樣不放心。又問一句：「你們都是黨員嗎？」得到肯定的回答才登上飛機。

專機飛越長江時，張瑞靄報告說：「總理，要過長江了。」

總理一直在朝航線下方張望。以往遇險，都是我不放心，我緊張。我總想找機長去問個清楚，而總理都是一百二十個信任地穩坐不動。記得兩年前總理跟葉帥去河內弔唁胡志明，

專機升空不久就進入雷雨區，電光雷火映得天空一片紅，飛機像燃燒的火團一般。我不安地想去前邊提醒張瑞靄幾句，總理馬上揮手制止：「別去打攪人家，瑞靄他們會有辦法的。」

這一次卻顛倒了。飛得四平八穩，我一百二十個大放心，總理卻狐疑地朝下方望個不止。

「是過長江嗎？」總理朝下望，朝張瑞靄凝視：「我怎麼沒看見長江呢？」

「那裡，看到了嗎？在那兒！」張瑞靄幫助總理找到下方寬闊的長江入海那一段，幾個人都跟著說看到了。

「瑞靄呀，這是長江嗎？」總理臉上的狐疑之色使我也疑惑了，該不是海灣或外國的什麼河吧？總理的聲音充滿了不安：「我看不像呀！」

「沒錯，總理，是長江。」張瑞靄忙拿出地圖遞給總理：「你對照一下，現在看到的就是這一段……」

總理拿著地圖，在張瑞靄的指點下，對照半天才多少放下心地點點頭：「哦，是長江……」

以鎮定出名的周恩來的此番作為確實出乎意料。周恩來首先要確認飛機無任何機械故障，再次要求確證的機組人員政治上可靠，最後自己要親自證實飛機是在國內飛行。此等諸般行為同「九·一三事件」究竟有因果關係，現在為止，尚未發現有力材料證明之。

3. 新一輪的迫害

9月21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表示同意汪東興的報告，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下設一專案工作小組，掌管和整理有關林彪、陳伯達全部案件材料，該專案工作小組以紀登奎為主、汪東興為副領導進行工作。毛澤東批示「同意。」隨後，由周恩來、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紀登奎、李德生、汪東興、吳德、吳忠十人組成中央林陳反黨集團專案組，下設由紀登奎、汪東興領導的辦公機構。又經報毛澤東同意，10月3日，中共中央分別發出撤消軍委辦事組、成立由葉劍英主持的軍委辦公會議的通知和成立由周恩來負責的審查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專案組的通知。

猶如中共一輪輪的清洗，「林彪事件」之後的清洗是驚人的。丁凱文先生說：「『九·一三事件』雖以林彪專機墜毀於外蒙而結束，但事件本身的後續影響卻剛剛開始。中共內部開始了新一輪的清查清洗，抓了一大批所謂林彪『死黨』、『餘黨』。中共軍內被立案審查的軍以上幹部就達千人之多，隨即而來的就是各種形式的『株連』、『迫害』，受牽連者幾達三十萬眾之多，多少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林彪一案過去三十多年了，可是其影響依然未消，許多人冤獄未平、死不瞑目。所以，林彪一案絕不僅僅是林彪一家或『黃吳李邱』幾員大將的問題，其牽連之廣，受迫害人之多，比劉少奇一案有過之而無不及。」直到1974年，又有很多人被劃為「林彪反革命集團漏網殘餘分子」被整肅。

以總參為例，自一九七一年十月到一九七四年底，總參黨委就開過四次擴大會和專題清查會，集中揭發清查總參工作人員同林彪的問題。在這期間，總參黨委向中央上報了九十七期揭發材料。在此期間，除中央審查的二十二人外，總參還清查了有牽連的五十九個人和二百二十多個問題。

時任副總參謀長的閻仲川就因為「林彪事件」受牽連。而閻的主要問題則是發生在1969年的「一號號令」。1969年10月18日，在蘇州的林彪通過秘書張雲生向在北京值班的軍委前指下達了幾條指示。黃永勝接到指示後要求閻仲川把指示下達到軍中。閻仲川則自作主張的把其編為「前指開設之後的第一份首長指示，從一號編起，叫一號號令。」這就是「一號號令」的緣起。隨後軍委前指陸續下達了一號、二號、三號、四號等命令。但是這些命令下達並沒有預先通知周恩來。後來地方系統的電報、電話報到中共中央、國務院。多數報告都把林彪指示稱為「林副主席一號號令」或「林副主席一號令」。在京主持中央日

常工作的周恩來看後大為驚訝。於是19日晚，周把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李德生等人找去，詢問林彪指示的來歷、內容，特別指出為什麼要把林彪指示稱為「一號號令」？對此，閻仲川的認識則是：回答周恩來的提問並不困難，即使說清楚了，問題並未解決。問題的癥結在於，林彪的指示雖然只發軍隊，卻事關重大，而且執行起來不能不涉及地方。周恩來作為毛澤東指定留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最高負責人，這件事情軍委辦事組理應向他報告。但黃永勝佈置任務時對此卻未作交代。耐人尋味的是，周恩來在批評辦事組成員時，卻又偏偏未點明此事，越是這樣越令人感到難過和不安。

周恩來可以說有理由質問黃永勝並表示對此不滿，因為周恩來畢竟是代表中央坐鎮北京的第一號人物。但是此後發生的事情則難免顯得周恩來有點「小家子氣」了。

9月13日當天，周恩來接見閻仲川、彭紹輝、王新亭、張才千幾個副總長。周恩來表情嚴肅，坐在沙發上。見到閻仲川等人，他免除了平時不可少的寒暄，對他們聳肩，兩手向外一攤，突然說了一句：「哼！副統帥，跑了！」大家全都愣了。周恩來突然用燦人的眼光望著閻仲川，直呼其名：「閻仲川，林彪逃跑以前你聽到點什麼風聲沒有？」問到自己頭上閻仲川反而冷靜下來。他簡單地搖了搖頭：「沒有。」周恩來雖然沒有再問下去，但是對閻仲川來說這已經是惡運的開始。

9月24日，隨李先念訪越的閻仲川回國。代表團成員下飛機後沒有各自回家，卻被引導到貴賓室。大家剛剛坐下，周恩來便態度嚴肅地對閻仲川說：「閻仲川同志，中央已經決定黃永勝離職反省。你是黃永勝的得力助手，你要好好揭發他的問題，首先是政治方面的，還有生活方面的！」然後他向葉劍英等人點了點頭，獨自先行離去。閻仲川思想牴觸：要我當黃永勝的助手，是組織的安排，當助手而「得力」，有什麼錯？葉劍英先講話了：「你還年輕，又有水平，只要好好揭發交代，還有前途嘛！」李先念只說了一句：「好好揭發交代羅！」主講是紀登奎和李德生。他倆介紹了半個月的清查工作，主要是林彪兒子林立果「小艦隊」的一些活動，什麼「571工程」紀要，暗害毛澤東的陰謀計劃，等等，希望閻仲川認清形勢，與林彪、黃永勝等人劃清界限，積極揭發他們的罪惡活動。

從此，閻仲川開始了隔離審查的生活。專案組提出許多認為可疑的問題，要他逐個回答。他全憑記憶筆寫口答，居然對每年的來龍去脈都說得清清楚楚，專案組已經感到沒啥可問的了。閻仲川的絕大多數問題陸續都排除了，但在「一號號令」問題上卻長期過不了關。閻仲川認為，林彪發佈緊急戰備指示，是否別有用心，他不得而知，那是林彪的事；他負責向全軍傳達林彪指示，完全是奉命行事，在組織上符合原則、程序，在政治上他不可能懷疑，因為是軍委辦事組五名成員向他下達任務。如果說自己在承辦此事過程中有錯誤，那麼，第一是編號可以不從頭另編，以免引起誤會，但這只是技術問題；第二是在傳達指示時，沒有提醒下面注意保密，但這屬於考慮不周，是在時間緊迫下的疏忽；第三是沒有向周恩來報告，這確是重大失誤，在這個問題上，首先是以黃永勝為首的軍委辦事成員應負責任，因為按工作程序，理應由他們向周恩來報告和指示軍委前指報告，他們卻馬虎了，當然，倘若自己想得周到一些，能主動提出建議，也可能就不會有以後的問題了。閻仲川的上述認識被認為沒有抓住要害、實質。

問題的癥結出在哪個地方呢？

直到1971年底，負責對閻審查工作的副總長張才千、陳繼德同閻仲川談話時，鄭重嚴肅地告訴他：「總理已經講了，『一號號令』是林彪進行反革命政變的預演啊！你要充份認識問題的嚴重性，作深刻的反省交代。」閻仲川問定性的根據何在？「總理親自問過主席：知不知道林彪發過一個『一號號令』？主席說，什麼『一號號令』？我沒聽說過。」

就因為黃永勝沒有及時將林的戰備指示傳報給堅守北京的周恩來，周恩來在「九·一三事件」之後，把此事上綱上線到如此地步，已經不單單是「耿耿於懷」的問題了。周恩來以此表示和林劃清界線！然而事實卻是，毛澤東知道「一號號令」正是周恩來告訴毛的！

林彪指示是發軍內的，又是電話稿，並未抄報周恩來。但是，有的軍區收到指示後，因為軍區領導人兼任所在省革委會主任，於是向省革委會領導成員作了傳達，而省革委會領導中有群眾組織代表，這些人「造反派」的習氣未改，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聲音」講究不打折扣，聞風而動。他們不考慮什麼後果不後果，連夜把指示的內容寫成大字報捅上大街，果然馬上引起轟動效應，部份群眾大為惶恐。西南地區一個邊境省尤其鬧得邪乎。這種情況是通過地方系統的電報、電話報到中共中央、國務院。多數報告都把林彪指示稱為「林副主席一號號令」或「林副主席一號令」。而周恩來正是把這些材料傳閱給遠在武漢的毛澤東的！

4. 「九?一三事件」之後的新的政治格局

1971年10月4日毛澤東接見新成立的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員時指出：林彪、陳伯達搞陰謀活動，蓄謀已久，目的就是要奪權；文化大革命中整幾位老師，也是林、陳他們搞的。又說：要好好整頓我們的軍隊，頭腦不要太簡單了。「凡討論重大問題，要請總理參加；下達指示，要用軍委名義。」

周恩來此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周恩來在黨政軍三方面的領導正式名正言順。「九?一三事件」之後，毛澤東重病之中只能向周恩來「托付」。

葉劍英在毛澤東在1971年5月、南巡時就已經向其手底下高級將領吹風，重提葉劍英的歷史功績。「九?一三事件」當日，周恩來就揣摩毛澤東的聖意指定葉劍英處理林彪善後問題及戰備事項。逮捕黃吳李邱的當天，周恩來就提議中央軍委工作由葉劍英主持，並籌組軍委辦公會議。

周恩來對政治的把握還在於對華國鋒的任命上。對於華國鋒備受毛澤東信任的事實，周恩來與9月30日提議華國鋒為國務院業務組副組長。

《毛澤東傳》的作者們認為：「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轉折。它在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失敗。毛澤東不得不面對這一現實，一方面把文革中的罪行都一股腦兒放到林彪頭上，另一方面毛澤東不得不採取更多的措施來挽回人心。在一系列的糾正文革錯誤的措施中，周恩來無疑再次成為具體的實施者和組織者，這為周恩來在文革結束後的名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是在這一過程中，周恩來無疑也犯了功高震主的「錯誤」，這也是造成周恩來在1973—74年被批判的根本原因。在1973年4月底，有人把外國一些雜誌帶給毛，並說外國媒體突出周恩來，很少提及到毛澤東，並提示毛，153號《新情況》同毛的思想不一致。這就是周恩來成了被批判的起點。

第一部分 第十章

起伏的兩年：從最高點跌落到受批判

「九大」之後，特別是「九?一三」之後，毛澤東意識到「文化大革命」的某些具體錯誤，同時也意識到黨內外日益增長的利用這些錯誤來懷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傾向。因此，毛澤東在某些具體問題上著手糾正那些已經造成嚴重後果的錯誤，包括調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是由於毛澤東不僅不會放棄「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而且還一再發起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二者都是為了捍衛「文革」的理論和實踐。於是出現了在意識形態上維護文革，在具體實踐上調整政策的局面。在這種局面下，出現了在思想上是「反右」還是「反極左」的爭

論，至於繼續解放老幹部、調整經濟政策等方面則無大的改變。

由於毛澤東並沒有給出具體的界線，在調整政策的過程中，處於「二把手」位置上的周恩來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來糾正「文革」造成的錯誤。一旦越過了毛澤東的底線，必然遭到毛澤東的斷然否定。對此，大陸黨史界無疑是誇大了周恩來在1972年的整頓中的作用。尤其是明顯地忽視了這種整頓其實大多始於「九大」。周恩來用批「林」的方式來批「極左」、批「無政府主義」也是沿用毛澤東最初的語言。

在具體執行政策的過程中，尤其是在執行調整後的外交政策方面，周恩來取得了得巨大的成就。這時候，毛澤東對其不滿程度亦隨之增加。特別是周恩來所處的地位是二把手，按照慣例，在毛出現意外的時候，隨時可能成為當家人，而周又不是毛澤東所中意的接班人。因此，毛澤東首先是在1972年的「批林整風」匯報會議上讓周恩來做了極為過份的檢討。繼而在1973年的7月份對周恩來提出嚴厲的批評，以至到1973年底對周恩來的不滿到達了最高點，對周進行了無情的打擊。所有這些都是為了告訴黨內高層：周是有歷史問題的、周並不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周不是接班人。

作為「文革」湧現出來的新一代的代表王洪文，「九·一三」以後迅速崛起，其中周恩來起了相當大的作用。1973年下半年的批周之所以沒有最終將周打倒，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初出茅廬的的王洪文極其需要周恩來的「傳幫帶」。伴隨著「十大」的結束，王洪文的位置穩固，鄧小平在這段時期的表現，也使毛覺得滿意。

1973年底，八大軍區司令對調，鄧小平並沒有參與其中的任何事務。八大軍區司令對調的目的主要是：為整肅軍隊、在各大軍區開展下一步的運動（即後來的批林批孔）做好準備，從而使毛更嚴密地控制軍隊，使文革激進派能夠滲入軍隊。

一、「九·一三事件」以後的調整和落實政策

「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轉折。它在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失敗。

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回憶道：「見過尼克松後，有一天他對我說：『我這一輩子就做了兩件事，一件是把蔣介石趕到那個小島上，另一件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我說：『你做了那麼多的事，怎麼只有兩件？』他說：『值得提的就是這兩件。』」

毛澤東說：「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看法不見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1：打倒一切，2：全面內戰。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對了，如劉、林集團。一部分打錯了，如許多老同志，這些人也有錯誤，批一下也可以。無戰爭經驗已經十多年了，全面內戰，搶了槍，大多數是發的，打一下，也是個鍛煉。但是把人往死裡打，不救護傷員，這不好。」

毛澤東不承認失敗，但是承認有不足，有錯誤。在不涉及「文化大革命」本身的前提下，可以糾正這三分錯誤。這在「九大」以前就開始了。

如黨的重建，1967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就作出《關於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單位恢復黨的組織生活的批示》。1968年1月1日，《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社論中公佈了毛澤東提出的整黨建黨的綱領：「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於階級敵人進行戰鬥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10月14日，《人民日報》又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一個無產階級的黨也要吐故納新，才能朝氣蓬勃。」這些話為文革中新生力量進入黨內提供了的依據。毛澤東在九屆一中全會則講「整黨建黨，事實是需要重建。」1970年4月18日，康生在中央和全軍整黨建黨工作座談會上對於如何整黨、建黨做了長篇指導性講話。在1970年

底到1971年初，部分省、市一級進行了整黨，產生了新的省、市委。到1971年8月，全國各省、市、自治區一級都進行了整黨，都產生了新的省委、市委和自治區黨委。

在其它領域包括經濟政策、外交政策、解放幹部以及更為敏感的科學、文化、教育等方面也開始逐步落實政策。「九·一三」之後，在經濟領域、科教文等部門的糾左並沒有因為「九·一三」而停頓。恰恰相反，毛澤東為了保持國內穩定，抵消因「九·一三」事件帶來的衝擊，化解黨內外日益增長的種種不滿，加快、加深了各個領域的整頓，也加速了老幹部的解放工作。不過顯而易見，此時的整頓更具有功利性。

「九·一三」事件不僅使普通百姓當中一些人覺醒，也對上層帶來巨大的政治衝擊，也給毛澤東本人帶來精神上的沉重打擊，使他的健康狀況迅速惡化。因此毛澤東不得不更加倚重周恩來。在1971年10月4日，毛澤東就明確指出：「（中央軍委辦公會議）凡討論重大問題，要請總理參加；下達指示，要用軍委名義。」在毛澤東的同意下，周恩來全面主持工作，包括落實幹部政策、經濟政策，開始中美兩國的高級會談等等。特別是毛澤東有過「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團，批判極左思潮」的指示，而在1972年6月份毛澤東又指出林彪是「五·一六」的總後台，批林彪自然是要批極左。這也是1972年整頓的主旋律和內在邏輯。

儘管1972年周恩來主導的整頓工作是「九大」以來在各個領域糾左的繼續，沒有毛澤東的同意，這種糾左是不可能進行的。特別是在毛澤東嚴密控制的外交部門，中央一系列文件（1972年26號、31號、38號、42號）提到反無政府主義。這些中央文件沒有毛澤東同意是不可能發出的，但是人們的注意力多數集中到台前的周恩來身上，使周成了糾左的代理人和實現中美、中日建交的外交形像大使。這成了日後毛澤東嚴厲批周的動機之一。

在同意糾左的大前提下，毛澤東並沒有給出具體明確的政策界線，因此周恩來並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越過底線，只能試探。當輿論上的宣傳同文革的指導思想上發生衝突、影響到文革本身時，毛澤東就果斷制止，以免動搖了「文化大革命」的根基。而具體執行「糾正極左」、「批判無政府主義」的周恩來就成了毛批判的對象。

1. 各個領域的調整

儘管毛澤東在1969年4月13日曾說過：「這次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眾有無政府主義，打倒一切、懷疑一切的思潮，一方面不少人乘機殺人放火放毒，包括武鬥在內，我看這些都無關大局。」但是毛澤東也認為：已經進行了三年的「文化大革命」該準備收尾了。因此，毛澤東在這年三月間在談到「九大」文件時已經說過：「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快要結束了，用常委。」1970年11月6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下發了《關於成立中央組織宣傳組的決定》。此標誌著中央文革小組的正式出局。此時的毛澤東他考慮在適當時候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第三個國民經濟發展五年計劃，把局勢逐步納入正軌，並且認為這樣做是完全可能的。

要把局勢納入正軌，必然要對67—68年期間在各個領域橫行的無政府主義和極左路線加以清理與整頓。1970年2月20日，周恩來在全國計劃會議上強調「在經濟戰線、生產技術領域，照舊框框不行，要打破常規，當然合理的規章制度還要保留，廢除了不行，那是無政府主義思想。」經過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於1970年5月29日發出《中共中央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指示》，指示要求1. 努力增加生產；2. 基本建設工程要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盡快形成生產能力；3. 大搞綜合利用；4. 提高勞動生產率；5. 大力降低消耗定額；6. 提高運輸效率；7. 提高產品質量；8. 改善經營管理；9. 大抓清倉查庫，注意修舊利廢，節約代用。指示說，上述各點主要是講工業戰線，同樣適用於農業、

財貿和其他各條戰線。 同年6月18日，周恩來指示李先念、余秋裡北方七省煤炭減產是在「一打三反」加「增產節約」運動後一種反常現象，應引起各地嚴重注意。防保守，排極左，仍然是當前主要任務。 同年12月經毛澤東批准，下發針對各行各業因受無政府主義思潮影響而廢除原有必要的安全制度而造成重大事故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安全生產的通知》。

1970年6月，經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轉發《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黨的核心小組關於開展保密大檢查情況報告》的批示稿說，各單位應結合當前打擊現行反革命破壞活動和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克服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的傾向，普遍開展一次群眾性的保密大檢查，發動群眾認真清理機密文件、密碼、電報、國防工業科研機密資料和工作記錄等等。

針對農業生產，周恩來在1970年10月4日接見參加農業、商業、外貿等專業會議代表時指出：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起來了，就要防止另一種傾向，就是不講平衡，不講計劃，甚至平調。繼而在1971年3月28日周恩來接見出席全國棉花、油料、糖料生產會議的代表是進一步提出：要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搞好農業更要靠地方的積極性，要堅持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強調：要掌握好政策，對中央已經規定的政策，不要隨便改動，如獎勵、自留量、換購等辦法，還要堅持不變。

1970年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後，根據周恩來多次講話的精神，國務院先後召開北方地區農業會議，全國棉花、油料、糖料生產會議和全國林業會議，決定適當放寬農村經濟政策，在保證集體經濟佔絕對優勢的情況下，允許農民個人經營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業，允許生產隊擁有因地制宜種植的靈活性。此外，國家還通過調高部分農產品的收購價、降低支農產品的出廠價和銷售價以及實行糧食徵購一定五年不變等政策，鼓勵農民發展生產、改善生活。

外交部批極左始於更早。1967年8月22日火燒英國代辦處後，毛澤東指示要揪出王力等人。在這點上，毛澤東的態度和周恩來的利益是非常一致的。8月31日周恩來就批評道「國內的極左思潮和極左行動，已經影響到我們的外交工作，損害了我們的國際信譽。」9月17日，周恩來指責外交部有關負責人，未經批准就同意中國駐巴基斯坦使館對巴基斯坦非官方報紙刊登台灣反共消息和勃列日涅夫反華言論事向巴政府提出抗議是極左行徑。「九大」以後，周恩來更是多次批評外事部門的極左行為和思潮。在「九·一三」前後的兩年，周恩來更是利用猛抓「五·一六」來達到控制外交部的目的，到1971年周就幾乎完全控制了外交部。

1970年9月18日周恩來約外交部黨的核心小組成員及有關各司負責人談話，指出：在外事部門，還要繼續批判極左思潮。同月24日周恩來同外交部黨的核心小組成員、副部長、司長談話，批評最近駐外使館中出現的「左」的傾向。指出：對駐外使館內部還熱衷搞極左的人，要調回國內學習。

1970年10月8日、10日，陪同毛澤東會見來華作內部訪問的金日成。會談中，毛澤東抨擊了文化大革命中「極左派」的一些做法。 12月，毛澤東在同斯諾談話時更是指出1967年7、8月份外交部失去控制，是因為有反革命。

1971年4月7日，毛澤東作出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決定。根據此，周恩來加大了在外交部糾左的努力。當晚，周恩來就對外政策等問題發表長篇講話：「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外交工作，由於當時忙於對內，對外事注意不夠，出了一些亂子。有一些壞人鑽了空子，利用極左思潮，搞了極左行動，如「火燒英國代辦處」、外交部「奪權」等。此後即集中糾正強加於人的極左口號和極左行動。從一九七一年開始，開展了新的外交攻勢，首先從乒乓球隊開始。我今天請這麼多人來，就是為了讓大家膽子大一點；但膽子大，不是搞極左。

1971年5月30日、31日，周恩來在全國外事工作會議發表重要講話，闡述在新形勢下的外交政策，批評並糾正對外宣傳工作中存在的偏差。周恩來指出：我不同意那種極左思潮的說法，好像我國外交路線也是修正主義的路線，因為毛主席一直關心這條戰線，親

自抓、親自領導這條戰線。周恩來還談到「文化大革命」中各項事業受影響、被破壞的情況時，說：這些事情為什麼不能跟人家說？這幾年我們出版的東西少了，要補上來；文藝方面除八個樣板戲外，只要內容是健康的、革命的、形式不是萎靡、庸俗的，就要允許人家嘗試。1971年6月4日周恩來繼續針對判對外工作中的極左思潮問題時說：一直到現在我們總說批判極左思潮不徹底，不敢大膽批評，包括我們中央許多部門。一直到現在還有。你不把極左思潮肅清，怎麼能掌握正確的政策呢？

1970年8月16日周恩來同國家體委軍管會負責人和一些乒乓球隊員談話，指出：建國後十七年的體育路線不都是修正主義的，還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由於壞人鑽空子，搞了極左思潮，弄得一個時期思想比較混亂。同日接見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領導小組成員，就批判出版界的極左思潮問題發表意見。指出：「現在書店裡中國和外國的歷史書都沒有。不出歷史、地理書籍，是個大缺點。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都是從資產階級的或受唯心史觀限制的學說發展來的。不講歷史、割斷歷史怎麼行呢？」「應該選擇一些舊的書籍給青少年批判地讀，使他們知道歷史是怎麼發展來的。」「否定一切，不分為二，這是極左思潮，不是毛澤東思想。我們要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問題。」經中共中央轉發的國務院《關於出版工作座談會的報告》寫道：這次會議「批判了極左思潮，批判了『文化工作危險』論」。

由此可以看出，在「九大」之後，無論是經濟領域還是外交政策，批極左已經展開。

還在「九?一三事件」以前，周恩來在一次講話中就明確指出：「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合理的還是要保留，一概取消是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是不尊重科學的。不能違背科學。……有些人要把一切制度砸爛，這是極左思想。」

2. 解放幹部

解放幹部的工作從成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的時候就開始了。「九大」之後，毛澤東更加注意解放幹部的問題。1969年6月26日，毛澤東同曾思玉、劉豐、張體學等談話：「聽說河南地專縣一級的第一把手，有百分之五十的人都出來主持工作，這個經驗很好，全國不太多。」7月8日，毛澤東在浙江對當地負責人說：「要教育幫助新幹部，就是要當見習官。他們沒有經驗嘛，就是要當見習官嘛！老幹部是有經驗的。」

在軍委辦事組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經過艱苦努力，經過和江青等人幾次舌戰後，終於同意軍隊解放一批幹部，國慶節要上天安門亮相，諸如張宗遜、楊勇、梁必業、肖向榮、李雪三、張賢約、王諍、王恩茂、吳克華等等。地方幹部如萬里和趙紫陽在1971年也是在周恩來與軍委辦事組大力支持下得到解放，萬里被任命為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趙紫陽被任命為內蒙古自治區革委會副主任。一方面，沒有毛澤東的點頭，這是做不到的；另一方面，因為當時毛澤東沒有明確說要解放老幹部，因此難度頗大。

「九?一三」之後，毛澤東出於穩定局勢和收買人心等諸多方面原因，解放老幹部速度大大加快了。

1971年11月4日，毛澤東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的同志。當葉劍英走進會場的時候，毛澤東對與會人員說：「你們不要再講『二月逆流』。」毛澤東同時編造謊言：「『二月逆流』是什麼性質？是老師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威的。那個王關威，『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師，老師就氣嘛，發點牢騷。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鬧懷仁堂嘛！」同時毛澤東叫葉劍英把此話轉告給陳毅。但是葉劍英並沒有轉達。而且毛澤東也沒有說反擊「二月逆流」是錯的，要給「二月逆流」平反，葉周等人也只能觀望。

1971年11月8日晚，毛澤東在接見出席第26屆聯合國大會的中國代表團成員。當介紹到外交部辦公廳主任、代表團秘書長符浩的時候，周恩來告訴毛澤東：他是「九十一人大字報」簽名者之一。毛澤東表示他贊成「九十一」。這是毛再一次表示支持陳毅，並肯

定外交部九十一人的行動的開始。

直到次年1月6日，毛澤東再次對周恩來、葉劍英說：「『二月逆流』經過時間的考驗，根本沒有這個事，不要再講『二月逆流』了。請你們去向陳毅同志傳達一下。」周葉當場核對了記錄後才去告訴陳毅。即使如此，周恩來在陳毅的悼詞上仍然做了負面的評價，毛澤東在審閱的時候指出「功過的評論，不宜在追悼會上作」。

沒有毛的發話，沒有人敢越雷池一步，即使毛髮話，也必須再三驗證，明確表態後，方敢落實。毛的權威是沒有人敢於冒犯。

整個解放老幹部的政策是毛澤東一手控制的，特別是高層幹部。正如鄧小平所說：「我們都知道周總理保護過許多老同志。可是如果毛主席不說話，周總理也保不下來。」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來看，毛澤東對於高層幹部如何安排做了具體的批示。在此過程中並沒有發現江青等阻擾的事情。至於在解放一些幹部中，江青等針對於個人的個別問題提出質疑，也是完全合乎程序的。有些文章說江青等是百般阻撓，筆者認為完全是誇大之詞。

根據毛澤東關於解放幹部的意圖，從這年上半年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加快了「解放」幹部的進程。4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經周恩來審定的題為《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社論，提出：「要嚴格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除了極少數混進革命隊伍的階級敵人和屢教不改、不可救藥的分子外，對一切犯錯誤的同志，不論老幹部、新幹部，黨內的同志、黨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團結一批評一團結』的公式，採取教育為主的方針。」「正如得過傷寒病可以產生免疫力一樣，犯過錯誤的人，只要認真改正錯誤，善於從錯誤中吸取教訓，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7月31日晚，在國防部舉行的慶祝「八一」建軍節招待會上，陳雲、李富春、陳再道等一批老幹部公開「露面」，十分引人注目。亦根據毛澤東的解放老幹部的意圖，周恩來指示衛生部組織北京十大醫院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給近50名副部長以上的幹部作體檢，並在這個名義下獲得「解放」，重新工作。

1972年12月，毛澤東在原鐵道部副部長劉建章妻子劉淑清來信上批示：請總理辦。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是誰規定的？應一律廢除。當天，周恩來就出三點批示：一、將劉建章保外送醫院就醫，並通知其家屬前去看望。二、將劉建章全案結論抽出送國務院李先念、紀登奎批。三、請公安部會同衛戍區將我在國務院提出的要清查北京監獄待遇問題，在年內再做一次徹底清查。凡屬主席指出的「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和虐待、毆打都需列舉出來，再一次宣佈廢除，並當著在押犯人公佈，如有犯者，當依法懲治，更容許犯人控訴。各事辦好，請分別報來。無論是毛還是周，對於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早就知道，只是此時才解決而已。

解放幹部的模式一般如下，老幹部先致信毛澤東，毛澤東批示中央辦，多數情況是周恩來具體辦理。

1972年1月10日，毛澤東帶病參加了陳毅的葬禮，這種顯然包含著歉意的舉動，很有象徵意義。它給全國發出一種「暗示」：廣大老幹部包括對「文化大革命」有嚴重抵觸情緒的幹部是好的，應當適時給予「解放」和平反。這對於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或受到錯誤批判的老幹部們來說，不能不說是企盼已久的「信號」。周恩來不久後在一次會議上感慨地說：「毛主席參加陳毅同志追悼會，使我們這些老幹部，使我們忠於主席的人，都很感動。」

一大批老幹部包含陳雲、王稼祥、譚震林、吳冷西、廖漢生等等紛紛給毛澤東寫信。既然黨中央號召揭發林彪的罪行，寫信也就有了題目。許多老幹部及其家屬在給毛澤東和中央寫信，扯「揭發林彪」的大旗，申訴自己受迫害的情況，要求解除監禁、出獄治病、要求落實政策、恢復工作。

陳雲在1972年7月21日，致信毛澤東：「如果沒有適當的工作可分配，可否參加

北京老同志學習班？參加學習班之後，可否在我身體還能走動的幾年在春秋季節仍到外地下面去看看？如果可以這樣辦的話，因為我不能坐飛機，可否破例在往返的路上給一個能燒暖氣的公務車，避免受冷感冒，也可延長一點在外地走動的時間。」請求中央根據陳雲的身體情況，給其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自然是此信的重點。對此，毛澤東於7月22日批示道：印發。請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繼而在陳雲的第二封信上批示道：請總理辦。

周恩來成為解放老幹部的「代言人」，與此模式不無關係。大陸黨史界在論述此過程中經常有意無意的忽略毛澤東的決定性作用，從而周恩來的形像更加「光輝」。

毛澤東在1973年上半年閱批了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老幹部或其家屬的來信，包括譚震林、何長工、李一氓、舒同、譚政、林鐵、葉飛等，並指示有關部門抓緊「解放」他們，「分配工作」。3月3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現在要「安定團結」、要「穩定」。周恩來見機而作，向毛澤東報告許多老幹部挨整、一直沒有工作的情況。毛澤東說：「我並不知道那這麼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燒一燒官僚主義，但不要燒糊了」。周恩來說：「看來有一個落實幹部政策的問題。」毛澤東說：「這個問題由你去落實吧！」

解放幹部的原則是正部長和中央文革直接處理過的人的材料要報毛澤東審批，副部長報中央批。中央由中組部負責落實省委常委以上幹部政策；國務院由總理辦公室負責，落實副部長以上幹部政策；軍隊由總政治部負責，落實正軍級以上幹部政策。

正如鄧小平在1979年的評論：「可是如果毛主席不說話，周總理也保不下來。」解放幹部也是如此，如果沒有毛澤東的點頭，政策的鬆動，周恩來也解放不了幹部。即使如此，牽涉到重大冤案的時候，周恩來還是要等待毛澤東的多次明確指示。例如當分管中央組織部工作的紀登奎向他請示如何貫徹毛為賀龍平反的指示時，周也只是表示：不忙，再等等看。而彭德懷的案子，周恩來就一點都沒有可能對其鬆動。此二例可以明顯的看出周恩來在解放老幹部方面的局限性和嚴重的依賴性。

除此之外，並不是所有受到「迫害」的人，都會受到此待遇。

毛澤東在1971年11月就說對林彪下面的幾十個工作人員和秘書也要給他們工作做，不能不用。但是直到1975年6月24日，一位原在林彪處做保健工作的醫生給毛澤東寫信，反映他自「九·一三」事件後參加學習班，至今已近4年，尚未作出正式結論。

二、「批林整風」匯報會

1972年5—6月間，中共中央在京召開「批林整風」匯報會議。此會議按照毛澤東的部署，主要任務則是兩點：第一：周恩來做檢討；第二：由周恩來出面說明毛澤東早就洞察一切、江青是毛澤東的最重要的政治盟友。

周恩來在1972年5月3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時，傳達了毛澤東當天向周恩來提出的中央要召開「批林整風」匯報會的指示。5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召開「批林整風」匯報會議的通知》稿。6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下發此《通知》，其中提到：我黨同林彪反黨集團的鬥爭，是我黨路線鬥爭中最嚴重的一次鬥爭。這次為期一個多月的重要會議有中央黨政軍各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312人參加，可見毛澤東對此會議的重視程度。

1. 「批林整風」匯報會的起因

出於政治目的，毛澤東在強撐病體參加陳毅追悼會後，因感冒致導致病情惡化，由肺炎轉成肺心病，還一度昏厥過去。在此種形勢下，毛澤東出於無奈，向周恩來托付了大權。此事後來成為「批林整風」會議的起因也是1973年批周的根本原因之一。

毛澤東的保健醫生李志綏在回憶錄中詳述了當時的情況：

毛將頭完全靠在沙發背上，說：「我看你們兩個人（指江青和李志綏一筆者註）給我吃的藥，都沒有起好作用。」然後對著我（指李志綏一筆者註）說：「所有的藥都停了。誰要是再說藥的事，就給我滾。」

毛將頭轉向周恩來說：「我不行了，全靠你了……」周立刻插話說：「主席的身體沒有大問題，還是要靠主席。」

毛搖搖頭說：「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後，事情全由你辦。」我看江青雙眼圓睜，兩手握著拳，全身好像要爆炸了。周恩來則小腿縮回，兩手撐在膝蓋上，上身挺直，微微前傾，好像凝固起來。毛的這些話，明明是將國家的黨、政、軍大權交給了周恩來，而且是當著江青的面講出來的，我那時還餘悸未定，全身大汗，沒有體會到毛那時話中的意思。今日走筆，我想這是毛第一次面對自己的死亡。

毛又說：「就這樣定了，你們去吧。」

周恩來從來就沒有被毛澤東看作接班人，這點是黨內高層的共識。周恩來本人也有自知之明，自己也多次表示為自己不具備帥才，只能作助手而不能掌舵。這一點在毛澤東提拔王洪文為接班人後，周恩來對王洪文的態度亦證明了這點。毛澤東向周恩來交權的舉動只是一時的無奈之舉，用毛自己的話說是形勢比人強。周恩來深知毛澤東嗜權如命，所以此事使得周恩來誠惶誠恐。當2月1日毛澤東昏厥被搶救過來的時候，聞訊趕來的周恩來心情緊張到了極點，以至當場大小便失禁，許久下不來車。毛澤東一醒來後，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寫道：伯伯此時如釋重負，他激動地撲到主席床邊，雙手緊握著主席的手，淚水奪眶、語音哽咽地衝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權還在你的手裡！」周秉德竟然把地道一個維護獨裁者的周恩來的形像卻當作「美德」寫出來，真是是非顛倒。除此之外，周又特別叮囑讓負責警衛毛的張耀祠帶話給毛，說：「等主席精神好一些時，請你向主席報告：我們還是在主席領導下工作。」

由於「九·一三」的周恩來處於「二把手」的位置上，又由於毛澤東說了「我死了以後，事情全由你辦」的話，周恩來在事實上成了接班人。一旦毛澤東突然去世，周恩來就會便順理成章地接班成為一把手。隨著基辛格訪華的結束以及毛澤東身體的好轉，毛要解決這個問題，扭轉這個局面。「批林整風」就是要達到這個目的。這也是為什麼鄧小平在1973年批周會議上一言中的而得毛歡心的關鍵原因。毛要通過對周恩來歷史的這次批判，向全黨發出一個明確信號：林倒了，但周恩來並不是接班人，這個事情要由周恩來自己來說，向全黨，特別是在高層，講明白這點。尤其要讓與會人員中的那些「新人」，即通過「文化大革命」上來的、被毛澤東認為能確保將來「紅旗不倒」的接班人，諸如王洪文、徐景賢等各省的負責人瞭解周恩來的歷史問題。

會議的另一個目的，提高江青的地位。一是將「林陳反黨集團」更名為「林彪反黨集團」，借壓低陳伯達而淡化他的文革小組組長身份，進而淡化江青的角色；二是讓周恩來為「毛澤東致江青的信」出面證明江青不僅為毛澤東的夫人更為毛澤東的親密政治盟友。

2. 周恩來的檢討

1972年5月18日，周恩來確診膀胱癌。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在5月27日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要在「批林整風」匯報會上，根據毛主席去年巡視南方談話中著重提到的中共黨內十次路線鬥爭問題，講一點個人的認識和我個人在歷史上所犯的路

線錯誤。次日，又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各組召集人會議上宣佈此事。

張佐良回憶，1972年的6月份，周恩來閉門寫「文章」，寫的渾身浮腫，苦不堪言。這期間，周恩來也不刮鬍子，整日緊繃著臉，沉默少語，鬱鬱寡歡地思考著問題。

周恩來於5月30日致信毛澤東：「我現在正寫一個講話要點，寫成後將先進主席審查，並請約我一談，好當面請示。」周恩來於6月7日將所寫《對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六次路線鬥爭的個人認識》提綱送毛澤東審閱，並附信表示自己願意像當年延安整風那樣，清算自己歷史上所犯的路線錯誤。周在信中這樣寫道：「現在既然大家願意聽，而我也讓大家都知道歷史責任。兩次在主席處聽到片言隻字關於路線的教訓，我更急於要寫出初稿，不管行不行，總算搞個初稿了，至少可供批判用。我老了，事又多，不定那天心臟病發，我就無法還賬，同志們也將失望，那時成為終身之憾！不管對不對，行不行，乘主席健在，我總（算）寫出初稿，請主席勉強翻一下，這樣長的稿子（30多頁），我實不安。如可用，我就去講，講後再改，實在不行，我就放下，以後再改。我現在認為，把我過去犯的路線錯誤和重大錯誤告訴三百多位老中青黨政軍和各地負責同志有好處，使他們可以批評我，監督我，對我還可以改造，對他們也可引以為訓。即使不行，至少也可知道我是怎樣一個黨員，主席又是怎樣挽救我和教育我的。」毛澤東圈閱了提綱及附信。

6月10日—12日，周恩來連用三個晚上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作了《對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六次路線鬥爭的個人認識》的長篇發言。周恩來在報告中自我作賤，再次表示保持晚節，「對自己作了嚴厲的、毫不留情的剖析，甚至是過份的檢討」。在談及王明「左」、「右」傾錯誤問題時，周恩來結合個人親身經歷，作了嚴厲的自我剖析，並又一次表示了沉痛的以至於過分的「檢討」。周恩來檢討道「這兩次路線錯誤，要沒有毛主席「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長期挽救我，教育我，給我以補過贖罪的機會，我何以能有今日？所以我每每回想歷史教訓，常感到補過之日無多。」凡熟悉中共黨史、周恩來為人以及毛澤東與周恩來關係的人士對此相當不理解，而那些「新生力量」則感到震驚。

周恩來非常清楚毛澤東的心病，自己作檢討的要旨所在，自己不配作為毛的接班人，因此周恩來主動提議會議擴大人數。為此，周專門在發言末尾當眾申明：「我覺得由我來談談前六次路線鬥爭，更著重說說對我自己犯過的路線錯誤的個人認識，確有其必要性和現實性」，「我一直而且永遠自認為，不能掌舵，只能當助手」。不僅如此，周恩來還表示：「你們瞭解我的歷史上的錯誤後，就會破除迷信……你們有權力要求我改好，如果還改不好而錯誤犯的又大，那你們有權力要求中央討論，輕則警告，重則撤職，這是毛主席建立起來的黨的正常生活。」周恩來還特意引用了列寧的話「忘記過去就意味這背叛」來再次表示自己原來犯過的罪惡是不容原諒的。

6月23日，周恩來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最後一次全體會議上，作了《關於國民黨造謠污蔑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的真相》的報告。周恩來特意宣佈了：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和中央政治局的決定，會後將把報告錄音、錄音記錄稿以及其它有關文獻資料存入中央檔案，並發給各省、市、自治區存檔。

然而事情的發展有時並不與發起人的主觀願望一致。毛澤東讓周恩來作檢討的初衷是要讓人們知道周恩來有歷史問題、並不是一貫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不適合作黨的接班人。然而，事與願違，周恩來的這種檢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與會者的同情，贏得了人心。這與中國的道德文化傳統密切相連。毛澤東一直想通過搞臭周恩來的辦法，來防止周恩來成為反毛的一面旗幟，不幸的是結局恰好如此。

3. 毛澤東致江青的信

5月21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周就會議印發的文

件逐一作出說明、解釋、回顧了一九七零年九屆二中全會以來與林彪反黨集團鬥爭的過程，並批判了林彪在歷史上的錯誤。

同日，周恩來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討論意見，前往毛澤東處請示可否將毛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寫給江青的信印發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至今為止，未有材料表明是毛授意在先，還是周主動為之。毛澤東表示可以印發作會議文件。周恩來在5月21日講話中說：「前天，我們政治局決定要請示主席，我昨天去請示主席，原來主席還說等一等，昨天一請示說可以。這個我們當然先印給到會同志看了，先不外傳了。」

首先周恩來解釋了為什麼「林陳」變成了「林」。周恩來說：「這一次我們這個會議的名字改成「批林整風」了。九屆二中全會以後，主席的一系列措施，都是教育一批幹部，還要保林，使他自己知道那個錯誤的嚴重，在九屆二中全會上也是如此。《我的一點意見》，把打擊的矛頭對準了陳伯達這個騙子，由於主席的教導使相信他的人、上當的人覺悟了，警惕起來了。使跟他搞陰謀的人就不要搞了嘛。所以，從九屆二中全會到去年九月十三日事件以前，一直提的是批陳整風。整個精神，從文件上你們可以看出，也是如此。但從九屆二中全會到去年九月十三日事件以前，一直提的是批陳整風。整個精神，從文件上你們可以看出，也是如此。但九月十三把這個問題真相揭穿了，頭子就是林彪，而不是林、陳，不像高饒聯盟那樣。林彪搞的是陰謀活動，他反黨、反主席的思想是長期存在的。」

然後，周恩來講了要發的前四個文件之後，重點介紹了毛澤東致江青的信：「現在確定的文件之五，是最重要的一篇，就是毛主席給江青同志的信。這個信只有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看過，在座的你們各省市的，還有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沒看過。就是在『九·一三』以後，今年印的吧？這封信是什麼時候寫的呢？就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政治局擴大會議林彪在河北廳講話以後，林彪講話經過多次改動，送到主席那裡，主席總是有點不安，裡頭有些話過頭，敘述政變那種寫法也不當。但是當時是為的要發動文化大革命，鼓革命群眾之氣，要打擊、掃除那種修正主義的風，所以說話有些過。但是當時的中央修改以後，還是請主席批。主席覺得不批，這篇東西不能發表，不是等於給群眾潑冷水了嗎？因為大家希望看到這篇東西嘛。實際上這裡頭有毛病，有些極『左』的話，有些不恰當的。現在大家回想回想恐怕就會看出來。林彪那篇東西是不是可以作為參閱文件印給大家？剛才政治局會議沒有討論，再看一看。毛主席這封信一針見血。主席寫這封信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在武漢寫的，我是七月十一日到武漢。那時見了個外賓，我跟主席報告我到國外訪問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以後，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見主席，主席就把給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給我看。是一個底子，那個字是徐業夫同志抄的，有些字還抄錯，主席還改了的。」

關於此信的真偽以及有無篡改甚至有無等問題，有學者已一一列舉，此處不贅。

關鍵的是周恩來道出此信的目的和作用：不僅著眼於現實，也在未來。周恩來說：「那個信可寫的深刻，現在大家想想看，那簡直是完全看到了這些問題。當然了，當時不是說林彪這個人了，也可能想著利用右派來搞。那封信指的林彪那些極『左』的話，這個極『左』，就形『左』實右，就落在林彪身上，是個右派。主席說七、八年後，結果六年就出現這個事了。只有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才能預見到這麼清楚。這封信貫穿了整個文化大革命，大家可以看一看。」

江青介紹此信的背景時說：「一九六六年，中央在杭州開四月會議，當時我在上海，不知道會議情況。五月初，中央在北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我還在上海，也不知道會議情況」。一九六六年七月，我收到了主席給我的信，當我讀到：『我的朋友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他的一些提法，我感覺不安。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我當時雖然不知道主席指的是誰，但是我感覺到事關重大，心情沉重。」接著江青認為「這封信不是寫給我一個人的，是寫給全黨、全國人民的。信中講了世界革命問題，所以，也是寫給全世界人民的。」但是在這些客套之詞之後，

江青道出實質：「不過在當時，主席不好寫給別人，只能寫給像我這樣的人。」

此信的公開發表，向全國人民傳達了三層意思：第一，毛對江青是極為信賴的，把如此重要的意見寫在給她的信中，表明只有江才是毛的最親密政治盟友；第二，既然毛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就「看穿」了林彪，那麼江青也是老早「看穿」了林彪的，因此江青不是林彪的同路人——無論林彪是「極左」還是「極右」；第三，著眼於毛身後，周恩來的檢討和推出毛澤東致江青的信本質都是一樣的，周不是接班人，代表毛澤東路線的是旗手江青。

如此重要的物件，但是除了毛澤東，還有誰能為江青背書呢？在中共黨內高層，有資格、有能力、有願望扮演這個角色的人只有一個，那就是被稱為「紅朝宰相」的周恩來！

一個周恩來還不夠，有扛大旗的，也有吹號敲鑼打鼓的。徐景賢回憶到「在這次會議上公佈這封信後，每個人都要表態，發言都要上簡報。我也在小組討論時作了發言：讀了毛主席的信，受到深刻的教育，林彪是反革命兩面派，『當面喊萬歲，背後下毒手』，毛主席高瞻遠矚，對林彪的問題早有察覺，等等。其它人的發言，也都是這個基調。另外，也有人稱頌江青的，例如鄧穎超的發言，說她「從三十年代起就知道江青，讀了當時報紙上發表的江青致唐納的公開信，認為江青是傑出的女性，林彪一夥要搜集江青的黑材料，不是『黑材料』而是『紅材料』，等等。」

三、從批「極左」到批「極右」

毛澤東在1972年6月份會見斯里蘭卡總理班達拉奈剋夫人時談到什麼是「左派」：我們這個國家也有人家罵我們，說是整了左派。我們的「左派」是什麼一些人呢？就是火燒英國代辦處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總理，明天要打倒陳毅，後天要打倒葉劍英。這些所謂「左」派現在都在班房裡頭。

儘管林彪對於文革的真實想法是不贊成，但是毛卻利用「林彪事件」的機會，把文革迄今為止的所有惡果歸到林彪頭上，於是給林彪戴上「極左」的帽子也就成了必然的選擇。從邏輯上講，既然林彪是左派的頭子，左派又是火燒英國代辦處的那些人，那麼批林彪就是批那些「極左行為和極左思潮」。毛澤東固然希望批「極左思潮」僅限於具體的政策而不涉及意識形態的爭論。但是沒有人知道毛澤東的具體底線，無論是周恩來還是張春橋都不知道。但是對於主管意識形態的張春橋等人，對於意識形態的「批極左」比周恩來等敏感的多。除此之外還有涉及到意識形態的主導權和話語權等問題，因此張等人也不得不維護自己的「地盤」。出於對批林方針的混亂情況不解，王若水在12月5日致毛澤東的信中表示：「很同意」周恩來不久前關於《人民日報》社等單位要批透極「左」思潮的意見，認為批極「左」不僅適合於機關內部的實際情況，在輿論宣傳方面也同樣適用。毛澤東隨後的表態，使得模糊的界限明朗化，也初次流露出「揚法批儒」的念頭。

1. 批「極左」引起的爭執

1972年7月14日，周恩來在會見楊振寧時對參加陪見的周培源說：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辦好，把基礎理論水平提高。這是我交給你的任務。有什麼障礙要掃除，有什麼釘子要拔掉。1972年10月6日，《光明日報》發表周培源根據周恩來多次指示精神所寫《對綜合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大陸黨史界還流行這種說法：這篇文章本來是1972年春應《人民日報》之邀而寫的，由於張春橋和姚文元從中作梗，不得不在《光明日報》發表。

根據當時在人民日報工作的王若水以及余煥椿的回憶，此時《人民日報》尚在周恩來控制之下，並不存在張春橋和姚文元從中作梗導致不能在《人民日報》發表的問題。那為

什麼周恩來不同意此文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呢？

此事可以追溯到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的制定。大陸黨史界長期以來的定義是「《紀要》基本否定了「文革」前十七年教育工作，錯誤地提出『兩個估計』是強加給全國廣大教育工作者身上的沉重的『精神枷鎖』。」「『四人幫』的『兩個估計』，與毛主席1971年對文化大革命前教育戰線情況和知識份子情況的估計完全相反。『四人幫』長期嚴密封鎖了毛主席的指示」下炮製出來的。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是「（一）十七年的估價不要講得過分。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執行了錯誤的路線，不是大多數人，是一少部分人。（二）多數知識份子還是擁護社會主義制度。執行封、資、修路線的還是少數人。（三）高教六十條。總的還有它對的地方嘛，難道沒有一點對的地方嘛，錯誤的要批，批它錯誤的東西。」

毛澤東始自1957年3月的中共中央召開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提出：知識份子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他們還是屬於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到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會見斯諾時說，「我們沒有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啊，全用國民黨的，就是他們在那裡統治。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開刀。拋掉就是百分之一、二、三，就讓他們在那裡，年紀老了，不能幹事了，養起來了。其他的保存，但要跟勞動相結合，逐步逐步來，不要忙，不要強迫，不要強加於人。」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在會見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時就教育革命問題說：「對資產階級教授我們還得利用，不然我們沒有呀，不過，他們也得聽我們的話，有些人嘴裡也講聽我們的話，但心裡老是埋怨。」毛澤東又說：「過去也有些進步，在教育方面不能講完全不對。但是你剛才講的這一條，就是教育從根本上來一個革命，在最近幾年才開始。」

建國以後毛澤東的一系列講話和指示清楚地顯示出「兩個估計」和毛澤東的思想精神是一脈相承的。而所謂的被「四人幫」封鎖的1971年指示卻是無法搞清的在何時、何地 and 何種情況下毛澤東對遲群等人的私下談話！何隍在1971年又哪里來的「四人幫」？！

根據《周恩來年譜》記載：1971年7月6日，周恩來約見全國教育工作會議領導小組成員，針對會上關於十七年教育估計的爭論，提出毛主席的紅線也是照耀了教育戰線的；知識分子的大多數是接受共產黨領導的，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對教師隊伍和解放後培養的學生要作具體分析，要辯證地看問題。

實際上周恩來對毛澤東和「兩個估計」的關係是非常清楚的，周恩來說：「儘管有些人是解放後當教員的，但由於教育制度是舊的，方針、政策是舊的，雖然是解放後培養出來的，世界觀基本上還是資產階級的。從這個意義上講，說『資產階級專了我們的政』是對的，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了我們學校』是一個意思，他們是搞修正主義的。不然，為甚麼在教育上沒有徹底改革呢？為甚麼毛主席的號召沒有執行呢？」

至於《周恩來年譜》中引述的，同當時發出的文件也有不同。根據《中央首長指示的主要精神》，周恩來說：「但不能說主席的紅線沒有射進學校。學校不能脫離社會（從整個國家來說，十七年來，毛主席的紅線還占主導地位的）。主席的紅線還是照耀著學校的，而且有些時候還是有力的。對教師隊伍和十七年教育出來的學生要有個正確的評價。要說清楚教師、學生隊伍大多數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接受黨的領導的。不回答這個問題，這個文件拿下去就不能起動員作用。」

兩下對照，不免看出其間不同之處。對於當時知識分子以及教育界的認識，周恩來同張春橋等並無二致，這也正是《紀要》開頭部分是肯定十七年教育的所謂「巨大成就」的，但這並不妨礙《紀要》馬上接著就講「資產階級在教育戰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的多數知識份子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至於周恩來所講的無論「主席的紅線還是照耀著學校的，而且有些時候還是有力的」還是「從整個國家來說，十七年來，毛主席的紅線還占主導地位的」都屬於《紀要》中說的「巨大成就」。但是要有個「正確的評價」，並不是為了真實的反映，而是「這個文件拿下去就不能起動員作用。」但是單純從年譜

中是無法得出這個結論的，雖然年譜中所記載也是歷史事實的一部分。這種經過精心剪裁的歷史為樹立周恩來文革狂瀾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做了殊死鬥爭的」的「中流砥柱」的形像起了絕對作用。正如1977年11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教育部大批判組」的《教育戰線的一場大論戰——批判『四人幫』炮製的『兩個估計』》中所言「在『四人幫』反黨氣焰極端囂張的困難情況下，7月6日，我們敬愛的周總理遵照毛主席的一貫教導，堅決指出……周總理的指示，同樣受到『四人幫』的瘋狂反對。」

應該說，從周恩來1956年以及1962年對知識分子的看法同此認識是相悖的。但是周恩來作為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領導小組的負責人，必須把毛澤東的意見貫徹下去，制定出符合毛澤東意思的中央文件。在此點上，周恩來同張春橋等人是沒有什麼不同的。在毛澤東的大棒指揮下，沒有人不做「搖擺人」，作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則是最大的一個。

1972年5月10日至6月20日，國務院科教組召開綜合性大學和外語院校教育革命座談會。這次會議不僅提出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問題，而且重點提出了加強基礎理論教育的，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大陸官方黨史把此次會議歸結於因為「是在周恩來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期間召開的」，因此體現了「周恩來等要求改變『文化大革命』中教育界遭受嚴重破壞的狀況的意向。」然而根據《周恩來年譜》並沒有周恩來參與這次會議的記錄，實際上兩次教育會議的召開和主持人都是遲群。

根據《周恩來年譜》記載，文章發表後，張春橋、姚文元提出：周培源有後台，不管他的後台多大多硬。就是要批！隨即，指使人撰寫批駁文章，對周培源的文章進行圍攻。事實上，《文匯報》發表《這樣提出問題是否妥當？》等反駁文章的時候已經是十一月份。

筆者認為，周培源的文章在10月6日發表後，並沒有引起張姚的反擊，這正是10月14日後來成為《人民日報》「一塊版」的出籠的重要背景！（見下文）正是此版引起張春橋等人的反彈，反擊周培源的文章也就「順理成章」了。

事實上，在周培源的主持下，北京大學教育革命組寫成《搞好自然科學基礎理論課教學》一文，就發表在《紅旗》雜誌1972年第9期上。如果沒有姚文元的同意這是不可能的。1972年7月，周培源的《看法》一文送到《人民日報》後，姚文元讓人民日報社派出記者，分別到天津南開大學和上海復旦大學「徵求意見」。結果發現爭論很大。8月15日，姚文元在給《人民日報》的一個批示中寫到：文章是否馬上發表或過一些時間較適宜，請你們繼續研究。《人民日報》有關部門的同志仍然認為可以發表，姚文元又說：「我和春橋同志商量了，文章發表後可能引起爭論，你們如何收場？」於是周培源的文章被轉到《光明日報》。直到10月18日，姚文元來到上海。姚文元才表示對周培源文章的不滿說：「《紅旗》的文章（指《搞好自然科學基礎理論課教學》一文）不一定是我同意的。報刊上的文章並不都是對的，都對了，就沒有階級鬥爭了。」「周培源的文章是有來頭的，有背景的，不發不好，不發是得罪人，所以發在《光明日報》上。」

姚文元的說法說明了當時和周恩來的關係還是相當融洽的，怕得罪人麼。至於周恩來為什麼也同意不發表在《人民日報》？筆者認為，周恩來知道涉足教育領域是非常敏感的，而且周培源的文章不是簡單的學術文章。文章中的「要批判『理論無用』的錯誤思想」，綜合大學理科的培養目標是「掌握一定的自然科學理論知識，具備做科學實驗、理論分析、概括和計算工作的能力」等理論性的言語是非常容易引起爭論的。既然張姚的意見如此，也就同意，進而說不定可以通過張春橋等人的反應，推測毛澤東糾左的「底線」也未嘗不可能。

1972年11月，周培源就66屆至70屆的大學生畢業工資待遇等問題向毛澤東報告。周培源認為，鑒於我國科學文化急需加速發展，大學生還要繼續培養，而且要培養質量更高的，他們的資格尤其是經濟地位不能過低。他提出了提高大學畢業生待遇的具體意見。毛澤東對報告不痛不癢的批示到：「此事關係很大。印發政治局各同志，國務院文教組及北

京市委各同志研究。請中央考慮作出決定。」毛澤東並沒有對周培源的說法作出肯定，而是模稜兩可的態度，這正體現了此時的毛澤東在考慮是「極左」或者「極右」的心態。

根據毛澤東講話精神，「左派」對外交工作的破壞是要清算的。經過準備，8月1日至2日，周恩來對回國述職的大使和外事部門的負責人作長篇報告，系統闡述對國際形勢、內外政策、「批林整風」，政治與業務關係等問題的看法：提出外事工作也有極左思潮，各單位的極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縱起來的；極左思潮不批透，右傾又會起來；運動和業務不能對立，如果真正懂得運動就要懂得政策，政策就是要落實在業務上。隨後，為繼續排除極左思潮對外交工作的干擾，中聯部和外交部根據周恩來的建議，準備召開外事工作會議。11月28日，中聯部和外交部為此寫報告給周恩來並中共中央，明確提出要聯繫外事工作的實際，徹底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的極左思潮。11月30日，周恩來審閱並同意中聯部、外交部《關於召開外事會議的請示報告》，將報告送毛澤東及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員傳閱。

12月1日，張春橋對此報告有異議：「當前的主要問題仍然是極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極左和無政府主義？我正在考慮。」江青也在報告上批道：「我個人認為應批林彪賣國賊的極右，同時批他在某些問題上形左實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時也應著重講一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鑒於黨內高層對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主題存在著尖銳的意見分歧，12月2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對這件事進行討論。根據政治局討論的意見，外交部在修改時刪去了原來報告中批判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的詞句。

顯而易見的是，張春橋和江青反對的是「提法」的問題而不是外交部門如何在「批極左」的「具體操作」上。因此修改後的報告仍強調：會議「主要學習毛主席最近一兩年來關於對外工作的批示」、「總理今年8月1日，2日接見駐外使節的談話(紀要)」。周恩來在4日審閱同意修改後的報告，並註明這是「經過政治局討論後，加以修改的」，之後送交毛澤東審閱。

8月8日，張春橋、姚文元來到報社，同報社軍宣隊和看大樣小組的幾個人談話。針對談批林問題，張春橋說：「林彪的一套，是在我們批判劉少奇的過程中搞出來的……林彪利用批劉，搞出一套形左實右的東西，流毒很廣，因此，在批林時要動腦筋，劃清界限，不要過頭，不要重犯過去批劉時的錯誤。」同時張春橋、姚文元在也表示：不能「把批林、批陳同批極『左』思潮和抓『五?一六』對立起來」，批林批夠了，極『左』思潮也解決了」。張姚的談話表明他們是支持周恩來對於外交部的整頓的。

同樣，在姚文元主持的《紅旗》第11期(11月出版)，也有提出批無政府主義的內容：劉少奇一類騙子(指林彪，當時還沒有公開在報刊上點林彪的名字)散佈無政府主義，是妄圖從「左」的方面來否定黨的正確路線。就是10月14日那篇反無政府主義的文章，曾經列入理論部擬定的「批林整風選題計劃」，並送姚文元審閱過，姚文元當時沒有表示不同意。

但是在國慶節的時候，報社準備了一篇社論，吳冷西根據周恩來的精神，在其中加了一句話：「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錯誤傾向，特別要批評極左思潮。」送審時，姚文元把這句話刪去了，說：「全國形勢如何，還要再看一看。」周恩來也沒有表示不同意見。

然而就在這篇社論中提到：我們同劉少奇一類騙子的鬥爭，從根本上說，就是堅持還是改變毛主席這條基本路線的鬥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們把這些隱藏得很深的資產階級野心家揭露出來，粉碎了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清算了他們的修正主義路線，這是偉大的勝利。

10月14日，《人民日報》由王若水審定，編發了三篇反對無政府主義的文章(署名龍巖，題為《無政府主義是假馬克思主義騙子的反革命工具》。另外配了兩篇文章，一篇是《堅持無產階級鐵的紀律》，一篇是介紹巴枯寧的書評，也是批無政府主義的。)此三篇文章組成成一塊版。文章是根據國務院領導華國鋒、李先念、余秋裡在1972年3月接見黑龍江省的同志時的講話精神而寫。這三篇文章理論色彩濃厚。文中說「無政府主義，是一

個以極左面目出現的機會主義派別。」文中對於無政府主義的描述直指文革初期紅衛兵的表現和67年奪權風暴。張春橋在上海組織了人馬寫文章反駁。但是張春橋和周恩來之間還沒有形成直接面對面的衝突。

就是上文論述的在11月30日周恩來審閱並同意中聯部、外交部《關於召開外事會議的請示報告》中，周恩來也僅是在聯繫被毛澤東譴責過的67年火燒英國代辦處風波一事提及反對無政府主義，而且這是整個報告中唯一的一次。張春橋在提出異議的時候，還是同意此報告的。

實際情況也是如此，1973年初召開的全國外事工作會議儘管避開使用批判「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的提法，但依然是按毛澤東、周恩來關於反對強加於人和大國主義的指示精神，清理和批判了近些年來在歸僑、僑眷、口岸、接待、宣傳工作中的種種錯誤認識和極端做法，並提出今後繼續清除極左影響的各項規定。

因此爭執的實質不在於具體工作上的分歧，而是如何提法，而且是由誰來提。因此自八月份以來，隨之周恩來糾左領域的擴大，特別是意識形態與理論性質上的牽涉，同分管意識形態的張春橋、姚文元發生衝突也是必然。

正當周恩來和張春橋等人在報紙輿論意識形態和實際工作如何「批極左」達成平衡和默契的時候，隨後王若水的一封信打破了這一格局。

2. 王若水的信引起的風波

王若水說：「我的想法並不是在聽到總理講話以後才產生的。早在1967年，王力、關鋒垮台和清查『五·一六』時，就提出了批判極左思潮的口號，包括反對無政府主義。……就實質說，『五·一六』反革命團體和林彪沒有區別，都是極右，但他們都以極左的面目出現。既然林彪是煽動極左思潮的總根子，我就以為這樣批是可以的。」然而這些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王若水說：「現在《人民日報》陷入宣傳上的混亂，主要是批林方針問題。總理在8月1日說，批『左』還沒有批透；但張春橋姚文元在8月8日卻說，批『左』不要過頭這就產生一個問題：到底批『左』是沒有批透呢，還是批過了頭？我認為周總理講的是對的。他雖然指的是幾個單位的運動，但我認為也適用於報紙宣傳。」

後來周恩來等同王若水談話時，王若水講：「從實際工作來說，『左』右兩方面的干擾都有，這是大家承認的，問題是哪個方面是主要的。我想『左』是主要的，所以總理在『八一講話』中講到要批『左』，我就按自己的意思來理解了。總理本來是講幾個單位的內部問題，還有外交方面的問題，我卻認為，這個精神也應該適用於批林整風的宣傳。」

王若水知道不知道周恩來同張春橋等人的分歧呢？王若水說：「當時，張春橋姚文元都不在北京，我抓住這個機會，就在10月14日把這一整版反『左』的文章發出去了。」

王若水還說：「信剛發出兩天，就聽到一個不利的消息：12月6日，張春橋、姚文元有一次談話。姚文元說：『主席說，林彪歷史上一貫是右的。』『林彪在教育問題上是右的。林彪的理論和實踐都是右的。』張春橋說：大亂是不是無政府主義？『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亂是主席號召紅衛兵造反。……當時亂有些損失，如鐵路，沒什麼了不起。……停止黨的生活，這是主席決定的，不是無政府主義。『文化大革命』剛剛過來，怎麼能忘掉？沒有大亂，哪有大治？《人民日報》的同志要到工農群眾中去，聽聽工農意見。到上海去聽聽，上海工人硬是敢提意見。」「生產搞不好。主要是階級鬥爭，班子不團結，不是群眾的無政府主義。」「只講極左思潮說服不了我。林彪也有個發展過程，只講極『左』怎麼行？最後投靠蘇修是極右。」

在王若水寫信的第二天，12月6日，毛澤東就約見江青，要她將王若水的信轉給周、張、姚等，由他們一起找王若水談話，解決一下這個問題。當日江青就將王若水來信送周恩

來等閱。關於找王若水談話事，江青提出：「建議我們先談談，統一下認識。否則，冒冒失失地找他們來，各說各的不好。」當日，周恩來閱批：「同意我們政治局內部先談一下。」

由此可見，儘管出於所謂大陸官方所定義的「派別利益」，對於林彪事件是「左」還是「右」江青等人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對於周恩來還是非常團結的。沒有一個人直接對周恩來發難，都是提出自己的意見，採取同周恩來商討的做法。

周恩來接連在12月15日、16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王若水十二月五日信和對批極左問題的認識。17日和張春橋、姚文元等到毛澤東處開會。毛澤東提出：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對，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關於林彪路線的實質，毛澤東說：「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19日，周恩來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約人民日報社魯瑛、吳冷西、崔金耀、王若水談話，傳達毛澤東關於林彪路線的實質是極右的指示。

周恩來首先批駁了王若水的說法：「王若水同志聽到8月1日我的講話。我講極『左』思潮要批透，是指外交政策，還有工作上的一些問題，不是講林彪的整個路線。林彪叛黨叛國，那是極右了。中央報刊上曾經指出過極『左』思潮，《紅旗》11期也提過，但是我們沒有定性為『左』。至於表現形式，也有形『左』實右。說林彪是『左』，在原則上是錯誤的。」繼而周恩來指出「黨報和黨刊應該一致，否則敵人就利用，把黨報和黨刊，《人民日報》和《紅旗》對立起來。只要我們有一點不同，他們馬上抓住。這次是美國記者，說北京的官方報刊走著不同的道路。」同時周恩來承擔了部分責任：「這是中央務虛不夠，不能完全責備報社的同志。」

江青直指王若水信是挑撥離間：「這封信不管動機如何，客觀上對中央起著挑撥作用，我看了以後很不高興。拿著總理在某一個場合某一個問題上講的話來加以利用。林彪的路線，右到叛國了。至於他在某一時間，某一事情上，利用極左思潮，實質上也是極右。你這封信，好像春橋、文元同志跟總理鬧彆扭，我認為過分了。全篇不是很講理的。都在中央工作，怎麼可以把兩個政治局委員和一個常委對立起來呢？」

對此點，周恩來和張春橋都敲打了王若水。

周恩來：「王若水同志這封信，一個是把報社形勢看得漆黑一團，像《海瑞罷官》那時的形勢一樣；一個是從中央找空子，要徹底認識這個問題。對上海的好事不贊成，你的錯誤嚴重些說是立場問題」

張春橋則說：「這封信反映出來，不是王若水同志一個人的問題，《人民日報》還有人。這究竟是什麼問題需要研究。我總覺得《人民日報》內部有一股邪氣，一股勢力，容不得外面的人。」「他們報社不但利用總理和我們之間，而且還利用中央、國務院各部看稿提的意見不一致，如先念同志如何看的。這種挑撥，你們各位要注意。」

王若水的回憶還提到另外兩個事情：一個是毛澤東在批王若水的信時講，當前形勢如何？林彪事件是一團漆黑，還是略有光明？第二個是在此過程中，毛澤東講漢宣帝批評太子的故事。太子劉奭的立場是儒家，而宣帝對他的批評是法家觀點。據史書載，漢宣帝對太子劉奭某次的講話很不高興，以至於從此對太子疏遠而喜歡好法律的次子劉欽，甚至一度有意改立劉欽為太子。王若水說，1972年的這件事，可以說是1974年「評法批儒」的先聲。毛澤東不讓周恩來作繼承人，固然可以說是因為周恩來已患惡疾，但更重要的原因還是擔心周恩來將會糾正「文革」的錯誤。

毛澤東講的那個故事見之於《漢書·元帝紀》。劉奭的父親宣帝在晚期濫殺好人，被殺的或是能臣，或是賢人，不過是講了幾句中不聽的話，就慘遭殺身之禍，當時震動很大。年少的太子劉奭有些看不下去，就利用一次吃飯機會提意見，說「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變了臉色，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接著批評了一通儒生的無用，說：「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說完歎了口氣：「亂我家者，太子也！」

「九?一三」之後，周恩來不正是處在太子的位置上麼？！如此，在這以後一輪一輪如潮而湧的批周，也就在意料之中。難怪乎王若水說「我已預感到周恩來的前途多舛！」

四、在毛主導下繼續調整

在毛澤東斷言關於林彪路線的實質為「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的同時，毛澤東也說「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但是實際上的政策卻變化不大。因為林彪的真實作為對於毛來實際是「右」的，然而在「九?一三」之後，把林說成「極左」更有利於糾正左的錯誤。總是要有替罪羊的，毛澤東自己不會承擔「文革」所造成的浩劫的責任。

以經濟調整為例。

毛澤東在1971年12月批示發出由周恩來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分配問題的指示》（1971.12.26；中發（1971）82號）。這個指示要求各地認真處理好集體積累與社員分配的關係，在增產的基礎上盡可能地增加農民個人收入；同時，反對把黨的政策允許的多種經營當作資本主義去批判。此文件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農村中存在的「一平二調」、「割資本主義尾巴」等「左」的做法。雖然不可能從根本上糾正「左」的錯誤，在當時的情況下也不可能得到堅決認真的貫徹，但在實際工作中還是產生了一定的良好效果。與此同時，從1971年11月至1972年1月，經毛澤東同意，在周恩來的主持下，中央連續發出「關於嚴格控制社會集團購買力制止年終突擊花錢的通知」、《關於調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員工資的通知》、《關於改革臨時工、輪換工制度的通知》，《1972年全國計劃會議紀要》，整頓企業，加強管理，恢復被砸爛的規章制度，強調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

1973年2月26日，周恩來召集國務院業務組會議，聽取國家計委關於本年度計劃和《關於堅持統一計劃，加強經濟管理的規定》起草情況的匯報。在匯報會上，周恩來歷數幾年來無政府主義在企業中的種種表現，尖銳地批評它給國民經濟帶來的嚴重後果。他指出：「一九六九年以後，在經濟管理上瞎指揮盛行。南昌把飛機廠最好的工人放下了。景德鎮陶瓷窯也給炸了。林彪一夥一直破壞到『九一二』，影響到一九七二年，惡果逐步暴露出來了。」「一定要批透，把破壞性後果消除掉。」他同時還強調，要把「整頓的方針」寫清楚，要貫徹按勞分配的原則，克服平均主義傾向，實行必要的獎勵制度。遵照周恩來的指示，國家計委重新修改後的《關於堅持統一計劃，加強經濟管理的規定》，以糾正生產管理中普遍存在的無政府主義傾向作為指導思想，明確地提出加強統一計劃和整頓企業管理的十條規定，重申政治掛帥要掛到業務上。規定特別強調：要反對各行其是，要嚴格各項規章制度，加強勞動紀律，遵守黨紀國法，堅持按勞分配原則，等等。這個規定，在計劃會議上討論時，全國絕大多數省、市、自治區的代表贊成這個《規定》，據說只有張春橋、姚文元直接控制下的上海的代表反對。張春橋宣稱：這是「拿多數壓我們，我堅決反對。我們是光榮的孤立」。他甚至要求將下發的《規定》稿收回。

由於整頓，使管理混亂，不講經濟效益的狀況有所改變，工農業生產有所好轉。1973年同1972年比，農業總產值增長8.4%，糧食增長10.2%，棉花增長30.8%，農民人均收入增長5.8%，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全員勞動生產率上升3.3%。工業產品成本消耗降低，質量有所改善。

最為明顯的是外貿方面。

1972年2月，毛澤東審閱同意國家計委《關於進口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的報告》。此報告提出從國外引進化纖新技術成套設備、化肥設備以及部分關鍵設備和材料。根據這一精神，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當年內共批准進口十四套化纖、化肥以及一米七連續軋鋼機等成套設備，成為總價值達四十三億美元（1973年初提出了一著名的「四三計劃」）。的進口

計劃中的一部分。此後，中美貿易關係的迅速發展。1971年中美之間的貿易額還不到500萬美元；而1972年，中國向美國出口了價值3230萬美元的貨物，從美國進口了6020萬美元的貨物，從而使兩國間的貿易額增長到約1億美元左右。美國約有150多名實業界人士參加了1972年我國春季和秋季廣交會；為了進一步推動中美雙邊貿易的迅速發展，一些著名實業界負責人還在1973年初發起成立了「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以此促進中美貿易穩步向前發展。

根據美方統計，1971年到1974年雙邊貿易總額由470萬美元增加到9.212億美元。其中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從1972年的6020萬美元增加到1974年的8.069億美元，美國對中國的進口從1971年的470萬美元增加到1974年的1.144億美元，中國在美國貿易總額中所佔的比重達到0.5%。根據中方的統計資料，從1972年到1974年中美貿易額從1288萬美元增加到47571萬美元，其中中國對美出口額從957萬美元增加到10286萬美元，中國從美國的進口額從331萬美元增加到37285萬美元。

外交政策以及解放老幹部等方面不僅沒有停頓下來，而是外交上更開放、解放老幹部的速度更加快了。

《毛澤東》傳記的作者認為：它的直接結果是一九七二年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明顯受挫。但是筆者根據上述事實認為，毛澤東的仲裁使得從意識形態上關於「極左」還是「極右」思潮的爭論停止，以免引起對「文化大革命」指導思想的否定和懷疑，但是並不意味這各個領域的整頓陷入停頓。直到1973年的年中，事情起了變化。

儘管張春橋等人寫文章批判了周培源的文章，1973年1月，《全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紀要（草案）》經國務院批准，向各省、市、自治區及國務院有關部門作了傳達。在教育方面也無改弦易轍行為，直到7月份，張鐵生白卷事件發生。但是這和毛澤東的思想變化也是關聯的。

1973年7月17日下午，毛澤東接見來華訪問的美籍華裔物理學家楊振寧，周培源隨同被接見。毛澤東對周培源說道：「你的講話有人讚成，有人反對（指周在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綜合大學組座談會上的發言）。」周培源說：「那個發言後來在1972年10月6日《光明日報》上發表了。」毛澤東指名道姓地說：「上海復旦大學的談家楨就不贊成你的文章。」（筆者註：由此可見，毛的信息十分通暢。）

隨後按照毛澤東的部署，「十大」以後「反右傾回潮」運動的興起，使得歷史再次出現了倒退，諸多領域都受到了影響，僅有外交和外貿等少數領域沒有受到衝擊。而這些又都表明，林彪同「極左」無關，因為即使在1972年年底林彪變成「極右」後，不再批林彪「極左」，這些整頓並沒有停止。換句話說，就是還在糾正「極左」，但已經不是批林彪的「極左」了，也就證明了所謂的林彪的「極左」完全是栽贓，出于政治的需要了。

毛澤東對於經濟調整的支配不僅在於有關重大經濟政策的必須要由其簽字方能生效，還在於毛澤東對於國家形勢的判讀。

在「左」的思想和高度備戰形勢的影響下，國務院於1970年2月15日至3月21日間擬定和提出的《第四個五年國民經濟計劃綱要（草案）》，是以「以階級鬥爭為綱，狠抓備戰，促進國民經濟的新飛躍」，要求「集中力量建設大三線戰略後方，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點、各自為戰、大力協同的經濟協作區，初步建成我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指導思想。此《草案》不可避免的盲目追求高速度，忽視綜合平衡，戰備壓倒一切。這實際上建國後第二次「大躍進」，對經濟的發展造成了嚴重破壞。197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在《關於轉發〈一九七一年全國計劃會議紀要〉的通知》中，批准了由周恩來主持制定的《會議紀要》和1971年計劃的主要指標。作為《通知》的附件之一，《一九七一年和第四個五年國民經濟計劃主要指標》亦下發至省軍級。其「左」

的冒進思想對全國經濟工作的影響到1971年就完全體現出來：職工人數突破了五千萬人，工資支出突破了三億，糧食銷量突破了八百億斤，這就是有名的「三個突破」。周恩來竟然把這些問題歸罪於林彪的「極左」路線。

在實施的過程中，雖然周恩來在1971年2月15日接見來京參加全國計劃會議的各軍區和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說：大中型基建項目不能上得太多，不要超過一千項。「大躍進」時搞高指標，結果影響了工業的發展。「三五」期間平均每年上八百多個項目。今後每年上的項目最多不要超過一千一百項，否則，搞很多，反不如搞少點更快。

但是周恩來還是分別在1970年10月7日、1971年11月10日兩次同意國家計委追加基本建設投資的報告。致使1970年額外追加基建投資共50億元左右（還不包括專項特殊性工程的投資），僅全軍基建財政撥款，由原計劃21.2億元，增加到26.2億元左右，積累率由1969年的23%猛增到33%，到1971年竟然投資總額達到32.1億元，大大超過了國家財力物力負擔的可能。

周恩來在1971年12月16日至翌年2月12日的全國計劃會議與1972年1月1月間的全國糧食工作會議都提出過三個「突破」問題，但是並沒有什麼具體措施出台，可以說毫無作為。1972年「三個突破」問題仍在發展，貨幣發行量也突破了。糧食和棉花被迫挖用國家庫存，形成當時所說的「兩個窟窿」。

直到1973年，中美和談之後，毛澤東認為國家安全形勢已經改觀，戰爭不是那麼迫在眉睫的時候，戰備才由舉國臨戰狀態轉入常備型，此問題才得到解決。

1973年1月7日—3月30日國務院召開全國計劃會議。會議，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精神。研究和制定了解決糧食銷量、工資總額、職工人數突破國家計劃的嚴重問題的具體措施，主要是：（一）大力加強農業，增加糧食儲備；（二）縮短基本建設戰線；（三）壓縮國防和行政開支；（四）精減職工。會議還討論和修改了一九七三年度國民經濟計劃。

1973年1月，全國計劃會議討論了調整「四五」計劃綱要問題，並提出了解決糧食銷量、工資總額、職工人數突破國家計劃的嚴重問題的具體措施，包括（一）大力加強農業，增加糧食儲備；（二）縮短基本建設戰線；（三）壓縮國防和行政開支；（四）精減職工。根據會議精神，國家計委一年之中又兩次調整了「四五」計劃指標。7月1日，計委提出「四五」計劃綱要（修正草案），強調農業是基礎，要把農業放在第一位，修改、降低了若干指標。12月7日，計委向國務院提出《關於1974、1975年國民經濟計劃的一些設想》的匯報提綱，又一次對半年前修訂的指標作了調整。經過這些調整，1971年的三個「突破」和1972年的兩個「窟窿」得到控制。

根據《周恩來年譜》，張春橋曾經兩次阻撓經濟的調整。第一次是在1972年初反對《一九七二年全國計劃會議紀要》和國家計委起草的《關於堅持統一計劃，加強經濟管理的規定》，第二次是在1973年2月再次反對國家計委提交的《關於堅持統一計劃，加強經濟管理的規定》。但是張春橋的作用無疑被大大地誇張了。因為不論張春橋反對與否，《一九七二年全國計劃會議紀要》中根據周恩來提出的「現在企業管理亂得很，要整頓」、若干整頓措施，例如恢復和健全崗位責任制、考勤制、經濟核算制和質量檢驗制度等七項制度，抓產量、品種、質量等七種指標也都被與會人員傳達，但是由於沒有採取根本的調整，因此「兩個窟窿」在1972年依然出現。換句話說，批極左帶來的成績都被戰備消耗了。至於張春橋在1973年的反對更是絲毫沒有影響整個「四五」計劃綱要的調整。因此，筆者認為國內官方把周恩來和張春橋的在經濟調整中的作用都不成比例的誇大了。更多的是在毛後時代，為了攻擊張春橋，這些可能不足掛齒的事情都會被嚴重放大。

在整個「批左」的過程中，毛澤東是啟動每一個「閥門」的關鍵，周恩來不僅要取得毛澤東的同意而且毛澤東的同意是必要前提條件。但是毛澤東對於經濟領域的干涉和他介入解放老幹部的情況有很多不同。經濟方面，毛澤東僅是制定指導方向，具體計劃由周恩來

領導下的國家計委制定，然後毛澤東批准。1973年5月份，毛澤東更是指出「要安排好年度國民經濟計劃，使國內工作逐步走上正軌。」同一個時期，除了上述張春橋的兩次阻撓之外，沒有其它記錄表明江青等人插手經濟領域的「糾左」，這更加說明了江青等人採取的在意識形態上維護「文化大革命」和實際糾正左傾錯誤方面的策略和毛澤東是一致的。反過來，也表明當周恩來隨著糾左的領域的擴大，涉足文化、教育、科學、意識形態的時候，這和「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相衝突的時候，江青等人的意見實際就是毛澤東的意見。特別是到了1973年下半年之後，毛澤東逐漸把注意力放到上層建築的時候，江青等人再次活躍起來。因此，無論是周恩來主導的整頓工作還是江青等人的所謂「反對活動」，都是執行毛澤東的決策，都會隨著毛澤東的改變而改變。用一個形像的比喻就是文革是一輛戰車，毛澤東是這輛戰車的主人和駕駛者，他永遠操縱著這輛戰車，周恩來和江青等人是這戰車上不同的部件，在不同的時候分別起著不同的作用。

《毛澤東傳》的作者認為：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可以在某些具體問題上糾正已經造成嚴重後果的錯誤，包括調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他不會允許批評和糾正「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這樣，「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災難便不可能從根本上得到消除，而仍繼續下去。以後幾年裡，中國政局許多重大變故，都同毛澤東這種思想狀況有密切關係。」

同時《毛澤東傳》的作者也認為：「這年上半年，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主要結合落實黨的幹部政策和經濟政策展開。儘管江青、張春橋等人心懷不滿，但許多問題（如一些幹部的解放）是得到毛澤東首肯或是由他本人提議的，加上他們對經濟工作一向很少過問，只得在表面上加以『認可』。這年下半年，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開始深入到教育、科技以及文化藝術等領域，涉及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等敏感問題，江青等便發難了。」但是筆者認為，不是江青等發難了，而是毛澤東一旦發難了，不是連周恩來都轉回身來猛批王若水麼？

1972年的調整，無論如何從哪個方面看，都無法同1975年鄧小平主持的整頓相比。正如「九·一三」之前，林彪和江青等人也提出過反對過「極左」，「九·一三」之後的調整也是延續「九大」以來的政策。所有這些都是對於文革的修補，而不是從根本上否定文革。對於毛澤東而言，任何理論的討論一旦危及到文革的指導思想，是斷然不可能的。周恩來對此是非常清楚的，實際上周恩來同「一塊版」和王若水的信的直接關係都不大，都只是周恩來貫徹毛澤東整頓政策時所做的講話精神的衍生物。正是如此，即使林彪定性改變，糾左還是照常進行。所以張春橋在12月19日對王若水說：「王若水同志的信，引了我的一些話，好像我反對批極左。其實那些話也不完全是我的意思。」亦即張春橋也表態「我並不反對對『極左』要進行完全的批評。」但是這一切到「十大」的時候就開始改變，因為毛澤東的思想在一次反覆了！

五、外交部「153新情況」事件

在毛澤東的主導下，周恩來的具體操作下，外交方面終於取得長足進展。繼我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後，許多國家與我國建交。特別是1972年2月和9月，美國總統尼克松和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先後訪華，當時是十分耀眼的事。但是事情很快起了變化。

事情起源於外交部自己內部的一篇文章。1973年6月16日至25日，蘇聯美國舉行高峰會談。蘇美峰會尚未結束之時，周恩來曾對當時的外交部長姬鵬飛說：「這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要好好研究。」姬鵬飛回部後即找到美洲大洋洲司司長林平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令其加以落實。6月25日，林平和美大司一處(美國處)副處長張再、蘇聯東歐司一處(蘇聯處)副處長田管佩開會商討決定，由張再執筆寫成一篇調研文章，即後來在中國高層釀成軒然大波的《對尼克松一勃列日涅夫會談的初步看法》。該文分析、評述了美蘇簽訂防止核戰爭協定以後的世界形勢認為美蘇會談「欺騙性更大」，「美蘇主宰世界配氣氛更濃」；

有協議比沒有協議更有欺騙性，美蘇的真正愈圖並非是限制戰略性武器。作者最後表示：美蘇兩家誰也欺騙不了，要想主宰世界也做不到。刊登在外交部新聞司的內部刊物於6月28日出版的第153期《新情況》上。周恩來於當天就看到張再執筆撰寫的這篇《對尼克松一勃列日涅夫會談的初多看法》，大為讚賞，立即批示：值得研究。隨後通給外交部值班室打電話，當時外交部辦公廳緒印的《外交通報》也就美蘇會談發表了文章。周恩來在電話裡指示：「《新情況》這篇寫得不錯，《外交通報》的稿子應該照著改！」

7月初，王海容、唐聞生去見毛澤東，一進門就問毛的機要秘書張玉鳳，《新情況》寫得不錯，是根據周總理意見寫的，你給毛主席讀了嗎？張說沒有。於是唐便給毛讀，不料毛聽後提出異議，還舉例說明簡報的分析錯誤，並對外交部的工作提出批評。

7月3日，王海容立即把毛的尖銳批評告訴周。周恩來立刻採取了一系列補救措施。周恩來非常清楚毛澤東這番尖銳的指責完全是衝著自己來的，當日即致信外交部黨的核心小組成員及美大組負責人一要求撤回該期《新情況》，並檢討說：「這個錯誤主要責任在我」，然後又誠懇地寫道：「望你們也應以此為鑒，發揮鑽研商討的積極性，有時也可要求我召集小的會來交換意見。不要怕我忙，為大事而撇開小事，應該學習主席的工作方式。」

7月4日，毛澤東撇開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來，而邀約張春橋、王洪文等人談話，毫不掩飾地猛烈抨擊周恩來長期主管的外交部。為什麼找張王二人呢？毛澤東說的很清楚：「你們兩位是負責搞報告和黨章的」二人又都是年輕人因此「年紀還不大，最好學點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爺們的當，受他們的騙，以至於上他們的賊船。」至於外交部的文件是「（凡是這類）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總理講話也在內，因為不勝其看。」「屁文件」、「照例不看」，毛澤東用同一類的措詞點名批評周恩來，在五十年代批評「反冒進」時就曾使用過。為了不受騙所以「正式勸同志們讀一點書。」例如「郭老現在又說孔子是奴隸主的聖人。」其實郭老「不僅是尊孔，而且還反法。尊孔反法。國民黨也是一樣啊！林彪也是啊！」毛澤東在這次談話中還重提了歷史上周恩來所犯過的錯誤。

毛澤東再次借嚴厲指責第153期《新情況》張再一文對周恩來長期主管的外交部極為尖銳的批評：「近來外交部有若干問題不大令人滿意，」（我）經常吹什麼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忽然來一個什麼大欺騙，大主宰。總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實質。」

最後毛澤東對周恩來蓋棺定論「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搞修正。將來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

但是最嚴厲的批評則是：毛說，外交部是獨立王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要對外交部摻沙子、甩石頭。這不是打倒彭真的語言麼？

7月5日，周恩來將三日寫給外交部核心小組成員及美大組負責人的信和四日外交部的檢討報告，一併送毛澤東閱，並附信說：「這些錯誤與我的政治認識和工作方式有關。」毛澤東在周恩來三日寫給外交部的信上批：「此種頑症，各處都有，非個別人所獨有，宜研究改正方法。」

12日，周恩來約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繼續討論此事，並14日在外交部起草的《〈新情況〉一五三號錯誤何在？》一文做了重要修改：「（美蘇）爭奪是長期目的，是實質，勾結是表面現象，互相利用為自己利益服務，而且勾結是為了更大的爭奪。同時，也會從反面教育出更多的人民覺悟起來，反對兩霸。」第二日，周恩來就將此文送毛澤東審定，並傳部分政治局成員校閱，同時附信提出：「關於錯誤的檢討，我當另寫報告。」當日，毛澤東閱後將外交部文章中「受到中央的嚴厲批評」一句內「嚴厲」二字刪去，並批：「檢討不要寫了。」檢討不要寫，但是要把周恩來所犯錯誤讓更多的人瞭解。根據毛澤東意見，周恩來批告外交部：將《〈新情況〉一五三號錯誤何在？》一文及《新情況》一五三號除發原單位外，加發各駐外使領館，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區黨政軍部門。

7月14日，王海容在一個由128人組成的學習班上，傳達了周恩來的話也是屁話的

最高指示。

究竟出於何種原因使得毛澤東如此大動肝火？

張再說：後來知道來周恩來對國際問題的一些重要講話和自己的文章如出一轍，不僅觀點相同，而且連語言的表達上也何其相似乃爾！說白了，張再的文章其實反映了周恩來的思想！那個時候，毛澤東在不少問題上仍與周恩來有分歧，甚至「不滿」，「《153新情況》事件便是一個最佳的突破口」。

就在這個時期，有人（筆者註：唐聞生）將一些外國雜誌帶給毛看，說外國媒體突出周恩來，很少提及到毛澤東，並提示毛，153號《新情況》的觀點同毛的思想不一致。

《毛澤東》傳記的作者認為是因為周恩來領導下的外交部沒有能夠很好的理解毛本人的外交政策。

1973年2月17日，毛澤東在會見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時首次明確提出「一條線」的構想。毛澤東對基辛格說：「我跟一個外國朋友談過，我說要搞一條橫線，就是緯度，美國、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歐洲。」6月5日，毛澤東會見越南領導人黎筍、範文同時對他們說：「我們外交部發過通報，說是美國的戰略中心是在亞洲、太平洋。後來我得到這個消息，我說不一定。它在歐洲、中東、還有美國本土，問題不少。它總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亞洲、太平洋。它管的地方太多，要收縮一點。而且在你們那裡，吃了虧了。」

因此，7月4日，毛澤東約張春橋、王洪文談話，首當其衝的就是張再一文對於國際形勢的判斷：「外交部有一個什麼《新情況》，先說大事不好，一說欺騙性更大，又說美蘇主宰世界的氣氛更濃。」「中央總是說國內外形勢大好。一個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而外交部說大事不好，欺騙性更大。」美國「究竟重點東移，還是西移，你們討論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點吧！」

這或許是其中的一個原因，後來鄧小平在聯大能把毛澤東的外交思想闡述清楚，對於鄧小平來說得分不少。但是筆者認為，這只是一個借口。

首先是根深蒂固的毛澤東對於周恩來的不信任。此種不信任源遠流長。早在中央蘇區，以博古為首的「三人團」剝奪了毛澤東的軍事甚至行政大權。當初在上海成立「臨時中央」以便協調各地黨組織並負責聯絡在上海的共產國際遠東局，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博古僅僅是因為和叛變的顧順章等人不認識而進入。其後周恩來、王明在強調集體分工時說，博古可多管些工作，但也不是總負責。王明在去蘇聯之前交代：此臨時中央一旦到了有其他政治局委員的地方，要交權出來。這件事情周恩來非常清楚。後來王明在延安時期把此事揭發出來，毛澤東的怒氣可想而知！那段日子對於毛澤東來說是「鬼都不上門」！

其次，林彪事件以後毛澤東的遷怒。林彪是周恩來揣測毛澤東的想法而向毛澤東提議而成為接班人的。同樣這也是毛澤東為打倒劉少奇等採取的最為重要的決策之一。「林彪事件」關係到對於「文革」以來整個路線、方針、政策及措施如何評價的問題。此後，毛澤東向周恩來詢問：「我周圍還有沒有親密戰友式的人物？」周恩來說：「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熱愛毛主席、保衛毛主席，捍衛主席思想，緊跟主席干革命！」毛澤東問江青，江青也如是回答。毛澤東勃然大怒，當初林彪用這麼肉麻的話這麼樣騙我，現在你們和林彪一樣用同樣的話來欺騙我！大陸官方承認「林彪自爆後，雖然眾口一詞都說是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又一偉大勝利，但毛澤東自己，心裡是明白的。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後來回憶說：「林彪叛逃後，主席就大病一場。所以林彪叛逃對主席的健康是有很大影響的。有一次，我們聽見主席又說起『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請自己去』的民諺，心裡就難受。我們安慰主席，主席反而不高興，說：『你們這是違背自然規律，有生就有死，人都是要死的，不死是屁話。』」

毛澤東的這口怨氣，發洩到周恩來頭上，也是找對了人。周恩來也是「始作俑者」之一。

最後，根據材料，雖然具體時間有待進一步考證，有次毛澤東在聽到王海容和張玉鳳讀到西方對於周恩來的讚揚時勃然大怒。毛澤東想讓人知道他才是外交政策的主宰。而正是這種毛澤東的干預才是外交部派別分化的根本原因。

如果說1972年底的關於「極左」還是「極右」的爭論，只是讓周恩來感覺到「蛋炒飯沒有加鹽」，這次7月份的批周則使周恩來充分認識到事情的嚴重性。

據周恩來的醫生回憶：周恩來這幾個月心情不好，拒絕化療，以至癌症復發。

1973年4月15日，周恩來同鄧穎超會見「表妹」王去病時，曾有過這樣一段對話：

周：你在單位裡人家曉不曉得你是我的親戚？

王：我填表時從不填和總理的關係，所以單位裡並不曉得。

周：你為啥不填和我的關係呢？

王：我可以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但在思想上並不能保證永遠跟上形勢，不出差錯。

倘若犯了錯誤，會連累總理的。

周：我也會連累你們啊！

可見周恩來對於當時政治形勢的嚴重看到非常清楚，也從另一方面說周恩來對於自己將來的命運多桀是有預感的。

但是毛澤東並沒有深究下去。

1973年3月29日毛澤東決定周恩來為政治報告起草小組負責人後，周恩來多次主持政治局會議修改「十大」政治報告。但是「十大」的主角不是周恩來，而是新生力量的代表王洪文。在決定「十大」政治報告由誰作的問題上，毛澤東講述了歷史上「劉邦殺白馬為盟，非劉氏不王」的典故。他說：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為什麼不找一個姓「工」的呢？在張春橋的提議下，決定由剛到中央的王洪文向大會作政治報告。直到開會前夕（8月20日），才改由周恩來作「十大」政治報告。但是無論如何，王洪文畢竟經驗缺乏，還需要周恩來的大力幫助。這才是7月份批周嘎然而止的一個重要原因。

六、「十大」的召開與王洪文等人的崛起

本應該在1974年召開的「十大」，提前到1973年來開，一是「林彪事件」之影響所致，其次是在毛澤東看來，毛澤東發動文革防止「變修」而採取的關鍵措施之一就是提撥文革中湧現出來的新生力量，而這正是毛澤東發動文革防止「變修」而採取的關鍵措施之一。

早在1967年，周恩來在接見國防工業口革命造反派代表就講：「要提一批，提到處科級、司局長甚至領導崗位，這是革命需要，還不少，把新生力量提上來，這是運動後期要實現的，在奪權鬥爭中也可以適當進行。抓極少數，罷極少數，調一些，留多數，提一批。這對於「三結合」，改造領導，改造業務有好處。」

八屆十二中全會期間，毛澤東就點名「此人叫王洪文，站起來看看。上海工總司負責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委員會。前年安亭事件是他搞的。」並概歎「這次會，有年青的同志參加很好。但太少了」。「九大」期間，毛澤東再次表示中央委員中絕大多數應該是工農兵，應該是一個工農兵代表的蘇維埃。今後我們提拔幹部，要在工廠、農村中選拔積極分子。借這股東風，王洪文被選進了「九大」的中央委員會。廬山會議和「九·一三事件」後，毛澤東更是多次說要提工農出身的同志為黨的副主席、常委。而在「九·一三事件」前後的王洪文的表現也讓毛澤東滿意。一九七二年七月，毛澤東說：「外國人說我們現在年紀大了，寄希望於年輕人，說是我們死了就會變修。怎麼辦？我的意見就是要搞一點年輕人來當共產

黨的副主席、軍委副主席。所謂年輕人，就是年齡在三十至四十之間，要工人和農民。老年、中年還要。你們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點，用一批知識分子扶助。」

被大陸官方所津津樂道的1972年的4月24日《人民日報》《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社論，是由周恩來親自審稿的。社論亦提出：「經過長期革命鬥爭鍛煉的老幹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湧現出來的新幹部，都是黨的寶貴財富。」在1973年，年齡上的「老、中、青『三結合』」正式代替了文革早期各級領導機構組建的時候曾經提倡的「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和革命群眾代表『三結合』」（實際上是老官員、軍人和造反派代表的結合）。正是在這種大的背景下，以王洪文、陳永貴、吳桂賢、倪志福等一大批新生力量被結合到中央領導班子裡面。

親歷者王殊回憶：1972年7月被從德國緊急召回後，在7月24日被毛澤東接見。毛澤東談到國內問題時，看得出來他最關心的是重建在「文革」中遭到破壞的各級政府和黨的機構，克服國內的混亂狀態，恢復正常的秩序。他著重談到了培養接班人的問題，對總理說，你要到全國各地去，在工農兵中好好找一找，找一些人來擔任我們黨中央的副主席、政治局委員，政府中的副總理、副部長，全國人大的副委員長等。要盡快地去走一走，在工農兵中找一些有代表性的，年紀輕一些的，當然也要顧大局的。要認真地找一下，把這樣的人找到。……兩天後，周總理召集我們和某些部門的領導同志學習毛主席的這次談話。在談到從工農兵中找人的問題時，總理提到了當時一些工農兵代表人物的名字，說這些人在群眾中是有一些威信的，但他們的文化水平太低，要擔任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估計會有很多困難。可能要辦一個學習班，讓他們學點理論，學點文化知識，並且總結一點經驗教訓才好。後來，周總理經毛主席同意，辦了幾期中央讀書班。調來了一些工農兵代表人物——這個很重要的參加，但也混進了一些造反派。舉辦讀書班的時間不長，在1973年8月舉行的中共「十大」和1975年1月召開的四屆人大上，一些參加讀書班的人擔任了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

1972年9月，張春橋打電話通知王洪文移交工作，調他到北京學習一段，帶好衣服和生活用品，可以帶一名秘書。周恩來安排王洪文住進釣魚台九號樓，和張、姚住在一起。毛澤東特意關照周恩來「傳幫帶」。自此中央政治局的小型會議，中央處理七機部問題的會議，解決河南兩派的會議，甚至包括絕密的討論……總之，凡是周恩來主持的會議，都通知王洪文參加，並讓他發表意見。1972年11月，張春橋到上海，對馬天水、王秀珍、徐景賢說，洪文在北京，比我和文元都忙，我們只參加政治局的活動和中央的會議，他呢，總理開的會，他都要參加，國務院那一坨，中央軍委那一坨，甚至連國家計委的會議，都請他去參加。而且他的文件也比我們多，總理指示，各個口都要向他送文件，他看都看不過來……看樣子，洪文回不來了。張春橋宣佈，經與姚文元和王洪文商量，上海的日常工作由馬天水主持。此後，由周恩來、王洪文聯合署名向毛澤東報告，周、王一起準備四屆人大，周恩來、王洪文一起渡過了一段比較愉快的合作時光。對於周恩來的提攜和幫助，王洪文也是報恩的。

1973年7月份，毛澤東對周恩來大發雷霆，怒到「外交部的文件是『（凡是這類）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總理講話也在內，因為不勝其看。」的地步，可是「雷聲大雨點小」，為什麼？「十大」要召開，王洪文要周恩來的「傳幫帶」，在這個時機上，毛澤東批周的風波注定是小打小鬧。但是毛澤東沒有忘記，不僅在「十大」上點了周恩來的問題，而且「十大」結束不久，就抓住了機會，在十一月份所謂「幫周會議」就上演。周恩來到達了人生的低潮。

1972年12月28日北京軍區黨委會議結束，周恩來、葉劍英、李先念、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中央首長接見。葉劍英突然在講話中提到接班人問題：「主席從64年起就講接班人。在座的王洪文同志，貧農出身，參加抗美援朝，又當過工人，三十多歲；主席早就注意了，要培養。」周恩來的講話更直接：「毛主席說，外國人說我們年紀大了寄希望於年

輕人其實老的中間也有『修』的。我（毛）的意見是要搞些年輕人當軍委副主席、黨的副主席。」接著周恩來說：「我講一講，讓你們有個精神準備，讓你們震動一下，看你們受得了受不了。年老的容易保守、自滿，也會摔跤。主席講年齡要在三十歲到四十之間，工人農民。」王若水回憶：這時全場的眼睛都注視著坐在主席台上的王洪文。

然而讓人容易忽視是另一個方面—王洪文的獨立性。雖然王洪文和張春橋的關係非常深，但是關係卻非常緊張。雖然王洪文是張春橋的下屬，但是卻敢頂撞張。特別是分別作為王洪文的在上海的代言人上海革委會第三副主任王秀珍同代表張春橋的第二副主任徐景賢有激烈衝突。這是毛澤東非常看重的一點。為此，毛澤東還要做張春橋的工作。毛澤東當面對張春橋說，王洪文當過工人，當過兵，當過農民，他的條件比你我優越，我們要瞭解工農兵，還要搞調查研究，他自己做過工當過兵了，已經具備這種條件。但是後來王洪文卻喪失了這種獨立性，是導致其失寵的重要原因之一。

1973年5月，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十大」準備工作。周恩來宣佈，根據毛主席的提議，政治局決定把王洪文調到中央工作，並被宣佈正式參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比鄧小平的級別要高一筆者註）；由王洪文負責黨章修改小組，起草修改黨章報告，並提出新的黨章草案。

1973年8月2日，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會議決定：中央「十大」選舉準備委員會可先開預備會議，草擬各項人選名單，此事擬由王洪文為主，張春橋、紀登奎、李德生為副進行工作。4日，致信毛澤東，報告政治局會議議定各事。隨後，周恩來連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王洪文主持下的中央「十大」籌備小組提出的「十大」選舉準備委員會名單和「十大」主席團名單。1973年8月13日，周恩來與王洪文聯名致信毛澤東，報告幾天果政治局會議討論情況，並附上兩份名單。信中提出：「為使籌備和準備工作銜接得好，（選舉準備工作委員會）主任仍為洪文同志，副主任七人（即周恩來、康生、葉劍英、江青，張春橋、紀登奎、李德生），均是在京政治局同志。」毛澤東表示同意。周恩來成了王洪文的副手。

8月20日，「十大」選舉準備委員會開會，毛澤東讓周恩來傳達他的指示，要重視提拔新生力量。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由王洪文擔任選舉準備委員會主任，周恩來、康生、葉劍英、江青、張春橋、李德生任副主任。周恩來宣佈完，立即從主持人的位置下來，讓王洪文接下去主持。

毛澤東選中王洪文，高層阻力很大。「十大」召開前，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黨中央副主席的預選名單，周恩來傳達了毛澤東的提議，王洪文擔任黨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周恩來之後，康生、葉劍英之前。周恩來重申了毛澤東對王洪文的評價，工農兵幹部……比較全面，還主持過上海市革委會的工作，調到中央以後表現也是好的，所以要提拔這樣的年輕幹部……但周恩來說完，政治局委員誰都不吭聲，張、姚不好搶先表態，坐在一邊的王洪文十分尷尬。許世友表示就表態說：「我看只要一個副主席就行了！」葉劍英表態：重視提拔年輕幹部，是主席的一貫思想，早在60年代，主席就多次說過，群英會中諸葛亮只有27歲，孫策小霸王17歲，周瑜當大都督時也只有30歲……我們這些人當軍長師長時，有的還不到20（歲）。現在王洪文同志已經38歲了，我擁護主席的提名，贊成王洪文同志擔任黨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總理之後。一席話扭轉局勢，王洪文勉強躍升到黨內第三位。

許世友的態度，也代表了很多老幹部的意見，對於「乘火箭」進入黨中央核心並在「十大」籌備工作中身居要職的王洪文強烈不滿。為此，毛澤東決定有必要再召集出席「十大」的中央和地方負責人開會，以便「打通思想」、「統一認識」。

1973年8月23日，周恩來主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黨政軍機關負責人協商中央領導機構成員的會議，並發表了重要講話。周恩來傳達、解釋了毛澤東關於老、中、青「三結合」的組織路線，說明自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後，毛

澤東多次表示要培養工人出身的王洪文做中央領導工作的意願。提出：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應重視選拔青年幹部，不能看不起「兒童團」。我年紀大了，但我還是要為黨鞠躬盡瘁的；我們是立黨為公，不是立黨為私。

在此次講話中，周恩來還說：政治報告署了我的名字，但不是我寫的，是張春橋按照毛主席的思想、路線起草的，經毛主席看過。報告是毛主席的思想，主席要我作報告。

此話後來被大陸黨史界廣為引用，以證明「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都是正確的，仍舊號召全黨『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十大」政治報告同周恩來無關。更有甚者，提及此報告時，絲毫不提做此報告者周恩來的名字，反而特意點出該報告的起草者張春橋等的名字，為「尊者諱」的地步，令人歎為觀止！

根據《周恩來年譜》記載，1973年3月29日，毛澤東決定周恩來為政治報告起草小組負責人。1973年6月16日，周恩來去毛澤東處談黨的「十大」政治報告起草問題，次日，致信張春橋，轉告毛澤東對「十大」政治報告的意見。1973年7月3日，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修改黨的「十大」政治報告草稿和修改黨章報告草稿。次日，將兩件草稿討論情況及其它「十大」準備工作情況書面報告毛澤東。1973年7月5日，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對「十大」政治報告草稿中國際形勢和任務部分進行討論，提出修改意見。1973年7月6日，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宣讀、討論「十大」政治報告國際形勢和任務部分，並商定由張春橋、姚文元再加斟酌後，印成修改送審稿報送毛澤東。周恩來的事無鉅細，事必親躬的做事風格，怎麼就會在「十大」政治報告上消失了呢？周恩來為什麼這麼講？筆者認為，既然毛澤東剛在7月份指責周的文件為「屁文件」，周恩來自然要替毛澤東圓場。

8月24日，周恩來在中共「十大」全體會議上代表中央作政治報告。當周恩來讀到「應當強調指出：有不少黨委，埋頭日常的具體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這是非常危險的。如果不改變，勢必走到修正主義道路上去。」時，毛澤東插話說：「對。」這實際上針對周恩來的批評。

繼5月份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宣佈「解放」譚震林、李井泉、烏蘭夫、李葆華、廖志高（候補）、江華（候補）、江渭清（候補）、王稼祥、秦基偉、李成芳、方強、陶魯笏、曾希聖等十三名老幹部之後，在「十大」上，鄧小平、王稼祥、烏蘭夫、李井泉、譚震林、廖承志、李葆華、秦基偉、陶魯笏等人被選為中央委員，廖志高、江華、江渭清為候補中央委員。而其中的李葆華、廖志高、江華、江渭清、陶魯笏、秦基偉、李成芳、方強等人很快被任命到各省、國務院各部和軍隊。

毛澤東寄希望這些老革命幹部不計前嫌，能和新生力量攜手共進。「十大」的政治格局完全體現了毛澤東的想法。「十大」之後，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處找吳德等談話，提出要扶助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等人，他指著房子外邊菜地裡的一些蔬菜比喻說，就像培植它們的生長一樣。王洪文在「十大」上做的修改黨章的報告同樣表達了毛澤東的願望：「在討論修改黨章過程中，許多老同志都有一個強烈的願望，要求進一步做好培養接班人的工作，使毛主席領導我們黨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後繼有人。許多年輕同志也熱烈地表示，經過長期革命戰爭和革命鬥爭鍛煉的老幹部，有豐富的經驗，要虛心學習他們的長處，嚴格要求自己，努力接好革命的班。新老幹部都表示要互相學習，取長補短。」1973年年底，毛澤東還就謠言「打掃廟宇，請進真神，老師歸位，小兵回營」進行了駁斥，應改成「打掃廟宇，請進真神，老師歸線，小兵提升」。

從1973年9月12日，一直到1974年5月底，毛澤東16次會見重要外賓，都由周恩來和王洪文陪同。在「十大」前後的周恩來的職責就是「培養」王洪文，因此兩人的交往特別密切，相比之下，同時期的周恩來和鄧小平的交往卻幾乎沒有任何記載。當毛澤東要求王洪文、張春橋學習英語，免得上了「那些老爺們的當」時，王洪文真的從上海復

旦大學外語系找了一個姓黃的教員，教他英語。但是王洪文卻沒有在外交部「插一腳。」

中共「十大」以後，周恩來寫給毛澤東的重要報告，都由周恩來起草而和王洪文共同署名。在周恩來病重的時候，也是由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無論是流傳頗廣的聲稱周恩來在1974年6月1日才離開西花廳到305醫院就是因為要等鄧小平從聯大歸來，還是鄧穎超的說法都是站不住腳的。周恩來去世數年後，鄧穎超才向身邊工作人員透露，周恩來為什麼一再推遲住院治療時間的緣由，她說：「恩來一直對小平的事情放心不下，他擔心江青那夥人乘他住院時間對小平同志下手，所以他不能離開工作崗位去住院治療。」因為在周恩來在離開西花廳之後，是由王洪文接周的班主持的中央日常工作。

在鄧小平出席聯大的風波中，王洪文是非常配合的。3月25日，周恩來就和王洪文一起提議請示毛澤東，由毛最後定奪。只是毛澤東當天太累，未能面談。但是毛澤東讓秘書傳話給周恩來、王洪文：關於鄧小平出國一事，他是個人意見，如果政治局大家都不同意，那就算了。周恩來聞訊當即表示：將於明日向政治局傳達，並對有關同志做工作。王洪文也作了一番表白：原先他並不清楚，既然毛主席這樣說了，當照此辦理。周恩來隨即乘熱打鐵，委託王洪文與張春橋、姚文元談談，做做工作。3天後，中央政治局再次開會，商討對鄧小平參加聯大會議的方針問題，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均稱病缺席但是王洪文參加了。

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在其回憶錄裡談到：1974年4月的一天，周恩來正在輸血，王洪文的秘書打電話來要求周恩來去參加會議。周恩來不得不拔掉針管，趕去開會。主流媒體紛紛渲染此事是「四人幫」故意干擾，使周恩來不得安寧，是一種非常殘忍、毫無人道的迫害行為，是對周恩來了肉體和精神上的雙重打擊。

筆者認為這是一種非常不公平的說法。首先，《周恩來年譜》明確記載了自1974年1月至5月，根據有關記錄統計，周恩來在五個月共計一百三十九天的實際工作量为：每日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時有九天，十四至十八小時有七十四天，十九至二十三小時有三十八天。連續工作二十四小時有五天，只有十三天的工作量在十二小時以內。此外，從三月中旬到五月底的兩個半月內，除日常工作外，周恩來共計參加中央各種會議二十一次，外事活動五十四次，其它會議和談話五十七次。根據王力回憶，在文革早期碰頭會的時候，只要通知周恩來，周恩來沒有不到的時候。張佐良同時也寫道當時周恩來就表示「不悅」。

其次，張佐良同時講，是鄧穎超寫了紙條要求周恩來去參加會議，而不是向王洪文說明周恩來正在輸血。說明知周者，鄧穎超也。就是作為秘書的紀東也沒有向王洪文說明情況。因為作為周恩來的工作人員，都知道周恩來的工作習慣。

最後，王洪文對於周恩來的健康是非常關心的。看過王洪文在周恩來的醫療報告上的批示的人說：從批示可以看出王洪文真的對周恩來的健康很關心，很焦急，不是造作的。此次通知開會，王洪文或許並不知道周在輸血當中。後來王洪文對於「長沙告狀」一事說：

關於這次告總理狀的問題，最近我又反覆回憶，並沒有在主席前說總理的壞話，因為在這個時期，我沒有同周總理有過任何分歧，總理也未批評過我，我沒有理由告總理的狀，我當時的思想活動，只是認為總理生病，沒有很好休息，還在指揮工作，這個我在政治局幾次會上講過，而且採取措施，如少批送文件給總理，動員大家少去看望他，這個思想在醫療小組也提過，同周本人也講過，關於總理有病不休息的問題，我以前曾向主席「告狀」過，第二次去長沙，我還向主席講過，這個思想被總理阻止，後來總理說我干擾了主席。

最為明顯的是在1973年的兩次批周過程中，王洪文都無批周的言語，並且主持會議的時候非常公道，不似江青和王海容、唐聞生兩位小姐等人（包括李先念、耿飆、許世友、喬冠華等人），上竄下跳，活躍的很。章含之甚至說，王洪文是持中立態度的，沒有在會議上添油加醋，而且還在江青太過分的時候制止她，不讓她亂講。在後來的四屆人大準備過程中，王洪文和周恩來的配合也非常的好。

一位資深黨史專家說，王洪文對於周恩來非常尊敬，在1975年年底的時候，周恩來

還建議王洪文同江青聯繫少一些為好。因此筆者認為，後來王洪文和周恩來的關係在文革後時期被大大歪曲。

1970年夏天，由周恩來直接提名，委任王海容擔任外交部禮賓司「負責人」。1971年7月，王海容被正式任命為禮賓司的副司長。1972年，王海容被提為外交部「部長助理」。再過一年多一點，王海容被任命為外交部副部長。顯然，這些都是周恩來一手操作。王曼恬在1970年就進入國務院科教組，也只能是因為其和毛澤東的關係才被周恩來「塞進」去的。

在文革後期大出風頭的毛遠新在文革初期就是周恩來的聯絡員。閻長貴回憶：1967年春夏，毛遠新回到北京後，住到釣魚台十一號樓（江青住的樓）。毛因為他到少數民族地區造過反，要他讀點民族問題的書，研究一下民族問題。為此，我（當時任江青的機要秘書）還幫他從《紅旗》雜誌圖書室和中宣部圖書館借了十幾本關於民族問題的書（主要是列寧的）。在這次交談中，我問他，在1967年的時候，我經常看到周總理轉來你寫的信讓江青閱，怎麼沒看到你給江青寫信啊？他告訴我，他從參加「文化大革命」起就是周總理的聯絡員。這是他在「文革」中第一次當聯絡員。更為蹊蹺的是，毛遠新到遼寧任職一事。

余汝信先生在《〈陳錫聯回憶錄〉的弦外之音》之中論述到：

1968年5月8日，中央同意成立遼寧省革委會，在中央的批示中，毛遠新列名為副主任，排名第七。經查證檔案資料，毛遠新被安排至遼寧任職，並非瀋陽軍區或陳錫聯本人主動提出，前於4月22日，陳錫聯向中央、中央文革並軍委辦事組提交《關於籌建遼寧省革命委員會的初步意見（第二次修改稿）》，這是陳關於此問題的最後一個報告，共有三大點意見，提出了省革委會中地方幹部、軍隊幹部、群眾組織代表的人選，其中完全沒有提及到毛遠新的名字。

但是在1968.05.08；中發〔68〕70號於關於成立遼寧省革命委員會的批示中云：中央同意中共瀋陽軍區委員會五月七日關於成立遼寧省革命委員會的報告。而在此報告中，對成立省革命委員會提出如下建議，其中第3條：

3，建議省革命委員會由陳錫聯同志任主任委員，李伯秋，楊春甫，王良，楊迪，楊棄，毛遠新，尉鳳英（女），任寶成，王鳳恩，劉忠禮，於桂蘭（女），張治國，魏禮玲，郝義田，劉盛國等十五名同志任副主任委員（暫缺工人副主任一名）。

中共瀋陽軍區委員會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

余汝信先生說：有關毛遠新事，我在遼寧省檔案館中並無看到瀋陽軍區68.5.7報告原件。從軍區5.7報告中央5.8即批復來推測，該報告將毛列為副主任應是中央的授意並非瀋陽軍區主動提出，否則很難解釋為什麼陳4.22未提而軍區5.7提出第二天中央就批了。在當時情況下，甚至報告本身中央都可代擬的。需要說明的是因未看到報告原件，以上所說，只是一種推斷。筆者認為余汝信先生所言有理。筆者更是大膽推測，此實乃周恩來揣測毛意而提出。當然此說法仍然需要檔案材料來證明。

作為「文革中的紅人」謝靜宜同周恩來的關係也是非同小可。毛澤東的私人保健醫生李志綏在其回憶錄中隱去謝靜宜她的名字，但在英國廣播電台的訪問談話中透露，謝是毛的女人之一。早在文革之前，她就在中央辦公廳為毛舉辦的舞會上被毛選中，據李志綏透露「毛同她很好」。一九六七年七、八月，毛說要南下去長江游泳，指名要代總參謀長楊成武陪同前行。行前，周恩來告訴楊成武，中央決定由他擔任周和毛的聯絡員，並告他：「要中央機要局送兩名譯電員跟你去。」據楊成武回憶：「中央機要局送來的兩名譯電員，一名是廣東人，一名就是長春機要學校畢業、分配到中央機要局工作的謝靜宜。」曾任北京市委書記的吳德在其口述史《十年風雨紀事》，談及謝到北京市委任職的經過：「在這裡就有必要談一下謝靜宜的情況。大概在1973年時，謝靜宜調到市委任書記處書記，她是中辦機要局的人，與

毛主席很熟。謝靜宜調來前，是周總理與我談的話，周總理說，就派謝靜宜任市委書記處書記，可以經過她向毛主席反映一些情況，傳達毛主席的指示」。吳德還提及1974年下半年籌備四屆人大時：「周總理還提出謝靜宜任副委員長，他找我徵求意見時，我表示同意」，而「毛澤東在批閱人大和國務院的人事安排名單時，才把謝任副委員長劃掉了」。而在「十大」上，謝靜宜已經是中央委員！周恩來「投毛所好」，不能說一點沒有吧！

七、嚴厲的批周會議

毛澤東晚年對於功高震主者極為敏感，無論是劉少奇還是林彪（1號號令）都在這上面摔了跤，如今輪到了周恩來。毛澤東對周恩來從來就不信任，外交上打開局面以後周恩來在國際上的名聲越來越大，毛由此而產生出來的嫉妒，終於在1973年11月份忍耐不住而爆發。這就是嚴厲批判周恩來的所謂「幫周會議」。其借口僅僅是周恩來在同來訪的基辛格的會談中立場不穩，並且私自作出決定。事實上周恩來，無論從程序上，還是具體操作上，根據美國解密檔案，均無問題。毛澤東透過江青之口，透露出此次實為第十一次路線鬥爭，以至於周恩來的衛士都想到可能被送進監獄。但是此時的毛澤東已經沒有文革初期的勇氣，而且「林彪事件」剛過去不久，中國的社會也經不起大幅動盪。再加上鄧小平和王洪文的聯手格局尚未形成，這次「幫周會議」終於沒有進行到底。但是毛澤東在批林批孔運動中並沒有放過周恩來，事實證明，周恩來一天不死，毛澤東對周恩來的批判就不會中止。

1. 批周的借口

1973年11月，基辛格第六次訪華。此時，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還中國，政治局勢都已大大改變。在美國，尼克松陷入「水門」醜聞。在中國，5月份，毛澤東首次提出「批孔」；7月份周恩來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指責，8月份，的中共「十大」上王洪文的接班人的地位確立；到了11月，批林批孔的文章已經是日漸增多，所有這些都嚴重的削弱了周恩來的權威和地位。周恩來變得更加小心與敏感。江青在11月13日向周恩來提出，原為對外友協編印的《外事活動簡報》只印發周恩來、江青二人事，現在「這類簡報，建議也送春橋，文元同志。」當日，周恩來就批告外交部：「請從今起，外事活動簡報，一律印送主席、政治局在京全體同志，及有關各部、委、組，望通知友協照辦。」

在這次訪華中，周恩來與基辛格在5天裡共會面10次，除去兩次禮節性的宴會和陪同毛澤東的1次，共會談7次。就在11月14日基辛格離京的當天晚上，毛澤東就把王海容、唐聞生找去「談話」，並讓她們立即整理出周恩來與基辛格的談話記錄。15日早，王海容、唐聞生拿著周、基最後一次會談的記錄稿，將劃有槓槓之處念出來，問周恩來：「您是這樣講的嗎？」周回答：「對，這是記錄稿嘛，我就是這個意思。」筆者認為對於無論是王海容、唐聞生還是周恩來都認為是「技術」問題。特別是王海容和周恩來的關係如此親密的情況下（見前文，王海容向周恩來私下透露毛對張再一文的不滿），毛澤東在沒有拿到具體的證據之前是不會「打草驚蛇」的。對於王、唐來說，在未得知毛的確切表態之下，也不可能向毛澤東歪曲匯報。毛澤東拿到王、唐同周核對之後的談話記錄後，根據張玉鳳的回憶：唐說，那就怪了，這麼大的事，總理為什麼不請示主席，也沒和政治局其他人商量，就急忙去見基辛格，答覆建立核保護。筆者認為這只能是毛澤東的授意下，唐聞生等人的四處散風，造輿論。事實上，當唐聞生和王海容兩位小姐把周同基辛格談話記錄送給毛後，毛當場就說：美國人要借給我們一把傘，這把傘叫核保護傘，這把傘我們是不能要的。還說：果真蘇聯打過來，就知道誰是敢打的，誰是要投降，當兒皇帝的。

關鍵的問題有二個，第一個：周恩來為什麼沒有報告毛澤東？第二個，所謂的「核保護

傘」的真相是什麼？

關於報告毛澤東。13日晚，當基辛格提出臨時動議後，周因事起倉促，來不及請示毛，而作為東道主也不便回絕客人的提議，便連夜與基辛格就中美雙方軍事合作的問題又舉行了一輪會談。當時只有中方的翻譯唐聞生和美方的溫斯頓·洛德在場。會談結束後，周當場並沒有表態，只是表示要請示報告中央，在基辛格早晨登機前再給予答覆。當晚的會談一直進行到0時30分。結束後，周恩來對喬冠華說，現在太急了，基辛格的問題要馬上答覆，要報告主席。周恩來立即打電話到毛澤東的住地中南海的游泳池電話，不料那邊告知：「主席才睡，服了幾次安眠藥才睡著的。」周恩來的衛士長張樹迎說：總理打了電話了，當時主席在睡覺，時間又不能等。周恩來此時非常為難，一個原因是睡眠對於晚年毛澤東來說，是件非常痛苦的事，好不容易睡著了就決不能被叫醒，因此當毛睡下以後，周一向不去打擾，其次此事情又十分緊迫，在毛澤東醒來之前基辛格就會離開，因此周恩來急的在辦公桌旁「團團轉」

文革發動之初，7月18日晚，劉少奇知道毛結束南方巡視，從武漢回到北京時，立即趕到豐澤園，想向毛匯報，但是門口不讓進，說主席需要休息，實則不然。這次是不是故伎重演呢？

關於核保護傘。根據1999年美國國務院宣佈解密的中美關係檔案，美國確實有一個「核保護傘」計劃。11月10日晚，周恩來、葉劍英與基辛格、同行的官員洛德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第一次單獨會談。基辛格主動向周恩來提出可以向中國提供情報，使得中國在遭到蘇聯突然襲擊時減少軍隊傷亡和並提供提前報警的技術，並表示可以由隨行的豪爾司令來具體介紹。這件事只有四五個人知道。周恩來向毛澤東匯報後，毛澤東表示現在這事不急，可以以後再討論。但是在12日，基辛格和毛澤東的會見中並未就此事直接交流。

11月13日晚，基辛格表示除了提供情報、在裝備上及其他方面給予援助之外，還提出準備在美國衛星與北京之間建立一條熱線，重點在於將情報快速傳遞給你們，這樣幾分鐘之內就可以將消息傳給北京，雙方還可以就防止突發性核戰爭上簽署協議。基辛格特別強調：這不涉及任何互惠或任何正式關係，而是基於我們的經驗及若干常規情報而做的建議。周恩來表示：至於你希望討論的特殊議題，我們必須研究一下。明早在你離開之前，我將去拜訪並送行。我想，有些事我們雙方都用得著。雖然在戰爭中，人的因素是決定性的，但現實問題同樣舉足輕重。無論如何，周恩來表現出了熱情，這或許被指責在「中美情報合作提議中表現太慷慨」的緣由？

14日早上7時35分，周恩來與基辛格舉行了最後一次會談。基辛格留下了兩份協議，一份是關於建立熱線，另一份還包括共同防止蘇聯襲擊的內容。周恩來說：如果如你所提議的，能夠在預警措施上合作，對我們在情報上會有大的幫助，當然，這也包括通訊網絡。可是要做得不讓人發現我們的合作關係。基辛格：總理先生，要秘密地建立一條熱線是不可能的。但是一旦建立起來，其特定用途，應該是可以保密的。針對美方提出的需要繼續商議的有關雙方合作的幾個具體建議，周恩來沒有給予肯定的回答，只是說：「我們還要考慮」，「要報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決定」。但是同時周恩來同意指定黃鎮繼續與基辛格交換中美情報合作問題。在毛澤東的眼裡，這就是沒有事先獲得毛的同意，亦侵犯了毛的權威。

早在1972年1月初，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黑格率先遣組來華，除了為尼克松及其訪華的大隊人馬進行技術安排之外，還負有一項特殊使命，就是受尼克松和基辛格所托向中方轉達一個重要口信。該口信在對國際局勢、印度和巴基斯坦衝突、越南戰爭和蘇聯威脅做出一番分析後得出下述結論：「蘇聯企圖繼續包圍中華人民共和國……由於美國對中國的生存能力表示懷疑，所以美國準備力圖抵消蘇聯對中國的威脅，以維護中國的獨立及其生存能力。希望通過這次訪問，加強尼克松總統的世界領袖的形象，這對雙方都是有利的。」對此，周恩來給予強烈反擊。1月6日深夜11時30分，周恩來、葉劍英會見黑格及其所

率先遣小組一行。周恩來表示：美方對中國的「生存能力」表示懷疑，並聲稱要「維護」中國的「獨立」和「生存能力」的說法，令人驚訝。中國認為，任何國家決不能靠外力維護其獨立和生存，否則只能成為別人的保護國或殖民地。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是在不斷抗擊外來侵略和壓迫的鬥爭中誕生和成長起來的，並一定會繼續存在和發展下去。

周恩來對於國家主權是非常敏感的。

周恩來在首次同在基辛格談完有關台灣問題後，周特意審查了翻譯唐聞生給毛澤東的會議記錄，而且是和唐聞生一起向毛澤東做的匯報。但是周恩來的看法和毛澤東還是有點不同就是，周認為有兩種可能性，這導致了12日毛澤東同基辛格會談時候指桑罵槐，表示了對周的不滿。毛澤東對基辛格說：「只要你們跟台灣切斷外交關係，就有可能來解決我們兩國之間的外交關係問題。這跟我們和日本之間的處理方式是一樣的。至於我們跟台灣之間的問題，就相當的複雜。我不相信會有和平解決方案。」此時毛澤東問姬鵬飛說：「你相信嗎？」這或許是周在台灣問題上表現軟弱的來由？

陳東林先生認為：這次會談中，周恩來是遵循毛澤東的「一條線」策略進行的，他堅持了中國獨立自主的原則，更沒有在台灣問題上放棄什麼。同時，周恩來也確實對美方提議表現出了一定的興趣，雖然他沒有做明確的許諾，也表示要請示毛主席才能決定。美方雖然有個「核保護傘」計劃，但基辛格鑒於以前黑格提出「保護」被中方怒斥的教訓，只謹慎地提出了建立熱線的建議，也沒有要求任何交換條件。今天看來，如果在平等基礎上中國能夠得到一些有重要價值的軍事情報，自然對國家安全有利，何樂而不為？畢竟中美兩國在1988年還是建立了熱線。當然，美國也可能企圖用一些信息來誘導中國，但畢竟判斷權在中國。這談不上接受美國的「核保護傘」。而且基辛格強調：這不涉及任何互惠或任何正式關係，而是基於我們的經驗及若干常規情報而做的建議。

50年代，蘇聯同時考慮到將來如果打仗的話，中蘇共同的敵人是美國。因此依次向中國提出建立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問題。但是這遭到了毛澤東的強烈反彈。毛澤東把尤金召到中南海去談話，指責蘇聯，發洩他長期以來積壓的對蘇聯領導人，特別是斯大林的不滿情緒，包括毛澤東第一次訪蘇時，斯大林在中國使館安裝竊聽器；蘇聯前任大使羅申在中國外交部發展情報員；貝利亞與高崗勾結，多次派人與高崗聯絡；蘇聯駐新疆領事館通過非法渠道收集情報等等。蘇聯人的印象是毛澤東整整講了一天。

現在是美國向中國提議，共同對蘇聯，要提供裝備，要建立熱線。毛澤東本就對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曖昧態度感到不快。現在美國是不是要利用蘇聯壓力打「中國牌」？像蘇聯一樣利用長波電台、聯合艦隊來控制中國？直到1975年6月，毛澤東對美國人的建議仍然耿耿於懷。他會見岡比亞總統賈瓦拉時說，美國人想賣傘給我們，送給我們「保護傘」，我們說：非常感謝，我們不要。

但是毛澤東的不可能找到一個類似尤金的美國人喋喋不休的罵上一天，例如找基辛格？伴隨對美國的強烈不滿，夾雜著長期以來對周恩來的憤恨，周恩來成了坐在中南海邊上的「尤金」。有沒有向毛報告都是整周的借口，真正不滿的是周因為外交的成功而在國際上獲得的巨大聲望；同時在國內因為糾左、解放老幹部導致周成為老幹部和普通群眾中的代言人。古話說的好：無心插柳柳成蔭。所有的這一切，受到壓迫的毛澤東在基辛格一離開中國，就開始「升帳點火」，周恩來進入了人生中的最低潮。

2. 批周的過程

11月17日，毛澤東親自出馬，在召集周恩來以及外交部有關人員的談話中，嚴厲批評這次中美會談公報「並不怎麼樣」，說：有人要借我們一把傘，我們就是不要這把傘，這是一把核保護傘。毛並放出狠話：「當著你們的面講，政治局開會，你們可以來，在後面

擺一排椅子，誰要搞修正主義，那就要批呢！你們要有勇氣，無非是取消你們的職務。」

由於周恩來開始拒不承認其在中美會談中對美國犯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會議相持不下。於是毛澤東決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從1月21日至1月25日召開擴大會議，對周恩來展開了前所未有的批判鬥爭，主題為「批判周、葉的修正主義路線問題」。外地的政治局委員也飛來參加批鬥，許世友等人就是連夜趕來的。

周恩來的衛士高振普認為：「中美、中日關係的大門打開了，他們認為總理這頭『老黃牛』也沒有用處了，像要動手殺『牛』了。」另外，「十大」已經召開完畢，王洪文也可以主持政治局會議了，真的要卸磨殺驢了麼？

會議對於周恩來的摧殘是雙重的，身體上的，更嚴重的精神上的。高振普回憶：總理病情明顯加重，尿血量增加。跟隨周恩來多年的衛士長張樹迎回憶道：總理有近半個月的時間神情憂鬱，落落寡歡。那些天中南海（實為人民大會堂）裡天天開會，每次開會回來總理面色都很不好，但他什麼話也不說，只是飯量銳減，常常一個人默默地坐在那裡想心事。

作為周恩來的醫生、衛士等充分知道了什麼叫世態炎涼。往日誰見了周恩來都會熱情的打招呼，現在有些人則竭力迴避，即使迎面相遇，也是冷若冰霜。周恩來在家裡偶爾和鄧穎超同桌吃飯，也是相互不講話，西花廳氣氛異常沉悶。平素很受人重視的周恩來身邊的工作人員無人在給予他們應有的禮節性問候，他們成了不受歡迎的一個小集體。張樹迎對張佐良說：「佐良啊，咱們得有思想準備，說不定哪一天給咱們帶上手銬，用吉普車把我們送到什麼地方去了，連家裡老婆孩子都不知道！」只有葉劍英、紀登奎表示對周恩來的關心。

會場內的周恩來也是孤立無助，當求助他人幫忙時，得到的一頓訓斥。周恩來因病右手發顫，拿不住筆，所以，請那位常去西花廳的小姐幫助他記一下，哪知道這位平時笑容可掬的女同志立馬杏眼圓睜，厲聲的指責：「怎麼？你想秋後算帳？是批你還是批我？自己記！」她們的發言是慷慨激昂、無限上綱唯恐批的不徹底。

各位「無產階級革命家」紛紛赤膊上陣。許世友，在椅子上不安分的跳上跳下，用手指著周說：告訴你，總理，如果蘇修打進來，美帝打進來，你如果想要做兒皇帝，我告訴你中國人民解放軍不會允許你的，不會放過你的。葉劍英說他和那些所謂的「投降主義」、「修正主義」都沒什麼關係，參加基辛格的軍事會談是周恩來同志叫我去的。葉劍英還衝著周恩來說：總理，都是你呀！把我拉進來了。你看現在犯了這些大錯誤，我的心情也很沉痛，可這些事都是你拉著我的呀，不然的話我也不會參與這些事了。李先念也直說總理都是你呀。耿飆則指責周恩來把外交部搞成自己的獨立王國，在黨內搞宗派。耿飆還藉機說周恩來用外交部排斥中聯部，中聯部是張春橋領導的，因此矛頭是對著張春橋的。喬冠華則指責周同毛主席唱對台戲，對抗中央，凌駕於主席、中央之上，並稱周管外交部管了29年，不原原本本的告訴我們主席的指示，不知道什麼是主席的，什麼是他自己的，自己說了算。喬冠華還說周的錯誤「不是偶然的，由來已久。」

參與「圍剿」的喬冠華兩年後向已經病重的周恩來當面檢討這件事，請求他原諒時，周恩來表示：「這不是你們能左右的事」，「那是總的形勢，大家都講了嘛，你在我身邊工作幾十年，又管美國這一攤，怎麼能不講呢？再說，我也有失誤，也不能說不能批評我。」

無論周恩來講的是真話還是假話都無關重要。作為從抗爭時期一手培養的嫡系，反戈一擊造成的刺痛絕非是唐聞生、王海容等人造成的傷害可比。但是此時的周恩來有沒有想起了劉少奇、林彪等人？所有的這一切，不是自己一手造成的麼？

同時不也正說明，如果不是刻意維護，周恩來的形像又怎麼是如此「高大」呢？

會議期間，周恩來因無端蒙冤受辱，心情鬱結而使得病情加速發展，體內的腫瘤細胞長得很快，侵犯了周圍的血管，造成潰爛出血，膀胱裡積存了大量血液，凝結成血塊，堵住了尿道口。他每次上廁所都很痛苦，要化很長時間，用力晃動身子才能排出。擴大會議後期，周的病情已經很重了，常常在廁所裡半天出不來。在這種情況下，會議只好暫時休會等待。

為此，江青、張春橋還斥責周故意耽誤時間，對抗會議的批判，又給他增加了一條新的罪名。

會上，江青提出這一次是所謂「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周恩來是「錯誤路線的頭子」，想要「迫不及待」地取代毛澤東。會後，江青還向毛澤東提出，要求增補她和姚文元以及汪東興為政治局常委。江青提出增補常委，同毛澤東提出要開九屆三中全會增補常委，是同出一轍。既然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周恩來不就是下一個劉少奇和林彪麼？江青此舉實為欲探知毛澤東批周的底線。

是否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值得考慮。第一，毛澤東自72年初到73年的「十大」，對於毛後時代有人會走修正主義路線，否定文革的擔憂愈來愈烈。而周恩來在歷史上的表現是「牆頭上的草」，先是跟著博古跑，後來跟著王明跑，這一切都讓毛感到恐懼。在江青拋出第十一路線鬥爭之前，毛澤東就告訴江青，周恩來要奪權。當江青提出後，政治局的人沒有人對此提法表示懷疑。第二：從1973年春天開始，毛澤東就讓人把在延安時期寫的九篇文章找出來，印成大字本，在極小的範圍內進行傳閱，其中包括毛的侄子、後來在政治舞台上一度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毛遠新，甚至准許他把其中涉及批周內容的兩篇文章錄下音來，帶回遼寧。毛遠新還調查周恩來的歷史問題。毛遠新後來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多次說：「毛主席發動的這場批林批孔鬥爭，一個是解決九次路線回潮問題，一個是解決十次路線沒有解決完的問題，能不能歸結到十一次路線鬥爭，可不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現在還很難說。」

根據現有材料，王洪文並無出格之言論。且在12月9日，毛澤東先後同周恩來、王洪文等談話。提出：這次會開得很好。就是有人講錯了兩句話，一個是講「十一次路線鬥爭」，不應該那麼講，實際上也不是；一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總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對江青所提增補常委的意見，毛澤東表示：「增補常委，不要。」江青做了屁股，毛澤東做了臉。毛澤東也並沒有說批周恩來是批錯了，而是「開得很好」！（筆者註：實為批的很好。）

3. 批周的結局

從尼克松訪華一開始，周恩來在某些細節部分就「用心良苦」。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訪華。第二天，《人民日報》刊登出那張著名的尼克松微翹著腳一副急不可耐的樣子同周恩來握手的照片。但是這張照片是假的，經過「移花接木」式的處理。照片中的站在後面的翻譯，人民日報登的是王海容，實則是冀朝鑄。此「換人術」的決定只能是周恩來作出的。因為這類重大事件的照片審核都是周恩來一手操刀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周恩來指導《人民日報》的原則居然是：尊重事實才能尊重真理。

而周恩來以前對於此等事件是非常痛恨的。1963年5月22日，劉少奇、陳毅圓滿結束對印度尼西亞、緬甸、柬埔寨和越南的友好訪問，乘專機回到北京。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了歡迎劉少奇訪問歸來的消息和社論，並配發了機場迎接的照片。當天下午，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辦公室翻閱當天的《人民日報》時發現此張照片是經過「換頭術」處理的。為此，周恩來十分憤怒：「豈有此理，荒唐！」當事者回憶，周恩來火冒三丈，將報紙重重地摔在桌上，吩咐秘書把負責那天活動攝影的攝影師和有關人員找來，猛剋一頓。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根據《周恩來年譜》在1966年7月22日的記載，周恩來指示「過去新聞照片拼拼貼貼的情況很多，今後一定要避免這種做法。」

將冀朝鑄換成王海容，而王海容同毛澤東的關係，天下人盡知，此事只能說明周恩來想通過此事向毛澤東傳達出這樣一種信息，那就是在外交方面，只有毛澤東才是最高權威。也說明周恩來在政治需要面前，對於原則、是非的踐踏也是隨心所欲的。

從對於《中美聯合公報》中的一個詞的用法，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於外交事務的控制之嚴

與周恩來的「言聽計從」。2月25日下午，中美聯合公報稿中有關措詞還沒有確定下來。這時，周恩來告訴基辛格：反正雙方觀點已經接近，我們也報告了毛主席，但還要設法用雙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詞表達。最後，這個問題以雙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得到了解決。基辛格又提出將公報稿中「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最後一句改為「人民要進步」。周恩來認為還是用原來的提法好，因為這一段講的是中方的立場。事後，周解釋說：我們本來也想讓一步，因為我國憲法裡也有人類進步的說法。但把公報初稿送到主席那裡，主席說：還是恢復「革命」這個詞。在連續幾天的中美會談期間，周恩來每天深夜或次日凌晨都要去毛澤東那裡匯報情況，交換意見，往往一談就是一兩個鐘頭正如周恩來後來所肯定的基辛格的說法：「中國總理的每一個步驟都是向毛主席報告的，等於毛主席參加了會談。」

但是無論周恩來如何做，結局早已經注定。周恩來不得不順毛意，而且還要加碼，表示自己不僅唾面自乾，而且是心甘情願。毛澤東要求周恩來做40—50分鐘的檢討就好，結果周恩來做了7個小時的檢討。周恩來對所有的指責照單全收，為了打消毛對他的疑心，周在檢討的末尾還提出他本人只能作助手，政治局的工作應交別人主持。

儘管毛澤東不同意江青把會議內容捅出去，但是在12月11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匯報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外交部和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準備召開擴大會議，學習、討論中央政治局「幫周」會議有關內容。信中還提出：外交部、軍委既開這樣的會議，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務院也應安排開這樣的會。毛澤東圈閱批准了此信。對周恩來的「批評」被擴大到了相當廣泛的範圍。

12月9日，他在會見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時，故意用說反話的方式，將這一情況透露給外界。毛當著外賓的面，談笑風生地說：總理啊，你挨整啦，聽說他們整得你不亦樂乎啊，說是你愛插我的話，弄得你現在都不敢講話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等等。

1974年1月，外交部組織了180人的讀書班，人員是由各大使館老、中、青代表組成，專門為批判周恩來使用。此舉意味著毛要在整個外交系統搞臭周恩來。

1974年2月22日，毛澤東接見完贊比亞總統卡翁達後，向陪同接見的周恩來發問：「總理，你怎麼樣了？」周恩來回答：「還可以。沒抓好大事。」……毛澤東笑著說：「被人整得不亦樂乎吧？」……周也笑了：「沒有。自己犯錯誤。剛才在汽車上我還在說，抓大事還不會抓，沒有抓好，常常抓了小事。」

無論如何，已經刮起來的「批林批孔」之風愈演愈烈，接著是批經驗主義與評《水滸》，毛澤東也不時的把那九篇文章拿出來欣賞一番。事實證明毛澤東確實有徹底整治周的打算。但是此時的毛澤東已經沒有文革初期的勇氣，「林彪事件」剛過去不久，再次使社會大幅動盪，無論是精神狀態還是身體狀況都不允許毛澤東這麼做。「林彪事件」給了毛澤東致命的打擊，毛澤東的精心準備的把戲沒有派上用場，而林彪拒絕檢討也使得毛澤東沒有享受到鬥爭快感。

更關鍵的鄧小平和王洪文的聯手格局尚未形成，也為了不致於使自己在「十大」努力經營的「老少共攜手」的格局泡湯，這次「批周會議」終於沒有走到徹底打倒周恩來的路上去。

然而，毛的暫時的歇手，並不表示放棄。但是無論如何，毛澤東一定在整治周的過程中得到快感。

1967年8月，毛澤東在上海，在觀看上海造反派鬥爭陳丕顯、曹荻秋的電視鏡頭時，表些陳、曹被迫做的「噴氣式」「這算不了什麼嘛。」紀登奎曾回憶，毛問他挨了多少決鬥，紀說他挨了幾百次鬥，坐了「噴氣式飛機」。「毛主席聽了，哈哈大笑。他老人家還親自學做噴氣式的樣子，低頭、彎腰、並把兩手朝後高高舉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九屆二中全會後，周恩來讓邱會作做黃永勝的工作：不是發言不發言的問題，主要是檢討宗派主義，讓主席高興點！

也許因為周恩來的自虐帶給毛澤東的快樂最大，每次折磨都有新的感受，這或許是周恩

來能活到 1976 的最主要的原因？

4. 批周的餘波

1973年5月份，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要注意抓路線、抓上層建築、抓意識形態，並要求學一點歷史和批判孔子。隨後毛澤東多次提到批孔的事情。「十大」的政治報告又提出「敢於反潮流，敢於硬著頭皮頂住。」在此背景下，清華大學「反擊右傾回潮」的三個月運動出台。同一時期，大量批孔文章在報刊上發表。

毛澤東發動「批林批孔」，其真實意圖之一既不在於批判已經被打倒的林彪和孔子，也不是替秦始皇翻案。毛澤東主要著眼於解決對待「文革」的態度問題，即進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進一步肯定「文革」的理論和實踐，防止「右傾翻案」，防止出「修正主義」。而許世友對於王洪文的態度，使得毛澤東認識到來自軍頭的反對是最大的憂患也是未來對文革派掌權最大的障礙。且自「三結合」以來，在領導班子中占主導地位的軍隊幹部擁軍自重，雄踞一方已經多年，並不是毛澤東自己怕這些「山頭」，實為後人鋪路，於是八大司令對調出台。1973年12月，毛澤東在接見八大司令對調會上提出「修正主義」與讀《水滸》。「修正主義」與毛澤東提及《水滸》中「接受招安」都是針對否定「文革」與無產階級專政的傾向而言，與「批林批孔」的精神是一脈相通的。毛澤東隨後通過批林批孔更加牢固的控制軍隊，在這複雜的背景之下，「八大軍區司令」對調也就被賦予了新的含義：（1）八大軍區司令對調是為了讓「批林批孔」運動在各軍區順利的開展，否則「蓋子」揭不開。「蓋子」揭不開，毛澤東怎麼知道你同林彪的關係有多深？；（2）成立以王洪文為首的專案組專門處理各大軍區的揭發材料，自是為了樹立其權威；（3）警告這些軍頭不要站在周恩來一邊。

12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先是提出全國各個大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接著話鋒一轉，再次嚴厲批評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政治局、葉劍英主持的中央軍委的工作：「政治局要議政。軍委要議軍，不僅要議軍，還要議政。軍委不議軍，政治局不議政，以後改了吧。你們不改，我就要開會，到這裡來。我毫無辦法，我無非是開個會，跟你們吹一吹，當面講，在政治局。」

在隨後的幾天裡，毛澤東多次含沙射影、怵目驚心的講：

我還可以打幾仗呢。要打就打嘛！天下大亂，包括中國嘛！我能吃飯，也能睡覺，所以，要打，我最歡迎了。準備打仗！內戰外戰都來！我還可以打幾仗。打起來就可以分清：誰是真正願意打的，誰是勾結外國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如果中國出了修正主義，大家要注意啊！

誰想當皇帝？誰會搞修正主義？毛說：蘇聯要是打進來，周恩來就是兒皇帝！美帝要是打進來，周恩來就是投降主義！

毛澤東為什麼對周恩來如此看法？早在1964年周恩來和賀龍訪蘇時，就發生過蘇聯人勸說周趕毛下台之事。事情更加嚴重的是，11月8日，美國、英國等國的通訊社根據頭一天馬利諾夫斯基一事從莫斯科報道：這裡的權威人士說，蘇共已和中共達成協議，要毛澤東下台，由周恩來當中共中央主席。

12月21日，毛澤東對許世友說：「《水滸》不反皇帝，專門反對貪官。後來接受了招安。」這是毛澤東晚年第一次在高層會議場合提到《水滸傳》。雖然僅寥寥幾句，卻已形成了1975年評《水滸傳》批判「投降派」的肇端和雛形。1975年8月14日下發的毛澤東關於《水滸》的評論中主要內容就是「冰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昆蓋於一百零八人

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昆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1975年的評論中還用對比的手法對「招安」和「非投降派」鬥爭還有深入闡述：位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願意投降。」

「招安」不就是投降麼？原來「修正主義」、「兒皇帝」和批「水滸」是一條線。既然，周恩來是投降派，毛澤東自然希望許世友是「非投降派」。毛澤東勸許世友等人讀《水滸》的目的也就昭然若揭了。

第一部分 第十一章

「批林批孔」批周公：
在身受其害的同時推波助瀾

1973年底的批周會議和八大軍區司令對調為1974年的「批林批孔」奠定了基礎。名為「批林批孔」實為「批周」的運動，周恩來既是運動的領導者也是被批者。

毛澤東發動在軍隊中的「批林批孔」是要完成「文化大革命」初期未完成的任務。文革開始，天下大亂，毛澤東不得不依靠軍隊來維持政局的穩定。在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後、在王洪文和鄧小平組成的政治格局穩定的情況下，毛澤東反過來整治軍隊，為未來的接班人打下基礎。此時，小平的崛起完全是毛澤東一手促成，周恩來並不是中共官方所認定的主動積極，而是被動、消極的。鄧小平和周恩來的關係在1973—1974這段時間裡是非常淡漠的。

但是成立的軍委六人小組並沒有達到毛澤東的意圖，王洪文和張春橋在軍隊裡的地位並沒有建立起來。周恩來的病情發展以及「批林批孔」造成的混亂狀態，使毛澤東決定停止「批林批孔」運動。四屆人大以及對國民經濟調整的必要性提到日程上來，為鄧小平在1975年的整頓打下了基礎。

一、「批林批孔」的意圖在於批周及整軍隊

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並不是一次再革命。這場運動的目的並不是象1966年發動的文革一樣是「打碎舊的國家機器」、「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鬥爭」。《毛澤東傳》的作者雖然聲稱「一九七三年下半年，毛澤東曾幾次談到評法批儒的問題，並寫了《讀〈封建論〉呈郭老》的詩，著眼點是針對那些懷疑以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提倡『社會要向前發展，反對倒退。』」「江青等卻認為『批孔』是一個好題目，可以借『批儒』把攻擊矛頭一步步指向周恩來。」「毛澤東在外事方面對周恩來的批評，更使江青等認為有機可乘，可以借此一舉打倒周恩來，掃除他們奪取最高權力的嚴重障礙。」

事實的發展卻表明「批林批孔」運動實質上就是「毛澤東在外事方面對周恩來的批評」的繼續。從1973年春天，毛澤東就開始提出批孔，把批林和批周聯繫起來；在毛直接指導下的「兩校」（梁效）的所撰寫的大量「批林批孔」的文章和在北大清華「反擊右傾回潮運動」（三個月運動）恰恰是是1974年「批林批孔」的前期運動；運動的對象為周恩來和軍隊，這是毛在1973年底決定的。儘管在激進派的領導下，這次運動有過火，但是毛在1973年的所作所為正是導致這次運動的根本原因。

除此之外，樹立文革派在軍隊中的威望也是其目的之一。所有目的都與毛澤東考慮身後事緊密相連。整個運動也在毛澤東所掌控之中。僅是由於運動的目的未能如預期那樣實現才

導致運動在 8 月份悄然而止。

1. 「批林批孔」的興起

對於「文革」，毛澤東非常清楚，反對的人不少，贊成的人不多。因此，毛澤東認為黨的「十大」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仍是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對社會上流傳的「文化大革命失敗了」的說法，毛澤東在 3 月 25 日五屆政治局會議上批駁道：「怎麼能這樣說呢？文化大革命把劉少奇集團揪出來了嘛，又把林彪集團揪出來了嘛，這是個偉大勝利。如果不是這場大革命，劉、林他們怎麼能發現？怎麼能打倒？」毛澤東還提醒政治局，要注意抓路線，抓上層建築，抓意識形態，要學一點歷史，要批判孔子和尊儒思想。在 1973 年 5 月下旬，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召開籌備「十大」的工作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講話以及精神。同日以及 8 月 5 日，毛澤東兩次召見江青，對江談了批孔等事宜。8 月 7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親自批轉的、中山大學楊榮國撰寫的《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制的思想家》。9 月 23 日，毛澤東對埃及副總統沙菲說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子。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 7 月 4 日同張春橋、王洪文的談話。毛澤東在嚴厲批評周恩來的時候，借批評外交部對國際形勢的看法時，用尖銳的口吻告誡說：「將來（有人）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同時提到「批孔」問題時，毛澤東表示不贊成否定秦始皇，認為林彪和國民黨一樣，都是「尊孔反法」的。至於兩者有何關聯，由於整個談話記錄並沒有公開，所以並不明朗，但是後來的發展卻實實在在的把二者緊密的聯繫在一起。

7 月 17 日，毛澤東會見楊振寧談到儒法鬥爭的問題時說：「我們郭老（指郭沫若。筆者註），在歷史分期這個問題上，我是贊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判書》裡邊，立場觀點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張社會要向前發展、反對倒退的路線，要前進。」對於這個問題，王洪文在 1974 年 1 月份的中央讀書班上的講話對於毛的這個擔憂闡述的非常清楚。

1974 年 1 月 14 日，王洪文在中央讀書班做報告：「這就是提醒我們要有長期鬥爭的思想準備。同志們最近看「批林批孔」文章，說秦始皇搞一種剝削制度代替另一種剝削制度的革命，被罵了兩千年，何況我們的文化大革命呢？肯定有人要罵，有準備十年幾十年以後還有人要罵，還有人出來為劉少奇、林彪翻案。孔子死了幾千年了，還有人崇拜，秦始皇當時還是革命的，結果被人罵了二千年。」「這正如毛主席所說的，『被敵人反對的是好事而不是壞事』，這證明我們文化大革命搞的是對的，我們的「批林批孔」越深入，蔣介石、南朝鮮、南越、蘇修都罵我們批孔，這從階級觀點看是不奇怪的。」

為此「梁效」寫作班子應運而生。然而《毛澤東傳》的作者卻聲稱他們（指江青等——筆者註）操縱的寫作班子，連續發表大量「批孔」、「批儒」文章，借古喻今，竭力把批判「孔孟之道」引導到現實政治鬥爭當中，火藥味越來越濃。

「批林批孔」材料組於 1973 年 10 月成立，由遲群和謝靜宜主持。江青開始並不知道。此材料組以及隨後成立的「梁效」受毛澤東直接控制，由謝靜宜直接向毛匯報工作，並由謝靜宜向梁效傳達毛澤東的最新指示。「梁效」成員范達人回憶：「（謝靜宜）她說我們班子是毛主席提議建立起來的，她說原來我們搞材料，清華幾個人在搞材料，她說毛主席看了幾條材料，小紙條，他說不夠，你們清華搞理科的不行，你們要找北大的文科老師一起搞，然後就把我們文科找去了……」不僅如此，在遲群、謝靜宜等人直接掌控的《北京大學學報》在 1974 年第一期批林的篇目有七篇，占一半以上，第二期，批林的只佔一半，第三、四期就完全沒有批林的篇目了，只剩下批孔子的了。

謝靜宜自己是這樣解釋：「當我們向毛主席匯報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論的時候，主席說，噢，凡是反動的階級，主張歷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問到林彪

有那些孔孟的言論或者類似的語言，主席讓我們，就是讓我和遲群同志搞一個材料送主席看一看。」

謝靜宜在1974年1月25日在首都體育館召開的中央和國家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說：「就是說北大馮友蘭也寫了批孔的文章啦，主席立即讓我們回去，說你回去拿，拿回來，給我看一看。所以我們當時就回去了，然後返回，把那一篇馮友蘭的文章拿來給主席看，主席是一口氣地把它看完。很長吶，字也很小，主席戴放大鏡把它看完吶，一直都沒休息，而且還看出了裡頭那些標點錯了，叫我們去改一改，很細。第二篇文章也是這樣的，第二篇馮友蘭的文章出來之後，又送給主席，主席又看了。」

1974年1月27日，江青在新華總社學習班講：「(8月5日)主席那天還給我講了，楊榮國教授說孔子是為奴隸主服務的，這樣我才看了楊榮國的文章」，江青有說「主席給我講：北京才怪呢，北京就不欣賞上海、廣州的學者。現在北京不同了，北大、清華的教授、助教和青年『三結合』的班子搞出了《林彪與孔孟之道》這個材料，立了大功。」

於是以歷史題材寫現實問題的「批林批孔」文章滿天飛。但是兩報一刊的元旦社論對於「批林批孔」賦予了新的含義（筆者註：即《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1974年1月1日，元旦社論）。社論指出：「批林，批判林彪路線的極右實質，就是批判修正主義。批孔是批林的一個組成部分。」社論引人注目的在提及「要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時，提出「黨委要抓大事，抓路線，抓政治思想工作。大事要多討論，討論才能引起大家注意。大事不討論，埋頭於小事，這樣很危險，勢必要搞修正主義。」而這不正是而毛澤東在1973年7月4日批評周恩來時說的話麼？

在1973年12月29日，根據毛澤東指示，王洪文在召集在北京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及有關部門負責人的會議上，除了傳達了毛澤東關於各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和鄧小平任職等問題的幾次談話要點之外，還重提了文革前夕，毛澤東曾經多次提出向「修正主義」進攻。

或許開始觸動毛澤東批孔是因為在毛家灣（林彪在北京的住處一筆者註）發現的大量有關孔子的材料，繼而認為林彪和孔子思想同源，都是「尊孔反法」、開「倒車」的。同時毛澤東發動了一系列針對周恩來的嚴厲批判。隱藏在二者之後卻是同跟同源的「否定文化大革命」。在毛澤東親自批轉的並向他人推薦的中山大學教授楊榮國撰寫的文章《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制的思想家》中，畫龍點睛的部分是「孔子最崇拜的『聖人』」不僅是「周公」，而且「提倡『忠』」，就是要「諸侯忠於周天子」，目的就是「要鞏固各級奴隸主的統治」（復辟）。毛澤東不是聲稱敵人來了，周恩來要做「兒皇帝」的麼？熟知歷史典故的毛澤東借古諷今，把「批孔」同批判歷史上反動階級的代表人物和黨內機會主義分子、批評現實當中的某些思想傾向聯繫在一起。

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和江青聯名致信毛澤東，提出向全國分發「梁效」編寫的《林彪與孔孟之道》。

隨後，王洪文於1月14日在中央讀書班做報告，再次詳細的介紹毛澤東曾經多次提出向「修正主義」進攻和解釋「批林」要與「批孔」結合。王洪文說：「毛主席說，『我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的，我就號召地方起來造反，向中央進攻』。這裡『幹壞事』指的就是搞修正主義。毛主席在杭州對許世友同志說到，『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怎麼辦？』毛主席曾反覆講過這個問題。」王洪文還說：「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正睡在我們的身邊，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到這一點。」「我們要把批林整風深入下去，把「批林批孔」運動搞起來，批孔結合起來，要批林彪的流毒，就要打倒孔家店，孔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系統全面鼓吹唯心主義的思想家，一切守舊的傢伙吹捧孔子。林彪是當代的孔老二，批林和批孔完全可以結合起來，也必須結合起來，要打倒我們頭腦裡的孔家店。」

1月18日，經毛澤東批准，作為74年1號文件下發《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

從此「批林批孔」運動在全國正式展開。

2. 周恩來的困境

此間的種種奧妙，周恩來心裡是十分清楚的。

周恩來在1973年11月會見基辛格。基辛格在最後一次宴會上，提出「孔夫子問題」，基辛格自認為是把毛澤東比作孔夫子，比作儒家。周恩來一聽就沉不住氣了。周恩來十分激動地堅決指出這種類比的荒謬。雖然當時基辛格對周恩來申辯：應當把我的任何誤解當作無知的表現，周也拒絕接受。筆者認為是基辛格觸動了周恩來的心事。

周恩來也曾試圖淡化批孔。首先是在「十大」前夕召開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江青曾借毛澤東關於「批孔」的詩和有關言論，主張將「儒法鬥爭」的內容寫進「十大」的政治報告，主持會議的周恩來以這個問題「還需要消化一段時間」為理由沒有採納。毛澤東對此也沒有提出異議。其次，在1973年底，大量的批孔的文章刊登出來之後，周恩來就1974年的工作向毛澤東書面報告時提出在新的一年裡將繼續「批林整風」鬥爭。周恩來在1974年1月上旬就政治局會議情況向毛澤東報告時，也不涉及「批孔」問題。

1973年11月開始的「批判無標題音樂」事件同當時毛澤東下令批周恩來外交問題也不是巧合。10月，中央音樂學院教師黃曉和就替對外友協對於即將來訪的土耳其音樂團寫了演奏報告。認為其音樂還是比較健康明朗。此前在3月至9月，已經不少外國音樂團來訪。但是此次卻出了岔子。11月18日，江青致信周恩來建議少接待或不接待資本主義國家的文藝團體。周恩來回復到今後應盡可能少接待，或有選擇地接待，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但我事先可調查清楚，避免請來無法接受或不瞭解其內情的文藝團體，請友協予以注意。姚文元將黃曉和報告中特指的「兩位演奏家合作演出的、沒有具體情節和標題」的作品，稱之為「無標題音樂」。

巧合的是，就在江青批示的前一天即17日，毛澤東召集周恩來和外交部一些成員開會，批評說：「對美國要注意，搞鬥爭的時候容易『左』，搞聯合的時候容易右。」毛澤東提議中央政治局開會，批評此次中美會談中的錯誤。因此完全有理由認為「批判無標題音樂」事件實際上配合當時批判周恩來外交活動的「大合唱」。

對於當時的批孔和批判音樂事件，外國報紙和電文看的非常清楚。英國《泰晤士報》在1974年1月19日說：中國是否準備進行另一次文化革命？……獻身革命的純粹主義者對西方音樂展開了進攻，而西方音樂看來也許遠非中國的真正用意所在。這種進攻在這場鬥爭中絕對不是無關緊要的陪襯，可以認為這是新的抗議浪潮的信號，甚至抗議認為這是矛頭指向黨內上層那些要受批判的人。美聯社記者約翰·羅德里克1月22日從東京發出外電：「中國的左翼分子在打倒古代聖哲孔子之後，現在又把矛頭對準貝多芬和舒伯特……主要是通過對孔子的學術批判來攻擊周恩來總理……」周恩來領導的對外交流工作被稱作是「引狼入室」「開門揖盜」。

很明顯，毛澤東還沒有放過周恩來。

二、1974年1月的在京「批林批孔」大會

1. 軍委六人小組的成立以及駐京部隊「批林批孔」動員大會

「九·一三事件」之後，在周恩來建議下，成立了葉劍英主持下的軍委辦公會議以替代原來的軍委辦事組，在中央軍委的領導下，負責軍委的日常工作。1974年1月18日，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時提議中央軍委成立以葉劍英牽頭，有王洪文、張春橋、鄧小

平、陳錫聯參加的五人小組，討論處理軍委的大事及緊急作戰事項，後加蘇振華。軍委六人小組「大事視情況或直報主席或經過中央政治局討論後再報主席」，「對內對外不行文，一律以軍委名義下達」。20日，周恩來與王洪文聯名向毛澤東報告此事，毛澤東表示同意。把王洪文和張春橋列入當然是有其他含義，特別在1月18日中共中央轉發了《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通知及附件。果不其然，在1974年1月31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根據李先念建議，軍隊系統的「批林批孔」由軍委六人小組負責處理有關問題。2月1日，周恩來與王洪文聯名致信毛澤東，匯報政治局會議情況。毛澤東圈閱了此信。

此軍委六人小組成立意義甚大。第一個是在八大軍區司令對調以後，對各大司令揭發材料是由王洪文統一搜集並上報中央。而王洪文原來並無任何軍職，此舉可以讓王洪文名正言順的參與軍隊事務，挾揭發材料之威，樹立王洪文在軍隊的威望，增加其在軍隊的影響力。第二個，軍委六人小組管理當時在軍隊中的「批林批孔」事宜，並且其成員結構保障了「批林批孔」的順利進行。在1月24日召開的駐京部隊「批林批孔」動員大會就是一明證。

1974年1月24日，江青在致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鄧小平的信中說：「我特請謝靜宜和遲群二同志向全軍指戰員（指在下午召開的駐京部隊「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一筆者註）宣讀中央的通知（即中共中央1月18日《批林批孔》的通知）。」江青在信中還提出：「毛主席說能文能武（毛澤東表揚鄧小平之語——筆者註），長恨隨陸無武，絳灌無文（毛澤東對許世友之語——筆者註）。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學得文武雙才，才能完成毛主席，黨中央交給我們的任務。」

謝靜宜和遲群與毛澤東的關係世人皆知。江青最後的提議則明顯的是借用毛澤東在八大軍區司令對調會議上的講話來向鄧小平和許世友示好。這為後來的事實所證明。就在28日，江青又修書一封，致「洪文、劍英、春橋、小平、錫聯、振華同志，請轉世友、紫陽同志」，要求許世友和趙紫陽同志協助準備材料。

同日，張春橋批示：「建議軍委議一議如何抓好「批林批孔」，並商量一下江青同志的信如何落實。」雖然其他人的批示尚未曝光，至少軍委六人小組並沒否定江青的意見。但是此信證明了24日下午召開的解放軍駐京部隊「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並不是江青擅自召開的。葉劍英等人也都表示同意，是在軍委六人小組都同意下才召開的。出席會議的中央領導人有葉劍英、鄧小平、王洪文、陳錫聯，有軍隊駐京14個大單位的幹部戰士1.8萬人。會議開始，葉劍英作了簡短的講話。葉劍英首先申明這個會是江青提議召開的，接著又列舉了江青給空軍寫信，給海軍送材料的事，然後說：「我們對於批孔與批林的關係理解不深，指導不力，沒有把批林與批孔結合起來，因此「批林批孔」運動不夠深入。」

2. 1月25日中央、國務院直屬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

對於1月25日召開的有一萬多人參加的黨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務院各部門「批林批孔」動員大會，《毛澤東傳》說江青在會前對遲群講了許多攻擊周恩來的話。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快到當天中午才得知開會的消息。甚至不少的文章說周恩來事先根本就不知道，因此毫無準備，並且言之確鑿的說周恩來當時講：「對於這個會，我事先一點也不知道。」毛澤東是事先知道的，但並沒有採取任何制止措施。

然而對照當時的會議記錄，周恩來並沒有講這話。相反，周恩來的講話說明：周是做了充分的準備。另外周恩來還親自起草了要求在京中央政治局全體成員參加「1?25」大會的通知和當晚政治局會議上準備討論的內容（此為根據江青的提議），隨後並主持了中央和國家機關的動員大會。

周恩來先是承認「我們中央和國家機關已經落後了。昨天在這裡軍隊已經大動員了。」隨後，周恩來對《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做了說明，稱「這個材料受到了主席的

稱讚。」

周恩來同時還對當時中央起草的關於以下學習文件和文章的通知讀了一遍。周恩來特別強調了軍隊裡的「批林批孔」情況「江青同志首先發現了二十軍防化連的一個對批孔問題的情況反映，是軍報內部參考上登的。江青同志看到那裡的批孔推動不起來……江青同志看了《內參》上的反映，就請謝靜宜同志和遲群同志帶著材料直送二十軍防化連。並帶去了江青同志的一封信，是1974年1月13日寫的……謝靜宜和遲群同志到現場後立即和他們進行了座談，浙江省委、防化兵和甘軍黨委均給江青同志來信，現把信轉發各地，作為「批林批孔」的參考。」「跟著江青同志又給空軍馬寧同志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據說空軍機關對批孔有些困難，特請蘇元勳同志送上北大、清華彙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及《名詞解釋》100份，可能有助於批林、批孔。請指定一個連隊，由蘇元勳同志去宣講。』」在後面周恩來還講了江青給海軍蘇振華同志的信，「信裡說：『現請謝靜宜和遲群兩位同志到海司去搞試點，並送上《林彪與孔孟之道》二百份，其他材料以後再送。七四年一月廿二日』」

介紹完江青如何指導在陸軍和空軍開展「批林批孔」的情況後，周恩來還解釋了江青寫給國務院文化組的信，是寫給吳德同志的。

關於24日召開的大會，周恩來解釋說：「第四封信就是江青同志給軍委幾位負責同志的（洪文、劍英、小平）。軍委收到此信後，昨天在這裡已經召開了動員大會。」

周恩來還說：「我今天早晨得到了這個消息，向政治局幾位同志建議中央和國家機關的同志今天開這個會議。」

最後，周恩來講了第六封信是江青同志寫給外交部的。

周恩來還在講話中讚揚了江青，指出是毛讓江青主持這次運動，還帶頭喊了「向江青同志學習！」的口號。周恩來還在遲群講話之前就講了「走後門」問題。周恩來還在講話中講了24日晚同張春橋一起去看望郭沫若，並動員郭出席此次大會的事情，充分表明了周恩來是事先知道這次大會的。江青也表示要不是周恩來邀請，這次大會她還不出場了。

謝靜宜在同一天的講話中又再次重述毛的話向周發出警告：「就怕你不抓大事，不抓大事，那就是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麼，此調不改動，勢必搞修正。」「主席教導，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警惕出修正主義，修正主義仍然是當前的主要危險。……江青同志寫的信，送的材料，我們認為，這本身就是貫徹主席關於抓大事，抓路線，抓政治思想工作，把軍隊的政治思想工作提上綱來的大事，把全黨的政治工作提上綱來的大事。因此，這就不是孤立的給某一個領導同志，某一個單位的寫的的信的問題，而是給全黨全軍全民寫的信。也不是孤立的在批孔的問題，是「批林整風」的繼續深入，是關係到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防修反修的一個大問題。」

24、25日的會議鬥爭目標顯然和1973年11月到12月的批判目標是一致的：周恩來和軍隊。根據《毛澤東》傳記記載：為了使大會的主要發言者遲群等明白她要開這次會的「背景」，江青在會前對遲群講了許多攻擊周恩來的話。在「1?25」大會上，遲群等發表長篇煽動性講話，有意將到會的周恩來、葉劍英等置於受指責的地位。他們借宣講《林彪與孔孟之道》的材料，大談所謂「抓大事」和「反覆辟」問題，說：黨內「歷次機會主義的頭子」，「都是推行孔孟之道的」；「修正主義仍然是當前的主要危險」，不抓「大事」而埋頭「小事」就要「變修」。

儘管陳永貴後來說王洪文在大會有過發言，但是根據會議記錄則表明，除了應周恩來要求，領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之外，並沒有發言。但是王洪文卻證實了此次大會是未經政治局討論、未報告毛主席的（但是王海容、唐聞生已經報告給毛）。既然王洪文、周恩來等都沒有報告毛澤東，只能說明他們認為江青就是代表毛的。這也是後來毛說「她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的言外之意是江青曾經代表過毛澤東。但是這個特權也是毛澤東一手授予的。

3. 毛澤東的策略

1月27日和30日，江青再次借「走後門」問題攻擊葉劍英。

繼葉劍英在1月31日因為江青在「1?25」講話中嚴厲指責「走後門」問題而向毛澤東檢討之後，周恩來也向毛澤東反映有關情況，提出：在「批林批孔」中，如果「只研究『走後門』一個問題，這又太狹窄了，不正之風決不止此；而『走後門』又要進行分析，區別處理，才能收效」。江青在「1?25」講話中提及走後門問題，相當不策略。早在唐聞生、王海容向毛澤東匯報大會情況時，毛就表示不滿意。這正如毛在回復葉劍英說寫：

「劍英同志：此事甚大，從支部到北京牽涉幾百萬人。開後門來的也有好人，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現在，形而上學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夾著走後門，有可能沖淡「批林批孔」。小謝（即謝靜宜。——引者注）、遲群講話有缺點，不宜向下發。我的意見如此。」

毛澤東絲毫沒有對江青等要大力開展「批林批孔」運動不滿，反而是怕沖淡了主題。因此，江青向毛澤東寫出檢討，稱：「我做蠢事，對不起主席！」

毛澤東後來對「批林批孔」表示肯定意見的時候，對此問題有過深刻的解釋：「在我們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錯誤要批評。三箭齊發，批林，批孔，批走後門。「批林批孔」都要這些人來幹，沒有這些人「批林批孔」就不行。走後門這樣的人有成百萬，包括你們在內（指王、唐），我也是一個，我送了幾個女孩子，到北大上學，我沒辦法，我說你們去上學，他們當了五年工人，現在送她們上大學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後門，我也有資產階級法權，我送去，小謝不得不收，這些人不是壞人。」

雖然毛澤東自己也有「走後門」的問題，但是這並不重要。重要的「三箭齊發」不可以，只能有「兩箭」：即批林和批孔，而且更重要的是會偏離運動的方向——要批判的主要目標是周恩來附帶著葉劍英（為了批軍隊）。走後門只是小問題，不能「沖淡了主題」。

檢討之後，江青又提出見毛澤東的請求。3月20日，毛澤東再次致信江青：「不見還好些。過去多年同你談的，你有好些不執行，多見何益？有馬列書在，有我的書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體諒。你有特權，我死了，看你怎麼辦？你也是個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的人。請你考慮。」

但是毛澤東並沒有說江青此舉會導致「修正主義」，而是提醒江青要注意大事，不要偏離「主題」。

果然主題隨後被突出。1974年4月，江青在一次會議上，公開點了周恩來的名：「總理是什麼人？總理還是我們的人麼？」

此外，根據江青親自擬題、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即遲群等領導的寫作班子，後來用「梁效」作為筆名）所寫的《孔丘其人》一文，含沙射影地把孔子刻畫成「言必稱仁義，口不離中庸」、「重病在床」的魯國「代理宰相」，宣稱揭露孔子對「反擊開倒車、搞復辟的逆流，很有意義。」這篇文章受到江青等稱讚，認為「寫得較生動」、「通俗」，被安排在《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上發表。

毛澤東並沒有因為「走後門問題」制止「批林批孔」運動，反而在全國各地如火如荼的開展起來。

對於江青因國內事務需要鄧小平參加而反對鄧小平去聯合國一事，毛澤東也對江青提出批評。江青或許感到氣餒，而致信毛澤東。4月17日，毛澤東在同一日覆信兩封，表示鼓勵，而且滿足了江青的要求。

毛澤東說：黨的大勢不錯，悲觀不好。不要動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要主觀片觀（面）。千萬注意。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不要請假。錢可略增。無限風光在險峰。

在第二封信中，毛澤東說：兩信都收到，並收到春風楊柳。後信打退堂鼓，不妥。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可主觀片面。多休息好，似不宜請長假。

於是江青也就只好振作起來，衝鋒陷陣，還要準備好繼續替毛背「黑鍋」。

三、周恩來的雙重角色

1. 由被動轉為主動

王洪文於1974年1月14日在中央讀書班的報告，可以被認為是毛澤東對於當前文革形勢的判斷的總結。王洪文說：「老幹部有錯誤要一看二幫，允許改正，對新幹部也要這樣。但現在有些地方，老幹部犯錯誤，可以一看二幫允許改正，但新幹部一犯錯誤就一棍子打死。為什麼老幹部犯錯誤可以教育，新幹部就不能教育，要打下去呢？這不公平嘛！不利於黨的團結嘛！毛主席批評了好些人看不起兒童團，提出『你們那幾個十幾歲、廿歲的人就那麼高明』？現在新幹部要謙虛、謹慎、不要驕傲自滿、翹尾巴，要尊重老幹部，向老幹部學習；老幹部要傳、幫、帶，對新幹部要有個傳幫帶的問題。」但是周恩來是否還屬於「老幹部」？王洪文還說：「還有一種傾向，認為林彪的修正主義路線是極『左』實質；其實林彪的修正主義路線的實質是極『右』，而不是極『左』，右得不能再右了。」

「1?2 5」大會對周恩來的刺激非常深，當時擔任中聯部負責人的耿飆回憶：「1?2 5」大會後的一個傍晚；他來到中南海西花廳周總理辦公室，向總理談起中聯部運動的情況，認為有人無中生有，借題發揮，被江青抓住，在「1?2 5」大會上點了他的名，他想辭職不幹了。周總理聽後說：「耿飆同志，我送你三句話。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論怎麼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趕你，不管他怎樣趕，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樣整，你自己不要死。」（筆者註：根據宋永毅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所記載的江青講話，並沒有點耿飆的名字）

如果說在這之前，周恩來對於「批林批孔」運動是有意採取躲避或者採取冷處理的話，那麼在這之後周恩來變得十分主動。

1974年1月27日，周恩來同江青等一起接見中央讀書班和記者學習班的代表時，就「批林批孔」問題發表講話。周恩來指出：「批林批孔」要結合，批孔是批林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批林批孔」可與目前城鄉正開展的「批林整風」，進行基本路線和社會主義教育結合進行。

同日，周恩來根據江青的建議將反映中共廣東省委常委決心把運動抓上去的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轉發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周恩來還根據「1?2 5」大會提出反對「走後門」的意見，專門加寫了一段要教育好幹部子女的內容。

1月28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了轉發《河南省唐河縣馬振扶公社中學情況簡報》的通知。此文章為江青指派遲群、謝靜宜調查該地的一位中學生考試問題受到校方批評後自殺一事，旨在意在「批林批孔」運動各地「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復辟回潮」不是個別現象。

1月31日，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批林批孔」問題。鑒於運動開始後發生的一些情況和問題，會議提出：在黨政機關、軍隊系統、生產部門和大中學校等，「應早一點規定一些政策界限」，報經中央和毛主席審批後，「下達全國試行」。其中，各野戰軍和軍委、各軍區的作戰、機要、通信、情報、運輸、供給等部門不搞「四大」，黨政機關則應「集中在一個易於觀看的地方貼大字報」，機關的學習「初期可定半天，其它時間仍搞業務」；學校、工廠都不放假搞運動，「學校可分出一定時間學習和批判，工廠可在生產外的時間搞，（農村）公社亦然」。「凡學習時，不論哪個單位。都要有值班員，不致誤緊急事件。」會議還決定成立由周恩來、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華國鋒和汪東興等七人組成的

小組，代表中央處理「批林批孔」日常事務。 周恩來任小組組長。周恩來試圖抓住運動的主動權。

2月5日，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批林批孔」運動問題。會議認為，目前各地、各單位運動處在發展不平衡狀態。經驗還不夠多，如果過早地規定政策界限，可能對群眾的發動定了「框框」，不如先看一看，搜集更多材料，多積累些經驗，才好提出問題，謀求解決。江青因扯出「走後門」問題而遭毛澤東批評之後，2月16日下午，周恩來找遲群、謝靜宜談話，明確地告訴他們：毛主席講的「形而上學猖獗」，是批評江青的。

2. 針對周恩來的一系列攻擊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事實是，從1973年一系列意在外交口打開缺口進而對周恩來的進行影射攻擊事件的不斷發生。

遲群在1月25日的講話提到一部名字叫《中國》的電影。遲群形容此電影是「他們盡拍了一些歪曲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一些鏡頭，……所以像這樣的片子，實際上就是一個間諜加漢奸搞出來的，難道不需要聯繫嗎？」

此影片是在1972年5月6日，經過中國外交部代部長姬鵬飛和代行文化部職責的國務院文化組批准，由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拍攝反映中國的影片。1973年楊振寧向周恩來反映此片有問題。 在批周的政治氣氛下，中央廣播事業管理局一位幹部在1973年12月11日，就電影《中國》問題給江青和姚文元寫了一封舉報信，他認為安導演在污蔑中國。17日，這名幹部又寫了第二封信，他在第二封信中還揭發了美籍中國科學家楊振寧給周總理來信「反映此片很壞」。 江青對此表示說：「過去我不知道美籍教授楊振寧對總理說過此片很壞，最近廣播局XX同志給我和文元來信揭發這片子很壞，我們才抓。」12月30日，中央政治局組織審看影片《中國》，江青講：「這是與帝國主義開辦的合股公司！究竟是愛國還是賣國？」 這事成為當時外交部聯繫實際進行批判的一個主要內容。

1974年2月10日江青到第四機械工業部發表講話，指責該部赴美考察組接受美方所贈玻璃蝸牛禮品是「屈辱於帝國主義的壓力」，是「崇洋媚外」；提出「要把蝸牛退回去」，「這條彩電生產線我們不要了」。11日，國務院就開會，李先念在召集四個部門領導開會的會上發了脾氣：「人家給你個反動標語，你也不打開看看？」同時，四機部也發了簡報，通報全國。 對此，周恩來幾次指示外交部就「蝸牛事件」認真調查。再作定奪。21日，外交部在詳盡調查核實的基礎上，寫出《關於美國人送「蝸牛」禮品等事的報告》。說明美方送蝸牛並無惡意，反駁了江青的論點，建議不必退回禮品和作外交交涉。周恩來閱後批示：外交部這一分析和所提處理意見較為正確，擬同意這一報告。在此期間，周恩來還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對「蝸牛事件」作了研究。會議決定：江青在四機部的講話不印發，不下達，已印發的立即收回。 周恩來還將報告送給毛澤東。毛澤東圈閱了報告，表示同意外交部的處理意見。

所有這些事件，完全可以套用當時吳德的話來說明。1973年12月26日，中組部和國務院文化組成立了電影《中國》聯合調查組，文化組一把手吳德是負責人之一。調查組追問彭華時，有意讓彭華朝周恩來身上引。但是時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的彭華沒有開口。1974年1月23日調查組研究給中央的初稿報告時，吳德說：「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外交路線取得很大勝利，世界發生了很大變化。聯合時易右，決裂時易左（筆者註：這是套用毛的話）」「前段轉尼克松來這個彎，現又出來右傾投降主義。」就是指向周恩來的外交口。1月30日，調查組向中央提交報告：「所以犯這樣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錯誤，是喪失階級警惕性，是不抓路線、不抓大事的必然結果。」（筆者註：整個報告，有6處提出外交工作存在「右傾投降主義」。1973年7月和12月毛的兩次批評周「右傾投降」） 由中組部和

國務院文化組聯合調查組以及外交部調查組分別寫出的報告均給外交部扣了兩項大帽子：（1）典型的右傾投降主義；（2）極為嚴重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這正是1973年批周時定下的調子。

1974年2月13日，江青上門要求郭沫若寫檢查，承認重慶時期寫作的《十批判書》、《屈原》等作品是「王明路線的產物」。「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批判「王明路線」，顯然是想將當年曾經擔任長江局副書記的周恩來一網打盡。所謂「第二次王明路線」，指的就是對1938年中共中央長江局在武漢時期工作的一個方面的評價。1939年之後的南方局工作，從未有人以「王明路線」問罪。江青還要郭沫若寫文章批秦始皇的「那個宰相」。毛澤東在會見外賓時直言不諱地稱自己是當今中國的「秦始皇」，這裡「宰相」自然是周恩來。

江青直言：「周總理都叫我搞得沒辦法了！」安徽等地甚至還公然貼出了「打倒當代孔老二」和「打倒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等直接指向周恩來的大標語。

1974年4月1日出爐的《孔丘其人》一文中，孔丘「竊取」了代理宰相的要職，是一宰相儒。5月17日，北京日報發表柏青的《從〈鄉黨〉篇看孔老二》，在描繪孔子見國君的時候，「端起胳膊」來影射周恩來。

周恩來一方面要應付這些攻擊，另一方面更加以積極的態度來參與「批林批孔」運動。周恩來相繼多次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各省和各部門的「批林批孔」運動。

1974年3月2日至4日，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研究中共福建省委、軍區「批林批孔」運動問題，並通過中央給福建省委，福州軍區的復電。復電聲稱：「福州地區批林整風運動長期深入不下去，在「批林批孔」運動剛剛起來又開什麼糾正錯誤大會，把群眾鎮壓下去，這同有些領導人長期捂蓋子是分不開的。你們應該認真地對待自己的錯誤，在「批林批孔」鬥爭中把福州地區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蓋子徹底揭開。」王洪文代表中央打電話給福建軍區：「九號文件不是對著你們的，是針對韓先楚的，你們要集中揭發韓先楚，把韓先楚的蓋子揭開。」於是福州出現了萬炮齊轟韓先楚的局面。

山東在「批林批孔」中也是重災區。周恩來指示山東省委：山東的「批林批孔」要揭發林彪反黨集團在山東的代理人袁昇平；「文化大革命」中按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批示作了結論的問題不能翻案等。袁昇平等人受到了嚴厲的迫害。山東被整的雞犬不寧。根據袁昇平的說法，1974年，山東工農業總產值，由1970～1972年的全國第六位，猛然下降到第十四位。生產遭受極大破壞，產量產值之低，為山東建國以來之最。社會秩序之亂，為「文革」以來之最，人民生活供應品全面短缺緊張，那段時間內，濟南市連醬油、煤球都買不到。

此時的周恩來因為自年初以來，拚命應對這些攻擊，精神上受到折磨，身體過度勞累，導致病情加重。3月上旬起每日便血達一百多毫升。據此，醫療組決定對其病情作進一步檢查、治療。3月8日，周恩來將醫療組所擬《檢查治療方案》作詳細閱改、批注後，致信葉劍英、張春橋、汪東興，提出：「治療方針仍按照你們原報告在這次施行膀胱鏡檢查，如可能仍採用通過膀胱鏡進行電灼或者電切除；如因病情變化，需採用手術切除，則此次不予考慮，以後再議。」隨後，周恩來到三〇五醫院作全面檢查，確診為癌症復發。

這段時間裡，他直接過問和處理在「批林批孔」中出現問題題的省、市、自治區和國家機關就有：新疆、浙江、江蘇、上海、山西、江西、吉林、福建、湖北、四川、安徽、廣東、湖南、山東、雲南以及國家體委、民航總局、四機部、解放軍軍政大學等。1月到3月就六次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批林批孔」事宜。海外輿論也對中國國內的「批林批孔」紛紛猜測，尤其注意周恩來的言論行止。

1974年4月22日，周恩來接見日本自由民主黨前眾議員、日本世界青少年交流協會會長川崎秀二及其隨員。川崎提到去年8月間，西方一些報道認為中國開展批孔，也牽涉到周總理，一些日本朋友對此感到擔心時，周恩來說：我們這一代都是反對孔子的，從五四運

動起，就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孔子思想在中國社會已影響了兩千多年，批判並肅清這種影響對中國人民來說是一件大事情，並且是長期的、艱巨的任務。在批孔的同時，還要對歷史上改革派的思想進行宣傳，當然我們不是繼承法家，今天馬列主義哲學思想已遠遠超過了法家。

四、穩定社會和經濟秩序與更露骨的批周

1. 「批林批孔」造成的社會影響

毛澤東後來談及「批林批孔」運動時認為說「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對的。但是無論是江青還是王洪文在執行毛澤東的部署時，如同周恩來一樣，並不能夠保證所有的行動都是完全符合毛澤東的意思。每個人在執行的時候都同自己的經歷、經驗有關，後果也就各異。

1974年1月14日，王洪文在中央讀書班的報告做報告時提到：「關於有些人犯了走資派的錯誤，經過幫助後改了，改了好嘛，但不能說改了就不存在走資派了。走資派不但過去有，以後還會有。少數人現在還對群眾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甚至說造反派沒有好人！這話那有一點共產黨員的氣味呢？『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條，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我們的老祖宗馬克思就是領導我們造反的。」造反有理一詞，使得許多各地原來已經大傷元氣的造反派又看到了希望，有部分又開始活躍起來。

從1974年2月份起，全國再度出現動亂，已走上正常化的社會秩序迅速惡化。派性鬥爭再度興起，許多地方重新拉起了戰鬥隊之類的組織，甚至又開始武鬥；一些領導機關受衝擊，許多幹部被炮轟、批鬥，各級黨委的工作又陷入癱瘓狀態；許多已恢復的合理規章制度又遭否定，經濟急劇下滑，不少企業陷入停產、半停半產狀態；運輸積壓嚴重，鐵路堵塞，運輸量銳減；學校教學秩序混亂，教育質量下降，大批判風又起。縣級以上建立「批林批孔」小組，運動辦公室和學習班。以黑龍江省為例，截止3月中旬，近30萬幹部進了學習班。「批林批孔」大大影響了生產。

根據遼寧省朝陽市記載：有些單位在運動中，群眾自行成立戰鬥隊。如地區商業局機關幹部成立兩個戰鬥隊，一個叫「反潮流戰鬥隊」，一個叫「批林批孔戰鬥隊」。八家子鉛鋅礦成立54個戰鬥隊。地區輕工商店成立戰鬥隊後，該店領導讓戰鬥隊領導運動。還有些單位，群眾公然奪領導者的權。如朝陽縣大平房公社大平房大隊12隊張淑琴找到生產隊長李洪文說：「我代表貧下中農，從現在開始罷你的官，奪你的權」，後被公社制止。根德公社平房大隊偏北溝生產隊，有些社員對生產隊幹部指名道姓的要揪「小林彪」。東電一公司、朝建一公司、朝陽建築機械修造廠、朝陽水泥廠等，有些工人問：「批林批孔運動來勢猛，在中央是不是有個代理人？在下邊是不是還要踢開絆腳石，打倒走資派？搞不搞奪權？」朝陽縣古山子、東五家子公社等，有些大隊和生產隊幹部說：「××公社××大隊被群眾奪了權，誰誰『靠邊站了』，開始整幹部了」，弄得一些基層幹部惶惶不安，影響了工作積極性。

因此中共中央於4月10日發出《中共中央關於批林批孔運動幾個問題的通知》。該通知指出：一、「批林批孔」運動在黨委統一領導下進行，不要成立戰鬥隊一類群眾組織，也不要搞跨行業、跨地區一類的串連。對已經成立的聯絡站，上訪團、匯報團一類組織，各級黨委應做好工作，勸他們回本單位參加「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二、人民解放軍廣大指戰員在三支兩軍中作出了巨大貢獻。已經回部隊的三支兩軍人員，不要再回支左單位參加「批林批孔」。如果對他們有批評意見，可以送到所在部隊的領導機關。部隊各級黨委和被批評的同志對群眾的批評應當表示歡迎，認真地妥善地處理。

如果說以上兩點是為了著眼於穩定，但是該通知的第三點卻又挑起了矛盾。中央對於運

動中衝擊各級幹部沒有嚴令禁止，反而指出：「有極少數領導幹部，不批林，不批孔，捂蓋子，怕群眾，甚至採取惡劣手段挑動群眾斗群眾，破壞革命，破壞生產，煽動經濟主義，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是完全錯誤的。對階級敵人的破壞，要提高警惕。」

雖然通知點明中央「希望各級黨委認真加強領導，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眾和幹部，使「批林批孔」進一步開展起來。」實際情況卻正好相反。

以吉林省為例，1974年4月3日，中共吉林省委召開在長春的省革委會黨委、委員「批林批孔」座談會。會議認為，省委常委對「批林批孔」很不得力，犯了方向性、路線性錯誤，即「不批林，不批孔，捂蓋子，怕群眾」等錯誤。會議要求對省革委會主任王淮湘在執行路線上的大是大非問題和同林彪死黨牽連的問題，要進一步深揭深挖。5月7日，省委召開省直機關揭省委階級鬥爭、路線鬥爭蓋子會議。經過一個多月的大會小會，集中地揭發、批判了王淮湘於林彪反黨集團有牽連的許多問題。在王被迫做了檢查發言之後，會議認為王迴避了要害的實質問題。會議決定，要深入發動群眾，繼續揭批王同林彪集團有牽連的問題。

有鑒於此，中央不得不於5月18日發出《中共中央關於「批林批孔」運動幾個政策問題的通知》：除了繼續號召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的新勝利外，認為「在運動中，廣大群眾揭發批判了許多同林彪反黨集團有關的人和事，這是完全必要的。繼續把這方面的問題搞清楚，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中央也認為「領導上必須注意清查的範圍應限制在同林彪反黨集團陰謀活動有關的問題，不要擴大化。在時間上，應當以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八、九月巡視各地打招呼為界；以聽到傳達中發（1971）57號文件為界。在這以前的事，包括犯了嚴重錯誤，只要向黨講清楚，同林彪反黨集團劃清了界限，就不要再算這些老賬。」為此，中央重申中發（1971）57號文件宣佈的政策：「中央對於堅決同林彪劃清界限的同志，不論他過去是否受過林彪的影響，是否犯過錯誤，都是同樣愛護而不會輕易懷疑的。」中央希望「在林彪問題上犯了錯誤，但是已經交代了問題的同志，放下包袱，振作精神，同廣大群眾站在一起，投入「批林批孔」，將功補過。也希望那些隱瞞了某些問題的同志，把問題講清楚。凡屬好人犯錯誤，都要堅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各級黨組織應當為這些同志創造條件，使他們有改正錯誤的機會。」

據《周恩來最後兩年的政治交代》一文，此兩項中共中央通知皆為周恩來主持定稿，並反覆修改之。

7月12日，紀登奎電話通知吉林省委，指出：吉林省跨行業串聯起來的「批林批孔學習班」的少數人，隨意揪斗幹部，是完全錯誤的，要嚴厲批評制止。同日，陳錫聯、紀登奎、吳德同吉林省革委會副主任宗希雲等談話，保護了王淮湘等被揪斗的幹部。以後王淮湘因此受累為後話了。

此通知另外還指出「批林批孔運動中，湧現出了一批搞革命大批判的積極分子，應當注意培養，並且團結一切願意「批林批孔」的知識分子，推動他們同廣大工農兵群眾結合起來，逐步地造成一支宏大的理論隊伍，使全黨全軍能文能武。各級黨委都要把這個問題當作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的百年大計認真抓起來。」

此舉後來頗為詬病，各地形成突擊入黨、突擊提干的浪潮。

6月18日，國家計委向中央政治局匯報工農業生產問題時指出：1974年上半年不少地區和部門沒有完成國家計劃。許多產品例如煤炭、鋼材等比1973年同期下降很多。鐵路運輸量急劇下降。全國財政收入比1973年同期減少5億元。同月，當毛澤東得知從4月份開始全國工農業生產明顯下降後，找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等瞭解情況，並指示他們要注意全國穩定和解決經濟工作中存在的問題。隨後，毛批准中共中央於7月1日發出《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不准揪幹部，不准打人抓人，擅離職守的領導和其它人員必須返回工作崗位，對把打內戰、停工停產的行為說成是「反潮流」、「不為錯

誤路線生產」的錯誤言論必須加以批駁，等等。

2. 「評法批儒」

周恩來因病重終於與6月1日離開西花廳，住進中國人民解放軍三〇五醫院。但是批周卻批的更露骨了。社會上關於周恩來因病住院而出現流言：「主要是政治原因，是體面下臺」。而在上層，對周恩來的批判也更加露骨。

1974年6月14日，張春橋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戰士「批林批孔」匯報會上指出：「批林批孔」要圍繞「一個克己復禮，牽涉到現實階級鬥爭，兩條路線鬥爭的許多問題。」同日晚，江青接見「梁效」和「唐曉文」成員時講：「現在的文章很提到現代的儒，除了林彪、陳伯達以外。以前的，不提無神論、唯物論；現在的，不提現在的儒。難道現在沒有儒了嗎？……我希望告訴我，提到現在的儒。沒有，為什麼反孔老二？現在有沒有儒？有很大的儒，蔣介石是總代表。」在隨後的謝靜宜和遲群召集一些出版單位開會，遲群說：「你們可以注意一下，地方上的報刊和學報有沒有批大儒的文章。」一位「梁效」的領導對批什麼樣的儒做了解釋：「大儒不是指劉少奇，也不是林彪、陳伯達。」謝靜宜接著表態：「就是他講的這個情況。」6月下旬，江青又到天津一些工廠、農村和部隊，繼續散佈「儒法鬥爭持續到現在」之類的說法，煽動要「揪現代大儒」、「批黨內大儒」。6月19日晚7時半至次日凌晨，江青主持召開了一千餘人參加的「天津市儒法鬥爭報告會」，她大講其「儒法鬥爭史」，提到從先秦至明清的許多歷史人物。她並以批劉少奇「進城初期親自祭過孔」為名，說「你們不要以為社會主義沒有儒了，我們黨就出了不少的儒」，並露骨他說：「這次運動重點是批『黨內的大儒』。」她還借國外傳媒的某些提法（有外國記者就中國開展的「批林批孔」運動發表評論說：「以江青為代表的激進派同以周恩來為代表的溫和派之間的鬥爭還在繼續。」），暗示周恩來就是她所說的「現代的儒」。此後，「梁效」等寫作班子紛紛撰文著書，進行「評法批儒」的宣傳。

6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在鬥爭中培養理論隊伍》一文，提出「兩千年來的儒法鬥爭，一直影響到現在，繼續到現在，還會影響到今後。」在北京等地，街頭還出現了「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大標語。

6月23日，江青在小靳莊把接待她的婦女主任改名「周克周」。

對於是否影射，當事者有自己的說法。周一良說：我認為「批林批孔」也好，評法批儒也好，都是毛主席的部署，她只是執行而已。追查梁效的罪行之中，很突出的一條是緊跟「四人幫」，反對周總理。……我在梁效期間，從未意識到批儒是指周總理，也從未聽到遲、謝二人在任何會上暗示過。」

著名軍旅作家張聶爾說：「我曾專門為此事找過小謝（指謝靜宜——筆者註）。她一口咬定，他們決不可能影射總理。」

「梁效」主筆范達人在接受鳳凰衛視採訪說：（《孔丘其人》中描述孔子）71歲病重在床，這段話在我寫這個文章之前，我曾經看到，看到上海《學習與批判》雜誌的《孔子傳》，他們有類似的描述，我覺得這段描述孔子的復辟形象很好，我採用它了，我們寫文章是1974年2月份寫的，當時總理呀還不斷出來接見外賓，參加各種活動，還是這樣的情況，總理生病，總理有病住院是6月份的事情。然後再講當時這個梁效大批判組的領導，他們也沒有任何人沒有向我暗示，你們寫這篇文章要影射周恩來，沒有，這個實話實說，沒有還是沒有，我不能栽在人家頭上，為自己開脫。」

范達人在其回憶錄《范達人：「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中說：1998年1月，我曾向謝靜宜問及這篇文章的寫作背景。她說：「《孔丘其人》一文是江青建議寫的。目的在於簡明扼要地介紹孔子。我就此事專門請示了毛主席。主席同意寫這篇文章。文章在

公開發表前，我們曾將文稿報送毛主席和周總理閱審。」如果要問我，想在此文中影射何人，那麼，坦率地說，首先是林彪，其次是李德生。李當時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在「批林批孔」前夕，從內部得知，他已受到批判。江青在一次座談會上罵他是「大惡霸」。1974年2月間，（中國文革研究網整理）江青叫陳亞丁到她那裡開會，她說：「八一廠造孽了，軍閥管理。」會一開完，總政就貼出了大標語：「打倒大軍閥李德生」。這事傳到了「梁效」大批判組。在此影響下，我們在《孔丘其人》一文中用了一個「凶狠殘暴的大惡霸」的小標題，影射李德生，這是實情。

究竟有沒有影射，相信讀者可以自辨。

五、「批林批孔」的終結

1. 軍隊中的「批林批孔」

「516通知」中宣稱「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使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但是在1966年底，天下趨於大亂之際，毛澤東不得不動用軍隊穩定地方，這也是軍委「八條命令」和「三支兩軍」的背景。但是隨後的軍委「十條命令」把「八條命令」否定，於是不少人認為偉大領袖是要把「混入黨內，政府內，軍隊內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揪出來，地方已奪權，將要奪軍隊權了，突然風向一轉，揪「軍隊一小撮」甚囂塵上，結果軍隊勢力大為反彈，終於激出驚天動地的「720事件」。毛澤東隨後急劇左轉，欲以民兵、造反派為依托，建立「第二武裝」，對此各級軍隊也紛紛軟磨硬抗，甚至造成軍隊內部的對立。同時火燒英國代辦處、外交部奪權，武鬥演變成「全面內戰」，對此毛澤東不得不審時度勢，拋出「王關戚」以平息眾怒。

「九大」召開不久，林彪主動出擊，攻擊張春橋，大有「釜底抽薪」之勢。毛澤東本來就沒有把林彪作為真正的接班人，現在林彪「自我暴露」，拿掉林彪也就是順理成章之勢。「九?一三事件」的爆發或許是偶然，但是林彪的「失敗」卻是必然的。「林彪事件」給予毛澤東的沉重打擊是不言而喻的，更重要的是廣大群眾對文革懷疑的思潮漸起，這是以後毛澤東再也不能發動大規模群眾運動的根本原因。經過1972—73年的短暫平靜，縈繞在毛澤東心頭上的軍隊問題再次被提了出來。

「九?一三事件」之後，毛澤東曾經要求軍隊「凡討論重大問題，要請總理參加」。1973年毛澤東兩次嚴厲訓斥周恩來後，毛澤東覺得必須對軍隊也採取措施。毛澤東先是在12月將八大軍區司令對調，接著在隨後展開的「批林批孔」運動中把軍隊好好的「整治了一番」。

1月13日，江青就給給空軍領導人寫信，要求「批林批孔」，隨後又找遲群等人談話，將他們派往海軍、空軍等單位「點火放炮」。隨後在1、2月間，江青還以部分軍區連隊作為「批林批孔」的試點，江青連續以個人名義給中央國家機關，軍隊領導機關和連隊、科研部門以及下鄉知識青年寫信，送材料。江青還指示要給南京部隊、廣州部隊以及國防科委等送信、送材料，宣講「批林批孔」。同期間，江青在軍隊地方召集的會議上稱：「今天我是斗膽。我不敢得罪軍隊，今天把你陳亞丁也請來了，就是要整一整軍隊。」1月27日，江青在即將結業的某期中央讀書班學員和即將派往外地的一批記者參加的會議，點了總政治部副主任田維新的名，並命人撕下其作為革命軍人榮譽標誌的領章與帽徽。（解放軍總政治部和《解放軍軍報》等軍隊宣傳系統負責人亦與會參加）。

江青在「1.25」講話中提出要揪「走後門」，對於江青這種沖淡主題的做法，毛是不滿的。特別是不合毛「批林批孔」的戰略安排。毛意圖通過「批林批孔」達到批周、整軍隊

的目的，但是不想文革初期的天下大亂重來，而江批走後門問題無疑會使衝擊面大為增加，自然會沖淡「批林批孔」的主題，那就是集中批周。另外，毛希望是通過這次運動樹立起文革派在軍隊中的威望和建立起人脈，「走後門」問題主要是高級幹部在軍隊中安插子女問題而非軍隊主要領導人的問題，揪「走後門」問題勢必不合此戰略。況且毛澤東本人也在「走後門」。

「批林批孔」運動伊始，正如周恩來在「1.25」講話中所提及，江青等主導了在軍隊中的「批林批孔」運動，以個人名義給空軍、各大軍區領導機關寫信、送材料等，要求進行「批林批孔」。王洪文、江青、張春橋相繼在軍隊系統「批林批孔」匯報會、軍隊文藝單位負責人會議上，指責軍隊領導機關對「批林批孔」消極應付，「右傾手軟」，提出「要整一整軍隊」，「該奪權的還是要奪」，要在軍內搞「放火燒荒」。

北京三總部首當其衝。據說在一次會議上王洪文和張春橋斷言：「總參領導右傾手軟，右得不能再右了。對總政治部可以奪權。總後勤部垮得愈快愈好。」2月8日，在一次會議上，王洪文、張春橋攻擊「總參領導右傾手軟，右得不能再右了。」2月25日，江青在會議上大喊：「總參問題太多了，要放火燒才好！」3月6日，王洪文聽取總參謀部匯報之機時說：「要揭總參的蓋子！」「揭不開就砸，砸不開就用炸彈炸！」張春橋在2月28日重提在1972年發生的「山東問題」：山東問題怎麼解決的？2月21日，王洪文派秘書到總參作戰部調走根據周恩來指示和批示承辦的文電34份。4月，總參作戰部被勒令清查所謂的「北兵南調」問題。此事最後卻不了了之。

1974年3月5日，張春橋、江青召集於會泳、陳亞丁等人開會。在會上，江青點名攻擊中央領導同志，說什麼「八一（廠）造孽了，軍閥管你們。」陳亞丁回去立即傳達佈置，煽風點火。「打倒大軍閥」的標語在北京和全國風行一時，造成軍隊和地方很大的混亂。陳亞丁還說：「江青同志要我回到總政，就是要放火燒荒。今天叫你們來，就是叫你們回去放火！」

為查看總政點火的情況，江青要求遲群、謝靜宜去總政大院查看情況，而且告訴他們「為了保證你們的安全，我已告訴汪東興，去總政這段時間內，給你們每人派一名警衛員。」這意味著毛澤東對軍隊「批林批孔」的支持。當新年伊始的時候，海軍就作為「批林批孔」的試點單位。遲群、謝靜宜來到海軍召開大會，肖勁光也表態支持「批林批孔」運動，並做了自我批評。肖勁光後來對此解釋說：「他們打著毛主席的旗號，江青又有代表毛主席的假象，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人唱反調。」所謂的假象是後來的說法，當時肖勁光的認識只能是「真相」。在軍隊中的「批林批孔」，如果說王洪文、張春橋還有合法身份的話，江青在軍隊中並無任何職務，只能用背後有毛澤東這個靠山才能解釋的通。這同周恩來沒有在軍隊中任職卻可以下令調動軍隊是一個道理。正如後來毛澤東對於「批林批孔」是正面評價的，充分說明了江青的「擾亂軍隊」的所作所為是毛澤東支持和默許的，這也是毛澤東言外之意所講的「江青代表我的」的含義。只有如此，才能解釋所有發生的這一切。

陳先瑞回憶到：「批林批孔」運動中，江青多次插手北京軍區部隊。她抓了北京衛戍區某師6連和保定某軍8連，作所謂「批林批孔」的試點。她以個人名義給連隊寫信，送了上百種材料和書籍，如《儒法鬥爭史講稿》等。2月4日和6月20日，江青先後兩次把連隊部分幹部、戰士召到北京，當面聽發言，匯報，作指示。她還抽調一名連隊指導員和五名戰士，到湖南搞了三個多月的調查；派戰士到全國各地的「批林批孔」點上送《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未定稿)，並收集瞭解情況。江青還到天津某軍九連，直接聽發言和匯報，觀看軍事表演。

江青不僅自己到軍區部隊去，還派沒有軍籍的記者到軍區機關搜集情況，規定記者可以參加包括軍區黨委常委會在內的所有會議，看軍區的所有文件，還可以查閱檔案材料。……在全國「批林批孔」又夾著批「走後門」，那時叫「三箭齊發」，在北京軍區卻是亂箭齊發，

又把「文化大革命」以來的問題翻騰一遍，軍區機關二級部以上的一些領導同志，又受了一次批判。這回給我算了一次總賬，查了我14個方面的所謂錯誤。

（後來）我根據自己對「批林批孔」的理解，（在北京軍區召開的會議上）講得很隨便。我說：對「批林批孔」運動，我們還不夠理解，現在要一面學習一面搞運動，在精神上需準備挨點批，挨批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沒有想到，我的講話內容很快就被河北省軍區的人告到了江青那裡，江青按捺不住對我的怒火，於5月12日給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鄧小平、紀登奎、陳錫聯寫信，說「陳先瑞不帶頭『批林批孔』，不作自我批評，把矛頭指向群眾，借『批林批孔』發牢騷，北京軍區的『批林批孔』運動開展得不力」等等，弄得北京軍區領導很緊張。

在江青寫信的當天晚上，軍區召開黨委常委擴大會，陳錫聯、紀登奎傳達江青的信，對我進行批評。我於5月13日向江青寫了檢討，經陳錫聯、紀登奎轉給江青。我在檢討中說，江青「對我的錯誤進行了嚴肅的批評，指出我的錯誤的嚴重性，這是對我的關懷和挽救，使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同時，對我們軍區的「批林批孔」運動牢牢掌握鬥爭的大方向有重要意義」。其實，這個違心的檢討，是陳錫聯、紀登奎同志為保護我過關，親自幫助寫的。在那種高壓下，不得不低頭。

不得不低頭，是因為江青麼？顯然不是，是因為站在江青背後的「偉大領袖」毛主席。

2. 八大軍區司令對調的妙處

廣州和南京軍區的司令對調，丁盛到南京，許世友到了廣州。

許世友的秘書李文卿說：丁盛調任南京軍區司令員不久，就說：「我既有挨整的經驗，也有整人的本領。」對前任許司令，他嘴上稱之為「老前輩」，褒之以「很能打仗」，當眾表白：「我很尊敬他。有人說我反對許司令，我怎能反他呢？」轉過臉又指責南京軍區「迷信沒有打破，蓋子沒有揭開，路線沒有分清，顛倒了的歷史沒有顛倒過來。」以揭不揭許司令為標準劃線，分裂幹部隊伍，理所當然地遭到了抵制，又採取「搬石頭」、「攙沙子」的辦法「改造軍區機關」。然而「倒許」的手段一套接一套，卻極少有人附和。有個想當「倒許」積極分子的收發員，從一封寫給許司令原來的保健醫生「高老」的信上認出了我的筆跡，把信交了上去。丁盛拆看後，發現信中有對「批林批孔」不滿的內容，在大會上點了我的名。結果呢？群眾輿論沒有講我的不是，反倒對這種不顧國家法律和職業道德的行為嗤之以鼻。丁錯估了局勢。

互相搞的不亦樂乎的時候，江青又出面安撫各軍區新上任司令。兩手並進，毛可謂用心良苦。

遲澤厚先生說：1974年1月28日，江青特派三名信使持其親筆信交送到廣州軍區司令許世友手裡，鼓動許世友「在上層建築、意識形態領域中進行一場持久的戰鬥」，信中還說「我們是心連心的。」許世友接到江青的信，心中有底，於是大刀闊斧的幹了起來。許世友為了製造聲勢，打開局面，一方面把過去黃永勝、劉興元當政時期因各種原因受過處分被調離軍區機關或轉業地方的人員，請回機關參加運動；同時又拉上趙紫陽，接見已堰旗息鼓多年的廣州地方兩派群眾組織的33名頭頭，宣稱軍區原主要領導人劉興元、丁盛、任思忠是林彪死黨，要這些頭頭與他「共同奮鬥，你們在地方揭，我們在軍隊揭」。許世友頻頻在大會、小會、軍內、軍外講，廣州軍區的問題「不簡單」，過去被「捂了蓋子」，現在要「打破沙鍋紋(問)到底」。於是，運動迅速升溫。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問題越揭越多，而且都具有「爆炸性」。隨著材料越揭越玄，破綻越來越多，結果是曲高和寡，最後變成多數人看，少數人表演，影響惡劣。北京在7月29日發來緊急電報指名批評了許世友，並派韋國清來處理善後。廣州軍區轟轟烈烈的「批林批孔」運動戛然而止。

丁盛說：「在廣州搞了兩次，一次是七四年，第二次是七七年、七八年、七九年，那一次真是荒唐，還是林彪南逃，還是這些人，結果兩個副司令被隔離，江燮元、黃榮海，這些同志是非常忠誠老實擁護毛澤東，擁護馬克思主義的人！他們不是為林彪革命，是為勞苦人民革命，是毛澤東培養出來的人。隔離起來，在中山紀念堂召開五千多人的大會，副參謀長劉如，政治部副主任李維英、趙國楠，要打倒他們。說是丁盛不接電話不知道，丁盛的秘書知道，陳宏康知道！真是我不知道，沒有這個事，所以我感覺到，這個事對廣東，中央雖然沒有下正式的什麼結論，但是在廣州搞的這些事情，影響很大，對廣州這部分幹部，在精神上，是很大的包袱、負擔！」

丁盛還說：「74年在廣州「批林批孔」，許世友提出來，廣東的劉興元、丁盛、任思忠就是林彪的死黨，不是死黨也是死黨。」

被調動的八大軍區司令享受此「待遇」的為數不少，過程也頗為類似。

許世友的秘書還說：（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張春橋氣勢洶洶地打出了「解決南京軍區的問題」的旗號，顛倒黑白地胡說：「南京軍區長期以來歪風邪氣盛行，正氣抬不起頭來。」在軍區和一些地方拉攏親信，又是「揭蓋子」，又是「砸核桃」，矛頭直指許司令。

3月11日，在軍隊沒有任何職務的江青，親筆寫信給南京軍區某部防化連，並派親信遲群、謝靜宜到這個連隊送「批林批孔」材料，煽動部隊揭發上級領導機關所謂「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大是大非」。3月26日，王洪文竄到浙江，擅自召開省委全會、省革委會和省軍區黨委會，公然宣稱：「涉及軍區以上領導人的問題也可以揭發。」（筆者註：原文如此，并非表示筆者同意其觀點。）

4月27日，王洪文又背著黨中央和毛主席給浙江的造反派頭頭打電話，要他們繼續揭批「軍以上領導」，並點了許司令的名，說「許世友想搞三省壓上海，搞獨立王國。浙江的問題在南京。」（筆者註：原文如此，并非表示筆者同意其觀點。）

這一時期在軍隊的「批林批孔」的記載，多是王洪文、張春橋以及江青等人的所作所為。作為軍委六人小組的成員，其行為是合法的。而軍委六人小組組長葉劍英也在3月8日召開的聽取國防科委「批林批孔」匯報會上表示要派人下去「煽風點火」。

1973年底的八大司令對調為1974年江青等人的行動鋪好了路。一方面，原來各大軍區司令的老班底可以徹底的揭發老司令的問題，雖然免去了面對面的尷尬，但是這種背對背的揭發卻讓人有口難辯，更重要的是大量的揭發材料成了這些司令們的「緊箍咒」。

3. 8月軍隊高幹會議

1973年12月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以後，在中央佈置下，各大軍區通過召開黨委擴大會議等方式，揭發有關同林彪集團鬥爭中的人和事，主要對象是被對調的八大軍區司令及其政委等。為此毛澤東決定成立以王洪文為首的專案組，專門處理各大軍區的揭發材料，並成立了兩個專案小組：李德生專案小組和許世友、楊得志、韓先楚以及陳錫聯專案小組。1974年7月，王洪文把這些揭發出來的送給毛澤東，並發給政治局委員。這些材料表明這些司令們無重大問題，比周恩來掌管的專案組要實事求是得多。

1974年8月，軍隊高幹會在北京召開。會議由王洪文主持，把各大軍區司令分成幾個小組，分別「批評幫助」。李德生、許世友、韓先楚等是批判的重點對象。關於如何開會，毛澤東指示：我看找他們來。不要一個一個，各大軍區司令員、政治委員都來，一道談一下。聽說會議氣氛緊張，他特別交代，每個同志發言時不要插話，發言後都要鼓掌歡迎。關於問題的性質和程度，毛澤東說：除若干同志外，有少數同志或多或少有些問題。又說，各地大字報揭露的都是老賬。這些人有錯誤，揭一揭也好。王洪文傳達了這個毛澤東的指示。毛澤東同時表示「要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一棍子打死不好。允許人家改正錯誤

嘛，要給人家機會。」

會議只要一開，就絕對不是多做自我批評，講完了就講完了，發言後都要鼓掌歡迎那麼簡單。韓先楚說：我願意認真檢查自己的錯誤，但我不能按照會議發給的《檢查提綱》檢查，因為我不能瞪著眼睛胡說八道。但是身不由己，最後還是得按那個提綱認錯。

丁盛回憶說：我在南京工作時，74年的8月份，在北京開會，當時主持會的是王洪文、張春橋，總理他們都沒有來，主席那就更不說了！我們九個人作檢討，楊得志、許世友、韓先楚、曾思玉、我、陳先瑞，劉興元都作檢討，對林彪思想上的認識，都作檢討。這個期間，張春橋、王洪文硬追我，說「林彪南逃你知道」，我說：「不知道！」張春橋的作風，比王洪文凶啊，形象凶，講話也凶，王洪文看著總下不了台，就說：「你不知道，以後再說！但是你，你上了林彪的賊船」。我說好吧，咱們就作妥協，這個可以的，但是我沒有和他搞陰謀詭計。「你要寫上」。我說：「寫上就寫上！」

這是74年8月檢討，我們這九個人的檢討，各種各樣的檢討！現在來看，不該屈服，不該寫，我否定，我上什麼賊船啊？

據丁盛說，有人要求他下來，當時是周恩來總理堅決不同意，說：「丁盛不能下來。」毛澤東自然是不能把這些司令們全部趕下台，目的是要樹立王洪文的權威。整個會議都是由王洪文主持。會議高潮過了，毛澤東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對於司令員們，毛澤東說：都是一些老問題了，在會上講也可以，寫出來印發也可以，不寫也可以。不要那麼挖苦，不要強迫人家做檢討，不要搞得那麼緊張，傳達範圍也不要太大，檢討不要發下去。為了幫鄧小平拉攏人心，毛澤東特意讓鄧小平捎話給這些挨整的司令們。9月過後，各大司令按照會議要求和定下的調子紛紛檢討過關。

4. 試點——總政治部

鑒於李德生在安徽支左的出色表現，中共中央不止一次向全國通報他的經驗。在1968年10月13日八屆十二中全會開幕式上，毛澤東當眾誇獎他「哪個是李德生？你們安徽的事件辦得不錯，你們整蕪湖整的不錯嘛！」在毛澤東的欣賞下，李德生是「芝麻開花節節高」，九屆一中全會上，第一次當選中央委員會的李德生被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1969年4月任中央軍委委員，1970年4月任總政治部主任。1973年8月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李德生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可是，到1973年12月，風雲突變。在北京軍區司令員任上不到三年（次任職時間同其它被對調司令成為明顯對比，例如許世友在南京軍區司令任上長達18年，自1955至1973）當黨中央副主席才三個月，李德生就被調離北京。他兼任的總政治部主任，被毛澤東一句「不要兼了吧」一句話就抹掉了。

李德生之遭遇，可以說至今還是撲朔迷離，個中緣由，現在還無法完全解釋清楚。《李德生回憶錄》則聲稱是「四人幫」誣陷所致。1980年8月26日中共中央為李德生徹底平反的決定中有一段話說得分明：「1974年9月間各大軍區負責同志在會議上，『四人幫』強迫德生同志承認『推行林彪路線』、『上林彪賊船』是不合乎事實的，應予以推倒。」但是作為一個中共中央副主席，豈是江青等所能決定的？

1974年底，為了給鄧小平騰出黨中央副主席的位子，紀登奎和李先念找到李德生談話，提到要他辭去黨中央副主席的職務。在此之前，在黨內很少有黨中央副主席辭職的，李德生聽後很詫異。紀登奎和李先念只是奉命辦事，不願意和李德生多說。紀登奎直截了當地說：「德生同志，你應該明白，你是黨中央的副主席，我們兩人只是政治局委員，按規矩，我們是沒有資格和你談這個話的。要你辭職，這是毛主席的意見。」

「九大」之後，毛澤東用「摻沙子」的方法抑制林彪勢力的增長，首選目標是軍委辦事組。1969年7月28日，李德生奉調進京，下午3時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會見了李德生，並通知李德生「中央已經決定了，你除了參加政治局活動外，還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和軍委辦事組的活動，同時仍然兼著安徽省和十二軍的職務。」

總政治部被砸爛後，毛澤東曾經設想讓張春橋當任總政治部主任一職，徵求林彪意見時，可是林彪就是頂著不辦。1969年12月，總政治部軍管結束，由李德生主持工作。林彪後來說：「我在江蘇跟許世友同志說，偏偏要找一個軍事幹部來總政當主任。軍事幹部中有許多不僅懂軍事，也懂政治，他們打過仗，不脫離實際。我偏偏找一個軍事幹部管政治，找個『丘八』管秀才。」林彪還說：「毛主席信任老粗，我也信任老粗。我說這些人粗中有細。」林彪推薦李德生是為了抵制張春橋的任命，毛澤東對李德生也是滿意的，因此一拍即合。但是這卻是李德生以後被整的原因之一。

1970年8月，在廬山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上，因為林彪發動對文革派的進攻，導致毛澤東的強烈反彈。李德生深得毛澤東信任，在會議中途被派下山，主持軍委辦事組工作。九屆二中全會之後，毛澤東為了防止天子腳下作亂，改組北京軍區，李德生作為「摻沙子」的重要一員被任命為北京軍區司令員。「九·一三事件」發生時，李德生被周恩來派到第一線，在空軍作戰值班室坐鎮指揮。事後，李德生還是中央處理林彪事件專案組成員。並由李德生領銜會同余秋裡、張才千主持軍委三總部的工作。

九屆二中全會期間，汪東興廬山會議上的「跳得最高」，不僅在發言中支持毛澤東任國家主席，林彪任國家副主席，且矛頭直指張春橋等文革派。毛澤東對此極為不滿，不僅大罵了汪一頓，還命汪停職反省，在家閉門思過寫檢查。據知情人告之，李德生推薦了楊德中接替汪東興，接管中央警衛團。周恩來並且找楊德中談了話，而康生則找了王良恩，讓王準備接管中央辦公廳。楊德中為了接管中央警衛團找了局辦公室的武建華和清華大學支左的遲群，對他們講了周恩來的部署，而武、遲二人卻將此消息報給了汪東興。不料，汪東興乃是毛澤東故意放出去的「蔣干」，並沒有真心想「換馬」。而楊德中同周恩來的關係非常深，形同毛澤東同汪東興的關係。如果楊德中替換了汪東興，不知道偉大領袖是否還睡得著覺。1973年，毛澤東兩次對周恩來大動肝火，此事又成為李德生受牽累的一大原因。對於此點，李德生在1986年回憶說：「江青一夥終於借『批林批孔』，掀起了反對周、葉的惡浪。我在工作中，大事都請示總理、葉帥，他們便稱我為『大軍閥』，進行批判鬥爭。」

「十大」之後不久，毛澤東要整軍隊，原因複雜，但是清除林彪勢力是其原因之一。而李德生原來是被毛澤東看作是「摻沙子」，現在在毛澤東看來是同林彪「穿一條褲子」，阻攔張春橋的任命。現在把李德生一腳踢開，就是為了給張春橋騰出「政治部主任」一職的位子。一年之後，周恩來向毛澤東談到他設想的總政治部主任的三個人選時，毛澤東笑著說：「羅榮桓。」但是隨後的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經毛澤東圈閱的一號文件，任命張春橋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也因此，後來李德生在1974年8月軍隊高幹會議上，就是因為是否上了林彪賊船問題而被窮追猛打。此事還同1970年5月19日林彪接見李德生有關，李德生後來說作為總政主任，在林彪一大篇講話之後，我不能不表態，是有盲目吹捧之嫌。

但是事情遠比這個複雜。李德生還向林彪寫了「效忠信」，雖然此事在「十大」以前就明瞭，並且沒有影響到毛澤東的信任，繼續在「十大」上得到提升和重用。但是當毛澤東因為要批周恩來，要清除林彪在軍隊中的影響的時候，要提撥張春橋等諸多問題糾纏在一起的時候，李德生成為靶子是在意料之中。

李德生調離北京軍區之後，政治部一時顯得「群龍無首」，毛澤東有意把它作為一個試點。

1974年1月13日，江青對遲群和謝靜宜說：「我就是要把你們當炮彈放出去，打

破他們的一統天下。讓你們到海陸空三軍去點火燒荒。總政的問題大得很，那個李德生不是一個東西，他在林彪死後就和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互相勾結，把軍隊要變成他們的工具。這是非常危險的。」

在1月27日晚，江青整了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田維新。

1974年3月5日，江青召集文化部部長於會泳和總政原文化部副部長陳亞丁等人到釣魚台開會。江青對陳亞丁後說：「李德生把八一電影廠搞得亂七八糟，造孽了，他們欠下人民的一大筆債。我看總政不是一個小問題了，是要重新奪權的問題。陳亞丁，你去把權奪過來嘛！」張春橋則說：「毛主席提出批林批孔，這些人就造謠，竭力反對，甚至說什麼批林批孔是多此一舉。李德生就公開說：『我們不認識孔夫子，沒有什麼批頭。總政這裡不需要批。』這樣的人能擔任總政主任嗎？」

陳亞丁雖然召集駐京部隊文藝單位一些負責人開會，傳達江青的講話，佈置在部隊「放火」，「奪權」。但是陳亞丁既不敢找黨組織也不敢去找有關領導去「奪權」，還怕找錯了對象！最後，陳亞丁是兩手空空，什麼權都沒有奪到。江青等人把水搞混了卻沒有抓到魚，可見能力和手段均屬平平。

軍隊畢竟是毛澤東的「命根」，但也是最講究資歷的地方。這就是為什麼張春橋在黨內地位雖然高於許世友（政治局常委和南京軍區黨委第一書記），但是在南京軍區，張在軍區並無實權。這一點，許世友的兒子在一封信中交代得明白：「爸爸說，別看王洪文是軍委副主席，張春橋是總政治部主任，軍隊沒人聽他們的，槍桿子全抓在我們手裡。他們只能調動幾個民兵師。爸爸說，他只用一個軍，就能把上海的民兵全吃掉。他把六十軍擺在無錫，就是盯著上海的。」

「槍桿子出政權」，這是一句至理名言。經過半年多的借「批林批孔」整軍隊，毛澤東的意圖並沒有達到。總所周知，毛澤東之所以能發動文革，一個是有堅實的「文革」的依靠力量即軍隊，另一個是有堅定的「文革」的推動和貫徹者即文革派。現在，毛澤東希望文革派能夠在軍隊中建立起自己的班底，到頭來仍然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雖然亦有趙紫陽、胡喬木、譚震林等人向江青等人表態，但是終歸都是手無寸鐵之人。因此江青等也就只能像是40年代的王明等「教條宗派」那樣只剩下嘴上的功夫。毛澤東也就只有說「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

六、周恩來的日子不多了

毛髮動「批林批孔」的另一大目的是整周。

1974年6月（此時評法批儒正轟轟烈烈，批現代大儒），毛澤東又找出在延安整風時期寫的「九篇文章」仔細看了一遍，並將其中有關稱讚劉少奇的內容全部刪掉，打算印發中央委員，但後來只發給部分政治局委員。「九篇文章」寫得很尖稅。它不僅點了幾位政治局委員的名，也點了周恩來的名，指其為「經驗宗派的代表」，為教條宗派「跑腿抬轎」，充當「幫兇」。而且用詞辛辣、刻薄，甚至還帶有某些挖苦。它是毛編輯《六大以來》時的激憤之作，也是過去長期被壓抑的鬱悶情緒的大宣洩，刺人的過頭話不少。後來雖幾經修改，然而整篇文章的語氣仍然是咄咄逼人、鋒芒畢露的。此時拿出來的目的不言而喻。

但是1974年的周，病情越來越重，出血速度快過排血速度，血塊堵住尿道口，使每次小便都是一場痛苦的掙扎。周不得不又跳又蹦，又翻又滾，想把堵在尿道口的血塊撞開。因為失血太多，周每星期要輸兩次血。醫生們要求給周做手術。經過各方包括周恩來自身的努力，終於在6月1日住進了醫院，當天就動了手術。但是8月上旬，周恩來再次開始尿血並被確證癌症轉移。周恩來於8月9日致信毛澤東，匯報病情及治療方案，並告：「在上次手術後。體力雖較弱，但自信尚能經受這次治療。」經毛澤東批准，於10日作第二次大手

術治療。此時的病情表明周已經來日無多。

就在7月份毛澤東離京的時候，還放出「煙霧彈」，特意提到了九篇文章的事，稱：文件我收回了，而且燒了，不要了。毛澤東還一手握住周恩來的手，另一隻手握住葉劍英的手，說：「你們為什麼對這兩個人過不去，他們不能反，一反就犯錯誤的。」（根據耿飆回憶毛澤東批評江青等人的話語推測為1974年的7月，而非耿飆所言的1973年——筆者註）高文謙先生認為「他（毛澤東）決定離開京城這塊喧囂之地，赴南方休養一段。這是毛在政治上作出重大決定前的習慣，當年發動文革，向劉少奇展開攻擊前就是這樣做的。」

既然周恩來不久即將離開人世，毛澤東心病既可以除掉，何必再大動干戈，引起社會震盪呢？對於那些剛被解放的老幹部也是個安撫。對於自己精心營造的老幹部和文革新人加上華國鋒、紀登奎等人的政治格局業已基本成型，毛澤東將繼續整周的念頭暫時擱置。這是「批林批孔」得以停止的一個重要原因。

對於毛澤東來說，在「九·一三事件」之後，毛已經沒有足夠的信心和精力讓1966—68年的形勢重新來過一遍，多次承認「全面內戰」和「打倒一切」的錯誤不能重演。因此毛澤東一直處於兩難。例如毛澤東雖然支持「批林批孔」運動，但不願再次看到社會出現動亂。為制止混亂局面的發展，中央採取了一系列果斷措施。不僅批「林批孔運動」，還是以後的反「經驗主義」、批「水滸」等，都是虎頭蛇尾。

這一系列的措施中，最為重要的一條，就是毛澤東的「八月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此指示的直接後果就是「批林批孔」的停止、四屆人大被重新提上議事日程，遠期後果則是為1975年鄧小平的整頓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還有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批林批孔」逆勢而行，周恩來的因病住院，這一切反而造就了周恩來的「忍辱負重」的形象。1974年9月30日的對周恩來抱病出席國慶招待會的掌聲就是對當時再次動亂的不滿。

在「批林批孔」運動中，雖然毛澤東也多次批評過江青等人，但是著眼點卻是「幫助」。1974年7月7日，在毛澤東離京去武漢休養的前一天，他召集了「批林批孔」運動開始以後的第一次在京政治局成員會議。在這次會上，他告誡江青不要設鋼鐵工廠和帽子工廠，提醒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但是王洪文依然主持黨中央工作，張春橋則很快被任命為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國務院副總理。在中共中央關於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通知中，傳達了毛澤東關於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這一段話；在政治局常委會上則傳達了毛澤東批評「四人幫」的有關內容；可是，在政治局傳達的1974年9月至12月毛澤東對國內工作的「指示要點」中，卻沒有這一指示。顯然，毛澤東當時作出的這一指示有著明確的針對性。

毛澤東還特意提到「她（指江青）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豈不是不打自招？正因為以前江青代表過毛澤東！

《毛澤東傳》突出敘述的毛澤東對江青等人的多次批評，但是毛澤東從來沒有從整體上否定過「批林批孔」運動。如同毛澤東在1973年的11月批周會議後的表現一樣，毛澤東在1974年年底，還表揚了江青：「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立了功，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此類批評與其說是批評，毋寧說是對其政治鬥爭手腕、策略的教誨。中共官方把毛澤東對江青的批評來證明「（毛澤東）並沒有主張在中央的全盤工作中突出「批孔」問題，更沒有提出要發動一場大規模的「批林批孔」的政治運動。」是站不住腳的。進而開脫毛澤東在「批林批孔」實為批周恩來上所應當承擔的責任。

毛澤東雖然多次批評過江青，但是從來沒有作出決定性的指示要求停止這場運動。就是在7月17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雖然是毛澤東第一次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點名批評江青，並且話說得那樣重，點出了「四人小宗派」的問題。這是很不尋常的舉動。但他還留有餘地。

在主要是批評的同時，毛澤東在會上也說了「對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更重要的是毛澤東批評的都是江青的工作作風，善意的批評，絲毫沒有提及「批林批孔」的問題，而且要一分为二！

七、周恩來與鄧小平的崛起

劉曉波先生認為：「文革結束之初的中國，由於中共的黑箱制度，當時的絕大多數百姓，一直把周與鄧視為毛的對手，把鄧的復出之功算在周的身上，認為鄧是周的接班人。而百姓們並不知道：70年代中期，毛澤東之所以一邊發動「批林批孔」運動，一邊重新啟用鄧小平，主要目的是為了防止林彪死後周恩來的權勢擴張。所以，鄧小平縱容改革初期的褒周貶毛，也是為了利用周在黨內和民間的人望，來獲取黨內高層（特別是平反了的高官們）和民意的支持。」就歷史上的淵源來看，鄧小平是毛派而非周派。鄧小平在文革中始終是毛澤東手中進行權力鬥爭的一枚重要棋子。更為重要的是，鄧小平是毛澤東一直想用來替代周恩來的最重要的人選！

1. 毛、周、鄧的三角關係

毛澤東、周恩來、和鄧小平三者在長達近50年的交往中，其關係是錯綜複雜的。早期在蘇區形成的關係，及其所造成的的影響遠遠比一般人認識的要深刻的多。周恩來隱瞞博古成為「總負責」的真相，無疑是毛澤東對於周恩來不滿的根源。自周恩來到蘇區後，毛澤東頗受壓制，「寧都會議」周更是難辭其咎。長征開始以後，周恩來更是不買毛澤東的賬，以至多年以後毛澤東多次恨恨不平的對王力說「老是四票對三票」（指周恩來、李德、朱德、博古對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一筆者註）毛澤東更是在衛士面前講過「此人當初是要殺我的」。此人有傳為博古，據筆者採訪得知實指周恩來。其後周恩來又在抗戰初期緊跟王明，雖然在延安整風，周恩來向毛澤東輪誠，甚至說自己是犯了罪惡的，在組織路線上再也沒有背叛過毛澤東，但是1956年關於「反冒進」的爭論，使得毛澤東再次對周恩來的政治路線表示懷疑。除了周恩來對於毛澤東個人的絕對忠誠以外，周恩來的組織和工作能力也是毛澤東所需求的。因此自延安整風以後毛澤東對於周恩來的態度就是「用（工作上）而不信（政治上）」。文革初期，周恩來成了毛澤東發動文革整倒劉少奇最重要的打手。「九一三事件」之後，客觀的形勢讓周恩來處在了「接班人」的位置上，但是為此周恩來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雖然周恩來可以通過毛澤東要求其做40—50分鐘的檢討的機會「趁機」做上7個小時來向毛澤東表示自己的忠心，毛澤東最後還是沒有放過周恩來，一直到周恩來在恐懼中死去，周毛關係徹底結束。

鄧小平之所以在文革中被打倒而又復出，蘇區的經歷也至關重要。在1972年毛澤東解放鄧小平的重要批示中第一條就是「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1937年紅軍整編，名不見經傳的鄧小平出任129師（大部分官兵是原四方面軍——筆者註）政委，可見毛澤東對鄧小平是另眼相看的。鄧小平給毛澤東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一是聽從命令，千里躍進大別山，不計自己損失；其二是軍事指揮才能得到毛澤東的認可，抗美援朝時候一度作為志願軍統帥的人選。建國後高崗事件，鄧小平因為向毛澤東揭發高崗而獲得毛澤東的進一步信任。作為建國後的更重要的一筆政治資產則是來自於蘇共二十大。鄧小平明確不同意赫魯曉夫的做法，同朱德形成鮮明對比。此事在中共「九大」的時候被毛澤東表揚。作為「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實際主持「反右」運動的鄧小平指出：右派十分猖獗，必須痛加打擊，右派實際同地主富農等一樣屬於敵我矛盾，決不能手軟，必須趕盡殺絕。這同毛澤東的思想是一致的。1957

年11月在莫斯科，毛澤東當著赫魯曉夫的面高度評價鄧小平「這個人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是我們黨內難得的一個領導人才。」原則性一詞同「反右」的成果分不開的。1959年4月，在黨的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確地說：「權力集中在常委和書記處，我為正帥，鄧為副帥。」「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從1956年2月到1963年7月，鄧小平先後七次率領中共代表團去莫斯科，同蘇共談判。1963年7月21日，當鄧小平回到北京時，毛澤東親自到機場迎接。毛澤東認為鄧小平是堅決「反蘇修」的。可以說，從反右到批教條主義，再到大躍進，直到「九評」，鄧小平可謂就是毛澤東的代言人，意氣風發的走了一路。鄧小平同時對毛澤東的宣傳不亞於其他人。在建國以前，鄧小平是第一次提出「兩個凡是」的。鄧小平在解放區進行土改的時候也是很左的。整個60年代，鄧小平不僅強調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性，而且也強調毛澤東思想與毛本人的關係。在1962年中央工作擴大會議上，他強調說，幹部有必要真正理解毛主席所倡導的那些東西，也一直堅持把學習毛澤東思想放在政治學習的首位，也替毛做了辯解。但是文革後，鄧掌權後，這些年中鄧小平的講話幾乎很難得到。原因不外乎在於維護自己的形象。（筆者認為鄧小平在文革之後，吸取經驗教訓，以經濟建設為忠心還是對的。當然同時忽略了法制的建設，終是釀成了嚴重後果。）此事在1972年8月14日毛澤東在那個關於鄧小平的著名批示中也特別提到一當年鄧小平「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因此，無論是能力還是政治素養，鄧小平在毛澤東眼裡都是可以接班人的。這和毛澤東對於周恩來長期的的羞辱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也可以預料文革伊始就「中箭落馬」的鄧小平的復出僅是時間的問題。毛澤東對於鄧小平也有不滿，主要是在經濟路線上的分歧。

周恩來和鄧小平的關係雖然可以追溯到20年代初在法國勤工儉學階段，但是二人並無可靠的直接交往的階段。周恩來是當時的風雲人物，而鄧小平則默默無聞，並不是所謂的在「組織和開展『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和中共旅歐支部的活動中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鄧小平則在後來回憶道：「我們認識很早，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就住在一起。對我來說他始終是一位兄長。我們差不多同時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們和人民尊敬的人。」鄧小平的說法顯然是應景之詞，二人住在一起就不屬實。從1927年年底到1929年夏季，周恩來和鄧小平在上海共事。鄧小平先任李維漢（秘書長—筆者註）的手下的秘書，後任中央秘書長，此時的周恩來實際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負責人，二者的交往也實屬有限，而且並無類似毛澤東和鄧小平被劃到同一個路線上的經歷。1933年5月，鄧小平遭「左」傾路線打擊，被撤銷職務，受黨內「最後嚴重警告」處分，到樂安縣南村當巡視員，時為「三人團」成員之一手握大權的周恩來也是打擊毛主義路線的決策人之一。建國以後，鄧小平在很短的一段時期在周恩來手下工作，但是大部分是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主持書記處的工作。而周恩來對中央書記處是有怨氣的。歷史證明，周恩來和鄧小平的關係遠遠說不上親密。

2. 鄧小平取代周恩來的歷史沿革與鄧小平復出的背景

建國之初，毛澤東就有把周恩來趕下台的想法。王光美在討論《歷史決議》時指出，建國伊始，毛澤東就想把周恩來趕下臺，曾經就此事徵求劉少奇的意見。劉少奇表示周恩來的功勞很大，不能這樣做。相互印證的是，根據《周恩來年譜》，周恩來於1952年7月就曾向毛澤東提出由鄧小平出任副總理並主持政務院工作，同時周恩來亦提出不再擔任中央機關總黨委書記。李誌綏也在其回憶錄中談及，當初「反右」時，毛澤東意在「右派」把矛頭指向政務院、周恩來，但是「右派」們却是要「輪流執政」。毛澤東此計流產。1958年，毛澤東借「反反冒進」終於得以嚴厲批判周。鄧小平在南寧會議上，是批周恩來最厲害的一個。王海容說毛講周恩來最怕鄧小平，南寧會議批周，別人都批不倒，就是鄧小平發言批周最厲害。筆者認為，在1958年，毛澤東的打算是啟用鄧小平來代替周恩來而非流傳

甚廣的柯慶施。但是眾所周知的原因，此事不可能公開。

毛澤東在文革發動的時候，曾經構想一個由林彪、鄧小平和陶鑄三人形成「三架馬車」，來代替原來的劉少奇、周恩來格局。因此在被稱為「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兩次重要的中央會議上，鄧小平在常委中的地位並未下降或者動搖。劉少奇倒台之後，「九大」開過，鄧小平復出的時機已到。九屆二中全會之前毛澤東提起鄧小平的目的，就是為了取代周恩來，完成文革發動後的未竟目標，但是自己「跳」出來的林彪打亂了毛澤東的戰略部署。林彪在「九大」後不久從康生處拿到張春橋的叛徒材料，然後上報於毛澤東。林彪和張春橋的矛盾在毛澤東看來，是否定還是肯定文革的問題。因此解決林彪問題遠比鄧小平的復出要緊迫的多。

另一方面，雖然毛澤東多次吹風劉、鄧要分開，但是這只是少數範圍內的談話，並沒有上正式的中央文件。例如毛澤東在八屆十二中全會的關於鄧小平的談話以及1969年3月15日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說「死不悔改的走資派難道他一輩子就不改？」等。中共中央發出的一系列文件，諸如中央熱烈祝賀各省、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的賀詞中，無一例外的都是點了「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等人的名字。如何向全國人民解釋這個事情仍舊是不小的麻煩。即使在「九·一三事件」之後，毛澤東在解決鄧小平問題的批示中還要點明「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給自己一個台階和向全國人民一個交代。

即使「九大」的政治報告沒有提鄧小平以及「黨內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話，但是在上層領導人中並沒有達成共識。周恩來1970年11月4日關於清查「五·一六」的談話中還點了鄧小平的名字。

因此，鄧小平在開「九大」或者之前復出的可能性是不大的。雖然在80年代初期，鄧小平曾在一次談話中說：「九大」時候，毛澤東同志確實也提出，要我當中央委員，進政治局，但是林彪他們不同意。筆者認為進政治局是萬萬不太可能的，特別是聯繫到後來鄧小平復出的過程。因為即使在「九·一三事件」之後，鄧小平復出都是經歷相對非常長的時間，而且同王洪文的陞遷相比慢的很多。但是考慮到毛澤東在文革初期時的既定目標，「九大」之後，如果此時鄧小平復出且能和林彪搞好關係，則對於在「九大」之後「倒周」的行動是相得益彰的。

有資料說，按照毛澤東的意圖，「九大」以後，「文化大革命」應該較快地告一段落了。鄧小平復出的機會也來臨了。無論是出于那種情況，有資料證實此時，毛確實有想讓鄧小平重新出山的想法。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回憶：「（周恩來以惋惜的口吻說）鄧小平同志就在山下，本來，這一次他是可以上山的，現在看來又不行了。」鄧樸方回憶：總理一直沒有忘記過父親，但他很謹慎的，特別是在父親的問題上他不能多說話，想多說也不能多說話。我看到一個材料，一次在廬山的時候，提到曾設想讓鄧小平上山開會的事情。當然我想，一定是總理和毛主席曾經談過這個事情，才有這種可能。」但是筆者認為，考慮到周恩來對待彭真的復出的態度，此時的周恩來是不會表態同意鄧小平復出的或者也是極其不積極的。

無論如何，在廬山會議之後，周恩來在公開場合對於林彪與鄧小平的評價「變調」了許多。周恩來在1971年5月10日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周恩來講述了黨內兩條路線鬥爭歷史。周恩來在講述「井岡山會師」時說：「當時林彪是個連長，陳毅同志是個團的黨支部書記。」在這裏，周恩來絲毫不再提毛林會師一事，而且把當時仍然為右派代表的陳毅作為林彪的上級講出，這與當初周恩來極力對林彪的吹捧形成鮮明的對比。更為驚訝的是，周恩來再談話中表揚了鄧小平。周恩來說：我們在廬山會議受到了教育，不然我們都是「天才論」證。在座的都知道了，三個副詞，「天才」我們都贊成了，還有一個「創造性」，然後又加上一個「全面」，三個動詞，「繼承」、「捍衛」、「發展」。「捍衛」倒是鄧小平提的。三個副詞，三個動詞，主席一看那么多，就把副詞勾掉了。副詞往往起副作用。有三個動詞就講

清楚了。期間折射出來的對林彪的貶低與對鄧小平的表揚，是不同尋常的政治氣息的變化。而恰恰是在一年前，根據吳法憲的回憶，周恩來對於鄧小平的說法還多有不同：周恩來說三個副詞是鄧小平提出來的。

鄧小平的復出第一個是得益於「九·一三事件」之後，毛澤東加快解放老幹部的政策。「黨內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復出的政治意義比其實際意義要重的多。這也是鄧小平復出緩慢的另一個原因。從毛澤東的8月14日的批示到任命副總理竟然費時8個月。鄧小平隨後的陞遷同周恩來地位的削弱在時間存在著直接的關係，或者說鄧小平就是踩著周恩來的「肩膀」一步步的高昇起來的，是毛澤東嚴厲批判周的結果。毛澤東啟用鄧小平的目的是非常明確的。

毛澤東為什麼要批判周？除了上述的重要原因之外，就是周恩來在外交上的成功讓毛覺得「反客為主」，由此引起的嫉妒讓毛澤東覺得要把周恩來在外交上的「威風」徹底打掉。不僅是外交上的，周恩來因為作為解放老幹部的具體執行人而大獲人心的事實，也引起毛澤東的忿忿不平。

鄧小平被任命為副總理之後，只是參與外交活動，雖然說可以參加有關外交事務的政治局會議，實際上因為外交政策都是毛澤東一手制定而不存在討論的問題，因此鄧小平復出後參加的第一次政治局會議竟然是在11月份的批周會議！因為一直沒有可以讓鄧小平表現的機會，因此「十大」上鄧小平僅是中央委員。鄧小平在批周會議上的發言可謂少而精，一語中的，使得周恩來百口莫辯，大獲毛澤東的歡心。隨之而來的在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會議上，毛澤東高度評價了鄧小平，並決定鄧小平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參加中央和軍委領導工作。雖然鄧小平此時的頭銜不少，但是還是沒有什麼實權，真正參與的還是外交事務，特別是作為中國聯大代表團團長參加聯大第六屆特別會議。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中，鄧小平在軍委六人小組中的作用也是非常模糊。但是鄧小平從1973年的復出到1974年10月以前同江青為首的文革激進派關係良好，並沒有什麼衝突，這使得毛澤東對於鄧小平的表現更加滿意。這也是鄧小平能夠一直穩步陞遷的重要前提條件。

根據《周恩來年譜》和有關《鄧小平傳記》等，周恩來和鄧小平從1973年3月個人見面以後直到1974年10月份才有個人見面！周恩來從1974年6月1日就因病而長期的住院，再也沒有回到西花廳，直到10月6日鄧小平才赴醫院同周恩來見面，還是因為鄧被任命為第一副總理的緣故。據此，可以判斷出6月1日以後鄧小平就接替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工作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但是周恩來知道鄧小平是毛澤東的「人」，即使就是回來替代自己，也要努力為之。這或許是周恩來的偉大和無奈之處。因為對於周恩來說，最要緊就是執行毛澤東的指示，無論是何指示。對此鄧小平在1978年曾經指責過周恩來做事既虛偽又無原則。

無論是鄧小平的外交工作，還是在國內同文革激進派的配合，都讓毛澤東覺得滿意。繼「批林批孔」之後，國內形勢的惡化，以及周恩來的身體狀況都讓毛澤東覺得，要徹底的「交實權」於鄧小平。這才是鄧小平在1975年能夠大刀闊斧的整個背景。而鄧小平在1975年年初的任命，標志著周恩來的政治生命的結束。

3. 鄧小平復出的過程

（1）毛澤東對鄧小平的刻意保護

意想不到的，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期召開的政治局生活會和在十月份召開的中央工作會上，不僅是林彪、江青、謝富治等人攻擊了鄧小平，周恩來也攻擊了鄧，並在倒鄧上起了很大的作用。筆者認為這正是周恩來看透了毛澤東的安排，利用當時的大局趨勢，作

出的自保行為。在這種形勢下，儘管毛澤東有意，鄧小平也不得不暫時退出政治舞。毛澤東對於鄧小平的批評是「鄧小平從來不找我，從一九五九年到現在，什麼事情都不找我。」以及鄧小平耳朵聾，一開會就在我很遠的地方坐著。一九五九年以來，六年不向我匯報工作，書記處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們不說他有能力嗎？」實際上，在書記處，是彭真仗著劉少奇的後台，大權獨攬，鄧小平自覺退讓，大大減少了鄧小平向毛澤東報告的機會。有黨史專家說鄧小平自認為同毛澤東的理念有差而自覺同毛澤東疏遠，以避免直接衝突的機會。毛澤東對此十分清楚。因此這個批評毫無實質內容。在鄧小平出席中央工作會議並在會上作出檢討上，毛澤東作出了「干了半輩子革命，跌了跤子，難道就一蹶不振了嗎？」的批示。

1967年4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戚本禹的長文《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文章將鄧小平指責為「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黨的最高報刊點名，意味著對劉、鄧這兩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批判將大大升級。鄧小平立即作出反應，於4月3日致信毛澤東「近日看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覺得我所犯錯誤的性質似已確定。在這種情況下，我求見主席當面聆聽教益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如果主席認為適當，請隨時通知我去。」毛澤東通過汪東興捎信給鄧小平表示：「第一，要忍，不要著急；第二，劉、鄧可以分開；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給他寫信。」而「對鄧小平的監管，毛澤東只讓他所信任的汪東興來管，從來沒有讓林彪和中央文革插手」。毛澤東在鄧小平的來信上批示到：做大的工作不行，干小的工作還是可以的。鄧小平的駐地還派有解放軍保護。毛澤東還把戚本禹編輯的《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中的鄧小平言論刪掉。在鄧小平提出要求面見毛澤東澄清一些事情後，毛澤東同意了，並再次告訴鄧小平如有事情可以找汪東興，也可以給他本人直接寫信。毛澤東說「看到主席態度和，批評得並不嚴厲，使人感到相當大的安慰。」

毛澤東在給鄧小平希望的同時，也懲戒了鄧小平在1960代初期所犯的錯誤——主要是經濟路線上的分歧。1966年7月18日和8月5日，鄧小平接連被批鬥。鄧小平因抄家寫信要求面見毛澤東，毛澤東此時在上海。即使毛澤東在9月份回到北京後，也沒有見鄧。在懲戒的過程中，鄧小平沒有受到殘酷的人身迫害和摧殘，毛澤東還是高抬貴手，亦證明了毛澤東的政治安排。

根據王力的回憶，1967年7月14日，毛澤東在武漢與王力單獨談話時說到鄧小平「打倒一年，頂多打倒兩年，人家要打倒嘛！那就打倒一下吧！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來相比，武可以同林彪、彭德懷相比。指揮兩個野戰軍的，只有一個鄧小平。林彪要是身體不行了，我還是要小平來。不管是我，劉少奇、林彪還是鄧小平，都離不開周恩來，小平舉重若輕。善於決斷，他的毛病就是性子急了一點，決心下得太快，也不要緊，他不專權，會用人。」但是1967年的7月份，正值天下大亂，鄧小平絕無在那個時期重新出山，毛澤東只能讓鄧小平繼續冷藏。

筆者認為王力可能會誇大其辭，但是基本上是站得住腳的。1966年5月5日，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後的第二天，毛澤東在外地作過一次談話。毛澤東說：譬如抗美援朝我們出動一百萬軍隊，那時林彪同志有病，我犯了一個錯誤，沒有用鄧小平同志去指揮，他是一個懂軍事的，你看他人這麼小，可是打南京是他統帥的。打南京是兩個野戰軍，差不多一百萬軍隊。打上海、打浙江、打杭州、打江西、打福建，然後他們第二野戰軍向西佔領四川、雲南、貴州。這三個省差不多有一億人口。毛澤東在談話中還讚揚了林彪。

1967年9月24日，周恩來到毛澤東處談到召開「九大」問題時，毛澤東說：接班人當然是林彪。還說：劉少奇、鄧小平要有區別。1967年11月5日，在與中央文革成員談關於黨的「九大」和整黨問題時，毛澤東說：「劉、鄧互相合作，『八大』決議不通過大會主席團，也不徵求我的意見就通過了。剛通過，我就反對。六三年搞了個十條，才隔三個月，他們又開會搞後十條，也不徵求我的意見，我也沒到會。鄧小平要批，請軍委準備

一篇文章。」但同時，他又說：「我的意見還要把他同劉少奇區別一下，怎樣把劉、鄧拆開來。」（筆者註：毛澤東關於『八大』決議不通過大會主席團，也不徵求我的意見就通過了的說法現在已經證明是謊言。）

八屆十二中全會來臨之際，鄧小平應毛澤東要求於1968年6月20日對於自己的錯誤作出檢查，特別是對歷史上的疑點一紅七軍「逃兵」問題作出詳細解釋。鄧小平最後表態說「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分，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繼而提出要求「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夠留在黨內，請求黨在可能的時候分配我一個小小的工作，給我以補過自新的機會。」

因此毛澤東在八屆十二中全會開幕式上專門對鄧小平的歷史問題加以澄清：「鄧小平還沒有發現他歷史上有什麼問題，就是發現他在七軍開小差那回事。（張雲逸插話：他在紅七軍當政委時，情況緊張了，他藉口到中央去匯報工作，在××地方開了小差，葉季壯同志死前也揭發過此事。）主要問題還是到北京後搞獨立王國，他不服氣，他說他不攬權，實際上他是劉少奇那個司令部裡搖鵝毛扇子的。但是有時我還找他說幾句話的，他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他是打敵人的。又沒有查出來他歷史上投敵叛變自首這一類問題。這個人一個是錯誤不小，一個是自己寫了個自傳檢討，可以給大家看看。他要求不要開除黨籍，最好還是找點工作。一說工作，許多同志搖頭。很大的工作也很難作了，我說給點室內整理材料之類的工作還可以吧！」

「九大」選舉前夕，毛澤東談過鄧小平的問題，他意在言外地表示：鄧小平與劉少奇要有區別，鄧小平「也有些好事，如『二十大』他不同意，也未查出叛徒。有人說打仗也不怎麼樣，總打過些仗，蘇區鄧、毛、謝、古，王明是反對的」。

在「九大」的時候，毛澤東還特意叮囑陳伯達「鄧小平同志打過仗，同劉少奇不一樣，報告上不要提他」因此報告上不要寫成「劉鄧路線」亦即「劉鄧要分開」。陳伯達向周恩來匯報了毛澤東的想法，因此周恩來是知道毛澤東的意圖的。

由於對鄧小平的監管，毛澤東只讓他所信任的汪東興來管，因此在1969年的戰備疏散之前周恩來也是「愛莫能助」。1969年10月14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黨政軍主要領導人及一些老同志，於10月20日以前全部戰備疏散。汪東興直接通知鄧小平要遷往江西。因為是由周恩來一手操作這次戰備疏散，周恩來說：「主席根據當前形勢，決定一些老同志在二十號或稍後從北京疏散到外地。主席指定了每個人的去處。各地安置工作，均由我打電話安排，中央辦公廳負責準備專機或專列。」因此1969年10月18日，周恩來與江西省革命委員會核心小組辦公室負責人通話，要省革委會妥善安置即將去江西的陳雲、鄧小平、王震及其家屬，生活上要給予照顧。次日，得知江西省革委會準備把鄧小平夫婦安置在贛州時，即告：對鄧安排贛州不妥，那裡交通不便，山區條件差。應安排南昌市郊為宜，並住兩層樓房，獨家獨院。據此，江西省革委會重新調整了方案，將鄧小平夫婦安置在南昌市郊。周恩來之所以強調交通便利問題，是緣於毛澤東說：「萬一打起仗來，要找的時候，我還離不了這些人呢。這些人還用得著，我還要他們呢。」

臨行前的頭一天，10月21日，鄧小平給汪東興寫了一封信，表示接受中央對於他的處理，重申對中央和主席做出過的保證，以一個普通黨員和社會主義公民的身份，盡力工作和勞動，並希望將此信轉報主席和黨中央。此信由汪東興轉呈了毛澤東，而且毛澤東本人看到了。鄧小平一到江西，江西省革委會辦公室主任程惠遠前來接機：「鄧小平同志，毛主席叫你來江西，我們非常歡迎。」11月26日，鄧小平致信汪東興要求把滯留在機場的行李托運到江西。行李不久便被運到。「同志」，就意味著鄧小平問題還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行李運到，說明「汪東興之路」仍然暢通。

（2）邁出關鍵的一步

直到毛澤東在1972年8月14日圈閱鄧小平的信之前，周恩來對於遠在江西的鄧小平都是「漠不關心」的。

「九·一三事件」之後，鄧小平在11月6日在江西聽取了《中央所發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及其反黨集團的罪行材料》的傳達。11月8日，鄧小平就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中，鄧小平首先向毛澤東表態對文革的看法「林陳反革命集團這樣快地被揭發被解決，真是值得慶幸的大事。如果不是由於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領導和及早地察覺，並且及時地加以解決，如果他們的陰謀得逞，正如中央通知所說，即使他們最終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我們社會主義祖國會遭到多少曲折和災難。現在終於解除了這個危險，我和全國人民一道，是多麼的高興呵！」，接著提出來了自己的要求「我個人沒有什麼要求，只希望有一天還能為黨做點工作，當然是做一點技術性質的工作。我的身體還好，還可以做幾年工作再退休。」此外，鄧小平很技巧地向毛澤東提及自己的孩子們，並請求毛澤東幫助，以安排好孩子們，借此探測毛澤東的態度。

果不其然，毛澤東並沒有回復此信，而是批示道：「印發政治局。他家務事請汪辦一下。」毛毛說：鄧小平要求安排孩子工作學的事情得到了解決，這說明毛澤東仍在注視著遠在千里之外的鄧小平。同時，毛澤東也想知道政治局大多數人的意見。

1972年1月10日，毛澤東在陳毅的追悼會上，在同張茜等人談話時，把鄧和在當時任政治局委員的劉伯承並列在一起，說鄧小平與劉少奇是有區別的，是人民內部矛盾在場的周恩來當即暗示陳毅的親屬把毛澤東的評價傳出去，為鄧小平的復出製造輿論。（筆者註：在所見所有的材料中，並沒有發現周恩來如何告訴陳毅的家屬以及陳毅的家屬在這方面的回憶。張茜後來整理的同毛澤東談話記錄也無此事記載。）1月24日，周恩來和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接見來京出席新疆工作會議的代表時，談到鄧小平問題時說，林彪就是要把鄧搞成敵我矛盾，而毛主席講鄧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不能混淆。

受到孩子被安排上到大學以及形勢變化，特別是被通知可以參加黨組織生活的鼓勵，鄧小平在1972年4月22日再次給汪東興寫信又一次提出回北京和工作的要求，信中還提出要求經濟上的幫助。汪東興收到信後，於5月30日批道：「鄧小平同志又來信，信中要求解決錢和人的問題。我建議把鄧的原來工資照發。」並請將此信報周恩來批示。6月27日周恩來批示同意。

事情終於出現了重大轉機。鄧小平在8月3日向毛澤東寫了那封著名的保證永不翻案的信：「關於我自己，我的錯誤和罪過，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間寫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鄧小平8月3日的信是江西省革委會送出通過江青轉交毛澤東的。張玉鳳回憶說：主席收到鄧小平從江西寄給他的信，非常高興，很激動。這封信主席看了兩遍。

毛澤東在8月14日作出了那個著名的批示：請總理（周恩來）閱後，交汪主任（汪東興）印發中央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毛澤東強調了鄧小平的歷史：（1）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2）沒歷史問題。（3）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而且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作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

雖然當日，周恩來即批告汪東興「立即照辦」並且當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毛澤東批示內容，但是卻沒有了下文。毛澤東的批示固然重要，鄧小平不再是「走資派」，而是「同志」了。但是毛並沒有明確提出對鄧小平的職務作出具體的安排，因此毛澤東雖然幾次提起「鄧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點工作」，鄧小平的復出安排仍然無法具體落實。毛

澤東把「球」踢給政治局，試探政治局的反應。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說「林彪倒台後，以江青為代表的中央文革一夥的勢力大大加強，對於像鄧小平這樣的老幹部的復出，他們堅決反對，形成了強勁的阻力。」事實上，根據《周恩來年譜》從8月15日周恩來在政治局上傳達毛澤東在8月14日的批示後，無任何記錄顯示政治局再次討論此事。周恩來也無任何積極熱心之舉。

此時的國內形勢又增添了很多變數。在1972年，面對林彪事件後黨內外日益增長的種種懷疑以及對否定「文化大革命」傾向的日益增長，毛澤東不得不在某些具體問題上糾正已經造成嚴重後果的錯誤，包括調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是作為這場「大革命」的發動和領導者來說，毛是絕不允許從指導思想上批評和否定「文革」。因此當周恩來在貫徹毛澤東的「糾左」思想時，牽涉到文革意識形態的批判時，毛澤東不得不出面糾正周恩來的「錯誤」。1972年12月17日，毛澤東提出：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對，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關於林彪路線的實質，毛澤東說：「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這是自「九·一三事件」之後毛澤東第一次表示對周恩來的不滿。伴隨著批周，鄧小平的機會也來臨。筆者雖然沒有直接的證據來表明，毛澤東在12月17日批周和12月18日周恩來致紀登奎、汪東興的信之間有何直接因果關係，但是筆者認為二者之間絕非巧合這麼簡單。而且根據以後事態的發展，鄧小平的崛起恰恰和周恩來受到的批評在時間是非常同步的。

1972年12月18日，周恩來致信紀登奎、汪東興二人：「昨晚主席面示，譚震林同志雖有一時錯誤，但還是好同志，應該讓他回來。此事請你們二人商辦，他在桂林摔傷了骨頭，請韋國清同志注意幫他治好。」鄧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點工作，請你們也考慮一下，主席也曾提過幾次。」當日，周恩來還約見了紀登奎和汪東興二人。四個月過去了，周恩來沒有提出任何具體建議，而是要紀登奎和汪東興替鄧找個位置。周恩來的小心翼翼躍然紙面。

汪東興的提議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毛澤東的看法，這才是周恩來此信的關鍵之處。1972年12月27日，紀登奎、汪東興就安排譚震林、鄧小平重新工作事寫信給周恩來，提出：將譚調北京安排工作。鄧仍任副總理，分配適當工作。周恩來收到此信後表示：譚事可先辦，鄧事待請示主席後定。

由此可以看出，周恩來對於鄧小平復出的採取非常謹慎的做法，而非「鄧小平被打倒後，周恩來盡己所能，給予鄧小平最大的照顧，後來又竭力創造機會為鄧小平復出製造輿論」。如果沒有毛澤東的點頭，周恩來在鄧小平的復出上是毫無建樹的，即使毛澤東點了頭，周恩來也要等待毛澤東的再次確認，因為鄧小平畢竟曾經是「第二號走資派」，稍有不慎，即可能被抓住把柄，而導致被動。同時亦因為毛澤東的批示「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這也是鄧小平才姍姍「始出」的重要原因，更是可以解釋周恩來為什麼如此慎重。

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說「1973年2月下旬至3月初，周恩來抱病連續幾次主持政治局會議，專題討論鄧小平的問題。周恩來提出，要恢復鄧小平的黨的組織生活，恢復鄧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要讓鄧小平復出。江青、張春橋等中央文革大員根本不可能贊同，於是便百般阻撓，從中作梗。政治局會議上充滿了尖銳的鬥爭。不過，這次讓鄧小平復出，是毛澤東的決定，中央文革再心懷不滿，也未能得逞。」

筆者對此認為毫無可能。江青等人在知道毛澤東的明確意圖下（汪東興在廬山會議後由於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斥責，絲毫不敢「違毛辦事」，汪東興對於鄧的任命推薦，政治局成員都明白是毛澤東的建議。）是不可能說出反對意見。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所說「周恩來急於要讓他的老戰友鄧小平盡快復出，周恩來知道，鄧小平復出，將會發揮很大的作用，並完全可以頂替他的工作」的說法，同江青等人的想法不謀而合，至少可以認為鄧小平的回歸可以大大增加對抗周恩來的力量。事實證明確實如此。張春橋為此還批評上海造反派「為什麼還稱鄧小平為第二號走資派？」。

在1973年11月的「批周」會議上，不僅鄧小平的表現是合格的，在接下來的近兩年的時間內，鄧小平同江青等人的關係是非常融洽的。而且最重要的是，鄧小平復出的前提條件之一就是不能夠反對江青。1973年5月，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召開以籌備黨的「十大」為主題的工作會議上講：中央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文件，是一個有代表性的文件，對此絕大多數同志都是滿意的。這應該是實情。

直到1973年的3月9日，此時周恩來已經得到毛澤東的同意取得兩周的病假，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匯報中共中央政治局幾次討論關於恢復鄧小平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情況，提出：政治局認為需要中央作出一個決定，一直發到縣、團級黨委，以便各級黨委向黨內外群眾解釋。毛澤東批示「同意」後，周恩來即批告汪東興，將中央關於鄧小平復職的文件及其附件交鄧小平本人閱，並對有關內容提出意見。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鄧小平終於正式復出。

巧合的是在中央發出《決定》的當天，周恩來正式向中央政治局請假，要求「病休」兩周，中央的日常工作交葉劍英主持。國內黨史界不少人探尋「周恩來的這個舉動說明了什麼？」，說明了「1972年5月，醫務人員首次在周恩來體內查出癌細胞。為此，毛澤東曾以『休息，節勞，不可大意』勸誡。同時，醫務人員也一再提醒他減少工作，配合治療。但周恩來卻毫不在意，仍堅守『崗位』。直至鄧小平復職一事終成事實，心力交瘁的周恩來才正式向中央告假休息。這就再次說明，解決鄧小平問題在周恩來心中佔有的特殊重要位置。」

然而事實遠非如此。

1972年5月中旬，在例行尿檢中發現周恩來得了膀胱癌。醫療專家們隨即向中央寫了書面報告，詳述周恩來的病況，力陳爭取及早治療的好處和疾病發展的不良預後。因為按照中共黨內保健制度的規定，凡是政治局委員以上領導人的治病方案，必須經由毛澤東批准後才能實施。5月底，毛澤東通過汪東興向負責周恩來保健的醫療專家們傳達了四條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訴總理和鄧大姐；第二、不要檢查；第三、不要開刀；第四、要加強護理和營養。（周秉建在《我的伯父周恩來》一書中則說：毛澤東的三條親筆批示是（1）不治療；（2）不要告訴周、鄧；（3）搞好營養。

張玉鳳回憶：當逐字逐句地看完醫療組關於周恩來病情的報告後，「主席的心情是那樣沉重，這種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時很少出現過的異樣嚴肅的臉上和緊皺著的眉頭上」。他叮囑這件事對外要保密。對怎樣治療，毛澤東說：「開刀容易擴散，有危險，是否可通過中醫的方法，用中藥來控制病情。」並且這樣解釋：你們外科醫生動不動就開刀，開一個死一個，陳老總不是開刀死了嗎？謝富治不是也開刀死了嗎？毛澤東還要求「防止擴散，注意營養和休息」。（筆者註：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彭德懷竟然被毛澤東允許做手術。）

1972年8月4日，周恩來第一次尿血，不得不到北京西部玉泉山邊工作，邊休息5日。同年11月，鑒於周恩來日益嚴重的病狀，醫務人員再次向中央報告有關情況。毛澤東在報告上批道：「應當休息、節勞，不可大意。」事實上，周恩來的病情變化，毛澤東一直是瞭如指掌。1973年1月13日，周恩來突然排出大量鮮紅色血尿，以至整個抽水馬桶的水都變成紅色。醫療組很快把報告上呈中央即毛澤東處。2月7日，汪東興卻對吳階平電話指示到：「七老八十，做什麼檢查！不要慌麼！」

1973年3月2日，周恩來約葉劍英、張春橋、汪東興談自己病情及檢查治療問題。5日，葉劍英陪同外賓接見外賓後，毛澤東反映了周恩來病情發展、急需檢查治療的情況，並拿出裝著周恩來血尿的瓶子讓毛看。毛當即批准先檢查、後治。同日，周恩來作透視檢查。3月6日，周恩來去毛澤東處開會。會前，周恩來將自己病情及檢查治療安排等向毛澤東作簡要報告。周秉建說「（周恩來）以他特有的方式爭取到3月10日檢查治療的機會。」周秉德還說在張佐良把病情發展和治療辦法詳細的告訴周恩來之後，周恩來說：「我需要真正弄懂再想辦法。」

吳階平在訪談時表示：「毛主席說，你告訴他們動手術不要去想，你可以用中醫中藥，不能用手術，可以用針灸，可以吃中藥，不能手術。那麼這個時候，我們甚至於想，我們能不能就說，周總理自己願意手術，周總理自己是願意手術的，可我們不能去說，因為我們要去說，周總理說，我讓你們不要說話的嘛，就違反他的意願了。其實他個人也是想做手術的。」

因此同大陸官方黨史界流行的說法恰好相反，並不是因為周恩來要準備鄧小平復出的文件和江青等鬥爭才推遲到10日進行手術，而是因為周恩來要在10日動手術不得不在9日把鄧小平復出的中央文件準備好。毛澤東已經批示很久，汪東興對鄧小平任職的提議也完畢多時，江青等人也並沒有反對的情況下，周恩來辦事何來如此「囉嗦」？

治療期間，周恩來委託鄧穎超先後前往看望李富春和蔡暢、鄧小平和卓琳，以及住301醫院的劉伯承，告訴他們自己病情及檢查治療情況。

1973年3月28日，周恩來同李先念等會見鄧小平。次日，約鄧小平到毛澤東處開會。之後，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議定：鄧小平「正式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工作，並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參加對外活動；有關重要政策問題，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會議參加討論」。需要指出來的是，在3月28日的接見中，還有江青。而《周恩來年譜》則用一個「等」字把江青給省略了！這也說明了江青對於鄧小平的復出也是非常關注和支持的。從另一方面來說，鄧小平的復出更能配合當時批周的策略，江青何樂而不為呢？後來，江青因為權力之爭又和鄧小平鬧僵，則是後話。

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曾經提起周恩來在4月9日，周恩來夫婦和鄧小平夫婦會談的事情：多年後，父親在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時，還不勝傷懷。他說：「我們去看總理，看到他瘦得不成樣子了。我們相對無言。」相對無言，能說什麼呢？幾年之中的風風雨雨、辛酸苦辣，豈是言語所能表達。見了鄧小平，周恩來很高興。周恩來為人向來嚴謹，對事物從不妄加評論，更不會隨便議論他人。不過，這次是和他最信任的鄧小平談話，他要把蓄積在心中多年沒有說出的話講出來。周恩來首先沒有談他的病，也沒有談今後的工作，他對鄧小平說的，是埋藏在心裡多年的話。他說：「張春橋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讓查。」講完後，他對著卓琳特別囑咐：「卓琳，你不要說出去啊。」

在同一本書裡面，毛毛還寫道：1973年我們回到北京後，父母親曾帶著我去釣魚台他的住處看他。我們看到的康生，已經病入膏肓，骨瘦如柴，病臥在床。見到我的父母親，康生開口便大罵江青、張春橋等人，罵得很凶，也很狠。如果是別人罵「四人幫」，自然沒什麼奇怪，但不知怎地，這罵，一出自康生之口，聽起來就讓人覺得有些變味兒。聽著康生的罵，剛剛回北京的我們竟然不知所云。

毛毛關於4月9日的回憶是值得懷疑的。首先，依據周小心翼翼的性格特點，特別是有第三者卓琳的存在，周提起如此敏感話題是不太可能的。其次，鄧此時剛剛復出，和周的交往甚少，甫一見面，周就同鄧談此事，其可能性更小。考慮到一個是鄧小平的回憶，一個是毛毛自己的親身經歷，筆者則完全有理由認為是毛毛把兩次事情記混了。

（3）非常緩慢的陞遷

3月29日毛澤東雖然決定：鄧小平「正式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工作，並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參加對外活動；有關重要政策問題，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會議參加討論」。此舉一方面說明毛澤東對鄧小平寄予厚望，另一方面做了保留，在使用的時候還要繼續進行觀察。因為鄧小平只能參加「有關重要決策問題的政治局會議」，亦即外交政策方面的政治局會議，而不是同王洪文等一樣可以「參加所有的政治局會議」。實際上，根據現有記載，鄧小平復出後的第一次參加政治局會議則是在1973年的著名的「幫周會議」。

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聲稱「鄧小平恢復了副總理的工作，但是，周恩來總

理卻要暫告病假。國務院的工作，特別是經濟工作，將主要交由鄧小平和李先念兩人全力來抓。」但是很少有明確的資料說明這一點。

1973年4月9日，周恩來在玉泉山會見鄧小平、卓琳，並進行長談。但是從此以後，再無周恩來與鄧小平私下交往記錄，而且引入注目的是自1974年6月1日周恩來搬到305醫院之後，直到10月6日鄧小平才因被任命為第一副總理之後才去醫院看望周恩來。事實上，復出後的鄧小平同周恩來與葉劍英的關係都不「熱絡」。毛澤東的「觀察」或許是個可以拿來解釋的理由，鄧小平知道要和周恩來「撇清」，才能獲得毛澤東的信任。

1973年8月份召開的「十大」，鄧小平僅被選舉為中央委員，沒有能進政治局。這同還沒有一個合適的「機會」讓鄧小平去表現，毛澤東的「考察」得到滿意結果有極大的關係。機會終於在1973年年底來臨。

在1973年年底的批周會議上，鄧小平以中央委員的身份列席會議。會議的中間，毛澤東曾問前來匯報會議情況的王海容和唐聞生：「鄧小平發言了沒有？」毛澤東要瞭解鄧小平的情況，要瞭解鄧的態度。王海容說：主席昨天晚上說，這個會議開得不好，所以現在要調兵遣將。將就是鄧小平。鄧小平一言擊中周恩來的要害：「總理表現出來的是外交路線上的錯誤，但是你的核心是對待毛主席的態度，我們在座的所有人認為，我們對於毛主席是可學不可及的，你這次的錯誤在於你的內心認為毛主席不只是可學的，而且是可及的。」因為病重，毛澤東托付周恩來「我死了以後，事情全由你辦」。「十大」之後，周恩來是排名第一的黨的副主席，但是周恩來又不是毛的接班人，因此毛最不放心的就是周恩來。周恩來對此誅心之論，百口莫辯。當王海容、唐聞生二人把鄧小平的發言向毛澤東報告後，毛澤東高興地說：「我知道他會發言的，不用交待也會發言的。」一時興起，毛澤東問誰知道鄧小平的住處，要馬上把鄧小平找來。雖然因其時已屆深夜，沒能將鄧找來。亦有資料說，會議結束後，毛澤東就召來鄧小平，進行了長談。但是無可置疑的是，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表現是十分滿意的。

為了避免在軍隊中形成尾大不掉的「山頭」，進而威脅到未來的接班人，以及在軍隊中「批林批孔」的順利進行，毛澤東決定八大軍區司令對調。12月12日到22日，毛澤東連續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嚴厲的批評了周恩來，並提出要將八大軍區的司令員對調。在這同一個會議上，毛澤東提議，讓鄧小平擔任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此時鄧小平才開始「歸位」。

因為195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重新成立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鄧小平就為其中的中央軍委委員（當時未設常委），1959後更是13人組成的軍委常委之一（常委之中，除毛、鄧外全為有軍銜的現役將領）。

1973年12月15日，毛澤東在他的書房與政治局委員和各大軍區司令員談話。毛澤東說：「我們現在請了一位總參謀長（指鄧小平）。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辦事比較果斷。」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評價相當高，「他一生大概是三七開。」同他對自己和斯大林的評價一樣。毛澤東繼續到「你們的老上司，我請回來了，政治局請回來了，不是我一個人請回來的。」毛澤東也勸鄧小平：「你呢，人家有點怕你。我送你兩句話，柔中寓剛，綿裡藏針。外面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過去的缺點，慢慢地改一改吧。」12月18日，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會上傳達毛澤東關於各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問題的講話。政治局會議贊成毛澤東提議，由鄧小平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的職務。22日，中央根據毛的意見，周恩來親筆代中央起草文件發出通知，鄧小平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參加中央領導工作，待十屆二中全會開會時追認；鄧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參加軍委領導工作。同日宣佈八大軍區司令員進行對調。

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說「王洪文雖然被提拔了上來，並得到毛澤東的刻意栽培，但畢竟新來乍到，在黨、政、軍機構內都還沒能插上手，更不要說掌握實權。鄧小平

剛剛回來，卻一下子在黨、政、軍都有了職務有了實權。」甚至一些資深黨史研究專家也據此認為「毛澤東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從未擔任過中央軍委要職的鄧小平出任總參謀長，說明毛澤東把最重要的軍隊權力交給他掌管。」這些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毛澤東雖然在12月15日說「我們現在請了一位總參謀長」，但是事實上此時的鄧小平並沒有出任總參謀長一職。毛澤東的說法是一個籠統意義上的「總的參謀長」而非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正如毛澤東在14日所講：「現在請了一個軍師，叫鄧小平。發了通知，當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政治局是管全部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個秘書長吧，你（指鄧小平。——引者注）不要這個名義，那就當個參謀長吧。」

根據《周恩來年譜》的記載和當時發出關於《中共中央關於鄧小平參加中央領導工作的通知》（1973.12.22）中都沒有提及出任總參謀長一職，僅是說：「遵照毛主席的提議，中央決定：鄧小平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參加中央領導工作，待十屆二中全會開會時請予追認；鄧小平同志為中央軍事會委員，參加軍委領導工作。特此通知」。根據中央組織部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附卷二中國人民解放軍組織（1949.10-1997.9）》中的介紹，鄧小平出任總參謀長一職為1975年1月。根據《中共中央關於鄧小平同志任職的通知》（1975.01.05；中發（1975）1號），鄧小平確實是在1975年1月才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至於毛澤東把最重要的軍隊權力交給他掌管和掌握實權更不是歷史的事實。根據《周恩來年譜》，1974年1月18日，周恩來主持會議中央政治局會議，提議中央軍委成立以葉劍英牽頭，有王洪文、張春橋、鄧小平、陳錫聯參加的五人小組，討論處理軍委的大事及緊急作戰事項。20日，由央政治局正式向毛澤東提此建議時，將原五人小組增至六人（加蘇振華），並確定：軍委六人小組「大事視情況或直報主席或經過中央政治局討論後再報主席」，「對內對外不行文，一律以軍委名義下達」。同日，與王洪文聯名向毛澤東報告此事，毛澤東表示同意。1974年1月31日成立政治局會議還決定成立由周恩來、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華國鋒和汪東興等七人組成的小組，代表中央處理「批林批孔」日常事務。在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王洪文作為組織工作小組的組長，負責審查全部人事組成名單。

因此即使在軍委六人小組中，當時的鄧小平不僅排列在葉劍英、王洪文、張春橋之後，而且在隨後的「批林批孔」運動中，對於運動的走向基本上沒有什麼發言權。而與同一個時期的王洪文相比，王洪文不僅和周恩來一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起籌備四屆人大，聯名向毛澤東報告政治局大小事務，而且同時還是主管同時期為專門處理各大軍區的揭發材料而成立的專案組。作為接班人培養的王洪文，可謂手握大權，更是在1974年6月1日之後代替入院治療的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此時的鄧小平和王洪文相比，如何比得上？作為周恩來更是悉心照顧和指點王洪文，同鄧小平的交往實屬「鳳毛麟角」「乏善可陳」！

毛澤東給予鄧小平的頭銜是不少，但是鄧小平實權並不多。對於毛澤東來說，鄧小平取代周恩來主持對外事務才是最緊迫的事情。因此，從一開始鄧小平作為副總理，分管的就是外交，隨著周恩來的病重，陪同外賓見毛就成了鄧小平的首要任務。

毛澤東在八大軍區司令對調會議上宣佈鄧小平新的任命意味著什麼？

政治意義大於實際意義。對於這次八大司令對調，鄧小平是毫無涉及。對於有人認為是鄧小平先提議、提撥鄧小平是為了保證八大司令對調成功等，筆者認為這都不是站不住腳的。因為至於誰提議的，毛澤東說是葉劍英和紀登奎。八大軍區司令對調的具體操作是周恩來、葉劍英、王洪文和張春橋四人完成。對於軍隊的控制權，一直都是被毛澤東牢牢的掌握著。從毛澤東的1971年的南巡講話以及1973年的許世友、韓先楚以及楊得志的檢討也可以看出。「林彪事件」以後，一大批原四野軍隊幹部受到牽連而倒台，很多原二野或其它山頭的人馬被提撥上以填補這些「空缺」。蘇振華的復出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代表。

蘇振華在1972年復出以後，很快掌握了海軍的實權。毛澤東提撥鄧小平的政治意義在於，鄧小平可以作為這些人馬的老上級，可以更好的理順和協調他們同中央軍委的關係。雖然毛澤東多次強調要重視和解決「山頭」問題，但是在中國長期的革命戰爭中形成的「山頭」也不是「百弊而無一利」。況且，鑒於鄧小平和林彪的間隙和歷史上無任何淵源，更加有利於進一步清理軍隊中的林彪勢力。毛澤東說：「現在要多用四方面軍的人，劉鄧的人。」

（4）出席聯合國大會的風波

中美、中日建交以後，西方各大報刊對周恩來好評如潮，把中國外交說成「周恩來外交」。毛澤東醋意大發之下，狠狠的整治周恩來。1974年的4月份，聯大第六屆特別會議召開在即。即使周恩來身體允許，周恩來也必定是無緣與聯合國的舞台。

主管這件事情的外交部繞過周恩來，由毛澤東的聯絡員王海容、唐聞生直接向毛本人報告了此事，探詢對中國代表團團長人選的意見。本來，各國出席這一屆特別聯大的多是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照理中國也應派出具有對等身份的周恩來參加，然而毛卻屬意讓鄧小平率團前往，由喬冠華做助手。毛澤東特別叮囑此事要秘而不宣，由外交部自己提交報告。毛澤東要觀察各方反映。但是王海容卻早早在3月20日就告訴了周恩來，這是毛的意思。周恩來對此安排表示驚訝，因為最初設想從外事部門選擇一位部長率團出席會議。

3月22日，外交部向中央呈送了關於出席六屆特別「聯大」代表團人選的請示報告。周恩來在批示同意外交部的請示報告的同時，考慮到葉劍英因高血壓導致視網膜出血尚未痊癒，而王洪文又忙於指導「批林批孔」運動，需要鄧小平協助工作，故而周恩來建議三周的特別「聯大」會期鄧小平出席一周，在向大會發表講話，並與主要國家領導人接觸後，即起程回國。周恩來特別指出，將他的批示意見首先呈報毛主席，暫不送王洪文、康生。在毛主席批示後再送葉劍英、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鄧小平核閱，最後退外交部辦。江青以「中央軍委要開會解決李德生的問題，鄧小平必須參加」為由反對鄧小平出任團長。江青的說法也有道理，因為李德生曾經是鄧小平的部下，希望鄧小平能像罵陶魯筋一樣去罵李德生。周恩來和江青的建議有不謀而合之處，都是因為國內事務需要鄧小平，因此建議縮短鄧小平在聯大的時間，只去一周。不同的是，周恩來是在毛澤東的決定之後作出的建議。江青則是被蒙在鼓裡。

正如前述，在鄧小平復出的時候，曾經有個前提條件，就是不能反對江青。在關鍵的1973年11月份的批周會議上，鄧小平又合作的不錯，因此江青講的也未必不是實情。但是問題的關鍵在於江青一直被蒙在鼓裡，王洪文知道以後也沒有告訴江青。因此在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堅持要外交部撤回這一報告，會議最後議而未決。直到毛澤東親自出面，寫信告江青：「鄧小平同志出國是我的意見，你不要反對為好」，要她「小心謹慎」。

從某種角度上來講，鄧小平復出和江青的利益是一致的，二者都是毛澤東用來從不同角度側面攻擊周的工具。毛澤東啟用鄧小平以後，希望能建立一種新的政治格局，即以江青為首的文革派和以鄧小平為首的老幹部派通力合作，共同穩住文革的大局。即使江青反對鄧小平出任團長的理由都是完全正當充分的，但是難免會在二者之間種下芥蒂。

同時，鄧小平的崛起，同和江青等人相處良好也有很大關係。江青在鄧小平復出的時候，並不認為鄧小平屬於周恩來派系，而是把鄧小平看作是自己的人。正如前述，鄧小平復出的兩大條件是不能夠反對江青和永不翻案，就是存在「聯大風波」一事，江青在1976年回顧時仍然承認，在1974年同鄧小平的相處還是大體不錯的。江青支持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因此，江青反對鄧小平出任聯大代表團團長，筆者認為理由是正當合理的，並非中共官方所定論。中共官方認為江青不僅「無理取鬧」還「有著更深的用心」，「在江青等看來，鄧小平和周恩來、葉劍英一樣，是他們自己「組閣」、奪取國家最高權力的重要障

礙。」

至於「至周恩來去世數年後，鄧穎超才向身邊工作人員透露，周恩來為什麼一再推遲住院治療時間的緣由，她說：『恩來一直對小平的事情放心不下，他擔心江青那夥人乘他住院時間對小平同志下手，所以他不能離開工作崗位去住院治療。』」《毛澤東傳》則說「在當時江青等不斷發難、政治風波迭起的形勢下，鄧小平不在國內，周恩來無法放心。他置病體不顧，繼續超負荷地工作，堅持等候到鄧小平從國外歸來，才在6月1日住進醫院。」這種說法是值得推敲的。鄧小平是4月6日離京，4月19日回京。周恩來是6月1日入住305醫院。根據《周恩來年譜》記載，從3月中旬到5月底的兩個半月內，周恩來外事活動多達五十四次！

1974年5月上旬，尿病理檢查中發現了「膀胱乳頭狀癌組織塊」，證實了癌細胞已經開始在體內擴散轉移。5月9日，周恩來醫療組認為必須進行手術治療，制定出《檢查治療方案》，並向周本人和負責醫療工作的葉劍英、張春橋、汪東興等作了匯報，當面陳情，情況已經十分嚴重，敦促中央下決心批准周恩來及早住院動手術，避免發生意外情況。周恩來也在5月13日約見負責醫療工作的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汪東興談話，陳述自己的想法，實為請他們幫忙，提早做手術。在同醫生會談後，在醫生的暗示下，周恩來寫了封信給毛澤東，希望能夠接受手術治療。張春橋代表中央表態，駁回了醫療組的請求，表示：「目前手術不能考慮，這一條給你們堵死。」理由是周「是黨、政、軍、內政的總管，他的工作別人無法代替。」葉劍英也稱張春橋所說的「是中央的意見，積極的意見，切除的辦法，暫時放一下，不考慮。」

張春橋說：「從現在起，到5月30號，有好幾批外賓要來，最後一個外賓，是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他們都要求總理接見。這是執行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線的需要。所以，起碼要到5月底以後，才能考慮怎麼辦的問題。」張春橋說的也是客觀實情。毛澤東的態度如何？吳階平說要做手術一定「周恩來一定要毛主席同意」才可以。毛指示檢查和醫療兩步走，但是吳階平在葉劍英和鄧穎超的支持下，兩步並一步走之後，「後來毛主席發下話，說兩步走比一步走好。」從1973年3月第一次手術之後，周恩來每一次的手術報告都是周親自所為。這一次，毛澤東說：「見完拉扎克再說。」拉扎克是馬來西亞總理，預計在5月底訪華。3月1日，和拉扎克分別代表本國政府簽署中馬建交公報。毛澤東終於批准了。6月1日，周恩來住院做了第一次大手術。

因此，周恩來到6月1日才住院同鄧小平去聯大基本上關係不大。

此時的鄧小平，在外交舞台上完全按照毛澤東的意見辦事，在六屆聯大特別會議上，詳細正確的闡述了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1)把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思想，作為外交戰略的基石；(2)對國際局勢的分析，堅持毛澤東所說的兩句話，即「天下大亂」，「山雨欲來風滿樓」；(3)關於中美正常化的途徑，關鍵是台灣問題，解決方式只能是日本方式，即承認一個中國，而不是兩個中國或一個半中國。鄧小平，而不是周恩來，在外交事務上的地位得到明顯提高。

5月12日，周恩來和鄧小平一起同布托舉行會談。這是鄧小平復出後的第一次參加如此高級正式會談，雖然鄧小平以前也在機場迎接外國客人，參加舉辦的招待外國客人的宴會，陪同外國客人到大寨參觀等等。1974年的鄧小平也開始多次陪同毛澤東會見外國客人。以1974年5月為例，毛澤東一共接見五次外國客人，鄧小平陪同接見三次，而王洪文全部都參加，分別是1974年5月11日，毛澤東會見巴基斯坦總理布托；18日，毛澤東會見塞浦路斯總統馬卡裡奧斯大主教；25日，毛澤東會見英國前首相希思。在1974年的上半年，鄧小平參與的國務院事務也比1973年增加許多，雖然具體責任並未明朗，但是至少參加可以參加例行的政治局會議了。

毛澤東無疑是鄧小平得到提撥的最重要和決定性的因素。當鄧小平回到北京時，當晚汪

東興就看望了鄧。鄧小平向汪東興致謝，汪東興說：「我是按毛主席的意思辦的。」鄧小平在1980年是說：「不是周恩來（提拔我的），是毛主席。」在國內黨史界，在此點上，無疑是有點本末倒置了。

鄧小平在批判周恩來中的表現，同江青等人的關係處理上，都是讓毛澤東滿意的。特別在「批林批孔」中，鄧小平也是積極配合，同王洪文等人也合作愉快。除了對1974年1月24日江青的信所提開會建議贊同之外，還在3月份嚴厲指責陶魯筭在「批林批孔」運動中不得力。鄧小平對於露骨的批周也毫無任何替周開脫之語。所有的這一切都使毛澤東覺得鄧小平可以托付重任。一切都按照以「王洪文和鄧小平的搭配，組成新的工作格局」的模式發展。當毛澤東在1974年8月，作出停止「批林批孔」運動，要重新進行治理整頓的時候，相對於王洪文等，鄧小平無疑具有更強的優勢。

基於鄧小平的表現，江青在誤以為鄧小平是同路人，從而要求鄧小平對「風慶輪」事件表態時，鄧小平可能是基於「風慶輪」有可能牽涉到自己或者對江青的態度所不滿而沒有當場迎合江青，於是引起江青極度不滿。但是在毛澤東看了這完全是「小事」，並不影響對鄧小平的進一步重任，鄧小平除擔任第一副總理外，還要兼任總參謀長。而且在1974年12月毛周見面時進一步提出：四屆人大之後，你安心養病，國務院的工作讓小平同志去頂。

在通過漫長的觀察期之後，鄧小平在1975年初終於獲得了更重要的職務，掌握了更多的實權，全面的代替周恩來在國務院的工作。1975年的鄧小平，無疑要站立在政治舞台的中心。

第一部分 第十二章

四屆人大以及最後的日子：

終於沒有被「打叉叉」

在四屆人大的準備過程中，江青等人的表現讓毛失望，但是也並不是官史中所講的是鮮明的正確與錯誤的兩條路線的鬥爭。1975年鄧小平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大顯身手，但去好景不長，又一次被打倒。1976年1月，周恩來走完了他的一生，雖然毛澤東對周恩來去世表現得出奇的冷淡，但不管怎麼說毛還是放過了周，周終於保住了「晚節」沒有被「打叉叉」。

一、四屆人大的緣起與拖延

1966年7月7日，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宣佈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改期召開。「九大」前後，毛澤東認為「文革」已經接近尾聲。毛澤東在1968年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講：「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們講要搞到底，什麼到底呢？這是一個問題。估計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兵簡政、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

中央文革小組提交的報告中聲稱：「解決不僅在實質上、而且也在組織上成立中央革命委員會問題，順帶也就解決國家主席問題。」要解決國家主席問題，自然會牽涉到修改憲法和召開人大等諸多事項。

1970年3月初，周恩來致信毛澤東，隨信附來一份憲法修改草案提要。周恩來在信中談到政治局常委提出憲法中原有國家主席一節，是不是還寫上。3月8日，在武漢的毛澤東指示汪東興回北京傳達毛澤東關於召開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的意見。此後，籌備

工作主要是由周恩來主持。

正如以後參加過四屆人大的一位代表的回憶：「雖然選舉是採用無記名投票進行，但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也只不過是完成一次『橡皮圖章』作用。」依據1954年憲法賦予全國人大的職能，國務院副總理、秘書長、各部部长、各委員會主任人選等都是由全國人大選舉決定。

在1970年5月27、28日，周恩來就已經認為「現國務院各部、委成立革命委員會條件已成熟，擬上報批准。」6月16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國務院6月7日《關於國務院各部門建立黨的核心小組和革命委員會的請示報告》和中共中央對國務院報告的批示稿等事項。6月17、18日，周分別將政治局會議商定事項報毛澤東、林彪。6月22日，中共中央批發毛批示「照辦」的國務院《關於國務院各部門建立黨的核心小組和革命委員會的請示報告》。在此報告中，周恩來提前任命了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但是報告卻不是提交給將來召開的四屆人大，而是毛澤東和隨毛澤東畫圈的林彪。余汝信先生認為：周恩來此時眼裡，人大這個過場都不需要走了，「橡皮圖章」也不需要蓋了。四屆人大要主要解決的無非是修憲——毛所關心的國家主席問題而已！毛澤東說：「我提議修改憲法就是考慮到不要主席」。

但是關於設不設國家主席問題，卻一直沒有解決。周恩來多次向毛反映要設國家主席的意見。直到九屆二中全會開幕的前一天8月22日，周恩來同其他三名常委一起提出根據群眾的願望和要求，應實現黨的主席和國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個國家元首、國家主席。8月23日晚，周恩來對張春橋說：《憲法》修改草案有關國家主席的章節，要準備一下，備用。張春橋回答：現成的，已經準備好了，請總理放心。葉群還以周恩來為例對邱會作等人講：「昨晚周總理交代張春橋準備《憲法》草案中設國家主席的章節，這對我們有很大啟發，我們要向總理學習。」周恩來23日還打電話告訴陳伯達：有些人主張還要國家主席，請陳準備些條文，等候毛的意見，備而不用。此後在中央辦公廳印發的《憲法》草案有兩個版本，一個「設」，一個不「設」。

8月22日，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對憲法修改草案中「設不設國家主席」如此解釋：「下午見主席，我們特別提了國家主席的問題。報告上已經說了嘛，但我們又說了：大家熱切希望，既然是一元化嘛，黨的主席、國家主席也要一元化。儘管是個形式，但群眾熱望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是當然副主席。這樣就滿足群眾願望。領導嘛，當然是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的領導了。……當然，起草的稿子還是照顧那個一開始由東興同志傳達的主席的意思。但我們還是反映一下子，還提出了一個方案。」

經毛澤東批准，在1971年12月11日下發的《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一）（中發〔1971〕77號）稱：「林陳反黨集團把四屆人大看作是『權力再分配』的會議，陰謀利用修改憲法和召開四屆人大的機會，實現他們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野心。他們反黨的政治綱領，是要設國家主席。他們反黨的理論綱領，是堅持天才的觀點。核心的問題，是要設國家主席，是林彪急於想當國家主席，搶班奪權。」

周恩來豈不是對於「林彪急於想當國家主席，搶班奪權」之陰謀非常的配合？

9月6日，九屆二中全會閉幕。全會公報宣稱：「全會認為，在當前國內外大好形勢下，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全國人民的迫切願望。全會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建議，進行必要的籌備工作，以便在適當的時候召開四屆人大。」

但是九屆二中全會之後，四屆人大並沒有如期舉行。雖然據報送毛澤東、林彪的《中央準備召開黨的九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的工作計劃（送審稿）》，四屆人大應在9月15日至24日召開。未能如期舉行的箇中原因，雖然官方從未作過任何解釋，筆者認為顯然在毛看來要發動「批陳整風」進而解決林彪問題比召開四屆人大重要的多。

1971年7月10日，毛澤東從熊向暉處瞭解到情況後斷定「黃永勝等人的檢討是假

的。廬山的事情還沒有完，還根本沒有解決。這個當中有『鬼』。他們還有後台。』

1972年5月，周恩來在一次會上說，毛澤東為什麼要南巡？去年批陳整風匯報會，中央文件發給軍事系統60多份，可是軍委辦事組黃永勝他們扣住了，只發了7份，傳達範圍非常狹窄。去年7月被毛主席發現了，說要繼續跟各地打招呼，他們的檢討是假的，廬山的事情還沒有完，還根本沒有解決，這個當中有「鬼」，他們還有後台。毛澤東南巡時說，批陳整風匯報會，發了五個大將的檢討，都認為問題解決了。其實廬山這件事，還沒有解決。他們要搗住，連總參二部部長一級的幹部都不讓知道，這怎麼行呢？

李德生回憶：經過批陳整風，毛主席從大量的揭發材料看出，同林彪的這場鬥爭遠沒有結束，他決定去南方視察，進一步瞭解掌握情況，並為即將召開的九屆三中全會作準備。

陳長江回憶：主席對接班人林彪越來越不滿。到1971年8月，對林彪的不信任達到頂點。謝靜宜的丈夫蘇某（蘇元勳一筆者註）在空軍機要局，通過謝靜宜傳來消息，林立果在空軍成立了秘密組織，在做武裝奪權的準備。主席決定南巡，行前主席說，我就不相信，這些司令員們跟著林彪走。難道解放軍都會造反？還是那句老話，如果解放軍不聽指揮，我再上井岡山打游擊去。

8月9日周恩來陪緬甸政府總理奈溫前往廣州參觀訪問。臨行前的8月8日，周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安排離京赴廣州期間中央日常工作，並致信毛澤東，主席如有急事，可經吳旭君（毛澤東的護士長）同志以保密電話告訴我，或告（王）海容（毛澤東的侄女）轉告。這說明周恩來清楚毛澤東的意圖。

就在8月12日下午，毛澤東南巡前兩天，周恩來從廣州飛回北京，立即到毛澤東那裡面談，請示四屆人大的召開時間，毛澤東提出國慶節後召開四屆人大的設想。8月16日，根據毛澤東指示，周恩來、張春橋、紀登奎、黃永勝前往北戴河向林彪匯報工作，分別談了宣傳、常務、生產、軍事等。匯報結束周恩來說，毛主席提議，黨中央決定國慶前後召開九屆三中全會，然後召開四屆人大，現在各項準備工作正逐步就緒。9月10日，周恩來請示國慶節前召開九屆三中全會，補選幾名中央委員等事宜。毛澤東批，都同意，還要補選常委。這說明毛澤東已經下決心人事調整了。

「九·一三事件」突發，毛澤東想用組織手段解決林彪問題的可能性絕無，九屆三中全會與四屆人大也就又一次夭折。

1973年8月24日，周恩來在中共「十大」上代表中央作的政治報告中宣佈：「最近，我們還要舉行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被延遲兩年的籌備四屆全國人大工作，又一次被提到日程上來。

1973年9月12日，周與王洪文一起向毛澤東匯報籌備四屆人大會議情況。同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四屆人大會議各項籌備工作，決定在政治局內組成三個小組進行：1：組織工作小組。王洪文任組長，李德生、李先念、紀登奎、吳德、汪東興為組員，負責審查全部人事組成名單；2：憲法修改小組，康生任組長，張春橋為代組長。江青、紀登奎、蘇振華、倪志福為組員，負責憲法的修改、整理工作；3：政府工作報告起草小組，周恩來任組長，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姚文元、李先念、華國鋒為組員，負責政府工作報告的起草工作，並先於近期提出報告要點或大綱。以上三組工作。均需在十月五日前進行完畢。十四日，周恩來報告毛澤東政治局商議情況，提出：「這些程序如果進行得順利，四屆人大正式會議開五六天就能解決問題。」毛澤東圈閱了報告。1973年10月16日—19日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四屆人大會議籌備工作，並基本通過政府工作報告草稿。

1973年9月23日，周恩來同王洪文一起向毛匯報了《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分配方案》等相關問題。當天，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由王洪文在會上傳達毛澤東的指示：知識分子代表要增加一些；老朋友要照顧，同時要多交一些新朋友等。1

0月21日，對於四屆人大主席團人選和《四屆全國人大常委委員名額分配方案》均已經落實。

但是李震的突然死亡導致四屆人大再次耽擱。然而國內黨史界流行的說法則是「四人幫」視周恩來為奪權的最大障礙，為此發動了11月份的批周會議，從而導致了四屆人大的推遲。但從現有披露的記載來看，江青等人在此次四屆人大代表的準備過程中同周恩來幾乎是沒有任何爭議的。

親歷四屆人大籌備工作的孫中范回憶：10月21日，組織工作小組召開會議對主席團人選建議名單進行討論。會議結束前，紀登奎要求值班室根據會議討論的意見修改主席團人選名單，第二天上午正式印好。第二天上午我們仍按紀登奎的佈置，仔細校核了《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主席團人選建議名單》，並討論修改了說明。按慣例，當天下午，紀登奎、郭玉峰、吳慶彤、周啟才等一定會來紫光閣辦公，審定印好的文件。可是他們沒有來，而且一連幾天都沒有來。後來，從國務院值班室聽說，10月21日，發生了公安部部長李震自殺事件。公安部部長不明原因身亡，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罕見的一起要案，北京的氣氛比較緊張。在當時條件下，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時難以查清。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會議，中央決定採取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範。這時才弄清楚，中央責成紀登奎、郭玉峰等參與處理李震事件，顧不上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大約在11月初，組織組負責人吳慶彤來紫光閣召集值班室工作人員開會。他說，中央最近有些緊急事務需要處理，一時顧不上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值班室也就沒有事情做。中央領導同志的意見是，值班室可以派人輪流值班，平時可以回原單位上班，但不要出差，隨時等候通知。

當李震事件告一段落的時候，隨之而來的「批周」和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以及「反右傾回潮」，直至1974年的「批林批孔」，四屆人大直到1974年的10月份重新題上日程。顯而易見的是，毛澤東才是四屆人大推遲的最關鍵的因素。

1974年10月4日，毛澤東要秘書電話告訴王洪文，並要王洪文轉告周恩來：由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同時提出了召開四屆人大的意見。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準備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通知。通知突出強調了毛澤東的意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

四屆人大再次被提到日程上來。

二、四屆人大準備工作中的插曲：「風慶輪事件」

毛澤東在8月決定中止「批林批孔」運動之後，開始考慮何時召開四屆人大。1974年國慶節一過，中央政治局會議正式討論了召開四屆人大的問題。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在10月4日向毛報告：「10月3日晚，政治局討論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問題，主要是討論了四屆人大的問題。如主席同意年內（或春節前）召開四屆人大，政治局最近一段時間的工作以此為中心全力準備。」毛同意年內召開四屆人大。有關四屆人大的籌備和會議期間所有的文件、人事安排，都要向毛澤東請示和獲得批准，方能湊效。

根據《周恩來年譜》，周恩來並沒有參加10月3日晚的政治局會議，因此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在10月4日並沒有向周恩來轉告關於四屆人大的通知，僅是告知由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後來國內黨史對此一致鞭撻，實屬不公平，筆者認為這正是毛的安排。高文謙先生認為：他在用召開四屆人大這張空頭支票吊人們胃口的同時，暗中打的仍是排周的主意，準備利用四屆人大組閣之機，先把周恩來「掛」起來，然後再逐步排出權力格局，用鄧小平取而代之。為此，毛澤東在籌組四屆人大的問題上，從一開始就明顯把周恩來晾在一邊，既沒有讓他過問有關人事安排的問題，也沒有明確表態是否由他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而是讓張玉鳳直接通知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提議由鄧小平出任國

務院第一副總理，擺出準備在政治上重用鄧的架勢。

1974年10月6日晚，周恩來和江青談話。江青提出對四屆人大人事安排及總參謀長人選的意見，周恩來當時並未表態。周恩來在沒有得到毛的明確授權，參與或者主持四屆人大之前，周恩來如何表態？雖然無從得知江青是主動還是被動的找周談話，江青此舉無疑是不符合毛的部署。

毛澤東的本意是撇開周恩來，讓王洪文等和鄧小平一起齊心合力，趁四屆人大的機會造就以王洪文等文革派和鄧小平為代表的老幹部派結合的權力新格局。而且鄧小平在這一系列的事件中，表現是讓毛澤東滿意的。這也是毛澤東在「九·一三事件」之後精心打造的身後政治格局。首先是通過1972年6月份的「批林整風」會議，讓全黨知道周恩來不是接班人；然後提撥王洪文和解放了鄧小平；進而再通過1973年的批周會議，徹底打掉周恩來的威信；隨後更在全國範圍內興起「批林批孔批周公」運動，讓全國人民知道以後如果是周掌權，則會走復辟的道路。毛澤東在事後所說的「總理還是總理」是有所指的，如一直有讓周恩來繼續做總理的打算，何必來這一句呢？

雖然從來沒有資料證實毛澤東設想周恩來不再擔任總理，但是6月份的鄧小平任中國代表團團長透露出來的信息無疑的。這次聯大特別會議以研究原料和發展問題為主題，是聯合國成立以來首次專門討論國際經濟關係問題的一次特別會議。討論這個問題，反映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願望。會前，已有許多國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腦表示要出席會議，使這次會議的規格明顯提高。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由誰代表不久前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的中國政府在會上闡明對當前重大國際問題的看法，為舉世所矚目。照理中國應派出具有對等身份的周恩來參加，然而毛澤東讓鄧小平率團前往，這不就是在暗示周恩來的總理職位即將不保麼？

然而一起突發的「風慶輪」事件讓毛澤東認識到，江青等人的政治段位確實太低，不得不再次讓以「調和」能力著稱的周恩來主持四屆人大的準備工作，從而毛澤東在以後的歲月裡，不得不對江青加以更精心的指點和指教。

不少著作引用王洪文在1980年被審訊時的供詞來證明「風慶輪」事件是意圖阻攔鄧小平任第一副總理、參謀長一事和「四人幫」一開始就打算把矛頭指向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問題，風慶輪只是個引子。江青在10月17日逼鄧小平表態一事是蓄謀已久的。

實際上，事情遠非如此。第一個在鄧小平已經被毛定為第一副總理的情況下，無論是江青還是其他人都不可能反對。恰恰相反的是，鄧小平的任命同江青關係密切，一定程度上講，毛是配合了江青才有了這麼一個安排。

有著作如此敘述：「在此之前，國務院副總理中是沒有第一副總理頭銜的。這是在醫院養病的周恩來向毛澤東建議，並得到毛同意後才設立的，暗示著鄧成為周恩來接班人地位。」

周恩來是第一個提出要設立第一副總理頭銜的人，但是周並沒有提出候選人。江青則說：「總理比較危險，可能動手術了，他（指鄧小平）就跑到我身邊說，不得了了，怎麼樣危險，最重要的問題要有一個第一副總理呀。我說，那還不是你嘛。你們看我蠢不蠢哪。」實際上鄧小平任第一副總理，沒有遇到任何的阻力。江青推薦張春橋取代周恩來的說法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江青之所以如此，同鄧小平的表現是分不開的。首先鄧小平復出的條件之一就是不能反對江青。其次，是鄧小平在「批林批孔」中的表現讓江青認為鄧小平和她們是一路人。

筆者在《周恩來年譜》或者其他資料中未曾看到過，鄧小平在整個「批林批孔」中對周恩來表示出同情或者是站在周恩來這邊。相反的是鄧小平卻有明確支持「批林批孔」的記錄。早在2月份，周恩來就建議「現在確實有些單位、有些省的個別領導者和個別老幹部在『回潮』，在談『復舊』，政治局同志請小平同志在適當場合批判這些錯誤，會較別人有力，當然要為他提供典型可靠的材料。」在1974年3月8日，軍委六人小組針對在軍隊中如何

「批林批孔」召開會議。會議由王洪文主持。鄧小平在會上猛批時任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政委的陶魯笏。鄧小平批陶魯笏要脫下褲子，要執行江青的指示，從文革中好好學習，積極進一步推動「批林批孔」運動。再加上鄧小平在1973年年底批周會議上的表現，江青認為鄧小平和他們是同路人，這是非常自然的。

風慶輪事件之後，周恩來勸說鄧小平找江青談，要搞好關係。對此，毛表示支持鄧。根據後來江青的敘述，雖然有分歧，但是效果還是不錯的。江青表示了對鄧的繼續信任。

1974年9月底，國產萬噸級貨輪「風慶」號遠航歐洲歸來。而在70年代初，周恩來建議利用當前能源危機，可趁低價購進一批萬噸級輪船。國產萬噸級輪船的成功遠航，此事正好提供給江青攻擊周的素材，買船實際是崇洋媚外，不符合毛一直提倡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在內部傳閱的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登出文章，文章中指責交通部派駐風慶輪的幹部「崇洋媚外」，公開散佈「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學。10月14日，江青將這份簡報批給在京政治局全體成員，稱「看了《國內動態清樣》有關風慶輪的報道後，引起我滿腔無產階級義憤。試問，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黨中央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部？國務院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關，但是交通部確有少數崇洋媚外、買辦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專了我們的政」，建議「政治局對這個問題應該有個表態，而且應該採取必要的措施。」

「文化大革命」期間在周恩來身邊工作的顧明說：「周總理是堅決主張買船的。七十年代初，石油能源危機影響到世界各國，使運輸業蕭條。船隊運輸也不景氣，代成新的船用原價百分之五十就可以買到手，一條萬噸級輪船花原價百分之二十就能買來。於是，周總理提出要買一批船，以加強我們自己的運輸力量，搞上幾年就會連本帶利都賺回來。經周總理批准，外貿部門便動用貨款買了一批外輪。為此，『四人幫』批總理批得很凶。」

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在江青信上批示，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意見，要求抓住「風慶輪」的問題，「批判修正主義路線」，「對交通部進行徹底檢查整頓」。鄧小平圈閱了該信。

這份文件經政治局傳閱後，退給江青。於是江青在10月15日（原文為25日）再作批示：

總理、康老：

這三份傳閱件毛主席都看了。現送上請閱。

周恩來看後，批示：已閱。

康生也於10月16日（原文為26日）寫下了下面的一段批示：同意江青同志在各份材料上的批示，同意洪文、春橋、文元同志的批示。我長期以來感到交通部有問題。應通過查處李國堂的問題，對交通部進行徹底檢查整頓。

10月17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即將結束的時候，針對風慶輪問題，作為已經被毛任命為國務院第一副總理的鄧小平此時還沒有表態。此時江青詢問鄧小平的態度也是自然的，而且是突然提起，因此並非什麼蓄謀已久的事情。

顯而易見的是，江青指責的是國務院，風慶輪事件的矛頭是指向周恩來而非鄧小平。而且此時的周恩來尚沒有獲得主持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的權力，如果單是指向周恩來，又如何能夠影響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呢？況且人事的安排最後還是由毛一手決定。而且根據後來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情況，把風慶輪看成是江青等把「矛頭指向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問題」也是毫無根據的。

但是，鄧小平的表現卻讓江青非常失望。鄧小平表示：我已圈閱，對這個材料我看還是要調查一下。江青卻進一步逼鄧小平表態：對批判洋奴哲學是什麼態度？是贊成還是反對？

鄧小平表示：這是強加於人，一定要寫上贊成你們的意見嗎？這樣政治局還能合作？江青認為鄧小平的這種態度有必要向毛澤東說明。江青認為「鄧小平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對文化大革命從來不表態。鄧小平不支持新生事務。風慶輪雖不大，畢竟是中國造的，鄧小平為什麼不表態？」江青想知道鄧小平是否在被任命了第一副總理之後還和他們是否一條心，站在同一個立場上。這其實才是江青質問鄧小平的最根本的動機。

1974年10月17日晚，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四人開會，決定派王洪文去長沙，向毛澤東告鄧小平和周恩來的「狀」。10月18日，王洪文在長沙向毛澤東匯報：為「風慶輪」的事，江青和鄧小平在會上發生爭吵，吵得很厲害。看來鄧還是搞過去「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那一套。又說：鄧有那樣大的情緒，是與最近醞釀總參謀長人選一事有關。北京現在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周總理雖然有重病，但晝夜都忙著找人談話，經常去總理那裡的有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後來王洪文表示擔心周恩來的健康才這麼說的，筆者認為鑒於當時王洪文和周恩來的關係，是可信的。

王洪文關於這部分的說法是：散（會）後我們回釣魚台，江青通知我：張春橋，姚文元至於17號樓碰頭，江青說小平吵架，就是對文革不滿，有氣，又說反對文革等等。江青說，鄧所以跳出，可能是對總參提名有不同意見，這是一次總爆發（鄧提陳錫聯，江青提楊成武）。

但是從中可以發現的是，當時江青和王洪文關係的微妙之處。王洪文飛長沙之後，江青得知王海容、唐聞生將隨鄧小平陪丹麥首相去長沙見毛澤東後。兩次召見王、唐二人，要她們向毛澤東反映國務院「崇洋媚外」的問題，並攻擊鄧小平17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是又一次「二月逆流」。此事說明江青對王洪文的信任是有限的。

周恩來對於政治局發生的這一切，非常關心。10月19日，周恩來把能「通天」的兩位小姐王海容、唐聞生找到醫院，向她們介紹整個事情的經過，著意替鄧講話，拜託她們向毛傳話，說：經他向參加會議的同志瞭解，鄧並非像江青宣傳的那樣揚長而去，而是李先念把他勸走的。鄧走後，張春橋說，他早就知道鄧要跳出來。江青也說她是有意問鄧對這個問題的意見。看來他們是事先準備好了要整鄧，鄧小平已經忍耐很久了。周此番話，不僅絲毫不提矛頭是指向自己的，反而挑撥離間，說是事先預謀好的。但是毛澤東發話此事是小事之後，周恩來又在11月1日至3日先後分三批約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葉劍英、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李先念、紀登奎、鄧小平，華國鋒、吳德、陳錫聯、陳永貴、倪志福、吳桂賢等開會，解決「風慶輪」事件的問題。其間，還另約王海容、唐聞生談話。還建議鄧小平找江青溝通。

毛澤東對於「風慶輪事件」認為是小事，不值得大驚小怪。風慶輪所能夠帶來的僅是江青偶然和鄧小平的衝突從而讓毛認為江青等人並不能夠理解自己的戰略安排一要和鄧搞好關係，且此時的毛澤東不想再掀起什麼「腥風血雨」。「風慶輪」對於王洪文造成的影響最大。在毛看來王洪文不能夠承擔大任，對王洪文的「聖眷隆恩」不再。雖然王洪文繼續和周恩來聯手準備四屆人大，但是王洪文從此開始走下坡路，而鄧小平卻一路陞遷。這就是江青所始料不及的事情。因此，毛澤東在見王洪文的時候，批評王洪文：有意見當面談，這麼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團結。並要王回京後多找周恩來、葉劍英談談，不要同江青搞在一起，提醒王要注意江青。

10月20日，鄧小平趕赴長沙，陪同毛澤東會見丹麥首相保羅·哈特林。鄧小平離開後，王海容、唐聞生根據周恩來的意見，把情況向毛澤東做了匯報。毛澤東生氣地說：「風慶輪的問題本來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等同志已經在解決，但是江青還這麼鬧。」毛澤東要王海容、唐聞生將他的意見帶回北京：「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如果他的身體還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齊給各方商量，提出一個人事安排的名單。鄧小平做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這是葉劍英的意見。我贊成照他的意見辦，戰時有事，平時無事，掛個名。楊成武可以做副總長。王洪文來的時候沒有這麼明確，再明確一下。委員長一二人再考慮。」

毛澤東對於總參謀長人選的談話，揭開了另一個話題，關於四屆人大人事的安排。

三、四屆人大人事安排中並無兩條路線的鬥爭

1974年10月20日，在長沙的毛澤東聽取王海容、唐聞生的反映後，對江青等人的做法表示不滿。他讓王、唐回京後向周恩來、王洪文轉達他的意見：總理還是總理，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由總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辦理。根據《周恩來年譜》的記載，自王海容、唐聞生傳達毛澤東的指示到12月22日由周恩來和與王洪文聯名將四屆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和國務院副總理名單的三個方案送毛澤東參閱之前，周恩來同王洪文一共談話14次，包括4次此單獨談話。顯然不是《毛澤東傳》作者所言的「受到毛澤東批評的王洪文，這時已處於十分狼狽的境地。」

對於官史中所做的一些寫作手法筆者認為需要點明。例如《毛澤東傳》中寫道「這一年，是建國二十五週年。慶祝活動比往年隆重，除組織遊園活動外，還增加放焰火、舉辦大型國慶招待會等。九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將參加國慶招待會見報的名單報送毛澤東，其中包括近幾年沒有露過面、第一次見報的老幹部四十多人，如胡喬木、孔原、伍修權、宋任窮、歐陽欽、林鐵、孫起孟、屈武、馬文瑞、張勁夫、李昌、李一氓、江一真、楊秀峰、孫大光、蔣南翔、蕭向榮、劉少文、傅秋濤、王輝球、陳鶴橋、傅崇碧、薛明、范瑾等。」，顯然對此國慶招待會見報的名單大加讚揚，但是誰主持寫撰的呢？則用籠統的中央政治局，是明顯的掩飾其中王洪文所起的作用。根據《周恩來年譜》，周恩來在9月28日晚閱王洪文送來的出席國慶招待會人員名單，提議增加齊燕銘。周恩來又在次日就出席國慶招待會人員名單致信王洪文並中共中央政治局，提議在愛國人士中增加起義四將領夫人等。由此亦可以看出在無論是王洪文還是周恩來都是執行當時「進一步推動對老幹部和社會各界人士的落實政策工作」的政策方針。

在周恩來同王洪文等協同各方的意見後，由周恩來同王洪文一起向毛澤東匯報關於四屆人大的準備情況。對於準備過程的幾個問題，將會在下面一一闡述。

1. 關於總參謀長人選的爭論

許多著作引用《周恩來年譜》上江青在10月6日向周恩來提出對四屆人大人事安排及總參謀長人選的意見，周恩來未表態一事來說明「召開四屆人大是他們攫取國家最高權力的最好時機。」且不論當時的中國國家的最高權力在毛澤東手裡，而江青的這個名單為什麼沒有曝光呢？如果說這個名單確確實實能證明江青要「攫取國家最高權力」！

江青向周恩來提出的參謀長人選是楊成武。鄧小平提出的候選人是陳錫聯。江青為什麼提名楊成武？雖然在1968年3月楊成武倒台時候，江青說了些非常過份的話。但是總的來說，江青並非楊成武倒台的關鍵因素。楊成武之所以倒台是腳踏兩條船，且表現飛揚跋扈，得罪不少人。但是江青和楊成武的關係並不一般。例如導致江青倒打一耙的「兩條路線鬥爭史」以及處理黑材料一事（見前文），不正說明江青對楊成武的信任麼？特別是在楊成武倒台後，總參謀長換成黃永勝，黃與林保持一致，對江敬而遠之，江對此極為不滿，聲稱總參謀長選錯了。林倒台後，江自然而然想起用楊成武這個投靠過來的軍隊內的重要人物。所以江青提名楊成武不足為奇。

周恩來並沒有提出任何人選。如果把這兩個人，陳錫聯和楊成武，放在一起進行分析，則會發現這都是投「毛之所好」。

鄧小平提名陳錫聯一點都不忌諱毛一再強調的山頭問題，只能說明這是投毛之所好。自陳錫聯出任北京軍區司令一職後，仕途一帆風順，在1976年達到頂峰。而江青提名楊成

武也是出於同樣原因。這在周恩來在1974年11月給毛的信中說得非常明白：我極端支持主席提議的小平同志為第一副總理，還兼總參謀長，便於楊成武同志學習工作，成熟了，小平可不兼，好為黨培養一個得力幹部。毛選鄧則化解了江和鄧提名上的矛盾，更重要的是符合毛現在的平衡原則。

由此筆者認為，高文謙先生的說法：「江青知道與沉潛內斂的周恩來不同，鄧小平為人剛愎倔強，說一不二，以後更難相處。自鄧復出後，兩人已經在一些問題上發生齟齬，像在總參謀長人選的問題上，兩人的提名就不一樣，相持不下。為此，江青決定先下手為強，尋機大鬧一場，即便鬧不出名堂來，也要給鄧小平點顏色看看。這就是後來鬧出『風慶輪事件』的由來。」這種說法是值得商榷的。

楊成武被毛看中，對比同一時期的羅瑞卿則看出明顯的不同。鄧小平對於整肅羅瑞卿表示出一定的保留意見，而楊成武在整肅羅瑞卿一事上是立下汗馬功勞的。楊成武在一定程度上是牽制鄧小平的一個棋子，也體現出毛對鄧的信任度並不是百分之百的，或許是吸取了林彪事件的教訓。

而陳錫聯則在四屆人大上被任命為副總理，預示著進一步的高昇。

2. 文化部、教育部部長人選的爭論

根據《周恩來年譜》1974年12月21日的記載：周恩來召開有王洪文、葉劍英、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江青、姚文元、紀登奎、吳德等參加的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員會議，討論四屆人大人事安排問題。會上，江青、張春橋等人竭力設法將其親信安排在文化、教育、體育等部門。會後，周恩來同李先念、紀登奎交換意見，認為教育部以周榮鑫掌管為宜，文化部、體委可作些讓步。

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根據毛澤東的安排，「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由總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辦理」，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有權力提出候選人名單，難道江青等人的提名就是奪權？

根據《周恩來年譜》，周恩來主持1974年12月21日政治局會議，草擬出四屆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和國務院副總理名單的第一、第二方案，並送葉劍英、鄧小平及江青、張春橋等閱。

張春橋在11月20日就被毛任命為第二副總理（只僅次於鄧之後）。而主管文化和教育恰恰是張春橋的分工。儘管江青在1個月以前寫信給毛表達自己的意見，提議遲群為教育部長。但是在12月21日，江青等人並沒有針對教育部長一職提出任何候選人。相反，在12月毛周會面的時候，周是帶著未定意見向毛澤東提出是遲群還是周榮鑫為教育部長。毛澤東否定了遲群。周榮鑫在1958任過浙江大學校長和黨委書記，而且以「土八路」的身份開了一門專講建築學的課。周榮鑫在浙大的表現讓毛覺得滿意：教育戰線要多派周榮鑫這樣的幹部！因此，當周提出兩個候選人的時候，是毛決定了周榮鑫為教育部長！

沒有任何證據能表明文化部不比教育部更重要。根據《周恩來年譜》，1970年3月10日，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設立國務院文化組問題，周恩來提議吳德為組長，劉賢權為副組長，石少華等七人為組員。當四屆人大來臨，周恩來詢問江青、張春橋關於文化部部長人選意見的時候，江、張提議吳德而非于會泳！

吳德回憶：「四屆人大召開前，1974年10月份，周總理就分別找一些人談人事安排，當時是三四個人為一批，周總理分批談話。周總理在與張春橋、江青談話時，他們提出要建立文化部，讓我去任部長。我知道後對周總理說我不行。我提出我負責北京市的工作已很繁重。我不懂文化工作，前一段負責文化組時，很多工作也沒有做好。我記得張春橋、江青堅持讓我任文化部部长，他們說：就得你來搞。為此，倪志福曾和張春橋發生了爭吵。倪

志福說：北京市的工作吳德同志還管不過來，他不能兼任兼管那麼多別的事情。張春橋說倪志福是本位主義。總理提出我做市委書記不兼革委會主任，主任要倪志福來搞。倪志福不幹。張春橋提出別的書記是否也不兼主任了？這就牽扯到上海兼主任的問題。總理沒有再提。

……後來，張春橋又提出讓我任副總理兼文化部長，這個提議大概是「四人幫」商量後確定的。……以後，在一次徵求人事安排的談話中，周總理對我說，讓我到人大去。周總理說：王洪文自己提出他不去人大，他不幹；讓華國鋒去，華國鋒也不干；總要有一位政治局的同志去……我不任文化部部長，就討論由誰任文化部部長。我提出文化部部長要由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擔任，于會泳、劉慶棠等人在文化界不一定能領導得起來。我具體提名上海的一個著名教授劉大傑。江青他們不同意，他們提出于會泳任部長，劉慶棠、浩亮任副部長。周總理考慮了他們的意見。」

在吳德堅決推辭的情況下，此時的于會泳是吳德的副手，而且自國務院文化組成立以來，於就在周領導下工作，為文化組組員之一。另有材料說雖然吳德推薦劉大傑，但是在吳德拒絕出任之後，是周恩來提議于會泳為部長，而這導致了江的極度不滿，並拒絕向于會泳祝賀。但是不論是哪一種情況，于會泳出任文化部部長是各方都接受的，所謂「四人幫」的設法將其親信安插一說是站不住腳的。

3. 「四人幫」有利用四屆人大組閣陰謀嗎？

周恩來自得知主持四屆人大的決定後，隨即連日在醫院裡約集在京政治局成員開會、找人談話，部署落實四屆人大的各項籌備工作。整個四屆人大組閣都是由周恩來一手操作。

其中一個典型的特點是周在安排老幹部方面遠遠跟不上安排中年人和依靠造反起家的新人。周在11月份給毛寫信，表示關鍵在於中青幹部——實則為造反年輕人的提拔，並且支持他們在政府中任職。在高文謙先生所著《晚年周恩來》一書中有信的全文。在12月份，周恩來又提議在現有名單基礎上一再增加老幹部、外事和體育等方面的名額，並提交政治局審議批准。但是根據《晚年周恩來》一書中所提，此信也包括增加「紅衛兵」（即造反派）代表，並且周恩來對其類建議增補的代表名額都提出了具體數字，唯獨對老幹部的增選名額不提出具體數字，建議由政治局「考慮斟酌後加以決定」。

在這次提名中，周恩來提議同毛關係密切的謝靜宜當人大副委員長。周還特意提拔了一些同毛沒有私人關係的人，如祝家耀、鄧崗、于會泳等以避嫌。周還催促張春橋和王洪文推薦祝家耀為公安部副部長。周恩來還推薦于會泳出任文化部的部長一職。周恩來還批評上海方面送來的人還不夠！來自上海金祖敏被周恩來安排為人大常委候選人。

周恩來同陳永貴談話，要求其出任國務院副總理。陳永貴以文化水平不行推辭。周恩來用當年勸陳伯達的話來勸陳永貴：「你是不是黨員？是黨員就得接受黨的安排。你是個農民代表。」

周恩來從長沙回京後又提出增加董加耕為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理由是上海、北京、東北都有人選了、西北也應有個年青人。但董是反許世友一派，因此周恩來最後沒有安排董加耕作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人選，讓他作了人大常委。

1974年12月21日，周恩來召開有王洪文、葉劍英、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江青、姚文元、紀登奎、吳德等參加的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員會議，討論四屆人大人事安排問題。根據會議討論醞釀情況，草擬出四屆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和國務院副總理名單的第一、第二方案，並送葉劍英、鄧小平及江青、張春橋等閱。審閱四屆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名單第一方案，增加陳雲、韋國清為副委員長。

其中大方案（第一方案）是，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人數多一些，包括一批老革命和各方面知名的代表人物，國務院安排的是一個精幹的工作班子；小方案是如果人大常委會副委員

長人數不宜過多(三屆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是18人)，則將幾位老革命安排作國務院顧問。周恩來同時提出對陳雲、徐向前、聶榮臻、韋國清、譚震林、李井泉等老革命如何安排，設想國務院設顧問等想法。以及他們是作國務院顧問還是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需請示毛主席決定。方案還列有：葉劍英兼國防部長，余秋裡兼計委主任，谷牧兼建委主任，華國鋒兼公安部長，喬冠華兼外交部長，方毅兼外經部長等。

毛澤東聽了匯報後表示，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贊成大方案，即副委員長人數可以多一些。這樣原方案列為國務院顧問或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幾位老同志均明確做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人選。在講到人大常務副委員長人選時，毛澤東贊成吳德主持人大常務工作。毛不同意謝靜宜列入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人選，他說：「副委員長，小謝不能放，人家對她不瞭解，提得太早了，不好。」又說：「小謝，官越作越大，搞共青團書記可以，當副委員長就不適當了。」

1974年12月22日，周恩來召開有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紀登奎、華國鋒、陳永貴、陳錫聯、倪志福、吳桂賢等參加的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員會議，討論21日所擬兩個方案名單。經過協商，又擬出兩項名單的第三方案。會後，與王海容、唐聞生談話。同日，與王洪文聯名將四屆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和國務院副總理名單的三個方案送毛澤東參閱。

在聽取周恩來匯報時，在講到喬冠華、方毅作國務院副總理人選時，毛主席說：「要保護喬(冠華)、方(毅)、謝(靜宜)，但不要放。」最後這三個人都沒有當上副總理。講副總理人選時，毛主席還曾問：「吳桂賢多大年紀？」

關於總政治部主任人選，在周總理去長沙時尚未有定論。周恩來向毛匯報時提出了三個方案——肖華、蘇振華、廖漢生，還提出可否調洗恆漢？對此，毛都沒有表態。最後，毛再三考慮決定讓張春橋兼任總政治部主任，並說，張春橋有才幹。

另外，毛在聽取匯報時還提出在開四屆人大之前開二中全會，並說：鄧(小平)換李(德生)常委、副主席。李要他自己提出來，辭去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職務。

因此筆者認為：文革中是否存在周、江兩個陣營的對壘？根本就不存在。四屆人大人事安排的過程充分表明，周、江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相當一致，都是在毛的旨意下行事，所不同點在於採取何種形式予以完成。周江在所有重大的根本問題上沒有重大衝突，相反，雙方的配合相當良好。

筆者還有理由認為中共官方所謂葉、周拼了老命要找毛匯報，防止江青等人利用四屆人大篡黨奪權是一個謊言。編造這個謊言的目的是為了是另一個謊言能夠自圓其說，那就是周恩來和江青各自擬定的名單有巨大的差別。歷史的真實是在毛授意下，讓他們商量名單然後來匯報。

而從鄧小平的任命到長沙告狀，恰恰反應了這樣一個事實：包括王洪文在內的一批人對鄧小平的崛起並不抱有好感，更是難以達成在一個戰壕裡戰鬥。王洪文說：

小平任命的事，我最想不通，我記得初時鄧出來工作時，我就思想不通，他是第二號走資派，我看到的，聽到的都講鄧不好，特別是聽了幾位原先同鄧共事的老同志的話，使我更不信鄧小平了。

這樣同毛澤東的初衷是完全相反的。由此毛澤東期望鄧、江、王等人合作一致對外(周)的設想注定落空，也注定了當毛澤東重用鄧的時候，王洪文會失勢的結局。

4. 關於兩個史實的說明

第一：關於《政府工作報告》的字數問題

不少著作引用毛毛的說法：毛澤東讓鄧小平起草一個短小的《政府工作報告》是因為考

慮到周恩來的身體健康問題。實則不然，儘管張玉鳳在10月4日給王洪文的指示中就指明政府工作報告有3千字就夠了，而實際上報告仍然達到了5千多字。而張春橋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字數更少，只有3400字左右，比周恩來的報告還少1600字。

第二：鄧穎超的提名

周恩來在準備四屆人大的時候，非常小心謹慎。周恩來讓孫中范把其所有的親筆原件都銷毀。

孫中范回憶說：「紀登奎聽了郭玉峰和我的匯報後說：看來要考慮調整全國婦聯的主要領導人。郭玉峰當場建議請鄧（穎超）大姐擔任全國婦聯主席，紀登奎當即表示同意，但他說這要同總理商量後再作決定。後來紀登奎傳達周總理的意見，周總理堅決不同意鄧大姐擔任全國婦聯主席，全國婦聯主席的人選要再考慮。紀登奎也曾向中央建議由蔡暢、鄧穎超擔任名譽主席，康克清任主席，周總理還是不同意。（後來周恩來匯報時）在講到鄧穎超、蔡暢的安排時，毛主席同意鄧穎超做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當周總理堅持鄧穎超不要當副委員長時，毛主席沒有再堅持。因此只安排蔡暢做副委員長。」

對周恩來素有研究的秦九鳳則說：四屆人大之初，中央政治局就有安排鄧穎超為副委員長的建議，這一建議並且為毛澤東生前親筆批准。

無論如何，如果周恩來執意不肯的話，鄧穎超絕對就不應該出現在提交給毛的方案名單上。周恩來此舉是借毛對此事的態度來揣測毛，打狗還要看主人，人事安排不也是如此麼？周恩來對王洪文等人的悉心培養、對江青等人的態度不也是這般道理麼？

但是無可否認的是，鄧穎超的資格足夠當人大副委員長的。鄧穎超在文革後也曾經對自己在建國後一直沒有得到陞遷而惱火。即使沒有處在高位，鄧穎超在政治上也是十分投機的。有一次周恩來指示新華社和對外文化聯絡部舉辦一次「我國領導人出訪國新聞圖片展覽」。鄧穎超對杜修賢說：「老杜，選圖片時，記住多選一些外國人舉毛主席像的場面。」周恩來得病後，有人向鄧穎超問候。鄧穎超回答：「你講的不對（指總理的的健康關係到人民的幸福），總理一再說過，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的身體健康才是全國人民的幸福。」鄧穎超就是一個「小」周恩來，也有人說周恩來是鄧穎超「調教」出來的。

1959年廬山會議，鄧穎超邀請朱旦華上廬山，並幫助鄧穎超整理了一份反應大躍進的材料。但是八屆八中全會後，全國反右傾。鄧穎超竟然把此材料轉交給了全國婦聯。全國婦聯以此批判了朱旦華。九屆二中全會期間，鄧穎超在發言中表示擁護林彪的講話，同意設國家主席，並義憤填膺地說，誰反對毛主席，誰反對林副主席，我們就打倒誰！鄧穎超還爭功似地說：「我們現在都說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你們知道嗎？『親密戰友』這樣的稱呼是我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第一個提出來的。」在該組，由鄧穎超牽頭集體通過了擁護林副主席講話，同意設國家主席，希望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林彪擔任國家副主席的意見。鄧穎超說：「對設國家主席，我們都發言了。現在我們再用全組通過的辦法，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議，這樣我們小組對設國家主席的態度就更加鮮明瞭。」「林彪事件」之後，在1972年的「批林整風」匯報會議上，鄧穎超又對江青做出了極其不合實情的發言。鄧穎超說她「從三十年代起就知道江青，讀了當時報紙上發表的江青致唐納的公開信，認為江青是傑出的女性，林彪一夥要搜集江青的黑材料，不是『黑材料』而是『紅材料』，等等。」就是文革後，鄧穎超又根據形勢的變化，一度對林豆豆許諾。但是形勢再變之後，鄧穎超就再也不再理會林豆豆了。

鄧穎超和周恩來的關係，有其融洽的一面，也有另一面。知情人透露鄧穎超曾經在延安因為搭竹竿晾衣服大罵警衛員。知情人也透露周恩來和鄧穎超之間摩擦不斷，並曾經打架，鄧向周扔碗，有次還導致周恩來臉都被鄧穎超抓破。知情人還透露，周恩來和服務於南海的文工團的團員跳舞之後，鄧穎超曾經握住此團員的手問到：周恩來對你沒做什麼吧。張佐

良則說：周恩來在1973年年底被批期間，周恩來偶爾與鄧穎超同桌吃飯，也聽不到老倆口的說話聲，西花廳的氣氛異常沉悶。

但是鄧穎超和周恩來畢竟在政治上是連體的。薛明在「林彪事件」之後回到京城，鄧穎超代表周恩來去看望。文革結束後，薛明揭發賀龍被迫害慘死的材料在北京政治圈中廣為流傳，引起很大的反響。但是知情人又都知道此事周恩來是要負主要責任的，鄧穎超就頗有些難堪，曾托人帶話給薛明，說：你寫的那個報告，要是恩來看了，他會哭死的。文革剛結束時，一批老幹部要求清算毛澤東的錯誤，但是又同時樹立起偉大的周恩來形象。其實抬高周恩來是假，想否定毛澤東是真。對此，鄧穎超不無擔心。因為鄧穎超知道，在高度個人集權和特定的政治環境下，周恩來不可能「潔身自好」、「光明磊落」。「毛榮周則榮，毛損周則損。」而鄧和周的關係，則是夫貴妻榮麼。鄧穎超說：你們不要這麼搞，不能這麼搞麼。恩來什麼時候反對過毛主席？他這個人你們不是不瞭解，路線對了，他就對了；路線錯了，他就錯了。你們那樣說，那樣搞，無法向歷史向後人交代麼。基於同樣道理，鄧穎超還對一些老幹部的復出持否定態度。鄧穎超擔心周恩來的聲譽被毀。鄧小平復出後，有人提議鄧穎超進政治局。對此，鄧小平說你知道鄧穎超是什麼樣的人麼？鄧穎超如果進了政治局大家還有辦法工作麼？當局勢發生變化，中央對於周恩來的評價過份扭曲後，鄧穎超又認為在《歷史決議》中寫上毛在「文革」中保護了中央和地方一批領導幹部，平反了一批冤假錯案，這樣寫不夠實事求是，反而會引起反感。

5. 關於江青、張春橋叛徒問題

毛毛回憶：1973年4月9日，鄧小平和其夫人卓琳看望周恩來。周恩來向鄧小平說張春橋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讓查。但是毛毛的回憶是值得懷疑的。首先，依據周的小心翼翼的特點，特別是有第三者卓琳的存在，周怎麼可能提起如此敏感話題？其次是鄧此時剛剛復出，和周的交往甚少，周同鄧談此事更是不可能。實際上考慮到毛毛寫的另一次親自陪同鄧小平去看康生的情況，則完全有理由認為是毛毛把兩次事情搞混了。

1974年12月23日毛周會面，周恩來又對毛談起此問題。這也是不可以信的。根據《周恩來年譜》，12月26日，毛澤東還表示，他已經知道有關江青、張春橋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的情況。

《周恩來年譜》並沒有告訴讀者是周還是毛先提起，僅是提及「毛澤東還表示，他已經知道有關江青、張春橋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的情況。」。但是很多著作言之確鑿的說是周主動向毛提起。

同樣根據《周恩來年譜》，毛不僅任命了提議由張春橋兼任總政治部主任，而且向周誇獎了張，說張有才幹，要周向政治局傳達。周還傳達了「列寧為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要寫文章。要告訴春橋、文元把列寧著作中好幾處提到這個問題的找出來，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讀，然後寫文章。要春橋寫這類文章。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這些都證明毛對張的重視。其實就是周恩來本人，對張春橋也是非常欣賞。早在1966年11月，周恩來向中央文革提出，他身邊缺少助手，沒有辦法正常工作，要求給他派個秘書，並點名要張春橋去。

陳永貴在1968年承認了自己的歷史問題。當有人質疑陳永貴沒有資格做為「九大」代表時，是周恩來根據毛的意思把此事壓下。謝振華說他寫了向上反映的經過和自己的看法：「陳永貴的歷史問題被發現以後，於1968年9月，我即派當時出席『軍工會議』的李金時（六十九軍副軍長）將陳永貴的問題呈報周總理。周總理當即指示：『六十九軍的同志要顧全大局，不要擴散，影印件可報中央。』」「遵照周總理指示，1968年12月，以六十九軍黨委名義正式上報北京軍區黨委轉呈中央。」「周總理陪外賓參觀大寨時，我又當面向他

作了請示。總理說：『要維護大寨紅旗，作為歷史問題，仍可讓陳永貴當代表出席「九大」，但只當代表。』或許過了幾年之後，此事已經淡漠，周恩來提名陳永貴為副總理！因此，鑒於以上幾點，在周明確知道毛對張的看法，周如何能向毛主動談起此事？但是陳永貴和張春橋之間出現矛盾時，周恩來卻站在張春橋這邊。由此可以看出張春橋的份量。

根據張佐良的回憶，當時毛周會面很長時間後，準備去接周，曾經偷聽到周對毛澤東的秘書說：「康生這個人，歷來極左，他在延安時期就是這樣。剛才主席也說了……。」聯繫到1975年12月康希望周能就此事同他聯名上書，周恩來拒絕了康生的要求，筆者認為實際情況有可能是：毛根據自己的渠道瞭解到有人提出此事，特別是張春橋的問題，早在「九大」之後不久，林彪就把此類材料報告給毛。（筆者採訪原空軍情報部有關人員得知）毛因此需要向周說明此情況，而周向毛的秘書解釋，把此事說成是康生「極左」的結果，實際上是為張春橋和江青辯解！周恩來和康生的關係本來是相當融洽的，不僅僅體現在周恩來對康生晚年得病之後的關心與探望。周恩來有次在洛陽龍門參觀，看到北魏時期的龍門二十品拓本。周恩來當下對隨同人員講：「康老很喜歡書法，可以給康老買一套帶回去。」周恩來為此專門詢問周圍的人是否帶夠了錢。康生在臨死之前的最後一搏，仍然是見了周恩來一面，據說仍然是為了江青、張春橋的叛徒問題。

張是毛的紅人，是文革的標誌之一，林彪想打倒張都辦不到，以至於在廬山在拉大跟頭。九屆二中全會後風向轉變之後，周恩來竟然遞條子給林彪，要求林彪表揚一下張春橋，結果林彪對周恩來的提議置之不理！張春橋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中，身兼兩職，既在七人「批林批孔」領導小組也在六人軍委小組，紅的發紫，以周的為人善於揣摸毛的心思，怎麼可能會在此時向毛提及張春橋的「叛徒」問題？

以江青和毛的關係，周恩來更是不可能提及了。

四、1975年中國的政治舞台

毛澤東提出四屆人大之後，讓周交班，要周安心養病，國務院的工作讓鄧小平全面掌管。

1975年1月8日—10日，周恩來在京西賓館主持召開了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復出兩年之後的鄧小平終於通過了毛澤東漫長的考察，最終獲得了實權。會議追認鄧小平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選舉鄧小平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在13日至17日召開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鄧小平正式成為排名第一的副總理。2月1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主持有全體副總理出席和葉劍英、郭沫若列席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審定國務院十二位副總理分工。周恩來順勢說到：「我身體不行了，今後國務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之後，鄧小平實際主持國務院的日常工作。

1975年中國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是鄧小平。

從1974年8月至1975年1月，毛澤東四次指示要安定、團結。說明這時毛澤東已經從思想上到行動上認識和接受了「文化大革命」前期「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教訓，決心以最大的努力盡快結束「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局面，實現安定團結，恢復正常的生產秩序和社會秩序。鄧小平在1975年整頓中創造性地貫徹執行了毛澤東安定團結的指示，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實踐證明，毛澤東關於安定團結的決策是正確的。

然而「你不管它，它要管你」的無產階級政治卻無時不在干擾「整頓」。

1975年2月18日，中央政治局下發了中發【5】號文件《中共中央關於學習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的通知》。此通知的重點是突出在引用了毛自己的話：「毛主席說，列寧為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要寫文章。要告訴春橋、文元把列寧著作中好幾處提到這個問題的找出來，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讀，然後寫文章。要春橋寫這類文章。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由此也可以看出張春橋的「才幹」在毛的眼裡是

如此的重要，也由此注定了一旦鄧與張等人發生衝突，毛澤東最終必然會選擇能給代表自己意識形態的張春橋等人。

1975年3月1日，姚文元的《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一文經過毛澤東批准，在《紅旗》雜誌第3期上發表。隨後，《人民日報》全文刊載。姚文元的文章強調了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至關重要，也論及了毛澤東的擔憂——在物質刺激的激勵下出現了令人擔憂的新資產階級分子，號召那集體所有制推向更高層次，並且進一步推向全面所有制，警告中國仍然有淪為修正主義的危險。除此之外，姚文元還加了一段至關重要的話：「1959年反對彭德懷反黨集團時，毛主席曾經指出：『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因此要認真讀書，這十幾年來，毛主席多次重複這個意見。」毛澤東在反經驗主義上是否在此之前有過表態，筆者尚未發現可靠證據。

在姚文元文章發表的當天，張春橋在全軍各大單位政治部主任座談會上講話說：「在延安整風中，主要批教條主義，全國解放以後，也批教條主義，對經驗主義沒有注意批過。」「對經驗主義的危險，恐怕還是要警惕。」張春橋要要求把經驗主義是主要危險「當作綱，聯繫我們軍隊存在的這些問題來學習。」江青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新華印刷廠的工人是發表了和張、姚兩人相同的看法：「黨內現在最大的危險不是教條主義而是經驗主義。」會後，江青又連夜讓其秘書打電話給「梁效」寫作小組，解釋說：「當前的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它是大敵，是修正主義的幫兇，使我們必須打倒的大敵。」

4月7日，《解放日報》發表《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說：「他們輕視理論學習，醉心與無原則的實際主義，滿足於沒有遠見的事務主義，以自己的局部經驗，指揮一切，而不懇聽取別人的意見。恰恰是這些同志，自覺地或不自覺的成了王明教條主義的合作者。」麥克法奎爾對此評論道：鄧小平主持會議時以目標為導向的生硬風格所表現出來的正是這樣。

同傳統的認識恰恰相反，筆者認為張春橋等人的矛頭是主要是針對鄧小平而非周恩來。重新獲得毛澤東信任的鄧小平是張春橋等在權力競爭方面的對手，而非周恩來。這可以從江青的講話中得到明證。

江青曾經對於理論學習挖苦到：「不要告訴別人是我說的話，在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時候，相比之下，政治局是最差的，他們只學了3條，然後就停下來了。有時候政治局沒法開會，一開會總有爭吵。」此時周恩來很少參加政治局會議，矛頭非常明顯的是指向鄧。

4月18日，鄧小平在陪同毛澤東會見金日成之後，向毛澤東反映自三月初以來江青、張春橋等大反經驗主義的問題，表示不同意關於經驗主義是當前主要危險的提法。鄧的觀點得到毛的贊同。23日，毛澤東在姚文元所送的新華社《關於報道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請示報告》上批示：「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批示還要求將「此問題請提政治局一議」。

4月27日，鄧小平和葉劍英等人根據毛的講話在政治局會議上對江青等人提出批評。會後，王洪文以匯報中央政治局會議情況為名致信毛澤東：說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總是把形勢說得一團漆黑，支持、縱容社會上最凶的謠言，並稱：這場爭論，實際上是總理想說而不好說的話，由葉、鄧說出來。筆者認為，毛澤東支持鄧小平並沒有想到會造成如此大的「分裂」。一個是鄧小平對於江青等人的態度過於嚴厲，其次是對江青等人把鄧、周放在一起的做法不滿。毛澤東覺得有必要親自說明這個問題：一是雙方不要搞派性影響團結，二告訴江青等鄧小平和周恩來不一樣，鄧小平是毛派。

5月3日，毛澤東在其主持的最後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批評了江青等人。官方對於這一段的說法是「嚴厲的警告」。筆者認為，毛確實批評了江青等人，指責江青等本人就是「小

小的經驗主義者。」但是「嚴厲的警告」則是遠遠談不上。就在毛講話的時候，江青還插了話。江青說「主席是不是說看《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毛澤東答道「嗯。」亦有材料說江青在中間是多次插話。

至於官方大力宣揚的毛澤東批評了「四人幫」一事（指官方宣稱恰恰是毛澤東第一次提出要解決「四人幫」問題）在筆者看來是對江青等人友好的提醒。在1975年的毛澤東最擔心的莫過於是「派性」問題—即影響鄧和江青等人的合作的重大障礙。毛澤東從三月份就在提出要消除派性：「不要搞什麼幫，什麼廣東幫，湖南幫。」毛對左、中、右各種派性都要敲打，不僅僅是「四人幫」。毛澤東明白，只有鄧小平與江青等人的團結一致才能完成文革大計—既可以保證文革的意識形態，又可以治理好國家。毛對此顯然非常自信，這也是毛澤東在5月3日當眾再次提及「鄧是毛派」的緣因。

經過點撥的鄧小平完全明白毛澤東的意思。5月27日的會議記錄完整的體現了這一點。會議記錄說：「不搞掉派性不行。春橋那個分析，現在的派性同過去不同，我始終贊成。看不到宗派主義，四人幫，值得警惕。不是什麼人挑起的。我是相信毛主席的話。在不在四人幫，都警惕。政治局有責任把主席的優良傳統貫徹下去。」葉劍英在隨後的6月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對派性問題做而來詳細的闡述，贊同鄧的觀點。簡而言之，鄧和葉都沒有利用毛的批評來攻擊「四人幫」。而官方的一致的宣傳是鄧小平、葉劍英等集中的、嚴厲的批評了江青等人，甚至是會議還沒有開始便是兩軍對壘、針線分明。這顯然難以解釋如下問題。

毛對於5月27日和6月3日會議的評價是「有成績」。同時毛澤東還不忘提醒鄧小平江青等人是有功勞的。

毛對於鄧的表現是完全滿意的。而且毛澤東特意讓鄧小平主持這兩次政治局會議，大有特意觀察之意。1975年6月下旬，王洪文被派往浙江、上海「幫助」工作一段時間。行前，他向毛澤東提議，在他離開北京期間，政治局會議由葉劍英或鄧小平主持。7月1日凌晨二時，葉劍英就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主持人選，致信毛澤東：「我因年老多病，精力不勝，提議請小平同志主持，以利黨的工作。」毛澤東批示：「同意。」這是對鄧小平表現的最大回報。鄧的表現完全向毛顯示：他是可以和江青等人合作共事的。逮捕四人幫後，葉劍英後來證實到：鄧小平主持工作時，研究過要團結他們，結果還是團結不攏。團結不攏的主要原因在於江青等人。江青等人把鄧小平視為掌握權力的障礙，絲毫沒有領會毛的政治安排。

周恩來是在4月中旬開始關注「反經驗主義」。但是直到毛澤東在5月3日表態之後才開始要求秘書準備將前一時期各報刊上批判經驗主義的情況，綜合成一材料，連同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提到的《哲學小辭典》一起送閱。周恩來在4、5日表達了自己的意見：對於毛澤東指出的江青等人的「這次錯誤」，表示「擁護主席意見」。「有錯誤的，要有自我批評」；此外，「同意小平同志意見」，「願自我批評的就說，說多少都可以，不說也可以，不要強人所難」。周恩來在和稀泥。為此，周恩來依據毛澤東的提議提出：關於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和手續問題，強調：政治局工作「必須遵守九大、十大方針路線，『三要三不要』，以安定團結為好」。「凡要議大事，先在政治局常委談一談。各單位擬好文件的，除外交、國防事急需立即傳閱送批外，其它總要在二三天前先行送閱待議。政治局同志有意見（除小事急事外）需提政治局討論的，請先向主持人在兩三天前提出。個人除自己管轄的單位外，其它需下達的事，必須經過政治局常委會或主管部門同意後以機關名義下達。個人交換意見，不能以個人或機關名義下達下送文件。個人通信，不能以指示口氣來信和通電。」周恩來指望分歧在政治局內部消化。

在5月下旬，周恩來和張春橋發生了關於「三月一日張春橋在總政召開的各大單位主任座談會上的講話」是否確切的問題上的爭論。筆者認為這恰恰正如周恩來所言：「我這段回憶的文字，不知是否較為確切；如果仍不確切，請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寫，

我決不會介意，因為我們是遵守主席實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導的。」張春橋也就不再爭辯，回信到：「不再改了。」 就在此信中，張春橋還對周恩來的健康表示了極度的關心。 知情人講述，張春橋對於病重的周恩來非常關心，幾次周的大手術張春橋都在場，而且在9月20日的最後一次大手術之時，周恩來不僅表揚了鄧小平，同時也表揚了張春橋。張春橋在和陳永貴發生了衝突之後，周恩來也是站在張春橋這一邊。

6月28日，江青做出檢討，主旨是自己的「派性」非常嚴重甚至到了有可能分裂「黨中央」的地步，並表態感謝政治局對其的批評和幫助。張春橋則說：「主席關於不搞四人幫的指示，一定要堅決照辦，並盡可能的作好團結工作。至少不給主席增加負擔。」 周恩來率先表態肯定了江青的檢討：「今後政治局同志凡遇大事都經過組織討論，事先請示主席，遵照主席指示執行，認真深入學習，聯繫中國實際，在實踐中多聽同志好意見，堅決改正常犯的錯誤，政治局的團結就會搞得更好。」

高文謙透露：周還特意把一些政治局委員找到醫院來，向他們打招呼，要他們適可而止，不要計較江青的態度，注意團結她一道工作。

秋石客先生說：據知情人講，周總理住院期間，的確同許多老同志談話。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的確經常往總理那裡去。……一些老幹部找總理是不斷做總理工作，希望總理站在他們一邊，採取一些行動。……(但是)總理不但沒有支持他們，反而語重心長反覆批評他們，其中有一條是叫他們放過江青，不要再犯錯誤。他們不聽，迫使周恩來帶病要參加批評江青政治局會議，阻止他們繼續批判江青，結果被擋在門外，使周總理很生氣，說了一些很重的話。知情人講，毛主席的確在政治局會上批評過江青，主要意思是江青不懂政治，不會團結人，有宗派主義傾向。毛主席用意很明顯，是恨鐵不成鋼，是關心和愛護，是希望政治局同志幫助江青。對此，周總理非常清楚。可那幾個中央領導人，卻大做文章，抓住不放，你說總理能不著急嗎？知情人分析，當時的總理很為難，一方面他是忠於主席的，愛護江青的，同時，他也愛護老同志，他與他們有數十年的交情，不希望他們再犯錯誤。

吳德回憶，在4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雙方因為要不要下發毛在姚文元請示上的批示上發生了爭執。張春橋提議，毛主席的批示在其他文件上順便提一下就可以了。張說完此話之後，雙方陷入了僵持。此時吳德發言說毛主席的批示應該下發，並說反經驗主義就是反對老幹部。此日，周恩來就找吳德談話，勸吳德以和為貴，團結要緊。周恩來還對吳德說：你知道不知道，主席對兩方面意見在觀察中，他們會反攻的，反攻時你是吃不消的。之後，吳德就不再怎麼發言了。 當毛澤最後一次考驗鄧小平的時候，鄧小平以「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拒絕後，周恩來在見到鄧小平後批評鄧小平「你就不能忍一忍？」

由此可以看出周恩來在反經驗主義時的真實態度：周恩來不可能對江青或者張春橋等人提出正面的批評。周恩來做的更多的是「調和」的工作。對於周的這種行為，完全符合周恩來對毛澤東的一貫理解。在筆者看來，周恩來是黨內真正深入到毛澤東的內心，真正懂得毛澤東需要什麼，要幹什麼的唯一高級幹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75年8月13日，毛澤東在回答為其「讀書」的北京大學講師蘆荻關於「水滸」時說發表評論：《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農民起義軍領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讓人招安了」，進而得出結論：「《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當時在場的張玉鳳則說：1964年毛澤東在武漢就說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義。 正如筆者在第二章所論述到的，那個時候毛澤東不正是想先打倒周恩來麼？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水滸》的評價是早就有所指的。而1975年這次，只是更加露骨而已。顯然毛澤東這番話不是泛泛而談，是有深刻的現實意義。毛澤東寄希望江青等人能和鄧小平團結合作，希望能給消除派性。但是反「經驗主義」暴露了江青等人對於鄧小平是不滿的，原因無非還是權力之爭。雖然江青做了檢討，又聽從毛澤東的

建議，去訪問了鄧小平的家，但是這並沒有消除甚至是減緩雙方的關係。毛澤東有理由擔憂自己去世之後中央會發生鬥爭甚至分裂，進而會出現修正主義—即有人會「鞭屍」，也就是毛澤東此時所言一否定文革即是投降、招安了。因此，當蘆荻提及水滸時，毛澤東也就有感而發，實為心中早有感焉。

蘆荻認為毛澤東的談話十分重要，對重視研究古典文學著作有價值。談話之後，蘆荻把毛澤東的談話一句句整理出來，交給張玉鳳送毛澤東看。毛澤東看後，表示同意。由於毛澤東的談話內容中有這樣一個內容：要出版二種版本的《水滸》，因此，毛澤東把這份記錄稿交給江東興，要江東興交給分管出版工作的姚文元看。8月14日，記錄稿交給了姚文元。姚文元於當天便致信毛澤東，認為毛澤東所作評論「很重要」，對現在和將來的中國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義」，並提出應把毛澤東的評論和他的這封信印發中央政治局成員及各宣傳、出版單位。毛澤東於18日對姚文元的請示批示「同意」。

8月17日，姚文元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組織討論毛澤東關於評《水滸》的談話，還訂出了一個宣傳規劃，於8月10日送毛澤東處，請毛澤東閱。毛澤東閱後批示：「同意」。《紅旗》雜誌1975年第9期發表文章《重視對〈水滸〉的評論》。9月4日，這篇題為《開展對〈水滸〉的評論》的社論在《人民日報》上公開見報。這些文章的關鍵之處在於：明確提出，評論《水滸》「是我國政治思想戰線上的又一次重大鬥爭，是貫徹執行毛卜席關於學習理論、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組成部分」，評論《水滸》是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要從《水滸》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訓，總結歷史經驗，學會在複雜的鬥爭中識別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知道什麼是投降派」。其主題就是要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

9月7日，周恩來在會見最後一批外賓時說：馬克思的請帖，我已經收到了。這沒有什麼，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法則。」但是懷有深厚「伍豪事件」情結的周恩來還是坐不住了。9月15日，周恩來在與人談話中，就近期報刊宣傳開展對《水滸》評論一事指出：他們那些人有些事情做得太過分了！最近評《水滸》批「投降派」，矛頭所指，是很清楚的。據說，周恩來還講：「如果真有投降派，那當然應該批，可事實上並不是這樣。」

還有一次，周恩來當著汪東興的面說：我要去見毛主席，我有文件證明，我沒有反對毛主席。汪東興後來說，文件沒有找到。

周恩來對此太過於敏感了。江青等人的目的還是想把鬥爭的矛頭對準鄧小平。張玉鳳說：主席評《水滸》，根本沒有影射小平同志。9月12日，國務院在山西大寨召開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中央部長、副部長一級的領導幹部，各省市自治區副省級以上的領導幹部與會。在會議上，江青針對「評水滸」發表講話：「不要以為評《水滸》只是一個文藝評論，同志們，不能那麼講。不是，不單純是文藝評論，也不單純是對歷史，對當代也有現實意義。因為我們黨內有十次路線錯誤。今後還會有的。」「宋朝，最著名的是方臘，洞庭湖的楊麼。方臘是在浙江。還是全國此起彼伏的農民暴動。獨獨是宋江上了梁山，篡奪了領導權。他怎麼篡奪的領導權呢？同志們，他是上山以後，馬上就把晁蓋架空了。怎麼架空的呢？……他把那些土豪劣紳，武將文吏請到梁山上，把重要的領導崗位統統佔領了。不然，他那麼容易得逞？晁蓋一死，第二天全部實現了。所以主席說，搞修正主義很容易。」江青在大寨還私下與其親信大談毛澤東評《水滸》就是批鄧小平，鄧小平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評《水滸》的談話就是防止鄧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早在8月下旬，江青就召集于會泳等人開會說：「主席對《水滸》的批示有現實意義。評論《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現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9月17日，江青召集「梁效」等寫作班子和電影、新聞界100多人講話，說：水滸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蓋，現在有沒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黨內有溫和派，有左派，左派領袖就是鄙人。」

在場的新聞記者把江青講話要點發回北京後，新華社副社長穆青向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負責人吳冷西做了匯報。吳冷西同胡喬木商討後，決定向鄧當面匯報。鄧小平對此反應十分強烈，指示：「這個講話要立即呈送毛澤東。」並且特別強調要想辦法用別的途徑盡快送上去。吳冷西和胡喬木於是找到能給經常接近毛的唐聞生，由唐在毛澤東接見外賓時交毛。9月21日，毛澤東會見英國前首相希思。唐聞生藉機把江青講話稿面呈毛澤東。

然而這一時期，鄧小平從來就不正面談論評《水滸》問題，也不公開講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話。江青在要求鄧小平在全黨播放她的講話錄音、印發她的講話稿，鄧小平便對她講，要請示主席。江青又去華國鋒那裡一再提要求，華國鋒也說，要請示主席。9月24日，鄧小平陪同毛澤東會見越南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筍後，向毛澤東匯報最近工作時，談到了江青在大寨會議上的講話及江青會後向他提出的要求。毛澤東聽後，氣憤地說：「放屁！文不對題。那是學農業，她搞批《水滸》。這個人不懂事，沒有多少人信她的」不久，華國鋒在一次向毛澤東請示匯報工作時，也向毛澤東談到了江青要求在全黨放她的講話錄音、印發講稿的問題。毛澤東指示：「稿子不要發，錄音不要放，講話不要印。」

江青這種做法恰好與毛澤東的想法背道而馳，毛澤東做出如此表示在情理之中。

到了9月下旬，形勢突然逆轉，毛澤東又開始對鄧小平不滿，以至於發展成「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政治運動，直到再次把鄧小平拉下馬。

五、生命的終結

1975年9月20日下午2時，在即將進入手術室前，周恩來讓工作人將他在幾年前所作關於「伍豪啟事」的講話記錄稿取來。躺在擔架車上的周恩來強撐病體，用他顫抖著的右手鄭重地簽上「周恩來」三個字，並註明「於進入手術室(前)」的字樣。當擔架車進入手術室時，躺在車上的周恩來又突然睜開雙眼，拼盡全身力氣大聲說道：「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10月24日，周恩來做了第五次大手術，這次手術之後，周恩來再也沒能從病床上下來。周恩來時日無多了。

12月20日，周恩來約羅青長談對台工作問題，詢問台灣近況及在台老朋友的情況，囑咐不要忘記對人民做過有益事情的人。其間，兩次被病痛折磨得說不出話來，並進入昏迷狀態。最終不得不中止談話。這是周恩來最後一次約中央部門負責人談話。

鄧穎超回憶：有一次，我們在一起交談，他對我說：「我肚子裡還裝著很多話沒有說。」我回答他：「我肚子裡也裝著很多話沒有說。」當時雙方都知道最後的訣別不久就會殘酷無情地出現在我們的面前，然而我們把沒有說的話終於埋藏在各自的心底裡，永遠地埋藏在心底了。周恩來能說什麼呢？因為此時伴隨著周恩來的是在臨終前的恐懼。

在文革初期周恩來曾經對陳伯達高調讚譽。周恩來在接見北京各院校七千餘名師生員工時講：「陳伯達同志是毛主席、林彪同志領導下的我們黨的最好的理論家。……陳伯達同志最善於發揮、善於闡明毛澤東思想……」周恩來在66年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對陳伯達更是不吝言辭：「陳伯達同志是我們黨最傑出的理論家，主席思想跟得很緊，把主席思想融會貫通，……。」但是在毛澤東決定整肅陳伯達後，由周恩來主持制定的《反黨分子陳伯達的罪行材料》分為四個部分：（1）「陳伯達的反動歷史」；（2）「投靠和追隨王明、劉少奇，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3）「對抗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黨亂軍，陰謀篡權」；（4）「投靠王明、劉少奇，招降納叛，搞獨立王國」。

這四部分內容是黨內政治整肅人的典型材料模式，周恩來作為中央專案組的總負責，對此是十分擅長的，也是十分瞭解是怎麼出爐的。周恩來知道，毛澤東發動《評水滸》的矛頭是對準自己的。階級鬥爭是無情的，一旦毛澤東把周恩來送入政治地獄，打翻在地，上述陳

伯達的名字完全可以換成周恩來。周恩來對毛的這套整人術非常的清楚和瞭解，周配合毛整肅他人也是這麼做的。周恩來長期助紂為虐的結果最終會演變為為虎作倀，這是歷史的必然。臨終前的周恩來就是被這種恐懼深深的籠罩。

當周恩來在接受喬冠華請求與大家合影留念時，說「我這是最後一次同你們合影。希望你們以後不要在我臉上打上叉叉。」此時的周恩來想到了什麼？那些被「打叉叉」的人真的都是「修正主義分子」、「叛徒」、「特務」和「現行反革命」嗎？彭德懷、劉少奇、林彪都該被「打叉叉」嗎？周恩來在手術前，大聲喊自己不是投降派，這又是怕的什麼？這只能說明周最怕的是身敗名裂。

周恩來還寄希望於鄧小平。據高振普回憶，在1975年8月份的一天，周恩親自向毛澤東寫信，提議由鄧小平代替自己擔任的國家和黨內的職務。高振普回憶說，周總理在信中雖沒有寫上要鄧小平同志任黨內「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但明眼人一看就知，是要把小平同志提拔到「二把手」一接班人的位置。周恩來的這封信寫好後交給了鄧穎超，由她轉交中央，並向鄧小平通報了信的內容。此時的鄧小平已經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並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恐懼的周恩來只能對毛澤東臣服到底。1976年元旦前夕，鄧穎超給周恩來帶來本剛出版的《詩刊》雜誌，其中發表了毛澤東十年前所寫的兩首詞《重上井岡山》和《烏兒問答》。在年後的頭兩天，周恩來在清醒的時候，幾次讓身邊工作人員把這兩首詞念給他聽。他除了悉心靜聽外，偶爾還說上一兩句話，當讀到「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時，甚至露出了笑容，還喃喃自語道：「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此時的周恩來或許還期望：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那樣的死心塌地的表忠會換來毛會出席他的葬禮。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去世。9日，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發出訃告，稱「周恩來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是中國人民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是中國人民的忠誠的革命戰士，是黨和國家久經考驗的卓越領導人」，周恩來終於保住了「晚節」，沒有被「打叉叉」。

六、餘波

周恩來的追悼會於1月15日舉行。此前，1月10日、11日是向遺體告別，12日、13日、14日是弔唁儀式。毛澤東沒有在任何場合露面，這使得那些熱愛周恩來的人十分失望。為此中共官方的黨史專家們費盡心機要想證明毛澤東沒有出席悼念周恩來的任何活動都是出於健康的原因，是因為「行動已經很困難，兩條腿不能走路」。然而事實的另一面卻尷尬地使他們的努力成為徒勞。

筆者承認周恩來去世的時候毛澤東已經病入膏肓，「無力行動」，毛的體力已經不允許他去參加周恩來的追悼會。但是，毛如果想要向世人表示對周的哀悼和惋惜、表示對周的看重，方法是多得很：毛可以發出讚揚周恩來的「最高指示」，讚揚的級別可以有不同的選擇，但是毛沒有這樣做；毛也可以指派江青或者毛遠新作為個人代表，在周的遺體告別儀式或追悼會上表示他個人的哀悼，毛也沒有這樣做（這樣做的另一個好處是還可以抬高江青或毛遠新，增加他們的政治資本）；毛還可以把鄧穎超叫到中南海自己的住處表示撫慰，毛還是沒有這樣做；毛甚至可以指示媒體渲染自己對周的無產階級感情和痛悼之意，毛不僅沒有這樣做，而且還不許別人這樣做。特別是關於在中南海放鞭炮一事，朱德的秘書說：據一個同志說，周總理逝世時，他在自己的住處看身邊的人放鞭炮，真是令人感到驚訝。

對於一個以外交著名於世的政治家，毛竟然決定「按照我國慣例和禮賓改革，決定不邀請外國政府、兄弟黨和友好人士派代表來華參加弔唁活動。」

毛不是不能做這些表示，毛是不肯做這些表示。

毛澤東對周恩來去世的冷漠態度不能不使那些擁毛又擁周的人感到萬分遺憾，置他們於尷尬之地。時至今日，仍然使那些千方百計粉飾毛、周關係的人辛苦徒勞。同時，毛的這種態度也使那些擁周而不滿毛的人產生出憤怒。

筆者則認為，毛這樣做是有意的。毛恰恰是要以這種方式表達對周的不滿，要以這種方式劃出自己和周的界線、表明自己和這個做了多年總管家的周恩來並不是親密戰友、並不志同道合。

然而，毛這樣做卻使那些對他不滿、對十年來的「文化大革命」不滿、尤其是對當時正在展開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不滿的人找到了發洩的渠道。他們盡自己一切力量來抬高周、悼念周，以各種手段來表達和宣洩自己的冤屈和義憤。甚而至於指桑罵槐，著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這些桑樹來痛罵。於是就有了「十里長街送總理」、1976年的「四五事件」、以至於粉碎「四人幫」，以至於造成了知道今天周恩來仍然是中國大陸甚至世界上部分群眾的道德楷模。

？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一章

周恩來在對毛的個人崇拜中的責任與特色

自延安整風以後，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日趨嚴重。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不僅有劉少奇、彭真、林彪等人，還有周恩來。相對於其他人，周恩來在大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上有很大的責任，也有他的特色。但因為他一向嚴格控制著不讓自己在宣傳上顯得突出，因此人們對他這方面的問題或是缺乏瞭解，或是未予重視。

一、周恩來在大搞個人崇拜中的首創性

在大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上，周恩來常常是走在別的領導人前面的。從1940年12月29日開始，周恩來就在許多份致中央的電報中，以「毛主席並中央書記處」開頭。

在稱呼上把「毛主席」放在「中央書記處」的前面加以突出。在筆者所見資料中，周恩來是最早這樣做的中共高級領導人。這種做法完全顛倒了個人和組織的關係，使個人凌駕於黨組織之上。一般人只知道林彪在六十年代對毛澤東的吹捧，卻不瞭解周恩來早在四十年代就開始這樣做了。

1943年4月22日，周恩來在《怎樣做一個好的領導者》中就說：「毛澤東同志的工作作風是：中華民族的謙遜實際；中國農民的樸素勤勉；知識分子的好學深思；革命軍人的機動沉著；布爾什維克的堅韌頑強。」 這年8月，周恩來回到延安後的首次公開講話，就最先提出「毛澤東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正確方向」，他說：「要爭取中國抗戰的勝利，還有沒有辦法呢？我們回答：有辦法！辦法就出在陝甘寧邊區！辦法就出在八路軍、新四軍和敵後抗日根據地！辦法就出在中國人民的身上！辦法就出在真正抗日的黨派和軍隊中間！

辦法就在中國共產黨，尤其是在我們的毛澤東同志手中！」

在說到中共三年來的成就時，周恩來說：「這一切成績，是怎樣得到的呢？是全黨依靠人民的力量得到的！是全黨團結在中央領導之下得到的！尤其有決定意義的，是全黨團結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之下得到的！」他強調：有了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和指示，在這三年來許多緊急時機、許多重要關鍵上，保證了我們黨絲毫沒有迷失了方向，沒有走錯了道路。沒有比這三年來事變的發展再明白的了。過去一切反對過、懷疑過毛澤東同志領導或其意見的人，現在徹頭徹尾地證明其為錯誤了。我們黨二十二年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串著整個黨的歷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

毛澤東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

毛澤東同志的路線，就是中國的布爾什維克的路線！

在隨後的中共「七大」上，周恩來進一步提出：中共能夠「鍛煉成為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也是一個很強大很有能力的共產黨」，「最主要的，我們還是依靠了我黨領袖毛澤東同志的英明領導。他指示了我們以新民主主義的方向，他教育了我們以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和學說，他領導了我們經過了中國革命三個歷史時期，創造了偉大的革命力量，經歷了無數次革命鬥爭，克服了無數次艱難困苦，達到了今天的初步勝利。」「讓我們團結起來，高舉起毛澤東同志的旗幟，勝利前進。」

在這次講話的最後，周恩來高呼：「毛澤東同志萬歲！」

周恩來這個講話中有關「毛澤東領導我們經過了中國革命三個歷史時期」的說法並不是事實，在篡改歷史方面也是走在其他人前面的。

1949年5月7日，周恩來在中華全國青年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做報告，主題之一就是「學習毛澤東」，這是最早公開號召全國學習毛澤東的記錄。周恩來聲稱：「我們必須有一個大家共同承認的領袖，這樣的領袖能夠帶著我們前進。三十年革命運動的實踐使中國人民有了自己的領袖，就是毛澤東。我們這次全國青年代表大會的口號也是『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前進』。我們決心舉著這面旗幟前進。」「毛主席的旗幟，就是我們最好的號召。」周恩來在講話中再次強調：「毛主席在中國革命的四個階段都是正確的，都是代表中國人民的正確方向……所以毛主席的方向就是中國人民正確的方向。他不斷的指出真理，堅持真理……在中國革命三十年的許多關鍵時刻，他的方向都是正確的。」

這是在中共還未執政、還在反對蔣介石「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獨裁政權之時就向全國青年介紹、宣傳並倡導學習自己這一個黨的領袖毛澤東的最早、最系統、最權威的講話。

1949年7月6日，周恩來再一次提出：「我們應當感謝毛澤東同志，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正確地應用到中國革命的實踐中來，因而造成了偉大力量，戰勝了中國革命的強大敵人。我們號召大家學習毛澤東同志，把革命理論和革命實踐結合起來。」

在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周恩來又對毛澤東進行了肉麻的吹捧：「中國幾十年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驗證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離開或者違背他的領導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發生錯誤，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錯誤足以證明這一點；反過來，作對了的時候或者作對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和思想是分不開的。因此，我們必須下苦功夫，認真地研究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學習他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光輝典範，學習他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學習他的思想和作風以及他所具有的偉大的共產主義的風格。」

我們可以對照一下林彪在中共七千人大會上的這段長期遭到詬病的講話：「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歷史，就是這麼一個歷史。」兩相對照，就可以看出，林彪講話的

這些意思，周恩來早已在四年前的講話中說過了。

不同的只是：

一、周恩來更極端，他說「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而林彪在那段話前面說的是：「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比較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的。」

二、周恩來用了貶損自己的說法（「我所犯的錯誤足以證明這一點」）來反襯毛澤東的偉大。而這正是周恩來與眾不同的一大特色。

三、周恩來的講話比林彪的講話更早，實際上對林彪及其他領導人後來的表態起到了引導、啟發、示範的作用。

就是在七千人大會上，周恩來也照樣講了與林彪相類似的話，他說：「『三面紅旗』，經過實踐的考驗，證明是正確的。從建設社會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來看，今後將會更加證明『三面紅旗』的正確和光輝。我們的缺點和錯誤雖然嚴重，但是，它是屬於執行中的具體政策和具體工作的問題，不是『三面紅旗』本身的問題。缺點和錯誤，恰恰是由於違反了總路線所確定的正確方針，違反了毛主席的許多寶貴的、合乎實際而又有遠見的意見才發生的。」

這個講話在官方編纂的《周恩來選集》中是沒有的。

我們再來看看人們所熟知的林彪講話：「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這是林彪在1966年提出的。然而早在1962年，周恩來就已經提出了類似的觀點。

1962年2月13日至3月2日，周恩來在廣東從化組織學習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周恩來在2月25日發言指出：毛澤東思想是對資本主義時代產生的馬克思主義和帝國主義時代產生的列寧主義的發展。在3月2日，周恩來對此問題還特意強調了毛澤東對馬列主義的創造性發展。周恩來說：馬列主義在斯大林後期停滯了，但在中國革命中找到了代表人物。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革命理論是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不同的革命鬥爭實踐中發展的，而毛澤東同志則是運用馬列主義指導中國革命實踐，在中國革命實踐中又發展了馬列主義。毛澤東同志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是有他的歷史條件的，有他的發展背景的。

根據最新的資料表明：周恩來早在1960年10月以前就已經說過：毛澤東思想是帝國主義走向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勝利的時代，創造性地全面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據《周恩來年譜》記載：1966年7月26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對林彪提出的「頂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等類言辭，我曾同毛主席談過，也同林彪交換過意見，用詞應當力求科學、準確、恰當。然而，周恩來在此前的1966年5月21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就曾宣稱：「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毛澤東思想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走向滅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走向勝利的這個偉大時代的頂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與列寧一樣是天才的領袖，是世界人民的領袖。」

同時，據王力的回憶可以推斷出，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公報是周恩來主持搞的。《公報》中就明確宣佈：「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同年9月26日，周恩來說：「林彪同志說的很對，毛主席是列寧以後的二十世紀最偉大天才。」到11月份，在周恩來的眼裡，毛澤東遠勝斯大林。周恩來說：「世界上只有列寧，毛主席這樣的天才。這樣的領袖不多見，斯大林問題不少，當然功大於過，三七開。」

周恩來在8月份的清華大學萬人大會上講：「毛澤東思想是從群眾中來的，偉大的天才毛主席把它集中起來，發揮起來，成為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此類語言，在周恩來的文革講話中不勝枚舉。

林彪號召全軍學習毛澤東的「老三篇」，提倡「帶著問題學，急用先學，活學活用，立竿見影」，而周恩來在1964年12月就曾把《毛主席的四篇哲學論文》送給工作人員，作為解決三門峽工程問題的工具。

過去在批判林彪時，曾批判林彪說過的這句話：「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都認為這個說法是林彪的發明，然而實際情況是：這句話最早出現在1966年《解放軍報》元旦社論稿中。當時值班的《解放軍報》副總編馮征回憶說：這樣的評價，不符合毛澤東思想。於是馮征親往林彪駐地蘇州打電話求證。結果卻被告知，「一句頂一萬句」是林講的，「句句是真理」是另一位領導講的。據筆者多方瞭解，這「另一位領導」就是周恩來。

在批判林彪時，還常常說他篡改歷史，比如把自己吹噓成南昌起義的領導人，把朱德與毛澤東在井岡山會師篡改成林彪與毛澤東在井岡山會師等等。其實，這些篡改歷史的做法，都不是林彪自己所為，而究其根源，卻能發現周恩來在其中的獨特作用。

比如，在對南昌起義的歷史闡述上：

1957年，周恩來在審定《八一起義》展覽提綱時，提綱有一段話的原文是：黨為了挽救革命的失敗，決定由周恩來同志在南昌舉行起義。周恩來在「舉行起義」前加上了：「以賀龍同志率領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葉挺同志率領的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和朱德同志率領的國民革命軍第九軍一部分為基礎。」提綱中還有一段話原文為：「七月二十日晚……周恩來……等同志率領了北伐軍三萬餘人，在南昌舉行了武裝起義。」周恩來在他的名字後面加上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人的名字。

為「反冒進」作檢討之後，1959年，江西省話劇團進京會演《八·一風暴》，周恩來指示：聽說戲裡寫了我，不要寫我，要寫毛主席。是毛澤東思想指導了八一起義。

1964年，周恩來在指導大歌舞《東方紅》時，為了突出秋收起義的氣質，指出「南昌起義部隊」的旗幟可以不要，改用「中國工農紅軍」。

到了文革中，周恩來的說法有了更大的變化。當年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負責人之一的戴維堤，在寫成於2004年的長篇回憶錄《逝者如斯》中記敘了這樣一件事：1967年9月9日，北京市工代會、農代會、紅代會組織一些人在北京工人體育館開大會，紀念毛主席領導的秋收起義40週年，大會組織者安排的發言者在歌頌了毛主席領導的「秋收起義」的偉大意義之後說，是偉大領袖領導的秋收起義打響了對國民黨的第一槍，不是「八·一」南昌起義打響的第一槍。「八·一」南昌起義是大軍閥賀龍他們領導的，最後以失敗告終。這次起義不是工農武裝起義，而是資產階級舊軍隊的一次兵變，所以「八·一」不能作為中國工農紅軍的建軍日，必須徹底砸爛。我們強烈要求中央廢除「八·一」建軍節，把「秋收起義」紀念日9月9日定為建軍節。甚至有人呼起了「砸爛八·一」的口號……

在混亂中，應邀出席大會的周恩來講了話。按戴維堤的說法：「這是我知道的總理最違心的一次講話」。

周恩來說的是：「同志們，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你們熱愛毛主席，熱愛江青同志，這是完全正確的。我完全理解你們的心情，但是，我要告訴大家，我周恩來熱愛毛主席的心情不比你們差。我要告訴你們，『八·一』南昌起義，不是我周恩來領導的，是林副主席領導的，我周恩來不過是參加了而已。『八·一』建軍節是毛主席確定的，不能砸！砸『八·一』是不對的！我周恩來一生犯了许多錯誤，但我是擁護毛主席的，擁護林副主席的。不信請同志們看一下，我周恩來的心是紅的。」

戴維堤回憶：「說到這裡，周總理突然用手撕開了襯衣，露出了胸膛。」

至於說將「朱、毛井岡山會師」篡改為「毛、林井岡山會師」，這也並非林彪所為，而恰恰是周恩來在文革早期以及中共「九大」期間說過這樣的話。1966年12月19日，

周恩來接見江西省聯合赴京控告團全體代表時指出：「『八?一』南昌起義，人數開始很少，但是由於領導，其中我就是一個，沒有負到責任，在領導戰爭中犯了錯誤，沒有能在江西站住腳，到廣東去，到海口就失敗了。就在那個時候，朱德同志、陳毅同志、林彪同志等人留在一起，會師到江西，跟著毛主席秋收起義的部隊，會師在井岡山，由毛主席高舉這個革命的火炬，今天成了強大的人民解放軍武裝力量。」這是毛、林井岡山會師說的源頭。

在1969年4月14日的「九大」全體大會上，周恩來發表以歌頌林彪為中心內容的發言時宣稱：「林彪同志成為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經開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義失敗後率領一部分起義部隊走上井岡山，接受毛主席領導的一位光榮代表。」

後來，「九一三」事件發生了，林彪變成了「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1972年5月21日，周恩來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系統批判林彪的發言中又說，「上井岡山，他僅僅是一個營長吧？（朱德同志：連長。）還是連長。那怎麼能把朱、毛會師說成了毛主席跟林彪會師呢？這是歪曲歷史嘛。」周恩來這是在批判誰呢？是誰歪曲了歷史？

二、周恩來搞個人崇拜注重娛樂性與藝術性

在大搞個人崇拜中，林彪以他那種軍人作風直來直去要求「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老三篇不但戰士要學，幹部也要學……」。與這種方式不同，周恩來搞個人崇拜，更注重大眾喜聞樂見的娛樂性和潛移默化的藝術性。在這方面，最具代表性，也最為人們熟知的，是他親任「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總導演和經常在公眾場合指揮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自「大躍進」失敗之後，越來越多的人不再相信毛澤東是「一貫正確」的。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崇毛的講話，是對高級幹部講的，一般民眾並不知道。而周恩來則在重振民眾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方面發揮了獨特的作用。周恩來此時選擇被冠名為「大型音樂舞蹈史詩」的大型歌舞演出《東方紅》來讚美毛澤東，是把握住了歷史機會，也摸準了毛澤東當時的脈搏。

周恩來作為大型歌舞劇《東方紅》的總策劃和總導演，堪稱嘔心瀝血，在如何編排上費盡心思。為了突出毛澤東，周恩來特意大大淡化了八?一南昌起義，認為有秋收起義就行了（此舉直接影響到文革中一些紅衛兵、造反派提出否定八?一南昌起義和改建軍節為秋收起義紀念日），把中國革命的歷史功績歸為毛澤東一個人。周恩來在1964年7月18日的國務院各部黨組書記會議上講：「從黨的誕生起，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後來的『五四』運動，到大革命，然後又到井岡山，舉起了紅旗，都貫穿著毛澤東的思想，通過這個表演逐步地體現出來……」

周恩來親自給參加《東方紅》演出的人員做了7個小時的黨史報告，講述毛澤東怎樣領導黨和人民從勝利走向勝利。周恩來要求演員「要把我們熱愛毛主席的心情充分表達出來。」有人質疑「黨的誕生」部分升掛毛澤東的像不合適，因為毛那時還沒有擔任黨的領袖。周恩來則回答說：「從黨一誕生，就存在著兩條對立的路線。真正能代表黨的，是毛主席的正確路線，這才是歷史的真實。」

周恩來特意在首枚原子彈爆炸成功的當天安排毛澤東接見三千名大型歌舞劇《東方紅》的演出人員並會演。當天夜裡，周恩來提出要把《東方紅》拍成電影，並繼續親自領導。徐肖冰回憶：周恩來指示，在拍攝電影時：「你們一定要拍好毛主席的光輝形象，尤其要突出反映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人民的領袖這一點。」

為了把《東方紅》電影拍好，周恩來特意要求外貿部從倫敦購買質量好的膠片，當時的外匯還是比較缺乏的。楊明偉先生對此評價道：「這一表態，令從事電影《東方紅》工作的編導人員欣喜若狂，他們知道，國家經濟情況雖然好轉，但是對於進口電影膠片來說，並不

是件容易的事。國家總理作這樣的表態，表示中央對《東方紅》的拍攝工作非常之重視。」在周恩來的全力督促下，1965年國慶節，大型電影藝術性紀錄片《東方紅》轟轟烈烈地走進了人們的生活。

大型歌舞劇《東方紅》是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特別是對當時的青少年有非常深遠的影響，文革中各地紅衛兵編演的大歌舞無不打著深深的《東方紅》烙印。「祝福毛主席萬壽無疆」也是在大歌舞《東方紅》中最早由一曲《讚歌》唱出來的。到文革中發展成為「三忠於、四無限」活動的日常用語。

為配合當時毛澤東向世界輸出革命的決策，《東方紅》火熱上演的同時，其第二部也在策劃中。主題定的是支持世界革命和全世界人民大團結，內容計劃描寫建國之後的建設和生產。一些作品像《工人之歌》、《椰林怒火》、《剛果河在怒吼》已創作完成。越南人民共和國主席胡志明訪華時，就看了《椰林怒火》的演出。但是後來因為形勢變化，不得不中途叫停。

究其本質，大型歌舞劇《東方紅》就是一個充滿個人崇拜並經藝術謊言刻意包裝的向毛澤東表示忠心的產物。中國的文藝本來就是神化領袖的造神文藝，而周恩來更是把這一點推向了極致。

在文革中，在廣大群眾之間造成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絕非林彪一人之功。在文革前期，人們最為熟悉的是在眾多的群眾集會上，都由周恩來親自揮臂指揮群眾齊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特別是隨著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記錄片的上映，周恩來揮舞雙臂指揮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形象也在群眾中深入人心。而這首歌本來是一首非常普通的歌，歌名原為《干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1964年6月，周恩來陪同朝鮮來賓在哈爾濱訪問時，作曲者王雙印演唱了此曲。周恩來聽後，給予了熱情鼓勵，並幫助修改詞曲，然後正式推向全國。

當年有關周恩來指揮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回憶，曾經充斥了紀念周恩來的文集。在一篇回憶中稱：1964年，周恩來出訪回國返回昆明，總是從外國朋友臨別贈送的西瓜、芒果中挑選最大最好的送給偉大領袖毛主席。同工作人員在一起聯歡的時候，總理常常站起來，親自提議，親自指揮大家齊唱歌頌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歌曲《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他那宏亮的聲音，充滿了對毛主席的無限深情，激勵著大家緊跟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奮勇前進。

據另一回憶：有一次，我們跟隨周總理到一所大學，當他健步登上主席台時，全場響起一陣陣的歡呼聲，革命師生高呼：「向周總理致敬！」周總理立即用洪亮的聲音對大家說：「同志們，首先讓我們一起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來指揮。」他帶頭起歌，揮動著手臂，有力地打著拍子，和全場一起高唱。

還有回憶稱：周恩來抱起一個幼兒園的兒童親了親，問孩子們會不會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孩子們雀躍著回答會唱。周恩來就打起拍子，親自指揮他們唱起歌來。還有回憶稱：出訪歸來飛越國界的時候，周恩來提議唱《東方紅》：「毛主席很偉大，要熱愛我們毛主席。」周恩來對機組人員講：「你們飛行要靠毛澤東思想導航，全國各行各業都要靠毛澤東思想指引，我們個人要靠毛澤東思想哺育成長。」

總之，還在文革之前，周恩來就不斷借藝術性的音樂、舞蹈、歌曲，向毛澤東表達了非凡的忠心。它們在大搞對毛澤東個人崇拜上所起到的作用，並不亞於後來被稱為「紅寶書」的《毛主席語錄》。

周恩來對於其他的歌頌毛的歌舞演出也是下大工夫給以關注和指點的。廣東省歌舞團人員追憶，周恩來在觀看《毛澤東同志主辦農民運動講習所頌歌》時指出：第六段中的「紅太陽照亮了粵海」，這樣說「太小了太輕了」，「何止照亮了粵海，大概你們從廣東出發吧？這樣就太小、太輕了。」

三、在崇毛的同時貶損自己

在大搞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行為中，周恩來與其他領導人不同而顯得十分突出的一個特色，就是在崇毛的同時貶損自己。

1958年伊始，因為「反冒進」問題，周恩來從1月份的南寧會議到3月份的成都會議，從「離右派50米」到「是否馬克思主義者」，一路檢討不斷。周恩來對檢討稿逐字逐句地親自修改後才打印出來，送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傳閱。時任總理辦公室主任的童小鵬回憶說：「後來，這個檢討稿打印出來發政治局和書記處徵求意見。鄧小平看後就說，寫這麼多幹嘛，把『離右派差50米遠』等刺激字眼劃去，有些話的份量也改得輕了。可見鄧小平對毛澤東的批評，是有不同看法的。」

周恩來在檢討中批判自己：「『反冒進』的錯誤，集中地反映在我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八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間。當時我對於一九五六年的建設成績和在躍進中出現的某些缺點和困難，作了錯誤的估計，把實際上不到一個指頭的缺點誇大化，肯定一九五六的年度計劃『冒』了，並且提出一九五七年適當收縮規模的意見。」他還說：對於毛澤東批評的反冒進是關於社會主義建設規模和速度問題上方針性的錯誤，「在相當時間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就在這裡」。

1958年4月25日，周恩來視察河南偃師，當一位社員高呼「周總理萬歲」時，周恩來立即制止：「我們敬愛的毛主席是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只能喊毛主席萬歲，我是主席領導下的工作人員。」

在指導排演《東方紅》歌舞的時候，有人問長征時候周是否直接參加指揮了戰鬥。周恩來回答：「我只是在毛主席領導下，做一些具體工作，勝利全靠毛主席的英明指揮。」

更為出格的是，周恩來為了突出毛，竟然把自己貶稱為「娃娃」。1973年6月，周恩來陪同外賓重訪延安。在毛澤東舊居前，周恩來告訴外賓：「我那時還是個娃娃！」

周恩來貶損自己，不僅是在語言、文字上，還經常表現在行動上。

毛澤東的保健醫生李志綏對周恩來有這麼一段描述：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毛第七次接見紅衛兵，因人數有一百五十多萬，已不可能在天安門廣場檢閱。周恩來提出，讓紅衛兵分別排在天安門前東西貫北京的長安大街，和向北郊去的二環路上。毛則乘敞篷吉普車巡行檢閱。為了說明行車路線，周恩來帶了一張北京市大地圖來到人民大會堂一一八廳，將地圖在地毯上攤開，跪在地圖前，為毛指點方向。毛站在地圖旁，一面吸紙煙，一面聽著周的解說。我站在旁邊，心裡很不是滋味。以堂堂一國的總理，怎麼能舉止像個奴僕一樣呢？毛的態度帶著一些嘲諷，似乎在享受著這一切。

文革中著名的首都紅衛兵「五大領袖」之首聶元梓，在晚年接受訪談時也講到周恩來的這類做法，她說：「毛澤東從沙發上起來，他趕緊去攙扶。有這個必要嗎？不是有下面的人嗎？你超過了你的身份了嘛。毛澤東看什麼圖，周恩來跪在地上給毛澤東講解。說明他還有奴才的本質。」

萬潤南回憶到：（毛澤東在「八一八」接見紅衛兵時）毛的步伐慢而緩，林的步伐急而促。後來我在記錄片裡更印證了如下的細節：林彪一不小心就要超越毛了，這時候周恩來伸出手，扯住林彪軍裝的後擺，很用力，因為從後領到下擺都扯直了，林幾乎是一個踉蹌。待毛走出了一步，周才鬆手，其後林彪一直自覺地保持著這一步之遙。更讓人歎為觀止的還在後頭，這時候周停住了腳步。周不動，後面沒有人敢超越他。等到毛、林走出了七、八步，周才帶著大隊人馬緩緩跟上。

在文革結束後紀念周恩來的文集中，也常能看到人們出於對周恩來的崇敬而寫下的這類回憶：周恩來去毛澤東處匯報工作，要提前在大門口下車。毛澤東請周坐沙發，周卻搬

過凳子，恭敬的坐在毛的身邊。毛澤東上天安門，周恩來每次都要提前檢查毛用的桌椅，等候毛。毛澤東一出現，周恩來立馬上前迎接。有人這麼形容：「周總理始終緊挨在主席身邊半側著身子；舉起一隻手臂，像是為毛主席開路，又像是準備隨時去攙扶……」

與此相對應的是，每次毛上天安門，周恩來都要親自先乘坐電梯檢查，然後自己不做電梯上城樓，而是從旁邊的台階步行登上城樓。隨後周恩來會站在電梯門前迎接毛澤東。

周恩來的這類動作，林彪及其他領導人都做不出來。

四、結束語

1958年以後，劉少奇、周恩來、林彪等一千中共黨內要員都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做出了巨大貢獻。現在，林彪早已被批倒批臭，劉少奇在這方面的作用也有所論及，唯有周恩來還被描繪成是一直在對個人崇拜風氣進行批評、抵制、糾正。但是透過對歷史的審視，周恩來在製造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方面是不亞於劉、林等人的。

第二部分 第二章

周與中央文革小組以及江青的關係

中央文革小組的前身是「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其成員名單是在周恩來參加、鄧小平主持的，在1966年4月9日至12日召開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草擬的，後報毛澤東批准。

但是中央文革小組成立伊始，並沒有人給以太多重視，且在中央文革小組許多成員觀念中，它就是政治局常委的參謀秘書班子，甚至是歸劉少奇、鄧小平領導。但是後來經過毛澤東和江青的諸多運作，中央文革小組最終成為「文化大革命」的指揮機構和其成員成為「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主要成員以及人所共知的中央首長（中央文革小組主要骨幹力量）。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這個歷史的變遷中，周恩來的作用始終被官方漠視甚至不承認。周恩來和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組以在文革前期、中期基本上是同盟關係，雖然也有分歧，但是這種分歧卻被官方演繹成是純粹的「鬥爭」關係，並進而把這種所謂的「鬥爭」誇大為長期持久、你死我活的路線鬥爭。這種看法顯然不是歷史的真實。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和江青的關係更是錯綜複雜，絕不能簡單地「概念化」。

一、中央文革小組、中央文革碰頭會

1. 周恩來與中央文革小組的成立

中央文革小組的前身，是「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據中發〔66〕267號文件（即「五一六通知」）附件二「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簡稱《大事記》）記載：「四月九日至十二日鄧小平同志主持書記處會議，周恩來同志參加。」在此會議上，周恩來、鄧小平、康生嚴厲的批評了彭真。同時這個會議決定：「（一）起草一個通知，徹底批判『五人小組匯報提綱』的錯誤，並撤銷這個提綱。（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報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根據《周恩來年譜》的記載，此次書記處會議還決定，成立以由陳伯達為首的起草小組為中央起草關於文化革命的指示。

作為文件起草小組的一位成員之一的穆欣回憶：「經中央審定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

名單是：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劉志堅，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吳冷西、陳亞丁、尹達、張春橋。」

另根據《大事記》記載：「四月十六日毛主席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彭真同志的錯誤，撤銷所謂《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匯報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等問題。」

5月16日，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通知》宣佈：「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以上文字，為毛澤東親自所加。

而周恩來對於上述會議都是參加了的。文革發動的前期準備工作，整個中共中央包括周恩來、鄧小平都是參與了的。

文革小組成員名單由中共中央在5月28日正式公佈，明確此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領導下。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講：「我們整個中央文革小組就是中央常委的一個秘書班子。也還是哨兵工作、參謀工作，就是提出意見，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中央常委參考。所作的工作就是這麼一點。」實際上的中央文革小組絕對不是江青這麼謙虛、低調的說法。

1966年7月9日，風塵僕僕回到國內的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舉辦宴會，慶祝「亞非作家緊急會議」閉幕。劉少奇等一千中央要員在宴會前會見了參加會議的各國代表。宴會開始前，周恩來特意打電話給穆欣：要陳伯達參加會見，並叫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出席宴會，新華社將趁此機會公開報道中央文革小組成立的事。周恩來不僅費盡心機創造機會把中央文革小組這個牌子打出去，還順從毛澤東的旨意在樹立中央文革小組的「權威」上不遺餘力。

毛澤東在7月24號發話：「中央好多部，沒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組卻做了不少好事，名聲很大。」繼而在緊接著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進一步稱讚道：前一時期正確的是中央文革，而不是中央。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列席會議並在同期舉行的批劉（少奇）、鄧（小平）政治局生活會上充當了主力軍。在此大背景之下，周恩來是心領神會，亦步亦趨。周恩來在1966年9月19日接見科學院文革代表和院黨委等人時就指出：「部的名稱太大，過去文化部那麼大，幹了不少壞事，今天中央文革小組，是一個小組，倒做了不少好事，很受群眾歡迎。」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由周恩來親自審定的關於此次接見的新華社電訊稿刊登於次日的《人民日報》。通訊中說：「有1500名學生代表登上天安門城樓，同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參加大會。毛主席和林彪、周恩來、江青等同志分批地接見了他們，同他們談了話，並且在一起照了相。」「慶祝大會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同志主持。他在致開會詞時說：『我們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在這裡同大家見面。……』」在此新華社電訊中，江青被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就如歷史已經證明的那般，江青高於其他政治局常委的地位呼之欲出。陳伯達也被單獨點出，對於這個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給以了非凡的待遇。對於周恩來插手此類排名事件，並不是只有這麼一次。王力回憶到：1967年的5月1日，周恩來把已經印好的《人民日報》停發，把原本排名排在中央委員名單之後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名單提到中央委員名單之前。

2. 中央文革碰頭會的由來

中央文革小組成立之後，形如一盤散沙，內部也是矛盾重重。曾經是中央文革小組一員

的穆欣稱之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內部充滿錯綜複雜的爭鬥，作為一個共產黨的組織，它是我所見到過的最無政府、最無章法的地方。甚至中央文革小組每天幹什麼(比如開什麼會，通知什麼人參加，接見什麼組織等)，都是臨時決定，辦公室必須在限定時間內安排停當，工作人員整天忙得團團轉。而更為致命的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之間芥蒂矛盾非常大。

江青曾經挖苦道：「中央文革小組的會議很難進行，只要康老（筆者註：康生）和陳伯達見面，兩個人就吵。陳伯達連（周）總理的話都不聽，儘管我告訴他你要聽（周總理的話）。周總理做康生的工作，我就做陳伯達的工作，最後會議總算可以舉行了。但是時間沒過多久，兩個人又吵起來了！」毛澤東也抱怨：（同一個事情）康生講他的，陳伯達告訴的卻是另一個，江青也有自己的版本。而且連報告都沒有。

陳伯達曾這樣回憶：在毛主席第一次檢閱紅衛兵不久，我生病進醫院，江青就當然代理組長職務。毛主席再次檢閱紅衛兵時，江青致辭，從此，她就在小組中橫行跋扈。我向去醫院看我的人，提出一些看法，於是大大觸怒江青了。當我的病沒有好時，江青要關鋒去叫我出院。我已曉得這個女人很難對付，決定出院。我撇開江青，找王力、關鋒、戚本禹起草一個擬送中央的文件，確定中央文革小組是中央政治局直接領導的工作機構。意思就是：中央文革的言行都要向中央請示，不能擅自作主。這就要使江青受到約束。會議未完，可能有人洩露給江青，江青來了，大鬧一番。我現在不記得她要加了一句什麼，但她說，「我這句是最重要的。」從此以後，文革小組就沒有再單獨開會了。毛主席指示：以後開會，由周總理主持，叫中央文革碰頭會。根據陳伯達所述筆者推斷周恩來是在1966年9月中旬期間。（筆者註：陳伯達所稱的中央文革碰頭會實際為中央文革小組會議。）

很明顯，在某種程度上中央文革小組實在是「扶不起來的阿斗」。周恩來從8月20號左右就開始主持中央碰頭會（《周恩來年譜》亦稱之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由此可見，周恩來主持中央文革小組會議完全是因為形勢發展所致。陶鑄在未倒台以前也經常參加中央文革小組會議，而張春橋、姚文元、王力等人在1967年初也參加中央碰頭會。自1967年2月19日起，中央文革碰頭會取代了原來的中央文革小組會議和中央碰頭會。前後參加過中央文革碰頭會的成員主要是原中央文革小組會議成員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汪東興、謝富治。1967年2—3月間毛澤東同意葉群、肖華、楊成武列席與會。隨著文革深入，黃永勝、吳法憲亦與會，其間成員也不斷遭到清洗。無論是早期的中央碰頭會還是後來的中央文革碰頭會都是由周恩來負責召集並主持會議，並決定會議議程。

二、周恩來與中央文革小組的關係

1. 周與中央文革小組的衝突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周恩來在理解和執行毛澤東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決策上，無疑是比江青等人更勝一籌。因為周恩來還可以用親身經歷作為他人的「樣板」。

文革初期，周恩來扮演了一個非常微妙的角色。一方面，周恩來要執行毛澤東的「抓革命，促生產」的號召，這也是國務院總理角色的職能；另一方面，周恩來為了不被打倒，這也是他在整個文革中所要達到的目標，無論是「下地獄」還是「跪在地上裝孫子」都是為了這個目標。所以，周恩來要做一個響噹噹的文革派，以至於在某些方面做得比中央文革小組還要左。這樣，在這兩個方面無疑都會受到中央文革小組的指責。

而且正如文革初期，陳毅所評論：「說什麼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和舊政權的矛盾，說到底，『文革』第一要打倒劉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來。」在這種局勢下，周恩來自然會遇到所謂的「黑槍」、「暗炮」。需要指出的是，周恩來受到中央文革小組的攻擊，出於多方面的原因。既有因為毛澤東的決策導向引誘而成，也有各自利益衝突，自然還有權力之爭。決

策導向，自然部分也是起因於毛澤東的在他的大字報中不點名的批評了周恩來。但是，這並不代表著基本決策有什麼變化。各自的利益衝突，權力之爭，在周恩來身上卻被演繹成根據「遵循黨的原則、為人民的利益辦事」，在其他他人身上則成了「禍國殃民」、「篡奪權力」。這是違背歷史基本事實的。

除了支持發動文革之外，周恩來還要執行國務院總理的職能，執行毛澤東保人的政策，這和中央文革小組有很大的不同。雖然中央文革小組也保人，但是因為具體的分工不同，衝突自然難免。因此就有了周恩來「調和」、「和事佬」等的說法。在1966年10月31日，姚文元在紀念魯迅30週年的講話和11月1日的紅旗社論都不點名的批評了周恩來，評之為「騎牆派」，謂之「那些標榜走中間道路的人，必然滑到修正主義的泥坑」。這是中央文革小組和周恩來在1966年中最大的衝突。原因有二，一是周恩來在參與了一些文件政策的制定，而這些文件並不一定全部符合中央文革小組的意；二是針對於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各級領導對於文革仍然「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的中央工作會議的召開。對此，周恩來為了保護自己，在11月起草關於公交系統和農村文革的文件制定中基本上不再參與，而是由陶鑄出面搞。事後，陶鑄完全成了周恩來的「擋箭牌」，在陶鑄落難的整個過程中，周恩來沒有施加援手。反而是康生還提醒陶鑄，進行路線交底。

周恩來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外交部大抓「牛鬼蛇神」，其中含有三名副部級幹部王炳南、陳家康、孟用潛，若干司處級幹部以及大批一般幹部與工人，也分別被打成「牛鬼蛇神」、「小三家村」等，並發生了抄「牛鬼蛇神」們的家的事情。周恩來還在9月份簽署了關於國務院系統如何進行文革的《紀要》，該《紀要》提出要把司局級以上所有幹部都放到火裡「燒一燒」。此事後來被張春橋告狀，說周恩來對此文件評價很好，並以此威脅周恩來多次檢討。張春橋批評周恩來說：打倒所有幹部其實是周恩來搞的。此事完全表明，雖然在支持文革的大方向上，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是毛澤東所倚重的兩駕馬車，但是在某些方面，周恩來比中央文革更甚。或許出於爭寵，也可能是爭奪運動的主導權（在1972年12月發生的批極左就是對話語權的爭奪），二者發生衝突是可以預見的。

2. 周同中央文革小組關係的另一面

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的關係，並不是水火不容，更不是《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所云「同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而是毛澤東手下兩大剛柔並濟的政治利器。雖然在毛澤東的初始打算中，周恩來也是要被清算的目標之一，但是在沒有徹底打倒和解決劉少奇的情況下，作為發動文革的最大的借用力量就是周恩來，周恩來仍然具備巨大的利用價值。徐向前回憶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來積極響應和支持毛澤東發動文革。對於那些持有懷疑或者不積極的很多高級幹部，周恩來用自己的親身經歷來勸說和幫助他們加深理解「文化大革命」的意義、性質、對象和任務。最後徐向前指出，沒有周恩來對毛澤東的「忠心耿耿」，文革是不可能搞起來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並沒有得到預期的想像中的「一呼百應」，很多例如李井泉等高級幹部在一開始就對於毛澤東的「發動文革」很是不理解。個中緣由恐怕是「高崗事件」恍如昨天之事，歷史教訓不可不吸取，劉少奇經營黨務多年，樹大根深，難保不再翻天。還有諸如陳毅之類一開始是舉雙手雙腳贊同文革並在自己權力範圍之內大搞迫害大揪「牛鬼蛇神」，但是當揪到自己頭上就不「理解」的高級幹部。此二類高級幹部都需要周恩來，這種「屢犯錯，屢檢討，保持晚節，終生都要做毛的奴僕」的人，作為活生生的「典範」來說服眾人。俗話說「殺雞給猴看」，周恩來是自己把自己變成了那只「雞」之外，還要「鳴幾聲」來告訴眾人，「你們不跟著毛主席走，就是自絕於黨，自絕於毛主席。」

在本質上，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都是執行毛澤東的文革決策的主力軍。也正是如此，

也就決定了就整體而言，特別是文革初期，周恩來與中央文革小組的關係基本是十分融洽的。

雖然江青倚仗「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對周恩來時有不敬，但是江青對於周恩來並不是後來官方一直認定和宣傳的：江青對周恩來是使盡奸計、迫害和炮打。兩者的關係可以用周恩來和江青自己的言論作為註腳。江青在接見北航「紅旗」，清華「井岡山，地質「東方紅」代表時指出：「反我們的總理……就是指向中央。」周恩來坦言：「有人想動搖中央，挑撥我和中央文革的關係，這是不會得逞的！我和中央文革是在一起辦公的，今晚我們又在一起。」

對於中央文革小組，周恩來曾經這樣評價到：「我們中央文革是無產階級司令部重要組成部分，成份上來說是主要的組成部分，在這個鬥爭中，不論從維護、堅持、發揮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方面說來，不論是說批判、揭露、打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方面說來，我們都應該承認中央文革在我們無產階級司令部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有她的豐功偉績。」同時，周恩來也同時號召廣大軍民要永遠忠於中央文革！

通過大量的實例，周恩來對於江青可以說是畢恭畢敬。（詳見下文）。很大程度上周恩來同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組的關係實質上周與毛的關係。以致周恩來多次說過中央文革（小組）決定的事，我們去執行。對於周恩來如何支持中央文革小組的工作，吳法憲對此有過生動的回憶。1966年10月中央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重點批判劉少奇的錯誤路線。但是由於與會的各地幹部對所謂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所以對於批判劉少奇並不積極，會議開了許多天卻效果不彰。經文革小組提議，周恩來親自給吳法憲下令，由空軍派出專機，將各地的造反派頭頭們接來北京，一起參加討伐劉少奇的大會。這些造反派頭頭一到北京，就展開了聲勢浩大的批劉鬥爭。吳法憲回憶說「我們東北組來的是貴州造反派頭頭，此人一到北京就由中央辦公廳派專車接到京西賓館，神氣十足。他來了以後，周恩來親自到東北組來參加會議，以示重視。他滔滔不絕地一直講了三個鐘頭，專門揭發當時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周林等人是如何破壞『文化大革命』，如何鎮壓學生運動和逮捕紅衛兵的情況。我看到，在這個講話過程中，周恩來一直在頻頻點頭，讚揚他的揭發。」造反派的與會終於在會上掀起了批劉高潮。可見，經過周恩來的智慧，中央文革小組的一些提議和決定會得到更完美的發揮和更理想的結果。

1966年年底，同中央文革支持的「工總司」的對立組織「赤衛隊」在康平路被血洗。被擊潰的「赤衛隊」要乘火車到北京告狀。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抓捕「赤衛隊」頭頭不准上訪。在支持地方造反派組織上周恩來同中央文革並無二致。

江青對周恩來也並不都是飛揚跋扈，相反，江青有時對周恩來非常尊重。官方為了樹立周恩來的偉大形象，對於此點非常忌諱，一概不提。而在穆欣、王力等當事人的回憶中都對此加以證實，而且連中央文革小組的日程都是由周恩來安排。林傑的太太王乃英曾經「交代」：江青經常等周恩來拿主意，雖然中央文革小組的其他人有時候不同意這種做法。林傑抱怨說，江青總是讓我們按照周總理的命令去執行，事情總是變的越發困難。在1967年夏天，造反派圍困中南海。戚本禹建議周恩來安全起見搬到釣魚台。對所有的這些支持和關心，周恩來自然也報之以桃李。不僅對江青，連對張春橋都說：你們是管戰略的，你們定了，我給你們辦。

周恩來在1967年1月份如此評價中央文革小組：「中央文革小組是毛主席最好的參謀部，軍委是司令部，我們國務院是執行機構（陳伯達同志插話：中央文革不是參謀部，只是個工作機構），我們要以上海為起點作個榜樣：鐵道學院已經決定到鐵路沿線去宣傳了，別的院校也可以考慮大搞宣傳。」「對中央文革小組我是堅決支持的」。因為文革小組的工作實際上周恩來主持的，這個支持也是針對周自己的。

1968年中央擬定的慶祝國慶口號中有一條：向立下豐功偉績的中央文革致敬！「九大」召開之前，1969年3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迅速掀起春耕生產新高潮

的通知》。在此中發通知中，排名為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排在國務院之前。 這個排名絕對不是一時心血來潮，周恩來在「九大」來臨之際對於中央文革小組的一個獻禮。1969年中央文革卻在新形勢下改頭換面，在它解散的前夕，林彪和周恩來都讚揚它「堅決地執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三、周恩來和江青的關係

1. 江青的陞遷

江青在1967年4月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講：「進城的初期，總理給我安排過幾次工作，接觸了一些事情。」

1956年由周恩來提議，中央政治局常委任命江青為毛澤東的五大秘書之一（副部級）。江青從文藝戰線打開走向政治舞台的通道，就是周恩來在1964年主持的京劇座談會。江青在此次會議上的講話在1967年5月8日出版的《紅旗》和5月10日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同時發表。在文革初期，由周恩來提議，林彪、周恩來共同簽署，將江青的行政級別從九級提到五級。 周恩來在中共「九大」籌備期間，曾提名江青為政治局委員，而在此之前，江青連中共中央候補委員都不是。在中共「十大」籌備期間又曾建議江青為政治局常委。

實際上，建國以後的高層對於江青的態度可以說是表現其本人政治態度的一個潛規則。作為一個老紅軍，徐業夫從50年代起就在毛澤東身邊擔任機要工作，曾經因議論江青而被調離過職位。 周恩來對於江青的堅定支持是其不被打倒的重要一點原因。特別是文革初期，江青進入「文化大革命」最高領導層，是毛澤東為了保證「文化大革命」政治路線得以貫徹的重要保證。而在此過程中，周恩來所做的工作無疑要比任何人都多，自然也比林彪多得多。這自然也是周恩來「緊跟」毛主席的結果。

陳伯達在1966年8月因病住院，主動提議由第一副組長江青代理組長。 筆者認為這本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但是中共中央卻為此專門發出通知：陳伯達同志因病經中央批准休息。在陳伯達同志病假期間或今後離京外出工作期間，他所擔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由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代理。 根據當時的組織程序，此類通知是由周恩來主持的中央碰頭會草擬出來並報毛澤東批准。此事是周恩來主動為之還是得到毛澤東事先提示尚無可信證據。但是無論如何，現在看來，這並不是多次一舉，而是具有深刻重大的政治意義。首先，對於江青在全國樹立起其為中央首長的形像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堪比「林彪事件」之後公佈的《毛澤東致江青的信》一般，為江青獲得了巨大的政治資本；其次，為江青把持中央文革作了法律上的背書。正如文革史專家王年一所論述，此通知具有非凡的政治意義。

雖然在文革小組內部，當家作主的是江青，不把陳伯達放在眼裡，但是「名不正，言不順。」有了此文件後，江青便成了名正言順的當家人，成為指揮全國「文化大革命」的太上皇。

2. 對江青的吹捧

實際上，在中央文革小組成立之際，周恩來提議陳伯達作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和後來江青提議徐向前作為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同出一轍。 軟弱的陳伯達和具有歷史包袱的徐向前都可以被輕易作為「劉盆子」、「阿斗」使用。陳伯達自己就承認：自己沒有能力。 於是陳伯達推薦康生，但是康生如何能做得了「劉盆子」？周恩來對陳伯達軟硬兼施：「你還是共產黨員，難道中央不能分配你的工作？」 後來公佈由江青代理組長則顯得極為順理成

章。成為代理組長的第二天即1966年8月31日，江青就主持毛澤東第二次接見50萬紅衛兵和革命師生的大會。大會情況由新華社發佈消息：「毛主席和林彪以及賀龍同志，由謝富治、楊成武陪同乘第一輛汽車，緊跟著周恩來、陶鑄、聶榮臻、江青乘坐的第二輛汽車……六時四十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宣佈接見外地來京革命師生大會開始。江青同志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向大家問好。她說，我們熱烈地歡迎你們，向你們致革命的敬禮」。

國慶節後，陶鑄對報紙上關於江青的宣傳極其反感：「你（曾志，筆者註）看，這幾天的報紙，照片上居然將江青和總理平列，像什麼樣子？」陶鑄是常委中主管宣傳的，但是是誰越過他插手照片排列之事？捨周恩來，還能有誰？

10月6日，首都紅衛兵「三司」在首都工人體育場發起召開有北京和和地方各大專院校師生10萬人參加的「全國在京革命師生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江青講話之後，周恩來表態：「同學們，革命的紅衛兵戰士們，我首先向你們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敬禮！我沒有更多的話要說了，我完全同意剛才江青同志講的那段話。她講的那段話，我們大家都看過，都同意的。……江青同志的講話和中央批准的軍委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的錄音，我們把它製成錄音片子，到全國大中學校去放。這樣就不僅是今天到會的同學、紅衛兵戰士都聽到，而且是全國大中學校的同學，紅衛兵戰士原原本本都聽到。」把江青在一個大會上的講話做成錄音，在全國播放。江青名聞九州、聲震寰宇的地位與周恩來的大力支持是分不開的。對於一個還不是中央委員的江青，這種待遇即使不是空前，恐怕也是絕後。

其次周恩來除了在宣傳江青上十分賣力氣，另外還當面奉承當眾江青。1966年11月28日晚，北京和來自全國各地的兩萬多名「革命文藝戰士」，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正如余汝信先生所言：之所以隆重其事，是為了對江青進行一次集中的人為拔高和吹捧，這是一次向江青表忠獻媚的大會。

周恩來在此次大會上不顧歷史的真實，對江青做了極其露骨的吹捧：「在這裡介紹一下，在座的陳伯達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是堅決擁護和執行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上面所說文藝革命的成績，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導分不開的，都是同文藝界的革命左派的支持和合作分不開的。這是同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貫穿在文藝界的一條修正主義黑線進行堅決鬥爭的結果。江青同志親自參加了鬥爭實踐和藝術實踐。雖然艱苦的鬥爭損害了江青同志的身體健康，但是精神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夠補償這些損失。我在文藝方面是個外行，是個不成功的支持者。在方針上，我是堅持革命化、大眾化、戰鬥化和民族化的，但在實踐上，常常犯指導性的錯誤。例如，在音樂方面，我是外行中的外行，我只強調中西音樂的不同處，強調反對崇洋思想，強調中西音樂分開的基本訓練，不認識洋為中用，不認識可以批判地吸收西洋音樂為我所用。在這個問題上，江青同志直接幫助了我，我也在學習革命歌曲的實踐中，得到了深刻的體會。」在這場把江青樹立為偉大的文藝革命旗手的登基典禮上，周恩來是立了頭等功的。周恩來把自己擺在了是江青學生的地位上。

正如余汝信先生所評論：周恩來的講話，通篇充滿了卑躬屈節、諂媚奉承的表白。誰又可以說，在江青邁向更高權力的道路上，沒有周恩來推波助瀾的一份功勞？誠如歷史所記載，周恩來從一個這種表態到當眾高舉手臂高呼「（我們要）誓死保衛江青同志！」也就不足為奇了。閻長貴回憶說：關於江青和周恩來的關係，我也問過汪東興，他說：「江青和總理的關係是比較親密的，非同一般，同她和其他領導人的關係不一樣。在文革中，總理說了很多讚揚江青的話。『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就是首先由總理喊出來的。連主席都說，總理有點怕江青。」

官方的文字、文獻以及傳記、年譜等對於周恩來和江青、中央文革的關係是比較隱蔽，為「賢者諱」。但是在文革期間多次的召見造反派的活動以及群眾大會上，兩者的關係就非

常露骨了。對於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江青的關係，在1968年的3月24日和27日的兩次大會上，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則顯示的非常清楚。

1968年3月24日，中央決定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對軍隊幹部會議，宣佈「楊、余、傅反黨集團」的問題。

首先是林彪講話。當林彪講到：「表面上他（楊成武）是擁護江青同志的，但實際上他是對江青同志不滿的。江青同志有病的時候，他同戚本禹這些人早在去年春天，他們就搞江青同志的黑材料，實際上成立了專案來迫害江青同志。」

此時的周恩來插話高喊：「誰反對江青同志就打倒誰！誓死保衛江青同志！」在林彪講話的時候，周恩來多次高呼：「誰反對中央文革就打倒誰！」

周恩來在自己的講話中對於江青的吹捧更是不遺餘力、無以復加。

周恩來說：「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提一提她的成績的一兩點，就足以證明江青同志的偉大成績。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剛才提到，她還有很多的著作，還有很多的演說，現在印成了小冊子，大家都讀了的。這就看出江青同志是我們黨內傑出的女戰士，傑出的共產黨戰士！值得我們向她學習！向她致敬！」

周恩來講：「在這裡，我提幾句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所起的作用。江青同志是一個堅強的共產黨員，無產階級戰士。她不是從今天，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三十年代她就是一個堅定的共產黨員，就是一個同叛徒，同假共產黨員、特務和社會的反動派作鬥爭的一位堅強勇敢的女戰士。」

如果說現在或者是兩面派或者是特務、壞分子，他們所謂收集江青同志那個時候的材料，有兩種，一種是江青同志自己為戰鬥所寫的東西，那不是什麼黑材料，那是紅材料，革命的材料！至於國民黨社會上，那時候是反動派統治著，那時他們寫的東西，污蔑、造謠、迫害，那都是反革命的東西，把那些東西如果拿出來，作為黑材料，那你要在哪個地方登？江青同志自己說的很清楚，那就是台灣的話，香港的話，就是應該被打倒的那些人的話，那有什麼黑材料？

三十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學生。得到毛澤東思想長時期的修養、學習和鍛煉。經過了戰爭的年月。解放以後正是江青同志身體很差的時候，受到黨內一小撮走資派的代表人劉、鄧、陶、彭德懷、賀龍、彭、羅、陸、楊，譚震林等等，以至受到肖華的迫害。儘管如此，江青同志堅強不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在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準備階段，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教育的時候，進行了文藝的改革。

大家都知道，1964年演出樣板戲八出，都是經過江青同志親自指導、修改出來的。到了1966年要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了，反革命、叛徒、內奸彭真寫了個《二月提綱》，可是江青同志得到了林副主席的委託，寫出了革命的《二月座談紀要》，這是我們人民解放軍大家都人手一冊，讀過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提一提她的成績的一兩點，就足以證明江青同志的偉大成績。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剛才提到，她還有很多的著作，還有很多的演說，現在印成了小冊子，大家都讀了的。這就看出江青同志是我們黨內傑出的女戰士，傑出的共產黨戰士！值得我們向她學習！向她致敬！」

時隔3日，中央文革小組在首都工人體育場組織10萬人群眾大會。周恩來對軍隊幹部吹完江青後，對於普通群眾再次對江青進行了肉麻的吹捧。當周恩來講到「我們要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時，江青回應到：「向總理學習！向總理致敬！」

周恩來則說：「我不敢當，我還要學。因此我們要誓死保衛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我們要誓死保衛林副主席，誓死保衛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付的黨中央，誓死保衛中央文革，誓死保衛江青同志，我們要誓死保衛我們的人民解放軍，誓死保衛我們廣大的革命群眾，誓死保衛我們的紅衛兵，還要誓死保衛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紅色政權。」

周恩來這個講話有如下幾個特點：1）從歷史上來塑造江青的革命歷史形像，把江比作

魯迅來讚揚；（2）江青受到過迫害，而且這些迫害者文革結束後卻被稱為「無產階級革命家」；（3）文革期間江青又立新功。

另外作為中央領導人，在如此大規模的群眾大會上帶頭高呼：「誓死保衛江青同志！」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這是十分難得的互相聲援致意的熱烈場面。這也真實的體現了在文革中期以前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之間真誠團結一致、親密無間的的一面。如果說文革是毛澤東和江青合夥開的「夫妻店」，那麼周恩來就是這個店的總經理。

如果說這是周恩來在公衆場合下的作秀，那麼私下裏的周恩來也不遜色。知情人講述，當時的軍政大學政委張秀川親自抓（筆者註即今天的國防大學），在周恩來的專門指示下曾搞過「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史」。知情人說她沒看過那東西的原稿，據說除有毛林會師（即井冈山會師）之外，還特別對江青倍加贊揚。但是後來時間不長，因為時局變化，周就命令把寫成的東西全部收回銷毀。

3. 江青和周恩來的互動

聶元梓回憶說：有一次，康生要我抓楊勳（經濟學家，文革時為北大教師，因為反對江青曾坐牢兩年）。楊勳是楊柄章的姐姐。指示我們讓群眾扭送楊勳到公安部。開始康生指示，我照辦了。後來康生又通知讓我到他那裡去，問我：「指示你抓楊勳，你怎麼沒辦呢？」我說我已經讓學生把她扭送到公安部了。他說：「那總理來電話說沒有送去。」然後他立刻打電話給謝富治核實。謝富治說「人送來了，在押了」。然後他當著我的面又給周恩來打電話，說：「已經辦了，我也問了謝富治了，在押了。」我才知道這事是周恩來讓辦的。

當聶元梓被問到：到底為什麼要抓楊勳？聶回答說：我先不知道，後來聽說是周恩來完全是唯江青意圖為從。是如聶元梓所說還是如林乃英在檢討中表示的要聽周恩來的？無論如何，閻長貴先生回憶說：在外出開會或活動時，周恩來有時坐江青的車。這是為什麼？對這個問題我當時就想過。我認為，主要就是周恩來要和江青討論問題，徵求她的意見，以統一對一些問題的認識。經過1967年的所謂「二月逆流」事件，在中央層面上出現了一個議事和決策機構，叫做「中央文革碰頭會」，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這個碰頭會由周恩來主持，參加者除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外，還有謝富治、楊成武、葉群等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雖然是陳伯達、顧問是康生，但說話算數的實際上是第一副組長江青，她幾乎具有一票否決權；不管什麼問題，就是陳伯達、康生同意了，江青不同意也是不行的。周恩來作為「中央文革碰頭會」的主持者，不能不正視和重視這種情況。筆者認為，周恩來與江青在工作上應該是對於對方還是非常支持的，雖然時不時的江青會耍下「小脾氣」。舉例來說，王力曾經回憶道：有關四川「二挺」（劉結挺、張西挺）的問題，他曾經應江青要求進行調查，事後也寫信給江青說明情況。但是後來此信是周恩來批示的。周恩來批示道：「同意王力同志意見。」

而對於周恩來，江青也是關照有加。1967年1月，北京大街上連續出現了要打倒周恩來同志的大標語。閻長貴回憶到：在發生所謂「二月逆流」的時間裡，我拿份關於周恩來的什麼材料（其內容沒一點印象了，很可能是關於貼周恩來大字報的材料）給江青看，江青嚴肅地跟我說：「凡是涉及到總理的事情，我心都不安！」江青這句話，這個表態，對我影響很大。也正巧在這段時間裡，我中央財經學院的一個大學同學（年輕教員），給我來信，說（大意）：1967年2月16日晚（或2月17日凌晨），周總理接見財貿口造反派的講話對造反派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利，還當場抓了支持造反派的財政部副部長杜向光，等等，並附來了周恩來講話的紀錄；其意思是想就周恩來的這次接見寫周恩來的大字報，問我行不行。我知道這不行，因為按照當時毛主席以及中央文革的意見，不允許貼總理的大字報，

陳伯達、江青不止一次叫我找聶元梓、蒯大富，讓他們組織人到天安門覆蓋有關總理的大字報，我聽了江青所說她「心不安」的話，更覺得不行，於是我就給我那位同學打電話，告訴他：「不行，絕對不行，決不能給總理貼大字報。有什麼意見可以向上反映。」我那位同學，知道給總理寫大字報不行，又給我來信，說要貼李先念的大字報，我覺得他不聽話，有點不耐煩，告訴他：「我不管了！」我當時的心態是只要不貼總理的大字報就行，其他我不管。我講這件事情，是想說明，江青所說「心不安」的話對我確實是影響很大的，也是很直接的。

周恩來在接見科學院造反派時說：「江青同志講話就是指示，誰不執行，你們就造他的反。我支持你們按江青同志的指示去辦事，至於他至死都不執行，那你們自己去想辦法，可以奪權嘛？我只能起煽風點火的作用，在必要的時候，我可以助你你們一臂之力。」

曾經是上海造反派負責人的潘國平回憶：一是有一次他參加北京工人體育館紅衛兵大會，會後大家鼓掌要中央首長繞場一周，周應是第一位，可他退到後面，還扶著江青下台階。潘當時感到很不舒服。二是1967年1月，潘上京開全國造反派頭頭大會，第一個發言，提出部份幹部可以出來工作由造反派監督，江青當場反對，把潘轟下台。潘氣不過，給周恩來遞紙條要求繼續發言，周卻公開宣佈說，潘的意見，他已知道，會轉告中央，今天不必再發言了。江青會後也順勢過來，叫我潘司令，並給我聯絡電話，派車派聯絡員。

江青和周恩來在日常生活中的關係也非常親密。周恩來曾對劉白羽說：她（江青）那裡一個電話就是幾個小時。吳法憲回憶說，江青下樓的時候，周恩來周恩來都趨步往前，扶其下樓！在江青外出青島遊玩，周恩來還要吳法憲和李作鵬兩位政治局委員陪同！而周恩來對於江青的要求更是有求必應！江青有個人問題時特別愛找周恩來幫忙。江青因為覺得住11號樓不安全提出要改住10號樓，又在17號樓和10號樓下面建立防空洞。而這些工作，都是周恩來一手操辦的。楊銀祿說：江青提出要求後，打電話給周總理。周總理對江青非常瞭解，他接到我的電話，立即就答覆了：「好嘛，江青同志的想法是對的，我同意。我現在就給東興同志打電話清他準備一下。江青同志還有什麼要求嗎？」我說：「江青同志說要檢查一下樓的安全情況，然後再用紫外線消消毒，別的沒有提什麼要求。」周總理說：「那好嘛，我請東興同志辦。」

閻長貴先生還說：周恩來到江青這裡來之前，都是親自打電話給閻長貴（時任江青秘書），問：「江青同志現在幹什麼，是工作還是休息？如果不是休息，我想到江青同志那裡去。」有時周恩來也打電話說：「我有事要到江青同志那裡去，請你問一下江青同志行不行？」閻長貴每次向江青報告時，江青都是高興和痛快地說：「總理來，可以，歡迎。」閻長貴說：實實在在地說，江青沒有一次說「總理不能來」，或借口有這樣或那樣的事情而拒絕總理來。閻長貴還回憶到：她常常纏著周恩來，她做的事，她的活動，很多總是要求周恩來參與。比如，當時江青經常看所謂革命樣板戲的演出，她要周恩來也看，演出結束後，她給劇團的演出人員談看法，提意見，她也要周恩來陪著，我看到周恩來不僅多次和江青一起看戲，也參加江青演出結束後的活動，可以說周恩來經常總是「奉陪到底」。——在文革中紅衛兵搞的一些資料中可以看到這方面的記錄。據我看，周恩來也「樂意」（不樂意也順從）幫助江青做些事情，這恐怕是大政治家的「深謀遠慮」，想到毛主席……

4. 周恩來和江青的關係受到毛周關係的制約

閻長貴先生說：談江青和周恩來的關係，不論從哪方面說，都不能脫離開毛澤東。周恩來對江青遷就又遷就，忍讓又忍讓，為什麼？因為江青背後站著毛澤東。江青是通天的，周恩來對江青的態度是他對毛澤東態度的延伸。江青也知道她在很多方面都得靠周恩來。她建國以後的工作都是周恩來給安排的，她在文革中的職務攀升也離不開周恩來。她1956年成為毛主席五大秘書之一，是周恩來提議的，1969年在「九大」當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無疑也有周恩來幫忙。這是從她本人的利害關係而言。而她對周恩來的態度，從根本上講，也是以毛澤東對周恩來的態度為轉移的。毛澤東經常敲打周恩來，在每一次敲打時，江青都比毛澤東走得更遠，從思想方法講，她比毛澤東更極端。江青認為周恩來成為她實現野心的障礙而必須打倒，恐怕是在林彪「九·一三事件」以後。因此，不論從情理看，還是從實際講，說江青從文革一開始就把周恩來視為「眼中釘」，就要整周恩來、打倒周恩來，是不對的，不符合歷史事實。

筆者認為，按照毛澤東的本來設想，「九大」之後應該是整周。作為毛澤東的代言人，「九大」後江青接連對周恩來的發動了幾次攻擊。最重要的一次是《周恩來年譜》記載的「江青私自召集姚文元、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謝富治等開會，誣稱周恩來『在亂中看不清方向，作不出決策』，吹噓自己是很成熟的領導幹部，可以掌握國家的全盤領導。」吳法憲和邱會作都對這次會議做了詳盡的回憶。

根據程光先生的採訪，「九大」之後，江青還背著周恩來曾經四次和在京部分政治局委員「談話」發洩對「九大」後中央工作的不滿，後兩次是專門誹謗周恩來的。

江青在1969年夏季也向劉慶棠交底：「文藝界大批判有個困難問題，就是有總理，有些事都是總理主張的。」劉慶棠馬上就呼應說：「文藝界的權還沒有真正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裡。」不久8月26日，劉慶棠致信江青說文藝界的階級鬥爭，實質還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

但是林彪自己跳出來之後，改變了文革的大方向。因此，周恩來和江青的關係儘管從文革開始，難免有些磕磕碰碰，但是總的看來是良好的。「九·一三」事件之後，周恩來同江青是毛澤東清理林彪勢力的左右手。此時的周恩來和江青的利益也是一致的。於是在，周江之間的良好關係再次體現，直到1972年年底。

「林彪事件」之後，江青多次宣稱：總理、康生、春橋、文元，我們是毛主席這一派的，都是受林彪集團迫害的。林彪一夥到處放火，我們是救火隊，保老同志。無疑，周恩來是被江青看作是同一集團的人。

1972年5月，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議在北京召開。5月21日，周恩來做了長篇講話，並為會議中最重要的文件—毛澤東致江青的信背書。周恩來用自己的政治聲望為此信的真偽做了證明。同年8月10日，周恩來將維特克一再表示希望見江青的要求的報告批示給江青：「江青同志，如你這兩天精神好，可以見見此人，談上一個鐘頭就可以了……如不願見，也可不見。」周恩來還說：「在你尚在北戴河時，已請鄧穎超、康克清兩同志見她，談談長征。蔡大姐因身體不好，尚在北戴河，不擬見了。」周恩來不僅把江青同鄧穎超、康克清等革命老大姐相提並論，更重要的是，在周恩來將報告批給江青之前，剛從北戴河回京的江青根本不知道有維特克此人。余汝信先生對此事的評價則是：「報告一批，周恩來完成了江青與維特克之間牽線人的角色。周的這一舉動完全是向江示好的表現，這一動作更說明，在1972年，周與江的關係是密切、良好的。」筆者對此完全贊認同。

1972年年底，毛澤東重新對對於「林彪事件」定性。毛澤東改變的不僅是批極左還是極右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對政治局內部格局的重新認定。王若水回憶說就是通過此事認定毛澤東對周恩來的信任是有限的。顯而易見的是，江青在批評周恩來方面比周恩來批評江青方面有更大的自由度。而周恩來在這之後對於江青的回應更為小心翼翼。這在1973年夏季毛親自發動對周恩來的批評之後更是如此。1973年11月13日，為對外友協編印的《外事活動簡報》只印發周恩來、江青二人的事情，江青以批示向周恩來提出：「這類簡報，建議也送春橋，文元同志。」周恩來當日就批告外交部：「請從今起，外事活動簡報，一律印送主席、政治局在京全體同志，及有關各部、委、組，望通知友協照辦。」當毛澤東決定發起批林批孔運動時，作為周恩來最得力的助手之一（筆者註：楊德中實為周恩來在中央警衛團、中央專案組的最重要的耳目。如果毛決定對周恩來動手，第一個需要清除的就是楊德中。）楊德中被江青等定為「壞人」隨後被下放也就在意料之中（現代版的項莊舞劍

意在沛公)。

周恩來在「批林批孔」期間依然讚揚過江青，但是筆者認為此時的讚揚和原來完全不能同日而語了。正如上面所論述，周恩來和江青之間也存在摩擦，可以說既有互相勾結、互持，狼狽為奸的一面，又有勾心鬥角、你爭我奪的一面。這完全可以歸於周恩來看透了文革其實就是毛江夫妻店。周恩來通過對江青的「投資」與「阿諛奉承」，獲取最高決策的信息和最高領袖的信任，自然也受益匪淺。但是自1972年年底之後，周恩來在政治上開始遭到毛澤東的拋棄，周恩來對江青的讚揚和順從，在某種意義上將只是對毛澤東的輪誠了。1975年5月毛澤東發動政治局批判「經驗主義」。吳德回憶，他和葉劍英都批評了江青搞「宗派主義」。而此時的周恩來卻對吳德說：「你知道不知道，主席對兩方面意見在觀察中，他們會反攻的，反攻時你是吃不消的。」

四、結束語

周恩來和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組的關係很大程度上受到毛澤東對周恩來的態度和文革的進展所影響，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這是個決定性因素。在文革前、中期，二者整體而言是以合作為主，共同貫徹毛澤東的文革路線。「九·一三事件」之後，兩者之間因為權力的再分配，則逐步轉為以爭奪為主，矛盾日益尖銳。但是除了這個因素之外，周恩來對於江青的吹捧很大程度是自降人格。相對於被中共認定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康生，在1966—1967年的公開場合對於江青都是不卑不亢，無甚吹捧。而在貫徹毛澤東的意圖，把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組抬到凌駕於中央政治局之上的這個過程中，周恩來可以說是居功甚偉。

至於周恩來為什麼如此自我「作賤」，是什麼重要因素在文革時期制約了周恩來，導致周隊對江青和文革小組如此這般。筆者認為那就是對周恩來毛澤東一個人的忠心，而非對國家和人民的負責，是周恩來時刻在心裡的以所謂「賢相」自居，保持晚節的心態所致，由此周恩來也只能扮演「從惡」和「幫兇」的角色，起到任何其他他人所起不到的作用，而非制止動亂、更不可能撥亂反正，引導國家步入正途。周恩來還可以說是第一個領會到「江就是毛的一條狗」的高級領導人，因此，周恩來對江青的態度之謎也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了。

第二部分 第三章 「伍豪啟事」風波

反擊「二月逆流」的最大後果，是周恩來承認了「中央文革已經取代了書記處」的現實。從此，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都是先提到文革小組討論，各省、市、自治區籌備建立革委會的權亦交給文革小組。

周恩來和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的關係步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由周恩來主持。1967年5月份出現的「伍豪事件」則使二者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發生了傾斜。「伍豪啟事」與其說是江青要挾周恩來的工具，不如說是周恩來自己強加給自己的心病。毛澤東則利用此事，有意不時的敲打周恩來，直到周恩來在生命的最後時段。

一、「伍豪啟事」的起源

30年代初，周恩來在上海黨中央機關工作時，曾使用過「伍豪」這一化名。1932年2月下旬，國民黨中統特務機關在上海的《時事新報》、《時報》、《申報》等報紙上連續登

載所謂「伍豪啟事」，宣稱「伍豪」等人脫離共產黨，企圖在共產黨內製造混亂。報紙流入中央蘇區後，時任蘇區中央局委員的項英、任弼時表示，一定要予以還擊，戳穿謊言，肅清影響。遂提議請毛澤東以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名義，發佈告示，在全蘇區範圍內，向廣大工農群眾徹底揭露中統特務機關陰謀。毛澤東擬就《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佈告》，並於2月下旬以中央政府主席名義，發佈了這份《佈告》。佈告全文如下：

上海《時事新報》、《時報》、《申報》等於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左右連續登載「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啟事，宣稱脫離共產黨，而事實伍豪同志正在蘇維埃中央政府擔任軍委會的職務，不但絕對沒有脫離共產黨的事實，而且更不會發表那個啟事裡的荒唐反動的言論。這顯然是屠殺工農兵士而出賣中國於帝國主義的國民黨黨徒的造謠污蔑。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
一九三二年二月。

此時的周恩來已經在蘇區瑞金，並主持蘇區中央局的工作，並且連續撰寫了兩篇文章，一文是《今年的「二七」紀念與中國工人階級的中心任務》；一文是《紅軍十二軍佔領杭武的意義》，分別於2月3日和3月2日，刊登在中央蘇區的機關報《紅色中華》上。《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的署名時間是2月18日，這一時間與周恩來在中央蘇區主持工作的時間，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

關於此事的說法，無論是《周恩來年譜》還是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都聲稱《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為南開大學造反派在查閱舊報紙發現。但是都沒有怎麼詳細敘述事情的原委。劉西堯後來寫的回憶文章中則說：「這次反總理的『五·一六』思潮，與一位長期在國務院工作的人有關，他竟把天津『8·18』造反派弄到的一份載有國民黨反動派捏造的『伍豪聲明』的報紙，送給江青，妄圖陷害總理。」劉西堯所言的這位長期在國務院工作的人是周榮鑫。1967年5月初，天津南開大學「衛東」的紅衛兵在查閱舊報紙時發現了「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當知道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時，將載有啟事的報紙的抄件交給周少華和張國忠，並由二人專程送到北京。周少華是周榮鑫的女兒。周榮鑫為什麼不直接交給周恩來？這恐怕同當時周榮鑫的情況有關。吳德說：「周榮鑫、雍文濤被揪走後，好幾天都未放回來，我們就派人想辦法去找。周榮鑫找回來後，周總理讓他在國務院燒鍋爐，紅衛兵再找他時，就說周榮鑫已經參加勞動去了，實際上把周榮鑫保護起來了。」這期間的原委則不難明白。

對周恩來來說，則是有點「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周恩來曾經直接授權紅衛兵可以進行調查取證為其所主管的中央專案組服務。周恩來對於紅衛兵的行動也曾經給以高度評價。例如周恩來對於學生搞出安子文是黑幫的材料和瞿秋白是叛徒的證據就大為讚賞。

5月12日，周少華致信戚本禹，報告此事。5月13日，戚本禹同關鋒一起會同周少華、張國忠兩人談話並將抄件取走送予江青。

關於伍豪事件還另有一說法。李文卿在其所著的《文革中的許世友》一書中記載，1968年5月4日，許世友攜帶南京造反派清查敵偽檔案時發現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脫離共產黨啟事》材料火速趕到北京。這和吳法憲的回憶是一致的。吳法憲回憶到：「江青把楊成武和我叫到她那裡，拿出一包材料對我們說：『這些都是周恩來的材料，但是現在你們不能看，你們只要知道有這些材料就可以了。』後來我才知道，這些材料是許世友送來的，裡面裝的就是著名的『伍豪啟事』」。

在1968年5月8日，毛澤東接見在京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解放軍指戰員、各地黨政幹部和群眾代表以及出席全國鐵路、交通會議的代表等人。同時參加接見的還有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和幾位副總理、元帥。毛澤東說：「敵、偽的報紙也不能全信。像許世友這樣六十多歲的人，他都不知道『伍豪啟事』是敵人偽造的，可見瞭解當時的歷史情況很不容易。」

當場周恩來簡要地談了「伍豪啟事」的原委：我是1931年12月中到了中央蘇區的。我到福建永定的時候，正好碰上寧都暴動。當時康生等在上海，他們看了這個敵人偽造的假啟事，很快就由申報館廣告部在廣告欄登了一條揭露性的啟事。

江青拿到這個材料後，於5月17日寫信給林彪、周恩來、康生，信中並附寄了這個啟事。江青在信中說：「5月12日夜，收到周榮鑫的女兒周少華（天津南開大學紅衛兵）給中央文革來信，說他們查到一個反共啟事，為首的是伍豪（周XX），要求同我面談。」

對於此事，官方《周恩來傳》的評述是「江青使出了更狠毒的一手。……江青此時要這樣做，用心的險惡是是十分清楚的。」事實上這種指責完全是站不住腳的。最為有力的證明是「伍豪事件」並沒有在社會上擴散，特別是在1967年的春夏之交（當時是文革中社會上第一次反周高潮）與1974年的批林批孔期間。筆者在查閱宋永毅主編的112卷《紅衛兵大字報》以及哈佛大學所存的紅衛兵資料，未能發現在社會上擴散的證據。

若沒有毛澤東的點頭，江青對於周恩來的任何企圖都是無法實現的。江青在收到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之後，致信林彪、周恩來、康生是完全符合組織程序的。直到1972年12月份，江青和周恩來的合作遠遠大於衝突。「伍豪事件」完全是周恩來自己的心病（詳見下述）。江青在沒有得到周恩來的回答之前，也未把這個材料定性。江青在當時是否意識到這個材料的價值，尚無可靠證據，但是事後的發展，卻表明了這個材料成了毛澤東手中有效的工具，並且隨著時局的變化，此材料宛如變化多端的「金箍棒」，時而「深藏」，時而「啟用」。

二、「伍豪事件」的澄清

周恩來對此反應十分強烈。周恩來發動工作人員對此進行詳細的查證。

在周恩來、鄧穎超身邊工作了37年之久的趙焯回憶：「鄧大姐讓我到西花廳的工作人員都召集到一起，包括秘書、衛士、司機和廚師。鄧大姐向大家簡單講了講這件事，讓（趙）茂峰去北京圖書館借來1931和1932年上海出版的幾種報紙，我們大家就不分白天黑夜地找起來。報紙太多了，堆在一起有我兩個人高，而且因為是豎版，找一條一二百字的小消息挺困難。」功夫不負有心人，工作人員終於在1932年2月20和22日的《申報》上找到了關於「伍豪啟事」的聲明和否定聲明。

隨後，在5月19日，周恩來寫信給毛澤東：「連日因忙於四川和內蒙問題，並同內蒙軍區請願戰士分批談話，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閱上海各報。」「現在弄清楚了所謂『伍豪等啟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的偽造啟事，「偽造啟事和通過申報館設法的處置，均在我到江西後發生的」。周恩來將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的有關事件編為《大事記》，一併送毛澤東閱。

同日，周恩來在江青來信批示：「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純屬敵人偽造」，「我當時已在中央蘇區，在上海的康生、陳雲同志均知為敵人所為，故採取了措施」。值得注意和耐人尋味的是，周恩來始終沒有提及毛澤東簽名的那個布告。

康生出面為周恩來澄清此事為假。周恩來（在江青寫信給周恩來過後不久：筆者註）專門在文革小組會議上對此說明。周恩來講完之後，康生出面作證這件事是敵人搞的，發生以後是由他處理的。但是因為康生現在已經不是「無產階級革命家」了，此等好事，一筆勾銷。

其實康生已經多次證明此事為假。文革前就有兩次。1962年10月31日，康生曾在一份涉及「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的材料上親筆寫過：「這完全是造謠誣蔑，與敵人完全站在一起的說法。事實真相是：顧順章叛變後，全家被我們幹掉了，敵人為了報復，用特務機關造了那個謠。實際上，當時周恩來同志已到蘇區去了，根本不存在這樣的事。」196

3年12月27日，康生在另一份有關材料上再次批寫道：「當時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這樣的事。」 1972年的2月18日，重病中的康生口述了一個記錄：「所謂『伍豪啟事』完全是國民黨特務的偽造，用來攻擊污蔑我們黨和周總理的」。官方一致宣稱原本知情的康生在1967年的5月卻啞口無言了，以此極力醜化康生。

不知道陳雲是否當時知道此事，但是筆者迄今為止沒有看到陳雲在1967年此事發生前後出面為周證明清白的材料，這應該和當時陳雲所處地位有關，極有可能當時並不知情。陳雲在1972年6月13日，陳雲在「批林整風」匯報會小組會上就所謂「伍豪啟事」問題發言：「我當時在上海臨時中央。知道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對這樣歷史上的重要問題一共產黨員要負責任，需要向全黨、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採取負責的態度，講清楚。這件事完全是國民黨的陰謀。」同日，他又寫了書面發言。指出：「我現在書面說明，這件事我完全記得，這是國民黨的陰謀。」

謝富治在死之前亦留言：「所謂『伍豪啟事』是國民黨偽造的，毛主席講過這啟事是假的，毛主席和康生等同志早就知道這件事的真相。」

據筆者所知，林彪沒有表態。毛澤東閱後批：「交文革小組各同志閱，存。」並在「存」字旁邊重重地劃了令人醒目的兩道槓。由於毛澤東並沒有明確表態，於是留下了不少可以想像的空間。卜偉華先生說：周恩來在其後的半年時間裡，心中可能一直在打鼓，他要反覆的琢磨毛澤東的葫蘆裡賣的什麼藥。毛澤東不明確表態，周恩來被掛在了半空中。

當時「抓叛徒」之風十分猖獗，在此大背景下，周恩來無法不心驚膽顫。周恩來在6月3日接見國防工業系統群眾組織代表和軍管會代表，在談到「揪叛徒」問題時說：關於「抓叛徒」問題，重申：材料要送中央核實，不要在街上貼大字報。有的是敵人搞的陷害材料。要從黨和國家的最高利益著想，不能把毛主席身邊的人都看得那麼壞。

康生在同日接見外事口單位和紅代會代表在談及「抓叛徒」問題也指出：

「抓叛徒的問題，我不詳細講，以後中央要發文件。紅衛兵做了大量的工作，挖出了許多叛徒，變節分子，做了許多貢獻。中央發了一個通知，關於劉少奇六十一人的叛徒集團，照片也發了下去，大家很重視這件事，做了調查工作。外事口也好，其他學校也好但是最近發現存在一些偏向，就是到處都去抓叛徒。我們希望你們繼續深入調查研究工作，可成立調查組，深入調查。你用一個『抓叛徒小組』的名稱，去調查別人，一聽這個組名就有意見，很不好。

另外這件事情不簡單，做結論要慎重，這是一個人的政治生命問題，不能根據未核實的材料，宣佈某一個人是叛徒，這實際上制定了一個人政治上的死刑，要負政治上的責任。這和西方新聞記者搶新聞不一樣，你也抓，他也抓，被利用了。我們黨是光榮、正確偉大的黨，毛主席說我們的幹部大部分是好的和比較好的，若都有問題那不就毛主席的結論推翻了嗎？進監獄對共產黨員來說是個很好的考驗，也很光榮。不要一進監獄就懷疑人家是叛徒，不要隨便貼大字報，有些群眾組織做得比較好，得到材料交給中央，不立刻宣佈結論，這是好的。你們革命組織要掌握方向。

不要喪失警惕，也不要特務如麻。對歷史上有政治結論的，凡是中央管理的幹部，歷史問題的決定權絕對在中央，必須由中央決定。」

誠然，康生的講話也有不實之處。關鍵之處，康生這個講話無疑是為周恩來講話的。為什麼在搞「六十一人的叛徒」時不講呢？康生、周恩來講話的言外之意都是在打「伍豪啟事」的預防針。

周恩來行動快速的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抓叛徒」問題的通知》，在6月28日發出。通知重點強調了：

(一) 對一個人作出是否「叛徒」的結論，是一件嚴肅的政治問題，是關係到一個人的政治生命問題，必須經過周密的調查，採取慎重的態度。不要根據不充分的，未經核實的材料，自行宣佈某人為叛徒。不要輕易公佈材料。

(二) 應當把重點放在清查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中的叛徒。其他歷史上有過變節行為的也要清查，但要根據其情節輕重，是否向黨交代清楚，是否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起幹壞事，以及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區別對待。

第一點無需多用解釋。周恩來當時尚屬「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自然不是要清查的重點，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無疑也是優異的。即使群眾再次發現關於周的什麼材料，也要區別對待的。

周恩來的這番努力，恰恰證明了周恩來的心虛與害怕。事情如果燒不到自己頭上，周恩來會搞這麼一個文件麼？當時有幾個學生就是在調查劉少奇的叛徒時，他們中有人懷疑正是周恩來可能在洩露 1928 年的天津事件中扮演了非常可疑的角色，結果最後被整肅，最後被打成「五?一六」分子。

對於江青等人來說，既然毛澤東不明確表態，就意味著可以做文章。但是文章做的也只能是時不時的敲打周恩來，向吳法憲等人擺擺譜，卻無置周恩來於死地的心。雖然周恩來已經對江青唯唯諾諾，但是江青還是要顯出「老娘」的氣概。

周恩來絲毫不敢掉以輕心。在一些相關的會議上，周恩來幾次就「伍豪事件」的來龍去脈，做出詳細的敘述和解釋。原中央警衛局副局長鄔吉成回憶，曾幾度在 16 號樓、17 號樓會議室外值班時，聽到中央文革小組的人，就「伍豪事件」對周恩來的高聲質問，周恩來不厭其詳地解釋回復。

1967 年 10 月 10 日，張春橋、姚文元擔任正副主任的上海革命委員會材料組，把這個偽造的「伍豪啟事」編進《「抓叛徒」簡報》第 55 期。

但是此時的 5 月，時值天下大亂興起之際，打倒周恩來時機未到。「二月逆流」之後，毛澤東本來寄希望各省的革命委員會能夠陸續建立起來，以利於下一步文革大計。未曾想，各省造反派、保守派等各色群眾組織為了爭奪在革命委員會中的主導地位，反而大打出手。

如河南問題。4 月 23 日，毛澤東批示林彪、周恩來：「河南問題爭得厲害，請商陳再道、鍾漢華、劉建勳諸同志，是否將兩派領導人調來談一次，省軍區只保一個趙文甫，將劉建勳、文敏生、紀登奎、戴蘇理、楊蔚屏都不要，這種看法是否適當，值得研究。又湖北問題也很大，幾乎省委大都是壞人，也應快點研究為宜」。

林彪就是個甩手掌櫃，具體事宜能躲則躲。

諸般事情，毛澤東當時只能依靠周恩來。

然而在「烏盡弓藏」的時候，「伍豪啟事」不啻於制周恩來與死地的利器。因此，毛澤東的批示模稜兩可，未置可否。

1967 年 5 月，紅衛兵中掀起了自 2 月份以來另一波打倒周恩來的浪潮。天安門廣場貼出了「炮打周恩來」的大字報、大標語和傳單，將周視為「右傾保守黑後台」、「二月逆流黑後台」、「右傾翻案風黑後台」。這些紅衛兵很多最後被冠以「五?一六」被整肅。

1967 年 5 月 29 日，毛澤東在王海容、唐聞生反映最近社會上有一股攻擊周恩來之風的來信上批示：林彪、恩來同志，文革各同志：此件請閱。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請文革同志向他們做說服工作。5 月 31 日，康生寫信告訴陳伯達、江青：建議由文革小組召集外交部的聯絡站及所屬核心組開會，明確指出那些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

周恩來於 10 月和 11 月，曾讓工作人員將登載有偽造啟事的報紙和他寫給毛澤東的信，以及毛澤東的批示等材料拍照存檔。

1967年12月22日，北京大學「6406」信箱歷史系學生范××向毛澤東寫信，又反映了他在1932年的《國聞週報》、《申報》、《時事新報》上發現《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的材料。

1968年1月10日，周恩來給江青寫信說：「此事在1931年、1932年，凡熟悉上海政情和共運的，均知其為偽造。我在1942年延安整風、下半年開的中央座談會上已經原原本本談過，今年有暇，我當在小碰頭會上再談此事，並予錄音，記入中央檔案。」

直到1968年1月16日，毛澤東就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的來信反映1932年2月上海各報登載過《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污蔑。」周恩來暫時才算放下了心。同年5月8日，在一次毛澤東親自參加的中央文革碰頭會上，周恩來再次談了此事經過並說：「我已將那件事的報紙和我的報告複印了，還要寫一個材料。」毛澤東則說：「前幾天，許世友忽然做飛機來找我，要親自交給材料。我一看是《舊申報》，就知道還是那個『伍豪啟事』。」「有些幹部對當時歷史不清楚，一看大吃一驚，說『這還了得』。」

實際上，正如前述，1932年2月，毛澤東曾經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名義，簽發《中央政府佈告》為周恩來闢謠。同年2月20日，中共臨時中央機關報《鬥爭》發表《伍豪啟事》，指出這是「國民黨造謠誣蔑的新把戲！」「一切國民黨對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與我個人自己的造謠誣蔑，絕對不能挽救國民黨於滅亡。」

除了中共方面的證言之外，還有來自國民黨特務方面的證詞。1951年3月7日，國民黨中統特務駐上海特派員黃凱被逮捕後，承認：張衝起草了這個偽造「啟事」後，他將「啟事」送到《申報》館門市部。但是《申報》廣告處律師看到這個啟事借口243人脫黨而具名只「伍豪」一人而暫不刊出。但2月16日、17日，《時報早晨號外》首先刊出了這一啟事；18日，《新聞報》也刊登了。19日，國民黨設在上海的新聞檢查處派人到《申報》館質問為何不登這個啟事，《申報》遂於20、21日刊登。《時事新報》也在這兩天刊登。

1953年6月7日，黃凱又在獄中寫的交待材料中說：「他（指張沖）在抗戰以前攸（悠）長歲月中，是蔣光頭的主要幫兇，我又是他的主要幫兇。他親筆起稿，寫伍毫（豪）啟事。……遍登中外各大報一星期，絲毫未達預期的效果。」黃凱刑滿釋放後，又寫文章記述了這段經歷，並稱這件事的結果是「毫無反響，好久無人來向各機關秘密自首。相反《申報》上卻由一位大律師代伍豪發表聲明。季源溥警告《申報》史量才不應刊登，史居然拒絕，他說：『廣告是營業性質，何況從法律觀點來看，姓伍的被人冒名，是應該聲明的。』」

應該說「伍豪啟事」的真相是不難搞清楚的。

三、《關於國民黨造謠污蔑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的真相》的報告

「林彪事件」之後，周恩來一時顯得「大權在握」，處在接班人的位置。毛澤東仿如一個握緊拳頭準備猛擊對手的鬥士，林彪的出走，卻使這個拳頭打在棉花上。毛澤東閃了腰，一下子病倒了。

1972年2月12日，毛澤東突然休克。周恩來知道後，慌張加緊張，當坐車趕到毛澤東居住的游泳池門口時，兩腿無力，許久都下不了車。毛澤東醒來的那一刻，周恩來脫口而出的是：「主席，主席，大權還在你的手裡！」

這個表白並沒有獲得毛澤東、江青、鄧小平的認可。

江青後來仍然指責周恩來：「（周）迫不及待。」江青為什麼指責周恩來「迫不及待」？李志綏回憶：「在毛澤東病了之後，毛對周恩來說『我不行了，全靠你了……』『我死了以後，事情全由你辦。』」李志綏說：「我看江青雙眼圓睜，兩首握著拳，全身好像要爆炸了。周恩來則兩腿縮回，兩首撐在膝蓋上，上身挺直，微微前傾，好像凝固起來。」

而鄧小平則說：「你現在的位置離主席只有一步之遙，別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卻

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已能夠十分警惕這一點。」 事後，鄧小平的這番表態大獲毛澤東「歡心」。

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寫道：「當王海容、唐聞生二人把鄧小平的發言向毛澤東報告後，毛澤東高興地說：『我知道他會發言的，不用交待也會發言的。』一時興起，毛澤東問誰知道鄧小平的住處，要馬上把鄧小平找來。雖然因其時已屆深夜，沒能將鄧找來，但這一事情，說明毛澤東對鄧小平在進行認真觀察。而觀察的目的，是他將要決定委鄧小平以重任。」痛打落水狗，好似是「光榮傳統」。但是如果你不痛打，你就會被淘汰，下一個被痛打的就可能是你自己。這個，就是中共長期黨內鬥爭製造出來的「畸形果實」。實際上鄧周的關係遠非後人所述，周恩來在1974年6月1日住院以後，直到4個月以後鄧小平才去醫院看望周恩來。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所寫的「在法國的兩年，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年月，在江西中央蘇區，在長征路上，在革命戰爭中，在建國後的黨和國家最高機關中，直到周總理為黨、為國為人民鞠躬盡瘁，吐出最後一息，父親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歲月中一直是周恩來的得力助手和忠誠戰友……」，則是不折不扣的謊言了。

1972年5月18日，周恩來確診膀胱癌。而此時的毛澤東已經「還陽」了。5月27日，周恩來先去毛澤東處，然後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說：要在「批林整風」匯報會上，根據毛主席去年巡視南方談話中著重提到的中共黨內十次路線鬥爭問題，講一點個人的認識和我個人在歷史上所犯的路線錯誤。次日，又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各組召集人會議上宣佈此事。然而只講歷史的上錯誤還不行，周恩來還要對伍豪事件做一個系統的說明。

張佐良回憶，1972年的6月份，周恩來閉門寫「文章」，寫的渾身浮腫，苦不堪言。

6月10日—12日，周恩來連用三個晚上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作了《對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六次路線鬥爭的個人認識》的報告。周恩來在報告中自我作賤，再次表示保持晚節。

6月23日，周恩來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最後一次全體會議上，作了《關於國民黨造謠污蔑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的真相》的報告。周恩來特意宣佈了：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和中央政治局的決定，會後將把報告錄音、錄音記錄稿以及其它有關文獻資料存入中央檔案，並發給各省、市、自治區存檔。中共中央還發出文件予以說明，並附若干原始材料傳達至高級幹部。毛澤東當時也說，這樣做的用意是：讓黨內高級幹部瞭解真相，不允許任何人今後在這個問題上誣陷周恩來。可是會後，並沒有下發周恩來的報告。江青在華東組和中年組會上的講話卻作為會議文件下發。在這次會議之後，王洪文叫人從上海檔案館尋找「伍豪的材料」。上海檔案館查到一份「伍豪等人的啟事」，於7月17日報王洪文。王洪文批示：「此件先存敬標同志處，再等一個時期處理，可能中央有指示。」

1972年8月3日，周恩來與李先念、紀登奎、汪東興約周榮鑫、周少華談話，詢問了1967年天津一些紅衛兵在查閱舊報紙時發現所謂「伍豪啟事」以及將載有這一啟事的報紙抄件送戚本禹的情況，並要周少華就此事經過情況寫了一個材料，即《匯報我和張國忠通過戚本禹向中央報告國民黨反動派報紙捏造總理黑材料的經過》。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就是下發一個中發文件。而關於中發文件和請示報告問題，毛澤東曾經做出批示。

1953年5月19日，毛澤東批示：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

1962年8月10日，毛澤東對於領導機關應加強請示報告工作做出批示：中央對國內很多情況不清楚。許多領導機關封鎖消息，不作論證性的報告，事前不請示，事後不報告，實行獨立王國。而國外使館消息，卻如此認真而迅速。請同志們想一想，是否可以把這個十

幾年的老毛病改一改呢？如果再不改，那就只有執行紀律的一條路了。

即使報告到了毛澤東手裡。毛澤東畫了圈，周恩來又能怎麼樣？

王力說：後來周總理總結出個經驗：凡是毛主席只劃圈的，還不要急著去辦。因為如果毛主席支持的話，他會鮮明地表態，同意或不同意，這樣才可以積極執行。如果只劃圈，那還不行，何況這個文件（筆者註：指「二月提綱」）主席連圈也沒劃。周恩來說：「主席如果說很好，照辦，那才算數。」

周恩來也親自叮囑過工作人員：「毛主席雖然看了，也可能只是覺得總的還可以，因為毛主席只劃了個圈，還可以再研究一下……」

實際上，在1972年6月23日，周恩來做完《關於國民黨造謠污蔑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真相》報告後，這個報告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會議處做了錄音，然後又根據錄音整理出文字記錄送給周恩來。周收到以後看過，但一直沒有簽字。根據毛和中央政治局的決定，要把這個報告的錄音、文字記錄稿及其它有關文獻自資料存入中央檔案館，並發給各省、市、自治區的黨委、各大軍區黨委存檔。但周恩來如果不簽字，這個報告印發不出來。

因此此事被擱置，絕非周恩來工作忙或者江青等阻攔所能解釋的。

1975年9月20日，周恩來要進行大的手術。周自知很可能再也起不來。在麻醉藥都打了情況下，叫工作人員讓趙焯把此報告盡快送到醫院來。趙焯用最快時間送過來，周簽字。簽好之後，周恩來如釋重負：「我簽了字，就算是辦完了這件事。」

是周自己耽擱的。因為周恩來非常清楚毛是把此事作為自己頭上的「緊箍咒」，毛澤東的真實意圖並不是什麼讓周恩來澄清事件，完全是一直敲打戰術，告訴全黨，周恩來歷史上不那麼乾淨。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周恩來希望毛澤東能夠瞭解自己的苦衷，高抬貴手罷了。

但是無論如何，「伍豪啟事」當時並沒有對外洩露，社會上也沒有出現任何與此有關的消息。

四、周恩來的叛徒情結

1975年7月1日，北京醫院。身患絕症的周恩來在和泰國總理簽署完中泰建交公報後，對一部分要求同他合影留念的工作人員說：「我這是最後一次同你們合影，希望你們以後不要在我的臉上打叉叉。」周恩來的這句話表明：他在他死後，說不定什麼時候有人就可以拋出「伍豪啟事」這個「定時炸彈」，把「周恩來」三個字炸成無數個「叉叉」。

1975年9月20日，病情急劇惡化的周恩來再次做大手術。周恩來自知不久將告別人世，這次上手術台能否還能活著下來尚存未知數。打了麻醉藥之後，在進手術室前，周恩來特地調來了「伍豪啟事」事件的全部材料及1972年批陳整風會上關於「伍豪事件」的報告記錄稿，詳細閱讀之後，將其封存，並用顫抖不止的手簽上自己的名字「周恩來」。於進入手術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周恩來用心良苦，不僅是簽名，還註明了簽字的環境和時間。不僅如此，周恩來在進手術室前突然高呼：「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場的鄧穎超要汪東興將此情況報告毛澤東。

周恩來的喊聲撕心裂肺、令人動容。「伍豪啟事」在周恩來心中的份量是如此的沉重和痛苦，此喊聲意味深長，耐人尋味！

為什麼要報告毛澤東？是要把毛澤東感動到擠幾滴「鱷魚的眼淚」然後批示「同意照辦」嗎？周恩來其實非常清楚，這些統統不起作用。

這是因為周恩來自己對此有個特殊的叛徒情結。

1966年5月21日，周恩來在談到「保持晚節」問題時候，就專門針對叛徒問題感慨：「蓋棺不能定論，火化了也不能定論，像瞿秋白就是一個叛徒，他臨死時寫了一篇《多餘的話》，這篇講話在香港的一個雜誌上發表了，意思是說我不應該參加政治活動。李秀成

也是一個叛徒，李秀成的自供就看出了，戚本禹同志寫文章批判過，不因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議把瞿秋白從八寶山搬出來，把李秀成的蘇州忠王府也毀掉。這些人都是無恥的。」

周恩來在1967年7月1日接見鐵道部部分革命造反派時講：「我是經過五個時代，從大革命到現在：一九二一～一九二七，一九二七～一九三七，一九三七～一九四五，一九四五～一九四九，一九四九到現在。五個階段都經歷過不少事情，看到過不少階級，有的是鋼鐵戰士，有的就是不行。像向忠發是黨的總書記，但一抓住就叛變。當然也有好的，像蘇兆征成為烈士。知識分子也是這樣，也有很多烈士，像李大釗；也有象陳獨秀背叛革命成為托派，瞿秋白臨死前還寫叛變書，就像從蘇聯回來不可一世的王明，也成為修正主義分子，住在蘇聯，成為人民的敵人。革命烈士很多，革命者是前仆後繼。我們是留下來的人，多做一些工作，就是為世界革命服務，你們應該全心全意干革命，要勝過我們。」

周恩來還對紅衛兵大搞叛徒材料大力讚揚：「我建議注意調查研究。我接見過南開大學衛東派組織。我叫他們多作調查，他們下決心鑽到很多圖書館裡，查了幾個月。安子文是黑幫分子，是一位學生調查出來的。南開大學發現了二十多年前的材料。安子文叛變，是經劉少奇批准，集體自首。入城之後，組織部長是安子文，就不把這一部分材料拿出來。瞿秋白死前也寫過一篇文章，同李秀成的一樣，結果蔣介石還是把他殺了，這篇文章被陸定一藏起來了。這些都是大事，是白紙黑字寫的材料。這些材料就值得了。」

在文革中，周恩來對於叛徒問題不厭其煩的講，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感覺。

「沒有作虧心事，不怕鬼叫門」。周恩來在「伍豪事件」中扮演的真實角色到底如何？陳小雅質疑的非常有道理：

第一個：周恩來本人和中共高層以及所有為周恩來辯護的人，在辯護和證言中，所強調的都是「周恩來本人並未登過那樣的啟事」，所謂周氏脫黨「並不是事實」。一言以蔽之，周恩來沒有「做」過那件事，但從來沒有人從正面澄清過：周恩來（我本人）從來沒有「說」過那類話。

第二個：毛澤東在30年代和60年代都深信不疑的事情，為什麼在70年代發生了變化？那些原來為周恩來作過證明的元老們，為什麼竟沒有堅持一定要形成一份中央文件？而把這件只需舉手之勞的事情一直拖到周恩來的身後。直到1995年，才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聯合撰寫了一篇《「伍豪事件」的前前後後》，算是「正式澄清？」

對此陳小雅女士認為：

1928年10月，共產國際書記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發表演說，認為中國紅軍「只能分散地存在」。根據他的指示，周恩來主持的中共中央致信湘贛邊特委，將紅軍主力分散為小部隊，認為在必要時，可以「對外宣稱朱毛死亡，以便他們安全地撤出根據地」。故此，1936年斯諾在延安向毛澤東提到的，外界曾多次謠傳毛澤東「已經死亡」，並非空穴來風。

發生在「六四」後大搜捕的期間，我（陳小雅女士）還在建國門內中國社會科學院大樓內的政治學所上班。在一周兩次的「返所日」，我和同事們在一起議論的一話題經常是：「聽說誰誰誰逃走了」，「聽說誰誰誰被捕了」，「聽說誰誰誰出賣了誰」……一天，有人說：「柴玲被捕了。」但過了幾天，又聽說：「柴玲已經出去了。」對於這些謠傳的信息，我們當時都沒有當真，不過是一聽罷了。但又過了一段時間，我們又聽有人說：「王超華被捕了。」我們仍姑妄聽之。但不久，又有消息傳來：「王超華已經出去了！」我們已經知道，解救柴玲、王超華等的「港支聯」，實際上是「六四」後「反」出去的中共地下黨的老班底，它完全有可能借鑒共產黨的地下鬥爭經驗；我們也知道，國民黨的特工藝術，極大的得力於共產黨。而中共的特工與地下鬥爭經驗，又直接來自蘇聯的「契卡」。

早年「偷渡」成功的周恩來喜不自勝。據說他一落定便給中央政治局寫了一封信，大讚

「汀州的繁盛，簡直為全國蘇區之冠。」不僅如此，他還召集省委、省蘇維埃和縣委的領導人開會，報告一作就是「8個小時」……。到達中央蘇區的周恩來，在「勝利沖昏頭腦」的情況下，完全有可能將此作為一段「佳話」告知過旁人，但由於根本不是事實，旁人「遊戲」聽之，轉眼就被忘記。但記憶力驚人的毛澤東未必會忘記：「下車伊始，就哇啦哇啦地發議論，『欽差大臣』滿天飛」——這至少說明，直到延安整風，毛澤東對當時的情景仍記憶猶新……

也就是說正是周恩來到達蘇區之時所講的「佳話」才正是張沖等人製造「伍豪啟事」的根本信息來源，而這正好也符合當時自然條件下的信息傳播速度：「國民黨謠言不攻自破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失去了「時效性」——它是在周恩來出現在蘇區兩個月之後才刊登的。在一般情況下，當事人不在「出事地點」，這項「栽贓」就不能成立。但是，在「六四」後大搜捕期間的兩則故事啟示我們：如果當日柴玲或王超華「被捕」的謠言，按照自然傳播的速度擴散的話，它從出事地點到京城，肯定已成了「馬後炮」。考慮到30年代信息傳播手段的落後，一個「謠言」從廣東東北部或福建西南部或江西東南部的崇山峻嶺傳到上海或南京，「兩個月」恐怕也不為多。

唯有一點不同的是，筆者認為記憶力也同樣超人的周恩來對於此事也是心知肚明，因此才一直不敢簽字，唯恐「偷雞不成反蝕一把米」。但是周恩來對於9月20日這次手術之後是否還能夠走下手術台無法確定，因此才命趙煒拿出此材料簽字，猶如臨終遺言般。

而正是基於這個原因，才是周恩來叛徒情結的根本來源，也正是如此，周恩來才有「啞巴吃黃連」的苦衷。

1972年的8月4日，周恩來指示：對於敵人污蔑我的材料，也要登參考清樣，供主席和政治局同志參閱，不應封鎖。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周恩來也自作自受，好比人家打了右臉，然後把左臉也貼上去，沒有打夠吧。但是周是有意說，別人是有意做，本來周瑜打黃蓋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現在成了一個是真心打，另一個也確實痛在心上。

相對於毛澤東對周恩來的態度，周恩來可以說是把自己完全貢獻給了毛。1975年夏，周恩來到北京醫院的時候，同護士閒談時問道：「你看我還能不能再活一年？」這話傳到周秉建耳朵裡。周秉建打電話給周恩來：「伯伯你怎麼能開這樣的玩笑？我們怎麼能夠離開您！」周恩來對此批評：「你怎麼能對我有這種感情？我們只能對毛主席才能源頭這種感情，沒有我誰都可以代替，我們誰都離不開毛主席！」

第二部分 第四章

周恩來在中央專案組中的作用

在文革中發生過許多令人髮指的暴力迫害事件。如果目光僅僅停留在各種群眾組織舉行的規模宏大的批鬥大會，顯然是不夠的。因為這些比起現在仍然不被外人所熟悉的中央專案組（亦稱中央專案審查小組或中央專案小組）所實施的法西斯行為，都只能算是小巫見大巫。

中央專案組不僅令人談虎色變，而且其具體的操作更是罕為人知，其結構和運作迄今還很少見諸公開出版物。楊成武的回憶揭開冰山一角，領導楊成武搞專案的是周恩來。實際上，整個中央專案組的實際領導者就是周恩來，連康生、江青等都是其手下工作人員。當然，江青的作用和地位比較獨特，因為江青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毛，所以周恩來對於江青非常遷就。以劉少奇專案為例，江青在此案上投入的精力最多、最大。但是就整個中央專案組的組織機構來說，周恩來畢竟還是中央專案組的總負責人，而且江青對於其他專案所投入的

精力相對於劉少奇專案則少的多。整個專案組的材料最後審批以及在報告於毛澤東之前都要經過周恩來之手，至於材料的真假不是關鍵問題，關鍵是能否迎合組織的要求。無論早期的彭德懷專案還是文革期間的劉少奇、賀龍等專案，都是依據中央專案組所提供的材料定性的。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重要專案的最後仲裁完全取決於毛澤東。無論在專案迫害上還是保護解放老幹部上，都是毛作出決定，周恩來負責具體執行的模式。

一、中央專案組的發端與演變

中央專案組和中央文革小組不同，中央文革小組的活動和意見可以在媒體上顯著報道，而同樣是1966年5月在政治局會議上成立的中央專案組卻是秘密的，這個名字從未出現在媒體上。在中央專案組存在的13年時間裡，它行使的權力不僅遠遠大於一度存在過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和中央組織部，也遠遠大於中央的公、檢、法機構。它的成員在「文化大革命」中擁有的特權相當於列寧的「契卡」和希特勒的「蓋世太保」。如果說中央文革小組是「文化大革命」中煽起動亂的第一個環節，那麼，中央專案組則是最後一個環節，它負責為中央文革小組發起的行動作最後的定案。

中央專案組發端於專案審查委員會。而專案審查委員會來源於文革之初成立的一個處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臨時機構。在劉少奇主持的1966年的5月20號左右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會議決定成立對彭（真）、陸（定一）、楊（尚昆）和田（家英）的審查小組（王力稱之為四個人談話委員會），羅瑞卿由軍委處理，同時決定由周恩來總負責並且直接擔任專案委員會下的彭真專案組的組長。中央的專案審查委員會和軍委的審查工作都是由周恩來做統一佈置，例如召開專案會議等等。其他各個小組的情況是：陳伯達負責陸定一專案，康生負責楊尚昆專案，安子文負責田家英專案。陳伯達主管陸定一，後來轉給陶鑄繼而是謝富治接手。田家英自殺後，在這個臨時小組基礎上成立了政治局常委領導下的專案審查委員會（實際是向毛澤東負責），下設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四個組，專案審查委員會的主任是鄧小平。隨著文革的深入，此專案機構不僅對所謂的「四大家族」——彭、羅、陸、楊做調查，而且對其他的眾多人員做調查。隨著鬥爭的深入開展，專案委員會更名為中央專案組，而且制度化，變成一個半永久性的機構。

自1967年2月起，中央專案組的成員同中央文革碰頭會的成員相差無幾。中央專案組和中央文革小組不是一個組織，雖然名義上都是直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領導、人員組成上基本上也是同一套班子，二者實際上都是直接對毛澤東個人負責。但是中央文革小組是公開的，而中央專案組是秘密的，而後者直接掌握超過國家公檢法的權力，負責決定整人、揪斗、隔離、逮捕等等，超越於黨章和憲法，凌駕於黨組織和政法機構之上。中央文革小組名義上不具備公檢法的權力，但是也可以作出逮捕、關押某人的權力。這充分體現了某種體制特色。例如周恩來在接見財貿系統各部造反派代表時就可以當場宣佈逮捕財政部的某副部長。至於此時的周恩來是以何種身份下的命令，就很值得玩味。最重要的是，中央專案組和中央文革小組的起源、發展至結束都是不同的。

文革期間，中央專案組織同國務院一樣成為常設組織，但是更有權力。中央專案組的具體工作是由謝富治和汪東興負責，但是康生、江青覺得需要加強專案組骨幹力量。在林彪主持的常委擴大會上，決定從部隊調人進入專案組工作，於是大量軍隊人員被調入，包含李德生等人。最後專案組工作人員多達數千人，其中一度有789位來自解放軍的官員，126位解放軍軍官擔任專案委員會下屬的專案小組正副組長職務。

在1967年的秋天，專案委員會極度擴張，調查的案子數量大大增加，由解放軍空軍司令員吳法憲負責的「羅瑞卿專案組」就已經分成了至少三個小組，處理所有與羅有牽連的

案子。毛澤東和周恩來下令專案委員會分成兩個辦公室，就是後來俗稱的「一辦」和「二辦」。「一辦」由汪東興負責（即任主任），下屬多個專案組：例如彭真專案組、陸定一專案組、安子文專案組、胡耀邦專案組、李維漢專案組等，以及後來成立的劉少奇專案組、王光美專案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專案組、陶鑄專案組等，此專案組主要負責對中央國家機關的負責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區、直轄市的黨政負責人的專案審查。「二辦」和中央軍委掛鉤，由楊成武負責，楊成武倒台後由黃永勝負責，主要負責軍隊內部系統的高級將領的專案審查。例如彭德懷專案、羅瑞卿專案以及後來成立的賀龍專案等。

以賀龍專案組為例，該案為主案祖，下面設17個分案組，計有：總參的「王尚榮專案組」、「雷英夫專案組」、總政的「金如柏專案組」、「李貞專案組」、裝甲兵的「許光達專案組」、通信兵的「陳鶴橋專案組」、「樊哲祥專案組」、工程兵的「譚友林專案組」、北京軍區的「廖漢生專案組」、成都軍區的「黃新廷專案組」、「郭林祥專案組」、武漢軍區的「楊秀山專案組」、新疆軍區的「張仲翰專案組」、空軍的「成鈞專案組」、「向黑纓專案組」、國家體委的「榮高棠專案組」等。

1968年，「三辦」成立，主要負責公檢法系統領導幹部的專案，三辦的主任是謝富治。但是「三辦」開始成立的直接目的卻是調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三辦」後來也處理許多其他的案子，例如「抓叛徒專案組」。其中最出名的可能是「中國（馬列主義）共產黨案」，涉案的一個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在拷打下招認存在一個由朱德領導的中共的秘密「影子」，與國民黨、與蘇共、與蒙古共產黨有聯繫。還有康生的姨妹兼情人蘇枚的「謀殺案」（法醫的證據認為是自殺），此案導致99人遭迫害，其中9人入獄，23人被軟禁，3人被逼瘋，2人死於審訊者之手。

文革期間，為中央專案組服務，成為許多黨、政、軍機關的重點任務。1967年10月，中央專案組下又成立了一個專門的中央敵偽檔案清查組，而且在北京以外的18個城市由常設的分支專門就嫌疑人的政治歷史提供信息。1968年8月，謝富治下令清理公安部的全部檔案，為此解放軍抽調了700多人，花了18個月的時間才完成這項工作。

中央政治局曾一度考慮撤銷中央專案組，就像「九大」以後撤銷中央文革小組一樣，但是到了1969年，中央專案組變得太有用處而無法輕易撤銷。1970年，它又負責「審查」陳伯達的專案，一年後又有了林彪專案。1975年，中央曾經設想盡快結束專案，中央專案一辦、三辦和「五·一六」專案組隨即撤銷。但是最終撤銷中央專案組還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後，1978年12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這一決定。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它的最後一項任務是為毛以後的領導人處理「四人幫」專案。

二、周恩來是中央專案組的實際負責人

周恩來主持中央專案組的工作會議，參與其所有的立案調查活動，給予指示，批閱下面調查小組所提出的報告，並報告毛澤東。對外界來說，周恩來同中央專案組的關係並不明朗。但是在很多回憶錄中，仍然不免露出些蛛絲馬跡。李銳曾經這樣回憶：1967年8月間，北京專案組的幾個人，持中央辦公廳和公安部的介紹信來，要我交代同胡喬木、吳冷西和田家英的關係，特別是在廬山時的情況，並說專案組長是周恩來。曾任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書記處書記、自治區人民委員會第一副主席的武光回憶說：專案組的人員告訴他，武光專案組是在周恩來和康生同志直接領導下工作的。

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後，鄧小平受到批判，無法繼續工作，鄧小平把工作移交給康生，但是王力在《王力反思錄》中引述戚本禹的話表明，專案組的會議是周恩來主持的。實際上，此專案委員會及以後的中央專案組，都是由周恩來主持其日常工作並直接向毛澤東負責。實際上，決定成立什麼專案組、由誰分管、選派專案組工作人員，均是在周恩來主持的中央

文革碰頭會上，由周恩來親自提出，經大家討論同意，再由周恩來簽名報毛澤東、林彪批准。

例如在1967年10月8日，一張署名為「中國共產黨中央非常委員會」的傳單引起了中央高層的深切關注。傳單批評了毛澤東、林彪等，唯一對周恩來提出了表揚。周恩來接到此傳單後立即轉交給毛澤東。10月10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中央常委擴大會議，研究傳單問題。毛澤東在會上決定由周恩來負責組織破案。當天晚上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文革碰頭會，並指定陳伯達負責，謝富治和吳法憲參加。

由於中央專案組的極度擴張，從部隊抽調了一大批人員充實到專案組工作。所有的抽調人員在北京集合後，由周恩來帶領中央文革碰頭會的成員召集開會，說明任務的重要性，並佈置工作。周恩來每隔半個月就在人民大會堂的東大廳主持召開一次專案組全體工作人員會議，由每個專案組依次匯報工作。

為了配合中央專案組的工作，1967年春中央決定成立以周恩來為組長的幹部專案組，副組長是陳伯達，成員有江青、康生、謝富治、汪東興等人。下屬一個專案審查辦公室，由謝富治任主任，汪東興、戚本禹、嚴佑民、肖孟任副主任。辦公室的日常工作則由嚴、肖二人負責。

對於中央專案組的工作，周恩來規定甚嚴。凡上送的文件、材料，一定要寫上「已閱」、「請周總理批示」，簽上自己的名字，才予以發出。在中央專案組內部，對有關專案的材料，不論是下屬各組上報的，還是中央專案小組成員及其辦公室轉來的，都要及時傳遞。至於怎麼傳送及傳送範圍，都有嚴格規定，不允許個人擅自處理、扣壓。

對於調查工作中需要查閱檔案等事情，也要由周恩來最後決定是否可以。當事人回憶：1968年6月8日，我呈送了上任後的第一份報告：

永勝、法憲、葉群、作鵬同志：

為全面審查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鄧小平的歷史，需向中組部借閱鄧的檔案。

是否可以，請批示！

黃永勝閱後劃了個圈，在報告的天頭批：「呈總理、伯達、康生、江青同志批示。」

陳、江、康等均劃圈同意。五天後報告從周恩來辦公室批轉回來，右下角幾行飽滿的鋼筆字：「同意。但目前江青處，過幾天後再辦。周恩來。六月二十三日。」

由此可以斷定，吳法憲在其回憶錄中關於黃永勝對彭德懷專案的報告是同意上報而非同意該審查的結論的說法是正確的。

在八屆十二中全會前夕，高達88位中央委員因為「叛徒」或者「特務」等罪被中央專案組立案調查。每個專案組下設很多分組，這些小組曾經一度調查過1262位主要案犯和數目不詳的相關案犯。把這些罪行統統都扣在康生的頭上是不公正的。1968年9月24日，為了八屆十二中全會的順利召開，周恩來專門召開中央專案組會議。賀龍在這次會議上被定性為「歷史上搞叛變」、「現行中搞政變」的人物，許光達則是「反革命政變的黑干將」。對於所有中央專案組的專案對象的定性都是在這次會議上最後敲定。對於周恩來的工作成就，林彪在十二中全會上專門提出表揚：「專案的問題除文革的幾個同志以外，總理也是參加了的，也是領導的，是他們這些同志，專案小組的全體同志的努力，剝開了這個畫皮，使我們看出，照妖鏡把這些牛鬼蛇神照出來了。」

在「九·一三」之後，中央專案組重組，在1971年10月3號發出通知，成立由周恩來負責審查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的專案組。而受到林彪事件牽連的眾多人員銀鐐入獄，並無實質性的犯罪行為，當然這都是周恩來主持的「林陳反黨集團」專案組的「傑作」和「功勞」。

根據毛澤東決定盡快結束專案審查的意見，1975年2月底至3月初，臥病在床的周

恩來兩次約紀登奎、吳德、華國鋒談話，盡快結束專案審查。除與林彪集團有關的審查對象和其他少數人外，對絕大多數被關押受審查者予以釋放。許多官方文章對於周恩來在文革後期解放了許多被專案組審查的老幹部一事津津樂道，也有的拿出對周恩來有利的隻言片語作為證據，例如《周恩來年譜》記錄周恩來在1967年5月19日就專案組工作指示：要謹慎，要有證據，要有人證物證。然而這種證據所能證明的只是周恩來在中央專案組的地位。後期的幹部解放即使是周恩來的功勞，那麼周恩來也應當為專案組的倒行逆施負責！審查所謂「林彪集團」的專案審查是由周恩來總負責，同樣，審查劉少奇等人的工作也是由周恩來負責的。

在整個文革時期，整個專案組(包含中央和地方各層)調查過大約200萬個各級幹部。僅中央、國家機關副部長和地方副省長以上的高級幹部，被立案審查的即占總人數的75%左右。在審查中，濫用專政手段，大搞逼供信，製造了數以百萬計的冤假錯案，加上受牽連的親屬和有各種社會聯繫的人，全國被株連的群眾達1億人。涉及面如此之廣的最重要原因是周恩來授權群眾組織可以自己成立專案組。詳見下述。

長期以來，周恩來被認為是「大樹參天護英華」，和康生、江青等「迫害狂」極力打倒老幹部的形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是現在的材料表明，中央專案組是對黨政幹部進行迫害的主要法西斯機關。整個專案組都是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工作，領導和參與了「解放」一部分老幹部的工作，當然也參與了所謂「康生和江青的迫害活動」。不可否認，康生和江青有私慾的一面，但是周恩來對「五·一六」的窮追不捨，不也是私慾嗎？更主要的方面則是，康生、江青、周恩來等人實際上是一個共同戰鬥的團體，都在為中央(很大程度上就是為毛本人或者為毛的路線)工作，要對中央專案組所犯下的包括審訊、調查、逮捕和實施眾多法西斯行為共同承擔責任。所有提交給毛澤東的要求立案調查的人員名單，都是在周恩來主持的專案組會議上預先討論通過，也包含了周恩來對於眾多專案組所提交報告的評語以及專案組所討論通過的結論，這些評語和結論無一不是令人髮指、怵目驚心。如果將周恩來在毛澤東指示下所保護的部分人的工作同其領導下的整個中央專案組所迫害的老幹部對比，周恩來的保護無疑是黯然失色，微不足道的。

實際上，任何專案組的專案對象，群眾組織提出批鬥，都必須由周恩來批准。周恩來對譚震林在「二月逆流」之前一直是保護有加。但是「二月逆流」之後，不少群眾組織提出「炮轟譚震林。」首先是3月14日，周恩來的聯絡員董楓在財貿聯絡委員會上傳達了周恩來的意見：譚震林的問題同志們認為要搞就搞，由大家定。5月份，農林口的造反派提出要批鬥譚震林。6月13日，周恩來批示可以批鬥譚震林。蒯大富被採訪時就陳述當年他們提出批鬥王光美後，先後請示威本禹、江青、周恩來的過程，最後由周恩來通知他，中央批准這次批鬥，並用周的專車送王光美到清華接受批鬥。

周恩來在文革中多次誣陷薄一波是叛徒。不過，在薄一波因長期「監護」身體衰弱、危及生命時，周恩來指示將他送進醫院保護起來，救了他一命。以至後來薄一波說，如果沒有周的關懷，他也許早已被迫害死了。知情人講述，文革中被打倒的將帥能否入醫院治療，甚至是否可以開刀，都要經周親自批示。知情人亦講述了陳毅在治療上的失誤應由周恩來負責。可以說，相對於薄一波的幸運，周恩來製造了更多的不幸。

三、紅衛兵是周恩來抓叛徒的「衝鋒隊」

在調查的過程中，周恩來直接授權於紅衛兵可以進行調查取證，為其所主管的中央專案組服務。除此之外，周恩來對於紅衛兵的行動給以高度評價，例如周恩來對於學生搞出安子文是黑幫的材料和瞿秋白是叛徒的證據就大為讚賞。而紅衛兵也在報紙上舉出證據來表明周恩來對於他們的支持，並多次向周恩來致謝。天津南開大學「八一八」紅衛兵說：

〔(1967)一月中旬，我們再次寫了《關於搞劉少奇大叛徒集團的請示和報告》送給周總理、謝副總理和中央文革，同時又交給戚本禹同志一部分材料。其後，周總理及戚本禹同志和其他中央首長給予我們極大的關懷，並不斷給作重要指示。當總理知道我們過去上報的材料被大叛徒陶鑄等壞蛋扣壓了的時候，中央文革、國務院聯合接待站和總理值班室轉達了總理的指示：『總理叫你們把材料交來。』』 知情人講述南開大學紅衛兵組織「八一八」還寫信給周恩來要求得到指導，周恩來則寫回信表示大力支持和指點。

周恩來對於南開「衛東」紅衛兵組織多次給予指示和鼓勵。對於劉錫五「叛徒」一案，周恩來和康生的指示是：紅衛兵找劉錫五談，叫他談，老老實實的談，知道多少就談多少。1967年7月，周恩來和江青指示天津市革命籌備小組要大力支持衛東某專案的調查。周恩來還親自對衛東的工作做出具體批示：「此綫索很重要，要繼續搞下去。」

全國到處掀起的「揪叛徒」之風很難說與周恩來的這種鼓動和支持沒有關係。由群眾組織任意推倒中共組織對在白區工作過、被捕過的幹部作出的正確結論，重新審查，甚至刑訊逼供。而對於這種「揪叛徒」之風，現在都歸到康生一個人頭上。這是非常不公平的。

聶元梓在其回憶錄中專門寫了一小節來描述「周總理關於『揪叛徒』的批示」。聶元梓說：「還有，我們參與揪叛徒，也是需要澄清的一件事。現在是只說，北大揪叛徒是因為康生寫了條子，是受康生指示；其實呢，康生的條子我不知道（筆者註：此說法與聶元梓在同一書另一處所寫的有矛盾），我們是有周總理的批示，周總理同意我們就有關叛徒線索進行調查活動。」

對此，周恩來的態度不是一般的欣賞。周恩來說：「這次文化大革命紅衛兵小將查出一批叛徒，這是小將們的功勞，這是很大的收穫，我們向紅衛兵小將學習。」

在第一次揪彭德懷未果之後，周恩來則直接指示紅衛兵把彭德懷從四川揪回北京。

在外交部，周恩來指示：要結合批判劉少奇，把外交部幹部的歷史問題查清。根據此指示，外交部造反派聯絡站成立了一個紅色尖兵四連（簡稱「紅四連」），專門負責抓叛徒。幹部司的審干處配合了此項工作，把其掌握的幹部材料提供給「紅四連」開展抓叛徒的運動。1967年9月，外交部原副部長章漢夫就被當作叛徒被拘捕審查。

四、專案組的證據與周恩來的指導

專案組的調查取證和定性是根據當時的需求，特別是可以隨意更改。例如蔣南翔在文革之初所犯的罪行就有反對劉少奇的工作，而周恩來在1970年11月1號談蔣南翔問題的時候又明確表示蔣南翔在文革前是極力吹捧劉少奇。周恩來在「七二〇」事件之後為了表示對王力的特殊照顧和歡迎，特意告知早到北京上空的王力乘坐的專機盤旋以待周恩來專機先行降落，然後在機場組織歡迎王力的儀式，一如迎接英雄凱旋，但是後來周恩來卻表示王力是國民黨，他妻子是叛徒，而且扣上「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頭子的罪名。

中央專案組報告給毛澤東的材料是經過剪輯和精心選編的，作為負責向毛澤東匯報專案工作的周恩來無疑是非常清楚這些材料的不真實性。周恩來對下面專案組如何搜集證據和如何審訊應是知之甚詳的，因為每天專案組都把他們如何搜集證據等做成《動態情況反映》簡報報給周恩來等領導人。面對如此眾多有疑點而且是通過嚴刑拷打得來的供詞和證據，是不可以作為法律上的證據的，但是周恩來對此熟視無睹。例如在《劉少奇專案組》中，面對如此破綻百出的所謂劉少奇歷史問題罪證材料，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周恩來傳》如此為周恩來開脫，說他「不清楚江青一夥有意製造偽證，不掌握真實情況而最終相信了專案組的報告」。周恩來的判斷力也未免太低下了！以周恩來為首的陳伯達專案組給出的有關陳伯達罪行材料的證明，當時僅為一個普通工人的陳曉農（陳伯達之子）都看出其材料是經不起推敲的，何況周恩來了！作為一度是毛澤東上級的周恩來，在「反『反冒進』」之後再

也沒有在毛澤東面前直起過那根脊椎骨，對於毛要打倒的人，他總是可以遞上讓毛滿意的材料。

高默波對此質疑評論道：

「周恩來在文革中是各個專案組，包括劉少奇專案組的總負責人。劉是在『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下被開除出黨的。從現在的觀點來看，這些罪名是可笑的。可在那個時候，問題不那麼簡單。劉少奇專案組花了很多時間和人力去收集指控劉少奇的證據。作為所有專案組的總負責人，對劉少奇調查的結論得先通過周恩來的批准才能送報毛澤東作最後首肯。據王年一說，送給毛澤東看的只有證明劉少奇有罪的『人證物證』，而證明劉少奇沒有罪的人證和物證卻沒有送給毛澤東看。為什麼沒送呢？周恩來不知道嗎？如果周恩來知道有反證材料而不送，那只有兩種可能性。一是周恩來相信劉少奇真犯了這些罪。另一種可能是，他不相信，但是他覺得毛澤東或是江青要栽贓劉少奇，他必須照毛澤東或是江青的意圖做。否則的話，周恩來可以有很多辦法來保護劉少奇。他可以把反證材料送給毛澤東。他也可以要求在專案組人員提出更可信的證據以前不下結論。他甚至可以用手續不全，證據不充份或方法不對頭為由把劉的專案調查停下來。他也可以直接跟毛說，劉少奇有路線錯誤可以打倒，但說他是叛徒，內奸和工賊是捏造。如果周恩來這麼做，他當然有冒犯毛澤東的危險。但不論從良心上來說還是從中共的利益來說這個風險都是應該冒的。」

周恩來還把成立專案權下放給造反派。1967年1月份奪權興起之後，周恩來曾經這樣說：「黑材料要集中起來，搞個目錄，以後集中燒燬。處理材料問題還沒有一個好的典型，為黑材料爭論不休，費了不少精力。造反派在奪權以後，可以找幾個人成立專案處理，處理材料是極其複雜的，黑材料一定要封存起來，中央決定嘛！現在奪權中大的事情很多，不要陷入到這裡邊去，否則就成了文牘主義了，只有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有價值的材料才拿出來。不鑽在材料裡把大方向轉移了。毛主席過去受打擊，現在事情都清楚，至於過去，誰說了什麼話，誰搞了什麼材料，主席才不管這些呢！大家不要陷在片紙隻字中，妨礙了大方向。雖然也不是不重要，弄幾個人搞專案，不要都陷在這裡，檔案不可沒有，不可太多。」此舉為各造反派成立專案審查、迫害對立面提供了依據。

周恩來在談及衛生部孫正專案的時候，指出：（1）孫正專案組的報告，要罪狀定實，不定實就不行，不落實就不行。罪狀的落實主要是看情節，例如叫嚷「無產階級司令部也可以炮打」，抓住這句話就可以鬥他。（2）定案，要說得準，很清楚。要穩准狠。劉少奇不過只抓了他三件大事。

周恩來所說的三件大事，就是指「叛徒」、「內奸」、「工賊」這三頂帽子。單是一個「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不夠給劉少奇定罪的，因此要能夠滿足毛澤東徹底打倒劉少奇的願望，周恩來主持的中央專案組（同時周恩來也是劉少奇專案組組長）不得不另行謀策並最終提供了證據。依靠這些證據，1968年10月，題名「劉少奇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被捕叛變、投降敵人、充當內奸、工賊的反革命罪行」的審查報告，通過中發（68）152號、中發（68）155號文件，下達全黨、全國。同時發佈的中共中央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說：「這個報告以充分的證據查明：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是一個埋藏在黨內的叛徒、內奸、工賊，是罪惡累累的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

周恩來在1969年「九大」期間以摧毀「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來證明文革「是完全必要的」。周恩來說：「如果不是毛主席親自倡導，並發動群眾進行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就不能摧毀，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就會像毛主席很早就指出的那樣，『那就不要很多時間了，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面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的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

官方強調的周恩來內心是不同意的、痛苦的，其妻子強調的他是為了服從大局。這些說法都無法為周恩來洗脫罪名。周恩來的內心無人知道，但是客觀的所作所為都已經被歷史無情地記錄下來。

第二部分 第五章

「周恩來保人」的真相

在中共官方的文革史中、在不少當事人的回憶錄中都認為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保人」的，保護了大量的幹部和群眾，而所有的迫害幹部群眾的壞事都是「林彪、四人幫」干的。甚至有人認為即使毛澤東要「打倒」的一些人，周恩來也總是加以保護。但是，歷史的真相並非如此。

在文革發動過程中，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關係是「君主」與「臣僕」的關係。這種關係不僅體現在毛澤東摧毀原一線工作的官僚機構上，也體現在毛澤東對於幹部的保護與解放上。對於毛澤東要迫害的對象，周恩來是親而為之，絲毫沒有半點的憐憫。同時，在實施的過程中，周恩來也有自己獨特的一面，從而留下了「大樹參天護英華」的說法。

在這一章裡，我們要描述和分析「周恩來保人」的真相。在以下的幾章裡，我們將針對劉少奇、陳毅、彭德懷、賀龍的個案加以分析。

一、保護與解放老幹部：真正起決定作用的是毛澤東

在文革發動的早期，如果沒有毛澤東的同意，《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絕對不可能出台，但是沒有周恩來的支持，該文就很難在大範圍順利轉發。無論是1966年初批判彭真，還是9月份保護蒯大富那樣的造反學生，12月保護中央文革小組，以及在1967年的「二月逆流」主持對老幹部的批判，以至隨著文革的深入開展，上至國家主席下至普通百姓的整肅，毛、周的關係都是如此。

即：毛澤東是決定者，周恩來是執行者。

對於文革當中對於老幹部的保護與解放，周恩來同毛澤東的關係也是如此。據不完全統計，從1966年至1975年，毛澤東談話涉及到保護老幹部的多達35次。在「十大」選舉前夕，毛澤東又親自宣佈解放包括曾希聖等13名同級別幹部。1975年3月至8月，毛澤東又批准幾個專案組關押的老幹部釋放350人。

1967年2月6日，毛澤東提出徐向前、江華、江渭清、楊尚奎、劉俊秀、譚啟龍等人都要保。依據毛澤東意見，周恩來指示譚震林、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兩次寫報告給周恩來，建議把葉飛、譚啟龍、張平化等人接到北京。2月8日，周恩來將報告轉交給毛。毛批示同意後，周恩來採取措施，把江華等人用飛機接至北京。

更能體現周恩來在保人一事上的則是被大陸官方黨史界所津津樂道的周恩來所開列的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章士釗在1966年8月30日致信毛澤東反映8月29日晚被抄家的情況，請求毛澤東幫助。毛澤東閱後批示：「送總理酌處，應當予以保護。」周恩來當即辦理，並於八月三十日下午二時在信封上批註：「已辦。周注」。同時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開列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鮮為人知的則是，早在8月27日，周恩來就已經收到到章士釗要求保護的信，但是並沒有採取什麼措施，導致章在8月29日被紅衛兵抄家。從中完全可以看出周恩來在保人一事上的局限性，如果沒有毛的首肯，周恩來是不可能有什麼舉措的。對於這一點，周恩來也是公開承認的。

周恩來在1967年1月29日接見北京軍區幾個革命組織時說：我保了多少人，劉少奇、鄧小平、王光美……我還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2月11日，對於王任重問題，周恩來說：「王任重的病很厲害，毛主席叫我找王任重回來休養一個時期再批判。我找了十天都找不見，昨天我才給軍區下命令限時間……主席命令我親自打電話，要找王任重，有一些人還不相信，這樣自由主義就氾濫到邊緣了。王任重要是死了，主席找我，我怎麼回答？……我這樣說，並不是保王任重。如果傳出去，有人又給我貼大字報，說我保王任重，那我也不怕。」1968年10月16日，周恩來在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第六小組會議上說：「我在這次運動中也沒有經驗，關鍵是對待群眾的態度。對群眾的態度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工作會議毛主席講了的，但有些人回去就是怕群眾。不僅是部長，我還奉命把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找到北京來，當時黃火青、歐陽欽、譚啟龍、江華、張平化、韋國清、楊尚奎、劉俊秀、葉飛、江渭清、張體學等不少人，叫他們自己反省錯誤。我有事不能去，叫譚震林、李先念同志找他們談。在中南海，譚震林、李先念、李富春、余秋裡、谷牧他們在一起開會，軍隊方面有徐向前、聶榮臻，有情緒，主席指示我保的最多，余秋裡、谷牧、部長們十多位。余秋裡被抓後，我去報告主席，主席交代我保他。」

王力說：「具體的人都還是毛主席決定要保的。有時是總理出面，有時是別人出面，總理出面的比較多。都打倒了，毛主席也不高興。有些人一定要保，包括幾位副總理。當時決定不保的只是一個薄一波，其他都要保。元帥中只有一個賀龍不保。（指1967年初的情況一筆者註）。」王力還說：「當時保護軍事機關不許亂衝擊，有些人中央要保，不光保邱會作，到處去保。凡是被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受到衝擊，無一不去保。中央文革也去保，這是毛主席定的。」王力由說：「打倒人的罪狀都歸於毛澤東，保人的功勞都歸周總理，這不符合歷史。據我所知，所有保的人都是毛澤東決定，周恩來執行。毛澤東不決定，周恩來不敢也不能去做，重要幹部他不能決定。」1967年7月18日，毛澤東對周恩來說：「趙紫陽、張平化、劉子厚、張體學……都要保。都給打倒了，打倒那麼多，我也不高興。」

文革中後期，老幹部的解放也是毛澤東決定後，由周恩來去執行的。劉志堅的解放就是因為先由許世友提起，毛澤東點頭。而解放劉志堅的工作由周恩來來做。在國慶25週年之前，即1974年9月28日，中央政治局對出席國慶招待會名單進行討論時，周恩來提出：「遵照主席精神，再加劉志堅一人。」洪學智也是因為毛澤東向周恩來發問：「洪學智現在搞到哪裡去了？」才導致洪學智自農場解放出來。類似的情況還有張聞天、江渭清等人。

二、周恩來的保人特色面面觀

1. 黑幫、黑線

根據《周恩來年譜》，周恩來在8月份討論《十六條》的過程中，周恩來與陶鑄商量後，刪掉了原稿中「黑幫」、「黑線」一類用詞，加寫了一些限制性的條文。周恩來又在9月10日首都大中學校紅衛兵代表第二次座談會上說：一些領導機關，領導同志犯了錯誤，但不是一切黨政機關都犯了方向路線錯誤，都是黑幫、黑線、保皇派。黑幫、黑線這些詞早就不用了。

這不是歷史的事實。周恩來在隨後的一系列講話中，「黑幫」、「黑線」滿口飛。試舉幾例，8月22日周恩來在清華大學萬人大會上說：我上次講了，因為前市委由黑幫統治著北京市各個部門、各個學校，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初期很迅速地採取的辦法。那麼，我們的辦法可以有兩種，一種是派出工作組，把黑幫的或者懷疑是黑幫的，或者懷疑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那些分子的權奪過來。10月3日，周恩來對參加國慶觀禮的全國紅衛兵代表的

講話。周恩來說：「黑幫是指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主席的集團，搞陰謀活動，像前北京市委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彭真、劉仁在全國總是極少數的，大多數不是這樣的性質，而是犯了方向性路線性錯誤，這種可能大。」周恩來又說：「被批判的領導，要敢於接受批評，對的就接受，不能模稜兩可。群眾問是不是革命的，是不是黑幫，你要回答。有人說：『你去調查好了！』連是不是黑幫、是不是革命的你都不敢回答，這樣群眾就更懷疑了。這個你要回答。你的行動作的對不對，要由群眾來鑒定。有錯誤就承認，是黑幫就低頭。」

2. 廖承誌的個例和周恩來對「親者」的拋棄

在國家僑委的兩個主要負責人廖承志和方方。周為了保廖，便在1967年1月3日近萬人的「奪取僑務界文化大革命新勝利誓師大會」上公開煽動打倒方，並作了如下異乎尋常的發言：「我同意你們提出的要打倒中僑委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你們挖掘出來的這個代表人物很對，是誰？是方方。我現在供給你們一份材料：在去年文化大革命當中，已經有人揭發，方方與香港的資產階級代理人商訂的大量寄去我們國內的所謂風景片子，實際上是照了我們許多的地面和建築物，簡直是把我們山河出賣給外國的反動派」。宋永毅先生對此評論道：今天再看這樣的發言，真會感到已不是什麼「上綱上線」，而跡近「天方夜譚」。因為以周為貴一國總理之尊，竟然會把風景片和間諜活動混為一談！

事實上上方方（是原南方局時期直接領導的南委負責人）和廖承誌都和周恩來有著密切的聯繫，唯一不同的是廖承誌和周恩來具有非血緣關係的家庭世交，而且其母何香凝更是中共重要的統戰對象。如果考察文革中被周恩來點名「拋出」的人，很多都是周恩來的老部下，有的甚至長達幾十年。有據可查的就有：國家體委榮高棠、外交部陳家康、中央調查部部長孔原、學部的潘梓年、親自下令逮捕衛士長成元功、自己的幹女兒孫維世等人。

周恩來在接見衛生系統有關代表的講話有過一個精彩的講話：

總理說：關於抓「五?一六」問題，我過去講過四條意見：

第二條，如果發現哪個組織有壞人、有黑手，就告訴那個組織，由那個組織自己抓。農口如秦化龍問題是我第一個告訴他們的。批判譚振林時結合秦化龍，不僅是「五?一六」還是叛徒，就跟他們講了，經委陳大倫，駱風，經濟研究的編輯駱風，民族所洪濤，統戰部劉郢，他們都是本組織揪出來的，知道有黑手就告訴他。

第四條，吳傳啟，他目的是搞垮無產階級司令部，他是國民黨，從十一月份搞了我的黑材料，我都不看。我看他怎麼暴露。潘梓年是個叛徒。反對派接見時，那一派問我，我沒明確說，讓他暴露，我要說的話，就切斷聯繫了。他們抱得緊緊的，一個跑到江蘇太湖，一個跑到山西河北交界地方。

在衛生系統，吳傳啟就是通過葉心清來搞，他是個江湖醫生。

周恩来还说过：

農口的批譚聯絡站原來保秦化龍，我提醒了他們，他們後來把秦化龍扭送了。一追查是「五?一六」的頭子之一。對劉郢、×濤、駱風、陳大倫也是同樣的辦法。這個辦法很好，不傷害群眾彼此的感情。

周恩來在大會上或者接見群眾組織等各種場合時點名的有，上至國家主席、黨、政、軍幹部下至普通百姓，依筆者所見到資料，有據可查的超過200多人，材料表明周恩來點名的人數遠遠超過康生、江青等人。（筆者註：周恩來在接見群眾組織時，經常点名，被点名者往往沒有好下場。筆者所看到的資料包括有：除了常見的例如有宋永毅主編的112卷紅衛兵報刊以及《周恩來文革講話集（1966—1976）》等，還有不常見的周良霄夫婦編輯的文革資料集、《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彙編》等，特別要提到的是由洛杉磯「中文出版社服務中心」《中共重要歷史文獻資料彙編》，我通過加州大學圖書館的「貸書」功能借閱，幾乎

把全套都借全了。此套資料非常珍貴和稀缺。)被周恩來點名的人幾乎全部遭到厄運(有的是遭到厄運之後被點名,有的是被周恩來點名之後遭到厄運),有的還被折磨致死,例如上述的被周恩來點名之後的衛生部一老中醫葉心清(曾為他和許多貴賓看過病)被他斥為「江湖醫生」、「五?一六」,抓進監獄後折磨致死。

3. 看毛澤東的臉色行事

丁凱文先生認為:周恩來在文革中對黨內的老幹部的態度基本上是看毛澤東的臉色行事。例如在文革剛剛開始時,劉鄧等人尚未徹底倒台時,毛澤東只是先揪出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和楊尚昆等人,黨內鬥爭的焦點也主要集中在「彭羅陸楊」幾個人身上。對於這些已被打倒的人,周恩來是持嚴厲批判的態度。

1966年10月3日周恩來對參加國慶觀禮的全國紅衛兵代表發表講話時談到彭真,周說「他長期執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路線,更主要的是他是兩面派……從現在揭露的看,彭真是一個反黨、反毛主席的分子。」11月28日周恩來在文藝界大會上談及文藝團體時說「我們的文藝團體,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化大革命的重點單位之一。過去長期在彭真、陸定一、周揚、林默涵、夏衍、田漢、陽翰笙等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統治下……我們一定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堅決把一小撮盤踞在文藝界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統統揭露出來,把他們斗倒、斗臭、鬥垮。」1967年10月7日周恩來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談到陸定一時說陸「三二年就叛變了,也是叛徒。」

陸定一隨後被關進秦城監獄。陸定一後來曾痛苦地回憶了自己的這段經歷,陸說「1967年10月9日這天,我被捕了。連續三天,有九個人審訊我。動了刑,沒有結果。就給我上手銬,刺進皮肉,很痛。接著又拷打,又上刑。他們根本不問我,也不問彭、羅、陸、楊的關係,硬給我加上叛徒、特務、階級異己分子的帽子,逼我招供。我受不了酷刑,人都快要死了,就按他們要的『招供』!從此,我就胡說八道。說什麼假話,他們都愛聽。他們愛聽什麼,我就說什麼假話。不說怎麼辦?死不了,就得說假話。黨內有些人就愛聽假話。口子一開,堵不住了。我就按他們要的,寫了假口供。接著,他們就把我送進監獄。」從陸定一的這段回憶,我們絲毫看不到周恩來「大樹參天護英華」的「光輝」形象。

余秋裡是毛點名搞小計委的。由此周恩來對余秋裡的態度是不同的。與余秋裡相對應的是薄一波,而薄是被認為劉少奇線上的。周恩來採取了保余秋裡拉薄一波來當替死鬼的策略。

1966年10月29日,戚本禹、余秋裡接見北京師範大學「井岡山」時,戚本禹宣讀了陳伯達的一封信:

同學們:

同學們發現石油展覽館的佈置有政治問題是對的,我贊成你們的意見。我本來打算同余秋裡同志來會見你們,因為我有事情不能來,特請戚本禹,余秋裡兩同志來給同學們說明展覽館佈置的責任問題。據我瞭解責任不在石油部,而在工交口陶魯筋同志,要陶魯筋檢討。謹此問好。

王力說,這是周總理參加決定的方針,保余秋裡,保石油部,拋出薄一波、陶魯筋。

1967年1月26日,周恩來接見工交口革命造反派代表時這樣講述余秋裡和薄一波:「批判薄一波、陶魯筋的鬥爭至今沒有展開,學校將薄一波抓回來後沒有示眾,都鬥爭薄一波,但不揭發,薄一波領導財經十七年,一九五三年那麼多人批判,為什麼現在批判不起來?

抓彭、陸、羅、楊不怎麼困難，為什麼抓薄一波那麼困難？今天工交口都在場，這個問題值得深思。薄一波管工交各部幾年，工交口成立黨委，管各部黨組，黨委，部長。管得很深，為什麼各部揭發得很少？」「余秋裡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錯誤，但性質與薄一波不同。他認識是誠懇的，檢討六次，心臟病復發現在還沒好，我們需要他，黨中央需要他，他是從小當兵起來的，你們看身上傷就知道了。他不是吃老本，靠老資格，這幾年有新的創造，是部長，委主任一級的標兵，主席幾次都要保。你們那天把他揪到中南海門口，那時我們有幾件急事，我報告了主席，主席再次提出要保余秋裡。我不是拿主席壓你們，我保這個，保那個，那是黨中央決定的，我不是個人行動，向你們說清楚。對薄一波恨不起來，也許是我們下的功夫不夠，所以我們準備把部長集中起來背靠背揭發。

薄一波寫信質問黨中央說他是政治局委員，副總理，為什麼把他揪回來，別的人還沒有向黨中央寫過這樣的信。」

另外一個鮮明的對比是武光和王恩茂的例子。

當時的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書記處書記、自治區人民委員會第一副主席武光，新疆的造反派和首都紅衛兵中著名的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等都認定他是革命幹部。但是由於歷史的原因，武光是王光美的入黨介紹人。1967年3月21日，毛澤東同意調查劉少奇的歷史問題。3月26日，周恩來就認定武光是壞人。武光參與了石河子的武鬥事件，居心不良。武光隨後受到批鬥，是當地的紅衛兵把武光將他救出新疆，送到北京，繼而武光遷入北航校內受到保護。但是一旦「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中央專案組為了打倒劉少奇的需要，炮製「劉仁與武光將王光美打入我軍調部」冤案，把武光定為「叛徒」，在周恩來和康生的嚴令下，北航紅旗也不得不乖乖交出武光並立即與之「劃清界限」。11月22日，周恩來下令一監護的名義逮捕武光。從此武光受盡了折磨，「林彪事件」之後處境並沒有得到改善，直到文革結束。

而另一位新疆領導人王恩茂（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第一書記，新疆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兼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一政委），新疆造反派和首都三司等紅衛兵都堅決要打倒他，但是毛澤東始終沒有同意，周恩來就再三給造反派做工作，宣稱王恩茂是人民內部矛盾，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時將他安排為副主任。但是新疆造反派仍然要想打倒他，自治區革委會甚至發起批判王恩茂的「宗派主義、山頭主義、獨立王國」問題。中共「九大」前夕，1969年1月12日，周恩來按照毛澤東的意圖為中央起草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革委會電報，明確指示：「新疆自治區出席九大的代表應包括王恩茂同志在內。……如說服黨員幹部和黨內外革命群眾需要時間才能選出，可先將王恩茂同志全家送來北京，以便繼續工作。」經毛澤東批准，王恩茂全家由專機接往北京，他被安排出席中共「九大」並「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

4. 點點滴滴

如果說因為毛澤東的臉色，還有點組織性為周恩來辯解的話，那麼另外一些活生生的案例更能體現出周恩來本質。

早在建國不久後發生的「潘漢年反革命事件」，周恩來對應潘漢年的所謂歷史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並沒有為潘漢年說話，只有李克農孤軍作戰。

同樣，在1967年發生在外交部的所謂「失密事件」，周恩來也是知道這是當時中央文革和外交部之間的工作聯繫，也沒有查出什麼幕後活動。但是到而來清查「五·一六」時，此事卻變成了大案，是陰謀策劃，洩露國家機密，為帝、修、反送情報，逼有關人員承認是「五·一六」分子。因為清查「五·一六」分子而受到迫害的馬繼森、黃祖轅等人寫信給周，都是石沉大海。

有幸得到周恩來關注的原外交部幹部陳讓山，在得知陳是因為說：毛主席被壞人包圍，江青是個小電影演員，陳伯達當個縣委書記也不夠格等條罪狀被迫害之後，就啞口無聲了。

作為賀龍線上的許光達，在經歷了極其殘忍的折磨批鬥之後，要求周恩來派人來同許光達談一次話。信是傳到了周恩來的手裡，但是至死都沒有人來同許光達談話。

當事人回憶羅瑞卿自殺的情況時說：我到時大致十一點多，十二點羅瑞卿跳樓了，我正在現場。唉！羅瑞卿是中午正十二點跳下來的，他住的是一個樓，有三層，那個時候，他日夜睡不著覺。他把衣服脫到二樓，從三樓往下跳的時候就穿了一個襯衣跳下去。他是直著跳下來的，就是站著跳下來的，腿一下子就完了。最後我們工作人員和警衛班就往屋裡抬，把羅瑞卿抬進屋裡去，然後一層一層報告，向軍委報告，向中央報告，你得治呀，還得請示批准，上哪個醫院，一直拖了四個小時沒人管。跳下去四個小時沒人管啊！這幾件事，我現在想起來，真難受啊。我就想到，咱們的國家怎麼這樣呢，羅瑞卿這樣一個元勳怎麼受到這樣的待遇，遭受這樣的結果呢。

無獨有偶的是，賀龍在被緊急送到醫院的時候，據知情人講述，也是報告很快送到周恩來手裡，但是遲遲沒有回音。

如果是小人物，或者是壞蛋，周恩來就連理都不理了。聶紺弩被捕之後，其妻周穎多次致信周恩來要求探監，卻絲毫沒有回音。

三、假象或隱情

張愛萍之子張勝說：「說到我父親和周恩來的關係，『文革』中，父親被批判、被審查、被關押，都有周恩來的簽字，他在絕望中，曾幾次給周恩來寫信申訴，但都石沉大海。但不知為什麼，和黨內很多老同志一樣，父親心裡一直認為，在中央高層，只有周恩來才是瞭解他的，他沒有能為自己說話，那是他確實有了難處。他真的不怪他，只能是自己認命了。在『文革』被打人死牢最絕望的時刻，他想到周恩來，黨內還有一個清廉正直的人在，就會在心中殘留下一絲希冀，即使那只是一種幻覺。」

為什麼很多人對周恩來抱有這種幻覺？

陳伯達回憶：（找毛，毛不見）因覺得康生和毛主席關係比較好，又硬著頭皮打電話給康生，想請他幫忙疏通一下。康生不接。要曹軼歐接，她也不接。當我打電話給恩來同志時，恩來同志的秘書我稍等。不一會兒，恩來同志來接電話了。他說，本來事情或許還可緩和，汪東興把那個語錄一交出去，就沒有辦法了。他說話的口氣是親切的，這是我終生難忘的。然而事實上，此語錄是周恩來從吳法憲手裡要去，再給毛的。在周恩來安慰陳伯達的時候，周正在按照毛澤東的部署對陳伯達下手呢！周恩來曾經點評林彪是「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現在看來，此話對於周恩來才是最適合不過，也恰恰是絕妙的諷刺。

1962年北戴河會議上習仲勳因為《劉志丹》小說被批判。習仲勳回憶說：「我正在陷入極端苦惱的境地中，恩來同志親切的握著我的手，語重心長地說：『黨中央和毛主席』對你是信任的，讓你代表政府做了許多工作，即使出了《劉志丹》小說這個問題，錯了就改嘛。我們還是朋友，千萬不要有一念之差。」習仲勳繼續說：「這包含著黨的溫暖和階級友愛的語言，感動得我忍不住流出了眼淚。」

誠心而論，作為國務院秘書長的習仲勳，是周恩來手底下工作時間近十年、可依賴的工作人員。周恩來處了這幾句不痛不癢、貌似關心、但絲毫沒有喪失革命立場的「外交辭令」之外，絲毫無意為習仲勳去洗脫罪名或者辯護。

但是想像到當時的政治環境，被中共這個天下最無情最勢利的絞肉機所絞殺的任何一個人，無論你前一天多有權勢，一旦被打倒，則是鬼都不上門，恍如剎那間掉進了冰窟去，到處只見一片白眼，冤枉挨整也是哭訴無門。例如彭真一倒霉，押送其回京的李雪峰和宋任窮

一路上「無話可講。」甚至昨天還是「親密戰友」，今天翻臉便是生死大仇，以便體現堅定的革命立場。

正是這種無比殘酷無情險惡的政治環境，反襯出了周難得的「人情味」。周恩來一面在會上跟著贏家痛打落水狗，過後又打電話或接電話，輕描淡寫地寬慰兩句受害人。也正如王光美說的：在電話被撤的前兩天的深夜，總理給我打電話，說：「光美呀，要經得起考驗。」我一聽是總理，很感動。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只說了一句：「總理，你真好。」但是這並不妨礙周恩來在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向中共中央報送的《關於王光美特務罪行的審查報告》上批示「應予判刑」。周正是這樣，一方面對周圍同事總是表現出充滿人情味的溫情，往往關懷備至，似乎通情達理；另一方面，他對毛又是無條件的忠實，當任何個人與毛髮生衝突時，他均會不問是非的站在毛的一邊，非常熟練的對毛要整的人冷酷的加以處置。

由此可以理解張愛萍、陳伯達、習仲勳的認識，或者他們擺脫不了那個時代的局限性，或者是他們也有說不出口的隱情。

第二部分 第六章

劉少奇的冤案與周的參與

毛澤東無意在文革之初就打倒周恩來，而是利用周恩來與劉少奇之間的矛盾，使周恩來稱為自己手中倒劉的利劍。建國之後，周恩來一直受到劉少奇、鄧小平的打壓、排擠。另一方面，毛澤東要「燒」一下周恩來的策略又促使周恩來附和毛澤東展開打倒劉的戰役。這也是為什麼周恩來明明清楚劉少奇的歷史、明明知道劉少奇一案是冤案、假案，根本不會為劉少奇辯誣的原因之一。

一、支持毛把劉少奇拉下馬

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劉少奇從黨內排名第二降到了第八，失去原有的接班人地位。林彪上升的第二位，成為新的接班人。在這個過程中，周恩來對毛、林的決定性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

當毛沒有表示要徹底打倒劉少奇，並作出種種承諾時，周恩來也是跟著表態，反對將劉的問題公開化。毛對劉的檢查有所好評時，周也就沒有提出任何意見。但一旦成立劉的專案，周則做出種種落石下井式的舉動，並出任「劉少奇專案審查小組」組長一職，為整倒劉少奇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此間周恩來的種種行為完全是周忠於毛氏文革路線的明證。

1966年8月4日，劉少奇和毛澤東當面爭執。李雪峰回憶：兩位黨的領袖為派工作組的問題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我們在場的人誰都不敢吭聲，感到驚心動魄。

當晚，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通知劉少奇不要再出面會見外賓。八屆十一中全會，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被拿掉，但是毛澤東說：要保劉少奇過關。

根據毛澤東意見，劉少奇按照毛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的口徑寫了檢討。9月14日，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檢討提綱批示到：「少奇同志：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後半段更好。」同時毛澤東建議劉少奇把檢討送給政治局、書記處等同志討論。劉少奇當日把毛的批示和檢討提綱送給周恩來。劉少奇致信周恩來告知毛的意見並提出「主席的批語也印發」。周恩來向毛請示之後，將劉少奇的檢討稿批送有關人員提意見。周恩來本人並沒有提出任何修改意見。10月23日，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做了檢討。

就在這次10月中央工作會議上，毛說：「也不能完全怪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他

們兩個同志犯錯誤也有原因。」「對劉、鄧要准許革命，准許改。說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對少奇同志不能一筆抹殺。」「劉、鄧的大字報貼到街上不好」並且在10月25日，毛澤東表態說：「北京的問題，到現在可以說基本解決。」周恩來在此前後也是多次禁止把劉少奇的事情公開化。10月12日，周恩來就清華大學紅衛兵以發「請帖」名義要王光美去清華參加批判會事批告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轉陳伯達、康生、江青等：「我準備派人去錄音，帶回給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參加會議。」10月19日，周恩來約陶鑄、童小鵬、周榮鑫等談話，佈置勸阻哈爾濱工業大學師生去天安門張貼批劉少奇的大字報。此日，周恩來又接見哈爾濱工業大學紅衛兵代表，告誡他們不要去天安門張貼批劉少奇的大字報，並派周榮鑫和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派人分頭去做勸說北京地質學院和北京航空學院學生不要召開針對劉少奇、鄧小平的「誓死保衛毛主席」大會。

在12月18日以前，毛澤東在此時表現出來的還是：對於劉少奇的問題要在黨內解決。毛澤東還派陳伯達去制止北大公開張貼劉少奇的大字報。江青在12月18日回答紅衛兵一司關於劉少奇問題時表示：劉少奇和鄧小平是黨內的問題，中央可以解決。但是江青同時表示原因是：「現在搞他們不適合，不策略。對於他們在黨內、黨外的影響，群眾還需要一個認識過程。」事實上也是如此，就在12月15—18日之間，王光美專案組成立。

而在12月27日前幾天，毛澤東表示：對劉少奇可以公開批判，但是要背對背，不能面對面的鬥爭。12月31日，周恩來同清華大學造反派頭頭蒯大富等談話。指出：主席不同意讓王光美回清華檢查，你們可以把你們要問的問題提綱給我，讓她回答問題。針對有人提出劉少奇的問題是屬於敵我矛盾，說：我不這樣看，不能把你們的看法強加於我。你們不要把「打倒劉少奇」的口號貼到天安門去。因此當1月初，北京建工學院兩派紅衛兵要搞聯合行動到中南海揪劉少奇。毛澤東批告周恩來：我看還是不宜去講。請你向學生方面作些工作。周恩來在7日凌晨找該校兩派談話，說：「你們可以送大字報，要揪不行，要照顧黨和國家的影響。」此事表明周恩來對於毛澤東的指示是完全加以執行的！即可以公開批判，可以貼大字報了，但是不能面對面的鬥爭。

1月6日，周恩來得知蒯大富為首的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把王光美騙出中南海後，立即派秘書孫岳趕至清華大學要回王光美，並打電話催蒯大富放人。7日，周恩來接見七機部造反派時批評騙揪王光美行動：斗王光美不僅是她一個人的問題，十一中全會以後，要看一段時間，不要擴大這個問題，這是毛主席、政治局的意見。

實際上如果沒有周恩來的點頭，公開批判王光美，面對面的鬥爭是不可能的。王廣宇回憶：1967年4月10日，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在清華園召開有30萬人參加的批鬥王光美和彭真、陸定一、羅瑞卿、薄一波等人的大會。但是要用王光美出國時穿的衣服來侮辱她，需要到王光美家裡把衣服拿出來。然而關鋒說：王光美家裡的東西需要周總理批准才能取。王廣宇又說：周總理開始時不贊成這麼做，認為用這種方式讓她參加批鬥會不好。但是在場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紛紛表示支持群眾的「要求」，即要給王光美穿出國的衣服。周總理無奈，只好同意讓小潘等人去王光美家取她出國穿的衣服和行頭。周總理最後說：「你們一定要堅持給她穿，能給她穿上就穿吧！」但是周恩來為什麼就不能堅持原則呢？當時保陳毅的時候，周恩來不是說誰要攔截陳毅的汽車，我馬上挺身而出！你們誰要衝擊會場，我就站在人民大會堂門口，讓你們從我的身上踏過去！兩下對比，相差遠矣。

在1967年的1月17日，毛澤東在會見一位外國共產黨領導人時，在談話中提到劉少奇時，仍稱「劉少奇同志」，並且說「劉、鄧是不是能選上（註：指中央委員），我的意見還是應該選上。」2月12日至18日，毛澤東在同張春橋、姚文元的三次談話中也說，劉少奇在「九大」還是要選他當中央委員。因此在1967年1月8日，當有造反派呼「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口號時，周恩來當即背過身去以示抗議，說：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決定上，他們兩位還是黨中央常委。批判可以背靠背，不要用揪斗的方法。

對於這段時期的保護劉少奇的行動，周恩來在1967年3月21日對務院財貿系統革命造反派解釋說：「你們要揪劉少奇出來鬥，當時也不是我一個人保，我對他有什麼好感？你們要考慮我的地位嘛！」

二、協助毛把劉少奇置於死地

但是事情在1967年3月起了變化。3月21日，毛澤東同意調查劉少奇的歷史問題。黃錚說：早在1966年8月13日，康生讓他的妻子曹軼歐出面，向中央一位領導同志寫信，揭發王光美的所謂「問題」，並攻擊劉少奇包庇王光美。筆者認為此領導人就是周恩來。這封揭發信在部分領導人之間作了傳閱。1967年3月21日，周恩來、康生等人討論了「劉耀祖案中涉及劉少奇在1927年叛黨嫌疑問題」，並決定把這方面的材料交「王光美專案小組」的辦事機構「調查研究」。據戚本禹回憶，這項工作當時指定由康生分管。議論時沒有記錄，後來也沒有形成文件或會議記錄。康生似乎對這種方式有點心虛，而這件事又歸他管，所以事後他特地讓工作人員寫了一份備案性質的簡短材料。這份材料中記載有：「共同研究之後，決定：關於劉少奇1925年在長沙被捕、1927年叛黨嫌疑及1929年在瀋陽被捕等材料，交丙組專案辦公室調查研究。」康生親筆在這份材料的下面注了一行字：「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林彪、恩來、伯達、康生都看過。」

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四人之中，只有周恩來對劉少奇的歷史問題是清楚的，可以說是當事人之一。上述的1927年叛黨嫌疑及1929年在瀋陽被捕等問題，周恩來更是清楚。

在中央專案審查小組公佈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及《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證》（1968.10.18；中發〔68〕155號）材料中認定劉少奇在1927年國民大革命的緊要關頭，竊據湖北省總工會秘書長的職位，充當內奸、工賊，破壞工人運動。報告列舉的罪名其中有：使「干群脫節」，解散工人糾察隊，調走武漢工會骨幹以及在武漢「七·一五」事變前，受汪精衛指使，「躲往廬山」，「繼續進行叛變勾當」。

然而，公開宣佈解散工人糾察隊，湖北全省總工會自動解除工人糾察隊的武裝是當時中共為了消除湖南軍閥何鍵製造事端的借口維護國共合作而作出的決定。此決定是在1927年的6月28日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陳獨秀主持召開的常委緊急會議上作出的。作為總工會秘書長，劉少奇僅僅是執行上級的命令。周恩來不僅參加了這次會議，而且和張太雷一起處理糾察隊及童子團等問題時，只交出部分破舊槍支，把絕大部分槍支和糾察隊員隱蔽、釘散，陸續轉移到賀龍、葉挺的軍隊裡。至於調走武漢工會骨幹，根據時任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委員、中央組織部長李維漢等人在1968年2月27日證明，27年6月初，中共中央鑒於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叛變革命、與蔣介石合流（歷史上稱之為-寧(南京)漢(武漢)合流），的步驟逐漸明顯，遂決定疏散各地集中在武漢的幹部，劉少奇領導的湖北省總工會根據這一精神，將公開活動的黨員幹部有的轉移、隱蔽，有的派往賀龍、葉挺的部隊，又新調一些沒有暴露共產黨員身份的幹部來堅持工作。根據《周恩來傳》的記載，自五月十九日，常委會議決定周恩來代理張國燾的中央常委職務，參加中共中央的核心領導。這段時間內，常委會議幾乎每天都要舉行一次，處理各項緊急事務。六月三日，增選瞿秋白為常委。四日起，中央常委由陳獨秀、瞿秋白、周恩來、蔡和森四人輪流值日。這種狀況一直繼續到六月下旬。對於這段時間中央關於湖北工會的工作部署，周恩來無疑是非常清楚的。

對於「七·一五」事變前，受汪精衛指使，「躲往廬山」，「繼續進行叛變勾當」一事，周恩來也是非常清楚。1927年7月上旬劉少奇肺病復發，經中共中央批准離開武漢去廬山養病。7月下旬，時任中央前敵委員會書記的周恩來指示中共前敵軍委書記聶榮臻到廬山，

將中央關於舉行南昌起義的決定通知劉少奇，要他有所準備，注意安全。

在中共中央公佈的中央專案審查小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及《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證》【1968年10月18號中發（68）155號】材料中，關於劉少奇一九二九年在東北叛賣革命的罪證是一大罪狀。

然而，當時的滿洲省委對此事前後經過悉數報告給當時的中共中央，作為當時中共中央實際領導人的周恩來對於此事的來龍去脈也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周恩來卻絲毫沒有提供任何證據和說明。

1929年8月31日中共滿洲省委臨時常委向中央報告劉少奇、孟用潛被捕經過。9月1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劉少奇、孟用潛被捕事件給滿洲省委的信，指出劉少奇、孟用潛到滿洲省委後的工作，「在精神上路線上迥然與前異，的確創造了滿洲黨之鬥爭的精神」；並分析了他們被捕的原因和應記取的教訓，指示省委要「用全力去營救」劉少奇、孟用潛二人。9月中旬，奉天高等法院下判決書，劉少奇、孟用潛「煽動工潮」案，「證據不足，不予起訴，取保釋放」。劉少奇、孟用潛出獄當天，同臨時常委派來的人見了面，並回到省委秘書處。9月19日中共滿洲省委臨時常委寫報告給中央，介紹劉少奇、孟用潛被捕情況，指出劉少奇、孟用潛被捕事在工作上雖然有很大的打擊，但在同志的思想傾向方面，沒有多大的影響。同時還介紹了奉天、撫順、遼陽、哈爾濱以及其他各地黨組織的情況。9月21日中共中央給滿洲省委指示信指出，「現時省委既已恢復，臨委取消」。

在劉孟二人被捕後，省委即獲得消息，派人瞭解事情的經過並積極設法營救。同時將劉孟被捕經過省委於8月31號向中央作了報告，出獄後省委又向終於報告了兩人出獄的經過。而中央對此並無懷疑，因此很快覆信指示劉少奇繼續擔任滿洲省委書記。作為中央實際負責人周恩來不僅親自寫過指示，而且應當對整個事件的前前後後來龍去脈都十分瞭解。然而恰恰相反，劉少奇在歷史上的此條罪證是周恩來首先提出的。在中央專案審查小組會議上，作為總負責人，周恩來說：「劉少奇的簡歷上有時寫：『1930年春，被一叛徒出賣消息而被捕於瀋陽，在獄中堅不吐實，敵人找不出證據，遂得以出獄。』有時又把『被一叛徒出賣消息而』幾個字劃掉，改成『在罷工中』可是有些材料上說劉少奇是1929年被捕過，這些到底是怎麼回事？需要仔細查一查。」

1967年4月1日，經毛澤東審閱的戚本禹的長篇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在各報刊同時發表。此舉標誌著對劉少奇的批判完全公開化。

為了消除群眾對此的疑惑，周恩來在4月6日，4月14日，4月18日連續向社會、群眾解釋為什麼要集中火力批判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三次講話的主題基本一致，中心思想是：一個人犯了錯誤，如果不改，總是積少成多的。不會是一下子從犯錯誤那天起，就把他的錯誤定下性質。從劉少奇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到說什麼剝削的功績是「永垂不朽」的，再到劉少奇不贊成農村搞合作社、「八大」報告，劉少奇的錯誤是逐步發展起來的。

4月6日，周恩來說：「一九六三年的社教運動，考驗了劉少奇，搞了個形『左』實『右』的後十條。到《二十三條》，對他失去了信任。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又反對。從七大開始，每次鬥爭，都感到劉少奇沒有多少馬列主義水平，看他二十年了，到十一中全會，就決定了，劉少奇不能挽回了，他沒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水平。難道你能說主席包庇劉少奇嗎？問題是要逐步認識的。……對劉，鄧的問題，也是逐步認識的。《清宮秘史》一九五零年就要批判，拖了十七年，今天才拿出來批判。現在，提出批判《清宮秘史》，是從抗日戰爭開始，批判《修養》，就要聯繫到抗日戰爭以前。」

1967年4月18日，周恩來在廣州駐軍幹部會議上講話，其中第三個問題是：為什麼要集中火力批判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周恩來說：「一九六三年提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就是四清運動的前十條，從理論上闡明

了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怎樣進行階級鬥爭，怎樣來挖掉修正主義的根子，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那是很清楚的，可是劉少奇領導的四清運動，恰恰跟毛主席相反，搞形『左』實『右』路線，那一種運動的方式，也就埋藏了這一次文化大革命頭兩個月派工作組的錯誤，撇開廣大群眾，叫所有幹部靠邊站，不加以信任，靠人海戰術，扎根串連冷冷清清地搞四清運動。劉少奇推行王光美桃園大隊的四清經驗，要把它廣為傳播，一直到這次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樣一來，我們可以批判的東西也就很多了。現在我們就應該對劉少奇作總結了。總之，毛主席對劉少奇不是不批評的，中間有幾次是書面的批評，最嚴厲的是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五年四清運動中間制定二十三條的那一次。那次毛主席已經對劉少奇接近失望了，經過二十年的幫助，扶不起來。」

此講話影響非常壞，後來周恩來自己也意識到。4月14日，周恩來在廣州中山紀念堂也做了同樣的講話。

1967年7月18日，劉少奇被批鬥。對於這次批鬥，當事人戚本禹說，「毛主席在外地。」「周總理參與組織了，連夜召集的會。原來沒有夫人陪鬥，陳伯達加的，他的目的是要加上王光美」。筆者對此說表示懷疑。但是沿用了官方多年的說法：周恩來「堅持不搬出中南海，使造反派不敢進入，從而保護了在中南海中的許多領導人。」此說法顯然是站不住腳的。在周恩來前往武漢的幾天，不正是這些揪劉的造反派鬧得最凶的幾天麼？怎麼也沒有衝進中南海？但是隨之而來的8月5日批鬥，周恩來確實是同意的。江青在1971年的華北會議上說：「六七年七月，主席出巡大江南北，七、八、九三個月，這些反革命他們就想在那個時候奪權，全部奪權。有什麼為證？首先把中南海圍得水洩不通，北園事件，午門會議。午門會議就是佈置火燒英國代辦處。那樣的圍困中南海，開始在西門，就出不去了，我就告訴總理說，不行了，北門走不了啦，然後又到新華門，那裡掛了旗幟，也出不去。我們的意思是叫他們撤退。最後走東華門，那裡也掛了三面旗幟。我給總理說，一定要解決這個問題，這時候我們上了大當，他們都安排好了，有一個人，這個人我看不慣他，眼珠子上下轉的，是輕工學院的，給總理講，提出要在天安門開十萬人大會，在中南海裡面鬥劉少奇，總理答應了，我們也都同意了，給中南海拉了線。他們要鬥劉少奇那個『黑修養』，目的是搞臭康老，因工作關係，那個『黑修養』，康老搞不出來，是陳伯達搞的。他們就是要搞康老，搞總理，過後我們才知道上了大當。」事實上這種批鬥，沒有毛澤東的同意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然而更令人髮指的是，周恩來在劉少奇專案組上的表現。

有文如下敘述：

1968年10月7日，周恩來看到這些假證後，感到非常可疑，追問徹查辦外調組的一個負責人說：「你們是不是把情況都告訴了被調查的人，劉少奇的名字是你們說的還是暗示的？還是誘供的？什麼大個子、白淨臉、高鼻子、南蠻子？」這位負責人當面欺騙總理說：「這些問題我們沒有告訴他們。」

周恩來問：「那劉多荃沒聽過劉少奇的名字，為什麼在證據上寫上了劉少奇呢？是不是你們告訴給他了？」回答說：「那是我們最後取證時加上的。」周恩來生氣地說：「那就不好。你們學過歷史唯物主義嗎？」在周恩來趕去接見外賓後，這些人立即做手腳，對可疑之處進行修改，然後送張春橋，由張春橋最後作了親筆修改。當時連中央專案組也有人提出：1930年中共滿洲省委和黨組織遭到大破壞是杜蘭亭出賣的，與1929年劉少奇被捕無關。但張春橋仍然生拉硬扯，將罪名強加在劉少奇頭上。

眾所周知的是，作為中央專案組的一把手，劉少奇專案組的組長，所有的材料最後上報都是周恩來一手把關的。沒有周恩來的同意這些材料根本上報不了。上面所述，不恰恰是在

說明周恩來暗示他們材料應該怎麼做才像模像樣些？

王年一就說：送給毛澤東看的只有證明劉少奇有罪的「人證物證」，而證明劉少奇沒有罪的人證和物證卻沒有送給毛澤東看。為什麼沒送呢？

李銳先生曾多次向單少傑先生談起他所親歷的一件事：大約在1983年至1984年間，中組部奉命銷毀一大批檔案材料。在銷毀之前，中組部部長陳野萍讓我（時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引者）看了一個原屬於劉少奇專案組的絕密件。這個絕密件中有兩份原稿，都寫的是給劉少奇定罪的結論，一份是由江青主持草擬的，一份是由周恩來主持草擬的。由周恩來主持草擬的那份結論計有四條，是周恩來親筆寫下的。我認識他的字。比較起來，周恩來給劉少奇定的罪名，要重於江青給劉少奇定的罪名。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關於劉少奇問題的決議，基本上就是按周恩來所親筆擬出的那個結論來定調子的。

最早揭露周恩來在「劉少奇專案組」的調查報告的批語的是《中國季刊》（1969年第37期）。周批示到：此人大叛徒、大工賊、大內奸，罪該致死。更有文證實八屆十二中（一九六七年十月）前，周恩來就「劉少奇專案組」的調查報告，親手批示「此人該殺」上呈毛澤東。此一筆跡也於八十年初，劉少奇案平反前後，由鄧穎超出面，通過胡耀邦，抽出暗下銷毀。文革史專家宋永毅先生是在《一個被掩蓋了的文革周恩來形象》一文中引用了孫萬國的材料，後來又表示他的文章引用過的史料——周恩來曾經批示：此人，指劉少奇，該殺，是比高文謙級別更高的人透露的，能夠看到更多文件。而曾經是中央專案組成員的某位將軍的兒子則明確表示周恩來的批示是「此人該殺」。金沖及後來亦表：有此事，大意如此，個別字可能不同。意指「此人該殺」實為「劉賊該殺」。

在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周還親筆起草了由他本人和陳伯達、康生、江青共同簽名上送的報告，把劉少奇所謂歷史上三次叛變的「罪行材料」送給毛澤東、林彪審閱。報告稱：「劉賊少奇是長期埋伏在黨內的大叛徒、大工賊、大內奸、大特務、大漢奸，現在專案組所掌握的人證、物證和旁證材料足以證明劉賊是一個五毒俱全、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如此眾多涉及周恩來的許多見不得人的東西，鄧穎超深知這些資料一旦披露，就會極大地損害周恩來在世人心目中已經形成的那種正人君子的形象，於是急切要求中央予以銷毀，並為此多次催逼胡耀邦，最後如願以償，迫使中央同意燒掉這些資料。可以說，鄧穎超晚年最用心做的事就是竭盡全力地維護其夫君周恩來的形象。鄧穎超此舉是「千古留一罵名而去百名」，可謂神機妙算的絕世高招。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形形色色的揭發材料，包括說劉少奇三次被捕叛變等假材料，都是劉少奇專案組花了很多時間和人力去收集來的。在此過程中，周恩來絕對知道劉少奇的「罪證」有若干的疑點，許多材料都是經不起推敲的，因為劉少奇的叛變一事就是周恩來代表中央給劉做了解脫的。在政治需要與良知之間——周恩來毅然選擇了政治需要。最後劉少奇是在「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下被開除出黨的。作為所有專案組的總負責人，對劉少奇調查的結論得先通過周恩來的批准才能送報毛澤東作最後首肯。然而現在官方的輿論都是一口咬定：整死國家主席劉少奇的是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林彪集團」，從來不涉及周恩來，既使涉及也是說周是違背良心，不得已而已。

具有極大諷刺意味的是，周恩來在劉少奇遭受迫害過程中的一些不齒行為，竟然被當錯「善事」來加以漂白。

劉少奇的女兒劉平平說：「1968年仲夏的一個晚上，爸爸發起高燒，大夫敷衍了一下就走了。第二天轉成了肺炎，引起多種併發症，隨時有死的危險。上面得知後，立即派醫護人員來搶救。為什麼故意把爸爸折磨病了以後，又要搶救呢？當時中辦的負責人對醫護、工作人員說：『現在快要開劉少奇的會了，不能讓他死了，要讓他活著看到被開除黨，給「九大」留活靶子！』誰都知道，對象爸爸這樣一個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了一輩子，經過幾十年槍林彈雨、白色恐怖、出生入死的考驗，威武不屈、富貴不淫、貧賤不移的共產黨員，最大

的摧殘、最沉重的打擊，莫過於『活著看到被開除黨』了。……」

官方編撰的《周恩來一生》則說：1968年劉少奇病重，醫護人員在當時「文化大革命」思潮影響下不願意或者不敢去護理，周恩來動員了北京醫院的醫護人員護理劉少奇。他在當時環境下做了自己能夠做到的一切。而這個做到的一切的背後卻是要讓他活著看到被開除黨，給「九大」留活靶子！

在1986年出版的高皋、嚴家其所著《文革十年史》書中，寫道：「沒有人幫他換洗衣服，沒有人扶他上廁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長期臥床，造成雙下肢肌肉萎縮，枯瘦如柴，身上長滿了褥瘡。……並用繃帶將劉少奇雙腿緊緊綁在床上，不許鬆動。」然而就是因為這部分此書沒有通過在出版前的審查！把一個已經癱瘓的老人綁在床上，是故意殘忍的折磨，是虐待！更直觀、具體，一看就懂。這種迫害已經遠遠超出對一個「罪犯」的懲罰，而是一種表態的心理滿足！

陳伯達在劉少奇去世以後，曾經向周恩來問過劉的情況。周恩來說他後來不肯吃飯，就沒有辦法了。陳伯達還問劉少奇為什麼不辯護？周恩來說外面的事，劉少奇什麼都不知道，沒有讓他知道。赤裸裸的謊言，實際上劉少奇在生命的最後階段，還是充分配合治療的。劉少奇也早給王光美說：「有人在逼我當反革命。我過去不是反革命，現在不當反革命，永遠不當反革命。」「我不會自殺的，除非把我槍斃或斗死。」周恩來的說法無異於是說劉少奇是自殺的，是自絕於人民、黨的。

文革結束後，一九七七年韓素音到北京訪問鄧穎超，問她：「我也曾寫過一些反對劉少奇的文章。他現在被平反了。當時我所得到的資料不正確。我該不該向劉少奇的太太王光美道歉？」

鄧穎超回答：「你有什麼錯？你並沒有反對他。你相信我們。開除劉少奇黨籍的文件，也是周恩來簽署的……我們需要為此行為道歉嗎？這是一件極痛苦的事，又非如此做不可……他不得不往大處著眼。」

是的，周恩來從來不需要為自己的所作所為道歉，也從來沒有表示過。從後來周恩來的言行，卻絲毫看不出周的問心無愧來，因為周只是擔心後人在自己的臉上打叉叉而已。成為鮮明對比的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劉少奇被折磨死去。周恩來擔任組長的「劉少奇專案組」為其「圓滿完成任務」舉行了酒宴。

第二部分 第七章

周恩來「保陳毅」的真相

周恩來在文革期間力保陳毅一事，是中共官方津津樂道的。

周恩來在文革初期與陳毅的關係並不僅僅是長期以來形成的戰友關係，更為重要的是類似於劉少奇與彭真的關係。如果陳毅倒了，周恩來就失去了一面屏障。在經過前期的周恩來與康生的通力合作下的工作之後，借劉少奇出國之際，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一舉拿下彭真。當中央要派周恩來出國時，正值北外學生堅持要打倒陳毅之時，周恩來要陳毅替其出國。雖然此舉未果，但是毛澤東此時也沒有要打倒陳毅的想法。陳毅在文革之初對毛澤東的支持，使其安然渡過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但是在「大鬧懷仁堂」中的出格表現，陳毅被毛澤東認為是無可救藥的人。但是當時的情況決定了周恩來要死保陳毅，同時毛澤東對周也說要保，但是背地裡又說不保。造成這一情況的發生的原因在於毛澤東在當時還不能和周恩來撕開臉面。於是在外交部周恩來處於兩難，一個是要支持毛的文革路線，一個是造反派是要打倒陳毅。此事讓周恩來備受折磨。直到1967年的8月底，這一切才得到改善。但是當到了1971年廬山會議的時候，毛澤東要整林彪，周成為是唯一可以借用的主要力量。此時的陳毅已經被周恩來拋棄了。

一、在「一批二保」的前提下力保陳毅

文革發動之初，陳毅就因為工作組問題陷入了麻煩。第一外國語學院的學生起來造反，要打倒陳毅，因為陳毅派出劉新權工作組鎮壓了學生。當時正值亞非作協會議召開，時北外學生又說參見會議的中國作家中有黑幫，要衝擊會議，而會議恰恰是由陳毅主持。當在周恩來要陳毅代替他出國未成之後，就要求時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傅崇碧派兵嚴加保護陳毅的安全。

八屆十一中全會開始後，陳毅明確表態支持毛澤東，並且在華東組傳達了毛澤東在8月4日指責劉少奇的話。但是陳毅的「大嘴巴」、敢放炮的性格還是不那麼招人喜歡。周恩來告誡陳毅：「不要講話！」而且在周恩來的一手安排下，陳毅於1967年1月24日做了檢查，成為第一個被解放出來的副總理與部長。

為此，周恩來在1966年12月3日、13日、26日、67年1月3日連續同北外學生見面，做工作，強調中央不同意打倒陳毅。1967年1月9日，周恩來接見外事口造反派聯絡總站代表。在這些接見中，有人當面頂撞周恩來。下面是其中的一幕：

（有人說要打倒陳毅）總理說：「我反對，我不能接受。這樣簡單不行，我可以和你辯論一番，但我現在不和你們辯論。」

一外有的同志說，不是打倒陳毅，而是要把陳毅燒成紅通通的無產階級外交家。」（答：現在沒有這些標語了，而是要打倒！）

總理說：「沒有開辯論會，怎麼能這樣武斷，燒燒我不反對！」

1月10日，江青代表無產階級司令部也代表毛澤東表態：

目前有股風，把鬥爭鋒芒對準我們軍隊的某些好同志，對準中央及國務院的一些好同志。如陳毅同志說過錯話，寫過詩詞，說話有過頭的，有不正確的，我跟他當面爭執過，這個同志不是兩面派，他有錯誤就改，他可以和我爭得面紅脖子粗，最後承認了。但陶鑄不能，他和王任重背後搞我們，甚至鎮壓我們，所以這種情況能不能一樣？（群眾答：不能！）對陳毅同志不能採取對劉鄧、王任重、陶鑄那樣的做法，而應該同志式的批評他的錯誤，承認他的工作。」

江青還在講話中提及陳毅的歷史上的功績，是支持毛的。

陳毅的檢查稿是經周恩來反覆推敲、再三修改的「檢查稿」。陳毅作完檢討後，陳伯達、康生、江青等都講話，表態肯定了陳毅的講話。毛澤東先行審閱過陳毅的檢查稿，陳毅檢討後又批示：很好。

在毛澤東表態和周恩來的全力支持下，外事口造反派聯絡總站主編的《革命造反派》刊登了其一把手張殿清的表態：「我們歡迎陳毅同志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陳毅是我們的紅司令。」於是直到3月下旬，外交部內的秩序基本上是平靜的，陳毅與造反派之間的合作是愉快的。

對於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周恩來還是特意要照顧的。1967年1月，毛澤東支持上海奪權，周恩來也隨之引導外事口奪權。周恩來打電話告訴時任外辦副主任李一氓：「你們不革命！應該成立戰鬥隊。」接著陳毅也打來電話：「哦，革命還要下命令啊？你們為什麼不奪權？」「外交部已經奪權了，我們自己人不奪，別人可要來奪了。自己外辦的情況，什麼情況，到底清楚些嘛，這是我和總理研究了。」

2月16日，陳毅在懷仁堂的中央碰頭會上說：「這些傢伙上台，就是他們搞修正主義。在延安，劉少奇、彭真，還有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這些人，還不是擁護毛澤東思想最起

勁！他們沒有反對過毛主席，他們根本沒有見過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嘛？歷史不是證明了到底誰是反對毛主席的嘛？以後還要看，還會證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給了赫魯曉夫搞修正主義嗎？」

陳毅的這些話是張春橋、王力、姚文元事後整理的，並經過周恩來、康生核對過的。

當陳毅講到周當年曾在延安整風中挨整一事時，周立即表示：「應該檢討，整得對嘛！我有錯誤，對當時的批評，從來沒有意見。」陳毅敢當著周的面，挑撥離間，膽子夠大的。周豈是如此能輕易被挑撥的？當陳毅講了對毛澤東有影射的話後，周恩來又是馬上接過來說：「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決定由周恩來主持開會批評陳毅、譚震林、徐向前三個人。周恩來叫王力整理出來一個2月16日懷仁堂會議記錄。王力在會上讀了，並核對情況。陳毅表示異議，說有一句他沒有講，要去刪掉。周恩來當場駁斥：「講是講了，不要刪了。」周還在此處特別註明：「陳先挑撥康老，後挑周」。周恩來保陳毅還是有條件的，那就是不能觸及毛澤東的底線，還有一個潛規則就是周恩來當時是否處於「危險」狀態。

陳毅顯然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在當天晚上，陳毅又發了七個小時的牢騷。陳毅說：「劉少奇在八大報告中不提毛澤東思想，也作為一百條罪狀之一，這報告是毛主席、政治局決定的，我一直在場的。前一時期大字報很有水平，現在的大字報越寫越多，字越來越大，水平越來越低。打倒朱德，打倒賀龍，中央根本不同意。賀龍是政治局委員，元帥，怎麼一下成了大土匪了呢？朱德今年八十多了，這樣搞，人家罵你共產黨是過河拆橋。你們誰都不相信，只相信毛主席、林總、總理、陳伯達、江青、康生六人，承蒙你們寬大，加上五個副總理，才十一人。這樣一個偉大的黨，就只有十一個人是乾淨的？我不願意當這個乾淨的，把我拉出去示眾！」

但是陳毅同時又說：「受迫害的同志不要報復，你過去把我打成反革命，現在我要把你打成反革命。請將我的意見轉告他們不要報復，否則就成不了大事。有幾個人沒有反對毛主席？很少。林副主席沒有反對過，很偉大。我反對過兩次，後來承認了改正了錯誤。搞一點黑材料有什麼了不起麼，年輕人要學會有很寬闊的胸懷，宰相肚裡能撐船。我整過很多人，人家整我的也不少，彭真、陸定一就整過的黑材料，我不怕，我看也不要看。受打擊最多，受委曲最大的是偉大的領袖毛主席，他的威望最高。」

但是陳毅在「二月逆流」中的表現無疑讓周恩來失望，讓毛澤東惱火。2月19日，李先念和譚震林來到陳毅家，告之毛澤東發了震怒。陳毅頓時慌了手腳，當晚就找了周恩來，並當即寫了封信給毛，要求當面說清情況。但是未見答覆。接著，陳毅又寫了第二封信。毛終於答覆，但是信中一大段是說歷來犯錯誤的改也難，結尾是「見面有期，稍安勿躁。」

3月下旬，陳毅捲入「二月逆流」、在懷仁堂放炮的情況終於在社會上傳開。4月5日，「批陳聯絡站」成立，總共有外交部聯絡站、北航紅旗等35個單位參加。4月21日，聯絡站召開全部「揭發批判以陳毅為首的部黨委在幹部問題上執行劉鄧資反路線大會」。陳家康在大會上揭發了陳毅在部黨委會上說過「乾綱獨斷」。意指這是對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不滿。由此，陳家康被周恩來多次點名為「跳樑小丑」，以至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5月11日上午，「批陳聯絡站」下屬十幾個組織上街遊行，要求陳毅到群眾來接受批判。當晚，周恩來連續兩次接見外交部各組織代表。但是在會談中，造反派成員對周恩來顯然是表現的「大不敬」。下面是部分對話節錄：

周恩來：外交部要揪陳毅的問題，中央不能同意，他現在沒有被罷官，他還是外交部長，還參加外事活動嘛！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你們可以提出意見，中央也還要討論，不能群眾大會一通過，中央就批准。

造反派：你不是主張陳毅到群眾中來的嗎？

周恩來：我們要製造環境。現在你們揪去，群眾一起哄，噴氣式飛機一坐，這怎麼行？！

一同學：我們就是要批判。

周恩來：批判錯誤可以，但不能揪人。批判錯誤也還要創造條件。

群眾：什麼條件？

周恩來：大中小「三結合」，商量好了，我陪他去。

群眾：好幾個月，有反覆嘛！我怎麼知道他二月份又出了事。有反覆，你也知道，何必問我。

一同學：陳毅不到群眾中來，心裡有鬼。

周恩來：他心裡有想法。你們想想，你們幾個隊伍遊行，把他揪去像什麼樣？

「六·六」代表：5月4日，我們就給陳毅去了照會，他到現在也沒回答。

周恩來：5月4日他已經患腸炎了。幾個造反派齊聲地以命令式的口氣說：你把陳毅交給我們，我們不會搞遊街，你要相信群眾。

周恩來說：我說過，還要商量具體的方式，還要創造條件。你們在這裡不要給我施加壓力。

……

造反派：總理，你剛才說把三反分子陳毅交給我們？

周恩來問：什麼？我沒有講「三反分子」，你們強加於我，我要抗議。說著，

周恩來轉向聯絡站代表，你們證明，我說了「三反分子」啦？你們提打倒陳毅，不能強加於我。

使陳毅真正陷入困境的就是這個1967年的5月。批陳聯絡站多次提出要批鬥陳毅，但是周恩來認為時機未到。經過多次爭論後，周恩來同造反派達成協議：第一，批陳會要待安排好了再開；第二，先在外交部開小會，然後到外語學院等單位接受批判，大中小會結合。

4月30日，被印度尼西亞驅逐的中國臨時代辦姚登山回國。周恩來親自到機場迎接。姚登山既讓造反派有了一個可以取代陳毅的人選，也被周恩來看成是陳毅的備用胎。一旦陳毅真的倒台，姚可以成為周恩來在外交部的代理人。後來形勢逆轉，姚登山被周恩來一腳踢開，則是後話。

姚登山一回國，就受到周恩來的垂青。在周恩來的運作下，姚站在中間，左挽江青，右攬毛照了一張相。如此殊榮在中共歷史上堪稱空前絕後。周恩來兩次提出讓姚登山參加抓部黨委的工作，參加「三結合」的臨時業務領導小組。但是姚登山以工作不熟悉為由，沒有參加。姚登山在外交部積極執行周恩來交代的任務。姚登山更是在8月26日保護陳毅時立下汗馬功勞，但是此事後來被渲染成周恩來一人的功勞。

毛澤東對陳毅是什麼態度？王力說，毛澤東說這輩子他就要保兩個人，一個是朱德，一個就是陳毅。毛澤東還說：「群眾喊打倒陳毅的口號就讓他們喊，沒有什麼了不起。人家要打倒，就打倒一下嘛！」「現在在我們國家裡，群眾提打倒這個，明天打倒那個，沒有什麼了不起。」毛還舉例子說群眾喊打倒朱德、打倒陳雲、打倒陳毅的口號，沒有什麼了不起。可是這個指示，竟然沒有向周恩來傳達。

1967年8月12日，毛澤東在上海接見阿爾巴尼亞專家時表示他贊成「打倒陳毅」的口號。毛澤東說：「我對陳毅也沒辦法，就是要紅衛兵給他點壓力……將來保陳毅也要靠紅衛兵。」毛澤東的這個說法是模稜兩可，陳毅難道要由紅衛兵來決定其命運？

毛要假手群眾批判陳毅，周恩來要保陳毅，但是又不能對毛髮動起來的群眾潑冷水。周恩來處於兩難。對於周恩來來說，一直不同意「打倒陳毅」的口號。毛澤東又公開認可了外交部造反派組織攀險峰對陳毅提出的口號「一批二保」。這對周恩來來說，意味著毛澤東同意周恩來的看法。更重要的是根據時任陳毅秘書杜易的回憶，毛澤東在1967年五一節

期間兩次私下對陳毅說「我是保你的」。周恩來顯然會從陳毅處得知此事。

而此時期的周恩來，正是在文革中遭遇到第一次「伏擊」。1967年的5月至8月份，北京一些激進的造反派、紅衛兵提出要「動一動」總理，「燒一燒」。針對周恩來的大字報還上了街。

關於周恩來同陳毅的關係，毛澤東說：「整陳老總的也就是整總理的。把陳毅打倒了，你周恩來也就差不多了。」對於這一點，連造反派也供認不諱。一個造反派骨幹曾赤裸裸地揚言：「不打倒陳毅，就不能打倒周恩來！」

「720事件」後，整個中國局勢急速左轉，在此大背景之下，周恩來也不得不同意陳毅到群眾大會上接受批鬥。1967年8月一共開了八次批判陳毅的大、中、小會。外交部開了三次小會。周恩來對批陳小會抓的很緊。什麼時間，怎麼開，哪些人發言，發言內容均須事先經過周恩來審定批准。可以說凡是造反派的「批陳」大會，周恩來都「事必躬親」，每場必到（筆者註：除了27日晚上的除外）。

8月7日，王力發表了一通關於外交部的談話，主題內容就是肯定揪陳是正確的，說外交部奪權不徹底。王力在其回憶錄中對此多加辯白，但是無可否認的是此講話大大加劇了外交部的衝突。陳毅接連受到群眾批鬥。8月11日與27日，陳毅也兩次承認了自己的「罪行」。王力還說，毛主席和總理要我過問外交部，在主席那裡說的。王力在這次談話中還對姚登山解釋了他和周恩來之間的不同。姚登山問王力，「不是總理不同意『打倒陳毅』的口號嗎？」王力回答說「總理身份不同嘛。」

顯然，由於毛澤東公開說的和私下對王力講的不同。雖然周恩來可以從陳毅處得知毛澤東的底，但是周恩來不可能公開亮出。以至有些造反派認為中央文革（特別是王力講話之後）和周恩來之間是有分歧的。周恩來對此非常在意。一方面，周恩來對於來自造反派、紅衛兵的攻擊表示：對我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議也行，刷大字報也行，我不怕打倒，幹了幾十年還怕這個？除非我自己摔跤，走向反面。另一方面，對於造反派等質疑的周恩來同中央文革是否保持一致，周恩來多次聲明，他和中央文革之間是親密無間的。

8月22日，火燒英國代辦發生之後，周恩來緊急接見外事口各造反派組織代表，對此事及奪外交部大權提出嚴厲批評。周恩來說：「你們目無中央，是無政府主義。我們沒有料到你們會來這一手（指奪外交部權），事前不打招呼，事後也不報告。你們現在拿監督小組的名義發電報給國外，完全是非法的，不算數的。外交大權是毛主席、黨中央授權國務院來管，如果你們說國務院沒有這個權力，你們要直接行使這個權力，我今天就去報告毛主席。我在你們心裡沒有威信。中央文革與我之間，你們沒有任何空子可鑽。」周恩來又說：「你不要從王力同志講話裡撈稻草，一根稻草也撈不到。你們把外交部所有副部長的辦公室都封了，也不給中央打報告，我找誰辦事？部黨委幾個人你們都點了名，說某某是三反分子，你們都有通令，完全目無中央。」

8月27日，李富春代表周恩來出席「徹底批判陳毅大會」。李富春說：「你們提出陳毅必須向毛主席低頭認罪，提出陳毅不投降，就堅決打倒他，我都贊成。但是你們有的同志提出『打倒陳毅』，我看還不是，你們勒令陳十天交出檢查，我支持你們的革命行動。剛才陳伯達特地打電話告訴我，要我說一句：總理和中央文革是一致的，現在有的人想挑撥是辦不到的。」

8月19日，外交部發生造反派封部黨委奪權事件。毛澤東在21日終於明確表態：「最近，我們的外交部熱鬧了，他們要把陳毅、姬鵬飛、喬冠華打倒，哪誰當外交部長、副部長啊？……」接下來，毛澤東直言不諱地說：「對陳毅，我也不高興他，但我一個外交部長也難呀！所以，我主張對他『炮轟』，不『打倒』。」筆者認為這也是上述8月22日周恩來同造反派談話口氣非常硬氣的原因之一。8月27日，周恩來變得益發強硬。周恩來怒斥造反派：你們誰要攔截陳毅同志的汽車，我馬上挺身而出！你們誰要衝擊會場，我就站在人民大

會堂門口，讓你們從我的身上踏過去！

火燒英國代辦，使得外交部的局勢逆轉。外交部的運動開始轉向。特別毛澤東在1967年的8月底開始右轉，要批判極左思潮，要搞大聯合。外交部開始抓壞人和清理「五·一六」。1967年10月，毛澤東批示：造反派不聽周總理的話，還叫什麼造反派？矛頭對準周總理，就是對準我、林彪。周恩來10月18日作出查封外交部聯絡站核心組的指示。但是陳毅的形勢卻不樂觀。

批極左，全國出現了一股為被錯誤批判的人和事翻案的現象。外交部也不例外。1968年初，外交部出現了三張批判「打到陳毅」的大字報。其中最著名的是「91人大字報。」此時恰恰是「反擊右傾翻案」時期。從2月到4月期間，周恩來獨此給予嚴厲批評。周恩來說：九十一人大字報是老保翻天，反攻倒算。無論周恩來是否是假戲真做，周恩來自1967年9月就提到要謹防「二月逆流和右傾翻案。」1968年4月1日，周恩來再次談到此大字報時講：翻案風有各種形式，極「左」也可以為「二月逆流翻案」。因為極「左」是同右合作的，是保護右的。現在反右是主要方面，要反右傾保守主義，右傾分裂主義。要擊退為「二月逆流」翻案風。

二、在事過境遷之後拋棄陳毅

八屆十二中全會在1968年10月份召開。陳毅作為「二月逆流」的代表再次被批。在這次會上，批判「二月逆流」的調子和規模都大大超過以前。為了批判方便，周恩來特意把幾位老帥和副總理安排到各個分組裡去接受批判。周恩來也點名批判並揭發了陳毅：「中央文革曾保過聶，但他對中央文革反而不滿。也保了陳毅、徐向前，都不滿，竟說：『不要你們保』。好像保了他們，他們就不光榮了，他們自以為一貫正確。陳毅同志在一次歡迎外賓時，紅衛兵也去了，他大罵紅衛兵『你們來幹什麼！我的檢查是逼出來的，是假的。』」

在十月三十一日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會議上，毛澤東特意點了陳毅的名字。毛澤東說：「對這些老同志（指參加『二月逆流』的人），還是選他們當『九大』代表；陳毅同志說他沒有資格，我看你有資格，代表左中右的那個右，你有右的方面的資格。」在那個突出政治的年代，作為右的代表無疑於反革命。這對陳毅實際上一種侮辱，事實上也是這麼做的。

在「九大」期間，陳毅在華東小組繼續受到嚴厲批評，並把陳毅從井岡山到「二月逆流」的各種「反黨罪行」來了個徹底清算。個別和陳毅熟識的老幹部也跟著圍攻陳毅，說陳毅「一貫反對毛主席。」經過這翻折騰，素有「大炮」脾氣的陳毅也被整的沒有脾氣了。甚至連初出茅廬的王洪文都可以直指陳毅的鼻子罵：「今天，我們要把這本《陳毅反動言論小集》當面送給陳毅同志，希望你能和大家一起，徹底清算自己！」陳毅連聲應承：「應該清算…應該清算…我陳毅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嚴重錯誤，承蒙上海黨選我當『九大』代表，我很慚愧，我一定要……」直到大會秘書處的吳法憲把徐景賢、王洪文叫到辦公室去，傳達周恩來指示，批陳要「適可而止」，並說「下一次會議是否就不開了？」吳法憲同時還說：「這次『九大』，要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毛主席指示：要保證這些捲進『二月逆流』的老同志選上。」

「九大」並沒有正式宣佈罷免陳毅的外交部長的職務，卻安排他請病假，由姬鵬飛任代理外長。陳毅可以說正式「失業」了，後來又根據中央的統一安排，下放到石家莊。

作為中央委員，陳毅參加了1970年的廬山會議。沒有想到，本想這次抓住機會，表示自己立場堅、也可以趁機一報私仇的陳毅，再次翻了船，結果整出個「二陳合流」。

此時的形勢已經不同於1967年。由於林彪帶頭攻擊了文革干將張春橋等人，毛澤東大發震怒。對於文革，毛澤東不能容忍任何人否定。自然對於自己的得力大將，毛澤東是一護到底。但是事前，沒有人會認為在林彪和張春橋之間，毛澤東會選擇張春橋。但是此時的毛澤東已經認定攻擊張春橋就是攻擊文革，攻擊文革就是攻擊毛本人。此等情況下，周恩來

成為可以說是毛澤東要借用的唯一的主要力量。陳毅自然也就不再是周恩來的「門戶」。

歷次會議陳毅都被安排在華東組。在八屆十二中全會和「九大」上，陳毅被批得「體無完膚」。這次，陳毅提出換個組，於是周恩來把其放到了華北組。8月24日，陳毅發言。陳毅說：以前我錯了，這回我非跟上不可。陳伯達發言之後，陳毅第一個表示支持，說完全同意陳伯達的發言。陳毅還說：毛主席是天才，是經過幾十年鍛煉出來的天才。……我犯過三次大錯誤，是犯錯誤的人，我願站在林副主席這一方面參加戰鬥。別以為我靠邊站就不能保衛毛主席，不論在什麼地方，就是有人在牆旮旯裡反對毛主席，我陳毅也要把他揪出來！有人質疑陳毅是否有資格講話。陳毅說：我怎麼沒有資格講話？我沒有保衛毛主席的資格了？陳毅又做了第二次發言。

結果，受到攻擊的張春橋等人在江青的帶領下找毛告了狀。毛澤東在8月25日下午召集中央常委和各大組組長會議，下令中斷討論和學習林副主席的講話。風雲突變！

8月26日，周恩來和康生同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談話。康生說：「你們要交代，這個『軍事俱樂部』是怎麼形成的？你們長時間串通一氣，還有陳毅這個反革命分子……」吳法憲當場反駁：「陳毅是中央委員，他什麼時候成為反革命分子了？」周恩來當時沒有表態，當吳法憲講話之後，才說：「康老的話錯了。」未曾想到的是，8月28日，當林彪為吳法憲等人開脫時，說不同意康生講的陳毅跳出來的說法，陳毅同吳法憲等人也沒有聯繫。周恩來則說：陳毅是跟著陳伯達來的，發言表示同意陳伯達的意見。這個說法是「兩陳合流」的說法源頭！後來扣到了康生的頭上。

1970年9月6日下午，歷時十五天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九屆二中全會宣告閉幕。徐景賢回憶說：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毛澤東在講話中，有一句話使全場為之驚愕，他說，這次廬山會議是『二陳合流』。

九屆二中全會後，在傳達陳伯達的罪狀中提到：陳伯達同「二月逆流」某些人勾結起來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對此，陳毅的夫人張茜非常生氣。陳毅自己說：這次廬山會議上，我講了對主席的敬佩，認為毛主席領導中國革命有天才這樣一段話，就把我搞成「二陳合流」，真是莫名其妙，冤枉也。

「林彪事件」之後，11月4日，毛澤東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的同志。當葉劍英走進會場的時候，毛澤東對與會人員說：你們不要再講『二月逆流』。毛澤東同時編造謊言：『『二月逆流』是什麼性質？是老帥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威的。那個王關威，『『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帥，老帥就氣嘛，發點牢騷。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鬧懷仁堂嘛！』同時毛澤東叫葉劍英把此話轉告給陳毅。但是葉劍英並沒有轉達。在場的周恩來也沒有傳達。

1972年1月2日，周恩來去醫院看望陳毅，絲毫沒有向陳毅透露出一點信息。

直到次年1月6日，毛澤東再次對周恩來、葉劍英說：『『二月逆流』經過時間的考驗，根本沒有這個事，不要再講『二月逆流』了。請你們去向陳毅同志傳達一下。』周、葉當場核對了記錄後才去告訴陳毅。但是此時陳毅已經毫無反應。張茜退出並病房後，十分生氣的說：「為什麼不早來？這時候已經聽不見了，傳達有什麼用！」

陳毅去世後，毛澤東卻藉機做了場「政治秀」，表達了對受到迫害的老幹部的一絲慰問之情。但是陳毅的悼詞修改之處，卻折射出其應有的內含。

根據當事人劉巖的說法，周恩來對其所擬的悼詞草稿修改的主要部分是刪去一短句，增加一長句。他用紅筆勾出的一短句的全文是「一貫忠於人民忠於黨，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增寫的一長句是：「有功亦有過，但他功大於過，特別是皖南事變前後，他堅決執行毛主席關於新四軍應渡江深入敵後作戰以求發展的指示，在鞏固和擴大新四軍方面，做出了極大的貢獻。」毛澤東在審閱周的報告時批了兩處文字，一處批在報告的首頁上：「基本可用。刪去兩段。」一處批在悼詞稿的第二頁上，即周總理用紅筆勾

出的一短句和增寫的一長句旁邊：「前面已作了結論，後兩段均可不要。功過的評論，不宜在追悼會上作。」並用紅鉛筆將不要的兩段話劃去。

第二部分 第八章

彭德懷的冤案與周的責任

周恩來在「反冒進」被批判之後，再也不敢向毛澤東「諫言」。無論是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期間還是之後，周恩來對彭德懷的批判絲毫不手軟。而在文革中彭德懷所受到的迫害，周恩來更是負有一定的責任。

一、廬山會議前後

羅瑞卿曾經撰文：「建國以後，在反對高崗、饒瀨石、彭德懷、劉少奇、林彪、『四人幫』的歷次鬥爭中，周總理都是毛主席路線的堅決捍衛者。」

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周恩來對於彭德懷的態度，可見一般。

廬山會議之前，彭德懷就曾寫過一個關於經濟問題的報告，委託周恩來，進言毛澤東，但是周恩來推卻不幹。周恩來此舉，自然同反「反冒進」之後所受到的批判有關。事實上，自那以後，周恩來再也沒有向毛澤東諫言過，更談不上在重大決策上堅持正確的意見。周恩來已經從對毛澤東推行的政策的忠誠蛻變為對毛澤東本人的忠誠。大陸官方黨史界把在1966年周恩來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看法作為周恩來不同意此提法曾當面向毛澤東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見廣為宣傳。然而事實的真相則是周恩來僅是對於一個文字性的提法質疑，毫無對其內容的諫言。此事也充分說明了大陸官方在維護周恩來的形象方面的捉襟見肘。

1959年7月14日，毛澤東收到彭德懷的信。兩天之後，毛澤東召集劉少奇、周恩來定下關於此事的處理方法——「評論這封信的性質。」毛同時要求周恩來通知彭真等上山。周恩來比劉少奇敏感的多。劉少奇當時還建議會議再開一周便結束，而周恩來在20日就批評了周惠，原因就在於周惠批評劉建勳等人的「假大空」。這種調子明顯是和毛澤東發彭德懷的信的意圖是不一致的。周恩來開始轉向。轉向的同時，周恩來還故意迴避李銳的話題。李銳在19日或者20日問周，毛對彭的這封信如何看待？周說沒有什麼吧。

此時的毛澤東採取不同尋常的態度來警告周恩來，希望周恩來能夠站穩腳：第一個就是彭真一上山，就代替周恩來主持會議的討論工作；第二個就是在7月23日的講話中多次提到周恩來，或點名道姓，或旁敲側擊，諸如「那次反冒進的人，這次站住腳了，恩來同志勁很大，受過那次教訓。」，同時又說「我們不戴高帽子，因為這些同志和右派不同，他們也搞社會主義，只不過沒有經驗。」這一切表明毛澤東對周恩來的非完全信任與敲打。

無論出於何種動機，彭德懷在廬山上書，毛澤東批彭是不對的。但是只有一個毛澤東批，也是批不起來的。而這種左的路線，就需要左的幹部去執行。1940年，曾就文藝問題與王實味爭論過的陳伯達，得知毛提著馬燈看了他反駁王實味的小字報後，連聲歡呼：「跟上了，跟上了」對此單世聯先生這麼揶揄陳伯達：從此陳伯達平步青雲，直到第四把手。周恩來不也是這樣的人麼？周恩來也跟上了，而且還能在文革的浪潮中全身而退，如果不左，而且有時候要極左，周恩來又如何能熬到最後？然而周恩來在左的時候，又有多少人被迫害

的妻離子散，身敗名裂？然而這正是大陸官方所不願面對或者故意遮掩的地方。

7月23日，彭德懷對周恩來說：「這次會議，我為什麼要寫這封信給主席參考？我有一個感覺，共產黨有不敢批評的風氣了，寫個東西要字斟句酌，我實在忍不住了。」然而，周恩來一語點破：彭的「骨頭是犯上」。周恩來的骨頭在「反冒進」之後就不再犯上了。

7月26日，周恩來批評彭德懷「把『失』放在前面是有意識的，應該把落實同洩氣分開」，彭德懷則針對周明明知道經濟困難而不敢言感歎：「你們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在批彭的時候，周不忘向毛澤東表示忠心：「馴服就是沒有骨頭？所有領導同志都要馴服，否則如何勝利？」

1959年6月12日，彭在列車上召開總結出國訪問的總結會議。他在講話中說：「無產階級專政，最怕的是官僚主義作風，領導脫離群眾，不曉得領導要走群眾路線，才能豐富自己、豐富領導。什麼是領袖，概念不明確。不能認為職務高就是領袖。馬克思對於巴黎公社的經驗很強調防止官僚主義，即，一、民主選舉公務人員，並可以罷免；二、公務人員的薪金不得高於一般人員。……這一次看到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給我們的印象是極深刻的。領袖遺體看到了列寧、斯大林、哥特瓦爾德、季米特洛夫，每個國家都搞一個。亞洲國家大概將來也要搞。」廬山會議期間，彭又幾次怒氣沖沖地說：他怎麼能這樣看待這個信！過去打仗時不是經常有爭論嗎，爭論過後還是照常工作，哪個去計較！現在怎麼變成這個樣子，一點意見也聽不進了！這樣下去，同斯大林晚年有什麼兩樣！

廬山會議之後，1959年8月24日，周恩來應軍委擴大會議主席團的要求，在會上作題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堅決粉碎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陰謀集團的活動》的報告。

報告將彭德懷的歷史分成15個時期：（1）平江暴動及其以後一段時間；（2）立三路線時期；（3）一、二、三次反「圍剿」時期；（4）第一次王明路線時期；（5）長征、遵義會議；（6）張國燾分裂時期；（7）北上長征時期；（8）洛川會議及其以後、東征以後西征；（9）第二次王明路線時期；（10）華北抗戰時期；（11）延安整風和華北座談會；（12）七大前後；（13）西北野戰軍時期；（14）抗美援朝時期；（15）主持軍委工作時期。周恩來歷數彭德懷的歷史問題。除此之外，引人注目的是，除了彭德懷以外，周恩來把張聞天和黃克誠也列入「高崗反黨集團的漏網分子，重要成員」，這一次是「高饒事件反黨聯盟的繼續和發展。」雖然周恩來表示：「我也不能說對彭德懷同志的歷史問題知道的完全的清楚。」但是這並不妨礙周恩來對彭德懷的歷史來個總的清算和鞭撻。

1962年七千人大會，在劉少奇作口頭報告談及彭德懷是「高饒集團」的餘孽時，周恩來插話表示：彭德懷是高饒事件中的主要成員。

二、彭德懷被「揪回」北京

文革前夕，彭德懷被變相「流放」到成都。標誌文革發動的號角《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於1965年11月10日在《文匯報》上吹響，預示著彭德懷必定再次墜入深淵，萬劫不復。以「保人」著稱於世的周恩來同這個時期的彭德懷關係如何？傳統的看法則是，周恩來對於彭德懷從成都被抓回北京不知情因而對於此事所述極為簡略，僅以接到西南局報告後給以指示，一筆帶過；或者宣稱周恩來對於被抓回北京的彭德懷給予了積極保護。但是歷史的真相如何？周恩來對於彭德懷被抓回北京知情不知情？周恩來對於抓到北京的彭德懷給予了哪些保護？採取了哪些具體的措施來保護彭德懷？周恩來對於彭德懷受到的迫害應該負哪些責任？

「揪彭」無疑符合毛澤東文革鬥爭的戰略決策和整體大方向，但在具體的執行中有以下幾中不同的說法：（1）在1966年12月份，在江青指使下，戚本禹提出或者在江青、

戚本禹的授意下，紅衛兵把彭德懷從四川「揪回」北京；（2）根據聶樹人的回憶，在12月的中旬左右，在周恩來參加的中央文革碰頭會上，江青提出「揪彭」，得到全體參加人員的同意。筆者對於這種說法表示懷疑，根據聶的回憶，參加人員有聶元梓、朱成昭、韓愛晶、蒯大富、譚厚蘭等人，而且當場並沒有指定由哪個紅衛兵組織去負責抓，為什麼去「揪彭」的隊伍只有地院東方紅和北航紅旗兩家而且顯得很有組織性？顯然聶的回憶同這一點不符。

筆者根據種種不同材料，推斷出「揪回」彭德懷的過程大致如下：在周恩來主持的中央專案組的會議上，做出把彭德懷揪回的決定。戚本禹指派閻長貴向朱成昭傳達了此命令。但是朱成昭前兩次所派人員被彭德懷感化均告失敗，特別是前兩批人員回到北京後，把他們在成都同彭德懷的談話記錄交給朱成昭。而朱本人則對彭德懷持有同情態度，就把這份談話記錄交給中央文革，結果被訓斥為「嚴重政治錯誤」。於是中央文革另起爐灶，馬上派北航紅旗去成都抓彭。在此情況下，朱成昭又派出以胡樂成為手的、100多人的大馬第三次赴成都抓彭。這時，彭德懷已經被北航紅旗的人馬抓走。地院東方紅仗人多勢重，把北航紅旗的人打得落花流水，搶走了彭德懷。然而朱成昭第三次派人，則是受了周恩來的直接命令的。這也是朱成昭在其自述和接受宋永毅先生採訪時一直堅持的：抓彭德懷回來是周恩來直接下令的。根據閻長貴先生同筆者私下的通信也間接證實了此點。

由以上所述內容可以推斷出，周恩來對於彭德懷「被揪」一事顯然非常清楚，並非《彭傳》所述：周恩來接到三線建委的緊急電話後，心知這一幕為江青所策劃，非常氣憤，又阻止不了，只能給以幾點指示。

實際上就在12月23日凌晨4時左右，彭德懷秘書綦魁英緊急找到三線建委副秘書長楊沛，告之彭德懷被紅衛兵所抓。楊沛向三線建委副主任錢敏打電話告急。錢敏感到事態十分嚴重，電話中答覆楊沛道：「我立即打電話請求國務院，你們要好地保護他」。而周恩來在24號才就北京航空學院等入川紅衛兵到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揪彭德懷進京一事電告中共中央西南局（並囑秘書電話告成都軍區）：（一）由成都軍區派部隊與紅衛兵一道護送彭德懷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許任何人截留，不得對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絕對保證他的安全；（二）不坐飛機，由成都軍區聯繫火車來京；（三）由北京衛戍區派部隊在北京站等候，並負責安排彭德懷同志的住宿和學習。此時的彭德懷已經身陷囹圄。周恩來對於彭德懷的關心遠遠不如對毛澤東的指示或者江青的提議所做出的反應來得及時。

三、彭德懷被批鬥

在文革中，批鬥重要的人物有兩種情形：一種是所要鬥的「走資派」、「反革命」、「叛徒」、「特務」等由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文革碰頭會決定，並將其交給特定的造反派或者紅衛兵批鬥；另一種情況則是造反派或者紅衛兵提出要批鬥的名單，由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文革碰頭會決定是否給予批准。這兩種情況彭德懷都遭遇到了。1967年7月中旬，北航紅旗受中央文革之命批鬥彭德懷，而這次批鬥是在周恩來主持的會議上作出的。在1967年8月19日周恩來就西安「工礦企業聯合會」等六個造反派組織要求揪彭德懷到西安批鬥一事批示到：「中央文革小組討論過，現在暫不讓彭德懷到外地去鬥。」這恰恰從另一方面證實，彭德懷在北京遭到的批鬥是經過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文革碰頭會同意的。

王力回憶說：我從秦城（監獄）出來後，北京市公安局的同志來找我，他是王稼祥的女婿。他坦率的說，判戚本禹判不下去，有些事情難定，如到四川揪彭德懷，戚本禹說他這是執行決定，是中央開會，總理主持做的決定。……他（們）問過汪東興、楊成武，是不是中央決定，他們說是的。再一條是把彭德懷交給群眾批判，結果搞成了批鬥，把彭德懷的肋骨打斷。戚本禹說這也是中央開會，總理主持，他執行的。他們也問了汪東興、楊成武，說確

實是中央開會決定的。對此，王力解釋說：我判斷是專案組的會。專案組的會也是周恩來主持的。專案組就是辦這種事的。揪人、批鬥、關人都是專案組管的。

雖然在這次批鬥中，周總理指示要「天派、地派聯合批彭」，並對批彭問題作了五點指示：不許搞「噴氣式」，不許武鬥，不許掛牌子，不許游鬥，不許搞「逼供信」。但是實際的情況卻是一旦交給那群對待他們認為是「叛徒」或者「壞蛋」的敵人，怎麼會手軟？這個是有前例可尋。1967年1月底2月初，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和國防科委副主任趙爾陸被造反派揪斗逼供致死的情況，周恩來是十分明白的。周恩來的這些指示無異於是給自己作一個政治表態絲毫起不了什麼大作用，事實證明也是如此，在1967年7月19日，彭德懷在紅衛兵手底下受到嚴酷慘烈的拷打。在這場批鬥中，年已七旬的彭德懷，被「打翻在地」七次，遍體鱗傷，慘不忍睹。而中央專案小組的領導們，對此情況是十分瞭解的，因為至少有三個渠道：第一個是中央文革自己的《快報》小組向中央文革提供最新動態的報告，而中央文革碰頭會正是周恩來主持；第二個是北京衛戍區的報告；第三個是來自紅衛兵自己組織的報刊。

彭德懷受到的非人待遇在北京衛戍區的報告上就寫的十分清楚。7月19日在場的北京衛戍區警衛戰士於次日向「中央文革」寫了一個報告：昨天北航開了三四十人的小會鬥彭德懷。會上打了彭德懷，打倒七次。前額打破了，肺部有些內傷。明天還要鬥。7月19日到22日，北京衛戍區對於彭德懷的監護記錄中寫道：彭德懷自19日參加鬥爭會後，食宿大大減少，精神很苦悶……進室後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難，不斷發出哎喲、哎喲的聲音，當晚未吃飯，不能吐痰。讓他寫材料時說：「我現在不能寫。」我們說，那不行。他又說：「寫不了，要不殺頭算了。」到22日精神稍好，起來後有點發牢騷，不斷出長氣……爾後躺在床上，但一夜未睡好。20日說：「今天胸部疼的面積擴大，而且又重了些，從床上起來很疼，也非常困難，起時需要哨兵拉一下，不然的話就起不來。」經醫生檢查胸部左右兩側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脈搏和血壓都有增加。7月22日，衛戍區又向上反映，彭德懷被毆打後「胸部疼痛，呼吸困難，痰吐不出來，不吃飯，不起床。據醫生初步檢查（未透視），可能有些內傷」。

在彭德懷遭受嚴重拷打以致肋骨骨折導致重傷後，付崇碧就把彭德懷的情況詳細報告給周恩來，並且附上胸片。20號的病志顯示：胸部正位象X線所見：（1）右第五肋骨中段骨折；（2）右第十肋骨末端可疑不完全骨折；（3）右膈角內小量積液（血）；（4）右肺下葉部分不張。但是周恩來也僅是表示以後沒有中央的批准不准再鬥彭德懷，實際情況卻是周恩來沒有採取任何實質性的行動和措施，例如把彭德懷轉移或者實施其他措施例如隔離或者送至301醫院「監護」，受到重傷的彭德懷在隨後幾天仍然遭到批鬥和毫無人道的摧殘。

四、彭德懷專案組組長

實際上，彭德懷專案組組長一直都是由周恩來負責或者兼任。楊成武回憶：「1959年廬山會議，發生了彭德懷的問題，會後設立了彭德懷、黃克誠專案組，當時由周恩來總理和賀龍副總理負總責，具體的專案組長是賀龍兼任的」。專案組組長的掛名是有個潛規則的，直接掛名的專案組的組長要高於被審查人的排名。例如在「二辦」中主管彭德懷先是楊成武後是黃永勝，但是掛名的卻是周恩來。對於彭德懷專案組的組長一事，《彭德懷年譜》如此記述：「1967年12月18日，專案組傳達中央專案領導小組指示，宣佈各辦公室領導成員和工作對象。彭德懷專案辦公室領導成員（略）。」一個略字，無字勝有字。

即使後來黃永勝接手主管彭德懷專案組，但是根據組織的原則，黃永勝也要把有關彭德懷的專案材料上報給周恩來，因為周恩來不僅是主持整個專案組的會議，中央專案委員會以

及以後的中央專案小組，都是由周恩來主持其日常工作並直接向毛澤東負責。

1981年1月23日最高法院特別審判庭在判決書中說「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三日，黃永勝同意彭德懷專案組提出要對彭德懷『判處無期徒刑，終身剝奪公民權利』的意見，對彭德懷進行迫害。」

但是事實的真相又是如何的呢？根據吳法憲的回憶原報告是這樣寫的：

永勝同志，遵照您對彭德懷結案材料可以上報的批示，現整理好，呈上，請審視。

時間為1970年年9月17日。

黃永勝在11月3日批示「同意」。

吳法憲說：按照我們當時的做法和理解，黃永勝批示的意思，應當是同意上報，而非同意該審查的結論。

吳法憲說：「在當時的情況下，彭德懷的問題不是黃永勝能說了算的。彭德懷的問題，中央早已經定了調子，除了毛澤東本人以外，任何人對此都不可能有任何的改變。黃永勝個人同彭德懷沒有什麼恩怨，他在這個位置上只能是替中央或毛澤東辦事而已。其實，當時的各個專案組的工作，事無鉅細都由中央文革碰頭會議周恩來負責。大一點的事情，要由毛澤東來決定。這是當時黨內一般的組織原則，也是一個常識。對彭德懷這一類人物的處理，別說黃永勝對此事沒有任何決定權力，就是林彪、周恩來，也是作不了半點主的。」

吳法憲更是表示憤慨：「彭德懷的問題應該由毛澤東來負全部或主要責任，算到黃永勝的頭上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黃永勝對彭德懷的問題是沒有決定權的。當時中央專案組上報的文件太多了，其中絕大多數都有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簽字。我想這些文件應該都還在。為什麼只算沒有決定權的黃永勝的帳，而不算有決定權的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帳呢？」

綜上所述，周恩來對於彭德懷所受到的迫害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推而廣之，對於在文革中被中央專案組所迫害的成千上萬的人面前，周恩來同樣是罪不可贖，因為對於作惡多端令人談虎色變的中央專案組，周恩來則是其首要負責人。在反思文革這場人類浩劫的同時，有人卻以種種理由來為周恩來辯護，只能用毫無說服力和具有真實客觀性的「違心」來為之開脫，在鐵的事實面前，周恩來的本來或者歷史原有的形象，難道不應該浮出水面嗎？

第二部分 第九章

賀龍被整與周在其中的作用

賀龍之所以倒台，其根本原因在於：在毛澤東眼裡，他是站在劉少奇、羅瑞卿一邊的，是不可以信任的。在賀龍被迫害的過程中，雖然林彪涉入很深，但是無疑又一次成為給眾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掩蓋劣行的「替罪羊」。

毛澤東最初確實沒有要打倒賀龍，只是考慮將賀龍奪權、讓賀龍靠邊。但是，由於賀龍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表現使毛終於作出整肅賀龍的決定。賀龍對待劉少奇的態度始終不能讓毛澤東滿意。賀龍四處插手在先，林彪搜集材料報給毛在後。林彪僅是毛澤東安排搜集材料的其中一位。而成鈞等人供認的「賀龍兵變計劃」讓毛澤東徹底改變了主意。

周恩來在賀龍事件初期是伸出援手過（在本文不是討論的重點，如有興趣者請參看官方《賀龍傳》以及《周恩來傳》等）。但是致命性的兩封揭發信連使本來對賀龍持同情態度並

給以有限保護的周恩來來了個180度轉彎。在賀龍被專案組審查和迫害的過程中，周恩來則更是難辭其咎。周恩來負責實施了整肅賀龍的決定。而且人們至今還沒有注意到的是：周在給賀龍平反的過程中有意拖延和阻撓，最終導致了賀龍在1974年並沒有完全被平反，而是留下了「尾巴」。薛明一家在最後也忠于明白事情的真相。

一、毛、劉衝突是賀龍遭整肅的根本原因

1. 毛、劉衝突

中共黨史上每一次權力鬥爭都會冠之以路線原則鬥爭，並以此對所涉人員劃線。毛澤東的名言之一就是：「對路線問題、原則問題，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則問題，我是不讓步的。」

三年大饑荒之後，在中共要員眼裡，毛澤東與劉少奇相比，一個是威望大損，而另一個則是如日東昇。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足以讓毛澤東懷疑自己的接班人是中國的「赫魯曉夫」。雖然毛澤東後來承認：從政治上搞掉劉少奇是從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條發表。其實還要更早。

就在七千人大會以後不久，毛澤東已下令審查劉少奇的歷史問題，開始策劃排除劉少奇為代表的黨內高層的反對派。隨著社教的進行，更是讓毛澤東覺得大權旁落。1964年，「四清」運動開始，毛澤東要求高級幹部下鄉蹲點，但是遲遲不見動靜。劉少奇在南下視察安徽時候，發火：「幹部不蹲點，不能當省委書記、地（市）委書記、縣委書記」，甚至說沒有資格當中央委員。大批省部級幹部才紛紛下鄉。

除此之外，劉少奇還指責毛澤東的調查研究辦法過時了。更令人難以忍受的是，劉少奇竟然含沙射影的說毛澤東的著作是「教條」的。對此，毛澤東不能不感覺到「大權旁落」，內心對劉少奇非常反感。毛澤東在1964年9月12日，當計委領導小組匯報計劃工作，並要求毛澤東對財經工作掛帥時，毛澤東說：「我看還是少奇同志掛帥。我年紀大了，有時我妥協，他厲害……比如這一次他下命令，一定要下去，一定要蹲點，說過去蹲點是假的，都得下去。我有時妥協，我有我的弱點。他有他強的地方。」

1964年11月底，毛主席在一次會議上說：「還是少奇掛帥，四清、五反、經濟工作，統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測風雲，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現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點，我罵娘也沒有用，不靈了，你厲害，你就掛個罵娘的帥，你抓小平、總理」。毛澤東在12月26日過生日時還說：「我沒有蹲點，沒有發言權也要說，錯了，大家批評。」

於是，從七千人大會到四清運動，毛澤東和劉少奇的矛盾不斷深化，終於變得難以調和，終於使毛澤東認為黨內存在「兩個司令部」，要整倒「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回到一線。

2. 整肅羅瑞卿

對於毛澤東來說，到底誰是屬於「劉少奇司令部」的，並無明確範疇。但是，只要不是旗幟鮮明地站在我這邊，腳踏兩條船的，就是屬於被整的範疇。在毛、劉之間搞投機的人，想腳踩兩條船的人自然為數不少。而毛澤東下定決心，要搞「文化大革命」，前提就是要先把軍隊牢牢掌握。對於軍隊裡面那些毛澤東認為對自己不忠的人，對劉少奇親近的人，自然屬於要「清洗」之列。於是羅瑞卿便首當其衝。

羅瑞卿上任之初，曾經諮詢過彭真的意見。彭真告訴羅：你不去掌握軍權，誰去？任務

雖重，但也有好處，可以多接近書記處，多接近鄧小平，多取得他們的指示。他們指的是誰，不言而喻。邱會作回憶到：賀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時候，上邊有人對羅瑞卿打招呼，讓他當國防部長。1965年春，劉少奇在昆明講接班人的問題時，提出一些人泡病號、不工作，豈不知，長期不工作，就是最大的錯誤。羅瑞卿在向林彪匯報工作的時候，就提到了劉少奇的這個講話精神。1965年2月18日，羅在國防工辦黨委會上說：「劉少奇怎麼不支持（指部院合併）？黨中央的副主席，戰時就是三軍統帥！」劉少奇在1965年5月，公開放言：我們的國防部長的接班人是羅瑞卿。羅瑞卿私下對其子女說：我們這些人（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人）是少壯派，以後要靠我們這些人。根據羅瑞卿自己的敘述，劉少奇曾經在背後散佈過周恩來的流言蜚語，這不正說明劉、羅走的很近嘛？在毛澤東看來，羅瑞卿的屁股已經坐在劉少奇那邊，已經是不可信任和重用的人。而奇怪的是，羅瑞卿在不同的場合下，包括公開的講話，關於軍隊事務的講話，竟然把劉少奇和彭真單獨點出來，例如表示此決議劉少奇已經看過也同意了。如果說劉少奇還可以理解的話，那麼怎麼理解羅瑞卿為何也要這麼提起彭真呢？

羅瑞卿在手握大權之後，飛揚跋扈，得罪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等老師，導致林彪左右為難，不得不把問題提交給毛澤東解決。壓倒駱駝腰的最後一根稻草則是，羅瑞卿斷然拒絕江青的提議。文革發動前夕，江青借解決軍隊文藝工作的問題為名插手軍隊，要求羅瑞卿支持其搞軍隊文藝座談會，被羅拒絕了。於是羅瑞卿成了毛澤東要發動文革的絆腳石，被毛澤東首先清除出局。正如文革史專家丁凱文先生所述：毛在文革中多次說過：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的重要標誌是打倒了「彭羅陸楊」。「彭羅陸楊」是連在一起的，毛是作通盤考慮的，「彭羅陸楊」就是劉鄧司令部的前沿陣地。

自1962年2月17日，林彪就開始病休，軍委日常工作由賀龍和聶榮臻共同主持。但是賀龍主持的國防工委和聶榮臻主持的國防科委因為機構重疊的問題，兩者矛盾重重，如同水火。中央軍委只得另組國防工辦來協調賀聶的關係。但是羅瑞卿在處理過程中，卻未能處事公道，偏向賀龍，引起聶的極大不滿。曾任賀龍辦公室副主任、賀龍的秘書何家為認為：賀龍和羅瑞卿的關係很好，但是軍委的其他幾位副主席都是受羅瑞卿打擊的。賀龍則不然，兩個人互相支持。毛澤東曾多次對羅瑞卿說，要多向賀龍請示工作。賀龍卻由此和羅瑞卿走的太過於近乎，不僅在工作中還是日常生活中。當毛澤東要拿掉羅瑞卿的時候，賀龍自然也在考慮之中。

1965年1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聽取中南局匯報工作時有段插話（是一大段的插話），特別強調了要突出政治：「有的同志重業務、輕政治，是方向問題。但不是說，不要業務。……可見，搞個人野心總是搞不久的。我們黨五朝書記都不好，但也沒有人能把黨搞垮。最危急的是內戰後期，王明路線的幾年。遵義會議後十年，雖然還是洛甫當總書記，王明路線基本被克服。但抗戰初期，也有過王明路線。……因為搞個人野心，總要有幾個人合謀，可是聯絡人多了，就容易暴露了」王任重說：1964年6月15日、16日上午，毛主席在北京西郊觀看大比武表演，16日下午，毛主席在十三陵水庫管理處一棟兩層樓的小會議室向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同志講話，講了半個多小時，講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地方黨委抓軍事問題，一個是準備後事要搞接班人問題(接班人五個條件)。其中尖銳地提到五朝書記，但沒有與「野心家」聯繫起來。1965年1月毛主席講話特別強調了「野心家」，「野心家」指誰，當時誰也不知道，也不便問。

毛在當年對羅瑞卿問題批示到：羅個人獨斷，羅是野心家。凡是要搞陰謀的人，他總是拉幾個人在一起。毛澤東在1月份的話不就是這個批示的翻版麼？

作為孤立和打擊羅瑞卿的第一步，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肖向榮在1965年11月19日被批。有人「策反」肖向榮：「羅瑞卿是犯了反黨性質的錯誤，你要與羅劃清界限，揭發羅的問題」。11月30日，批判肖向榮的會議結束之際，會議主持人王新亭特意來詢問

賀龍：「賀總，現在批肖向榮，說肖向榮的後台是羅瑞卿。」賀龍反問為什麼，王回答羅諷刺林彪。賀龍說：「如果沒有別的根據，就不要胡亂猜疑。羅是扛大旗的，是擁護毛主席、擁護林總的。說他反林總，這是不可能的事，你們不要往那方面去想。」但是事隔兩天，也就是12月2日，王新亭再次找賀龍，告之批肖的事情要出簡報並且將寫上羅是肖的後台。賀龍堅持說羅瑞卿絕不會反黨，這個不僅可以擔保而且可以傳達。

實際上這是毛給了給賀龍一個表態的機會。毛澤東也給了林彪同樣的機會。在11月初，毛澤東就要求林彪對羅的問題表態，並表示如果林身體不好可以由葉群代為匯報。在11月底毛澤東召見葉群之後，從此有了「羅瑞卿反對林副主席」的說法。而毛澤東在12月2日就大罵了羅瑞卿是野心家。林彪的表現比賀龍更令毛滿意。

於是，整肅羅瑞卿，賀龍被完全蒙在鼓裡。上海會議結束後不久，召開了中央軍委常委會，毛澤東決定不再讓賀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賀龍被葉劍英取代了！根據文革史專家余汝信先生的研究：因為羅所處的敏感位置，毛澤東當然認為會前知情的人越少越好，以免走漏風聲。惟多種材料及回憶表明，常委中除毛、林之外，起碼周恩來、鄧小平是知情的。據周恩來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毛澤東到達上海的當天，12月5日，即召周恩來從北京飛上海。當天，周在毛召見後，即成為毛有關批羅指示的實際執行者。其他與會者中，起碼陶鑄、謝富治、葉劍英、肖華、楊成武、李作鵬、張秀川、王尚榮、雷英夫等是知情的。政治局成員中，劉少奇、彭真、賀龍等不知情並不奇怪。在毛的心目中，羅與他們走得那麼近，提防還來不及，豈能讓他們事先知情！至於彭真，毛就乾脆以在京「看家」為名不讓他到會。而且周恩來還特意讓吳法憲對彭真封鎖消息！

事情很明顯，賀龍已經同羅瑞卿成了拴在同一根繩子上的螞蚱，而且在毛澤東的眼裡已經成了劉少奇的人馬，屬於要拿掉的人！自然，下面接著批羅的事情，毛澤東沒有讓賀龍掺合，而是放了賀龍的「假」，為解決羅瑞卿問題的會議打開方便之門。同樣，毛澤東也有意暫時讓賀龍「清醒」，做個逍遙派，以免在解決羅的問題上又陷了進去。但是事實證明，即使後來毛澤東當面點撥賀龍之後，賀龍依然我行我素，終於導致自己被徹底打倒！

3. 賀龍和劉少奇、羅瑞卿之間的關係

毛澤東在1964年底異乎尋常的發了「雷霆之怒」，以「四清矛盾」為出發點，於1964年12月28日，1965年1月3日、5日，毛澤東連續指責劉少奇，最後竟然得出結論說：白區的正確代表是李雪峰。最後由於王力和陳伯達的努力，劉少奇主動向毛澤東道歉，作為回應，毛澤東對一些領導人表示：「我批評了少奇同志了，但你們今後還是要聽他的話喲」

從以後的發展來看，毛澤東此招純是「煙霧彈」。劉少奇的道歉就是真心的嘛？劉少奇很清楚，自己同毛澤東相比，最大的劣勢在於一個是軍隊，一個是毛澤東作為偉大領袖多年來樹立的崇高威望。

而在1965年的5月26日《體育報》和《解放軍報》率先刊登出《毛主席劉主席暢遊十三陵水庫》一文。接著1965年5月27日，《人民日報》以頭版顯著位置發表了署名《體育報》、《解放軍報》記者的通訊報道《毛主席劉主席暢遊十三陵水庫》。全國各大報1965年5月28日紛紛轉載該文。雖為通訊報道，但是此事卻是1964年6月16日的事情。事過一年，《人民日報》才在頭版發表此事，究竟是為什麼？

此文完全是大搞個人崇拜。記者報道：

「從車上步下兩位身材魁梧、和藹可親的人，邁著穩健的步伐，向水邊走去。正在水庫裡游泳的首都高等院校學生和解放軍戰士，遠遠就認出這是我們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和劉主席，人群中立刻響起一片歡呼聲：

『毛主席來游泳啦!』

『劉主席來游泳啦!』

青年們看到毛主席和劉主席紅光滿面，精神煥發，只覺得一股幸福的暖流傳遍全身。毛主席和劉主席撥開千頃碧波，肩並肩地向前游進。時而側泳，時而仰泳，神態悠然，輕鬆自如。青年們緊緊跟在毛主席和劉主席後面，鬥志昂揚，破浪前進。」

此時毛澤東遠在井岡山，而這次報道又是《體育報》和《解放軍報》記者搞出來的，羅瑞卿在此次游泳中又是全程陪同，文中又大肆為劉少奇唱頌歌，宣傳規模空前，其目的是不言而喻的！相對應的是，賀龍主管的《體育報》卻不登毛澤東語錄。

當毛、劉衝突伊始的時候，形勢並不明朗，中共高層或許只有周恩來一個人洞若觀火。周恩來在1971年對韓丁談話時明確指出文革的苗頭始自於1962年。斯諾在1964年訪華時要求訪問劉少奇，卻被周恩來拒絕，與之對應的是1961年蒙哥馬利訪華，周恩來得知蒙氏在探詢誰是毛澤東的接班人時特意安排蒙與劉會面。鑒於會見外國人的特殊敏感性，周恩來此舉可謂微妙。而對應的是，當時掌握軍隊相當大權力的賀龍、羅瑞卿等人卻懵然不知，腳踏兩條船。對於毛澤東來說，不能一心一意，就是「小老鼠們，船要沉了，就要搬家了。」

從1964年底到1965年初，毛澤東和劉少奇的衝突愈演愈烈。當毛澤東決定要清除劉少奇時候，最擔心的並不是劉少奇的黨務系統，而是軍隊，是劉少奇對於軍隊的滲透以及軍隊高級將領的是否「變心」或者「腳踩兩條船」。

在1965年5月份召開的軍委作戰會議，引人注目，廣為人知的是林彪兩次對羅瑞卿的動怒。第一次是因為羅瑞卿在召開之前並沒有和林彪商量。第二次是因為葉劍英等人告狀，羅瑞卿自作主張作了作戰會議的總結講話，拆了葉的台。不為人們所注意到的則是，5月19日劉少奇接見在北京召開的軍委作戰會議全體成員。羅瑞卿事先請求在京常委接見與會人員，但是林彪以健康理由推遲。林彪突然改變主意，臨時到場，並在劉少奇宣佈散會之時，表示要講話。林彪否定了與會領導包括劉少奇、周恩來等人已經認可的與會者的發言。此意表明劉少奇並不能在軍隊中享有決定權，進一步延伸則是代表毛澤東講話的林彪阻止在中央主事的劉少奇插手軍隊事務。

與此成鮮明對比的是，羅曾在1965年10月份講：「軍隊幹部參加地方社教運動，應該按照劉主席的指示辦，劉主席的指示一定要執行，但要先試點，劉主席也是這樣講的。」賀羅在視察軍隊的時候，更是露骨：「我們是代表劉主席來看望你們」。

同此事相互對應的是，劉少奇在同年夏天，悄悄走訪賀龍。根據賀龍子女的回憶，劉少奇和賀龍話不投機，並當面批評了劉少奇：一九六五年夏天的一個晚上，劉少奇不預先通知就突然來訪。劉少奇坐了一會兒，沉著臉走了。爸爸氣得在屋裡走來走去，憤怒地自言自語：「想搞什麼名堂！？有什麼了不起？不尊重毛主席，我就要批評，就要提意見！……。」雖然賀龍子女百般「澄清」，仍然表明：劉少奇在文革前夕極力拉攏串聯賀龍並不是子無虛有的事；劉少奇同樣希望能夠獲得軍隊高級將領的支持，取得同毛澤東鬥的資本，同毛澤東抗衡。筆者認為劉少奇對賀龍做了某種承諾，賀龍在文革初期才表現的有恃無恐。這種拜訪並不是沒有結果，在文革展開之後，賀龍對劉少奇的態度相對於其他一些高級將領例如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陳毅等是迥然不同的。

而在上海會議批羅瑞卿，劉少奇飛到上海還沒有下飛機，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徐業夫就把批羅的資料送上飛機。當天晚上，劉少奇來到賀龍住的地方，詢問賀龍是否事先知道批羅。賀說不知道。劉少奇說：「這麼說，咱們大家事先都不知道嘍。」劉的這句話，意味深長。

劉少奇為什麼要找賀龍問呢？

聶榮臻說：「劉鄧只聽賀龍、羅瑞卿的話，不安排，不聽我們的意見。薄一波也出來說：

『什麼新型材料，我不懂。賀龍 6 2 年在北戴河會議上，要中央重新考慮『二彈為主，導彈第一』的方針。』羅瑞卿與賀龍一唱一合，大叫：『能安排的就要安排，不能安排就堅決不安排，國防工業生產耽誤了，工辦負責任。』

上海會議期間，已經成為毛澤東發動文革「絆腳石」的羅瑞卿被整，在此時，同羅瑞卿關係密切的賀龍，並沒有表現出同羅劃清界限。除此之外，賀龍同劉少奇彭真等人的密切關係，也是賀龍被毛澤東懷疑成「不能夠繼續重用的軍隊領導人」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同次會議上，賀龍被解除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權力。

4. 毛澤東對賀龍的態度

應該說，賀龍對於毛澤東是支持的。突出表現在：（1）二、四方面軍北上同一方面軍會師；（2）在延安整風期間，賀龍積極支持毛；（3）賀龍領導的晉西北根據地對於延安的大力支持；（4）建國後的廬山會議。特別是廬山會議，賀龍出於個人恩怨猛攻彭德懷的表現讓其成為直接受益者。

但是，關於賀龍在廬山升任軍委副主席一事卻存在著諸多不實說法。1959年8月11日毛澤東主持的八屆八中全會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彭德懷、黃克誠的工作改換問題，請大會討論，同時並決定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批判彭德懷。周恩來找林彪談話，傳達毛澤東的意見，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全軍的事都要管。但是林彪推辭不幹。同時林彪私下委託羅榮桓和羅瑞卿向毛澤東進言，林彪身體難以勝任國防部長，賀龍則是合適人選。但是毛澤東並沒有聽取意見，還是決定林彪為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兼國防部長，賀龍為中央軍委第二副主席，聶榮臻為第三副主席。

賀龍在「突出政治」，突出「毛澤東思想」方面也不落人後，徐寅生如何用毛澤東思想打乒乓球」就是一例。

應該說，毛澤東對於賀龍是十分信任的，當林彪以身體原因不能繼續工作時，宣佈由賀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那麼毛澤東什麼時候開始對賀龍不放心的呢？

正如前面所述，毛澤東對於劉少奇插手軍隊是嚴加防範的，對於軍隊表現持有二心的將領是很懷疑的。恰恰在1964年四清期間許多人都感覺到毛、劉之間出現微妙不合的時候，賀龍的表現可謂獨樹一幟。

1964年9月18日，賀龍視察解放軍政治學院。賀龍公然說：「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總司令是劉少奇。」「以後報告要經過羅瑞卿批准，你們為什麼不請劉少奇、鄧小平、彭真做報告，王光美也可以嘛，他們是靠的住的。」值得一提的是，賀龍在一些敏感時候公開場合的講話不能不讓毛澤東重新考慮賀龍的立場。

私下裡的賀龍，對於毛澤東和劉少奇有過比較。賀龍對其長女賀捷生說：「你在宣傳部工作，不能犯錯誤太多，特別是《論共產黨員修養》，你這個小黨員要好好看，研究研究，你就是政治嗅覺不靈，幹不了什麼大事，一定要向《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請教。」另外，賀龍由於性格豪放，經常不拘小節。1962年毛澤東接見國家乒乓球隊並觀看球員表演，賀龍站在門口看了10分鐘就走人。1964年毛澤東接見運動員，賀龍沒有露面。在1966年國際乒乓球邀請賽閉幕式上，樂隊奏《東方紅》，全場起立，賀龍卻一個人起身走了。薛明在家裡從電視上看到這一場景，禁不住喊出聲：「糟了。」

但是，在中共的高層，竊聽、監視甚至互相臥底的情況屢見不鮮。有關人員的往來、談話、行動都會有人注意並且上報。毛劉之間更是如此。1965年11月，毛澤東離京四處「交底」，密謀倒劉部署。但是在中南海的劉少奇辦公室收到一份無抬頭、無署名，打印在一張白紙上的毛澤東在外地與幾位負責人的談話記錄。其中有毛澤東談四清運動：「王光美在河北省搞四清，河北省領導不了，華北局也領導不了，是他（指劉少奇）親自領導的。」

他有他的長處，我有我的弱點。他有一股硬勁，我愛妥協。我說不行，他說行。……他是第一副主席，瞞不住他……。」而毛澤東也不示弱。羅瑞卿在任公安部長時，曾經因為交報告少而遭毛澤東訓斥：你的黨性比 XX 差，比 XX 委的人差，他們 XX 部，XX 委買茶葉的事我都知道，你們公安部的事情我不知道。」毛澤東真的不知道公安部的事情？毛澤東是在提醒羅瑞卿不要自己做大，太過於自主。

由此可以推論，賀龍的諸多不敬行為，瞞過毛澤東的可能性不大，且不說其有部分是公開講話。這些「大不敬」很容易在毛澤東那裡產生歧義，在毛澤東緊盯劉少奇，防止劉少奇挖自己軍隊牆角的關鍵時刻，賀龍的這些話在毛澤東聽來，無異與是向劉少奇表忠心。不僅地方大員黨務幹部唯唯諾諾，視若神明，連屬於自己「禁衛」的軍隊系統幹部也向劉少奇輸誠。這些無可避免的進一步加劇毛澤東要搬倒劉少奇的想法，猶如多米古諾牌效應，反過來會加深毛澤東對賀龍的猜忌和不滿。

毛澤東準備在國內做「大手術」的時候，出於安全考慮，借赫魯曉夫下台之機，決定同蘇聯緩和關係。1964年11月5日，中央派出黨政代表團(團長周恩來，副團長賀龍)離京赴蘇參加莫斯科紀念十月革命47週年的慶祝活動。但是，期間卻發生了令毛澤東震驚的一件事。11月7日晚上，蘇聯國防部副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對賀龍說：「我們現在已經把赫魯曉夫搞掉了，你們也應該做我們的榜樣，把毛澤東也搞下台去。這樣我們就能和好。」賀龍同志一聽這話，立即很嚴肅地對他說：「這是根本不能相比的兩回事，我們黨和你們的情況是完全不一樣的，你的想法是根本不會實現的，而且是錯誤的。」周恩來在聽取賀龍報告後一再向蘇方提出強烈而嚴正的抗議，直至勃列日涅夫道歉。

事情更加嚴重的是，11月8日，美國、英國等國的通訊社根據頭一天馬利諾夫斯基一事從莫斯科報道：這裡的權威人士說，蘇共已和中共達成協議，要毛澤東下台，由周恩來當中共中央主席。對照歷史，蘇聯通過共產國際的組織手段，改變別國黨的領導人，不是沒有先例。共產國際解散後，在斯大林時代以及以後的若干時間，蘇聯也從別的國家黨內找到內應並施加影響和壓力，從內部進行顛覆，以改變不按其指揮棒轉的別國黨的領導人。

這件事有雙重效應。其一是大大影響了毛澤東對賀龍的態度，其二是當賀龍被整肅之後，周恩來會變本加厲來整肅賀龍以洗清自己在其中的干係。

這些事對賀龍的影響絕對深遠。

赫魯曉夫的下台與上台都與軍隊密切相關。著名文革史專家王年一如此評論：搞掉赫魯曉夫得力於軍方的支持。馬林諾夫斯基如此猖狂挑釁，對毛澤東有何影響，不得而知；但可以確知，毛澤東此後想到了政變問題。

1965年10月以後的幾個月中，毛澤東提出了防止和對付「兵變」、「政變」的問題。1965年10月10日，毛澤東在同大區第一書記談話時說，不要怕兵變，不要怕造反。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應該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線，就可以造反。1965年底和1966年3、4月間，毛澤東問過軍隊和地方幾位領導同志：如果北京發生政變，你怎麼辦？肖華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去年上海會議後，主席又問許世友同志，假如北京發生了政變，你怎麼辦？主席說，出修正主義不只是文化出，黨、政、軍也要出，主要是黨、軍。這是最危險的。」

1966年4月，江青對劉志堅表現出憂心忡忡的樣子，說她耽心「毛主席在杭州的安全沒有保障。」劉志堅立即轉告總參謀部，總參謀部立即通知南京軍區許世友採取措施，加強對毛澤東的安全保障，許世友立即作了部署。總參請劉志堅將此情況報告周恩來和軍委。劉志堅從上海趕到杭州，向周恩來、林彪、葉劍英作了報告。此後在「兵變」、「政變」的問題上的定位一直到林彪作了著名的「518講話」時到了一個頂峰。

那麼，毛澤東擔心誰會搞「兵變」？1965年底和1966年初，毛澤東在武漢和杭州的時候，曾經兩次同陳再道談話：「中央可能會出現修正主義分子，你是聽誰的呢？聽我

的，還是聽什麼人的？你不是已經揭露了羅瑞卿了嗎？豈只一個羅瑞卿呢，還有比他大的呢，他們都盼望我下台。就像赫魯曉夫搞斯大林那樣來搞我，就像勃日列涅夫趕赫魯曉夫下台那樣來逼我下台。這都是可能的，你不要以為我是在和你講故事。你們要有這個思想準備，出現了這樣的問題你們怎麼辦？」陳再道表態說：「主席，你放心，我是堅決地站在你這一邊的，堅決地要和一切修正主義分子進行鬥爭，而且要鬥爭到底。我除了你其餘誰都不認。這點，已經有人跟我打了招呼了。」或許正是這個表態才讓陳再道在「7.20事件」後仍然被毛澤東稱之為「同志」，得以保全性命？。

那麼誰是比羅瑞卿更大的人物？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接見阿爾巴尼亞共產黨領導人時說：「我們的軍隊也不是沒有問題的。像賀龍是政治局委員，羅瑞卿是書記處書記，總參謀長。」至此真相大白於天下！

毛澤東在《五一六通知》中寫道：「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賀龍、羅瑞卿正是毛澤東心目中混進軍隊裡面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

中國有句俗話，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在蘇聯人眼中，賀龍自然是「有縫的那隻蛋」。而毛澤東在發動文革的一個很大的目的就是「防止出現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來作「秘密報告」，同蘇聯這麼搭上界的，自然屬於被懷疑之列。所以無論以後賀龍如何洗刷自己，總是有點「跳進黃河裡也洗不清」的味道。

劉少奇說：主席前幾年同羅瑞卿、賀龍同志講，我們國家是否會變顏色，如果發生改變，會不會把我們也抓起來？賀龍同志當時聽了傻了。

在1973年12月21日，毛澤東表示是聽了「林彪一面之詞」，賀龍被搞錯了。但是同時，毛澤東也表示：這個人經常身上有武器。可見，賀龍的「軍閥」形象對毛澤東的刺激甚深。筆者認為：如果說發生兵變，毛澤東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賀龍。

5. 林彪與賀龍的歷史糾葛

在延安時期，毛澤東曾經向賀龍談起林彪，並對林彪做了一番負面的評價。諸如林彪表面上承認毛澤東的領導而背後卻寫信要撤換他（指會理風波——筆者註），另外林彪愛出風頭不能顧全大局等。賀龍借此事詢問陶鑄，知不知道林彪在歷史上的問題。陶鑄告訴了林彪。根據羅瑞卿的回憶，賀龍對此表示了極大的義憤！薛明回憶：早就知道林彪的歷史問題，而且做過揭發！薛明說：周恩來告訴賀龍同志，陶鑄向林彪反映賀龍講了林彪在長征中的壞話！

根據《賀龍傳》的記載，蔣介石曾經在1938年1月於洛陽召集第二戰區軍官會議，林彪、賀龍等人都參加了。會後，林彪曾給賀龍寫了一張紙條，上面寫道：「蔣介石是有抗戰決心的，我們回部隊後可吹吹風。」此事成了林彪的心事。筆者認為，此事有被大肆渲染之舉。在國共合作抗戰的初期，表達過類似意見的不少，彭德懷還喊過蔣介石萬歲，周恩來也說過不少蔣介石的好話，歷史環境使然。

薛明在延安曾經揭發過葉群，此事被認為後來林彪整賀龍的原因之一。在延安，薛明揭發葉群那件事，明明是薛明的錯，如今一邊倒的回憶錄都咬定葉群有特務嫌疑，其實是不公道的。當時延安整風中的「審查幹部」運動，或者叫做「搶救運動」，普遍存在的過左的傾向，片面誇大敵情，冤枉好人。如今都說是康生的錯，其實錯者絕非康生一人，否則也不會成為「運動」。許多人成為受害者，諸如柯慶施、陶鑄和曾志，等等。最慘的當然是王實味，直到被冤殺。葉群也是受害者。像葉群和薛明這樣來自大城市的青年學生，當時是懷疑的重

點。我們不排除薛明也曾遭到過懷疑的可能。薛明揭發葉群，有可能是受到了左傾思想的影響，也有可能是為了撇清自己，也有可能是出於女人間的嫉妒。不論何種原因，事後總應該有個正確的態度。認為自己是革命的，沒錯。但不要非得把別人說成是不革命、反革命、特務。事後不僅薛明沒有一個正確的態度，賀龍也沒有。甚至現在寫回憶錄的人也沒有，就因為葉群是林彪的老婆。「搶救運動」做到別人頭上是不對的，是毛澤東、康生的錯。做到葉群頭上，難道就是對的嗎？

筆者認為，第一件事，毛澤東難逃挑撥離間之罪。如果林彪真的有錯誤，毛澤東有權利批評，但是在另一位高級將領賀龍面前談及，實在是不利於團結，而是呈口舌之快，搬弄是非。第二件事公正地說，林彪是做了一件好事。歷史也證明了蔣介石有抗戰之決心。為了抗戰抵禦外侮，利用蔣介石，鼓舞士氣，何罪之有？第三件事，筆者認為諸多文墨騷客應該客觀看待歷史和秉直書寫歷史，而不是「為政治服務」。試想，賀龍在最後時刻，不就是因為「一切都要為政治服務」而被耽擱，以至於不幸身亡！

其實除了宿怨之外，林彪對賀龍還有「知遇之恩」。

彭德懷在1959年的7月14日上書毛澤東後，其下台的命運即以決定。林彪在8月4日出席劉少奇主持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向新上廬山的中央委員傳達中央的精神。林彪說：「…我是先到的援兵，你們是最後到的一批援兵。……」但是什麼時候毛澤東開始同彭德懷以及其他政治局常委們討論國防部長「換馬」的呢？根據《彭德懷年譜》，毛澤東在8月1日對於彭德懷提出的不再管軍委一事表態說「現在不談此事，還是你幹。」但是在8月7日，毛澤東單獨同彭德懷談完之後，彭德懷委託其秘書寫一個辭掉國防部長、軍委委員、政治局委員的信。在8月11日毛澤東主持的八中全會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彭德懷、黃克誠的工作改換問題，請大會討論，同時並決定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批判彭德懷。

但是林彪對於此事的反應如何？根據當時林彪的秘書關光烈的回憶，林彪對於此事非常不感興趣。早在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反軍隊教條主義」的時候，林彪就寫信告訴毛澤東，說自己身體不好，不能參加，林彪還委託羅榮桓向毛澤東說自己不想幹，毛澤東批示還是要林彪干。但是舒雲並沒有解釋林彪不想幹什麼。根據 Frederick C. Teiwes 和 Warren Sun 合著的《The Tragedy of Lin Biao: Riding the Tige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1》中透露，根據他們的採訪，對於廣泛流傳的：

廬山會議期間，彭真從廬山打電話給羅榮桓，通報了會議情況，並說，毛主席準備讓林彪接替彭德懷國防部長的職務並徵求未出席會議同志的意見。羅榮桓說，國防部長外事任務較重，林彪身體不好，似不宜擔任這一職務。羅榮桓建議由賀龍任國防部長。彭真向毛澤東報告了羅榮桓的意見，然而未被採納。

事實真相則是，正是林彪私下委託羅榮桓這樣做的。林彪同時委託羅瑞卿向毛澤東進言，不同意林彪出任國防部長，所有這一切充分表明了林彪對於出任國防部長毫無興趣。

而關光烈的回憶則證實了這一點。1959年的廬山回憶開到一半，毛澤東命令林彪上山（筆者註：根據種種材料筆者推斷林彪是7月29日才上廬山；亦有材料認為林彪是25日上山，例如最新明鏡出版社出版的《林彪日記》）。林彪上山後，周恩來找林彪談話，傳達毛澤東的意見，由林彪擔任國防部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全軍的事都要管。林彪讓關光烈給周恩來打電話，說他的身體擔當不了國防部長。8月17日八中全會決定撤銷彭德懷國防部長和中央軍委委員的職務；同時決定林彪為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兼國防部長，賀龍為中央軍委第二副主席，聶榮臻為第三副主席，但是正式公佈則是在9月17日。

二、毛澤東終於作出整肅賀龍的決定

1. 賀龍在文革初期的表現

值得指出的則是，賀龍雖然被毛澤東暫時拋棄在一邊，但是並無要繼續整肅的理由。可是賀龍自己並沒有認識到毛澤東用人的戰略，沒有認識到自己可以成為牽制林彪的一個棋子。在毛澤東整肅劉少奇的時候，賀龍不積極同劉少奇劃清界限，沒有能夠反戈一擊，於是賀龍在毛澤東的棋盤上成了「閒子」。而賀龍自己卻不甘寂寞，到處插手，從而導致自己被動，以致被整。

（1）文革初起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上海《文匯報》發表，而彭真掌控下的《人民日報》遲遲不予理會，直到11月30日才轉載。此事後來成為彭真對抗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罪證。各地方報紙轉載的時間各有不同，華東各省率先響應，很多省卻按兵不動。毛對此極為惱火，成為以後算賬的一個依據。

賀龍在這之中的表現肯定是不能令毛澤東滿意的。有一個例子是四川省委當局對於是否要在《四川日報》上轉載姚文元的文章舉棋不定，於是向鄧小平打電話請示，碰巧鄧小平不在，於是又打電話給賀龍，賀龍回答不轉載。於是，《四川日報》便沒有及時轉載，一直拖到12月18日，比北京還晚了半個多月。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澤東同康生連續三次談話。毛澤東嚴厲批評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壞人，壓制左派，不准革命。並表示：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五人小組匯報提綱」是錯誤的，毛澤東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隊伍，進行「文化大革命」，批評彭真同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壞人，如果繼續這樣下去，要中宣部解散，北京市委解散。康生後來在5月5日和6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表示毛澤東的這三次講話貫穿一個中心問題：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義？現在已經出了，彭羅陸楊，田家英、鄧拓、廖末沙都是，向中央進攻，要進行「文化大革命」。

3月31日，康生奉毛澤東之命回到北京並且當日將三次談話紀要給周恩來、彭真看並匯報四個小時。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周恩來不僅正式寫報告給毛澤東，用來表明自己的態度，以及為貫徹落實毛的指示而準備採取的措施。報告中說：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旗，徹底批判文史哲方面的反動學術思想，徹底揭露這些學術權威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立場，嚴格看待這是奪取文化戰線上領導權的問題，以利興無滅資，組織自己隊伍，打倒反動學術權威的鬥爭。並擬按此方針，起草一個中央通知，送主席審閱。同時，指出前送主席審閱的五人小組報告(即「二月提綱」——筆者註)是錯誤的，擬由書記處召開五人小組擴大會議，邀集上海、北京有關同志加以討論，或者進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寫。同時，周恩來還特意用打電報的方式告訴毛澤東以示鄭重，表示對毛澤東給以堅決的支持。

在4月9日至12日，此時的劉少奇忙正忙與外事活動，由鄧小平主持書記處會議，周恩來同志參加。周恩來同志和鄧小平同志指出，彭真同志的錯誤路線，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對立的，是反對毛主席的。周恩來明確指出：《彭真五人小組匯報提綱》是錯誤的。周恩來同時警告彭真：想不通可以保留看法。你現在需要沉默。毛主席看過那些人的文章，而且是親自批准發表的。你我還有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們，都應尊重毛主席的指示，我們不能再出現任何裂痕了。實際上，就是讓彭真閉嘴，老老實實的等著挨批！更為重要的是告訴彭真，不要抱有任何幻想，我們是不會站在你的那一邊的！毛主席的指示就是「聖諭」，違抗不得！

賀龍在4月9日由成都回到北京。彭真在這緊要關頭，在4月11日晚拜訪賀龍。彭

賀如何談的現在是無從知曉，但絕對不會是如往常一樣談笑風生。聯繫到上文，劉少奇的拜訪以及那篇不容忽視的報道，賀龍在八屆十一中全會的表態，也就不難理解。

（2）賀龍「插手」軍隊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與卡博、巴盧庫談話，說：「我們的軍隊也不是沒有問題的。像賀龍是政治局委員，羅瑞卿是書記處書記，總參謀長。」「比如楊成武，他是代總參謀長，總參管好幾個部，其中一個作戰部的部長、副部長寫大字報要打倒他，那是賀龍挑起來的。」筆者認為，毛澤東主要是針對空軍黨委三屆十一次全會、海軍黨委三屆三次全會及海軍黨委擴大會議和總參「8.25事件」而言。

誠如余汝信先生分析，中央在5月份下發的[66]268號文件，尤其是肖華發言對劉亞樓的指責，才是空軍黨委三屆十一次全會造成混亂的根本原因。在會議中，空軍黨委常委形成了三派：1、吳法憲、余立金；2、劉震、成鈞、曹裡懷、譚家述、常乾坤、徐深吉、王輝球；3、張廷發。吳余在會議初期是被批派，也是少數派。吳法憲回憶到：北京軍區空軍還比較好，沒有跟著起哄，其他如瀋陽軍區空軍的黃立清、南京軍區空軍的聶鳳智、廣州軍區空軍的吳富善，都是些老資格，還有成都指揮所的高厚良、武漢軍區空軍的傅傳作、廖冠賢等，他們和常委一些人結合在一起，哄啊、鬧啊的，……。

眾所周知，中共軍隊歷來是講山頭的，紅二方面軍的幹部在中央的「山大王」自然是賀龍。會議中間，6月19日晚飯後，原紅二方面軍出身的黃立清、傅傳作、廖冠賢等三人到賀龍同志家裡。賀龍同志主動問及空軍黨委全會情況，說了一些看法，而這些看法是同林副主席、葉副主席的看法是對立的。

根據吳法憲的回憶：「與此同時，成鈞、黃立清、廖冠賢、傅傳作等原紅二方面軍的幾個幹部，又到了軍委副主席賀龍那裡，向賀龍匯報說，空軍黨委正在開會，空軍的問題很多，到現在，已經亂糟糟地開不下去了，吳法憲已經不能主持會議了。據說賀龍當時說：『這個會，吳法憲、余立金他們不能開，你們就組織起來繼續開嘛。有話就說，有問題就揭嘛』。這個情況是真是假，我鬧不清楚。因為我當時沒有直接見到賀帥。這些話我當時並不知道，都是以後成鈞他們自己做檢討時講出來的。成鈞、黃立清、廖冠賢、傅傳作他們都同時說到了這一點。」「賀龍還表示：『吳、余是有錯誤的。』」賀龍當時還說過：「看來，空軍這個標兵是有些問題。過去不但你們受了蒙蔽，我們也受了蒙蔽，林副主席也受了蒙蔽。有問題揭開來好。有問題不揭，將來捂出大事來，那損失就大了！」

姑且不論吳、余是否真的是有錯誤，賀龍未經與主持軍委工作的林彪商量，對空軍高層的矛盾匆匆表態，給吳、余定性，這對於這次會議中的矛盾激化無疑是起了重大作用。而且更為重要的是：賀龍的這種私下表態行為就是一種「地下活動」—明顯是違背了組織原則的。

相對於同時「插手」的葉劍英，賀龍明顯表現出政治上的「幼稚」。會議初期，6月9日，葉劍英專門給空軍黨委寫了一封信，內稱：「空軍黨委領導核心一定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和鬥爭達到團結的目的。黨委要經常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要經常互相見面，相互間要經常提意見。對其他同志的錯誤不要當作某種資料去收集，看到同志有了錯誤，要隨時提出來，不要使問題成堆。希望你們這次會議是在高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大好形勢下進行的勝利的會議，是團結的會議。」葉劍英說的是「官話」，態度是不偏不倚。

而且此時的葉劍英沒有獨斷專行，而是經常同林彪聯繫，及時匯報會議情況。林彪在得知空軍七常委聯名控告材料內容之後，對葉劍英稱：「空軍這個情況不正常。劉亞樓、吳法憲有缺點、有錯誤，應該批評，但是這種作法不對頭。這是有人乘『文化大革命』之機，搞罷官奪權。」根據吳法憲在1980年10月14日的交代，林彪當時說：「在空軍現在這個領導班子中比較起來還是吳法憲、余立金比較正，劉震、成鈞等人搞地下活動，搞罷

官奪權，是不允許的。」

而葉劍英在聽了林彪對海、空軍黨委全會、擴大會議的意見後，「在當晚就報告了鄧小平，小平說他完全同意。第二天7月4日在劉少奇那裡開了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周恩來、鄧小平、陶鑄和軍委常委賀龍、聶榮臻、陳毅和葉劍英都參加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專門研究了海空軍黨委擴大會議的問題，由鄧小平親自記錄。

「一、黨絕對不能允許搞地下活動，劉少奇特別指出，犯錯誤，路線錯誤是第二位的錯誤，搞地下活動是第一位的錯誤。應該按照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公開講自己的意見，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

「二、肖勁光、蘇振華、吳法憲、余立金四同志，已經進行了自我批評，不夠的，以後還可以再講。常委其他同志要利用這個機會好好的挖一下。」

「三、用黨委全會和黨委擴大會議這種方式撤換領導的做法是錯誤的。」

對於幾乎同一個時期的海軍黨委三屆三次全會中暴露出的矛盾，林彪亦同時指示：海空軍的問題要解決，海空軍現在的班子不要動。從中可以看出，當時中央常委的意見同林彪是完全一致，就是現在領導班子有錯誤可以批評但是不能罷官，更不能通過「地下活動」來搞！

在這裡要特別指出的是，劉少奇主持的7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賀龍是參加了的。賀龍同中央唱了反調。賀龍在7月11日召開的討論空軍問題的中央軍委常委會議上，表示：「個別也可以做些調整嘛」而眾多的賀龍傳記，視7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議而不見，把賀龍的話作為賀龍反對林彪的證據是站不住腳的。

就在7月11日晚，賀龍大發牢騷：同林彪的鬥爭，只要我不死，我就同他鬥爭到底。我就不相信他這一套，他這個人為什麼就不能反對，他能代表黨？反對林彪就是反對毛主席，就是反黨，就是反革命？他就是想利用黨和毛主席的威信嚇唬人，使別人不敢講話。根據范碩的說法，「在7月11日，葉劍英傳達中央常委的意見，針對空軍常委中有人搞小動作，企圖撤換空軍兩個第二把手的問題，提出批評。他形象引用三國人物的典故，批評某些人『罷官』『奪權』鬥爭，真是『天下英雄誰敵手，可惜今日無曹劉（暗諷空軍中的曹裡懷、劉震）。』現在難以得知的是，賀龍的這番牢騷如果是真的，難道真的僅是對林彪一個人？毛澤東在66年9月9日要求賀龍對一些對其不滿的同志包括林彪登門拜訪，這些其他同志都是誰？葉劍英的那個比喻對於賀龍來說，不也是個諷刺？

據知情人告之，這些老同志之一就是葉劍英同志。

林彪對此心知肚明：「沒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領導，不僅我們黨沒有今天的勝利，就是我自己也沒有今天，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我這個人。如果在賀龍底下，在張國燾底下，我早就沒了，腦袋也早就沒有了，一定沒有了，是一定的，不是可以有可以沒有，而肯定地沒有，而是肯定地沒有的。張國燾能允許我這種人嗎？是絕對不會允許的，一定要砍掉的。如果是賀龍能夠允許我存在嗎？那就變成段德昌，（二十八年開到鄂豫皖去的……）賀龍不會留我，張國燾不會留我。」

不僅林彪清楚，就是其他人也清楚。鄧小平說：（林彪）至於和賀龍的關係，大家是知道的。

據筆者所知，陳錫聯曾經揭發，在文革初期，時任瀋陽軍區空軍政委的黃立清告訴陳：如果他們（指吳法憲）整我，我就到賀老總那裡告狀。

（3）總參「8.25事件」（依據筆者手中最新的總參的材料，此事件主要應該由楊成武負責）

「8.25事件」的主角王尚榮說：他是在那種「革命」氣氛中，糊塗塗簽名的。他

是賀龍的老部下。是不是糊糊塗塗簽的，筆者沒有關鍵材料來證實。

8月22日，楊成武在京西賓館禮堂召開總參機關師以上幹部會議上作了機關開展文革的動員報告。會後，有人就在總參機關所在地貼大字報，總參的一些部、局，也貼出一批大字報，其矛頭大部分是對著總參領導對著楊成武。

8月25日下午，毛澤東要接見坦桑尼亞軍事代表團，本來總參外事局局長潘振武為引見人。但是外事局參謀孫啟祥給毛澤東的秘書徐業夫打電話，說他代表革命群眾，要求毛澤東不要讓潘振武參加接見。徐業夫將他接到孫電話事告之楊成武，楊請示了周恩來，周同意了楊為照顧群眾情緒，不要潘參加接見的建議。

但是外事局一些幹部對此不滿，借25日下午總參黨委召開會議之時，衝到會議現場質問楊成武，楊成武對外事局衝擊會場的同志做了解釋。這些衝擊會場的幹部退出後，楊成武又向到會的總參黨委委員和列席的部、局領導重複了一遍。王尚榮是總參黨委委員，參加了這次黨委會。楊成武兩次敘述潘未參加接見的經過，王尚榮都是親自聽到了的。但是當天晚上作戰部部長王尚榮、副部長雷英夫等帶頭簽了名的大字報就貼出來了。隨後各部、局馬上響應，紛紛貼出了大字報，表示對外事局部分人的「革命行動」的支持。總參機關的形勢，發展異常迅猛，使人有「烏雲壓城」之感。

周恩來獲知此事，打電話告楊成武，要楊提高警覺，並說人家都要奪你權了，你還不知道。隨後，周還親筆寫了一信說明事情原委，徐業夫也於27日寫信給總參黨委作出解釋。總參黨委收到兩信後，第二天公佈於眾。二人的信立馬把局勢翻盤。

8月30日，葉劍英在三座門開會，總政治部主任肖華講話指出此事是錯誤的，副總參謀長張愛萍也批評了王、雷。王、雷做了自我批評。

下面的陳虹的說法，是國內黨史出版物的關於林彪作用的一個「流行說法」：

本來事情已經結束「可是林彪知道了，卻抓住不放，他說此事一定有後台，要撤作戰部長、副部長的職」。「第二天，林彪親自召集軍委會，老師們大都參加了，賀龍副主席也到了會。林彪講了對『八二五』事件看法後，堅持要撤掉王、雷的職務。他的意見得到了與會人員的認可，於是會上決定撤銷王尚榮、雷英夫總參作戰部正、副部長職務，交代問題。隨後軍委給各大軍區和軍兵種發電，宣佈了王、雷被撤職的事，作戰部掀起了對王尚榮、雷英夫的揭發批判。總參各部局的同志也到作戰部參觀大字報。這就使總參機關的局勢得到了控制，變得較為平穩」。

陳虹又說：「客觀地講，林彪當時利用了『八二五』事件，對王尚榮等人進行了迫害，並借這個事件整了賀龍同志，這件事的平反是完全應該的。但這不等於說這個事件就是正確的。就這件事本身來看，不論在當時還是在今天，都不能說成是對的」。

余汝信先生評論到：筆者十分同意陳虹最後這段話的後半部分，卻難以同意這段話的前半部分。對總參「8.25事件」的定性，周恩來早在林彪之前已認定是王、雷要奪權，周不是說了「人家都要奪你權了，你還不知道」嗎？林彪後來堅持要對王、雷按原則處理予以撤職，並沒有什麼錯，否則，作為軍隊中樞的中樞——總參機關的局勢難以穩定。而且，這一處理意見得到了軍委常委會議全體與會者（包括賀龍）的一致認可，不能說是林彪一人對王尚榮（陳虹此處沒有提雷英夫）的「迫害」。陳虹文章還多處為楊成武開脫，認為楊並無意要處理王尚榮，這恐怕也有違當時事實。總參大院內發生的事，楊成武不主動去匯報，周恩來、林彪怎會這麼快就知道？以楊的脾性，周、林對事件的性質都已表了態，維護了楊的權威，楊高興還來不及，還會為王尚榮說什麼好聽的話？

而事情的關鍵還在於，在這大字報上，不僅有王尚榮的簽名，還有賀龍辦公室的人。賀辦還隨後另外起草了一張「炮轟辦公室黨委」的大字報，矛頭指向楊成武，號召向王尚榮學習，雖然賀龍、薛明並沒有在這張大字報上簽名，而且賀龍對大字報內容也不是很瞭解。但是事後，薛明還是為此做了檢討。

而王尚榮在被「揪」出來之後，王的愛人打電話給薛明，說王尚榮想見賀龍。

針對此事，林彪批示到：這件事與不久前煽動空軍顛覆吳法憲、海軍反對李作鵬、王宏坤等「同出一個根源」，並報告毛澤東。

2. 毛澤東決定整肅賀龍

賀龍上述的所作所為使毛澤東非常不滿，但是更重要的是賀龍對劉少奇的態度、賀龍與林彪的關係終於使毛做出了整肅賀龍的決定。

8月5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發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不指名的批評了劉少奇。就在當天晚上，周恩來約各元帥（包括賀龍）談話，談了三個多小時。周恩來此舉，明顯是在向各元帥交底。吳法憲回憶到：1966年8月8日（據筆者考證實為6日）周恩來親自向軍隊主要領導人打招呼，傳達毛澤東的「大字報」精神。與會者除吳法憲外，還有楊成武、張愛萍、肖華、許光達、肖勁光、蘇振華等人。周恩來將毛的「大字報」向眾人連續念了兩遍，並說「現在看來，多年的事實證明，劉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來想培養劉少奇當接班人，現在看來不行了，他辜負了毛主席的希望。現在中央決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劉少奇，擔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現在先通知你們一下，暫時不要再往下傳，就你們知道就行了。」周恩來向各位元帥交底只會比同吳法憲等人交的更深。

隨後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期和會後召開的一系列解決劉少奇、鄧小平「問題」的黨內生活會上賀龍並沒有表態，用當時的話說就是向毛澤東表示「忠心」，同劉少奇劃清界限。毛澤東問賀龍：「你發言了沒有？」賀龍說：「還沒有發言。」毛澤東又問：「怎麼不講一講？」賀龍回答：「報告主席，我上不了綱？」

此外，有知情人說，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期召開的政治局生活會上軍隊系統將領與會人員只有賀龍一個人對批劉、鄧不積極，這也可以從《賀龍年譜》以及其他材料反向理解得知。

賀龍同劉少奇藕斷絲還連。不僅不劃清界限，在王光美受紅衛兵衝擊後，賀龍見王騎自行車上班不安全，特地從軍委總參派出一台卡車保護王上下班。8月18日劉少奇上了天安門，但是一位工作人員發議論：「今天場面很大，效果也很好，就是劉少奇有點灰溜溜。」賀龍當場批評：「你這個同志是咋個搞的嘛？一個國家主席，有什麼可灰溜溜的？你這樣說是不對的。以後不要這樣說嘍。」

賀龍的表現無疑是辜負了毛澤東的期望。

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被免職，賀龍就被毛澤東用做牽制林彪的重要人物。上海會議批羅，賀龍則被解除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權力。但是隨後在1966年3月份舉行的批羅會議，賀龍卻被排除在外。上海會議一結束，賀龍就被安排到廣州休息，隨後被中央安排到西南視察。特別是中央傳達有關羅瑞卿問題之時，特意保護了賀龍。筆者認為，這是毛澤東有意安排，刻意讓賀龍同羅瑞卿事件摘清。羅瑞卿被批判之後，林彪曾嚴令軍中諸將「批羅不可涉及賀龍」，所以那時賀龍絲毫不曾被牽連。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期開始的「批劉鄧生活會」，當牽涉到賀龍的時候，毛澤東下令停開，保護了賀龍。

但是也由於上述的種種原因，在權衡各種因素利弊之後，毛澤東還是選擇了整肅賀龍而不是繼續保護。但是在整肅之前，還是給了賀龍最後一個機會。

毛澤東在9月5日，把林彪遞交上來的揭發信/誣陷信交給賀龍。同時毛澤東對賀龍表態：「你不要緊張，我當我你的保皇派。我對你是瞭解的。我對你還是過去的三條：忠於黨、忠於人民，對敵鬥爭很，能聯繫群眾」。當時賀龍表示要找林彪談，但是毛澤東婉言拒絕。但是三天以後，9月8日晚，毛澤東通知賀龍去談話。9月9日徐業夫按照毛澤東指示給賀龍打電話：「經過和林彪還有幾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結了，你可以登門拜訪，爭取下有

關同志的意見。」毛澤東緣何這般安排？9月8號，毛澤東故意置賀龍於召開的中央軍委常委會之外(詳見下文)，目的就是讓賀龍登門拜訪的同志在賀龍拜訪之前知道毛澤東的底。

10日，賀龍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登門拜訪林彪。林彪說：「賀老總啊，你的問題可大可小，今後要注意一個問題，支持誰，反對誰。」賀龍說：「我幹的是共產黨，支持誰、反對誰，你還不知道？」

這次談話，很明顯的是林彪要讓賀龍表明在毛、劉之間的立場：支持誰，支持毛，反對誰，反對劉，提醒賀在關鍵時刻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而賀只是繞圈子，打轉轉，王顧左右而言他。話不投機是很正常，也從令一個方面證實了賀龍沒有徹底拋棄劉，這不符合毛澤東的期望。林彪等於把底透給賀龍，但是賀龍模稜兩可的答話無疑讓自己陷於日後的被動。

賀龍同林彪談話之後，還去拜訪了其他幾位毛澤東提到的幾位同志。這幾位同志是誰，筆者無從知道。但是有人寫道：這幾位同志或者背過臉去，緘口不言；或者違心批評，附和形勢。

毛澤東在文革中多次用「登門拜訪」的形式來測試對方的政治表態。

9月中旬，賀龍對一位領導說：「你為什麼要提炮打司令部？難道你承認你自己是資產階級司令部嗎？」賀龍不承認存在另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

10月，賀鵬飛還喊：「誰反對劉少奇，誰就是他媽的反革命！」賀家的子女確實表現的也非常突出。7月，賀曉明在北大同江青辯論長達三個小時。毛澤東在7月18日回到北京之後，還親自做過在清華的賀鵬飛的工作。

劉少奇在10月份中央工作會議上做檢討後，賀龍說：「劉少奇的檢討是被迫的。」

知情人告知，在十二月底，賀龍還寫了一個報告抬頭有劉主席。

毛澤東把自己置於一個調解人的位置，造成的印象是林彪和其他老同志對賀龍不滿。毛澤東的權術謀略不可不謂是爐火純青。

就在賀龍一步一步的走向深淵的時候，在12月28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突然跟他招呼，讓賀龍坐到自己身邊，以示信任。

但是毛澤東這個「好人」，被周恩來「一語戳穿」。1967年1月11日，林彪主持毛澤東提議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周恩來在會上談到外面有很多有關賀龍的大字報時說：「主席說了，政治局不要公開點賀龍的名，我們政治局的同志和常委的同志不要在公開的場合點他的名，只是要他去登門聽取大家的批評……」這不正說明「打倒賀龍」的整個部署是在毛澤東的掌握之中嗎？

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取消劉少奇、鄧小平、陶鑄、陳雲、賀龍出席政治局會議的資格。

3. 林彪參與整肅賀龍

現在可以來探討一下林彪對整肅賀龍的參與。

9月2日，林彪打電話給李作鵬：「你要主意賀龍，賀龍實際上羅瑞卿的後台。他拉了一批人來反我。軍委很快要開會解決他的問題。你就這個問題盡快寫個材料。」

由此可見，是軍委要開會，林彪才打電話要求李作鵬寫材料。而賀龍是否是羅瑞卿的後台有待商榷，但是賀龍確實在搞林彪，而且很明顯是賀龍搞在前，而不是在後。

毛澤東一面在賀龍面前做好人，另一方面指使林彪充當「壞人」。1966年9月8日上午，軍委常委會議九人民七會堂新疆廳召開。林彪、陳毅、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出席，肖華、楊成武、王新亭、劉志堅、邱會作列席。據會議記錄：

主持會議的林彪說：「今天談談賀龍同志的問題。在主席那裡談過兩次，主席已看了

空軍的材料，總參的材料。他的材料很多，只選看了一些綜合性材料。主席的意思，要在高級幹部中打個招呼，找各位元帥談一談。主席已找賀龍同志本人談了，要他以後不要這樣搞，人家不滿意。賀龍同志說，有些是事實，有些不是事實。主席找我、劍英、陶鑄同志談，主席說賀同主席的關係不好。」

「我們元帥中間，除了彭德懷外，賀是最不好的一個。」

「過去早有苗頭了，因為不那樣緊急，所以拖著沒有談。我從沒有同主席談過。這次他搞到總參來了，利用外事局這樣小的一件事，要把楊成武同志搞掉。要打掉楊成武，換上許光達。」

「在空軍大鬧要搞掉吳法憲，就是他煽動的。打掉吳法憲，替成鈞開路。」

「空軍開會期間，賀那裡是地下司令部。」

「海軍他想扶蘇振華，搞掉王宏坤、李作鵬、張秀川。」

「材料很多了，總參、空軍、海軍、工程兵、政治學院、國防工辦、公安部、衛生部，到處發現他伸手奪權。……他同彭真、羅瑞卿、楊尚昆關係很密切。」

「現在主席說要向高級幹部打一個招呼。」這是個打招呼會。會上沒有異議。

與會的葉劍英、陳毅、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紛紛表態擁護毛的決策和林彪講話。就在同日，在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日常工作會議上，通過了經葉群、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的提出要成立賀龍專案組的提議，形成了會議決定，並責成中央專案小組寫出立案報告，報毛澤東、林彪批准。

根據林彪的說法，材料很多，不僅空海軍有，還有總參的，據劉秉榮說有十幾封！這個說法與張雲生的回憶是一致的。如果此說屬實，賀龍則是眾怨甚多，那麼這些材料都是林彪組織的？根據中共黨史寫作的潛規則，只要和林彪掛鉤的、上了林彪賊船的都會「抖個乾淨」。那麼海空加起來材料也就不過幾份，其他那些是誰寫的，誰組織的？有誰有這麼大能量？而且後來賀龍登門造訪的不僅有林彪，還有幾位其他同志。是誰，難道還不清楚嘛？如此，林彪追究賀龍，僅是其佈局中的一個部分。因此，筆者認為林彪搜集的材料完全是毛澤東授意，而且關鍵的是賀龍確實摻合在其中。

同一個會上，林彪還談了一個事情：「主席的意思要在高級幹部中打個招呼。……主要危險在主席百年之後，他會放炮起哄，會出亂子。」毛澤東怕有人做朱可夫。十月份，關於賀龍有問題的打招呼的範圍擴大到解放軍各總部、各軍兵種、各大軍區負責人。其中，根據洗恒漢的回憶，葉劍英、肖華專門就賀龍的問題同他交底。

正如上文所提到過，毛澤東認為站在王尚榮背後的是賀龍，真正的主謀是賀龍。作為毛澤東機要秘書的徐業夫為什麼要寫信給總參黨委？筆者認為，作為一個秘書，是無權主動去做此事，而是毛澤東授意。可以說，軍隊是毛澤東能夠發動文革的「後院」，後院起火，可不是毛澤東所希望看到的。因此，筆者斷定毛澤東對於整個「8.25事件」是瞭如指掌。那麼林彪堅持要對王、雷按原則處理予以撤職是自己的意思，還是執行毛澤東的意見？

根據王年一的材料，在8月中旬至9月初，林彪對賀龍的追究主要有以下幾點：

(1) 林彪在8月17日表示海軍應該立即收兵停戰，立即收回工作組。要團結起來搞好工作。不久，林彪召見了李作鵬（筆者註：實為9月2日，林打電話給李），說：「要注意賀龍，賀龍實際上是羅瑞卿的後台。他採取種種卑鄙手段拉了一批人來反我。」李作鵬1966年9月7日給林彪寫信，誣告賀龍反對「以四好為綱」，支持海軍某些人反對李、王、張企圖罷官奪權。林彪將此信報送毛澤東。

(2) 吳法憲1980年9月4日交代：1966年8月中旬（根據賀龍年譜，是8月28日，筆者註），林彪住在人民大會堂浙江廳，有一天上午林彪約我去匯報情況，即匯報空軍黨委十一次全會情況，我說：「據成鈞、傅傳作、黃立清、廖冠賢等人交代，會議期間他們曾到賀龍家去談過，說：吳法憲、余立金不能主持和領導會議，問題很多，又不積極，

對開會採取消極態度。賀龍同志回答他們，『那你們自己組織起來開嘛，繼續把會開好。』林彪說：『這不是明明指示他們奪你的權嘛，我早就知道賀龍插手了，賀龍到處插手，總參、海軍、空軍、政治學院都插手了，賀龍早就想叫成鈞當空軍司令員。你叫傅傳作他們把材料寫出來給我，並且寫一個報告給我。』然後林彪到毛主席那裡去了，我就回來了。」我回來後就叫成鈞、傅傳作、黃立清、廖冠賢他們寫材料，他們材料寫好後交給我們，用吳法憲、余立金兩人名義向林彪寫了一個報告，將材料送給林彪。

(3)吳法憲，余立金給林彪的這個報告寫於1966年9月3日。報告中說：「大概是6月19日晚飯後，黃立清、傅傳作、廖冠賢等三人到賀龍同志家裡，賀龍同志主動問及空軍黨委全會情況，說了一些看法，和林副主席、葉副主席的看法是對立的。」報告中轉述了吳富善1966年8月20日對賀龍的「揭發」，然後說：「我們覺得空軍黨委這次全會所以在會議前期方向偏了，是和賀龍同志在上面的幕後活動有很大關係的。」林彪將此報告和所附材料報送毛澤東。

另外，根據張雲生的記述，在葉群組織下，軍委辦公廳警衛處長宋治國寫了「揭發」賀龍的材料以及幾個兵種都寫了揭發賀龍的材料。

值得重視的是，上述事情的發生都是在8月中旬至9月初。

客觀的說，根據上述論述，賀龍確實有到處插手的活動，揭發材料裡面誣陷的也會不少。而且更重要的是賀龍對林彪的敵視態度，使得賀龍在某種程度上違反了組織原則，例如在關係到部隊人士變動上面。

更深一層，追究賀龍，是林彪自己主動追究的？還是林彪得知毛澤東的意思後主動去搜集的？換句話說，是林彪用材料去改變了毛澤東對賀龍的認識還是林彪知道毛澤東對賀龍的態度有變之後才去搜集材料？甚而是毛澤東授意林彪去做的？

王年一曾引述吳法憲1980年10月14日交代：「在空軍黨委十一次全會以前，林彪曾多次同我說：賀龍要成鈞當空軍司令員，你要警惕和防備成鈞奪你的權。」但是最新的吳法憲在回憶錄中，卻再沒有提及林彪曾說過這樣的話。聯繫到上述材料收集的時間，筆者認為，吳法憲的這個說法是在專案組壓力下的產物。

而對於海軍的事情，徐向前後來講：

當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很好，要繼續發動群眾，把運動搞深搞透。今天學生要開大會，要打倒蘇振華，打倒杜義德。

蘇振華是堅決貫徹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是鄧小平安在海軍的釘子，這種人不能保。海軍黨委擴大會議期間，不是肅清羅瑞卿的影響，而是把李作鵬、王宏坤、張秀川置於死地。林副主席給海軍的信，不知為什麼落到劉、鄧手裡去了，並且經過修改。蘇振華要鬥倒、鬥垮、鬥臭。海軍文革要改組，蕭勁光任組長，王宏坤任第一副組長，李作鵬任常務組長。以哪些人組成，他們三人提出。

在66年的文革初期，空軍借倒劉亞樓拱吳法憲、海軍倒肖勁光、總參倒楊成武，而這些背後都隱藏著賀龍的影子，而且賀龍也敢說敢做，就如賀龍說調整班子一事。賀龍說：王宏坤可以調出來！軍隊如此混亂，賀龍儼如幕後「黑手」。毛澤東怎麼安得了心？

所以，林彪是被毛澤東推到前台來整治賀龍的棋子而已！更重要的是，現在眾口一詞，只說林彪參與了整肅賀龍，現在眾口一詞，其他人根本不提，這對林彪是不公平的。

4. 周恩來也對賀龍不滿

按說賀龍對毛澤東矛頭指向劉少奇一事，早在周恩來解釋毛澤東的那張大字報以前就明瞭。

7月31日，王任重、李井泉來到賀龍家，對當時的形勢議論一番。討論的焦點主要是

因為有人貼了劉少奇的大字報和王光美在清華被群眾攻擊。賀龍建議王任重去找周恩來，因為周恩來主管解決清華問題。而要解決清華問題，勢必為向王光美開刀，而向王開刀就是對劉少奇開刀。但是王任重推辭不去，於是薛明出馬。薛明到人民大會堂向周恩來陳述了賀龍的意見。但是周恩來對此態度很淡漠，很是讓薛明納悶。

其時的周恩來正在為貫徹毛澤東的文革意圖而操勞。7月31日，周恩來親自找蒯大富面談。賀鵬飛幾次也想聽蒯大富的匯報，都被周恩來拒絕。蒯大富狠狠的告了工作組一狀。

賀龍不是不知道毛對劉的態度。賀龍就在8月1日劉少奇主動承擔「文革」中關於工作組錯誤的前一天，即7月31日這天，對周恩來說：涉及到劉少奇的處理一定要謹慎，一定要顧及黨的團結。

8月5日，周恩來在清華主持為蒯大富平反的大會。周恩來說：「我這次來清華是老老实實做學生的，來學習的，也是來煽風點火，煽社會主義的風，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火。」同日，周恩來又向賀龍等元帥解釋，而賀龍的做法實際上又一次扯了周恩來的後腿。

賀龍的兒子賀鵬飛在清華貼出大字報，支持工作組，支持王光美，罵蒯大富。這些都不符合當時周恩來解決清華問題的方針。而這些大字報大都是經過賀龍以及賀龍的秘書修改的。

周恩來主持清華大學蒯大富平反的大會，賀鵬飛對蒯大富是批的體無完膚。

隨著文革的進一步開展，賀龍在諸多問題上，和周恩來產生了矛盾，特別是榮高堂一事。在薛明、賀曉明在鳳凰衛視訪談的時候，明確說道：周恩來說榮高堂是反革命，但是賀龍說不是。

8月18日賀龍陪同毛澤東接見紅衛兵，8月31日賀龍再次陪同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在這次會見中，周恩來還特意安排賀龍同毛澤東在第一輛車上。事後，周恩來被中央文革小組提了意見。賀龍的日子卻越來越難過了。

在得知王尚榮被定性為反革命後，賀龍說：「看來問題複雜了，他們要揪後台啊。」

在林彪的9月8日傳達了毛澤東對賀龍的看法之後，周恩來很快就做出了回應。

1966年9月25日周恩來對「首都大專學校紅衛兵」負責人談話時故意透露了一點玄機：「（1927年南昌起義）我和朱德同志、林彪同志、陳毅同志，我是主要負責人。」丁抒先生評論到：周恩來的這種講法，故意抹去南昌起義的主要軍事指揮者賀龍的名字，在起義的主要負責人當中加上了當時僅僅是個連長的林彪。這種對賀龍的貶低在那個政治上極度敏感的年代裡就是一種關於賀龍要垮台的暗示。

10月1日，賀龍正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有人向賀龍報告榮高堂因為內部派系鬥爭被造反派圍攻，賀龍接到此報，急火攻心，當場暈厥。

賀龍開始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1966年10月中旬，賀龍在中央工作會議第四小組會上作檢討：「北京體育學院的文革運動，體委派工作組，不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而是包辦代替。結果，把那裡轟轟烈烈的文革運動搞得冷冷清清。……體委本身的文化也搞得不深不透。體委一些領導，怕字不少，框框很多，對這場文革的領導，還處於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的情。……我是有責任的。根本問題是對主席思想學得不好，跟得不緊。」

賀龍隨後在11月13日的軍事院校革命師生大會上，也僅是中央軍委文革小組給其準備的稿子，照本宣科，顯得謹慎，不再當眾放炮。

但是賀龍還是身不由己被牽涉的越深，最後周恩來生氣了。

為了對付不讓榮高堂出國的體院和體委少數派，11月2日下午由國家乒乓球隊、游泳隊、羽毛球隊、體操隊組織了個「出國誓師大會」，並邀請了賀龍，榮高堂出席大會。賀龍對此的解釋是：「前天開誓師大會，接了請帖很猶豫，未問清楚，本來出國有幾百人，講講話，一去看到一禮堂人，知道糟了，要我講話，我就不講話了。」

到了11月4日，多數派一些出國運動員等竟不按時上車出國，而到國務院請願，要榮高堂出國。周恩來對此很惱火：「把賀總也請來了，把賀總給拉下水了！」聽說榮高堂不出

國，你們就不去，我一聽就以為榮高棠搞的鬼。我對熟悉的同志要求的嚴，我瞭解榮高棠，他有許多短處，突出政治不夠，原則性不高，政治性不強，還有些迎合。我懷疑誓師大會是他搞的，要批評。」

榮高棠的問題越來越嚴重。陶鑄在1966年12月10日會見體育界造反派時表示：體委是執行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代表是榮高棠。

賀龍對李達說：「榮高棠是我的接班人，我告訴了總理。」這句話傳了出來，周恩來的反應如何，不難想像，賀龍是在和總理對著幹。

時隔半個月，榮高棠被定性為修正主義分子、彭真的徒弟、叛徒嫌疑，是周恩來親自定的。周恩來動怒了，打了賀龍的屁股。

周恩來：「你們說榮高棠是個修正主義分子，我看是對的。在我們體委，榮高棠掌握這樣領導權的人，完全是一個修正主義分子，那怎麼能不把我們體育界引上歧途呢？」「不曉得從那個時候(指抗戰時期)一直發展到現在，卻變成一個真正的彭真的徒弟——兩面派羅！所以，他在思想上，在靈魂深處，應該說，你們批評得對，他是彭真型的人！」「不僅是在表面的形式上，在靈魂深處，而且在歷史上，我們現在正在審查彭真入獄經過的那一段歷史。同樣的，榮高棠也有這樣的經過，也值得審查。」

周恩來認定是榮高棠利用這些尖子運動員來要挾。周恩來的講話把榮高棠打入了另冊。

在周恩來講話之後，陳毅也講了，賀龍發現預先準備的稿子「步調不一致」。

賀龍最後來了個補充發言：「榮高棠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分子！這個大會開得很好。要把榮高棠鬥倒！鬥垮！鬥臭！」賀龍這段話明顯的是言不由衷。

私下裡，賀龍對榮高棠說：「我們要相信毛主席。有人想整我，毛主席不聽他們那一套。毛主席還說要保你榮高棠。」在周恩來把話說明的時候，賀龍還是沒有和榮高棠劃清界限，怎麼不扯周恩來的後腿？

榮高棠自然不是反革命，但是在此問題上周恩來同賀龍的認識不同。如果只是群眾組織造反派貼榮高棠的大字報，說其是叛徒不要緊，周恩來這個講話則是完全不同，周在那個時候是被認為代表中央表態。

薛明說：「從這以後群眾就不饒他了，總理說他是反革命，彭真式的人物，你這麼講不是反對總理嘛？好多大字報就對著我們來了！」薛明說：賀龍認為榮高棠是革命的幹部犯了工作上的錯誤。

隨後賀龍的形勢突然惡化，被造反派衝擊，與周恩來等這次講話不無關係，要知道，揪後台在文革中是司空見慣。周恩來為什麼不替賀龍在榮高棠問題上「撇清」一把呢？周恩來為什麼在榮高棠定性一事上不事先同賀龍通個氣呢？

就在開完鬥爭榮高棠大會的第二天，賀龍被體育系統造反派逼的有家難回。當天，周恩來指示賀龍暫到釣魚台6號樓休息。第二天，賀龍按周恩來的指示從釣魚台搬到了新六所。

三、周恩來負責實施整肅賀龍的決定

儘管在12月28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還讓賀龍坐到自己身邊，以示信任，然而這絲毫改變不了賀龍的處境，賀龍已經走向深淵。

12月30日，江青在清華大學當著賀鵬飛的面當眾宣佈：「你爸爸犯有嚴重錯誤，我這裡有材料。你告訴他，我要觸動他啦，還有你媽，也不是好人。」12月31日，「打倒賀龍」的口號響徹北京街頭。1月4日，江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賀龍「搞陰謀」、「是個壞人」、「要端出來」。

1967年1月9日，林彪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真正要打倒的未打倒，在軍隊內並沒有炮轟賀龍。賀到處搞奪權，搞山頭主義，反而不炮轟。」「賀龍這個人手伸得很長，不

僅軍隊到處伸手，而且地方也到處伸手。賀龍搞大比武，是個大陰謀。羅的後台就是賀龍。賀龍是個大土匪，是土匪出身，拍肩膀，介紹老婆，搞舊軍隊一套，40年來靈魂深處是個大野心家，吃了飯不幹事，經常在家請客，拉攏幹部，許多軍區、軍種、兵種都有他的人。賀龍是反毛主席的」。

同時，受到江青鼓動的解放軍政治學院造反派傳出了風，要到新六所抓賀龍。薛明連續3次向周恩來告急，但是沒有回音。

1月11日凌晨，賀龍本意回東交民巷，途經中南海時臨時起意向周恩來報告此事。周恩來得報後讓賀龍暫住其家。對於此事，高文謙先生在《晚年周恩來》中已經有詳細描述，不多冗贅。薛明、賀曉明在鳳凰衛視訪談的時候對此事也說得非常明白，而且薛明特意強調是她建議賀龍要向周恩來報告一下。

據知情人告之，賀龍住進周恩來家後，周恩來有意躲賀龍，不與其交流。但是賀龍極想詢問周，如果實在躲不過去，周則以無時間讀報讓薛明讀報來應付。此般種種情節同權延遲所述大同小異。

1. 周恩來出面向賀龍攤牌

作為賀龍的老部下，成鈞以及廖漢生在不堪忍受的迫害下，在1967年初，供認了「賀龍兵變計劃」。筆者認為此事直接導致了賀龍問題的升級。

1967年1月19日，周恩來、李富春代表中央正式同賀龍談話。周恩來主要講了如下幾個問題：1）林彪說賀龍在背後散佈他歷史上問題；2）賀龍到處插手；3）毛澤東百年之後不放心；4）洪湖肅反賀龍應負責任。談話過程中，周恩來不容賀龍分辨，談完之後就不理賀龍，告之，「我還有事要辦」就離開。賀龍當時非常驚訝和氣憤：「我沒有想到把我看成這樣的人。」賀龍指的是誰？周恩來應該是其中一人吧。

據知情人告之，當時周恩來講話如「連珠炮」，不容賀龍分辨，賀龍想插話，但是都被打斷或者阻止。賀龍聽完之後，並不想離開周家。《中國元帥賀龍》記載：賀龍有很多話要說，實在按耐不住了，站起來想申述自己的觀點。周恩來何等聰明，不等賀龍說話，便阻止他。薛明回憶：（周恩來的談話）說的快極了，像一口氣念下來的講稿，不給賀龍說話機會。

談完之後，賀龍就被送到西山隔離，實則軟禁，正如余秋裡所言是失去自由。賀龍對此番「正式談話」耿耿於懷：「別人不瞭解我，難道總理還不瞭解我？」「毛主席不是讚揚過我嗎？我要回去，找他們算帳。」

筆者認為：周恩來這次談話，其實就是代表中央同賀龍之間一個攤牌。根據吳法憲的回憶，主要是毛澤東、周恩來聯手策劃，周恩來執行實施。吳法憲說：「關於賀龍的問題是毛澤東親自決定的。據我所知，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澤東和周恩來兩個人在中南海專門研究賀龍的問題。後來周恩來告訴我，那天，毛主席決定對賀龍採取隔離措施，並要他親自去落實。他先在北京西郊的山區找了一所房子，要北京衛戍區預先作了安排。然後，他把賀龍找到中南海，先是問賀龍：『聽說你身上帶了手槍？』賀龍說：『有一支。』於是，他要賀龍立即交出身上攜帶的手槍。待賀龍交出手槍後，他便要警衛部隊把賀龍夫婦送到北京西郊的山區。從此，賀龍夫婦便失去了自由。1969年6月9日，飽受折磨的賀龍在北京三〇一醫院逝世。」根據吳法憲的回憶，主要是毛澤東、周恩來聯手策劃，周恩來執行實施，這也是文革中諸多冤案的一貫模式，例如後來逮捕所謂「四大金剛」等。

知情人說，毛澤東在67年1月份重申對賀龍的的專案審查。此事應當同成鈞的供認有關。知情人說，1967年1月份成鈞的供認賀龍確有兵變計劃，這同1月19日攤牌賀龍一案的升級有直接關係。

王力回憶說：（1967年）一月份就不保賀龍了。

67年1月上旬，陳再道、鍾漢華到北京參加軍委會會議。1月20日，陳、鍾打電話回武漢說：軍委在查賀龍的問題，我們軍區也要查有沒有賀龍分子，開常委會查這個問題。二方面軍出身的副司令員唐金龍在21日凌晨在家開槍自盡。

知情人告知，有人問過直接辦（賀龍）案的人，此人說從頭到尾都是周在操作，林一直沒有摻合。此言可信。代表中央同被迫害官員談話宣佈中央處理決定是周恩來的一貫職責：無論是早期的習仲勳，楊尚昆還是後來的劉少奇、陶鑄、賀龍、「楊余傅」，直到「黃吳李邱」都是由周恩來出面向他們宣佈中央的意見，然後關押、審訊、流放。周恩來對這套操作流程想必已經是輕車熟路。

賀龍被送到西山之後，67年3月份，中央軍委改組。賀龍的軍委副主席一職被正式撤銷。

周恩來對體委造反派的指示：對體委的文化大革命十分關心，並再三要求不同觀點的革命組織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聯合起來，把矛頭對準劉、鄧、陶，以及賀龍、榮高棠。這就是大方向。

2. 賀龍專案組的設立

楊成武回憶：「1959年廬山會議，發生了彭德懷的問題，會後設立了彭德懷、黃克誠專案組，當時由周恩來總理和賀龍副總理負總責，具體的專案組長是賀龍兼任的。『文革』中，賀龍被列為專案後，組長仍由周總理接任。」這個組長，楊成武的這句話是存在歧義，組長到底是指的賀龍專案組還是指的彭黃專案組？但是如果聯繫整個文章來看，在楊的文章裡面，還列舉：上海會議「揭發了所謂羅瑞卿的問題，會後成立了羅瑞卿專案組，組長也由周恩來總理擔任。」黨中央於1967年春成立了對幹部的專案審查小組，組長是周恩來，副組長是陳伯達，成員有江青、康生、謝富治、汪東興等人。」無疑這個是指的賀龍專案組，因為楊的意思是指這些新成立的專案組的組長開始都是周恩來擔任的。

在王年一的文章也是如此論述到：王年一在引用了楊成武的原話後，還解釋到賀龍的級別是如此之高，「除了毛澤東，周恩來不擔任誰擔任？除了毛澤東，還有誰能讓周恩來擔任這個組長？」王年一寫道：「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在接見阿爾巴尼亞來賓卡博和巴盧庫的講話中就明確說了：『我們的軍隊也不是沒有問題的。像賀龍是政治局委員，羅瑞卿是書記處書記，總參謀長。』9月13日（正是賀龍在囚禁地盼著周恩來兌現秋天去接他回京的諾言時）（筆者註：此說有誤），中央正式批准對賀龍立案審查，審查報告經過周恩來之手，他在上面親自動手作了修改，寫下了大段的批語」。

在《把歷史的知情權還給民眾——駁「司馬公」先生一文中》高文謙答覆司馬公時，明確點出賀龍專案組的組長開始時是周恩來。

因此無論是王年一還是高文謙都指的這個組長是賀龍專案組的組長，但是鑒於王年一仍然在國內，而高文謙在國外的不同狀況，此中緣由不說亦明，王年一不可能像高文謙一樣直言而述。

綜上所述，在楊成武的回憶中，這個組長指的是賀龍專案組的組長無疑。而且這和當時的專案組的潛規則是相符的，就是直接掛名的專案組的組長要高於被審查人的排名。例如在「二辦」中主管彭德懷先是楊成武後是黃永勝，但是掛名的卻是周恩來。

附：周恩來對賀龍專案組請示報告的批示

周恩來

1 9 7 0 . 1 2 . 0 3

「東興同志，這全部是公開文件，請你考慮是否需全部調閱。我記得在下放鄧小平、譚震林時，已將兩人從專案組撤消。現專案組既又重新提出查此人，可否先告專案組將鄧小平以三反罪行、招降納叛線索（筆者註：先定罪，再按罪名找材料，是專案組一貫模式，從彭德懷到林彪一案，概莫例外）寫一報告來，以便擬此查閱。周恩來。」

附一

賀龍專案組的報告

康生、永勝、法憲、葉群同志：

關於鄧小平的三反罪行，招降納叛等問題，經過調查，我們已掌握了不少材料和線索，但其中有些問題的核實和查證，還需要查閱一些檔案材料。為此，我們擬到中央檔案館、中辦機要室等單位查閱有關材料，並對必要的部分拍照取證。

是否妥當，請批示。

附：申請查檔目錄表。

賀龍專案組

1 9 7 0 年 1 1 月 2 8 日

附二：

吳法憲對賀龍專案組報告的批示：

可否查這些檔案，呈請總理、汪東興同志批示。

1 9 7 0 . 1 1 . 3 0

上述這些專案組報告皆來源於宋永毅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此為具體辦案的中央專案小組的典型報告案例。由小組具體操作人員寫出報告上報主管人員，由主管人員在上報周恩來。是否可行或材料是否可由採納，最終都是由周恩來拍板定案。

賀龍專案組成立之後，周恩來並不是和賀龍斷絕了聯繫，也不是無能為力了。而這恰恰是官方為周恩來辯護的最大的所謂「證據」。

1 9 6 8 年 8 月 6 日，康生在賀龍寫的一份材料上批示說：「賀龍寫的材料沒有交待一個實質性的問題」，「到底如何要他交待。要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議一議」。而中央文革碰頭會是周恩來主持的。

1 9 6 8 年下半年專案組曾經準備與賀龍進行「面對面的鬥爭」，但是這個方案在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文革碰頭會否定。反過來，那些迫害賀龍的方案又是如何出籠的？不也是由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文革碰頭會上或者中央專案組會議上通過的？

其實「背靠背」的策略早在一年以前就出爐了。周恩來：主席說賀龍的問題要背靠背。你們寫過信，主席不批准怎麼辦？我不能拿主席的話壓你們。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多了，你們知道我的處境、我的難處：把他搞出來怎麼辦？你們知道了就不要去了。不能宣傳。宣傳也進不去。」

第二天，周恩來又傳達了「背靠背的鬥是最高指示」。

在同一次講話中，周恩來告訴這些代表：「賀龍他製造材料，說他一直跟毛主席走，是一貫正確的，這當然是不對的。你們要攻他的要害。研究問題要研究點歷史。諸如南昌起義問題，洪湖革命問題，立三路線問題以及段德昌問題。」

賀龍死亡之後，301醫院寫的兩份「關於賀龍死亡原因的報告」都上報給周恩來。周恩來無批示。

3. 賀龍的罪名

「文化大革命」中扣在賀龍頭上的帽子有一大堆，諸如「三反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土匪、軍閥」、「二月兵變」、在體育界搞「錦標主義」，等等，不一而足。但是所有這些都不足以置賀龍於死地。正如「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足以置劉少奇於死地，而必須把他定為「叛徒、內奸、工賊」一樣，賀龍最致命的罪名是以下幾項。

（1）晏章炎揭發賀龍通敵

中共湖北省委1983年6月4日報送中共中央的中共武漢市委1983年4月14日《關於晏章炎誣陷賀龍同志的調查報告》說：晏曾三次誣告賀龍。

晏章炎：武漢市第二十中學英語教員，其父晏勳甫，解放前曾任國民黨陸軍中將參謀長、南昌行營二廳廳長、漢口市市長等職。

第一次在1964年下半年。他找學校黨支部書記袁順理談話，他說他父親在1958年被劃為右派後，曾告訴他一樁秘密。說他父親抗戰前在國民黨南昌行營二廳當廳長時，有一天收到一個報紙卷，拆開後發現一張字條，落款是一個龍字，他父親當即向蔣介石作了匯報，派了一個姓黃的去蘇區找賀龍接洽，回來後說賀龍同意投誠。情況層層反映上去，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有關材料上作批示，予以否定。筆者認為，若非真的屬實，晏章炎怎麼敢在賀龍還如日中天的時候就揭發此事？

第二次在1966年7月23日，晏寫了一份材料，繼續誣告。情況又層層反映上去，市委第一書記宋侃夫予以駁回。

第三次在1967年2月14日，晏寫了《關於揭發賀龍在抗戰前叛變的罪惡活動的材料》。由晏所參加的造反組織的頭頭專程進京交給了中央文革接待站中南組負責人，這位負責人按規定程序送交中央文革辦公室簡報組。

2月20日，簡報組原文照抄了一份送林彪、江青。2月22日，江青拿著抄件對周總理說：「這下該把賀龍揪出來了吧！」隨後，2月28日，文革辦公室將原件轉交中央軍委信訪處。3月4日，軍委辦公廳副主任金濤送楊代總長，請示處理意見。3月6日，楊代總長簽送林彪閱。3月9日，林彪在送批簽上簽了名，江青劃了圈。

（2）烈士段德昌遺孀揭發賀龍殺害段

1967年初，湘鄂西已故領導人段德昌的未亡人給武漢軍區寫了一封信，主要揭發：（1）賀龍在三十年代和國民黨有勾結；（2）賀龍在殺段德昌一事上的責任。

段德昌的未亡人劉淑雲揭發：「1933年古歷2月11日，賀龍到我家，對我說：『段德昌就要回來了，給他準備點好吃的吧。』第二天段德昌回到軍部就被捕了。同一天，我也被捕了。古歷2月13日賀龍親自審問我，一進門就問：『段德昌是反革命，你知道不知道？』」

我說『不知道』。賀問：『他是反革命，你們是倆口子，你都不知道！？』賀龍問：『段德昌平常說過哪些反動話？』我說『他什麼反動話也沒說過』。賀龍走後，2月14日、15日關向應、夏曦先後來審問了我。」劉淑雲還說是賀龍設計「誘捕了段德昌」。

關於段德昌一事，在劉淑雲揭發前後，段德昌手下的士兵、以及賀龍軍部特務班（執行看押犯人）的戰士以及親手執行槍決段德昌的戰士都寫了揭發材料，力陳賀龍的責任。

對於殺段德昌一事，對周恩來的影響不小。周恩來還「提醒」時任寧夏軍區司令的朱聲達起來揭發。

周恩來：（大意）傅傳作同志告訴我兩件事，一是賀龍不是正確路線的代表；二是段德昌同志被殺時，賀龍問他有什麼要求，段說：一我不是改組派，是共產黨；二洪湖老百姓很好；三給我一顆子彈。賀龍說他一貫正確，實際上立三路線時期，他執行的最堅決，只剩下他和關向應、夏曦三個人，誰都不相信了，段德昌同志就是他殺的，洪湖根據地是段德昌同志搞的，那時賀龍在山上，他篡了段的功勞。這一段歷史賀沒有給組織講，也沒有人揭發。關向應是個好同志，但到延安時我去找他，也沒有講。賀龍是冒險主義，後是逃跑主義。這件事你（指朱聲達）是知道的，也不揭發，你怎麼沒把段德昌同志的作風學到，而是學了賀老總的作風，所以這次寧夏搞的很不好，要好好反省反省。

朱聲達作出了回應。

朱聲達：長期以來，在思想上對賀龍不僅崇拜而且十分感恩戴德。自認為在捆改組派時捆了我，並要殺我，是賀龍、關向應救了我的。後來我在長征途中負了傷（當時在紅四師十團任連長），過金沙時掉了隊，又是賀龍派周長庚（當時是紅四師的衛生隊長）把我抬走的，因此我對賀龍感恩不盡。在這個錯誤思想指導下，對賀的重大問題一直進行包庇。一九三二年洪湖突圍、作戰、行軍都是段德昌指揮的，勝利到達了湘、鄂、川、黔蘇區，這一段功勞是段德昌同志的，但後來被賀龍竊取了，我一直沒有揭發。

我長期在賀龍部下工作，學了賀一套軍閥主義作風，一直把這種軍閥主義作風帶到黨內來，一掌遮天，目中無人，大搞一言堂，在黨內進行家長式的統治，破壞了黨的集體領導，破壞了我黨的光榮傳統。在部隊建設上不抓根本，不突出政治，而是搞突出軍事，貫徹彭、羅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在同志之間拉拉扯扯，對待不同意見的同志進行打擊。報復。對黨、對組織陽一套、陰一套，玩弄兩面手法。總之，在思想上、作風上，完全是資產階級軍閥主義一套，與毛主席的教導格格不入。這是我所犯錯誤的一條重要原因。

周恩來說：三二年還是三三年「肅反」，第一個就把段德昌同志殺了，說他是「改組派」，實際上他是一個很好的同志，是洪湖地區的創始人。解放後講起這個事才平反了。賀龍說這個問題他不負責任，把責任推給夏曦，肅反時的負責人是賀龍、夏曦、關向應，賀龍是頭子。我曾找他談過話，說肅反應該是賀負責，賀一直認為由夏曦負責，這次他才承認錯誤。這次我到武漢，部隊一同志說：打死段德昌起決定作用的一票是賀龍。我（總理）說這句話很公道。兩個結論：賀龍不是一貫正確的，（一）在湘西執行了立三路線，（二）肅反擴大化。

而周恩來早在1月19號提出賀龍在肅反一事上是有責任的。賀龍與1967年3月7日上交《關於洪湖地區肅反擴大化問題的報告》，為自己辯護。周恩來將材料轉呈毛澤東。

這個材料，顯然周恩來沒有相信。

（3）李仲公揭發賀龍通敵一-最致命的揭發

賀龍同志的平反有兩次。1982年10月16日的《關於為賀龍同志徹底平反的決定》指出，1974年9月29日《關於為賀龍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對賀龍同志的平反不徹底，有些提法是錯誤的。

哪些地方平反不徹底？根據《賀龍傳》以及《賀龍年譜》的記載，賀龍的主要問題是牽

涉到1927年、1929年、1933、1934年的叛變、通敵問題。1974年的《於為賀龍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對1927年以及1929年的事情絲毫不提，而這正是當時《於為賀龍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中所提當時立案是必要的依據。

而賀龍拿到這要其回答這幾個年份的提綱時候，惱怒異常，「冤枉」二字寫滿幾張紙！賀龍怒吼：「他們要是叫我簽字畫押，我就寫這兩個字。要是槍斃我，我就喊冤枉！」，整整一天，賀龍就像一頭被激怒的獅子！

1968年3月26日至4月20日國務院參事多次舉行分組會，學習文件，座談揭發所謂「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歷史上的問題」。國務院參事室的「軍代表」動員參事們反映他們所知道的中共高幹的歷史情況，李仲公3月25日對「軍代表」說，我有事情反映，但必須向周總理本人單獨談。稍後李仲公將兩封據稱是早年賀龍同志的「親筆信」，交給了參事室，並提出要向周總理報告。參事室即向周總理聯絡員鄭凱同志電話報告，鄭要求將原信馬上送去。參事室即派人送去。

而李的這封信正是揭發賀龍1927年和1929年賀龍通敵叛變的親筆信！具體的說，就是南昌起義時期干了哪些陰謀活動，1929年又親筆寫投降信。

根據蔣健先生的分析：李是蓄謀已久，但信顯然不是1968年3月偽造的，否則他造假的技術和速度未免也高太快了，周總理也太好騙了！

客觀的實事則是：1968年5月20日，毛澤東接見在京學習班學員時說：「賀龍這個人，我先是保他的。但後來知道他搞陰謀，和成鈞他們一起搞陰謀，搞顛覆，我就不保他了。」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公開宣稱對賀龍不保，雖然毛澤東沒有提李信一事，但是未免過於巧合，令人遐想。

1968年6月，賀龍問題升級。賀曉明：「那個文件抬頭變了，就是坦白交代了。我爸爸一看就說壞了，我的問題升級了。」

1968年6月14日，賀龍一案正式由中央專案第二辦公室接管。

周恩來在八屆十二中全會指出：賀龍是中央點了名的壞人！既然如此，專案組對於賀龍怎麼會發善心？

「九大」上，周恩來在毛澤東講話時插話表示：彭德懷、賀龍、彭羅陸楊，薄一波、安子文證明他們是同劉少奇一樣的叛徒、內奸、異己分子。

賀龍被困在西山永遠沒有被釋放出來。

在賀龍去世後的5年以後，周恩來下令調查李仲公交來的「賀龍求降信」的真偽，結果發現所用紙張是40年代後出產的。這是不是符合實際情況呢？李仲公其人從歷史上看，是個貪生怕死的人。但是在90高齡時，在接受調查時拒不承認造假，尤其是面臨抗拒從嚴的後果，還拒不認錯，不合他的本性。

關鍵的是，為什麼當時周恩來不做紙張鑒定？1974年9月29日就要發出《關於為賀龍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而這個鑒定結論一直到1974年9月23日才出爐，這都說明了什麼？

周恩來在1975年6月對薛明說：「我對不起賀龍同志，對不起你們！我沒有保護好賀龍同志！」這個對不起，應該是誠心誠意的！

而賀曉明在接受鳳凰衛視採訪時候，突然間來了個轉折：現在呢我就覺得呢，這個問題太複雜了，太複雜了，總理有他的難處，但是他也有過失。

然而，知情人卻告訴我兩件事：1）賀龍病危的當天，黃永勝、邱會作把賀龍病危報告交上去等了四個小時左右才有回音2）薛明在私下裡接受某著名女作家採訪時，一談到周恩來就「咬牙切齒」。

而李仲公的這封信是周恩來親自處理，未經過任何第二者！周恩來受此信影響至深！在賀龍平反的過程中，直到最後一刻才去鑒定真偽，周恩來阻撓賀龍平反也就不難理解了！

南昌起義部隊在潰敗過程中，賀龍第10軍第1、2師在發生過任由粵軍繳械收編（隨之牽動了前沿陣地24師的潰散），而南昌起義時賀龍麾下的趙營長叛變導致起義提前舉行。

紅衛兵在北平《晨報》上發現的一則消息，雲賀龍曾經在1927年的8月賀龍給蔣介石、汪精衛、唐生智發過四封電報。而晏章炎自64年就開始揭發，國民黨南昌行轅公署內部刊物《軍政旬刊》（1934年第18期）上則說「熊貢卿招降一事——一切辦法均已議妥」，雖然此刊同時說明熊已經被殺。

而賀龍確確實實是「土匪」出身，腳踏兩條船，未必不是真。

關鍵的是，從賀龍的平反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出周恩來是如何對待這些材料的。畢竟揭發的許多事，周恩來都是直接受牽涉當事者之一。

1967年7月，毛澤東在楊成武面前還稱讚「賀龍同志是二方面軍的旗幟」。

不久，毛澤東變調了。毛澤東說：目前要把大批判推向一個新的高潮，成為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把批判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與批判本地區、本部門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結合起來。整個報刊的重點是劉、鄧、陶、彭、羅、陸、楊。在軍內批判重點是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羅瑞卿。

1967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央關於對徵詢「九大」的意見通報》時指出：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彭德懷、賀龍、彭羅陸楊、王明等絕對不能留在中央委員會，不能當「九大」代表。此文件發到全軍連級黨支部。

1968年2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轉發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關於深挖叛徒工作情況的報告》的批示及附件是毛澤東簽閱的對賀龍明確定性的中央文件。這是第一次對賀龍點名定性的中央文件。可想而知，以後的專案工作必須為此服務，所以筆者認為那些具體專案審訊人員還是醫療人員，下至普通看押人員、外調人員上至周恩來、黃永勝、邱會作無不要為這一定性服務。

文件指出：「劉、鄧、陶及其同夥彭、賀、彭、羅、陸、楊、安（子文）、肖（華）等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長期隱藏在黨內，竊踞了黨政領導機關的重要職位，結成了叛徒集團，他們推行了一條招降納叛的反革命組織路線，使叛徒、特務得以混進各地區各部門的黨政機關，長期竊據要職。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把這些叛徒、特務揭露了出來，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此後，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關於成立各省革命委員會的批示中都會：「要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全面落實毛主席的各項指示，繼續大力辦好各種類型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要深入開展革命的大批判，加強兩條路線鬥爭的教育，以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為武器，放手發動群眾，徹底批判劉鄧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把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彭真、羅瑞卿、彭德懷、賀龍、陸定一、楊尚昆等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及其在浙江的代理人的反革命罪行，揭透批臭，把毛澤東思想的紅旗插遍各個陣地。」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關於軍管國家體委的命令中嚴申：「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包括國防體育俱樂部）系統，是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夥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賀龍，劉仁，榮高棠等完全按照蘇修的辦法炮製起來的。」

對此，毛澤東曾經兩次對此事作出說明。

1968年5月20日，毛澤東接見在京學習班學員時說：「賀龍這個人，我先是保他的。但後來知道他搞陰謀，和成鈞他們一起搞陰謀，搞顛覆，我就不保他了。」

八屆十二中全會的閉幕式上，毛澤東重審：「過去說對賀龍是一批二保，因為他是二方面軍的代表。現在看來不能保了，因為他搞的事以前不知道。從成鈞、許光達、廖漢生等的揭發材料看來，他是破壞我們這個軍隊的。他背地搞篡軍反黨企圖是有的，但是沒有來得及。有賀龍、劉震、王尚榮、許光達這些人。不要扯遠了，就到此為止，散會。」

而若干年後，「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改口了：「聽了林彪一面之詞」，毛澤東真的是

聽了林彪一面之詞？

有意思的是，後來周恩來讓廖漢生寫為賀龍平反的材料。
賀龍最後非常明白：不是林彪的問題了，是毛澤東的問題。

4. 周恩來的責任

高文謙在其著作《晚年周恩來》如此評論道：本來弄清這件事情並不難，賀龍當即處決了熊貢卿一事，領導層中很多人都知道，而且當年湘鄂西中央局為此事寫給中央的報告就存放在中央檔案館裡。可以說，身為中共資深領導人的周恩來對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很清楚，不過當調查組按照林彪的旨意給賀龍加上「叛變投敵未遂」的罪名上報以後，他卻沒有出面為賀龍辯誣，相反還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附和了葉群的提議，正式決定對賀龍立案審查。

而向中央報送的審查（賀龍的）報告正（都）是經過周本人的手。他在上面親自動手作了修改，寫下了大段的批評，無論人們可以找出多少理由來為周恩來辯護開脫，諸如賀龍平日重用的某人向中央寫信揭發賀龍的「歷史問題」，從背後捅了一刀，讓中央一時真假難辨，但周在賀龍後來被迫書致死的問題上，是無論如何也難辭其咎的。

宋永毅則說：「（周恩來）寫了數百字的批語，……把賀龍罵得狗血淋頭，沒說一句好話」
根據楊成武的說法，當時賀龍專案組的負責人是楊成武，而領導楊成武搞專案的是周恩來。最後給賀龍定罪的就是他們搞出來的材料，不管具體負責人是楊成武還是後來的黃永勝，他們都是直接在周恩來的領導下辦案子，任何其它什麼人的揭發都要經過專案組的調查採納才能上報毛澤東、林彪等人。可以說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專案組的人是在違背了周恩來意願的情況下「蓄意陷害」賀龍。賀龍的所謂「歷史問題」不管是真是假都不是什麼大不了的問題，關鍵是對否能迎合組織的要求。

試想，周恩來為什麼就不能把證明賀龍無罪的材料上報給毛、林呢？

1968年12月30日，周恩來作關於使用賀龍歷史材料的批示：「同意。使用這些材料，應與當時背景聯繫起來，加以分析並鑒別真偽。」

可以看出的是，這裡面透露了兩個方面的問題，其一是，這些材料有問題，所以要同當時的背景聯繫起來，如果單純的看這些問題，就會造成嚴重的後果。其二，當時的背景大家都知道，只能左，不能右，你說又多少人又會有多少程度的去聯繫問題發生時的背景呢。更不要說有時候即使沒有這些問題，都要去編造。

1975年夏，在八寶山賀龍骨灰重新安放儀式上，已經身患癌症且已到了晚期的周恩來，在有人攙扶著走進八寶山禮堂時，他，聲淚俱下的那一聲撕心裂肺的「薛明啊！我來晚了……我沒有保護他……」長喊，真是催人淚下，每一個在場的人無不為之動容。「我的時間也不多了……」緊接著，周恩來又這樣告訴薛明，然後，他們痛哭擁抱。卻不知周恩來本來並未有意去參加這追悼會，是因為毛澤東批示才去的。

周恩來的喊聲中充滿了手足之情，悲切之音，7個躬，這些堂而皇之的表面文章就把多少不知內情的人欺騙一生？

四、艱難的平反過程

「林彪事件」之後，從中央到地方，上至中央常委下至普通老百姓，揭發林彪、葉群的「反黨罪行」成了他們光榮的任務和義務。

賀龍的妻子薛明自然屬於知情人。作為主管林彪一案的周恩來派出的老徐、老齊找到薛明的當天，沒有忙著讓薛明去看醫生等，而是急不可耐的讓薛明揭發葉群。薛明講述道：他們呆了半個月，薛明講了半個月，事後，他們先回去匯報去了。目的達到了，他們就走了，

是因為要先回去匯報。結果薛明後來做火車回來，連飛機都不沒有的坐。但是這個事情竟然被說成是薛明虛弱的連飛機都做不了了！

薛明被帶回北京之後，就落進了遲群的手。看守薛明的張魯妮告訴了薛明真相，是要審查薛明同葉群的關係。薛明同其子女的團圓是因為其子女寫了信要求的，並不是周恩來主動提供機會的。賀曉明回憶道：因為臨產，回到北京。姊妹三個相聚。聚首的當天，含著淚寫了封信給周恩來，要求打聽薛明的消息。第二天，周恩來就派人來，帶他們見到了薛明。

1972年12月，毛澤東出於政治目的，為了把文革整老幹部的責任推到林彪頭上，主動提及要解放一批人。毛澤東對周恩來說：「看來賀龍同志的案子假了。怎麼打倒了那麼多幹部？我也無意把他們都打倒嘛！我主要是想教育他們。」事後，總政治部派保衛部部長蔣潤觀持介紹信前往中央專案組一辦（筆者註：實為二辦）索取賀龍元帥的材料，卻吃了閉門羹。為何？誰在主管專案組？是周恩來。是周恩來沒有告訴二辦負責人可以把賀龍的材料給蔣潤觀。

1973年2月29日（原文如此，據筆者根據不同材料推斷僅是2月底，具體日子不詳，因為1973年的2月並無29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地與鄧小平、張春橋談話。據張春橋的記錄，毛澤東說：「我看賀龍沒有問題。策反的人，賀把他殺了。我有缺點，聽一面之辭。」值得提出來的是，《賀龍年譜》以及《賀龍傳》在此處的描述是不準確的，指責張春橋沒有向政治局傳達也沒有著手為賀龍平反，這種指責是不公平的。

1973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同參加中央軍委會議的同志談話時說：「我看賀龍同志搞錯了。我要負責呢，當時我對他講了：你呢，不同，你是一個方面軍的旗幟，要保護你。總理也保護他呢。不過這個人經常身上有武器。（周恩來插話：「一個小手槍，後來交了。」）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賀龍不好呢。楊、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聽了林彪一面之辭，所以我犯了錯誤。」在賀龍去世之後四年之後，毛澤東仍對賀龍帶槍一事仍然耿耿於懷。

1974年9月初，毛澤東又向陪外賓來武漢的鄧小平提出：「賀龍要恢復名譽」。毛澤東並且強調不要再核對材料了。鄧小平回京後，立刻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了傳達。是誰在核對材料？是誰當時主管整個「翻案」工作？是周恩來。

阻力不僅來源與周恩來一個人。

據知情人講，在1973年的軍委擴大會議上，葉劍英說：「賀龍的案不能翻，張愛萍的案也不能翻。」其實葉劍英和賀龍的恩怨已非一日，始自延安整風，久已。

葉是踩著賀龍的肩膀上來的。早在打倒賀龍的過程中，葉不僅緊跟毛的步調，而且對賀龍落井下石。1967年夏天，葉劍英曾對國防工業一次會議的代表這樣說過：「劉（少奇）、鄧（小平）、彭（德懷）、黃（克誠）、賀（龍）、羅（瑞卿），他們是根本不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賀（龍）、羅（瑞卿）都是有個人野心的。他們都是搞秘密活動的。」「他們是有個人野心的，賀（龍）、羅（瑞卿）經常排擠、打擊聶（榮臻）副主席。賀（龍）、羅（瑞卿）專門打擊聶老總，當然他們更打擊毛主席、林副主席，對於我這方面，就不要講了。」

1966年10月，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葉劍英和肖華就對蘭州軍區政治委員洗恆漢、新疆的王恩茂、左齊吹風：賀龍是大土匪，是大軍閥，國民黨曾派人到他那裡策反，很壞！洗恆漢替賀龍辯解，但是葉劍英和肖華根本不理睬，還讓他回去向在軍區部分領導傳達。

1974年9月13日，中央專案審查小組上報《關於為賀龍同志恢復名譽問題的報告》。對於賀龍的骨灰安葬將秘密舉行，「實行五不政策」，對此賀捷生非常不滿。賀捷生直接上書中南海，此信由周恩來轉呈毛澤東。賀捷生說：因為我和張玉鳳的父母是鄰居，我們交流過，張玉鳳說，毛主席對你爸爸，覺得有歉意。他還有個批示，所以總理才能去參加追悼會」

五、分析和結論

1. 毛澤東的作用

毛澤東是持有決定權。誠如周恩來所說：定性由主席定！

1966年七、八月份，為了給大學裡派工作組的事，毛、劉的矛盾已經表面化。兩位夫人一個在北大，一個在清華，觀點截然對立。這個時候賀龍的表現顯然是無法讓毛滿意的。而賀曉明是被認為代表了賀龍的態度的。

毛澤東說：「亂了就可以亂出名堂來，四川、貴州最亂，主要是賀龍、羅瑞卿、李井泉搞的。」

從賀龍專案組的設立來看，沒有毛的同意誰都不可能對賀龍進行立案調查，就像上海會議解除賀龍的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權力樣，沒有毛的同意和首肯，也是不可能的。

起關鍵作用的則是二方面軍高級將領的揭發，才導致毛澤東決定「不保了」。

毛澤東的態度決定了賀龍的命運。

薛明說：「（賀龍能夠平反），我想這都是毛主席幾句話的結果。」

2. 林彪的作用

建國以後，1963年賀龍代林彪主持軍委，有觀點認為林彪要重新奪回權力，所以置之賀龍於死地。林彪要不要通過打倒賀龍來奪回權力呢？1959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改組中央軍委，新的軍委由21人組成，中央軍委主席仍為毛澤東，副主席為林彪、賀龍、聶榮臻，林彪的位置在賀龍之前，由林彪主持軍委日常工作。1963年9月，賀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但還是在林彪之下因為是林是政治局常委而且是黨的副主席。如果說林彪僅是為了奪回權力，完全可以通過組織手段，重新掌握權力。

在賀龍被害的過程中，林彪雖有牽涉，但林彪決不是主謀。林彪和賀龍鬥，林彪屬於反擊。

知情人說，在有關賀龍專案的所有材料上，林彪無任何批示。這也說明了在80年審判的時候，並無任何文字材料來證明林彪有過任何「惡毒」的批示。

文革中有一個說法：「林彪同志當即識破了這一陰謀詭計，為了讓這一小撮牛鬼蛇神充分暴露，故意暫時不予回擊，但卻一直密切注視會議的動向。」

3. 周恩來的作用

3月底賀龍薛明收到小女兒賀黎明的信，賀龍回了幾十封信，但是賀龍的子女一封都沒有收到。根據楊德中的回憶，賀龍在1967年11月8日以前，賀龍的信件都是由其直接交給周恩來，但是周一封都沒有轉交給賀的子女。1968年3月6日賀龍親筆致信楊德中要其代購治療糖尿病的藥D860，但是沒有回音。

67年國慶節的時候，賀龍發高燒。吃飯嘔吐。周恩來不講，讓傅崇碧講。康生、江青反對送301，周恩來當時不吭氣。最後只好進267醫院。

不可否認，周恩來在賀龍到西山的初期，給了一定的關懷。但是這種關懷是非常有限的，特別是類似傅崇碧所言，一旦和江青等衝突，周恩來只會默不作聲。

賀龍實際上就是自1月19日之後就被押解到西山，從而軟禁。看管賀龍的是8341部隊的戰士。當事人回憶：還有一件事，對我印象很深，賀龍元帥那時被關押在西山，那裡也歸我們團（隸屬8341部隊）管，我有一次晚上去看警衛戰士。我問執勤戰士，首長現在有些什麼要求，戰士反映首長想要吃點辣椒，專案組他們不讓給。我說，想吃點辣椒有什

麼不讓給的，怎麼這樣呢？戰士說，咱們沒辦法。那時候，賀龍身體也不太好，一兩個禮拜，不是老吃窩窩頭，就是在生活上受到虐待。《賀龍傳》裡面也寫了不少令人髮指的事情：例如飯裡面摻沙子不說，還把飯倒在地上，讓薛明賀龍象豬一樣舔著吃，這不僅是折磨還侮辱人格。

賀龍一事主要是楊德中主管，而且一直到賀龍去世！就是賀龍外出就診之後，也是要交給楊德中，由其押送賀龍回到象鼻子溝。

賀龍專案組始終在周恩來的控制之下，林根本管不著。

當毛澤東著手要為賀龍平反，周恩來一面拖，一面準備，直到1974年1月才同廖漢生談：整賀龍同志搞錯了，毛主席對這件事很關心，我也很關心。為了盡早搞清賀龍同志的幾個問題，你要寫個證明材料，以便在複查中弄清事實，作出結論。虛與委蛇而已。直到最後毛澤東催得不能再拖了，鄧小平把此事在政治局公開傳達了，周恩來才忙著為賀龍平反。

周在賀龍追悼會時連鞠七次躬，說沒能保護好賀等等，這種姿態頗能迷惑不知真相的老百姓，表演實是登峰造極。

林71年死了，賀龍74年還在被調查。楊成武也是，他的女兒楊易可是在「林彪事件」之後被迫害致死。可在楊被「解放」後，周如此跟他說：「我要向你檢討，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林彪頭上，一切幸福來自毛主席……。」

羅瑞卿復出之後，周恩來對他說：「一切仇恨要集中到林賊身上，一切恩情都來源於毛主席」。

4. 結論

文革的起因就是毛澤東要「炮打司令部」，打到羅瑞卿，穩定海空軍都是為發動文革和保證文革的順利發動。賀龍沒有理解和按照毛澤東的部署，反而四處插手，明確不贊成打倒劉少奇，不相信中央存在資產階級司令部，因而，賀龍也成為了順利發動「文革」的「絆腳石」，被打倒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也是必然結果。

一旦專案組成立，本著「一切要為政治服務」，受專案審查者的「罪名」基本上都是根據當權者的政治需要來製造的，而不是根據事實來判定的。而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大批原二方面軍將領被牽涉關押審訊則是標準的時代產物。例如受賀龍一案牽連的許光達，在受到嚴重迫害後，其子許延濱曾經寫信給周恩來，要求周派人來同許光達談一次話。後來專案組的人員正式通知許延濱信已轉走，但是沒有人來同許談話。時過不久，許光達就被迫害致死。

賀龍被打倒，除了其本人不安分之外，沒有毛澤東的同意誰也打倒不了他。秉承毛澤東的意思，林彪等人出面搜集材料。

賀龍專案組被毛澤東批准成立，其所有一切報毛之材料必須符合毛澤東給賀龍的定性。

「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出於政治目的，借批林彪之際，籠絡人心，把髒水都潑在林彪頭上。但是賀龍的平反，卻遇到了周恩來的阻力。究其原因，是周恩來認為李仲公的揭發是真實的。因為對於這些事情周恩來本人就是當事人，周恩來想把事情真正搞清楚也無可非議。但是這並不符合毛澤東的想法。無論材料是否真實，都無需核對，一切還是要為政治服務。

一旦大局一定，周恩來則作出一番對賀龍平反積極支持的態度，最後不惜以超出常情的七個大躬來向世人表示自己的懺悔。

故，賀龍一案必須放到整個大環境去考量，而非單純林彪之迫害。

迫害人並不都是毛澤東、林彪在迫害，解放、保護老幹部也並非都是周恩來之舉，正本

清源，撥亂反正，尚是任重而道遠。

而賀龍一案，始終在周恩來的控制之下，看守西山監管賀龍的部隊主要是 8 3 4 1 的部隊，直接受楊德中和汪東興的領導。實際上被關押在北京衛戍區的所謂無論是「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還是「叛徒」或者被周恩來直接掌管的賀龍等人，如果被紅衛兵揪鬥，都需要在周恩來的同意下才能揪鬥。而賀龍在西山受到的令人髮指的慘酷迫害，更是在周恩來直接掌控下發生的，直至賀龍去世！周恩來在賀龍一案上，絕不僅是保護的一面，更多的是迫害，而且在賀龍的平反上不僅不積極，而是推遲延誤直到毛澤東明確表態之後，才開始積極為賀龍平反。

因此，周恩來在賀龍之死上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第二部分第十章

周恩來與清查「五?一六」運動

文革期間的清查「五?一六」運動可以稱之為文革期間最大的冤案。「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本是北京部分高校的一個規模不大的造反組織，以多次張貼炮打周恩來的大字報而著稱。但是隨後被定性為「反革命組織」，遭到包括毛澤東、周恩來在內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殘酷鎮壓。事情並未因「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的消失而結束，徹底清查「五?一六」被作為清除異己、鞏固新誕生的革命委員會而被擴大到全國範圍。全國因此受牽連的不下百萬之巨。在清查「五?一六分子」運動中，手段之殘酷，時間之漫長，涉及面之廣，逼死逼瘋逼殘的人之多，為文革中其他運動所未有。在這株連甚廣、卑鄙殘暴，不可寬恕的清查運動中，反對周恩來就是反革命，周恩來同其他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更是密切、通力合作，充分展現了和江青等人同在一個戰壕作戰的風采。同時，周恩來也藉機在外交部等領域剷除異己，清洗對立面。而文革結束後，此冤案竟然沒有被官方所正式平反過，雖然最後證實這是一場人為的打擊實際上並不存在的「階級敵人」的政治運動。

一、「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的起源與瓦解

「五?一六」的直接起因是 1 9 6 7 年 5 月 1 6 日公開發表《五?一六通知》。此通知的發表，對一些人來說可能意味著中央會有新的政治動向，即要繼續揪出「那些睡在我們身邊，但是還沒有被識破的赫魯曉夫。」1 9 6 7 年 7 月 1 7 日，毛澤東在武漢說：5 月 1 6 日的通知，我同總理臨時決定的，發得那麼快，引起了很多猜測，整到總理頭上。周恩來則說：「『五?一六』的出名，是因為《五?一六通知》。去年五?一六通過的，今年發表，他們就說，這是因為無產階級司令部還有新的赫魯曉夫沒有揪出來，還在主席司令部裡。說這才是主席的戰略部署。恰恰相反，這是節外生枝，無中生有，抓小失大，破壞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鞏固，這是使敵人快意的，使我們親者痛恨的。」實際上，《五?一六通知》的發表是周恩來建議毛公布的。實則是又一批想立曠世奇功、以為又走在了歷史前沿的造反派而已。從根本上來說，這僅是無數中敢於反潮流、無政府主義思潮的一種。

「五?一六」兵團是 7 月 1 日正式出現的，主要是以北京鋼鐵學院「五?一六」（屬鋼院造反公社紅一團）和北外「六?一六」的組成，主要代表人物為張建旗、張光武等人。早在 4 月份，張建旗就寫了一封攻擊周恩來的萬言書《致總理的公開信》，送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五?一六通知》發表以後，北京鋼鐵學院的一些學生打著貫徹這個《通知》

的旗號，成立了「北京鋼鐵學院五?一六革命造反公社」。張建旗提出所謂「要掀起深入揭發高潮」和「抓新的一小撮」，活動大幅度升級，並相繼在5月份—7月份貼出針對周恩來的大字報，聲稱要揪出新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期間遭到數次來自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打壓。

5月29日，毛澤東針對最近掀起的攻擊周恩來的浪潮，在一份來信上批示：「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請文革同志向他們做說服工作。」康生看到批示後，即寫信給陳伯達、江青，建議由中央文革小召集有關造反派開會，批評「極左派」的觀點。與此同時，一些造反派強烈要求中央文革對日益增長的「炮打周總理」一事表態。1967年6月3日，陳伯達、康生、江青、戚本禹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接見外事口的革命造反派時，對「五?一六」發出警告：「把矛頭對準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極端錯誤的，必須懸崖勒馬，否則是很危險的。」陳伯達等人並指出周總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總管事務的參謀，反對周總理是嚴重的政治問題。葉群在會上也表示：「林彪同志是很尊者周總理的。」「周總理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嘛。」江青說：「有人把鬥爭鋒芒搞錯了，把鬥爭矛頭不是指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是對準周總理，一位能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同志，這就錯了。」

「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表態並沒有制止住世態的惡化。6月30日—7月1日，在張建旗倡議下開會兩天，宣稱「首都五?一六兵團」正式成立，並通過了《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第一屆代表大會決議》。決議聲稱：「周恩來是劉鄧司令部的一員幹將，是中國最大的反革命兩面派，是中國最大的賣國主義者，修正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者之一。……他是十二月黑風的煽動主角，是全國自上而下的資本主義復辟逆流的總後台，是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和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我國黨內出現的一股資本主義暗流的總後台之一，是最近全國發生一連串大規模屠殺的客觀支持者，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企圖把水攪混，篡黨，篡軍，篡政伸手來摘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果實的中國第二個赫魯曉夫式的個人野心家。」

根據當時紅衛兵材料，7月14日在首都大街上及農口各局、各院校發現大量反動傳單，8月9日攻擊周恩來的大字報再度大量出現。又據記載，張建旗等在8月3日—4日開了兩個晚上秘密會議。會議決定：一，積極準備寫、印攻擊總理的大字報和傳單，公開貼出和散發。二，擴大組織，統一行動，成立所謂「八個方面軍」。經過一番準備之後，寫了7種傳單，大約印了4000份，並抄寫了13份大字報。8月9日凌晨，攻擊周恩來的大字報出現在北京街頭，張建旗等人還向北京大專院校，以及湘、鄂、粵、新疆等地郵寄傳單。

8月11日，「首都五?一六兵團」被中央文革定性為反革命，要剷除。陳伯達說：「《五?一六》（『首都五?一六兵團』）是個秘密組織，是個陰謀組織，矛頭對準周總理，實際上對準中央，對總理也對中央，要把它打倒。」江青說：「『五?一六』組織，我不重複了，總而言之是不容許的。同志們不要上當。在大革命中難免一些人混水摸魚，要提高警惕。有的人想從兩方面，『左』的或右的來動搖中央。這個中央是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執行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儘管工作中可能有些缺點，我們也力求改正。像『五?一六』這樣的組織是不容許的，是一種破壞行為。」

在中央文革的號召下，8月中下旬北京地區開始組織集中打擊「五?一六」。8月14日，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北京農業大學「東方紅」、北京師範大學「井岡山」、北京航校等成立了「專揪『五?一六兵團』聯絡總站」，下設農口、公交口、財貿口等分站。隨後包括張建旗在內的「五?一六」骨幹分子相繼被抓。北外紅旗大隊等組織還搗毀了「五?一六」的大本營——北外「六?一六紅衛兵」，抄出大批材料。8月26日下午，首都紅代會北京鋼鐵學院「延安公社」、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北京師大「井岡山」等全國一千四百多個造反派組織兩萬多人，在北京鋼鐵學院召開「徹底砸爛反動組織『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團』大會」。至此，「五?一六」全面崩潰、瓦解。

1967年9月24日，中央文革小組內部的《快報》第4621號刊登的《公安部有

關人員談反革命組織「五?一六兵團」的一些情況》說：

8月11日，江青等中央首長宣佈「五?一六兵團」是陰謀的反革命組織以後，該組織從政治上、組織上迅速土崩瓦解……但是張建旗等6—7人，仍在負隅頑抗。……8月17日，革命群眾紛紛起來抓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到8月25日，就把「五?一六兵團」的頭頭和骨幹分子全部抓起來了。

然而，事情並沒有結束。「720事件」之後，毛澤東急速左轉，武裝左派，結果天下更是大亂。8月份，竟然發生了火燒英國代辦處的極左行為。毛澤東要剎車，向右轉，於是曾經被毛澤東指定要參與外交部事務的王力被拋出，且被冠之以「五?一六」後台被整肅。在此事上，無產階級司令部表現的高度一致。

二、周恩來與中央文革在清查「五?一六」中的密切合作

1. 清除王力、關鋒、林傑

在調查「五?一六紅衛兵團」張貼反對周恩來的大字報的過程中，發現在一名「五?一六」骨幹分子的筆記本中，發現記載著《紅旗》雜誌社編輯周英的電話號碼，而周英是主管《紅旗》雜誌社的副總編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關鋒的妻子。還有個「五?一六」骨幹分子宣稱，他們同《紅旗》雜誌社編輯部負責人林傑有聯繫。當事人也斷言：僅靠這一點材料，難以判斷周英、林傑同「五?一六」有無關係，更難判斷他們是不是這個組織的後台。而且「五?一六紅衛兵團」到8月底就已經土崩瓦解，被徹底摧毀了。事情的要害不在於是否真的有牽連，關鍵在於周恩來是否認為你有牽連。

對於周恩來震動最大的是當時發生在外交部的事情。周恩來在1971年與美中友好協會會長韓丁談文革時指出：「也有人要打倒我。反革命的『五?一六』集團的建立是為了反毛主席並破壞文化大革命。但表面上，『五?一六』反對我和其他幾位中央首長。我是他們的第一號目標。『打倒第一號!』他們寫了大量反對我的資料。」這也是周恩來對「五?一六」揪住不放的一個重要原因。

「720事件」之後，八月初外交部一度失控。而「五?一六」攻擊周恩來恰恰是在這個時候達到高潮。這種局勢一個是危及自己，另一個是關係到中央的權威。同時抓「五?一六」成了周恩來在外交部掃蕩對立面穩定外交部的一個有效和有力的策略。特別是毛澤東在「720事件」之後的急速左轉之後的剎車，也認定「五?一六」是反革命組織的時候，周恩來更是有恃無恐。

首先是王力發表了在外交部影響很大的「八七」講話，受到鼓舞的外交部造反派在外交部的造反活動愈演愈烈。再次在八月二十二日夜，外事口造反派和北京一些紅衛兵組織衝擊並焚燒了英國駐華代辦處，製造了一起建國以來最嚴重的違法涉外事件。據說，周恩來知道火燒英國代辦處之後，極為震怒與自責，下令徹查。但是實際上縱火的與王力並沒有直接關係，更為詭異的是周恩來並不去把縱火的責任查個水落石出（筆者註：真正參與縱火的人並沒有受到嚴懲），而是栽贓嫁禍與王力、姚登山等人。如果真的查清了，這贓也就不好栽了！8月25日凌晨一時，周恩來單獨約見剛從上海毛澤東處來到北京的楊成武，向他談了對近來一系列事件的看法，特別談到王力的「八七講話」，並把一份講話記錄交給楊成武，要他立刻送給毛澤東看；還談了關鋒主持起草的《紅旗》社論中「揪軍內一小撮」的問題。周恩來說：這樣下去怎麼得了？我擔心的是連鎖反應。現在，一個是中央的領導不能動搖，一個是解放軍的威信不能動搖。

就在8月25日當天，周恩來針對外交部中激進分子談話：「『五?一六』在外交部有根子，有人在外面打著『聯絡站』的牌子幹壞事，你們知道不知道？將來你們跳進黃河洗也洗

不清，中央文革那裡有材料。」

8月30日，王力、關鋒被抓。對於王力的被抓，康生、江青也是非常賣力。根據王力的回憶：江青曾向毛說：「王力以為7.20以後天下不是毛澤東的了，是他王力的了。」毛說「查一查王力到底是什麼人」，然後江青和康生便證明王力是國民黨特務兼蘇修特務。

雖然後來「王、關、戚」並稱，實際上當時的稱謂是「王、關、林（指林傑）」，只是在1968年1月戚本禹也被打倒之後，林傑的名字才被戚本禹所代替。

周恩來後來多次對「王、關、戚」筆誅口伐。因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簡稱學部，即後來的中國社科院）同戚本禹等人的關係密切，周恩來對於學部清查「五?一六」是異常的關心。（詳見下文）

1967年8月31日，周恩來接見外交部黨委成員和聯絡站核心組成員時針對外交部的形勢發表談話。在談話中周恩來指責了姚登山，批評了陳家康，對於外交部的「五?一六」問題說：外面現在調查「五?一六」，材料很多，牽涉到很重要的問題，主席已經肯定了，這是一個反革命組織。外交部大一統了，不會一個沒有（指「五?一六」分子）。我看你們不要太天真了，既有「五?一六」組織。哪個地方都能鑽進去，秘密活動、抓材料。「五?一六」的後台，現在還沒完全弄清楚，現在他們唯恐天下不亂。

周恩來的這個講話已經為日後外交部清查「五?一六」的擴大化埋下了伏筆。在後來的講話中，周恩來也多次提到8月11日批陳大會、火燒火燒英代辦處，言之確鑿的認定這些都是「五?一六」分子所為。這些活動也是後來在外交部清查「五?一六」的重點之處。

2. 清查「五?一六」的嚴重擴大化

雖然「五?一六紅衛兵團」到8月底就已經土崩瓦解，但是追查「五?一六」分子卻成了當時中共高層剷除異己分子的工具。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對「五?一六」大張撻伐，紛紛強調嚴防從「右」或者「左」的方面「動搖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同時因為當時革命委員會難產，無產階級司令部希望通過鎮壓「五?一六」分子來剷除對「新生的革命委員會」稍有懷疑或持有反對情緒的人，以此來促進大批判和大聯合。因此「五?一六」問題演化成為一般的反對毛主席無產階級司令部（實際就是中央文革），反對革命委員會，反對解放軍的普遍性的反革命集團。周恩來則解釋說：「不要因為打擊『五?一六』的極左思潮，就變成右的老保翻天，以批判極左思潮來推動革命大聯合。」由此，周恩來還聯繫原來的「二月逆流」：「從三月到五月反擊『二月逆流』都是對的，『二月逆流』從右的方面干擾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是以譚震林為首的一夥人搞的，批判『二月逆流』的大會一直到八月份我都是參加了的。『五?一六』是從極『左』的方面，動搖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都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1967年9月1日，謝富治在北京市革委會常委擴大會議上講：「革命大聯合這是毛主席提出來的，主席提出要聯合。要團結共同對付『五?一六』，搞大批判。」謝富治在9月10日接見中學代表時，繼續點明主題：「根據我們掌握的材料，人數不超過50人，這50人中間很多是十幾歲的娃娃，主要是有後台老闆。」

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開始後，「文化大革命」中各類受過衝擊的人又被重新清理一遍。在謝富治領導下，公安部在1968年在公安部成立的第三辦公室，負責審查「五?一六」專案以及其他案件。1968年3月「楊、余、傅事件」後，中央成立了清查「五?一六」專案領導小組，陳伯達為組長，謝富治、吳法憲為成員，並正式部署清查「五?一六」。全國山河一片紅之後，清查「五?一六」又進一步與社會上的「一打三反」結合，成為新生政權推行「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全面專政」的重要手段。但是因為「五?一六」分子本來就沒有幾個，於是被鎮壓清除的人被冠之為所謂的「幕後人」和「操縱者」以及後台。

1967年11月27日，中央文革小組的內部小報第5633號刊登《中央機關群眾組織抓「五·一六」分子中的幾個問題》。這份材料說：「一些單位已有擴大化。」它又列舉了種種表現。謝富治、陳伯達等人也先後提出抓「五·一六」不要擴大化。1967年9月19日，謝富治接見北京紅代會工代會農代會時的講話時說「五·一六」小集團人數很少，不要到處抓「五·一六」。1967年謝富治傳達了江青的指示：「抓5.16到處亂抓。在接見工代會第一天會議上，江青同志還講了話，這個沒有向大家傳達，也應該告訴同志們。」江青同志說：不要到處抓5.16，哪裡有那麼多5.16呢？總理也說：不要借題發揮。江青同志還在會上講：不要什麼都扣5.16的帽子。」但是實際操作上，抓「五·一六」被大大誇大化。

1968年12月17日，陳伯達、謝富治接見「五·一六」專案組全體人員。陳伯達說：「有的人可能是，你們這個表裡沒有；有的人表上有，也可能不是。骨幹哪有那麼多？你們把當權派放進去，靠得住靠不住？你們認為有當權派就厲害了，那不一定。」陳伯達還說：「案子要落實，情況要弄清，要有真憑實據。」「『五·一六』這是一個反革命陰謀集團，反革命特務集團。」

對於陳伯達的這個觀點，周恩來顯然是持有不同看法的。

周恩來說：「填表不填表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他們的反革命活動，他矛頭針對無產階級司令部，要重在罪行。主要是查他們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每次運動都是說只抓一小撮，抓幾個頭頭。在實踐上，在左傾的錯誤理論指導下的運動，都是會擴大化的。因為對於到底誰是「五·一六」分子，並無明確的概念，到頭來，只能是成了整肅對立面的工具。

周恩來在1969年9月20日講話時對「擴大化」問題談到：「原來搞『五·一六』、挖『五·一六』的時候，我們提了四條：第一，不要擴大化；第二，不要讓老保翻天；第三，要區別對待，第四，要促進大聯合。提了這四條，當時是需要的。現在，抓了大批判，區別了什麼是無產階級，什麼是資產階級，當然仍要把一時的極『左』同搞陰謀集團區別開來。但是，不能強調了不擴大化，就不敢動了，就縮手縮腳了。中央各單位還沒有搞深搞透嘛！擴大化，不加區別，不要區別對待，不對，但是，不敢動，不搞深搞透搞徹底，也是不對的。要防止兩個極端。」

顯而易見的是，周恩來在這裡強調的是要繼續搞而非防止擴大化。

1970年1月24日，周恩來、康生、江青等接見中央直屬系統文化部、學部、教育部等單位軍宣隊代表，集中部署了清查「五·一六」的問題。周恩來對「五·一六」問題做了總結性的講話，指出：（一）「五·一六」歷史發展的來龍去脈；（二）「五·一六」的部份罪行；（三）深挖「五·一六」的意義。周恩來還說：「這些人（指『五·一六』分子）隱藏在最革命的中央文革裡，最革命的軍隊裡頭，就必須深挖，……既要深挖，又要謹慎。『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從文化大革命前就存在社會上，存在於機關，司令部內，但劉少奇資產階級黑司令部的暗中活動，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小撮，他們有的人原來就是跟他的，有的是派出的。」在此講話中，周恩來把吳傳啟、王力等人，甚至楊成武等人都納入「五·一六」這個大筐子。周恩來在講話中還特為中央文革塗脂抹粉，說中央文革小組揪出王、關、戚，並不影響中央文革的大方向和偉大功績，王、關、戚，也是中央文革自己揪出來的，對他們是慢慢的逐步看清的。

周恩來在陳述了王、關、戚之後，點出了楊成武的問題：「楊成武那篇文章主席很不滿意，大樹特樹不符合毛澤東思想，不能登出，但戚本禹一定要登。後來登在第二版上，楊成武還很不滿意。戚本禹道歉，王力還給送像章慰問。互相勾結，暗地活動，以後才揭發出來。（筆者註：指的是1967年11月，《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署名楊成武的理論文章--《大

樹特樹偉大統帥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大樹特樹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對一個人的認識是要經過相當一個時期考驗的。經過考驗知道戚本禹是這麼一個人，他的根子是很深的。沖機要局，搶檔案，他（與葉向真他）們是合謀，後台是楊、余、傅，肖華。……在『五?一六』通知發表之前，他們就做了很多壞事，……他們矛頭國務院是我，中央文革是康生、江青同志。

周恩來繼續說到：「這段事情很複雜，集中到『五?一六』這個問題上，名字叫『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來源是各個方面的，既有國外的帝修反，又有暗藏的反革命、國民黨特務、黨內叛徒、內奸、走資派、修正主義分子，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是個大雜燴，不僅是中央有而且地方也有，在地方插到了廣西、湖南、石家莊、湖北、四川、山西、貴州、武漢等地。……。」

在周恩來這種指導思想下，「五?一六」問題能不擴大化麼？這也是與會的江青、康生等人的共識，也是整個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共識。

由周恩來主持制定的《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經毛澤東批示，中共中央於1970年3月27日發出。此通知完全是周恩來1月24日講話精神的體現。通知說：「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在反革命兩面派肖華、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關鋒、戚本禹操縱下，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猖狂進攻，罪大惡極。有些人認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團，對清查「五?一六」極為抵觸，甚至為他們翻案，是完全錯誤的。」「『五?一六』是一個秘密的反革命陰謀集團」，「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重點應當是揭露它的骨幹分子和幕後操縱者。」

根據這個通知精神，各省、市、自治區，各地、市、縣革委會紛紛發出文件，成立清查「五?一六」領導小組和辦事機構，層層舉辦專案人員學習班，要求有領導、有計劃、有重點地發動群眾，號召廣大群眾迅速掀起一個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的大檢查、大揭發、大批判的高潮，打一場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的人民戰爭。有的地方在清查過程中，要求結合正在開展的「一打三反」運動，確定清查的重點地區、重點單位、重點事件、重點人物，重點打擊現行反革命分子。在極「左」路線的指導下，這一運動成為派性鬥爭的繼續，愈演愈烈。有的地方把文革中出現的問題，說成是由於「五?一六」的破壞，把一派群眾組織干的錯事當作「五?一六」反革命罪行來清查，將一些平日「有問題」的人戴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五?一六分子」成了一個「筐」，可以將任何人都往裡裝。《通知》雖然提及避免擴大化和搞逼、供、信，甚至採用體罰或變相體罰的手段，這是完全錯誤的，但是在實踐中，由於絕對不肯否定「五?一六」的存在，各地只會在上述通知精神下嚴重「左傾」，因此只能更嚴重擴大化而非避免。且由於普遍存在著逼供信，清查「五?一六」的問題也就陷入越清越大的惡性循環。而且通知進一步提出「國內外階級敵人同我們的鬥爭是很複雜的，反革命秘密組織決不是只有一個『五?一六』。」加上所定「五?一六」的罪行範圍廣泛，因此，「三?二七通知」雖然有制止清查「五?一六」的擴大化傾向的詞語，但實施中卻只能適得其反。

金春明先生說：這個通知還錯誤地把遭到誣陷的解放軍高級將領肖華、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同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幫助林彪、江青一夥干了很多壞事，當時已被隔離審查的王力、關鋒、戚本禹混在一起，都說成是「五?一六」陰謀集團的操縱者。後來的發展更具有諷刺性。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後，身為清查「五?一六」專案組組長的陳伯達，竟被列為「五?一六」陰謀集團的操縱者。「林彪事件」之後，林彪也成了「五?一六」陰謀集團的操縱者，而且名列首位。到1973年冬，身任公安部長、「五?一六」專案領導小組成員、並兼管專案辦公室的李震，也自殺身亡了。在下邊的清查運動中，由於大搞逼供，輕信口供，專案組負責人被咬為「五?一六」分子的事，也屢有發生。如此混亂不堪的清查，自然難以進行下去，只好不了了之。但是，這種隨意製造出來的階級鬥爭，卻使數以百萬計的幹部和

群眾經受了一場莫名其妙的痛苦的災難，造成了很大的創傷。這樣的教訓是不應該輕易忘記的。

然而周恩來卻說：「中央3月27日發了個材料，講『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在反革命兩面派肖華、楊、余、傅、王、關、戚操縱下，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猖狂進攻，罪大惡極。有些人認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團，對清查『五?一六』極為抵觸，甚至為他們翻案，是完全錯誤的。後面說清查『五?一六』鬥爭已經展開，其實也沒有大展開，沒說清楚，有些單位『五?一六』很隱蔽，一搞深了，情況就不明。有的單位出現了擴大化，後面幾段主導思想是防止擴大化。」

周恩來還辯解到說：「是不是參加組織，填表沒有，不是主要的。要重本質，罪行就是本質，形式是第二位的。當然也要弄清楚。黑會都開的。就等於組織關係了。彭德懷，黃克誠的活動就是反黨的，還需要成立什麼組織？真正的核心不一定填表參加組織，他們背著中央開會集會這種行動就是罪行，有集會就是有計劃的行動。……『五?一六』就是利用《5.16通知》作號召，搞反革命陰謀活動，他們在一起開黑會，搞秘密反黨活動，就是『五?一六』組織活動。如火燒英代辦處，衝中（央）機（要局）都有誰，怎麼去的，要講清楚，慢慢地頭頭就清楚了。他認罪了。你不處理，去追組織，不定案，就是寬大無邊，和好人一樣看待，就是一風吹。」

1970年10月，毛澤東作出批示：「『五?一六』問題不能一風吹，有些單位已經一風吹了，例如（北京）外語學院。」當天，周恩來就約8341部隊支左辦公室、駐北京外國語學院軍宣隊負責人談話，聽取匯報。翌年2月8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建立『五?一六』專案聯合小組的決定》。專案聯合小組以吳德為組長，李震為副組長，組員有13人。《決定》指出：在清查過程中「要防止擴大化，又不要一風吹」。整個專案組是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工作的。此後，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運動更加「深化」。

周恩來在1970年11月20日更是強調：「一件事在實踐中要反覆好多次，才能認識。『五?一六』問題，又搞又不搞，一會兒說擴大化。他亂咬一頓，形式上擴大化把水攪混；大家互相懷疑，實際上他自己滑掉了。今年三?二七發了個指示，他們又抓住三?二七通知中提到防止擴大化，變成一風吹了。……火燒英代辦處是公開出來搞的陰謀，這也怪我們當時沒有追下去，當時當作一時的錯誤行動……」

各地也設置了專門機構，先後開展清查「五?一六」運動。定案範圍被擴大為「三指向」，即鬥爭矛頭指向無產階級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軍，指向新生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而實際上是追查反周總理為主。吳德回憶說：當時，我們組織查了幾個事件，是涉及到全國性的東西。一個是圍困中南海，幾十萬人安營紮寨；一個是火燒英國代辦處；一個是午門大會，就是香港問題。這三個都是對著周總理的。在清查中發現他們有一句口號，叫做「要揪一個永遠健康以下的、保人保得最多的、揪出來讓你嚇一跳的人」，矛頭所向清清楚楚。以後，我們在清查中提出了一個口號，就是「誰反總理，誰就是反革命」。我們清查的這幾個事件，都涉及到他們反總理。圍困中南海，他們就是想把總理轟出來，戚本禹就逼周總理搬出中南海。然後，他們衝進去，抓劉少奇，再嫁禍周總理，他們是這麼個陰謀。火燒英國代辦處也是這樣，總理負責外事嘛。午門大會也是這樣。

此時抓「五?一六」已經變成包括周恩來在內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剷除異己的重要藉口，也成了一個把敵人可以裝進去的「大筐。」通過揪所謂幕後「反革命的黑手」，剷除自己的對立面，為權力鬥爭通用的模式，在此模式下，抓「五?一六」不可能不擴大化。

王年一先生說：「打成『五?一六』的人，沒有準確的統計，估計全國至少有幾十萬人。」嚴家其認為全國遭受誣陷迫害的有數百萬人。江蘇省趁著「三?二七通知」的東風，自1970年4月起，江蘇卻掀起了聲勢浩大規模空前的清查「五?一六」運動，1971年形成高潮，歷時三年多，打擊面之寬，手段之狠，前所未有。釀成了建國以來江蘇涉及人數最

多的一起冤假錯案，足足超過十幾萬。王力說：「我是作為『五?一六』頭子被打倒的。但是專案組審查了12年多，沒有查出我同『五?一六』有任何關係。中紀委告訴我全國整了1500萬『五?一六』分子。」

3. 清查「五?一六」成為周恩來同中央文革的粘合劑

打倒王力等人，無可避免讓人聯想到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等人。然而借「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攻擊周恩來之名，又借王力等人煽動外交部造反派之實，把王力等人歸為「五?一六」的後台加以清除，而周恩來又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一員，進而引申為王力等人不僅是攻擊周恩來，而且是攻擊了整個無產階級司令部。如此這般，既可以把王力等人和中央文革可以分開，又可以藉口凡是類似於火燒英國代辦處的「極左」行為或者反對周恩來的都可以劃為「五?一六」分子而加以整肅。對此，周恩來也是極力配合，言談之間刻意維護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團結性是不容質疑的。

1967年9月1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召開擴大會，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謝富治等分別講話。

康生說：「五?一六」兵團出現不是偶然的，「五?一六」兩個目的，從「左」的、右的兩方面來動搖毛主席司令部。同志們你們不要上當，他們實際上是想整個推翻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他們到處貼標語，打倒周總理。有的人不自覺地上當，結果幫了陰謀家、反動分子或者反革命組織的忙。這是一小撮，我們應當向同志們講清楚。這樣一小撮壞頭頭要堅決鎮壓，要立即逮捕起來。」

江青在陳伯達講話時插話表示：「五?一六」表面反總理，但實際分多少個方面軍。有的方面軍對我，有的方面軍對伯達同志。這是個重大的事件。他們就是想從『左』的方面，從右的方面動搖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想亂我們的套。「五?一六」是反革命組織。

而此時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也向外表達了一個堅強的聲音：無產階級司令部是團結一致對外的。

1967年9月5日，江青在接見安徽代表團時稱：「五?一六」是以極左面目出現的，它集中目標反對總理，實際上我們每個人的黑材料他們都整了，什麼時候都可以往外拋的，切不可上當。此講話後來在全國範圍內廣播。

1967年9月16日，周恩來、陳伯達、江青接見大專院校代表時周恩來做了長篇講話。周恩來首先對前陣子中央文革的「友好」表示回應，特別強調了他與中央文革之間的密切無間的關係：「江青同志九月五日有一個講話，你們放了錄音了吧？（眾：都放了。）她講了三個問題，可是你們的做法與這三個問題都相反。」

接著，周恩來說：「9月1日在市革委會擴大會議上，我們講了『五?一六』兵團是一個陰謀反動組織，它要動搖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姚文元又提出了它的性質。但這主要是一小撮壞頭頭，從極『左』方面破壞黨的領導，我們要認真對待。他們的矛頭不是反對我個人，實際上是對中央文革，我與中央文革是堅決一起戰鬥的嘛，一起辦公的嘛，這是統一在毛主席、林副統帥指導之下的。這你鑽什麼空子呢？有人想從極『左』鑽空子，我們小將到處傳聞，油印，推論，臆造，總歸是干擾我們的工作，我們今天就是幫助你們。」

最後周恩來說：「『五?一六』兵團以極『左』面貌動搖毛主席的司令部，從內部挑撥我和中央文革的關係。我和中央文革不可能都是一個口吻，如果談什麼事都是一個口吻那就一個人講好了。（康生插話：勾心鬥角的看待中央文革和無產階級司令部。）這是資產階級思想，『五?一六』從極『左』方面來干擾。但也要防止『二月逆流』那樣從右的方向來干擾，兩者形式不同，實質相同。所以我們要指出『五?一六』問題，但不允許老保翻天，不能借此機會翻案。文匯報今天講，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要從中央領導鞏固起。」

周恩來還說：「我們學主席著作不好，我四十六年黨的歷史，我犯過不少錯誤，也犯過路線錯誤，不需要『五?一六』來整理，我心裡清楚。我個人犯過錯誤要認識錯誤，我快七十歲了，要做到死，學到死，要改到死，跟到死，就是要至死緊跟毛主席，緊跟林副統帥。」

繼而9月17、18日，周恩來再次強調：「『五?一六』想動搖中央，挑撥我和中央文革的關係，這是不會得逞的！我和中央文革是在一起辦公的，今晚我們又在一起。」

周恩來似乎非常在意有人把他從無產階級司令部給單獨摘出來。周恩來的聯絡員董楓在1967年12月1日再次傳達了周的觀點：「五?一六」中央已經宣佈是個反革命組織了，「五?一六」不僅是反總理一個人，總理是主席身邊的，毛主席說的話，通過總理來貫徹，反總理不光是反總理，是反中央，反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總理很多講話是毛主席講的，但是總理不能說那句話是主席講的，針對總理是針對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財貿口（「五?一六」）直接對總理，實際不僅是總理一人，實際是對準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問題，是反中央的問題，是搞陰謀活動。

對於清查「五?一六」，無產階級司令部，表現的異乎尋常的一致。周恩來江青等人在1969年8月接見文藝口代表同志的談話充分體現了這一點。江青說：我們對於「五?一六」問題，要認真對待，不許他們翻案，只要交待好的，完全可以從寬處理，可以不扣反革命的帽子，交待得不好的，隱藏起來，那要查出來，可就不客氣了。姚文元插話說：包庇那更是不許可的。謝富治則說：不能麻痺，包庇就更壞了。掌握政策把敵人查出來。周恩來應和到：堅決貫徹江青同志講話精神，把「五?一六」搞一搞。

由此折射出來的，在使用專政手段對付民眾對付反對者的問題上，周恩來與毛澤東、中央文革等沒有什麼區別。特別是在以國家暴力機器為後盾，政府在清除地、富、反、壞、右，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等諸多事情上，無產階級司令部是保持了高度的一致。由此可見在這場可以稱之為「浩劫」的大災難上，周恩來注定是要被審判的。

4. 清查「五?一六」擴大化的一個樣板

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簡稱學部）的清查「五?一六」運動是在周恩來一手指導下進行的。周恩來更是直言：關鋒的根子在學部。王力、關鋒被端出來，學部與其有密切聯繫的潘梓年、吳傳啟、林聿時、周景芳、洪濤、王恩宇為首的「紅衛兵聯隊」一派就垮了台。

對於學部的清查「五?一六」，當事人孟祥才有個詳細的回憶：

我參加的「大批部」也興師動眾地抓了一陣子「五?一六分子」。主要目標是與王力、關鋒有牽連的一派組織潘梓年、吳傳啟、林聿時、周景芳、洪濤、王恩宇等紅衛兵聯隊的骨幹分子和頭面人物。由於這些人都進了監獄，所以最後只抓了經濟所的周慈敖。據有人揭發她整了周總理的材料。……1968年底，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工軍宣隊）進駐學部，先搞了一陣子大聯合，批判「走資派」。1969年下半年開始全國規模的清查「五?一六」運動，學部成為重點單位。由於除鋼鐵學院外其他地方根本就不存在「五?一六」組織，所以，由此開始的全國性的清查「五?一六」運動，也就只能是「莫須有」的大冤案了。

學部的清查運動開始不久，當時中央的一個重要的負責人（筆者註：此負責人即為周恩來）就接見了學部工軍宣隊的主要領導。他根據學部上呈的有關「五?一六」案情的那些編造的材料，明確指出：「學部是『五?一六』的大本營，黑據點，潘梓年、吳傳啟、林聿時、周景芳、洪濤、王恩宇、傅崇蘭是『五?一六』的操縱者、組織者、黑後台、骨幹分子。」這番話對學部清查「五?一六」無疑起了定性和導向的作用。只要承認這個假前提的存在，學部的聯隊和大批部兩個群眾組織的人誰也脫不掉「五?一六」的干係。

按照當時的思維定勢，既然中央下發了清查「五?一六」的文件，又有某重要領導人對學部「五?一六」問題的明確指示，學部肯定有很多「五?一六分子」。工軍宣隊於是大張旗

鼓地發動群眾清查「五?一六」。……清查運動儘管轟轟烈烈，聲勢浩大，但因為學部壓根就不存在這樣一個組織，自然也找不到真憑實據。怎麼辦？好辦，拿出歷次搞運動使用過的駕輕就熟的老法寶：逼供信。此法還真靈驗。……凡是欽定為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即指稱個個都反，整黑材料，乃至搞反革命武裝政變，推翻無產階級司令部，重新將當時已經打倒的劉少奇、鄧小平、陶鑄、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關鋒、戚本禹等扶上台，等等。其實，只要領導運動的人，尤其是專案組人員還具有起碼的良知，只要認真審查同一個所謂「五?一六」組織的分子們所寫的交代材料三份以上，就能判定此案純屬子虛烏有。因為所謂的「案情」人人言殊，矛盾百出。關鍵是找不到任何可以定罪的原始材料，什麼表格、照片，整領導人黑材料等，一件也找不到。清查運動進行到1970年初，清查者和被清查者心裡都明白，所謂「五?一六」組織根本就不存在。……後來哲學所的一位朋友告訴我，一次哲學所一個審查對象翻供，說被逼交代的材料都是假的。一個清查積極分子說：「什麼真的假的，給你戴上『五?一六』帽子就是真的了。」

1971年春天，上級忽然又來了指示，學部五七干校停辦，全體隊員到河南明港的一個軍營集中進行清查「五?一六」的運動。這一次，先是傳達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五?一六」不能一風吹。還傳達了一個中央文件，內容是過去運動走了些彎路，只重視清組織，忽視了清罪行，這次重新開始的清查主要是抓罪行；只要將「五?一六」的罪行一樁一件搞實了，他們就翻不了案。同時，又傳達了中央某重要領導人（筆者註：中央重要領導人即為周恩來）接見學部工軍宣隊領導的指示。大概工軍宣隊領導在匯報中談到所謂的「五?一六」組織和罪行只有交代材料，沒有原始證據，定案難度大，這位領導人要求集中力量抓罪行，並強調「群眾參加就是證據」。……不過，從毛主席和某重要領導人指示以及中央文件的內容看，近兩年的全國性的清查運動遇到了困難。因為根本不存在全國性的「五?一六」組織，用逼供信的辦法只能搞出一大堆矛盾重重，漏洞百出，經不起推敲的交代材料。如果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清查運動應該停止了。

在這次清查「五?一六」運動中，整個學部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究竟有多少人？我沒有確切的統計，估計不會少於一千人，即總人數的一半以上。近十人死於非命。歷史所被牽連在內的也在百人左右。

三、外交部的清查「五?一六」運動

外交部是周恩來的後院。對於無產階級司令部清查「五?一六」的行動，周恩來自然不會怠慢。外交部是全國清查「五?一六」的典型，頭號重災區。三千個工作人員抓了一千七百個「五?一六」，更甚的是，在1972年二十人被周恩來親自定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在全國是獨此一家，別無分店。

如同全國的清查「五?一六」，1967年8月開始到1968年是摸底排隊，到1970年開始全面展開，1972年之後開始收尾。周恩來在1967年的8月底開始直接指導外交部的「五?一六」清查。對於外交部的什麼樣子的人屬於「五?一六」，顯然有著自己的認識。1967年10月20日，中央文革小組內部的一個小報第4975號說：「10月18日下午，總理在同外交部……接待組同志談話中指出：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中有人與『五?一六』有聯繫，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活動。」實際上就在10月17日，在一次接見毛裡塔尼亞外賓後，周恩來對外交部禮賓司的工作人員說：「『聯絡站』同『六一六』的關係密切，直接間接參加「五?一六」的活動，名字我現在不說，我有名單。」同時周恩來又說：「外聯」（外交部聯絡站）核心組的檢查我看過了，很不深刻，根本過不了關，我看了很生氣。」周恩來表示：「我支持『聯絡站』到8月31日。」

周恩來為什麼「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聯絡站」）如此痛恨？早在1967年5月，

因「聯絡站」核心組的王中琪等人參入過反周恩來的短暫活動，而與王力、戚本禹等人，是支持批判陳毅的，他們更是老造反派的「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聯絡站」）的鮮明支持者。而王力那導致他倒台的著名的「八·七講話」，也就是他接見「聯絡站」核心組人員時發表的。「六·一六」是北京外國語學院贊同「五·一六紅衛兵團」觀點的極左派紅衛兵組織。1967年10月18日，副部長韓念龍在外交部大禮堂召開全部大會，宣佈周總理指示：「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核心組有人同「五·一六」有直接間接的關係。「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組織頃刻瓦解，下屬成員紛紛退出。其核心組成員王中琪等人，還被原「聯絡站」下屬組織與《攀險峰》等組織人員抓起來，以「五·一六分子」罪名，送公安部審查；因證據不足，第二天公安部即將人放出。

但是周恩來在實踐中盡量撇清自己。周恩來說：「『五·一六』也不只是炮轟總理，他們隨時都可以轉移目標，目的是要把無產階級司令部搞個亂七八糟。」周恩來又說：「不要把一切問題都歸結於反對周總理，要明確幾件事情，給毛主席抹黑了。」

陳家康是周恩來特別留意的一個重點。周恩來多次表示陳家康像一個小丑一樣，跳出來反對陳毅，實際上反對我。周恩來同時表示「你陳家康象小丑一樣，跳出來了，很壞。」原因何在？1967年4月21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召開全外交部「揭發批判陳毅及部黨委執行劉鄧資反路線大會」，部黨委成員、副部長們都一一被點名命令上台「揭發」陳毅。姬鵬飛等只好支吾搪塞，只有在運動初期曾差點被打成「三反分子」的副部長陳家康揭發到：陳毅曾在文革初的部黨委學習會上，說過毛澤東發動文革是「乾綱獨斷」。陳家康的這個「揭發」，在當時確有重磅炸彈的影響。陳家康也為他的這個「揭發」付出了沉重代價，從此他再沒有能出來工作過，直至迫害致死。

在周恩來的直接掌控和催促下，外交部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與全國的這個運動同步進行的，1968年中開始，直搞到1969年間，外交部是戰果纍纍。清查「五·一六」則是運動中的重點之重。

在抓「五·一六」的緊張關頭，周既運籌帷幄，指揮全局，又身體力行，率先垂范。他找外交部造反派若干頭頭和骨幹，勸說他們坦白交代。1969年3月31日，周恩來親自出馬接見外交部軍代表馬文波、韓立業和「大聯籌」負責人，談話中心就是推動抓「五·一六」。被接見的還有前「聯絡站」核心組成員張殿清、高誠、王中琪、黃安國和蔣書勤。周恩來在講話中一再點到王中琪和黃安國，要他們老實交代「五·一六」的組織問題。周恩來要黃安國：徹底揭發，不要冤枉一個人，也不要漏過一件事……。周除向黃這樣的二十多歲的青年做工作，還做老幹部的工作。歸國華僑出身的林兆南就是一個。他經周動員承認了，回去一想覺得不對，又推翻了。姬鵬飛不甘心，又找他談，他再次承認了。回去再想，又推翻了。如此反覆多次，被傳「七進七出」。

在威脅逼供、重點突破下，清查「五·一六」終於取得了重大成就。黃安國、洪嘉與成綏三被定為「五·一六」組織的三個組織部長（筆者註：黃與成分別是原聯絡站的核心成員）。而這三個被當作從寬處理的樣板，從而誘使更多的人承認自己是「五·一六」分子。而對於不承認的，則予以嚴懲。除此之外，包括欺詐蒙騙做偽證、專案組輪番轟炸、恐怖政策、利用親情等威逼法西斯手段，外交部清查「五·一六」取得「輝煌戰果」。到1972年的定案人數分別為：（1）正式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20人，頭一個就是姚登山，原「聯絡站」核心組頭頭王中琪也在列；（2）另有劃為敵我矛盾性質待處理的31人；（3）因「五·一六」問題給予各種處分的80餘人；（4）定為犯嚴重錯誤的170多人；（5）因「五·一六」問題而屬一般錯誤的1408人；共計1700多人。

在運動中間，1970年7月馬文波向國務院匯報說，外交部已清出了1500個「五·一六」問題的人時，周恩來說：「外交部有那麼多『五·一六』？不要頭腦發昏。」正如前所述，周恩來此話並不意味著要制止清查「五·一六」的擴大化，倒是說明了周恩來知道確實

已經擴大化了。作為掌握內情的清查骨幹張燕齡曾經把外交部清查「五?一六」嚴重擴大化的原因以及後果告知周恩來。周恩來實際上根本否認外交部的查「五?一六」有擴大化之舉。原美澳司司長現在湖南干校查「五?一六」的鄭為之，當面向周恩來陳述外交部的查「五?一六」已經擴大化，周恩來隨之把鄭為之調離其職，外放阿根廷。張燕齡也因為實事求是反映情況被清理出外交部。而那些清查的要員姬鵬飛、馬文波等人卻受到周恩來的重用。

更有甚者，當周恩來特別指示外交部要以抓「五?一六」為運動中心，陳伯達流露抓「五?一六」出現擴大化傾向，他即批評稱運動才開始怎能講擴大化，這會給群眾潑冷水。

周恩來在1970年11月份接見外事口核心組軍宣隊工宣隊負責人時關於清查「五?一六」時說：「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是在一個光明正大的運動中專門搞陰謀活動的。……姚登山沒有填表，他說沒有必要參加。他就是「五?一六」。

周恩來點名的姚登山原是周恩來一手樹立起來的典型。周恩來曾經當著姚登山的面說說：姚登山你在這裡，我要再講一遍：你在對外鬥爭時是英勇的，我對你的估價是足夠的了，是我把你派出國的，你回來我去接你了，我又推薦給毛主席接見了，報上還登了照片。不料你卻昏昏然了。這姚登山原是駐印尼使館代辦，曾在雅加達使館奮勇保護中共國旗，備受吹捧，回到北京時受到周恩來和江青的親自迎接，後在周恩來的策劃下，在「五一節」在天安門城樓看完煙火會，姚站在中間，左挽江青，右攬毛照了一張相。如此殊榮在中共歷史上堪稱空前絕後。周恩來視其為可培養對象。姚奉周恩來之命，從5月起到8月，到北京大專院校做外事報告，以圖影響紅衛兵學生正確對待外事工作，並且參加外交部的文革運動，被「聯絡站」核心組負責人聘為顧問。周恩來還提出讓姚登山參加外交部黨委常委。可是形勢突變之後，周恩來指責姚登山奪了權：大權旁落了四天。最後姚登山以反周，要奪陳毅的權（實則均為欲加其罪，何患無辭）的罪名被列為「五?一六」頭號分子，被關進了秦城監獄，長達9年多。

整個外交部當中，姚登山還不是算最慘的。比他高級得多的劉曉（八屆中央委員、外交部常務副部長）、王炳南（中美大使級代表中方大使，外交部副部長）、潘自力（駐蘇大使）和陳家康（副部長），雖曾長期與周共事，卻被定為外交部「五?一六」後台。潘、陳二人被迫害致死，王炳南是家破人亡，劉被整得精神癡呆。在無產階級司令部發起的這場政治運動中，周恩來要以更「左」的行徑來表示對黨的忠心，順帶清除異己。

四、結束語

清查「五?一六」運動基本上是以國家暴力機關作為後盾，由當時恢復原有秩序後執掌大權的當權派所搞。因此很難將其歸於所謂「四人幫」的罪行。因此，這場時間長，規模大，手段殘酷，害人無數的清查「五?一六」運動，最後竟然是不了了之。但被當作「五?一六」抓的上千萬人及受株連者，並無得到中共的一個正式平反決定。從中央到各級組織，從發動者到組織者，無一人承擔責任。筆者從來沒有聽過周恩來或者鄧穎超對此有過歉疚之詞。周恩來的檢討與世聞名。但是周恩來的檢討有哪次不是討好毛而為了自己犯下的真正錯誤而作？與毛無關，確屬個人所犯錯誤，周恩來做過檢討麼？何方先生說：抓「五?一六」迫害了上千萬人，在最後也知道並不存在「五?一六」，但是周恩來始終沒有在這個問題上表過態，講過實事求是的話。況且清查「五?一六」運動既然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共識，周恩來自然也就更加不必為此表示任何的歉疚了。

结束语：笔者对周恩来的认识

林肯總統曾有一句名言：「你可以愚弄全體人民於一時，也可以愚弄部分人民於永遠，但你無法愚弄全體人民於永遠。」

這是我們寫此書的最初動機。但是如何寫，則是得益於在美國的生活所見所得。在美國，任何一個人在被法庭判決之前，都是對被告實行無罪推定。因此，對於周恩來的歷史定位是由其所作所為而判定，而非其心態、動機來決定。不能以某一時期、某些人所定義的好人與壞人的標準去預先判定誰是好人或者壞人。周恩來是政治人物，是總理，就更應當著重於從其政績和政治遺產來考察，而不僅僅是其私德。對歷史人物的解讀，離不開對史料的分析、挖掘，觀點必須隨著新材料的面世而改變，即觀點必須是建立在材料基礎上。

孩子看書的時候睡著了，父母說：孩子真努力啊，睡覺的時候都在看書。旁人說：孩子真懶惰啊，看書的時候都在睡覺。歷史學家應該考證的是，「孩子看書的時候睡著了」這件事情，發生的具體時間、地點、有沒有旁證等等，先確定細節，再發表自己的看法。這就是筆者在寫作此書時一直堅持的基本態度。

在一個和平的時期，中共建政 27 年，而國內的老百姓不僅是一直生活貧困，更是經歷了生靈塗炭的大饑荒和文革歲月。國家從一個災難走向另一個災難，而它的國務院總理卻是一個聖潔的完人，這無異於天方夜譚，令人感覺不可思議。有人把這些不幸災難歸結為體制，但是體制不僅僅是由人在歷史當中磨合創造出來的，更重要的是錯誤的體制必須要有人來執行。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路線就是第一位的，左的路線需要左的幹部。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周恩來扮演了兩個角色，一個是現在廣為人知的角色，就是執行毛澤東的救人、滅火的角色，執行國務院的職能。另一個則是緊跟毛，全力執行毛整肅、放火、致使天下大亂的決策。沒有周恩來，毛澤東的文革戰略是很難搞下去的。周恩來更多的是扮演後者，但是現在中共宣傳和大部分人看到的是前者。

文化大革命期間充滿了一個集團和另一個集團、集團和個人、個人和個人之間的利益衝突，但是這並不是路線鬥爭。無論是在上層還是在下層，無論是在文革初期還是文革末期，路線鬥爭都不過是為了整垮對方而扣的大帽子，都不過是解決個人恩怨的托辭。所謂路線鬥爭應該是黨內在實現一定歷史時期的一定革命任務的總的指導方針問題上的鬥爭。而周恩來從來沒有對黨的指導方針表示否定過，就是其執行的批極左、解放老幹部都是執行毛澤東的命令。其行為本質是，前提是要肯定當時黨的指導方針，要達成的目標是緩和當時指導方針所造成的緊張局勢。周恩來在文革後期來被批，並不是因為路線鬥爭的原因，而是因為毛澤東的既定文革目標所致。周恩來後來成為中共樹立的楷模完全是利益的需要、大眾心理的需要而非歷史的真實。

一、周恩來是一位不合格的總理

中國老百姓是一個大量的謊言構成的體系下的犧牲品，周恩來卻是這一謊言體系的主要構建者之一。在歷次違反憲法、違反《黨章》、違反人權而發動一輪一輪的清洗整肅當中，毛澤東無疑要負首要責任。但是作為總理的周恩來應負相應的責任，不管他是被迫的、無奈的、還是無意的，在破壞法律、黨的制度上的副作用遠遠大於周恩來在執行毛澤東之命保護一些老幹部的作用，也遠遠大於周恩來所被後人稱道的那些修修補補。作為政府首腦，周恩來的主要作為不是滅火，而是保障整個國家的良好運作。如一今天的法律標準，行政不作為是要撤職，嚴重的要追究瀆職罪。

因此，從這點上來說，所謂的沒有周恩來，中國（包含文革）的災難會更大，換做他人，沒人做的比周更好是赤裸裸的謊言。因如果法律的尊嚴得到保障，黨的制度不受到破壞，即

使沒有周恩來，老幹部也會受到法律和制度的保護。

作為政治人物，最值得後人用來評價其政績的是兩點：1：政治遺產（包含國家上層政治制度，還包括基層老百姓、社會組織的民權）2：民生（老百姓的吃穿溫飽，文化教育）。

在毛澤東帶頭破壞黨和國家的制度和法律時，周恩來不是阻止毛的做法，而是忠實的執行了毛的錯誤指示。因此周是要負政治責任的。

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組在代替中央政治局、書記處的過程中，周恩來執行了毛澤東的錯誤決策。而由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文革碰頭會完全是不合黨章的明文規定。中央文革小組從誕生到正式參與黨中央的決策和執行決策，周恩來都是大力輔佐與培養的。這是一個周恩來配合毛澤東破壞黨的制度和國家的法律的一個典型範例。再比如，在1966年12月18日，在周恩來主持下，中央碰頭會決定成立王光美專案組。王光美是第三屆人大代表，受《憲法》第三十七條保護。這一做法是違背憲法的。周恩來要承擔破壞法制的主要責任。

周恩來作為總理，應該對毛進行積極有效的輔佐，在毛周圍營造出民主決策氛圍，他的責任比其它高級幹部大。做好這點，需要從革命時期就要有這個意識。如果沒有意識到，那就是沒有遠見的問題。也就是作為總理某個方面合格與否的問題，如果潛意識裡只有「效忠君主」的意識，那麼他的治國境界就存在缺陷。缺陷就是缺陷，周恩來作為總理不可推卸。面對民眾，作為政府的一號人物，周需要實際解決他們的是豐衣足食的問題。這兩點，周都需要有正面的結果，沒有正面的結果，周就需要負責。

對於最高層的幾個，需要擔當的，首先是政治責任。評價，必然需要以效果為標準，對於負面的結果，他們是不可以推卸責任的。比如，對於領導人，不能用曾經反對過搞大躍進，但是最後還是搞了大躍進來推卸責任，因為，你不是地方大員，你也不是某個部長。

建國以後，周恩來除了唯一一次對毛澤東說不外，從來沒有對毛澤東諫言過。即周對於毛沒有過正面的實際有效的制約，或者做的只是婉轉的協調，細節上的協調，對於毛的決策基本上沒有有效影響，甚者大多數是照顧毛的面子進行個別的「遣詞造句」（例如在1961年把「整頓」改為「調整」）。作為總理，更應該從源頭上去影響一個國家，即對毛的決策施加影響，而不是在毛做出決策後進行小媳婦似的「修修補補」。從源頭影響決策，是大的智慧，因壞的政策導致民不聊生，再掉眼淚，非常虛假。人禍比天災更可怕。從歷史的事實出發，周恩來根本不是委屈求全，而是完全的異化。周恩來沒有什麼需要委曲求全的。因此，說周在文革「顧全大局」「只是說了些違心話」是解釋不了的周的。因為異化的周恩來只能為毛是從，是周對於毛的認識上的缺陷，而非周性格上的缺陷。

毛澤東之所以能破壞黨的制度，視國家法律為兒戲，其主要潛在原因就是毛澤東已經被「神話」。毛澤東發動文革更是依賴其在人民群眾中樹立起來的巨大威望。對於毛的神化起源，都承認起始於延安整風時期。當時已經有很嚴重的言論箝制，比如王實味的死。當時樹立毛的權威，或許確有必要，但是，既然最後發展為「神」，其早期的「樹立權威」說法的正面意義就要大打折扣。整風運動，骨子裡的精髓應該是「神化」運動。在此運動中，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的作用是別人無法比的，雖然角色不一樣。周長期是毛的左右手，不管主觀想法如何，客觀來說，他都需要負責的。毛的「神化」，在60年代前，已經形成。因此，在追究「神化」毛的過程中，卻發現是周的責任最大。因為周的言論表態就是行為。作為中共元老和建國後的總理，周恩來所臣服而表現出來的巨大感召力是劉少奇所不能比擬的。徐向前對此就有過很深刻的解剖。

異化的周恩來，把自己完全貢獻給了毛澤東，因此在幾千萬人的冤魂還沒有散去的時候，在周恩來一手導演下，以吹捧毛澤東為主題的大型歌舞劇《東方紅》就出台。周恩來對毛澤東的恐懼已經滲入到他的血液、骨髓裡面去了。

周給中國的政治帶來了什麼？周恩來留給後人的，無論是政治制度上的遺產，還是在中國經濟方面，不是乏善可陳，而是遺禍無窮。這已經為真實的歷史所證明。而周恩來的這種

不作為完全可以用下面這個例子來證明。

一直被中共官方津津樂道的周恩來保衛老幹部的例子就是那張著名的十三人名單。在「紅八月」，紅衛兵打人抄家，草菅人命。一直和毛私交很深的章士釗也未能逃脫被抄家的命運。無奈之下章士釗寫信向毛求救，毛批示：「送總理酌處，應當予以保護。」於是，周趁勢列出一份應予保護不受衝擊的民主黨派負責人共十三人名單，對他們採取了不同形式的保護措施。正如胡平先生所認為：但是在法律被蹂躪的時代，那區區十三人名單以外的人又由誰來保護呢？當紅衛兵見到這份名單時，他們難道不是同時也得到明確的暗示：那些在名單之外的人——千千萬萬的人——是否任隨他們凌辱處置的？！事實上他們也是這麼領會，這麼行動的。誰能說在「紅八月」的血腥罪惡中就沒有周的一份？惡有大惡、中惡、小惡之分，但縱然小惡也是惡。

事實上正是對制度的破壞，才使得所有的人都置於有可能被迫害的局面。正如崔衛平先生論述到：假如你在政治局會議上「一致通過」某個打倒老幹部的決議，儘管內心多麼不贊成（筆者註：筆者並不認為周恩來不贊成。），但是並沒有阻止這種決議的產生和發揮效用，你會後、事後再力圖做出某種補償，只能是杯水車薪！你保了張三而李四呢？你保了部長級而副部級呢？你保了黨內的要人而黨外的呢？中南海住滿了怎麼辦？你保了上層而下層呢？在下層發生的並不比上層更不殘酷，許多下層的工人農民也一樣迫切地需要保護呢？他們怎麼辦？等你高高在上的周恩來親自一個一個簽字、畫押？人命早就沒了！早就人頭落地了！

二、周恩來是為毛一個人服務的

梁漱淇曾講過，周恩來是絕頂聰明的人。毛澤東召集會議，特別是建國以後，講起話來經常是國內國外、海闊天空。講完了，說，就這樣吧，究竟怎樣？別人未必明白，但周恩來全明白。餘下的事就要靠周恩來去貫徹執行了。梁漱淇的話，雖是一家之言，但起碼說明，在重大決策過程中，毛澤東的主導地位是毫無疑問的，但這之後缺不了周恩來這位總理。

在中共高層，唯一能言行如一，真正做到對毛澤東「馴服」的只有周恩來一人。造成的原因則是周恩來對於自己的錯誤定位。周應該首先是共和國 8 億人民的總理，其次才是毛的部下和助手。恰恰相反的是，周後期把自己定位於毛的臣子，而且還是愚忠的那種，所以才會對毛唯唯諾諾，卑躬屈膝。

廣義的來說，他做了黨的馴服工具；狹義的來說，他成了毛的馴服工具。自毛澤東主持中共大局後，周一直甘當配角，並不遺餘力。搞「大躍進」時，他竭力配合過毛；搞「文革」時，周是毛的第一幫兇。周恩來不花功夫理國政，把精力都用在為毛出鬼點子整肅其對手上。當聽到毛的怒斥聲時，便檢討不已，自己給自己扣上了一頂又一頂嚇人的大帽子。在人們對周恩來的讚譽中，最常聽到的話是：忍辱負重，顧全大局。忍誰之辱？負誰之重？顧誰之大局？對於周恩來來說，在政治上的首要原則是維護毛，順從毛。因此周是忍毛之辱，負毛之重，顧毛之大局，顯然不是人民的大局。同時被周恩來「忍」掉的還有人民的利益，或者是說為了黨的利益而犧牲人民的利益。如果沒有周的傾力相助，毛能折騰不起來的。周恩來的所作所為，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客觀上都起到了這樣的作用：延長了毛澤東的政治壽命，也延長了中國人民的苦難時間。

毛澤東成為「馬克思加秦始皇」式的「中國第一人」，周在其中起了最重要作用的作用。強權，都是周和與周類似的人捧、慣、縱出來的！從「反『反冒進』」以後到 1976 年周恩來政治生命的完結，對於毛澤東的每次倒行逆施、出爾反爾，周恩來都是盡量配合。僅以林彪為例，周恩來揣測毛澤東的旨意，苦口婆心的勸誘林彪騎上虎背。但是當毛林翻臉之時，周恩來則堅決的站在了毛澤東一邊，並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因此很難想像沒有周恩來的毛澤東的時代，會是一部什麼樣的歷史。歷史不能假設，誰也無法回答。

周恩來在文革中多次表態：要緊跟毛主席，不要掉隊。這就是周恩來的跟人政治哲學，無條件的緊跟毛個人，不管毛本人是對還是錯。事實上，周恩來從來沒有表示質疑過毛的對錯。中共政權形似一個「金字塔」。毛澤東是「金字塔」的最頂端，而處於「金字塔」頂端的其他人既對毛澤東亦步亦趨，誠惶誠恐，又十分迷戀自己的權力，周恩來也是其中的一位。周恩來也知道自己的權力都是來自於毛本人，這也是周要緊跟的一個內在原因。

周恩來在建國後，不僅在自己正確的情況下做檢討，而且經常以顧全大局的名義勸別人向毛澤東投降。客觀的效果則是周幫助毛製造了黨的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分裂，無論是1959年的廬山會議還是1970年的廬山會議。

毛澤東知道，周恩來並不反對文革，但是在歷史上，周有幾次都是靠批前任一把手而鞏固地位的。特別是當毛對赫魯曉夫在斯大林去世後做得的報告懷有深深的恐懼時，周就不能不遭到懷疑。周恩來對此也非常明白。當毛澤東越是臨近人生的終點，周恩來存留心頭上的恐懼越重，因為毛澤東為了杜絕周恩來式的人物最好的方式就是將其打倒。所以，周恩來就得時不時的向毛澤東表態，讓毛澤東感到放心，以示自己的忠誠。例如在1972年毛澤東突然暈厥又甦醒過後，周恩來第一句就是「主席，大權還在你手中啊。」周恩來挖空心思的並不是國家、百姓，而是如何討好毛。但是這身後秘密報告之事，卻不是毛澤東在生前所能控制的。毛能做的是消滅一切可能的人選。而周恩來則是最可能的人選。因此，無論周恩來如何做，都不可能讓毛澤東感到放心。唯一能解除這一雙方都恐懼和擔心的死結那就是周恩來死在毛澤東之前。周恩來對此或許是明瞭的，至少在1975年夏季就曾經表示了厭世的想法。

三、如果沒有周恩來，文革的災難是否會更大？

許多人用「沒有周總理，文革的災難可能會更大，換做他人，沒人做的比周更好」來為周辯護。首先這是一個偽命題，因為歷史不能假設。這正如現在有人說汪精衛是因為突然間死掉所以曲線救國的大業沒有來得及證明一樣。現在學者們能做的只是弄清楚周恩來到底做了什麼。

對於周恩來所作所為，是不能用「那是共產黨體制」的錯，或者是追究罪魁禍首亦即毛的錯來為周恩來辯護。如此，周恩來自己親手迫害、誣陷、製造冤假錯案的責任都推到共產黨身上、毛澤東身上而一了百了。正如李南央女士在其著作《我有這樣一個母親》中所舉張志新一案，有人質疑到：割喉管的人無罪，押打張志新的人無罪，公安局、法院、省委宣傳部那些揭發張志新的無罪，都是在執行上級指示、中央精神、毛主席革命路線，那麼到底誰有罪呢？對於體制所造成冤案和罪惡，是沒有辦法對誰起訴的，只能對具體的犯罪執行者起訴，正如二戰之後對戰犯的起訴一樣。因此，對待周恩來的所作所為也應當是如此追究和審視。

為了證明自己對於文革是鼎力支持的，周恩來採取了「滅親」（是否「大義」卻難說清）的行動。包括其乾女兒孫維世、親弟弟周同宇等人被捕，都是周恩來親手簽署的逮捕令。其親屬是否真的有罪，則完全是不在周恩來所要考慮的。對於中央定性的壞人，周恩來也就會將置之死地。這本身就是中共黨內鬥爭的邏輯，作為其中的一個螺絲釘，周恩來也必須這樣做。

統戰部副部長張執一在中直機關討論《歷史決議（草案）》時說：對周總理，我是衷心愛戴的，但也要實事求是，不能把他神化了。他也作了許多違心的事。總理最熟的錢瑛、榮高棠同志，錢的拘捕，總理批過，榮的叛徒帽子是周總理給戴的。人就是人，總是會犯錯誤的。王明當初要沒有周恩來同志，王明上不了台。筆者認為，同樣道理，沒有周恩來，毛澤東能夠為所欲為麼？

例如周恩來是文革時期中央專案組的總負責，所有重要的大案、要案都歸周恩來管，如劉少奇、羅瑞卿、賀龍，以及後來的林彪專案等。中央的要案均需周恩來的簽字、批准，諸如關押、審查、外出提審、接受批判、生活起居、轉移、看病、家屬探視等，事無鉅細，面面俱到。周恩來對文革中老幹部的遭受迫害負有無可推卸的責任。

中共官方後來為此辯解到：1）周恩來簽字不是周恩來個人能夠決定的，甚至是違背他的本意的；2）周恩來不得不履行手續；3）更重要的是要看周保護了很多的幹部。

但是經過具體研究周在專案組的行為後，筆者認為周所有的簽字都不是被迫的。對於是否違背周恩來的本意，周恩來從來沒有如此表示過。從一開始組織調查到最後結論的出爐，作為中央專案組的總負責，周恩來沒有不得不履行的問題。相反，這些後來被認為受到迫害的人，在當時恰恰被定位為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敵人。作為無產階級司令部對階級敵人實行專政的具體執行人，周恩來恰恰是自覺履行其必要的職責的，是兢兢業業的。周恩來要執行而且要殘酷地執行，沒有違心不違心之說，只有執行了和還沒執行之分。這也恰恰是中共官方所從不提及的事實。由此可以看出所謂的忍讓、服從大局的說法是荒謬的。更何況是，周既然簽了字就要負責。

在文革當中，作為毛的決策的最主要的執行人，周恩來帶給全中國的災難遠遠大於其行使的正常職能所帶給國家的正面作用。這個已經由歷史證明。那些以周是違心的，被迫的，本身就忽略了一個基本的邏輯：如果周是違心、被迫的，那麼數十年下來，周恩來豈不可以稱得上是歷史上最大的偽君子。而這又是官方所不願承認的。因此中共在維護周恩來的形像難免顧此失彼。

周恩來的特殊地位決定了其特殊性。例如很多人的定性都是周最早講出去的。例如對王任重的定性。在我們採訪過程中，有人表示當時只相信周講的，周代表中央麼，周講了出來之後，我們的胳膊就輪的理直氣壯了！

還有人為周恩來如此辯解到：周不簽，還會有別人簽，不會改變受害人被打倒的結果。這如同強盜頭子逼你拿刀濫殺無辜，你不但去殺，而且還冠冕堂皇振振有辭：「我不去殺，還會有別人去殺，我不去殺，同樣也不會改變受害人被殺死的結果。」這種邏輯是站不住腳的。

文革的最大幫兇就是周恩來。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在文革當中，遭到周恩來點名迫害的人達到200多名以上。對比當時江青、康生的講話，周恩來的點名遠比這兩人高的多！在中共高層會議上，周恩來更是對於中共高級將領的往事如數家珍，及時的插話。例如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問到：肖×還是打過仗的，國慶節上了天安門，這次沒有去，他是什麼問題？我也不清楚（周恩來插話說：他有段歷史不清楚。他在潮安縣一個村莊打了一仗，向敵人交了槍，還回家成了一個黨。這次被造反派查出來了。）毛澤東又問到：×××呢？（周恩來回答到：大革命失敗以後，他在梧州開書店被抓後，向敵人乞降，原判死刑，改為徒刑，他又乞降，放出來時他跪下說：「再不當共產黨。」。經過調查，確有此事，需要審查，現在不能參加這個莊嚴的會了。）

何方先生在其《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中說》：「至於給我個人，九年干校可以說一無所得。人們會說，你總還是讀了一些書吧。我卻不以為然。如果不是在政治迫害和思想壓力下，換一個真正的學習環境，我相信會讀得更多更好。」同理，如果說周恩來還在毛澤東的授意下保護了一些人，為什麼不說如果周恩來能夠堅持「反冒進」時敢於對毛澤東說不的精神，那麼許多人也就不可能遭受到迫害呢？更不用說，周恩來為了討好毛，顯示自己的「左」性，在外交部大抓特抓牛鬼蛇神、「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了。對於周恩來的所作所為是應該批判還是存有感激之情，不是很顯而易見的事情麼？「沒有周總理，文革的災難性可能會更大，換做他人，沒人做的比周更好來為周辯護。」則是不折不扣的歪理了。

周恩來要扮演很多不同的政治角色，但是首要的角色則是要無條件的忠實於毛個人，熱

衷於吹捧對毛的個人崇拜，千方百計維護毛澤東的個人權威，不折不扣的執行毛的所有指示，大大的擴大了文革的後果。「沒有周恩來文革的災難更大」則是地地道道的謊言了。

四、從沒有主動地去害過任何一個人的謊言

中共建政之後，一旦黨內鬥爭開場，周恩來就決不含糊，立刻就認準了誰是未來的贏家，站在強者的一邊，同時巧妙地 and 注定要倒霉的那一方疏遠。事後，周恩來都要痛打落水狗，決不會「喪失立場」，充當毛的第三隻手。1959年彭德懷一事就為一例，早期王明也為一例，後期「林彪事件」又為一例。隨著越來越多的史實披露，周恩來參與迫害的事實即使現在官方也不得不含蓄的承認。雖然中共官方不得不用違心、不得不履行組織手續為其辯護，進而提出如果換做他人，只會比周更糟的謊言。除此之外，挺周派退而求次，提出周恩來從來沒有主動的害過一個人。但是這也是一個經不起推敲的謊言。

文革伊始，周恩來還在國務院系統的國家對外文委、中國科學院和國家科委親自抓了文革試點，把這些單位的負責人張彥、韓光和張勁夫統統打入「反黨集團」。

自1967年夏季開始到1972開始收尾的清查「五·一六分子」運動，則是周恩來主動迫害人的一個鐵證。全國因此受牽連的不下百萬之巨。在清查「五·一六分子」運動中，手段之殘酷，時間之漫長，涉及面之廣，逼死逼瘋逼殘的人之多，為文革其他運動所未有。在這株連甚廣、卑鄙殘暴，不可寬恕的清查運動中，反對周恩來就是反革命，周恩來同其他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更是密切、通力合作，充分展現了和江青等人作戰在一個戰壕的風采。同時，周恩來也藉機在外交部等領域剷除異己，清洗對立面。文革結束後，此冤案因為周恩來的關係竟然沒有被官方所正式平反過，雖然最後證實這是一場人為的打擊實際上並不存在的「階級敵人」的政治運動。

清查「五·一六分子」運動，緣起於1967年春夏之交的受到無政府主義和懷疑一切思潮影響的紅衛兵炮打周恩來的行動。但是這些紅衛兵組織在8月下旬基本上全部被鎮壓。由於周恩來失責，外交部發生了火燒英國代辦處的事情。周恩來把外交部的失控歸於「五·一六」反革命的破壞。抓「五·一六」則成了周恩來在外交部掃蕩對立面穩定外交部的一個有效和有利的策略。從抓捕王力開始，到整肅陳家康，直至姚登山，周恩來在外交部掀起了腥風血雨。外交部三千個工作人員抓了一千七百個「五·一六」，更甚的是，在1972年二十人被周恩來親自定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在全國是獨此一家，別無分店。在全國清查「五·一六分子」中，「誰反總理，誰就是反革命」是重要的一個口號。

王年一先生說：「打成「五·一六」的人，沒有準確的統計，估計全國至少有幾十萬人。」嚴家其認為全國遭受誣陷迫害的有數百萬人。王力說：「我是作為516頭子被打倒的。但是專案組審查了12年多，沒有查出我同516有任何關係。中紀委告訴我全國整了1500萬『516』分子。」

五、周恩來成為偉人的背後

從邏輯上來講，當一個國家整個方向錯了，亂了那麼長時間，給國家造成那麼大的災難，而國家的主要領導卻被奉為聖人，真是不可思議！為何中國歷史上就沒有有一個在暴政下唯唯諾諾的宰相或高官能獲得如此高的評價？為何我們歷史書上就從來沒有體諒過處於周類似處境的以前所有時代的那些高官的難處？周恩來成為偉人，確實是機緣巧合。

首先是中國文化、道德方面的價值取向問題。周恩來給人的任勞任怨的形象獲得了大量普通不明真相的百姓的好感。因為即使現在，很多人還在為鄧穎超為周恩來縫補睡衣這一樸素的行為而感動。做為一個泱泱大國的總理，人們對他的要求應該是這個國家的人民處於一

個什麼樣的生活水準，是否還有人們食不果腹、衣不遮體。

周恩來的私德在中共高層，應該是相當不錯的。建國以後，周恩來確實沒有出現過緋聞。雖然大陸境外有些刊物和書籍論述到周恩來在外面也有女人，但是在筆者看來不足為證。據筆者通過某位知情人的講述，周恩來在建國後確實在男女關係上相當克制。周恩來也沒有什麼存款。但是這並不表示周恩來不會享受，不是資產階級法權的擁有者。

吳法憲回憶：周恩來有一非常漂亮的專列。半夜，吳法憲去找周恩來，發現一個女服務員正在為周恩來剪指甲。周恩來的漂亮指甲，曾經給尼克松很深的印象。丁盛回憶到，當時廣州軍區為毛澤東、周恩來等人都修了大房子。周有次住了之後，鄧穎超告訴丁盛說，周恩來很高興！周恩來在釣魚台也有自己的一幢辦公樓，中共當局在1970年也為周恩來在老使館區的一處別墅裝修過。但是這些從來在中國大陸內部是提不得的，因此是不為人所知的。

其次，在文革末期，很多人對社會充滿了怨恨，但是又無處發洩。周恩來的去世則提供了很好的一個機會，借悼念之事鬧事。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是由於毛以及其扶持的文革派的自作孽，周才在一部分人心中成了反對文革的工具。特別是在1976年初，經歷過75年整頓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反覆，老百姓對當局的怨恨已經到了一個新的層次。

當事人在回憶參加當時有名的發生在南京的「三·二九運動」時說：我們25日的悼念活動是從長江路過去的，後來數學系的同學則是繞道新街口過去的。因為當時官方不允許去悼念，所以我們的這個舉動實際上就是在挑釁了，就是一場遊行示威了。當時我們這個班去的時候，還沒有造成遊行示威的印象，但也很受社會上的注意。因為春節放假以後就沒有什麼人去梅園了，現在一下子50多人抬著大花圈走過去，就很有影響。梅園新村的管理人員很快接到通知，就把大門關起來不准我們進去悼念。同學們不管這些，有一個同學從牆上翻過去，把大門打開，大家一下子就衝進去了。其實這次活動悼念是假，挑釁是真，是想借悼念故意挑起政治事件。說實在話，當時我們反「四人幫」沒有什麼新思想，沒有提升到什麼「民主」、「自由」之類的思想高度，只是感覺這個社會太黑暗了，必須放一把火燒一下才痛快。

不可否認，確實有人是真心的去悼念總理，但是「四五事件」前後參與悼念活動的大部分群眾是暗含對毛、對文革不滿，特別當時的輓詞和貼在旁邊的匿名大字報，直接攻擊的是當時正在開展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攻擊的是張春橋、江青，甚至有的已將矛頭指向毛本人。

文革結束之後，不少中共元老開始打著周恩來的旗號反對毛澤東。例如當時剛復出的陸定一在《人民日報》發表紀念周恩來的文章，不點名的指出毛澤東犯了路線錯誤，從1958年開始直到1976年10月才結束。

顯然這種選擇是一種很無奈的，除了毛之外，還有誰能一直在中共決策層能代表中共？唯有周恩來一人而已。中共無論如何都不能是「洪洞縣裡無好人」的一個黨。

對於周恩來，據海外的文章披露，無論是鄧小平還是陳雲、胡耀邦都曾經指出周恩來是有過失的。鄧小平在文革結束後，也批評過周恩來是沒有原則的。

為了所謂「維護」周的形象，中共做的工作並不少。例如那首著名的詩《周總理你在哪裡》時，原文是「革命的征途千萬里/你大步緊跟毛主席」就被改成「革命的征途千萬里/你大步向前不停息」。

在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周恩來積極投入並支持。正如在文革剛結束文革路線還沒有被否定的時候，無數回憶懷念周恩來的文章中，無人否認這一點，恰恰相反的是，都把周恩來作為毛澤東革命路線和政策的堅定不移的忠實執行者來讚揚，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更是緊跟毛澤東的偉大戰略部署，積極的貫徹毛澤東的每一項關於文革的指示。但是30年後，這段歷史竟然被顛倒，周恩來竟然是被動違心的捲入文革，豈不是咄咄怪事？

中共把文革徹底否定的同時，把文革實際的二把手樹立為文革時期「正確」的代表，本身就是荒謬的邏輯。作為文革派的同路人，甚至是文革派的中間力量，中共把周恩來完全從中剝離出去。於是本來是掌控全部高幹生死簿，冷血殘害同僚的中央專案組的總負責，最後以保護幹部的姿態欺世盜名。但是這個這個「光輝形像」是那樣蒼白，那樣經不起歷史的檢驗。正如有人評論到：以這樣的形像作為全民的道德資源，中國的道德水準怎能提高呢？不充份揭露毛澤東的罪惡，中國的人性就不能真正覺醒；同樣地，不批判周恩來這樣的偽「道德楷模」，就難以激發中國人的道德勇氣。

周恩來向來都是審時度勢，站在強者的一邊。在周恩來看來，政治生命是第一重要的。周恩來從來沒有表示過問心無愧，只擔心後人在自己的臉上劃叉叉而已。

天道恢恢，青史無情。政治宣傳從來都是過眼煙雲，而歷史會記錄一切！

？

後記：寫作的起因與致謝-司馬清揚

本人最早對文革感興趣是因為偶然之間對林彪產生了強烈而濃厚的興趣。當時國外有個比較有名的論壇叫做文學城，討論歷史的地方叫幾曾回首。時任版主對林彪表現出極端的仇視。在漸漸討論的過程中，曾經對於時任版主所講的事情提出過疑問，但是卻遭到極力打壓。時任版主從開始的刪貼到封殺我「蓑笠翁」的 ID，無一不表現出一個活脫脫的、「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現代版的「獨裁者」。畢竟文學城是處在一個民主的社會裡，在我和另一個網友「蘇門走狗」的合作下，號召大家起來，「打倒獨裁者」。結果一舉把時任版主掃地出門。同時收穫的是對林彪的重新認識。在這期間，我在網絡上發表了大量有關林彪的文章，同時也認識了很多新的朋友。在大量閱讀林彪的材料的時候，我逐漸發現一個問題：大量的所謂認為是林彪做的事情實際上不是林彪做的，而是周恩來做的。例如「句句是真理」、在文革中主管軍委、文革中的迫害幹部等問題，特別是賀龍問題等等。筆者認為有必要正本清源。

另一方面，中共建政後，本應該是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向，但是實際上却是從革命集團向利益集團方向不斷異化，建立政權前向人民的承諾，諸如民主、富強等等等，都一一落空，在此異化的過程中，周是要負很大責任的。與其同時，毛周關係是從黨內同志到君臣關係不斷的異化，越到晚年，毛的君王意識與「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他說的就是法,他本人就是天)思想越加強烈，周越來越像毛的家僕與工具，其人格、思想越加矮化。那麼周恩來是如何一步一步的蛻化，蛻化之後又是如何的表現的呢？真實的過程則是蛻化與表現是相輔相成的。而將周與劉少奇、林彪、鄧小平對毛及對江對文革的態度，則更能體現出周的蛻化之完全。劉、林、鄧都有不同程度的不滿與抗拒。而林彪尤甚。唯獨周沒有。同林彪相比，周恩來只能在毛澤東的陰影下苟延殘喘，最後落得鬱鬱而終。而林彪的一「飛」，則是石破天驚，刺破了毛澤東的文革神話，使得國人第一次在文革中驚醒，開始反思。而林彪留下的大量的讀書札記更是證明了林彪確實是貨真價實的「右派」。值得思考的是，周到底是沒有思想還是將其隱藏得太深以致外人都看不透？這也是本人動筆的一個起因。本人通過大量的史實認為，周恩來屬於前者，而不是後者，關鍵在於經過長期的「自我閹割」或者自我麻醉都會使得本來屬於自己的東西喪失的一乾二淨！以致外來的壓迫帶來的虛幻成為真實的景象。這在生物學上完全可以得到解釋。例如周恩來對於毛的崇敬與恐懼而造成的自我矮化，在本人看來就如現代醫學證明的經過長期的外界刺激而形成的條件反射一般，完全成為潛意識的行為。

眾所周知的是，周恩來是被中共樹立為道德楷模的。在國內出版的大量有關周恩來的書，本人收集了大約近 3 0 0 套，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作為官方定論的，例如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出版的《周恩來傳》等，也包括《周恩來年譜》。此類書無疑是含有大量可信的史料，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其對於周恩來的很多活動的描述都是掐頭去尾、斷章取義，對很多事情更是絲毫不提。例如對於周恩來在中央專案組的活動，就甚少提及，即使提及也是只展

現其光輝的一面。對於周恩來在眾多專案材料上的批語則是提也不提了。第二類是曾經是周恩來的身邊工作人員寫的關於周恩來的回憶。這類書提供了大量鮮為人知的史料，特別是文革剛結束但是還沒有否定文革的時候，關於周恩來支持文革、支持毛澤東極左路線的大量做法是作為「優秀事跡」來回憶的。第三類就是非正式官方出版的有關周恩來的傳記，其特點是打「擦邊球」，或者欲言又止。而國外出版的，最為有影響力的或許應當是高文謙先生所著的《晚年周恩來》。此書應當說含有豐富的史料，但是本人認為過於拘泥於周恩來的心理活動探討。當然還有很多的英文版有關周恩來的書，在此就不再一一介紹了。

於是本人就產生了要寫一本有關周恩來的書的念頭，就是要對官史補遺，期望能夠在大眾之間塑造一個立體的、完整的周恩來的形象。此念頭一起，便一發不可收拾。起筆於倉促之間，寫作也完成於倉促之間，因此此書不足之處，必不能避免，錯誤也必定有之，包括技術性錯誤。如有提供新的史料加以辯駁或者爭論，本人將不勝感謝。這無疑要特別感謝加州大學所提供的良好便利條件，我可以借閱所有有關周恩來的資料——可以說是從全世界的圖書館中去借閱。當然遺憾之處也必定不少，例如鑒于精力有限，本人無法對周恩來與對外援助、與知識分子、文藝界人士的關係等等進行論述，而這些對於認識周恩來無疑是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在寫作的過程中，認識了很多的對文革、中共黨史頗有研究的朋友。文革史專家丁凱文、余汝信、蔣健等就是在幾曾回首闖蕩的時候認識的，在和他們的交往過程中，本人深受其益。丁凱文先生更是百忙之中給本書作序，作者不勝感激。本書的兩位作者也是這個時候相識的。

網絡論壇讓人之間的距離縮短。無論是信息的傳遞還是與人的相識都明顯優於傳統模式。在2004年夏季，通過強國軍事論壇，我又逐漸認識了張聶爾、京城孤魂、馬甲同志、海平007、相炳、山羊、danbe、書喫等一大批黨史愛好者。此軍事論壇雖然現在已經不復存在，但是在其短暫的生涯中，余汝信先生對「她」的評價甚高。特別張聶爾女士，我曾經同她用QQ（一種網路對話工具）對話多次，獲益匪淺。

在寫作的過程中，我還認識了舒雲女士並給了我很多有益的幫助，並有幸當面請教過。同樣在我回國路過湖南的時候，也得以向陳益南和楊大慶先生當面請教。

2007年8月份，我專程前往哈佛大學費正清圖書館去複印「傳說中」的程前的《文革漫談》（即王年一手稿）。在圖書館工作的Nancy Hearst給了我很大的幫助。雖然從來沒見過王年一先生，但是仍然非常感謝王年一先生。讓我感激的不僅是手稿所提供的豐富史料，更是被王年一用那板板正正的字（我稱之為是老私塾裡訓練出來的），一筆一劃的謄寫在一個個的方格裡面的精神所感動。在返程路過紐約的時候，見到了胡平先生。後來在此書的寫作過程中，還向胡平請教過。

後來何蜀和吳迪主辦了電子雜誌《記憶》，我陸陸續續的投了四篇文章。吳迪先生在百忙之中給以精心的修改。通過修改前後稿子的對比，使我學會了如何把文章寫的更加精煉、條理更加清楚。何蜀更是對此書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在此，筆者對何蜀和吳迪表示真誠的感謝。通過《記憶》，我還認識了閻長貴先生，在短短的時間內，書信交流即達幾十封。後來我還親自拜訪了閻長貴先生，閻長貴先生平易近人的作風給我留下了非常珍貴的印象。不可忘記的是，在同一行程中，我和金秋到了東家蹭了一頓飯，和丁東暢談了幾個小時。我也和卜偉華先生電話交流多次，獲益匪淺。

《記憶》雜誌帶給我的還有一位橫跨上萬里的澳洲的一位朋友，孫萬國。2009年夏季，借孫萬國來美國之際，筆者同孫先生就黨史中的許多問題交流了看法。隨後，我和孫萬國去洛杉磯同宋永毅先生見面。宋永毅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對我的寫作幫助非常大，節省了大量時間。閒談之間聊起丁抒。有次我去明尼蘇達，恰恰就在我離開之前的前一天晚上，和丁抒聯繫上了並且用電話聊了兩個多小時。雖然近在咫尺，卻因臨近午夜未能見面，頗為遺憾。

還要特別感謝許多給我提供大量史料的知情人，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不能夠提供給讀者真實的名字。

對於本書所採用照片，因年代久遠或者其他原因，沒能及時聯繫到攝影者本人或者版權擁有者，敬請攝影者本人或者版權擁有者通過出版社與作者聯繫，以便作者支付薄酬。

最後，筆者要特別感謝明鏡出版社何頻先生，沒有何先生的慧眼識珠和對我們的大力支持，就不會有此書的順利問世。另外對於在香港負責明鏡事務的黃志民先生，筆者也對其在本書寫作過程中所提供的幫助深表感謝。

「後記之二：寫作的過程 —— 歐陽龍門」

司馬清揚對各位幫助者的致謝也代表了我本人的謝意。

對於司馬清揚提到的多年前在「文學城-幾曾回首」網站發生的風波，我本人曾試圖做一些調和而未能奏效，於是只好置身事外。

下面我要就本書的寫作過程說幾句話。

大約五年前，我開始對中共黨史感興趣，尤其是對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人物和事件感興趣，開始上網看帖。去得最多的地方是「文學城-幾曾回首」，在那裡開始了自己的啟蒙時期，同時也結識了司馬清揚（當時的網名為「葦笠翁」）以及其他一些網友。當時自己對中共黨史的認識基本上是以接受中共官方的政治宣傳為主，只是對一些具體問題有質疑。通過和一些網友的交流，通過進一步閱讀歷史資料，逐漸開始從「接受中共的政治宣傳」向「探索客觀的歷史真實」轉變。司馬清揚和其他一些人也經歷了類似轉變。儘管我們在年齡上有很大的差異（我比他空長二十多歲），在地域上有很大的距離（我們分別在美國東海岸和西海岸），但是這個類似的轉變過程使我們成為忘年之交，成為本書的共同作者，而且在這個轉變過程中他常常走在了我的前面。

本書就是對這樣一個轉變過程的階段性總結。

其實這種轉變是一種趨勢。回顧文革結束後的幾十年裡，中國大陸的作者發表、出版的有關中共黨史的文章、書籍，不論是在中國大陸還是在港台、海外出版發行的，都可以看到這樣一種轉變：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共黨史研究中屬於「中共的政治宣傳」的部分慢慢開始讓位於「客觀的歷史真實」。即使是中共官方的黨史，有些作者也試圖從「中共的政治宣傳」中或多或少透露一些「客觀的歷史真實」。趨勢當中雖有反覆，但總的方向不可逆轉。仔細讀者可以從我們列出的參考文獻中看出這一點。

當司馬清揚提出寫這樣一本書的時候，我和他在對周恩來的認識上還有很大的差異。我曾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後期，對於周恩來的「光輝的一面」留有印象，而對於周的另一面則瞭解不多。但是我們的共同點是「探索客觀的歷史真實」。於是我們開始收集資料、分析資料、討論我們要用到的每一件史實。在收集資料方面他付出了比我大得多的努力，而討論的過程常常變成他說服我的過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掌握了更多的資料和證據，尤其是原始資料和證據。這就使我們能夠跳出政治的、道德的框框，完全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待事件和人物、來看待周恩來。（司馬清揚：完全的跳出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使你覺得跳出，仍然會有人認為你是在「抹黑」，認為這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行為。我們只能盡可能的跳出，置於文中的部分內容，顯然會有很多讀者認為過於政治化，特別是結論部分。而我們更希望的是，對於結論部分盡可能的看淡，而對於史實更加重視，因為即使不同的史實，仍然會有不同的解讀。）我衷心地希望本書的讀者，尤其是和以前的我類似的讀者能夠感受到這一點。